



兰台稿存

田逢禄 汇编



田逢禄,1923年5月13日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郭村,1939年1月参加革命,1946年2月入党。毕生从事档案工作:参加中央会议速记工作12年;参加《毛泽东选集》注释校订4年;主编《中央文件汇集(馆存本)》50余册;参加主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参加《毛泽东年谱》撰稿。离休前任中央档案馆办公室主任。笔耕成为他乐生之需,故离休以后仍默默地为“捍卫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这一档案工作的宗旨而耕耘着。

兰台稿存

田逢禄 汇编

2005年5月13日印制

前 言

我今年八十三岁，家居无事，闲着翻阅中央档案馆同志们的文稿；涉及的作者有：“党史资料研究室”、唐群、吴雪生、殷子贤、孙慧娟、王根广、潘合定、张景堂、张锡江、李云龙、郑淑兰、马淑德、许卿卿、许虹、陈小枚、齐得平、耿仲琳、田逢禄等。这些文稿，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写作的，有的发表过，有的未发表过，有的一时还不适宜发表。可是，其中存有不少可供史家采摭的金玉良言，可珍可惜，不可废弃。所以汇编成册，自费印制，名为《兰台稿存》，重在“存”字，留备查用耳。其中《动乱春秋》一文，作者耿仲琳央求寄存，并申明文责自负，故收作附录，其他文稿大体按成文时间顺序排列。我的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教！

田逢禄

2005年5月13日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毛泽东在抗大讲话记录稿介绍 | 耿仲琳 田逢禄 齐得平 (1) |
| 介绍毛泽东同志有关理论学习问题的几件手稿 | 党史资料研究室 (56) |
| 毛泽东同志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部分论述 | 齐得平 耿仲林 田逢禄 (60) |
| 商榷太平天国能否称为“革命”的问题 | 耿仲琳 (65) |
| 浅谈掌握材料和驾驭材料 | 耿仲琳 (68) |
| 话说“述而” | 耿仲琳 (69) |
|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问题 | 齐得平 (70) |
| 亲切的回忆 深情的嘉勉 | 潘合定 齐得平 (74) |
| 鄂豫皖红四军南下史实和张国焘的《回忆》 | 党史资料研究室 (76) |
|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编辑情况介绍 | 齐得平 郑淑兰 (94) |
| 挚友和诗友 ——毛泽东和郭沫若 | 齐得平 (98) |
| 沙窝会议辨疑(二则) | 耿仲琳 田逢禄 (106) |
| 《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作者考证 | 田逢禄 殷子贤 (111) |
| 两次中央会议时间考证 | 田仲 (113) |
| 刘少奇的一大功绩 | 齐得平 许卿卿 (117) |
|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张国焘的谬说 | 殷子贤 (124) |
| 张国焘《会师与内争》考略 | 田仲 齐雨兰 (130) |
| 关于新民学会的宗旨 | 张景堂 田仲 (146) |
| 秋收暴动文献巡礼 | 孙慧娟 (159) |
| 张国焘被捕叛变问题的材料 | 耿仲琳 孙慧娟 (170) |

兰台稿存

- 张国焘“肃反”与曾中生、许继慎被害····· 吴雪生 (205)
-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文件校勘记····· 田逢禄 (221)
- 四保临江文献资料摘述····· 田仲群 陈小枚 (232)
- 一九四八年中共接收沈阳情况概述····· 田仲德 (271)
- 读毛泽东《群众工作问题》一文札记····· 孙慧娟 田铸 (285)
- 清算张国焘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
- 1937年3月中央政治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错误问题的情况介绍
····· 田仲群 (293)
- 本世纪最珍贵的档案文献(答记者问)····· 齐得平 (322)
- 翰墨留香 风范传永
- 《刘少奇手迹选》介绍····· 齐得平 (331)
- 叛徒的末日,恶棍的下场····· 田逢禄整理 (340)
- 毛泽东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与实践····· 王根广 齐得平 (347)
- 出版毛泽东手迹应当严肃
- 评赵德昌主编的《毛泽东手书宝典》····· 齐得平 (352)
- 毛泽东科学明哲的论断和主张
- 中共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委····· 齐得平 (360)
-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红军东征····· 耿仲琳 田逢禄 唐群 (365)
- 毛泽东保护北京文化古迹纪实····· 郑淑兰 齐得平 (371)
- 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读吴瑞林著《鸭绿江——嘉陵江》····· 耿仲琳 (375)
- 一篇科学名著形成纪实····· 张锡江 齐得平 (391)
- 对西路军问题的一点意见····· 齐得平 (403)
- 毛泽东三封信写成年份考····· 齐得平 (405)
- 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证····· 陈小枚 齐得平 (409)
- 重温刘少奇关于理论学习的若干论述····· 齐得平 田逢禄 陈小枚 (413)
- 对《毛选注释》和《党史》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改动的不同意见
····· 潘合定 齐得平 (426)
- 忆在毛主席身边做速记工作····· 田逢禄 (440)
- 关于一封电报的考证····· 齐得平 (445)
- 关于西路军渡河问题的材料校评····· 田逢禄 耿仲琳 齐得平 (448)
- 《周恩来军事文选》和《周恩来年谱》若干错情辨析

| | | | |
|--------------------------|------------|-------------|-------|
| | 许虹 | 齐得平 | (468) |
| 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考 | | 齐得平 田逢禄 耿仲琳 | (472) |
| 学习毛泽东哲学著述摘记六则 ... | 齐得平 唐群 田逢禄 | 耿仲琳 | (476) |
|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注释值得商榷 | | 齐得平 耿仲琳 田逢禄 | (501) |
| 四野纵队称军时间及首任军长考 | | 陈小枚 | (508) |
|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范例 | | | |
| ——读山城堡战役决策电感言 | | 齐得平 | (519) |
| 附录:动乱春秋 | | 耿仲琳 | (526) |
| 后 记 | | | (556) |

毛泽东在抗大讲话记录稿介绍^①

耿仲琳 田逢禄 齐得平

中央档案馆保存有毛泽东在抗大的讲话记录稿 26 篇,其中一篇是 1945 年 10 月 25 日讲的,其余都是 1938 年到 1939 年这两年中讲的。大家知道,这时候,毛泽东对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经验已经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使我们党在艰苦的抗日战争环境中获得很大发展,肩负起领导中华民族抗日图存的神圣使命。毛泽东当时日理万机,但他还非常关心办好抗大,经常到抗大作讲演。他的这些讲话,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而又精辟地阐释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于研究党史军史,是十分珍贵的材料。

但是,在这些讲话记录稿中,有的记得不完全或有相当多的错讹,毛泽东生前没有来得及审查修改,现在如要出版,则需要做大量的技术性工作,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好的。有鉴于此,所以我们把毛泽东的这些讲话的基本内容做一介绍,以飨读者。

我们的介绍,力求详尽和准确地反映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分了二十六个小题目。大家知道,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 1937 年为抗大编写的。由于这个提纲已有传抄本,并且它的核心部分——《实践论》、《矛盾论》已经收入《毛泽东选集》,所以我们的介绍没有包括这篇文献。

^① 本记录稿是吴善昌主持汇编的,我们作了摘要介绍,于 1989 年分别连载于《党史研究资料》第 10、11、12 期。《抗大精神永远放光芒》一书及《熔炉》(北京抗大光荣传统研究会编)均有转载。

为什么办抗大？

毛泽东多次提出和回答了为什么办抗大的问题。

(一)

对于日本压迫我们，我们要用统一战线来打胜他，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目前的情形是力量不够，有困难，要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此时尚无健全的民众、政府与政党；“最后胜利”还是口号而非现实，要经过长期的过程；国、共、人民，力量都不足，当前任务在增加力量，这一点也是没有疑问的。

可是对于如何实行这一点，便颇有参差。

什么方法是最中心的呢？我们的党在各方面都有工作，什么才是最有效，最能联系一切的呢？

“出个报纸，办个学校”便是解答。因为它能组织而且增大抗日力量。现在不惜请工人，弄好的印刷厂，新华日报、解放报都是关于出个报纸的问题。办学校，便是为的供给人到各方面去，到南方，到北方，到前线，到后方。现在有觉悟的人不够，共产党员不够。要煽动全国的烽火，有了全国人民做干柴还不够，而火与助火的风，都需要我们来制造。各处都要我们去讲游击战、民众运动、统一战线，甚至只要到过一次延安的人都拉了去。他们相信清凉山、杨家岭山的人有法——辩证法和战法。（见1938年3月30日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的讲话）

(二)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现在力量不够，必须增加力量。那么怎样才能增加抗日力量呢？用什么方法最有效？游击队、青年团、工会、农会、共产党支部，都是增加力量的办法。但是有什么办法能够把那许多东西（共产党、工会、游击队、杂志）统统联系起来呢？有的！办一个报纸，办一个学校。现在好多地方没有共产党、工会、农会，已有的也需要巩固与扩大。有什么事情可以办呢？办报纸，解放报、新华报，一二十人印，几百人看，一人传十，十人传百，游击队，民众团体，……这一下便传开了！天下懂得大道理的人不多，安得人人讲之！洛甫、陈云不可能向全体人民讲，只可把他们讲的印成报纸，用火车轮船运到各方去。

但这总不如人好,还是要共产党来人才好。武汉只要有延安来的人,便要他讲游击战。所以办个学校是联络全国最要紧的东西,可以生新游击队,又教育人,而且会扩大。(见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第3期干部总结会上的讲话)

(三)

今天第四期开学,到的学生很多,现在真的是大学。以前也是大学,但人数没有这样多,今天人多得很,真是好事,全国各地优秀的青年男女都到这里来,这是很好的。中国共产党十年来的斗争,已能够在全国青年中有这样大的影响,这是非常光荣的。

有人说:中国打日本的战争,很快就要完结了,这是不对的。抗日战争是艰苦的长期的,要想很快的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那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要很快的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现在我们的力量是不是够了呢?如果说够了,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就可以打出去,那抗大也用不着办了。我们说:打日本的力量还不够,而且是很大的不够。因此,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要增加抗日力量。全国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的人,他们的任务,他们的工作,也是要增加抗日力量。谁增加抗日力量,就是革命工作,谁不增加抗日力量,那就不是革命工作,甚至可以说是汉奸工作。

我们的学校,就是要增加抗日力量的。因为抗日不是一两年,而是几年的长期的战争,所以要有很大的力量。我们的学校,要有几千几万人毕业出去,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们共产党今天要扩大党员到一百万,今天十几万共产党员是不够的;我们更希望国民党也要扩大,扩大到一千万。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只有十几万共产党太少了,力量不够,所以要扩大。有人问,我现在到了延安,可以加入共产党吗?我们说:可以,不过要他自愿,要经过共产党的考查。总之,在原则上我们是欢迎的。

我们不但要扩大党,同时,还要扩大军队,要有机械化的军队。今天你们做了飞机,这个很好,不过,这是假的。将来我们要有几千架的真的飞机、大炮、坦克那样的新的军队,要用飞机飞到日本去,把日本的法西斯军阀打得一塌糊涂!

不但要扩大军队,全国的人民也要组织起来,组织在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以及各种抗日的团体里,这就是增加一个很大的抗日力量。因为日本鬼子,他说中国这个地方很好,他不走有什么办法?不想走,那我们有办法,就是增

加抗日力量,要他走。在这里,我就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怎样快点增加力量,要日本鬼子快点走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办大学,抗大就是一个名字,用别的名字也可以。

现在你们在抗大学习几个月,几个月中间,你们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都研究清楚。你们中间,有的晓得制飞机,(笑)写得文章,绘得画,人才多得很。将来你们毕业出去了,日本真受不了。我们这里有清凉山,这山上的人不下去尤可,一下去就把日本鬼子赶得快些。日本人占去了我们的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早几天又占去了我们徐州。他们想占一百年,一千年,并且要永远占下去。你们中间有从北平天津来的,你们将来回去了,就不让他们占久了。那有什么办法?就是要增加量,办学校,办抗大。

虽然只有几个月的学习,你们要学成军人,并且不是老粗的军人,而是马列主义的军人。有人说:我们学三个月,怎能做军人?这个不对。像西班牙许多人,他们什么学校也没有进过,他们更没有到延安抗大来过。他们昨天还是煤矿工人,他们今天就带军队,当了排长、连长、甚至军长。(大笑)你们现在学了三个月,那还了得,我看就不得了。(大笑)

这样学好了,你们都要去带游击队,到八路军中去,到全国各地去,到敌人占领的后方山西、北平、上海去。现在有许多地方,已经有了游击队,将来你们每个人都要去组织游击队。假如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组织四千人,有四千枝枪,并且还要发展起来,那个把日本帝国主义算什么,就是三四个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要紧。

抗战是艰苦的持久的,我们决定用持久战,看日本人要多少久,就给多少久,他说五年,就给五年,他说十年,就给十年。因为没有这样久,日本人他不走,那有什么办法呢?看日本人要多少久吧,我们总答应。你们现在还没有胡子,我虽然有一点,还不多,(长时间的笑)我们一定要争取时间,一定要达到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我们还要建立新中国,要把旧的中国,变成新的中国,靠马列主义是会变的。这个工作的责任就落在你们的身上。(见1938年5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第4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抗大的教育方针

毛泽东1939年5月30日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抗大

三周年纪念》。这篇文章收进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缺少，抗大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从事学习的”。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曾是我党我军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从记录稿中我们看到这个方针在1938年3月19日的讲话中就强调了，并在以后的多次讲话中反复地强调了这一个思想。

(一)

你们一定要在学习的短短时期中完成学习计划，主要的是要学得一个方向，一种作风。方向是革命的方针，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民主义的方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一个学生说到延安一个多月，了解中国原来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于是豁然贯通，大澈大悟。中国的经济性质知道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知道了，目前中心问题是抗日问题也知道了！所以为了抗日，便要联合一切抗日的阶层、党派，来建立统一战线，同时也要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今日革命的性质，是最最要紧的东西。

其次说到作风，便是艰苦奋斗的作风。你们要练习爬山，因为“爬山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笑声)为什么如此说呢？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中国的具体任务，是去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便非吃苦耐劳，努力爬山不可！否则便成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再加上明确的，灵活的战略战术，学习军事知识，你们便是“文武双全”的干部了！会打军事的冲锋，又会打政治的冲锋。这两个冲锋有机的、统一的配合起来，便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所以，你们到抗大来可以学习三样：

- (1)正确的政治方向；
- (2)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 (3)灵活的战略战术。

有了这些，你们便可出去当教员，当排长也是教员，当新闻记者也是教员，教一切和你们接近的人，教他们如何抗日。(见1938年3月19日毛泽东对抗大5大队的开学训词)

(二)

诸同学不避艰苦,从很远的地方,风尘跋涉,来此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决心是很好的。我们彼此都不认识,但也可以说又都认识。因为在政治上我们是站在一条线上的。从政治上说,从精神上说,我们是彼此贯通的,是相识的。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的东西,不像别的大学可以学几十年;但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即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因此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的几样东西:

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向,你们却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抗日救国,怎样打,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得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抗大是军事学校,还要作一个军人,学点军人的样子。军人是老百姓变来的,大家都不肯做军人便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要广大的老百姓都愿意变作军人,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你们要学作一个军人,要学军事,要学战略战术——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这里的战略战术不是呆板的,而是灵活的。即是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我们都有一样办法对付,敌人用这一种方法打过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打过去,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等到敌人技穷了,我们便可以打胜他。总之,你们在这里要学得正确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样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胜敌人。(见 1938 年 4 月 9 日毛泽东对抗大 4 期 3 大队的开学训词)

(三)

你们来此学什么?就是学了这二条:第一条前面说过是坚定的政治方向,第二条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第二种作风,你们有了,就算不错。梁惠王曰:“不远千里而来,其将有以利吾国乎?”(大笑)你们比孟子高明,因为他只走了一千里,(大笑)你们却走了几千里。所以你们有了这作风,困难到你们面前,好象鬼在科学家面前一样。困难在共产党面前是没有的,共产党员与非党布尔塞维克一样。你个把日本帝国主义算什么,再来五个十个有何妨?你说打十年就打十年,一百年就一百年,现在不过一九三八年。你说没有大米便吃小米,没有教室就在露天讲,就是天下第一,(大笑)因为全世界没有我们那

样好,(大笑)空气最好。这两种都是要紧的,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遇到困难,便要向后转开步走,(大笑)跌下门牙流血,啼啼哭哭泪满脸,于是向后转是不好的。我们跌下门牙,扔它一旁,揩干血,再往前进。你们学了这两条其它忘了都不紧要——记住更好,忘了当然是很可惜,不过这是无关大局的——我们的政治方向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等等,那是第一条;再有坐地下,吃小米,爬山等等便是实行,这是第二条。现在你们是政治队,两月毕业,也可到军队中去,如果再加上战略战术,那是更好。我们抗大的学习有三:(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三)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条就够了。(见1938年5月4日在抗大一大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为“抗日救国”,不为“升官发财”

毛泽东在抗大的讲话谆谆诱导,要我们树立抗日救国大志,摒弃“升官、发财”观念,不当投降派,做一个为中华民族解放勇于自我牺牲的最纯洁、最伟大的人。

(一)

今天庆祝你们开学,也庆祝前方的胜利。你们在战争中学习,也要贡献所学于战争。同志们!你们都是“不远千里”几千里而来延安的,目的当然不是“升官发财”,而是“抗日救国”。即是说,你们是准备牺牲而来的,要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生命”与“打仗”,在某种情况下是二者不可兼得的。你们这种热心、积极性和牺牲精神,是最纯洁最伟大的了!值得欢迎,值得尊敬,更值得佩服。(见1938年3月19日毛泽东对抗大5大队的开学训词)

(二)

你们还要下一种决心。你们从很远的地方辛辛苦苦地来延安学习,我看是已经有了决心的。什么决心呢?延安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不知你们来此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然则远道来此,果何为呢?无疑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你们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的。你们要学抗日救国,我们要帮助你们完成。但有些人是只有一个“大概的”决心的。所谓“大概”,是说也许有点模糊,不十分坚决彻底。也许有些人是由于看了别人来自己也跟了来的,没有彻底的

认识与决心,这意思是说他的决心不是由坚定的政治方向出发的;有些人是没有经过很好的“考虑”而来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爬山吃小米饭,还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困难。要知道飞机大炮是没有眼睛的。现在日本侵华部队虽在鲁南打了败仗,可是大概还要再来。敌人抢了我们的上海、南京,还企图占领我们的潼关甚至武汉。现在山西的敌军攻下了临汾,到达风陵渡。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只牛,那么我们中国在山西的几万大军正在这牛的背后拖着牛尾巴,(大笑)阻止他南下。如我们八路军在敌人的后方,接济困难,上有飞机,下有大炮,但在这种困难环境之下还要拖牛尾巴,不断地打击敌人。你们从各地出发的时候,有的是想到了,恐怕也有的人没有想到延安的艰苦。在别的地方有鱼有肉有大米饭,这里却只有小米饭,还得爬清凉山。现在你们吃米饭、爬清凉山的决心是有了,但你们将来还要去“拖牛尾巴”。(大笑)抗日战争的前途上困难还很多,你们要下一个更大的决心——不怕任何艰苦、向前迈进的决心!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是一年半载可以解决的,而且将来还要建设新的中国。我看你们都是没有胡须的,没有胡须的人名之曰青年,青年人是勇敢的,但你们要到长了胡须的时候(自然女同志是不会生胡须的),(听众莞尔)到老到死都不动摇,不退缩。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河中行船,怯懦的常常会动摇起来,不知所措的。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要为中华民族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所以我们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是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鼓掌)现在你们牺牲升官发财及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初步决心是有了,但没有最后的决心是不够的,更要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见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对抗大4期3大队开学的训词)

(三)

抗大同志们!(鼓掌)

今天你们开三周年纪念大会。就是说:抗大已经办了三年了。我们的抗战也快二年了。抗大是做什么的?就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抗大,他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你们已有三年了,创造了很多的抗日干部,在前线打日本帝国主义有很大

的功劳；但是，同志们，现在还是开头，还有很长的时间要打。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向我们进攻。而另一方面在我们中国内部，还有很多的汪精卫派，这一派人叫“投降派”。这个投降派，他们是不赞成抗战抗到底的。他们的主张是跟日本帝国主义“讲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反对投降，反对妥协，我们是抗战到底的。这是蒋委员长的号召，全国人民都拥护，反对投降，抗战到底；我们抗大也是一致拥护，反对投降，抗战到底。我们抗大的人，不能有一个是不抗到底的！不能有一个是不反对投降的！不能有一个叛变要和平妥协的！如果有一个，就不是抗大的学生，没有资格做抗大的学生，是对抗大的反叛，是对全国人民的反叛，是对中华民族的反叛。全中国人民也是一样，各党各派也是一样，不准有一个人同日本帝国主义讲“和平”、“妥协”，一定要全体一致，抗战到底！这是你们抗大的任务。（全场高呼：打倒汉奸！打倒汪精卫派！坚持抗战到底！）三年来，根本没有变过，坚决要抗到底的！过去三年这样做，以后三年，以后多少年，我们都要这样做。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政治方针。（全场鼓掌）抗大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全场高呼：反对投降！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今天我们开这个庆祝大会，庆祝抗大三周年纪念大会，是很好的，大家欢喜的。明年庆祝四周年，五周年，六周年……，大家要努力一致，不是为了升官发财，都是为了全国的胜利，全民族的解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新中国！大家都是这个目的，这个主意，没有第二个主意，第二个目的；而且不准有第二个目的，第二个主意。我们要同心一致，结成大团体，要结成永久的团体。

同志们！今天开了三周年纪念大会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学习，加紧锻炼。毕业以后到前线去，到各方面去！抗战到底！反对投降！要作到这两句话。我们要高呼：反对妥协投降！（全场也跟着高呼）抗战到底！（全场也高呼）为中国民族解放流最后一滴血！（全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场同样高呼）中国民族解放万岁！（全场同样高呼）抗大万岁！我的话讲完了。（全场鼓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民族解放万岁！）（见1939年6月1日毛泽东在抗大庆祝三周年纪念大会的讲演）

为什么要弄清中国的社会性质？

1938年3月20日毛泽东对抗大3大队临别演讲词中论述了弄清楚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问题的意义，下文即是演讲词中的有关论述：

今天我来讲些什么？我还是来讲那一封信，那封信是一位你们的同学写来的，信里说：“过去未到这里以前，在外边看到过很多的书报杂志，五花八门，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着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就学到了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知道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我只记住了这一点。”只记住这一点，别的忘了，这是可惜得很。学了许许多多，只记住这一点，不过能够记住这一点，也算不错，这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我们要在这里革命就先要知道这里的情形，好像戏台上去唱戏，不了解戏台的情形就唱不成。知道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性的，但是不要忘了半殖民地的性质。这是最本质的东西。学了三个月，懂得这点，再学三个月，也是需要懂得这一点。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现在许许多多报章杂志都来讨论这问题，意见当然是各色都有。站在国民党立场有国民党的意见，站在共产党立场有共产党的意见，还有其它种种……。

我们认识了中国是半封建性的社会，那末，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以封建的对头——民主来对抗。有些人说：“中国是封建的社会”，这是不对的，照他的结论，目前革命任务只反封建，这种错误，显然用不着证明。托洛斯基匪徒们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这种说法的结论是说：“我们推翻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懂得中国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社会，于是乎就忽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与任务。

三民主义里的第一个口号是民族独立；第二个口号便是民权自由。这决不是孙中山先生的胡说，或者说他是“无的放矢”，他也主张要民权来解除封建的束缚。事实上，对于民主，现在已经有着部分的实现。

我们也懂得了中国社会还有半殖民地的性质，那末就是反帝，可是，有一部分人会不高兴，而且要反对，就是那些买办分子。半封建性要反封建，那末也免不了有些地主会反对的。

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的地方就在这里，大家要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所以说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可是，现在在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还是不到时候，如果他现在主张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变成反革命者。

有人会说：“现在和国民党结合（指国共合作），过去为什么要同他打呢？”是的，真是可惜得很，同他打，一打打了十年；但是那时，我们要结合，他们要分家，要打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被逼上梁山，（全场哄笑）那时不是梁山是井冈山，（全场又大笑）被逼而打。

现在外面来了一个东洋鬼子，来打我们，牵涉了民族，当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起冲突时，民族矛盾就要变为首要的地位，所谓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

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

毛泽东在抗大的讲话中，多次引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教育大家，要永远坚持革命，决不中途妥协，并与抗大同学相约，要永远以革命和抗战建国的面目相见。告戒不要学汪精卫，不要学张国焘，不要学米亚加。谆谆嘱咐：“革命是要真正革到底的”。

(一)

早几天有几个同学哭脸，武汉，广州失掉了，因为不愿意地方失掉，爱国，这个哭脸是好的，那些汉奸才再也不会掉泪哩。但我们要知道今天失掉个把城市是不要紧的，因为我们是长期战争，那些城市总归要掉的。今天还有长沙，南昌，西安，也差不多了，它要来，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打下去！要打多少年？五年还是六年我们不算数目，问问日本帝国主义要多少年？我们总归打下去，一直到胡子白了，于是把枪交给儿子，儿子的胡子又白了，再把枪交给孙子，孙子再交给孙子的儿子，再交给孙子的孙子……，总要打下去，日本帝国主义倒不倒？不倒也差不多了。（全场笑）中国古时候有件故事，有一个老头子他要搬山，因为一座山挡在他家的门口，讨厌得很，所以要搬掉它；他的儿子跟着他挖。他的隔壁也有一个老头子，说：“你要搬掉这个山，真是太笨了。”他回答说：“你才是太笨哩。你想想，我现在来搬这个山，我搬不完还有儿子，儿子搬不完，还有儿子的儿子，还有儿子的孙子……，我的儿子是不断的，是生的，是长的，然而山却是不长的”。……我们要走下去，不半路上开小差，不象张国焘半路上忽然不见了。……我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现在我们就订一个条约：不开小差，坚持长期斗争，长期学习，不怕艰苦，与我们的朋友长期合作下去，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掌声雷动）（见1938年12月1日毛泽东在抗大第4期1、3、4大队15个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

(二)

全国都有学校，有学军事政治的，有学其他的，我们抗大就是学军事政治

的其中之一。但我们有特点,我们学的东西,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还有艰苦的工作作风。抗战一定要胜利,这是政治方向,而这个政治方向是坚定的,不怕任何艰苦困难要坚持着,不要半途而废,不要学张国焘,也不要学汪精卫,他们熬不过困难,开小差了,做汉奸了。我们是长期抗战。现在同志们都没有长胡子,等长了胡子了,抗战还未胜利,就交枪给儿子。儿子长胡子了,就交枪给儿子的儿子,儿子再给儿子,再给儿子,这样下去,何愁抗战不胜,建国不成?这条道理是中国古时一个老头儿发明的。他的门前有座山,要把山移掉。有人说他,这样大的山,怎样挖得完,真愚公也。他回答说:“我死有子,子死有孙,孙有曾孙,山不能高,何愁山之不平乎?”实际上说他的人倒是一个蠢人。我们打日本帝国主义,也是这条道理,一定要这样干。今天开学,我们就订好条约:我们一开始就要以抗战建国的面目相见。我们失了武汉、广州,失了许多大城市,但无论失地怎样,我们总要达到抗战必胜与建国必成的目的。这是我们的政治方向。有了这条,还要有艰苦的工作作风,这条是足,没有足不能走路,没有这一条,就不能实行我们的政治方向。这条也是马克思主义。有嘴上的马克思主义,还要有手和足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它是不行的。我们是经过艰难困苦的,过去红军五军团到了一个地方,那里一没有小米,二没有高粱,三没有包谷,更没有大米、白面,就吃了五十天的树皮。同志们!这是实际经过了的。现在日本要封锁我们,我们就自己生产,种小米、种菜、喂猪、做鞋、打袜子,日本能封锁吗?我们今天讲了,就不是空话,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艰苦奋斗,不怕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有了这一条,抗战一定能够坚持下去,有了这一条,一定能达到我们的政治方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建立我们的新中国。(大鼓掌)(见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抗大第5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三)

每个人抗战要抗到底,不是空喊。在南京的汪精卫,当上海打仗的时候,他也广播演说要抗战到底。所以有些人不一定抗到底,今年抗明年就不抗。同时各人的抗战到底不同,汪精卫在武汉为底,有的人以为在卢沟桥为底。他们卢沟桥的底,是依赖英法开会,把日本迫到卢沟桥去。我们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抗战到底是在鸭绿江。各人有各人的底,武汉、卢沟桥的底,东三省的人听了就不赞成。我们要收复整个的失地。这要靠全国人民的努力,尤其是抗大的同志努力,努力创造千百万的抗日干部。

西班牙的教训,西班牙来一个反革命的暴动,把坚决抗战的人都干掉。西政府军、守马德里的总司令米亚加将军,他秘密的跟敌人谈判,所以有很长的一个时期没有打过仗,他就没有抗战到底。从前替他宣传很好,名誉很大。可是到今年三月他的抗战到底就完了,私自勾通敌人妥协投降,要缴共产党的枪,在马德里就被缴了枪。这是很大的教训。马德里的失守,米亚加的反动,听说其他各地方都反抗米亚加。所以马德里的失守是吃了反革命的亏非常大。我们中国第一位米亚加就是汪精卫。今后要防备一下,以后要缴共产党的枪的人,我们要预防他。

听说你们抗大在测验问题:“抗大的抗日,共产党的抗大与其他的地方抗日是否一样?”有人说一样的,这个不大对。西班牙的共产党抗战最英勇坚决,没有投降的。其他,社会民主党、共和党尚有一部分投降,但一部分是抗战的。我们共产党要干到底的。但是共产党中间也有产生个把坏蛋,中国共产党就有一个张国焘。……所以我们党内要注意不坚定的分子混进来当奸细。每一个人决不是一进了共产党就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一定要经过修养一下,不是仙人,早上练仙晚上就成的。抗战到底不是口号,而是实际的抗到底,一定要在抗大里修养一下。真正的抗战到底是一个大问题,在共产党的队伍中,要时常讨论。这个革命的道德,要有始有终。张国焘、汪精卫都没有这样的决心。……我们要注意教育抗大的学生,抗战要干到底,不半途不干,应该叫亲戚朋友都要这样干到底。参加共产党,我们就要为抗日干到底。如果抗战没有胜利,不管多大的困难都要干下去。为共产主义奋斗要一直达到共产主义的胜利,每个人在政治上不要开小差。将来在其他地方见面的时候,可以见得面,就是可以见得江东父老,不作丑媳妇见不得娘家。东三省的人抗战一定要到鸭绿江,抗到底。楚霸王项羽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这比较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但是项羽尚有一个缺点,从前有一个人在他的墓上做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不学汪精卫、张国焘,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从中国抗日一直干到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共产主义胜利。不学西班牙的米亚加,不学汪精卫、张国焘,要学真正抗战到底的西班牙共产党以及抗战到底的社会民主党与共和党。中国在动员纲领上,引了孟子的话“富贵不能淫”里也少一句“威武不能屈”。中国多少共产党员被捕杀头,这是威武不能屈。但是尚有一部分叛徒起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做工作,但一旦威武来了,就屈服,带路捉人,什么都做。一种人被捉了,要杀就杀,这种英雄的人中国历史上很

多,有文天祥项羽岳飞,决不投降,他们就有这种骨气。那些叛徒就没有这种骨头,所以平素讲得天花乱坠,是没有用的。……我们抗大的干部都要革命到底,一直到共产主义胜利,始终不动摇,决不学张国焘的开小差。假使犯了错误,可以改正错误,革命是要真正革到底的。(见1939年4月8日毛泽东在抗大检讨工作总结晚会上的讲话)

一部分和模范作用

193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抗大第3期2大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集中论述了共产党、八路军如何起模范作用的问题。下面就是他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

今天讲的是一部分和模范作用。

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我们是一部分,合起来才是中国。八路军是全国军队的一部分,边区是全国领土的一部分,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一部分。但是单只一部分还不够。偷东西的、贪污腐化的和资本家也是一部分。去年的那位李服膺也是一部分,要逃跑,又要逃得快,结果阎王请他吃饭。又如三路军(我们是八路军)总指挥韩复榘遇到日本人到来也采取李服膺的办法,结果也到阎王那里去了!这和我们虽同样是一部分,然而不相同。因为我们要加上一点东西,成为模范的一部分。土豪劣绅不是好的,自己肚子涨得这么大,我们便和他相反,努力工作,廉洁得很,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的一切。我们要在这方面来起模范作用,全国人民都该如此。张国焘却不如此,张国焘说边区是块鸡骨头,吃之无肉,弃之可惜。所以他终于丢了!我们全国男女青年便不然,由南洋群岛来的,由成都步行来的,李服膺的女儿把她家的汽车全捐与八路军,自己走路,愿意学习,当宣传员。这是“小姐”,还有“少爷”。我们抗大不但是全国佩服,而且世界闻名。卫副总司令前几天来此,也说我们好,各地都向我们要人。……模范作用不在于口头说而在事实上做。不在于两只手举起来赞成马克思主义,主要的是在于实际中去行马克思主义。这才是真真要紧的。单是学学还不够,要在实际中去做到底。为全世界的平等而奋斗到底。而且要在人家来诱惑我们的时候贯彻到底。……共产党是与别人不同的,有功不见得赏,有过便要批评,薪水也不过五元为最高。……我们革命是没有什么赏的,赏,可说是侮辱了人家。我们对伤兵发钱慰问,并不说是赏,因为革命是自动的嘛,自觉的嘛,还要什么赏不赏?如果这一点底子不打好,可能一点不满意便离开革命的,所以你们要起模范作用,不要学张国焘。

有名英雄与无名英雄

1938年7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纪念“七一”、“七七”及突击运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用大树与小树作比喻,精辟地论述了有名英雄与无名英雄,领袖与群众的辩证关系。下面是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

今天的突击总结大会,刚才张主任已经报告得很详细,从总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虽然在有些地方还不免有些缺点。这个胜利是在正确的领导下,领导者和群众共同努力所得到的结果,当然突击队员们的优秀和聪明也是一个条件,不然你去训练一个木头,那无论怎样也不成功的。可是单单是这一条件也不成功。例如在森林中有很多的树木,那中间一定有很多又大又高的树子,假如是一棵树独长,它就不高兴长,懒得长,索性不长了。所以说森林中那矮小的树子不能说它没有用,要没有它们,高大的树子也长不出来的。五百多个突击队员也正如大树,而其余的无名英雄则如小树,没有其余的无名英雄,五百多个突击队员也是不会有的。有名英雄是从无名英雄中产生出来,而且他们是不能分离的,这是此次突击运动中所得出的一个主要经验。

以此来看一周年的抗战中,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也是如此,军队中官长与士兵的关系也是如此,团体中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也是如此。现在有一个公式说:“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公式很对,但还需加以解释。四万万人要能打败日本侵略者,非有群众的领导者不可。没有领袖,是做不出事情来的,那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有些人常常以为自己了不得的人,天下第一。此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也称王”。每个领袖都应当有他的志向,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的志向。但是为什么当时的孔夫子不作共产党呢?那是当时的老百姓不要他作共产党只要他作教书先生。而今的老百姓则需要我们作共产党了,而今有了无产阶级就有了共产党,孔夫子时代没有无产阶级当然不会有共产党,正如没有母亲,怎么会有孩子一样的道理。因此,这个志向是根据老百姓的需要与当时当地的环境而定。而今的老百姓要求共产党、国民党、八路军、新四军,抗大的诸位突击队员们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你们将来出去要为着这个要求而定自己的志向,去当连长、营长、旅长,去作宣传和教育民众的工作,不辞一切辛苦,甚至说得舌敝唇焦。我们去宣传抗日,使一传十,十传百,传至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团结起来,筑成一座火焰山,

而日本帝国主义如一条牛，两只角钻入这个火焰山里来。大家预备着食盐，让牛烧死后就好大吃。但是要烧死这一条牛，一定要所有老百姓齐心来干才成功的。

再讲到共产党的十七周年纪念——共产党它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它是和老百姓联结在一起的，它从没有脱离过老百姓，它不但不扰乱老百姓，而且帮助老百姓，保护老百姓的利益，这不单是共产党应该这样做，也是其他所有革命分子所应该做的。为什么一定要帮助和爱护老百姓呢？不吃老百姓的鸡蛋而给老百姓以鸡蛋，这是所谓改善人民生活。鲁迅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却一生都为着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甚至舌敝唇焦，生肺病而死。所以我们非常尊崇鲁迅。

我们目前需要造成千万个突击队员，民族英雄，打走日本帝国主义，为老百姓谋幸福，这样“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全场热烈鼓掌）

当一辈子学生

毛泽东在对抗大同学的讲话中，多次讲到要同志们毕业出去以后，要继续当学生，要当一辈子学生的道理。

（一）

你们在抗大是学生，毕业了为什么还要当学生呢？那不是没有毕业吗？我的意思就是没有毕业，要真的毕业了，日本帝国主义就打不倒，毕了抗大的业，而没有毕革命的业。

在抗大才刚刚开步走，还未深入，虽然你们学了很多的东西，但还只是打开了一道门。

有很多人在学校读了许多年的书，而门都还没有打开，在学校学的与后来所用的完全相反，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像孙中山先生在学校里并没有学过三民主义而是学的看病，三民主义是出了学校以后才学的。第二个是马克思，他在学校时学的是唯心论而出学校以后便学唯物论了，如果他以后不再学，那我们也要反对他的，而我们现在却拥护他是因为他研究了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工人运动、世界斗争等，创造了马克思主义。还有高尔基，连抗大这样的学校都没有住过，他是工人老粗出身，仅仅念了几个月的国民小学而已，但是他

的文章却比什么北大,南大,东大,西大毕业的都好,而且成为世界文学家。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要再举下去,今天晚上就不用睡觉了。再说一个自然科学家爱迪生,他研究一种只能用脑子去看,显微镜都看不见的东西——电子。发明了八十多种东西,而他也没有住过学校。……所以你们现在是值得庆祝的,已经开了会庆祝你们,不在话下。你们出去,三教九流都要去学。……抗大是军事学校,战略战术,已经学过,但看见日本帝国主义时还得再学。

抗大有你们的教员,出去以后也会有教员的,那就是工人和无产阶级,只要你去请教他,他们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说马克思的先生是黑格尔,有一点对,但主要的先生,还是工农。所以第一种教员是工人,第二种教员就是农人。农人老爷不干事,皇帝老子也得饿死。我们有好些同志,跟农人学了好久没有学通。第三种是洋教员,知识分子,他会说 a, b, c, 知识分子也是主要的教员,因为他是知识的传播者。第四个教员是资本家,第五个教员是地主,要去学他们干些什么。

小脚妇女和秀才、举人等都应当保存起来作将来的教员。……

边区的法院,关犯人关得很好,犯人也有自由,故此地的犯人就不知道外面管犯人是怎样管的,外面管法院的人都是很好的教员。

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是教员,我们从战争中俘虏口中可得到很多的学问。

还有毛厕里面的石头大粪都是先生,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就要去研究它,医生要研究病人的屎,所以屎也是先生。(笑)

只有我们的主观是学生,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是死的,活的,香的,臭的,都是先生。

抗大的同志们学了许多作风,第一就是学习的作风,不管是什么都要学习。离开这个作风就会变成孙悟空,要翻斤头,但是还没有他那样大的本领,翻斤头会跌破了头。一切东西都是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将来还有马克思的儿子,孙子,孙孙子的新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

当学生的出去了再当学生,一直当到长胡子,胡子又变白,白了再见阎王爷,那时候就算毕业了。(笑)今天只是拿的开门的毕业证书,那时才可以拿真正的毕业证书。(见 1938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对抗大第 4 期毕业同学的讲话)

(二)

我们在抗大学习了几个月,何以出去又要当学生呢?你们中间有大学生,有中学生,何以还要再当学生?我所说的当学生,并不是当一般的学生,我们这里有一种作风,就是要学习,出去以后还要学习。我们在抗大学的很少,但是你要说多,也是多的,如学习艰苦精神,吃小米,打仗,还有战略战术等等,但是,你说学完了吗?学习好比走路,第一步走完了,还有第二步,在抗大仅仅走了一步,还要继续地走。

我们出去,无论作什么事情,都还要学习。我们一直学到胡子长了,黑的变成白的了,女同志呢?(会场笑)头发由黑变白了。所以我们提倡抗大出去的同志要有学习的精神,一直到开追悼会,(全场笑)那时候就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的儿子。

我们一生都在什么地方学习?不完全在学校里,大多不是在学校里学的。我们中国的农民,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是这样,他们能把原来没有的东西创造出来,像米、麦、房子……。这个本领大不大?没有粮食就不成功呀!我学习创造粮食就没有学好,你们也许有对于这个精通的。我们共产党队伍中的人,多半不是在学校里学的,所以你们出去要学习,时时刻刻都要学习。抗大要学的好比是一把钥匙,好去开门。开门做什么事呢?睡觉、工作、抗日。我们抗大是一个敲门砖,开抗日之门,所以今天首先说学习。

我前次说过,中山先生学的不是三民主义,他是学的医生。后来离开学校,继续学习,进了世界大学。“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于是辛亥革命成功,后来又办了黄埔,所以他是在学校以外学的。再说到马克思,他在学校里学的什么?那个学校不是马克思学校,而叫做反马克思学校,然而他学到了那个学校里所没有的东西。你们的学习条件比孙中山、马克思都好。孙中山、马克思他们没有你们这样好的条件,你们有抗大可进。

你们出去,在山东打游击,要学习,读的是无字书,一本“无字天书”,看到什么就跟什么学习。如果我们跟房子学习,不跟石头学习,走得不好,就是一跤,把牙齿碰掉两只——石头反对你!(全场笑)所以我说:要跟山学,跟水学,跟树林学,还要跟毛厕里的大粪学。你说:大粪有什么学头!不学,它就请你一跤跌进去。(全场笑)陕北的天气很冷,你也要跟它学,要穿棉衣。如果你说:我不跟它学,于是不知道穿棉衣,就要冻死。(全场笑)山水、林木、花草、鸟兽,都是自然物,我们都要学。

要向工人(无产阶级)、农人学。“他们一字不识,还作我们的先生吗?”然而你不拜他们作先生,你不学习,就不成功。还有小资产阶级,不学就不知道他。还有资本家、土豪劣绅,你不去学学,就不知道他怎样土法,怎样劣法。还有日本帝国主义,也要学,你不学就不知道他的飞机怎样?大炮怎样?战略战术怎样?所以一切都是我们的先生。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是先生,你们出去,乘汽车到西安,汽车夫是先生,你走过一家饭馆“店小二”就是先生,你要跟他调查清楚。你到河南去,如果说不学了,够了,游击队就组织不成。

所以我们出去,要虚心学习。我们要出主意,……对于任何一件事,都要想一想,把它变成一种方法,一种主意,一种决议,然后去做。

我们抗大出去的同志们要仍旧学习。……这是头一条,出去以后要学习,要恭敬,要老老实实,调皮是不行的,跌一跤就要出血,你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地学,那就神气得很,日本人一来你就能叫他跑。如果不这样,不去学习,以为群众不好,就不成功。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见1938年8—9月间毛泽东在抗大的一次讲话)

你们要学作干部

这是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4期3大队开学时的讲话中的一段,提出要学作干部的问题。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在这里要学作干部。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要干部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没有组织便没有力量,干部要把成千成万的广大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这广大的有组织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你们不论在前方后方都要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从政治上从军事上去组织他们。日本人口少,中国人口多,但他所以能够欺负我们,因为我们广大的人民没有很好的组织,至今也还组织得很不够。

你们要把握紧正确的政治方向,经过你们传达散布这政治方向于广大的人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因为事实上不可能使全国人民都到这里来学习,却可以靠你们将来在工作中间把这个政治方向告诉全国的人民,使他们都明了我们怎样,而且一定能够打败敌人,使这个政治方向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方向。同时你们也要传播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使广大民众都能坚定地不动摇

地与任何困难奋斗。像你们在这里吃小米饭，爬清凉山，也可说是一种艰苦奋斗，要你们改变了不能艰苦奋斗的软弱作风，要有点“劲”。譬如跑路跌了一跤，碰坏了牙齿，却依然站起来向前迈进。单是你们有这个作风还不够，要使全国人民都有这样种精神。在我们的前途上摆着一样东西，其名曰“困难”，我们告诉它我们是从抗日军政大学锻炼出来的，不怕你！它说它有很大的本领，能使我们没衣服穿，我们不怕；能使我们没饭吃，我们不怕；它说它还有飞机大炮坦克，但我们都不怕。我们克服了一切的困难，再问它还有没有？没有了！敌人便只好缴枪。（欢笑鼓掌）我们便是这样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你们要教育全国人民，使他们都不怕困难，且能克服困难。这样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你们更要以灵活的战略战术教育广大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而且都会打击日本侵略者。组织全国人民，训练全国人民是要靠你们这些干部的。所以第二你们要学作干部。

当教员当指挥官

这是1938年8月5日毛泽东在对抗大第4期毕业同学的讲话中，讲从抗大出去以后如何当教员、当指挥官的部分内容：

第二当教员。

出去不当教员，当然是在学校没有学得好，在抗大不是好学生，到延安来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讲的教员不是要人家来请，而是自己当起来的。也不用办学校，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是学生。全中国就是一个抗日大学，你们去当学生也当教员。当中国人的教员，也当日本人的教员。学生不必多，有一个人都行。没有没人的地方，只要碰着一个人就好办了，首先你去给他当学生，慢慢的就当起教员来，但同时还仍然当学生。只要你们出去每人能找到一个人，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了。原因是一个人又认得一个人就变成两个，两个还可变成四个，……这样增加上去，一直增加到四万万五千万人都团结到统一战线之上来。现在它挤我们，以后我们也要挤它，最后各种条件的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可以打倒。抗大学生出去后看见人就要团结他，组织他，向他学习，教育他。贺龙是从一把菜刀开始的。只要方向正确，又当学生，又当教员，一点一点的就会多起来。孔子是一个教员，但是他只登过泰山就以为是最高的山了，我的马夫所登过的山比他登过的泰山还高一些。可是他很喜欢当教

员,他说教人家就不要打瞌睡,学生也不要打瞌睡。这点是我们最赞成的,虽然他比我的马夫差一点(从登山说),(大笑)但我们还是要学他。看肚吃饭,量体裁衣,看情形来当教员。从孔子那里学来了教人打瞌睡,但是学生不高兴学,一个个的溜走完了,只剩自己一人也是没意思,所以教员还要看情形来团结学生,给学生所需要的东西。不要用注入式的方法去灌注学生,而用下毛毛雨的方法去教育学生。这才是当教员的精神,百折不回才是我们的作风。

无论哪种职业的人,他都要当学生,又要当教员。一个新闻记者他也要当学生,又当教员,而且他还是一个很好的教员。像孔子那样的周游列国,碰到一个人就可以从他那里学得一些东西,也可以教他一些东西。无论从一个什么人身上都可得出一些东西来的。我惭愧得很,你们来了这样久,我却当学生当教员都不够,你们出去以后不要学我。

第三当指挥官。

现在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了。你们出去后有作各种工作的,但却有大多数是要到前线去当军事或政治指挥官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在打仗,民主共和国是打出来的,幸福的生活也是打出来的。阿Q在人家打他时,他说不能打不能打,君子动口不动手。对本国的同胞应当用阿Q的精神,动口不动手;但对日本帝国主义就两样都要动了,捉住俘虏时动口,打仗时却要动手了。要去当指挥官的人,不要自己以为学得太少了,我说你们是世界上顶呱呱的。水浒上的林冲虽然学了一下,而李逵什么没学,仗也打得很好。民族英雄岳飞,金人非常怕他,以为山都打得破而岳飞的军队却打不破。他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如像他的“冻死不撤房,饿死不强民”,这不正像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所以老百姓们都喜欢他,只有汉奸秦桧才不喜欢他,把他害死。岳飞也没有在什么地方毕业,而他的仗却打得这样好。西班牙的许多将军,从前也没有经过什么武学校,他们是挖煤矿的工人,挖着挖着挖出一个佛郎哥。(笑)他们就只好放下锄头打仗,起初当班长,以后当排长,连长,以至于军长。他们不当指挥官有什么办法,我们又没有调干部给他。(笑)

陈胜,吴广,石达开,杨秀清等不都是农民出身吗?资本主义发生以后才开始兴办学校的,但是当革命战争初起的时候,却没有办学校。你们应当提倡这种风气,只要干起来就可以学习了,那是在大抗大学习,而不是这个小抗大。当然我们现在办学校也是应该的。你们现在在抗大毕业了,这还了得,好像在昆仑山上学了法,下山以后,一切鬼怪都可以收拾了。(笑)

下了决心去干游击战,才能把日本挤到东京去。发展广大的民众,组织他

们,从打敌人的斗争行动中去教育他们。不但是男生,女生也是如此。这些女生和一般的太太小姐、林黛玉、薛宝钗是有区别的,是新的女性。男女老幼都要有到敌人后方去活动的决心。有些人只想到勘察加,挤到四川。将来四川的粮食不够了,大家就会开会,商量仍然回去,到敌人的后方,打他的屁股,拉他的尾巴。要是没有朱总司令等在后面拉他的尾巴,西安恐怕早就没有了。游击战争四个字,就是一个锦囊妙计。

没有打过仗的人,不知道打仗的味道,子弹没有眼睛,乱钻一阵。恐怕艾思奇同志都给你们讲过,凡是一样东西,没有摸清楚时,是被那个东西压迫的。初到延安来的人,也被延安压迫,但是不久以后,就征服了延安,当它的主人。马克思主义及别的学问也是这样,开始总是盲目的。敌人也是这样,不懂他的脾气才怕他。子弹也是如此,一千发中究竟能够中多少?而且敌人还是活的,最不易中靶。马克思主义说:“什么叫做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了解。”我对于蛇是很怕的,大有机会主义及不抵抗主义之味。看见了蛇,就只有三十六计的方法,原因是我不懂蛇,所以怕它。但是有一种人,其名为“流氓”,他研究了蛇,看见蛇就开心。打仗就是这样的,八路军中有些人,三个星期不打仗,就会手也痒足也痒了。

你们出去不要怕翻斤头,翻了起来再走,马克思由唯心论翻到唯物论。人是不会没有错误的,翻斤斗的时候,就是不翻的时候,不要怕错误。三打祝家庄,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失败的时候,就是胜利的时候,“失败为成功之母”。列宁说,没有一九〇五年的失败,就没有一九一七年的成功。跌了跤的人再打他的屁股是要不得的。你们跌了跤起来的时候,不要哭脸,把灰拍了,来研究这是什么道理。张国焘的开小差,就是怕跌跤。抗大出去的人绝不要开小差。唐僧取经的时候,遇了多少困难,而始终没有开小差,他比张国焘好。我们也要有唐僧这种精神。今天的话讲了,我就不再讲,可是将来我们还要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济南,太原等地再讲。(大鼓掌)

尊重对象 了解对象 继续下去

这里录述的是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的训词,讲解工作方法,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

今天是三大队同学毕业的一天,过去我和别的同志已对你们讲得很多了!如像民族革命的干部应当有正确的方向,吃苦耐劳的作风,马列主义,三民主

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队的知识等等,都已讲过,今天来讲三点即是“尊重对象”、“了解对象”、“继续下去”。

先说说抗大吧!我们抗大有许多缺点,如教员少,物质条件坏,但最大的一点还在于教育的“一般化”。这一点,不单抗大如此,陕公、云阳训练班也是如此。我们只注意到一般的教育,总的教育,没有注意到特殊的教育,个别的教育。例如我是抗大一个教员,但我对你们每个人的个性、经验、兴趣、工作要求……,了解都不够,自然你们的队长,主任,教员又比我多了解些,但了解的程度仍然是不够的。这原因是在于时间短,学生多,以后我们要努力改正这个缺点。

你们来到抗大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如我们办抗大的目的一样,“为了抗日”。所以我们不求在你们身上取得什么东西,来裨益我们;而是在求这共同目标之实现。就如募捐一项,也是为了扩大与维持抗大而发起的。其次,我还说我们彼此之间是友爱的,因为抗大是有党派为学校,什么党派?“抗日党,抗日派”。凡是抗日的都是朋友,互相友爱;只有降日的汉奸例外,我们坚决反对它,而且要打倒它。

现在对你们毕业后的工作方法说几点:

(1)尊重对象。要尊重敌人,才能了解敌人,才能百战百胜。否则变成轻敌了!对于友人,也是如此,应当尊重而不应当忽视。列宁曾说要向资产阶级学点东西,便是这意思。我们今天,便要向敌人日本学点东西;也要向友人国民党学点东西。不单要学人家的好处,也要学人家的坏处、他的反面。譬如大粪(全堂大笑)我们也要研究研究,考察考察,狗为什么欢喜大粪?大粪化学成分如何?大家总觉得开玩笑是平常的,然而卓别林研究玩笑几十年。玩笑也有高级趣味与低级趣味之分,玩笑也有它的阶级性与党派性。由此看来,开玩笑也是值得尊重的科学的事情了!我们要用这种态度来对付环境,处理工作,才能战胜敌人,扩大统一战线。对于友人,更应该尊重,他不了解我,污蔑我,甚至骂我,我都不生气而要研究研究,考察考察,求得合理的结果。敌人固然不好,但佐藤上台时也曾说过“中国的情形变了!我们要缓和一下,再认识中国”,这可见他们是不轻敌的。

(2)了解对象。工作无成效的最大原因便是“不求甚解”,马马虎虎,在形式上,大体上望一望,便要解决问题,这是错误的。说到了解,必得是在当地当时的具体环境中去了解,才是真的了解。所以有人向上司请求办法时,我可以说上司有办法,然而也没有办法。因为上司说的是总办法,具体的办法他没

有,也不会有,那是全靠自己具体环境中去了解去决定的。陕公过去有学生问:干游击队人家要缴枪怎么办?组织抗敌后援会人家说是汉奸怎么办?陇海路切断回不了湖北怎么办?我说:你自己去办,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会告诉你怎样办。我们只有总的办法——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万应灵丹的具体办法。凭空的解答是无补于事的,天下也决没有什么问题都能代你解决的老师,除非你把一切具体条件都告诉他才行。我们说“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他说:“哼!我是大学生,何以不知,你要取消我的发言权!”(笑)我说:“不是我取消你,是你自己取消了自己”。滔滔不绝,一无所有,凭空乱说的话说了等于不说,自然没有发言权了!而且去了解是多方面的,表面、里面、侧面,都看到的,不是片面的。所以希望你们在毕业后再来一周开会,听演讲,作讨论,去了解了解工作。其实社会才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学习。游击队长也是学生,要向队员学点东西。一个人可以做教员,但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书也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无字天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古人说“攻”书,我看“攻”字是有大道理的,那就是说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字去“攻”;古人说校对为校“仇”,我看“仇”字也很有道理,那就是说不把稿子当仇人看,校对是弄不好的。

(3)继续下去。不要辞职,不要畏难,不要被环境被工作征服和统治,要反过来征服和统治环境。西安办事处有一位同志要求调工作,便是因为他不习惯于今天的环境,只懂得过去十年对立的那一套,结果被环境征服所致。中国老话说“熟能生巧”,巧便是征服环境的表现。求“巧”,求“自由”,一定要继续下去。假定世界上最初只有一粒米,现在却有了千千万万粒米,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粒米抱定宗旨“继续下去”。(笑声)苏联几个共产党员弄到如今的样子,贺龙一把菜刀扩充到今天的军队,都是如此,都是“继续下去”所致。

团结和调查

毛泽东在1938年3月21日对抗大三大队的“临别赠言”中,讲了“团结”和“调查”两个问题,他说:

今天讲的第一个大题目是团结问题,其中又分几个小题目:

(I)如何入门的问题。你们很可能遇到无门可入的问题。我在毕业典礼时曾说第一要尊重对象,例如爱迪生便是尊重每一个小的问题,所以他发明

了许多东西。而学习别人失败的教训也是必要的。所以在做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尊重环境。对人，对党派，对机关，都是如此。这便是敲门砖的第一块。尊重他，研究他，客观的看他，我们才有胜利的可能。

其次，每到一处都应团结积极分子，即是找朋友，才能有力量。我每次对新闻记者都说，希望他们自身团结起来，而对自己采访的对象作教育工作。总之，我们要随时随地了解对象，了解情况，团结先进分子，有朝一日，和他再行碰头，便可由他生许多关系了！

我们要诚诚恳恳的进行这些工作，如传教的教士一样，到每个偏僻的地方，对每个人作耐心的宣传与说教。什么教？抗日教！假如这样，门不会打不开的。

(Ⅱ)变的问题。大家都说：“将来出去不会依照情况变怎么办？”首先要了解变不是由脑筋里想出来的，而是依客观条件，根据经验法则，再加脑筋思考制造出来的。即是说，“变”的问题，乃是辩证法上面认识论的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领导人根据客观情况而决定的政策，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幻想。要把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才能施之于实际的具体环境，而且要依情况的变化来改变口号和方针。中共十余年来的斗争，由国共合作，十年苏维埃运动，到目前的统一战线都是例子。同时要从根本上，大体上，各方面来看问题：看本质，不看形式，看整体，不看零碎的片断，这样才不致模糊真相。为什么你们每天作息时间表要规定呢？因为时间一变你做的事便不能不变了！小事已经如此，别的可想而知。“雪中送炭”合于环境；“锦上添花”便可不必。

了解这个，应用这个，便是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会“变”了！

(Ⅲ)同学会问题。这个团体已经组织好了，其用处自然有，但易于陷入小团体的危险。因为你们所要团结的对象是大的团体，一切与你们接触，发生关系的都要团结。有人问可不可以加入国民党呢？我说可以的，只要国民党答应。十几年前的一切不是证明了吗？！自然，目前还没有到共产党员公开加入国民党的程度，因为还没有完全了解。抗大之所以要办，也就是因为现在状况还是“左右为难”的时候。有人问，组织游击队人家要解散怎么办？我说他实在要解散也只好解散。可是要说明不是应该解散而是让步，总以不破坏统一战线为原则。山西羊城游击队解散后反又更多便是证明。抗大同学会不要离开别的团体与群众而孤立起来，要多多的团结。其次，你们以后可以同各地共产党或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联络，他们一定帮助你们的。自然，学校方面决不会和你们脱离，只要你们愿意和学校联系。

现在讲第二个大题目,如何做调查工作。

有一个辩证法的方法,便是调查。这个调查,自然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联系的,本质的调查,而不是机械的调查。

我问你们:“地主如何压迫农民?”你们当然了解一些概念,但没有具体内容。要解答这个问题,便须调查。可分政治的,经济的等等方面。苛捐杂税,自然很多,但是征收种类如何?数目多少?方法怎样?对于民众剥削程度如何?这就需要调查了!而且各地情形又不同,虽则大致差不多。

中共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农村工作和调查得来的。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一年后到乡下养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便不同了,三四月后因环境不允许而到广东,办农民讲习所。到1930年,对富农中农贫农问题才算有了明确而彻底的了解。

“走马看花法”是不对的,中国人欣赏了几千年花,对于雄蕊雌蕊还弄不清楚,便是没有科学方法的原故。合理的方法是开调查会。譬如你到了王家村,一千人口。你便可调查他三四天,找几个富有经验的老农开他几次调查会,仔细谈谈各方面的问题,如像政权、土地、经济、文化教育、婚姻风俗都可了解的。工农其实是最有知识的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丰富得多,实际得多。

1927年我做过湖南五县的农村调查,在井冈山上也做过,可惜现在都遗失了!我的调查会是如何开的呢?我请了以前的钱粮师爷,老秀才,区苏维埃的党的书记,另外还有一个流氓,便把调查弄得差不多了!

根据十多省比较,十几年的时间,对中国农村土地问题有如下结果:

地主人口百分之三至四,富农人口百分之六至七,占的土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中农人口百分之二十,雇贫农人口百分之七十,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无怪乎中山先生也主张“耕者有其田”了,因为这是实在的问题啊!

你们出去,不要先当“老师”,搬出抗大的一套;应该先当“学生”,了解情况,调查明白,然后再来说话,再定方针。中医看病也要四项调查,才开药单,何况工作?假如环境不允许直接调查,也该从旁打听,问问人家。

学战略

毛泽东在抗大的讲话中,多次提出要学习战略学。

(一)

必要开展,所谓开展便是在政治方面要知大局顾全大体,因此在军事方面我们要讲点战略问题,兵团以上的问题。你们可以由排连长做到师长,领导更多的人。这不是升官而是干革命工作。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必要开展。(引自1938年4月2日毛泽东对准备迁移到瓦窑堡去办校的新编抗大一大队临行前的讲话)

(二)

战略问题,以后我们要上战略课,除部队动作外,我们还要讲大局大兵团的战略。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政治上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便是总的战略,所以军事上我们也应当不只学学战术而已。现在,我请了个教员来了!他是文的,然而却有研究,我也愿意来研究一下,因为过去只学了一半。(引自1938年3月30日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的讲话)

(三)

战略是什么?是军事理论。我们讲了政治理论,现在要讲点军事理论。我们提倡学习战争思想,或称路线。十年来的战争我们有了很多的经验,如像在政治上自己形成了路线一样,独秀路线,立三路线,国焘路线,结果知道马克思主义才好,盲动,机会主义都完全不好,很不好。军事上十年经验我们形成了路线,但见之于文字的却不多。抗大之好,主要的三言以喻之;政治方向,工作作风,战略战术。马克思主义便是政治方向,“艰苦奋斗”四个字便是工作作风。政治队学了这两点,军事队加一点,即是兵法,战略战术。过去对战略方面比较忽略,军事顶困难也不过难到马克思主义的地步罢了!我们不要以为人家是连营长为什么要讲战略?其实大纲节目非要不可,黄埔也是有的。而且没有战略,战术也一定谈不好。小的东西是要占大的东西的地位的。如一个鼻子,(笑)你能把它安在背上吗?战术也是如此,班教练,连教练,是有它一定位置的。我很担心把它安错了,所以要讲战略。不信有证明:伙夫是能讲战略的,他们要问山西胜败如何?四方面军来了没有?他不问一连一营的战术,而问兵团,并且是大兵团,战术问题太小,懒得去问。伙夫是战略家,为什么不令人奇怪呢?故我们要发展战略思想,不要把自己屈伏在下面。何思

敬懂得外国文,虽然现在他讲的还不能十分妥当。其实天下那有生下的小孩便十分妥当的?我们提倡写书,提高战略空气。中央组织部因此也发起抗日战争研究会。(引自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提高你们的文化程度

毛泽东的下面两段话,都是要求从八路军调来的文化水平低的同学,要提高文化程度、学习文化课。历史说明,许多老同志从这里获益非浅。

(一)

提高文化问题。现在决定凡是八路军来的头二三个月尽量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少教军事。过去教学上的失败是在于他们对讲的既不懂,又无法记笔记,在校有如坐班房,出门通通忘光。提高文化水平便是给他们以法宝,拿了去可以看书看报,懂得几千条几万条,而且自由应用,不单是在校学的步兵操典几条而已。对文化教员决不可看为副手,而是主要教员之一。(引自1938年3月30日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的讲话)

(二)

我们八路军有一个普遍的缺点,就是文化水准不高。因为你们都是工农出身,一方面当然有许多好处,比方:你们社会经验比较多;可是,文化一方面,水准是比较低的,文字认识得不多,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汉字四角方难学的缘故,不过这是一个不能抹煞的缺点。如果你们文字认得多一点,那么写起文章来比鲁迅还会好的,因为你们有着丰富的经验。一个大师傅讲的话就是文学家所写的文章,所苦的他不知道文字,只会说,不会写。所以我主张在这一个月中间——你们在这一个月后就要毕业——学习文化,学写文章。但是,问题又来了,你们就会这样感到:“我拿着十来斤重的枪倒能指挥如意,要这样就这样,要那样就那样,要打敌人就‘砰’的一声把敌人打倒;可是,拿到这还不到三两重的笔杆,它却不听我命令。”这怎么办呢?这是不要紧的。你们天天拿一支笔在纸上涂,没有笔用棒棍或树枝在土上划,没有棒棍树枝就用手指,这样一天天自然而然能够学得好写字。至于写文章也是不难,你们很会说话,就把说的话写出来。写不出字,也慢慢的一个个学得来。譬如:学到一个

“饭”字,就有许多地方可用:你吃“饭”,我也吃“饭”;人吃“饭”,牛不吃“饭”;穷人没有“饭”吃,有钱人“饭”吃得多而且好。如此种种,都可以写许多话。这样一个个学得多,不是能写文章吗?所以你们懂了文字,动动笔杆,把过去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情形,长征时代的情形,以及在抗大里的情形等等都写起来,就可以写得厚厚一册,甚至可以写厚厚的几册。你们现在不会写,你们就天天的写,每天的写,将来就可写得很多。你们学习到了文字,就像得到一件宝贝,你们就会看报告,写报告,看党的决议案等等,到处可以应用。(引自1938年4月4日毛泽东对抗大新组第二大队的讲话)

要有个本本才好

这段话是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总结干部会上讲的:

教材的事,我完全同意这意见。三期在别的方面都进步,在这点却失败了。教员的话不容易懂,听的与写下来的有时根本不同,说的一件事,写的又是一件。所以要有个本本才好。孔夫子死了,何键现在还拿他的本本来提倡读经。游击战,战略、战术、政治工作。现在我想游击战由我负责,战略我负一部分责,别的由何思敬,郭化若。战术也要。政治工作由罗瑞卿同志请假一日,到我那儿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写政治书”。艾思奇同志也如此,牺牲一点课,少教一点,以后全世界全国都可以教。这是办法,一定要减少教员工作才行。过去为什么失败呢?便是没有专人的缘故。这事大家考虑,如不反对,便下命令。命令是要服从的,而基础在大家的同意上面。

使你们脑袋里装得饱饱满满

这段话是1938年4月4日毛泽东对抗大新组第二大队讲的:

你们抗大里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在同学们毕业后,不马上派出去,留一个星期,在这一星期里天天上大课,叫中央负责人来同你们讲讲,我也要来讲,使你们脑袋里装得饱饱满满,才出去工作。

要下决心在此教它二十年书

毛泽东多次讲到抗大教职员工作的重要性。

(一)

同志们！没有共产党是不能战胜日本的，没有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希望抗大四个月办一期，每期三千人，连陕公党校每年出它三万人。有人说在后方办学校是倒霉的事，想到前方去，其实后方也是重要的。……我们党员，尤其是干部，要下决心在此教它二十年书。虽然事实上也许不会如此，但我们要准备着。我们打仗也是如此，七十里可宿营我们当它一百里，还有余勇可鼓。我讲二十年还是少的哩！希望同志们下决心，在此努力，不要五心不定，事实上也不会叫你们教书一世，死于抗大，埋在清凉山的。（笑声）

我们应该有纪律，而这纪律是建筑在自觉上面的。要用自己的热心，积极性，全副精神来对付学生，把他们教好。热心应该尽量发挥，而不应该吝啬。有的同志两个足断了，但仍然日夜工作。当一个共产党员，没有把事情做好而晚上能够安然睡着，是不可能的。把私事看得比革命、国家、民族还要大的人是要不得的。

你们中间便有人写信给我说：“在抗大不能实践，没有群众，我是草包，教学生害人，要求到前方去”，我就请他回答我：“学校为什么不能实践？二千几百学生不是群众吗？在学校草包害人到外面去就不害人了吗？”此人确是观念论，怪思想……。而且还有这样的事，事情办了一大半忽然不办了！无论如何不办。这是共产党员的立场吗？又如上述要求调到前线工作的同志还曾说：“不准我就开小差”。这自然是他的自由，但我们也有抓他的自由。今天抓不着以后再抓，或者不抓他也行，我们可省点小米饭：这种人倒不如开了的好。……

我们应该有一种政治的空气，艰苦的干，努力的干。……我们要死了都要立下遗嘱，请同志们完成未竟事业；这才是模范的共产党员，（引自1938年3月30日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的讲话）

(二)

这个总结会，是很有意义的会。抗大两年来缔造艰难，由三个教职员到三百教职员，到今天有了很大的成绩。单看今天，这干部的队伍便可证明。如像学校，共产党一样，在抗日的力量中我们是一部分，但这部分不能与其他相提并论，这是作用更大，意义更多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教育干部的干部。抗大集中全国优秀的人才，在抗日战争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就必须依靠这个队

伍——三四百教职员。他们的任务是“造学生”。这一点在上次也提到过，今天再来讲，因为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

出人是要紧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这是母鸡与鸡蛋的问题，（笑）因此办学校，开检查会。为了派人要不派人，有些人便要留到好几年。有人说我再等半年，其实不一定一生当教员，你才二十三十岁，人生百年，还有多少年呢？不是留你一生，但你要下当一生教员的决心。张如心是很好的例子，当了七年之久。禹王起初不是皇帝，事办得好了才做皇帝的。此人是山西人，办河工，说是三过其门而不入，但他还比我们差，我们有七八过其门而不入的。（笑）共产党比禹王高明之处便在此。我们要下决心，把学校办好，因为力量不足，我们要增加力量，办学校便要我们这许多母鸡（笑）在此。这是大事，大家要下决心。我上次说二十年，大家不要吓着，长久一点，要一生，（笑）一生当教员，黑格尔便是。黑格尔何人也？他是马克思的先生，此人似乎当了一世教员。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当教员当到死吧！详细的我还没有查清楚。（笑）张如心学黑格尔学孔夫子，我们要学黑格尔、孔夫子、张如心。

当教员，同时又要学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黑格尔、孔夫子还是个圣人，（笑）几千年只此一个。他们也未当过省长，孔夫子做官，也不过小国里的秘书长。我再举个例子，美国的爱迪生，起初是个卖报纸的，他研究电子，全世界有了他发明的几十件东西，那比省长大得多啦！斯达汉诺夫是个工人，挖煤的，一般人以为挖煤的没有文章做，但他做了大文章，成为英雄。你看省长大还是斯达汉诺夫大？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几个黑格尔呢？重要的是要发展。由小的地方出发可以有利于全世界。中国有个武训，不去做官，当叫化子，（笑）他办学堂，办了一生，有了钱仍旧要当叫化子。现在是不是提倡同志们去当叫化子呢？（笑）不是，只请你们当教员，下决心当一世教员，也许七八年以后调你们走，但你们要安下心来。（引自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总结干部会上的讲话）

（三）

巩固西北的工作，我们抗大也是其中之一。现在抗大有一万人，其他陕公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还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计约有两万多人。我们办了这许多学校，训练了许多干部。这个政策，六中全会说是对的。这许多人不是在前线进行战争，而是在后方训练干部，这个意义比较在前

革命的自由,政治上平等,生活同艰苦等等,都是民主的。所以行动要服从。伙夫长官平等,废止肉刑打骂,而不是极端民主。一个学校四百人,三百九十九个人反对校长仍然没有用。军队中不用举手的办法,假如少数服从多数,那你们五六个人便可反对校长而胜利了。这样一来会亡国的,在今天是确定的理论。

用老老实实来打垮日本帝国主义

这番话是1938年8月2日毛泽东对抗大四期一、二队及随校毕业同学讲话中谈到的。

中国历朝以来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派的,另一条是不正派的。

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朝,是不正当的,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宋朝徽钦二帝,秦桧当朝,害死岳飞,弄得河山破裂。历来有这样的两条路线。组织路线(就是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历来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刚才说战争第一,还有一点,用干部也是要注意的。

你们恨日本恨汉奸,现在可以不必再说,你们还要恨“吹牛”恨“拍马”,还有天下第一,也是要反对的。……这里就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自大,盖世无双;另一条是估计不足,把自己看得太渺小,缺乏自信心。所以要讲老实,有多少讲多少。世界上事情都是老老实实的。地球绕太阳也是老老实实,是依规矩走的。规矩亦名科学。你们出去也要科学,向人家讲自己实在的。

这里讲“规矩”、“科学”、“正派路线”,反对历朝来的不正派路线,一句话,就是老老实实,用老老实实来打垮日本帝国主义。

政治上的持久战

这是毛泽东于1938年12月15日给抗大八大队同学所作讲演。当时正是党的六中全会开过以后不久。六中全会估计了武汉、广州失守以后,战争要渐渐进入新的阶段的形势,充分地估计到了日军还将继续向南拿南昌、拿长沙,向西拿西安、拿兰州。我们要停止敌人的进攻,必须要克服许许多多的困

难。中央决定抗大的一部分教职员和学员要回到各个地方去进行新的工作。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非常雄辩、非常有说服力地阐述了要大家懂得走“之”字路的道理，武装大家的头脑，要大家准备应付更多更大的困难。

八大队的同志们：

今天因为同志们不久要分散出去工作，所以来向同志们说几点意思。今天我所要讲的问题是：“政治上的持久战”。我曾经写过一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不知道同志们都看过没有，今天我又讲一个“持久战”，替它上面戴一个帽子；就叫作“政治上的持久战”。

同志们从全国各地远途来到延安，抱着极大的志愿，就是要抗日救国。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有全国优秀的青年在这里学习，我们觉得非常光荣。广大的青年，并且有女的也到这里来，这不是一件小事，正表示了今天的中国与古时的中国不同了。古中国的女子是不能出外的，说是要“抛头露面”，那就不行。从前有种经书，叫作女子经，那个上面说：女子笑的时候，不能把牙齿露出来，坐的时候，不准许摇摆身体，这就叫作“笑莫露齿，坐莫摇身”。我们这里的同志呢，只要一笑，嘴就张开，两排牙齿让它完全露了出来。（全场笑）至于坐的时候，当然可以摇摆身体，如果跳起舞来，那就摇得更多了。（全场笑）上次开会的时候我向同志们说过，外国有许多女英雄，大脚板，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比如象花木兰，穆桂英。这是出在战争时代。非战争的时代呢，就有另外一种女子产生出来了，象什么张丽华，林黛玉。今天是在战争中间，许多女同志跑到这里来，不仅有男性青年，而且同样有女性青年，这的确是一件大事，与古时的中国大不相同。

同志们的志愿都很好。从前有个孔夫子，他讲 he 自己是十五而读，可见他十四岁的时候还没有读书。今天我们不但是立志要读书，而且要立志做大事，而且要立志打倒日本，而且要立志创造一个新中国，这是同志们从家里动身往这里来的时候的一个动机。但是这个志向——抗日的志向，要达到目的，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持久战”就是要在战争中间，慢慢增长我们的力量，克服自己的困难，暴露敌人的弱点，增加敌人的困难，使敌人渐渐衰萎下去，改变国际形势，到那时候才能够把他赶出中国去。这件事业需要的时间很长，要经过很多变化。所以，每个革命者，在政治上要有持久性。我说张国焘这个家伙不好，就不好在这里，因为他政治上没有持久性。我们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到现在九十几年了，还没有搞好。今天我们抗日，是不是又要九十几年呢？那就不一定。过去的九十几年，正是我们的准备时期，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太平

天国起义,要推翻满清,又失败了。在太平天国时代,满清有一个女子,这个女子不大好,即是慈禧太后,曾经打过八国联军。从前还有一个大英雄,就是唐朝的武则天,后来男子把她的缺点扩大起来,吹得怎样怎样坏,其实她比其他的皇帝要好。慈禧太后,她后来虽然反动,但是她也打过八国联军。在前年我们曾经有过“七君子”,在那时候也曾经有个什么“六君子”吧,要想推翻慈禧太后,拥护光绪上台,也失败了。后来就有孙中山起义,推翻满清,但是袁世凯一起来,又失败了。民国十三年国共建立统一战线,蒋介石做黄埔校长,领导军队北伐,但是刚到上海,革命又失败了。革命好比走船一样,洋船倒不管,但是木船就要走顺风才好,逆风就困难。然而无论如何,在一条河里走船,如果去的是顺风,来的一定要逆风,或者今天是顺风,明天又说不定要逆风。所以,抗日战争也不一定走顺风,中间有许多的逆风,同志们要去观察它。路总是曲的,象你们在抗大也是一样,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连斯大林也在内,都要学到,然而都还没有学到什么的时候,现在忽然来一个分散。过去已经分散过一次,组织成了八大队。但是现在八大队又要分散,一部分去担任通讯工作,一部分到前线去工作。以后的工作,对于同志们也是一样,谁愿意把刚刚编好的八大队又拆散呢?在抗战中间要有许多事情不能如我们意的。比如现在抗大的大部分同志要到前线去,就要走路,这也是一样,如果来它四五百架飞机,一装就把大家运走了,岂不爽快。但是我们还没有飞机,要走路。路是曲的,“条条大路到南京”,然而路总是曲的。中国的河大都是朝东面流的,无论黑龙江、黄河、长江、珠江,然而也都是曲的,决没有一条直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曲路,而不是走直线,同志们可以细想一下,不管是大事小事,总是采取曲线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走“之”字路,还是走“一”字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之”字路,而不是走“一”字路的,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叫作走“之”字路原则。我刚才举的例子,“条条大路到南京”,条条大路到上海也好,但是无论哪条路,哪条河,总是曲的。无论哪只船有顺风的时候,也有逆风的时候,无论什么革命有胜利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从前的革命也是一样。列宁领导之下,一九〇五年爆发大革命,后来又失败了。再到十月革命胜利,以为一直线就可以变成共产主义,但是又要实行新经济政策,经过新经济政策把资本家的残余肃清,之后才走上社会主义的路。为什么要走“之”字路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子弹在枪中间也是走的“之”字路,你不信拿一杆枪来,把那柄枪闩拉下来,然后一只眼睛闭起,一只眼睛光着,对准枪口上一看,原来里面也是走的“之”字路,那个来复线是螺丝形的。那么,子弹在枪筒里面受

着压迫所以是走的“之”字路，出去之后，不走“之”字路了吧？不是，出了枪口走的还是“之”字路。如果是走直线，那么我要打太阳，于是把一枝枪口对着太阳瞄准“砰”一下，那个子弹就走直路，朝着太阳走去，一下子就打到太阳的身上，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一枝枪可以打太阳。走“之”字路，自然界也是一样的。同志们学过政治经济学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来一个繁荣期，隔几年又发生恐慌。把恐慌渡过，又繁荣起来，再停几年又要恐慌起来。所以社会现象也是走的“之”字路。战争也是走“之”字路，如果不是，那么有进攻就没有退却，在军事上是有退却的时候的。不退却，只进攻当然好，一打打到太原，再打打到石家庄，再打打到北平，再打打到东三省，打到鸭绿江，……岂不妙哉。（全场笑）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有对头的，逆风是船的对头，枪弹的对头是空气，空气不准它到太阳那里去，走到半路上，空气叫它说：还是下来休息休息吧！它就要下来。（全场笑）革命也是一样，因为有革命，同时还有反革命，当革命的力量还比不上反革命的时候，对不起，就要休息一下。战争也是这样，有进攻就有退却。比如我们现在开会就要晚上开，如果要我早上来讲话，我就要不干，因为日本下一个命令，叫我们晚上开会。（全场笑）比如延安原来好好的一个城，炸成了那个样子，走在路上，这里一堆土，那里一堆砖，那么你就哭脸：“哎呀，怎么办呢？”（全场笑）哭脸我们是不干的，让城里的那些房子去抵抗它！（全场笑）所以战争是有进攻也有退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暂且退一步。比如早上就从城里面退一步，走出来，晚上又回去。城里面的老百姓一早就跑到山里去，老百姓也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全场笑）如果有一个老百姓腰板子硬，早上偏不退一步，站在城里面，日本飞机来了，炸弹也就跟着下来，这么一炸，刚刚就碰到了他，于是阎王老爷请他去。（全场笑）

无论一件什么事都有它的反对者，物质上的困难，干部的缺乏，粮食的不够，飞机的轰炸，日本要打西北，等等，都是我们的反对者，也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打日本，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持久战。同志们政治上的持久战走了多少远呢？才走了两步：在家里面起身的时候走一步，到了这里以后一直到今天开会，又走了一步。将来要走多少步呢？我的八字算不大好，倒不清楚了。我们的抗日战争，敌人进攻，我们退守，这是第一个阶段。渐渐地，敌人没有力量再进攻了，于是我们就准备反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开始实行反攻，敌人来一个总的退却，这是第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都是走的“之”字路。我们走路，如果不走“之”字路，就要碰壁，就要受到打击，遇着挫折，结果悲观，失望，消极，灰心，于是向后转开步走。开步走有两种，一种是向前开步

走,一种是向后转开步走。(全场笑)我们走路,如果前面有一张桌子挡住,我们还是不管,硬要走过去,那只有把鼻子碰出血来,(全场笑)所以在这时候就要稍微转过一点,我们要懂得转弯抹角。还有一种,是碰到了桌子就不走了,向后转回去睡觉,不干了。(全场笑)青年有许多好处,因为我过去好象也是青年变的,(全场笑)所以稍微知道一点。青年人眼明手快,眼睛看得清楚,做起事来很爽快,很迅速。青年人又聪明,活泼,有朝气。象那些老年人如果学外国文,死也咬不进去。(全场笑)青年人也有二三条缺点,这总难免。比如说吧,有一个青年,就算他是二十岁,如果要活到一百岁,才只走了五分之一的路;当他还是娃娃的时候,母亲把他抱在怀里,他就不高兴,要提出反对意见,(全场笑)要走路,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就要在地上爬。好象我们中国半殖民地一样,不能独立自主,(全场笑)走的不好,跌了一跤就要哇哇的叫,(全场笑)于是就要知道这个路是种什么样子。我们走路,每天都在上“走路”课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慢慢地就走得差不多了。再举个例子,小孩子总是看见了火觉得怪好玩,就想去摸摸它,把它拿到手里来玩玩,但是碰过几次他就不要了,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大玩得的。(全场笑)所以每一件事都是经验。比如飞机丢炸弹,这一次我们就好得多了,这些都是斗争的经验。

我今天来讲的道理,就是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同志们要准备各种的曲折,忍耐,克服困难,不痛快,不如意……。有许多同志写信给我,说是手冻坏了,要我想办法,这我就没有办法,如果只有你一个人,我还可以替你买一双手套,但是人多得很,大家都忍耐着,所以我只有叫他还是和大家一样。也有的同志写信给我,说要写字,没有自来水笔,叫我想办法,这我也没有办法,没有很好的自来水笔的人多得很,也只有叫他跟大家一样。我们是要遇到种种困难的,比如我们常常在夜晚睡觉的时候,想得如何如何美丽,什么都是好的,自己真是天下第一,但是第二天早上一起床,都不相同了,处处要碰钉子。所以我们要准备着曲折,准备着克服困难。

……

我今天就是来告诉同志们这一个办法,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情况,如果走不通,我们就转一转弯。比如八大队刚刚办好又要分散,这就是转弯,不单女同志,男同志也要转弯的。日本的飞机要来轰炸,要进攻西北,所以我们要转弯。在抗大学他一年半当然好,但不进抗大也成。那么抗大就不要办哪?(全场笑)不是的,抗大还是要办。但并不是非要进抗大才能抗日,不进抗大就不能革命,不能抗日。我们说要进抗大也行,不进抗大也行。像我们的徐

海东,他就没有进过抗大,也没有进过黄埔,但是能够打仗。

所以我们要政治上的持久性。从前我看到男同志中间有这样的情形,碰到了困难就转弯了,但是他来了一个大转弯,转了一百八十度,转向反面去了,(全场笑)于是回到家里去。我们就不这样,碰到困难,稍微转一个小弯子。共产党中有过一个中央委员,是女同志,名字叫向警予,在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八年死掉了。她何以能作中委的呢?因为她非常坚决果敢,我们同志就要学向警予。我们同志遇到困难还是继续前进,决不根本后退,不像那个张国焘。(全场笑)我们两万五千里也是走“之”字路的,本来哪里有两万五千里长,就是走“之”字路,这一弯,那一弯,一共加起来才有这么长的。我们到了四川,要从那里过去,刘湘说:“不准走!”(全场笑)于是我们又转回去,到贵州,到云南。那时候要过江,船都烧光了,只抢到了四只船,于是就慢慢儿慢慢儿地过,把大批的部队都渡过河了。渡过去之后,四只船也都烧掉了。后来的贺龙又要绕到金沙江才渡了过来。所以我们同志们要能克服困难,那就万事俱备,要有政治上的持久性。我们同志来到这里,有的觉得不能满意,所以我们开始总要讲一次话,不要估计太高,这就叫作拿一盆冷水,先在大家头上浇一下。(全场笑)因为有些同志来的时候很高兴,蹲了一些时候又不满意了。我们这里有些是不可以克服的,比如物质上的不好,有些是能够克服还没有克服的,比如工作上的某些缺点。我们这个地方是共产党的,对不对呢?不全对;我们这里是抗日分子的集合地。你们到通讯学校去,到卫生工作中去,遇到有不对的地方,就要把它改善,要把它看作自己的事情一样。说了如果不成功,等一个时期,有机会再说。我们同志有时候受到批评,,批评得对还好,批评得不对就要呕一肚子气。(全场笑)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时搞不好,就要长期的搞下去,要能忍耐;青年多半没有耐性,不能忍受。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是要有政治上的持久性,这是第一;第二就要克服困难;达到光明的大路,这是第三。我们都要达到光明的大路!

同志们到这里来学习它八个月,我也赞成,这是真话。然而今天怎么又要解散呢?这是环境的不允许,将来我们还要准备应付更多的更大的困难,钉子,打击,阻碍,曲折……我们走的是“之”字路,然而最后就要达到你们最初到这里来的时候的目的:抗日救国。(全场掌声雷动)

自己为自己的劳动,其生产能力是不可限量的

下面这些话是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演讲:

同志们:

今天的大会,是你们生产运动初步总结的大会。抗大同别的机关一样,生产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完成了,这是很好的。这证明了: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计划是可以实行的。在当时,有些人怕这计划难于实现,因为在过去没有做过,但在那时候,我们有信心,有把握,认为是能够实现的,我们的根据有两个:

第一个根据,盘古开始分天地,人就要吃饭,就要自己耕地,为什么陕甘宁边区四万脱离生产的人不能吃饭,不能耕地呢?人类已有五十万年,都是自己做饭吃,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够自己搞饭吃,就是外国的老百姓,也是如此。这是一个最硬的根据。他们是人,可以搞饭吃,我们同他们比一比,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搞呢?

第二个根据,是去年四五月间,后方留守兵团,进行了生产运动,但只是部分的进行。生产的结果,他们的弟兄们,每人都有两双毛袜子,两双手套,一双鞋子,并且自己解决了一套单衣服,这都是由于他们自己种菜种出来的。在过去,他们机关里没有办公费,因此做起统一战线工作来,只能请客人吃茶,不能请客人吃饭,但是人家都请我们吃饭。讲起礼来,就要礼尚往来,因而有点不大妙,但要妙是要钱的。怎么办呢?他们就办合作社,赚的钱划出百分之几做部队的教育费,百分之几做办公费,百分之几改良伙食。这样一来,就好了,抗日家属的母亲父亲老婆儿子来看一看,从前没饭吃,只好饿肚子,现在可以请吃饭,还有肉吃呢。去年夏秋季,他们的教育费,办公费等等的问题都胜利的解决了,那末,粮食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解决呢?部分的生产运动有成绩,为什么普遍的就不能做呢?

这两个根据证明了:古今中外人都能自己搞饭吃,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能有成绩,同样的,陕甘宁边区脱离生产的四万人进行普遍的生产运动也是可能的。因此下决心,提出生产运动。四万人与边区的老百姓大家要进行广大的生产运动,来改良自己的生活。

这四万人要是没有饭吃,没有钱不能解决。那只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饿死;第二个办法:解散,把共产党解散,八路军解散,抗大也解散;第三个

办法：自己动手解决。实行哪一条呢？只有第三条。

现在有了第三个根据，那就是我们生产运动第一阶段的成绩相当好。

我们有了这三个根据，确定这个方针，并且实行了这个方针。

现在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抗大可以做，边区四万人可以做，可以自己耕田搞饭吃，现在全国所有的军队、政府、党部、民众团体、学校，可不可以做？我想大概也可以的。我们的根据，是上述三个，只要下决心，没有不成功的。所以现在我们先第一，要把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办法，散布到全国去，使之成为一个普遍的全国性的运动。同时真正打日本，抗大与延安四万人是不能包办的，一定要同四万万五千万人共同来打。全国各地地方——西安、长沙、重庆、成都等等地方与广大的老百姓，大家都做出计划来，大家同我们一样的干，日本就没有办法，它要战胜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却是能够战胜它的。所以我们要胜利，首先要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穿衣问题，就是说，要进行生产运动。

第二，我们要在全国提倡，造成一个风气。全国四万万人人都干起来，这是有很大意义的。同志们，那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新中国了。老中国只有大多数老百姓干，历史上几千年来一部分办国家事情的所谓治人者是不耕田的，只有被治者耕田生产，假使全国都干起来，不论做官的或不做官的都干起来了，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

历史上只有禹王，他是做官的，他也耕田，手上也起了泡，叫做胼胝。还有一个墨子，也是一个劳动者，他不是官，而他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孔子虽然是圣人，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耕地。人家问孔先生耕地种菜怎样做？他说：不知道，去问耕田的人，去问种菜的人。墨子不同，他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

……

你们出去教人家打游击，做统一战线工作，办报纸，做民众运动，但除此以外，还要教人家打草鞋，造房子，耕田生产。这一些，你们现在都有经验，你们足上的草鞋是自己打的，北门外七十九个窑洞，也是抗大同学在去年打的，现在你们又开完了荒了，今天提出来，你们要把这种意思宣传到全国去。

你们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因为是在抗日军政大学。你们是工农商学兵团结在一个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

我们延安四万人能把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文武配合起来，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在外国，除了苏联，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日本算什么？美国算什么？

比起延安来都差很多呢！所以要把这个经验宣布出去，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里头道理是讲知识分子的分法。知识分子有几种？有三种，就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不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什么标准来区分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农相结合的，结合的是革命的，不同工人农民结合的，那只有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中国有三万万多是工人农民，其他的只有几千万人，知识分子不同工人农民相结合，不能与工农打成一片，看他如何去革命？我们抗大学生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而且是知道马克思主义的，能够同全国的工农结合的；我们不但能组织工农，训练工农，并且自己也做工农。现在这样的工作使我们更加革命化了。抗大同志们参加这次劳动运动，很多的人，身体锻炼得更好了。而且思想意识也在这个运动中锻炼得更坚决更结实了，那种鄙视劳动的意识，在同志们中间已不复存在了，而且个个以参加劳动为荣事，所以今天的初步总结大会是有特别重大意义的。

同志们：在这三星期里，给了我们一个方向，就是粮食问题是可以自己解决的，同时，从这个解决粮食问题出发，也给了我们一个抗日的方向，就是我们要与工农结合，一切事情都办得到，办得好。我们更应懂得：革命的知识分子（汪精卫也是知识分子，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但他们是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把这个方向宣传到全国去。你们毕业以后，学了整套的经验，到全国各地去宣传，教育，组织起来。

这次你们抗大的一百二十个伙夫同志，生产成绩要算最好。目前讲起来，延安生产运动，第一是抗大，但老实讲，头功应该是你们的伙夫同志。你们的伙夫同志一百二十人，要承担你们全校自己所要解决粮食的一半。现在我们全体自己担任了三分之一的粮食，而其中一半就是他们一百二十人耕种的了，就是说，他们担负了你们全体全年粮食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一百二十人的劳动，要供给五千多人全年粮食的六分之一。而且，他们还是用很原始的工具，用这样笨拙（在现代应该说是笨拙的）的锄头铲子来耕种。你们想，他们的成绩大不大？这一百二十人的劳动生产，真是伟大，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既然我们一百二十人能够解决五千多人全年粮食的六分之一，就是一个人解决了十个人的粮食，而且还是在用原始工具的条件之下，是第一次尝试的条件之下的成绩，那末，我们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只要有四千五百万人的生产就可以把全国全年的粮食问题解决了。但是现在我们中国的农民要占全人

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即是有三万万以上是耕田的,而这三万万多耕田的人,还有没有饭吃的,非常穷苦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制度不好。农民耕种出来的粮食,被地主先剥削了百分之七十五,并且由于耕地分配的封建性,都是分散耕种的,这使收获量减少了。如果用抗大伙夫同志的办法,没有剥削,而且是集体耕种的,这样,象上面所说的,只要四千五百万人,就可以解决全国人口的粮食问题了,根本用不着三万万。若用机器来耕田,可以再减少几百万;用电气化的话,那只要几百万人就可以解决了。这就是抗大伙夫路线,你们想,好不好?我自己想,认为是好的。但是,同志们:要如此就得把制度改变一下才行。

为着自己而生产,这种生产能力是不可限量的。有人说:这种劳动是当“农奴”。我们不以为然,因为是为了自己,是算做“农奴吗”?诚如所说,那末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议,是剥削抗大五千多人了。(笑)共产党变成剥削党了。(笑)我们为自己而生产,不是为别人而生产,这种劳动热情是很高很大的,是没有限制的。

这一百二十个伙夫,他们生产了一千个人吃的粮食,而他们自己只吃了一百二十人的粮,其余八百八十个人的粮,是给你们了。但是他们知道,这不是剥削,不是做农奴,做奴隶。他们知道,给你们吃,你们是要到前方去拼命,去打日本的,把命都贡献给了国家,他们之供给粮食是应该的。

所以伙夫同志的耕田,不是什么“农奴”,这种劳动办法,是自己为了自己。假使四万万五千万人,也是自己为了自己劳动的话,那末新中国就出来了。耕田的人再减少了,就是社会主义;四万万五千万人,只有几千万人耕田,其他的可以做旁的事情。进到共产主义,那更好了,这是我们的远大目的。现在你们正是大学其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要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的。

现在有人做文章,议论相当多,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现在我们延安首先来试一试,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可以耕田,可以做工,为什么不适合国情?耕田不适合国情吗?打草鞋不适合国情吗?难道贪官污吏是适合国情的?!(笑)

中国不实行共产主义是不好的,我们说:还是实行的好。马上实行,倒也不是,但是将来一定要实行的。马克思主义,也有三个阶段,我们现在首先是实现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共和国不过是第一个阶段而已,社会主义是第二个阶段,共产主义才是第三个阶段。

新中国是民主主义的阶段,将来就要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到共产主义的阶段。

战争第一

1938年8月2日毛泽东对抗大四期一、二队及随校毕业同学讲话中,论述了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树立“战争第一”的观点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战争来进行,“一切都不离开战争”。他说:

战争第一,为什么还要讲呢?哪一个不晓得呢?但是我们还是想讲一讲,因为这一问题,外面的还有一些人弄不清楚,里面的人,同志们中间也许有一部份不十分弄清楚。这问题的内容是革命的形式与革命的方式,这问题在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已使得许多人弄清楚,然而,现在我们在理论上的指出还是必要的。

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受帝国主义管;帝国主义是全副武装的反革命,他来管是用武装的,现在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样来管我们。

中国且是半封建的国家,就是说没有民主的国家。民主就是讲话、开会、讨论,中国这些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国家的特点,是对外不独立,对内不民主。根据这一特点,我们的革命是怎样呢?历史证明着,是战争第一,军事第一。

鸦片战争是打仗,同英帝国主义打仗,为什么败?因打得不好。后来太平天国战争,是对外求独立,对内求民主的战争,一共有十三年。为什么有十三年?因为有枪杆子。但为什么会失败?也是弄得不好,内部团结不够。另外有一回,是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在戊戌年,掀起一个运动,就是维新运动。就是说要把“女孩子提起,老婆子压倒”。但是那时光绪反被他们压死,捉到几个枪毙,砍头,康有为和梁启超便“溜之大吉”。(大笑)为什么这样?因为手里没有枪,人家(指清廷)有枪,于是就被枪杆子压倒。后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三民主义运动就不同,他是主张战争的,鼓动全党以武装来革命。国民党的历史,就是到处打仗,时时武装。一次次的失败,到辛亥年革命成功;又被袁世凯力量压倒,再起来打倒袁世凯。一直到现在,蒋介石先生都知道是要打的。

共产党也是讲打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文的,而且还要武——特别在中国。外国也一样要有,但外国有民主,国会,有工会,各党派可以在议会里宣布自己的主张,开展议会斗争。中国却没有这一条。

中国在大革命时代,未注意到达这个问题(枪杆子),那时江西有二百多万

的农民协会会员，湖南有一千多万农会会员，工人十几万，在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马日”事变，一边来一个杀，一边就来一个垮，（大笑）所有的农会工会都垮了台。

我们共产党就得出这一条：枪杆子里出农会，枪杆子里出工会，枪杆子里出政权，又出共产党，枪杆子里出一切，这是真理。

被逼上井冈山，为什么能够在山上？就是有这枪杆子。它打出游击队，从小到大，打出大红军，打出政权。没有枪杆子的地方，哪里有没有政权？有没有工会、农会？

这样下去，就要枪杆子显灵，一年，八年，十年。后来枪杆说要走路，一走了二万五千里。那末在江西，鄂豫皖等的党政军都垮，还要被人捉，老百姓受苦受难。你们可以去问（我们已经问过了的），到现在他们还是同意我们的。现在土地归还豪绅地主，债要一五一十的还，少了就要坐班房，打啦骂啦，他们那儿是换来了另一个。一面没有了，另一面就有。抗大办到保安，再搬到延安。为什么不在香港？这道理很简单，这里有肖劲光（延安留守处主任）。

过去共产党被赶上山，现在我们的朋友国民党也被赶上山，（大笑）福建，山西，河北，江苏等省政府都上山。省政府上山，那末省党部上山吗？那由你！（大笑）

日本帝国主义把国民党共产党都赶到山上，这是上山主义，（大笑）还要来一个“下水”主义，所谓“登高临水”，怎样“下水”呢？那就要好好的做。

总而言之，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就要枪杆子。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的特点，又是优点，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到现在这句话还是正确的，“武装革命人民反对武装反革命——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这句话是真理。

所以我们说战争第一，无论是抗大同志，无论是那里的同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都是战争第一。

那天讲的当指挥员，就是方法。做什么？回答是搞游击战争。

那末，有人要去当新闻记者，我们说新闻记者还是要战争。

假定汉口不守，那末在汉口能办报纸吗？是可以办的，是汉奸报。当然除了汉口以外，还可以在昆明、贵阳、峨眉山等地去办，但是在那里办的报，是不能到达全国各地山脉的。所以我们要办山脉报。过去在中央苏区就有这种报，现在的晋察冀边区也有这种报，延安也有新中华报，各地的山脉都需要这种报。所以新闻记者还是要战争。

好了！新闻记者已经解决了，那末女同志呢？八路军不要女同志怎么办呢？我们说八路军不要女同志，又要女同志。因为世界的分工，一半是男子做，一半却要女子去干。八路军要医院，要宣传员，组织老百姓，农会，工会，青年、妇女会，都需要妇女去做，女同志都可以做，这就是战争，是战争所不可少的。

艺术工作者，也是要上前线。

如果说延安就不是前线，这是狭隘的前线观念。延安今天不是，明天不是，后天是了，谁能断定呢？日本飞机来了几次，虽没有“下蛋”，但这是不是前线的气味呢？

那末云、川、贵是不是前线？有些云、川、贵的同志会这样问的，我们说，在广义上讲来，也是前线。但是云、川、贵同志是不是可以到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去打游击呢？那个说不可以？有几个人要去，当然还是可以的（虽然工作是分配的，但还是征求个人意见的）。这也是战争，是广义的战争。四川等有十几万来参加战争，你们回去宣传，组织民众生产，也是抗战中所需要的。

现在是全国的战争，而且是世界的，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这个问题是说战争第一。当指挥员，政治委员，看护，宣传员，组织农民，组织青年，组织妇女都可以，到山上去建立一个共产党支部也可以，但不要离开战争。在没有战争的地方是不是也可去呢？当然可以。但五台山和天津、北平之间，五台山是要重要些，总之，都要战争。

现在在大小根据地都实行民主，但是这种工作就离不开战争。延安的民主是从枪杆里出来的。现在民主就是从日本手里去夺。

只有枪杆子运动，才能做得好，而这枪杆子是归马克思主义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管）。政治下命令，枪杆子就要服从，枪杆子如果脱离了革命的政治，就会失败。过去俄国皇帝有几百万支枪，被一支枪没有的俄国共产党，俄国人民打垮。现在苏联有几千万支枪。皇帝路线失败，几百万支枪没有，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下，就有几千万支。

所以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

“一切都不离开战争”，我再重复一句。

为什么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这是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一大队成立大会上讲的：

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理由，我简单的讲些。

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开除？因为他不干了，对共产党路线发生动摇，因为他自由行动，到汉口与陈独秀叶青天天会面，弄得火热。

他在西安事变时主张杀蒋，实行内战。以前，在1936年西征的时候，他要到昆仑山上进行统一战线，与姜太公、太上老君进行统一战线（大笑）。我们到了陕北他还要去，他自立伪中央，自封为总书记，天下少有的这位先生。1921年中共开第一次全代表大会，他也到了；1923年在广东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也到了；中央决定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他坚决反对与资产阶级合作，他说无产阶级是清高的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要沾上脏物，反对合作。可是他终是少数，在革命时他就脱队了，因而到了末期又与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方向同去。这是所谓历史根源。承认错误，尾巴又在，一翻一复，两面派的行为始终占据他，现在又去了，跑到国民党那儿特务机关里去。我们要他当代主席时，希望他割掉尾巴（机会主义的尾巴——记录者），要他在工作中纠正错误，他说：“割掉了”！而实际上穿起长袍子，尾巴藏在里面。（笑）为什么今天才开除呢？因为讲讲仁义道德，而且他资格老，做过工人运动。同时，我们共产党对党员以说服教育为前提的。他这次走，是借口到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他到西安与林伯渠讲，说边区是鸡骨头，吃之无肉，食之有味，这是曹操讲的。这边区是否鸡骨头，可以讨论，我看你们一定以为它不是。我看边区还有两块肉：（一）坚定的政治方向；（二）艰苦的工作作风。你看这里有民主，只要抗日我们都拍掌欢迎，不论男女，信仰都不成问题，国民党也行，决不会抓。如果他们来探听消息，那有什么不好，我们希望他去报告，这里有二条消息，一条是坚定的政治方向；一条便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去报告很好，希望他不要少报。以前国民党人不知道我们是怎样，谈了一下，才觉得很好。国民党派人到云阳青训班调查，写了报告，说都是很好，全讲抗日。你若反对共产党，就和你讲讲道理，讲得通很好，讲不通，三个月出去也就算了，边区里除了汉奸以外都不反对的。全国青年潮水一般的涌进来，他（指张——记录者）说边区不好，是鸡骨头，我看不对，不知你们意下如何（大笑）？他到汉口，住特务机关，与托匪往来，脱离了共产党，共产党的册子上有他的名字，现在就可把他勾消，因此开除他的党籍。今天他被开除后，不破坏共产党，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当汉奸，我们对他还可以在党外联合抗日。

破坏与建设

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抗大与女大联欢晚会上讲话,驳斥了反动派污蔑我们“只会破坏、不会建设”的谰言,他指出:

在中国,要把统一战线搞好,要把这个大团体弄巩固,首先就要反对投降派,反对反动派,反对分裂派,反对倒退派。那些投降派,他们为了要投降,就要闹分裂做倒退,因为不分裂不后退是投降不成的。他们一个人兼做了三个博士,第一是投降博士,第二是分裂博士,第三是倒退博士。(全体大笑)你们今天开大会,他们说,要不得,抗大要不得,女大也要不得,什么都要不得。总而言之,他们是反革命博士,顽固博士,他们说,抗大女大都是不好,依照他们的意见,是要取消抗大,取消女大。取消抗大与女大好不好呢?只对日本是好的,而对中国抗战是有害的。

那些顽固派说:抗大,女大,共产党都只会破坏,不会建设。似乎只有他们是讲建设的,而我们不讲建设的,这是哪里话?我们建设了抗大,建设了女大,建设了几千个窑洞,谁说我们不会建设?我们建设了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建设了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五台山的抗日根据地,建设了广大的游击战争,这许多是什么?谁说我们不讲建设?

同志们!要建设是不是要破坏呢?比方:这个地上有一堆屎,要在这堆屎的上面建设能不能呢?要在这个地方建设,要不要把屎破坏一下呢?现在那些顽固派反对这种破坏,看来他们跟屎一类的东西是很亲善的。(笑)中国要建设,就要把旧的东西破坏。中国有很多的东西要把它破坏,有很多屎一类的东西要把它破坏,那些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势力要破坏,抽大烟的要破坏,打麻将的要破坏,嫖赌的要破坏,土豪劣绅要破坏,贪官污吏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破坏,顽固分子要破坏,倒退势力要破坏,一切不利于中国抗战的都要破坏。总而言之,要把中国的半殖民半封建破坏,要把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两堆屎破坏,(全场鼓掌)建设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这就是革命的破坏,而那些三重博士——投降派、分裂派、倒退派——是反对这种革命破坏的。可是,他们是不是不破坏呢?同志们,那倒并不。他们破坏的东西多得很,他们破坏的是好东西,他们要破坏抗大,要破坏女大,他们要破坏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他们要破坏八路军,破坏共产党,破坏最进步的科学思想,凡是一切进步的东西,他们都要破坏。同志们!他们的这种破坏,是反革命的破坏,是违

反历史危害人民利益的破坏。

我们对三民主义的态度

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抗大3期2大队讲话,详尽地论述了“我们对三民主义的态度”的问题,他说:

同志们!你们已经毕业了,现在再来一星期的讨论,把一切问题弄清楚才走,这办法是很好的。今天最后一次,我来讲点,也就是你们提出来的问题之一,“我们对三民主义的态度”。

去年7月15日,我们中共中央曾发表一个宣言,表明我们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你们可以拿这个去看一看,讨论讨论。那上面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两句话的意思说,第一,三民主义是必需的;第二,我们共产党愿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必需,如果不必需,要不要为它的实现而奋斗呢?然而它是今天所必需的,民族要独立,不受帝国主义压迫,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一点我们还缺少;民权要实行,老百姓没有权利,你们由各省各地来的,知道只有土豪劣绅能做官,老百姓便不能做官,祠堂里办事的全是有钱人,工农不能去办事,这一点我们也缺少;还有民生改善,我们没有做到的,人民生活非常痛苦,百分之七十的收成要交与地主,有的地方高利贷到百分之五,甚至借一百元每年利息要付三四十元,借一担谷子几月以后要还一担五或两担。工人生活也很痛苦,不能安身。我们长征时大家都看见过老百姓下大雪还是单衣,有的地方甚至没有裤子穿,你想这样的天气我们还穿两层,老百姓得了不得了?外国人到延安的曾对我说:“世界上只有中国老百姓最苦”。要不要民生呢?使老百姓有点饭吃有点衣穿。所以民族解放、民权有权、民生解苦为中国今天所必需。你们出去了,人家问你们,不要不懂,三民主义便是这样的道理,容易懂的道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句话,有什么难?

好,三民主义为中国所必需,为什么共产党以前不实行呢?难道以前不需要吗?你们到外面人家问起来如何答复?昨天就没有压迫吗?我们回答:谁说昨天我们没有实行呢?我们昨天何尝不是说必需的?我们一向是实行着的。十多年前,孙中山先生还没有死,红军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在广东见了中山先生。国共两党的代表开了一二十天的会,决定了好多的事情,即是所谓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列宁同志就是在我们开会时死

的,我们还追悼过他。现在1938年,十多年了。那一次会,中山先生和许多国民党代表开了差不多一个月,那是很好的宣言,也是两党合作的宣言。人家问你们,你便可以对他说:1924年大家开会,共产党参加了的,几十个代表开了会的,汪精卫、孙科、胡汉民……都是国民党的。一切在那时便讨论好了的。以前有人把三民主义讲歪了,在那次就加以解释,三民主义不能那样讲。又订了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那时有这三大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求国民党恢复。现在联俄有了,联共有了,联工农也有了一点,而在战区后方如五台山,行的合理负担,有钱出钱,减少苛捐杂税已经有了,这些是十四年前决定了的。以后1925、1926年北伐,打开武汉,再后两党分家,他们说共产党不好,工会农会自卫军要解散。我们加入了国民党的要清党,拉了共产党便要这个样子(作杀人手势)。为什么打起来了呢?你们有些怕还不大清楚,打开武汉,攻下南昌,取得南京(林伯渠同志便是第六军的政治部主任),攻得上海以后,国民党便与帝国主义讲和,要捉林伯渠,说他把日本领事馆烧了,其实是流氓放火,加祸于共产党的。捉林伯渠,他没有办法,才在南昌和贺龙叶挺起义,以后他又到苏联读了几年书,你们在抗大不过读几个月。

我们要信仰三民主义,1924年便信仰三民主义的,参加过国民党大会,参加的有我,有林伯渠,还有好些人,有许多不在此地的。哪个不信三民主义?哪个不实行三民主义?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我们到处讲,你们不实行却要杀我们,我们犯了什么罪?天不该地不该,只行了一个“三民主义”,要民生实行,废除苛杂,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民权实行,老百姓有权组织团体;民族实行,烧了帝国主义的房子便好像烧了他父亲的房子一样。(笑)他们又说打错了,但是那时九江汉口的租界收回了,广大的群众起来了,真是大场合,叫做“大革命”。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西、上海、陕西、四川、河北都起来了,真是热闹得很。他们说不行,我们说要行,他们便砍头,你看得不得了?行三民主义便要杀头吗?我们共产党才开会,在1927年8月7日,十分秘密的开了一会,稍为漏一点风,我们的头都会不见的。在汉口德国租界,我们批评机会主义,说明国民党叛变了革命,与帝国主义勾结,反对老百姓,反对人民生活改善,取消工会农会,到处杀人,不单杀共产党,有共产党味的都要杀,办过农会的更不得了。你们讲中国问题,大概讲到这些,但是讲的人未亲身参加,我想还是我讲好一点。(笑)

说共产党不信三民主义,今天才需要三民主义,这话完全不对。1924到1927年我们实行了没有?谁在全国内对三民主义最尽忠?他们也知道只有

共产党。打土豪、办工会、反贪官污吏，反帝国主义，这些那一条不是三民主义？国民党也知道的，不过不要行得彻底，行得太厉害了。以后我们逼上梁山，所谓官逼民反，井冈山、鄂豫皖的山，陕北的山，四川通南巴的山，并且来了游击战，这些难道不是三民主义吗？共了产吗？好多农民同志，以为打土豪便是共产主义。从前我在井冈山时，要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有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那一位农民说：“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笑）本来昨天打了土豪，猪、谷子、衣服、都拿走了。这话对不对呢？实际上不对的。土地革命还是资本主义范围以内的工作。因为把地主的田分与农民，仍是私有财产制度，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每家老百姓都分了田，自己去耕，耕了仍为自己所有，可以送朋友，别人便拿不得，只能借。这是不是私有财产制度呢？是的。苏联的却不是如此了，把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八家的土地都合拢来，譬如说八百亩，举一个人管，土地不是某家人所有，而归举出来的人管。假设举了我，我便可以调兵遣将，可以指挥。耕了之后，谷子归公家，即是国家，然后再来分配，姓赵的五口人给他一百二十担，姓钱的人多点一百四十担也可以。到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便可以要多少供给多少了，因为那时的情形不同。有大人小孩，有读书的，有在新剧团跳舞的，你要多少用多少，只要不乱丢就行了！土地工厂一律归公，公家再来发。六十岁的人，好，你在家吃闲饭，有了小孩子公家给你养。现在的小孩子可不行，鼻涕、眼屎、蚊虫、苍蝇，多得很，都是他的大敌人。（大笑）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准小孩子身上有虱子的，每天换衣服，而且有几套，文化程度也高得很，马克思主义大大研究起来。那样才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今天还是资本主义以内的东西。老百姓分点田才能活，这是民生主义，否则便是“民死”了。所以十年来还是我们行了民生主义，他不要我们行，我们说要行，于是便打，一打就打十年，你打八年还好哩！（笑）行了民权吗？只有我们的地方行了民权，有妇女会，儿童团，少先队。还办了苏维埃，姓苏的（笑）老百姓可以当县长。西安委的县长280元一月，我们老百姓举的一元钱一月，一角都不多，整整差了280倍。但老百姓的反而艰苦奋斗，做得很好。行了民族主义吗？我们对帝国主义是历来不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辛辛苦苦，便是为了北上抗日。在苏维埃，帝国主义一只足也伸不进来，因为有自主的关税，外面任凭帝国主义摆布，我们却是由自己来。煤油、盐、棉花，我们需要便不抽税，不要的根本不准来。天不怕，地不怕，对洋人也只有我们才不怕。黄石港、长沙、漳州我们都打帝国主义。在福建漳州时，他们24条兵船马上开来了，生怕我们飘洋过海去打他一样。三民主义我们真正的行了，去年7月15

日宣言所说：“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话对不对呢？对的。十年来我们实行了，而且还要行得彻底。什么是底？水桶有底，要彻底的有，不要半桶水。三民主义要“彻底”的实行，这两个字是他们所不敢加的，只是说实行而已。我们共产党为了要中国将来到进步的共产主义社会，今天便要真正的彻底的实行三民主义。行起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独立的做，过去行了十年的便是如此；但是今天友人国民党要和我们合作，因为日本人打进来了，所以今天单是八路军与抗大二大队还不够，我们几年来的统一战线是有效的。张国焘批评我们1936年8月25日致国民党书是“韩文公祭鳄鱼文”。这个你们怕还不懂。中国从前有个姓韩的读书人，平时很会做文章，那时在潮州做官，海里有鱼，几十丈长这样大，（手势）尾巴一卷，呵，好长！每年要杀几个小娃娃去祭，这位姓韩的便做了一篇祭文，如像7月15日孟兰会祭文一样。这篇文章我这儿还有。说：“不要来，来，我便要打你！”以后真的不来了。（笑）这在我们看来是迷信，他怕了你？文章有啥用？不过到别的地方吃人罢了！祭了便不来是假的。张国焘说我们那封信是“祭鳄鱼文”。（笑）国民党是鱼，我们是“韩文公”。但是他的话不灵，还是“韩文公”灵，你看现在我们一同打日本，而且全国打，打得相当好哇！所以我们要讲统一战线，以便实行三民主义。过去单独的实行，一切由我们做，开会，组织苏维埃，现在是合起来做的，所以一切要商量商量。苏维埃好不好呢？有人说不好了，因为现在没有要它，这是不对的。苏维埃为什么还不好呢？那是民权嘛！我们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朋友说我们做得太多了，现在一同打日本，商人也可以参加选举。其实土地革命便是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外面的土地不分了，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过去我们想的方法非常快，他们说要不得。其实在当时个个乐意，只有土豪不乐意。

现在正是抗日的时候，抗日第一；而要抗日便要统一，所以抗日第一也便是统一第一。单独的干他们便不打日本了，所以我们让一下，还是大家来打日本，这便是行三民主义。第一条民权主义已是开始实行了，《新华日报》在汉口出版，全国发行，这是共产党办的呀！你看这一条好得很哪！以前我们的传单标语都是要通通涂掉的。现在共产党员可以到汉口，自由走路，挂上“八路”的臂章。以前红军是无走路之权的啊！你有走路之自由，他便有捉你之自由，现在我们在西安等地也都有走路之权了！民生方面阎主任也提出合理负担，有钱出钱的办法，这是我们赞成的，工人农民钱少，所以出力。这次国民党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了宣言和纲领。现在有了这东西，相当好，里面

有些好话,可去看看。我们现在便可拿这东西去驳那些人,如什么不要民主,一个思想,一个信仰,一个领袖等等,把那些人的嘴巴用国民党的东西来封着。“你讲不好,你们自己发的宣言议决案,有命令,有公事你看看!”这是真的嘛,有宣言有公事,你不服从便是反对蒋委员长,反对上面的公事。还是要实行一下,这很有道理。可是不要抄了我这一篇道理去讲!(笑)“你们不对,反革命”。这样一来统一战线便统翻了。这个老账在今天讲,但不是对外面讲,我们要说:“仗打得不坏,宣言纲领都不坏,要建国,建立个新中国”。

这便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共产党员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三民主义是要的,而且要彻底实行,和朋友在一道,在统一战线抗日第一的原则下实行。将来一步一步的行下去,土地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人民即使不组织苏维埃,也要选举大总统。这些都要做到。做下去,做下去,再做下去,就做出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来了!大概此地到城门口是三民主义,城门口到你们住的地方是共产主义,所以三民主义是必经之路。我们的大纲领本质上是三民主义,而且没有超过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出了城门的一段是社会主义的路,第二段才是共产主义的路。苏联今天还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而共产主义却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想多少衣服便有多少,你要帆布床便给帆布床,家里小孩子多便多来小桌子。我们中国人不大理小孩子,桌高人矮,爬不上来。桌大手小,菜又弄不到。(大笑)将来床也要弄好几种,夫人大床、小人小床,现在小孩子一不当心便会跌下去。(笑)现在小勤务员也穿我们的衣服,好像穿外套一样。(笑)看肚吃饭,量体裁衣。为什么能那样?因为丰富得很,所以能解决问题。苏联今天还不是这个样子,今天还不过“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你姓赵的,两弟兄做工,大哥多做,给你二百元,二哥少做,一百五十元,不做的不给钱,各取所值。如一家八口,两个人做工,得三百元,五口人两个人做工,也得三百元,这是不平等,人手少,病多,小孩子多的便吃亏。苏联的社会还不能平等,因为没有这样多东西呀!要到共产主义社会,一切都好办,那便到了你们的宿营地了!好多共产党员不明了,以为分了土地便完了,这是错误的。到共产主义社会是很远的路。我们开步走,经过城门口,即是为了达到目的地。实行共产主义,这是伟大的理想,真是好得很,一切都平等。因此我们结一个政党,为此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志向是大得很。以前农民以为中了秀才当了县长便了不得,这对我们共产党员算得什么东西?我们真要弄那样好的社会,世界上从来没有的社会。但要做到,便要先实行三民主义,打倒日本,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

幸福。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他们又怕了！因为我们公开讲我们不放弃共产主义。我们说共产主义好得很，怎样怎样好，一条二条……再有比共产主义好的吗？没有了！现在只能实行三民主义，因为中国条件还不够，正如你们不能马上学政治经济学一样。中国不可能马上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而要先实行三民主义。

一定要实行三民主义，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便由三民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呵！你们又要推翻三民主义了！不是的，我们要开个会，讨论讨论。你说不好，我说好，由老百姓来讲。我们不动刀枪，好好商量，避免打仗。可以好好发展，到各地办工会农会，出报纸，走路之权，那当然以不打为妙。不过事情是两方面的，我不打，你也不要打，专打外国人。一次不行说二次，二次不行，找老百姓。只有对汉奸是要打的。哪有汉奸不挨打之理？

合则两利 分则两伤

这是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一大队成立大会上讲的：

国共合作可分为三段：头一段是两党合作；第二段是两党分裂；第三段是两党又合作。按照中国古书（《三国演义》——你们看过吗？——那里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全场大笑）过去分了十年，现在又合起来，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当然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了不一定会再分的。我们可以把他改成两句话，改成：“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是过去已经证明了的。你看历史上的合作，北伐胜利，基本的原因是那时两党的统一战线执行了这个纲领，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了一个宣言，我是亲身参加了这个会，孙中山先生主持，确定了国共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1924年1月开大会，就在那年开办黄埔军校。1925年统一广东，打陈炯明。他是多年打不下的——这也是合作的力量。那时蒋介石先生为黄埔校长，周恩来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如第一军蒋介石先生为军长，周恩来同志为党代表。1926年北伐，势如破竹，占南昌、武汉，攻破上海、南京，把吴佩孚、孙传芳打得落花流水，这都是统一战线的力量，没有这力量是不可能的。所以说，1925至27年大革命的胜利，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同时这革命的影响那样深入到群众中去，也是空前的。这就是“合则两利”的证据。

分则两伤有什么证据呢？就是从1927年两党分家到西安事变，这个时期不仅是两伤，而且是三伤，因为那时老百姓也遭难。国民党有什么好处呢？打

了十年，无结果而散，没有打个名堂出来。要想消灭共产党，以前共产党是参加国民党的，那时他不赞成合作，将共产党赶出来，所谓“清党”。在各地不准组织工会、农会、学生会，不发展工农运动，说我们反对封建太厉害了，反对帝国主义也太过火了。可是，叫全国人民看来不是如此的。因为那时所做的不仅没有超过，而且很大的不足于代表大会宣言的——这个宣言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可以研究研究——这宣言究竟是谁忠实的实行呢？就是国民党的同志也不能不说是共产党。那上面的民族民权民生的纲领，共产党是老老实实一五一十的去做，但要说是“做坏”了，我们不但口头上讲而且做，但要说做得“不好”，老实不客气来一个“清洗”，把共产党抓了来，脑壳不在了，阎王请吃饭。（笑声）你们可以知道，那几年来杀了几十万。为什么要杀这些人呢？有什么罪呢？我到现在还弄不明白。我想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实行三民主义，罪名也不过实行三民主义“罪”。那时我们还未实行土地革命，其实土地革命就是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现在不过平地主一点与农民，而且孙中山讲过的，他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我们也不过实行那个口号而已。这是共产主义呢？还是资本主义？我看是资本主义。因为农民得了土地还是私有，自己耕，这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的东西，没有取消了私有财产的制度。你们大约是想来此地共产的，（笑声）可是现在不行，虽然世界上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东西，呱呱叫，（笑声）但是现在还没有走到。你们看地主不耕田，肚皮吃得很大，太大了，所以要平一平。那不是很怪吗？共产党不实行共产主义？我们是实行的，因为这就是走到共产主义的道路。那末有人会说：是的，前面说得不错，不过你们还有一条不对，弄了苏维埃。其实这就是民权主义。老百姓有说话之权，走路之权，开会之权，从前苏维埃都有，现在边区政府也有，只不过汉奸除外。（笑声）从前我们到汉口走一走就会把你抓去，脑壳就搬场（大笑）。你们大家都知道苏州关了七君子，为什么把君子关起来呢？（大笑）孔夫子孟夫子都说君子是好人，君子确实是好人，因为他们主张抗日，那里没有民权，不准他们主张。我们却是行了民权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说过了的，要实行民权。这苏维埃是外国字翻译的，其实便是代表会议的意思，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都可派来代表开会议，这是民权哪！至于民族主义在我们那儿有没有呢？这十年，我们干的事，帝国主义是不欢喜的，因为我们所到地方帝国主义便要抖，虽然在热天。（大笑）我们在长沙，黄石港，田家镇，打到漳州，那时，帝国主义二十三条军舰封锁我们，大炮对着我们，怕我们飘洋过海到美洲去似的。我们收关税，无论那一国，为我们自由，我们要这东西，就不

抽税,不大要的这些东西,就抽重税,不要的就不让他进来,一切由我们作主,哪一个帝国主义敢干涉我们?要传教,非经我们同意不可。在外边(指非边区——录者)这几十年来,人,对于洋人,“洋大人”,(大笑)何曾如此?那儿老百姓怕官,官怕“洋大人”,成了规矩。共产党不怕他的。如果和我们平等做生意,我自然要的。这就是我们所干的民族主义。

十年来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做了这三件主要大事:民族、民权、民生。别的一点没有干,为什么要打我们?我真不懂,还是实行不彻底?还是行得太多?

现在不算老账。总之,我们是执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纲领,清党是他们要清,我们是所谓被逼上梁山。为什么我们走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因为要实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便是反帝反封建,我们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内插,就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以前插在雪山、昆仑山,现在插在清凉山,现在你们到此,也是为了清凉山上飘扬了这面大旗,由他(指共产党——录者)产生,17年来旗子不放下。你们从南洋,云南、四川、贵州到这里来爬山,并不是你们那儿没有山,而是这山上有这面旗。我们很欢迎同志们,你们和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政治上是一致的,都是要变旧中国为新中国。

以前与国民党一致,西安事变前不一致,现在又一致了。

合作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什么条件呢?就是反帝反封建。谁能遵守这一条就与之合作到底。国民党以后我以为能合作,因为中国的世界的情形有变化,现在国内国外都有变化。西安事变时,好些人说我们不好,把仇人放了。这话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现在证明是正确的。一些人以为国民党不进步,如西安事变解决后,苏州开审七君子,杨虎城出洋等等,如此国民党员也担忧这事。你看七七卢沟桥事变真的打起来了,最近国民党的临全大会,发布了宣言与纲领,你们都看见过没有?共产党认为这根本上是好的——虽然与十大纲领还很差——全国应该拥护,解释、宣传并实行这个纲领,你们每个同志都要实行,这是国民党十年来最进步的表现。国民党想想自己的历史,也不会要打,为什么大革命失败?十年来有什么好处?国民党的领袖也都承认没有好处的。他们要实行这纲领,进步,共产党决与之合作下去。还有从过去事实来讲,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现在的抗日合则又大利。(完)

介绍毛泽东同志有关理论学习问题的几件手稿^①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

前些时候,我们在工作中研究了几份毛泽东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的手稿,很受教育。我们认为这些珍贵手稿对于当前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真理标准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八十六周年,我们写了这篇学习笔记。

56

中国革命经验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诞生后,就是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是这个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中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挫折的经验教训,在同陈独秀、王明等机会主义斗争中明确地提出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学风问题。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就在《〈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著作里面,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公式。这篇著作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得好的时候,革命就发展就胜利,反之,就遭受挫折和失败。

毛泽东同志对于自己的理论观点,是十分严谨审慎的。他曾经长时间不同意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① 此文曾发表在1979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

一九四三年,经过了延安整风学习,我们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党内更多的同志认识到毛泽东所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这一年我们党二十二岁,毛泽东同志五十岁。党内一些同志酝酿为他祝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同志把这个意见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他既不同意作寿,也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关于后一个问题,他在四月二十二日给凯丰同志复信里是这样说的:“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一九四五年六月,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的主义的偏向”载入我们的党章。在这以后,毛泽东同志继续反对有关毛泽东思想的不切实际的提法,并不断阐释它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同志这些观点,在今年叶剑英同志建国三十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得到了阐明:“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

从我馆保存的毛泽东同志的手迹中,我们看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在临近全国解放的欢呼胜利声中,吴玉章同志出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敬,想在华北大学开学的典礼上讲话,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他打电报向毛泽东同志请示。毛泽东同志回电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

毛泽东同志十分嫌恶林彪、“四人帮”等人对他的别有用心的“神化”。他厌恶并反对把“最高”“最活”“顶峰”等违反科学的说法加到毛泽东思想的头上。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文件上写了这样一段批语:“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在审阅一篇新闻稿时,用粗重的笔勾去了“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和“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两段话。

我们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十分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在一九三七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给学员讲课时,就讲过《实践论》。在延安整风时汇编的整风学习文件中,收入了毛泽东同志所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重要著作。上文提到的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给凯丰同志的信中所说“整风文件中的几件”,指的就是这几篇著作。毛泽东同志在这几篇著作中,集中阐释了有关认识论的问题。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精辟地阐释了我们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这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是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用来解决我们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不是背诵马列和毛泽东同志著作上的词句。一九六〇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批示》原稿时,加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应当是这样。”

全党熟知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闪耀着马列主义光辉思想的著作,在短短的不到二千字文中更加精辟地表达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这篇作品中更加精辟地表达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这篇作品原是毛主席一九六三年五月批加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的话。现在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文件的第四稿上,又特别加上一句话:“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一位负责同志起草的文件上,写了一个很重要的批语:“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

一,是不懂马克思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过了不久,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又把这个批语加上一段话:“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毛泽东同志的批语,再一次强调了要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又一次通俗地阐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实践认识真理和通过实践检验真理的道理;提出要克服在我们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的“框框”“教条”“迷信”的问题;尖锐地指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会“官越大,真理越少”。

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整整十年中,毛泽东同志培育的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所形成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传统,遭到了粗暴的践踏。结果是唯心论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我们的党受到了空前的破坏,人民和国家遭受了严重的灾难。这个深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毛泽东同志关于批评 与自我批评的部分论述^①

齐得平 耿仲琳 田逢禄摘录

编者按：邓小平同志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学习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我们摘录了毛泽东同志未经公开发表过的关于批评自我批评的部分讲话，说明毛泽东同志对自己也是一分为二的。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会上的讲话中说：

“共产党的错误、缺点是有的，但是一经有人讲出来，在实际中证明行不通，我们就改一下，不管缺点多少。并且对这个缺点公开讲是缺点，错误公开讲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成为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的了。”（《毛泽东同志讲话记录汇集》第五分册第二十一页）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在七大预备会上关于七大工作方针

^① 此文曾刊于1981年2月16日中央档案馆编印的供中央领导同志审阅的《党史资料汇报》上。

的报告中在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时说：

“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的，我也有过错误的，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上面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那时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我写错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其数目有几十打、几百打，这些东西都没有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摘自速记记录稿）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七大的总结报告中讲到审干、整风、锄奸工作时说：

“这次审干、整风、锄奸有他的历史。整风从前不晓得，现在学会了，有成绩。有没有缺点错误？有，两个都有。党校我是校长，整风在老一部得到的成绩相当大，但也有相当的缺点与错误。”“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对于搞错的这些人很不好，因为错了，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人家难过，我们也就难过。‘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乐’。比如在座的八百多人中有一个人向隅，这八百多人就为之不乐。一个人在这里哭起来，我们大家心里就难受。天下有许多人是不快活的，我们也应该不快活。我们是与天下人共快活的。对搞错的同志，同志们应当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同志们，那个地方搞错了，就在那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现在得到的经验是少而精，又少又精。从前是多而粗，这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经验，抓到我们手里来，就非同小可。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所以犯了错误，要抓到手里，当作经验，当作武器，对搞错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如果同志们同意的话，我们大会可以决定，将来在全国推行，不走弯路，就可以胜利了。”（摘自速记记录稿）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中曾写有“以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

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的话。一九五一年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又说“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一九五一年六月一野一军政治部对决议中的上述提法提出意见。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向中央写信，也对中央决议中的提法表示不同意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写信给刘少奇同志征求意见。信中说：

“据安子文、胡乔木等同志说，象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那样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现在不能不改正整党决议草案中的那种提法。此事现已陷于被动，只有改正才能恢复主动。现将电文一件，安子文报告一件，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一件，送你审阅，征求你的意见，请予示复，并交来人带回为盼。”

由安子文同志起草经毛泽东同志修改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问题给各级党委的电报中说：“过去的这种提法中央现在认为是不适当的，而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的意见则是正确的。因此，现在决定将‘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的’这种提法，及‘中国革命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半工人阶级也‘是包括在内的’，这种解释，予以修正。即将党员标准第一项第二句改为‘中国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并将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撤消。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摘自档案原稿）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

“老干部能不能批评？这个批评的问题，从马克思以来，没有一次说过要分清老干部，说只能批评新干部，不能够批评老干部。我们宪法上规定，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那么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在犯错误这个问题上，错误思想上，也应该是平等的。有一批人比如是共产党的老干部，或者是民主党派的老干部，因为他老，他就享受一种不受批评的权力，可不可以？我看是不行的。你活着不受批评，你死了以后人家还要批评你。我们就批评过死人。批评过孔夫子，打倒孔家店嘛！人家死了几千年了，还批评他嘛。现在孔夫子又好了

一点。斯大林也是死后批评的嘛。活人也能批评，死人也能批评，这个东西不分官职大小，老稚长短，是不是你越老就越可以享福，避免批评呢？犯了错误以后，总是要批评的。”（摘自速记记录稿）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说的对。所谓说别人，就是说恩来、陈云这些同志，现在说我，就是说，实在是许多事情没有搞好，一大堆事情没有搞好。”（摘自速记记录稿）

毛泽东同志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归于正确时写道：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〇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那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摘自档案铅印稿）

毛泽东同志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草的中央关于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示中写道：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

兰台稿存

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摘自《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0〕1002号。此件发至省市书记处和中央各部委党组)

商榷太平天国能否 称为“革命”的问题^①

耿仲琳

前年冬,李新同志讲历史,讲了许多新奇观点,本文不能一一讨论,只想就其中论述太平天国是否革命运动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不同意见。

下面摘引李新同志讲述的原文:

譬如说首先近代史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就是太平天国,这个太平天国是农民战争,是农民起来造反,所以我认为它不可能叫革命运动,不能叫太平天国革命。因为太平天国不可能带来新的生产方式。洪秀全当时受西方影响,但是基本上说来,太平天国主要思想是农民的。尽管后来洪仁玕西方思想影响更浓厚一点,但是他主导的不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是中国的这一套,农民的东西。农民革命不叫农民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都没说过,这个没有问题。毛主席是不是说过?我一查,毛主席也没有说过,你不信,你去查。你看《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叫太平天国运动。这是科学的。太平天国它那里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它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太平天国,洪秀全当天王,然后东南西北忠于一王。他的政权是什么政权?如果洪秀全成功了,把清朝推翻了,他建立什么?那不是封王朝?!他能建立一个中华民国?不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可能!没有门!他就是这个,只能是封建王朝。他那套东西,什么天朝田亩制度,是行不通的。事实上他也没有实行。是空想,农民的空想。那么太平天国“革命”是谁最先说起来的?我现在为止,我查出来的是我们的所长,我最尊重的范文澜同志。嗯!范文澜同志搞历史我觉得他是科学的,这个人治学是很谨严的,为人也很好,史德史才史评都是好的。但是这个问题上他虽然是我的老师,也是非常亲密的在一起,我当他的通史组织长,原来他自

^① 此文曾发表在中央档案馆编印的《探讨》1981年2月10日出版的创刊号上。

己当组长,后来我给他当组长,合作得很好的,这个事情上以前我没有注意,现在我不同意他的思想。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中国近代史出版时后边还附一篇文章:《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他就把曾国藩骂得一塌糊涂。那么曾国藩这样这样坏,因此把太平天国抬高一点,“革命运动”,他就没有去很好分析。所以,太平天国是很伟大的一次农民运动,但是却不是一次科学意义上的革命。他骂曾国藩,曾国藩应该骂,坏透了,但骂的也不很科学。“汉奸刽子手”,戴两顶帽子。刽子手戴得住,他的外号就叫曾剃头,杀人像剃头一样。汉奸恐怕就不一定。他为什么?他说是满清的奴才。如果曾国藩是汉奸,他向满着称臣,那么你林则徐呢?林则徐也才向满洲称臣,你为什么范文澜没有说林则徐是汉奸?”

李新同志是在批驳范文澜。我不想替范老辩护,所以范老为什么把林则徐当作鸦片战争的领袖人物来肯定,而怒斥疯狂屠杀汉民族同胞力挽清廷的曾国藩为汉奸,就不去讨论了,这里只限于商榷太平天国是否能叫“革命”的问题。

李新同志查,“太平天国‘革命’是谁最先谈起来的?”李新同志说:“马克思……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个没有问题。毛主席是不是说过?我一查,毛主席也没有说。”“我现在为止,我查出来的是我的所长,我最尊重的范文澜同志。”李新同志还说:“你不信,你去查。”

我是有些不信,就去查了查,可惊的是所查结果和李新同志查的完全不一样:

一、毛选的一条注释上说过:“太平天国战争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反对满清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农民革命战争。一八五一年一月,这次革命的领导者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宣布成立‘太平天国’”(毛选一卷 P164 - 165)大家都知道,当时毛主席精力充沛、毛选注释他都亲自看过;

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也不能帮助李老师立论。该文是写的“太平天国运动”而没有加“革命”二字,但同样排列并提的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等,也都没有加“革命”二字,是否也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都不足称为“革命运动”呢?再说这段文字乃是隶属于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章的标题是“中国革命”,而第一节的标题是“百年来的革命运动”,何以李新同志未顾及这两个标题?

三、太平天国是“革命”这话决非范老“最先谈起来的”。中国人可能是李

大钊,可是李大钊却是抄自外国人的文章。这个外国人不是别人,原来就是马克思。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5.20)一文中直呼太平天国起义为“中国革命”,他说“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李大钊的《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1926.5)》一文介绍了马克思的上述文章,说:“这一篇论文说明,太平天国的变乱实为大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第一次中国国民革命的大运动。”与此差不多同时,李大钊还写有《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1926.3.12)》一文,称道孙中山“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的正统”等等,都可证明不是范老先说的;

四、还应注意:天安门前、英雄碑下镌刻着八幅历史浮雕,其第二幅就是太平天国金田村起义。

综上查引可证范老先说之说不能成立。那末,所谓范老为了反蒋介石反曾国藩,“因此把太平天国抬高一点……他就没有去很好分析”等论断,也自然不能成立了,统是信口开河了!

浅谈掌握材料和驾驭材料^①

耿仲琳

为什么司马迁能写出史记呢？南宋老儒郑樵曾说过：“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这里说了两个条件：一是长期管档案图籍，广泛地占有了材料；一是他雄于为文，善于驾驭这些材料，所以他能够驰骋三数千年，牢笼百家诸子，写出有声有色、动人心弦的历史巨篇来。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足够的材料，历史学家的头脑这个加工厂就很难开工；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如果你不谙炊事，有米也可能做出一锅糊涂粥感夹生饭来。驾驭材料也许有点像骑马，你不会驾驭它，那就不晓得它会跑到哪里去。“工于制作”不简单，怎样才能“工”，这恐怕和掌握骑马术一样，要勤学苦练！

^① 此文曾发表于中央档案馆编印的《探讨》第2期（1981年6月12日出版）

话说“述而”^①

耿仲琳

《论语》有一篇叫“述而”，孔子概述了他的著述宗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大意是说：我只是述说史实，徵信于档案，是以周朝的守藏史彭祖作为自己的楷模的。司马迁也有近似的说话：“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可见他们都是“述而不作”论者。

我觉得我们应当重视这个“述而”。因为外间企望我们写的东西主要的可能就是“述而”，就是说要求我们忠实地、准确地徵引档案，介绍史实以解决疑难，而并不希望你空言立说，专发空洞的大议论。

我觉得我们不要轻视这个“述而”。如果以为这仅仅是原档照搬，不过是戴个帽穿双鞋，恐怕就不对了。因为你不熟悉历史，不熟悉档案，不熟悉外间研究的现状；不花力气（详细占有材料，并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综合概括。）就算你戴顶高帽穿双花鞋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编者会给红灯，读者会给白眼。

^① 此文曾发表在中央档案馆编印的《探讨》第3期（1981年12月25日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问题

齐得平

(一九八〇年初,我用毛泽东手稿和讲话记录,核对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几篇文章,发现有的文章、题解与原文原意不符,起草了中央档案馆手稿保管科对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的一些意见的报告。经馆领导审阅同意,送曾三转报姚依林、胡乔木同志。建议中央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进行审查。

一九八一年初,中央文献研究室约我去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问题。经馆领导同意,我带着有关文稿,去中央文献研究室,详细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问题和我的意见。

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关于停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四月十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通知新华书店总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停售,存书分批化浆处理。(见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的《知情者说》第三辑之二第64页)。

同中央文献研究室谈后,我又整理了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问题》这份材料,经领导同意后上报。)

一、关于《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一文:命令原文收文者是“彭高贺、邓洪解^①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选集》上将“彭高贺、邓洪解及”删掉。命令共六项。《选集》中将原文的“(二)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等三项内容,全部删掉。命令全文六条变成了三条。

二、关于《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① 彭德怀、离岗、贺晋年、邓华、洪学智、解方

一文:原文收文者是“彭邓杨等各同志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军区,军委各部门及军事学院各首长:”《选集》上将收文者删去。

我们知道,彭德怀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卓越领导人,对我军的建设,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了伟大的贡献;他在“文革”前遭到错误的批判,“文革”中又遭到残酷迫害,含冤而死。以上两例说明,当时担任毛选编委会主任的党中央的负责人,是决心不给遭受不白之冤的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

三、关于《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在全国第二次财经会议结束后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座谈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有很长一段是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在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有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选集》上把这段文字全部删掉了。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还说:“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说也有那么一点错误,我也犯了上述几点错误”。《选集》上将“我也犯了上述几点错误”一句也删掉了。完全抹煞了毛泽东同志自我批评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自我批评,正说明我们的党是一个郑重的党。抹煞毛泽东同志自我批评的精神,搞个人崇拜,神化领袖,这对于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和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威望都是无益而有害的。

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一文:原讲话记录最后一段中有“不要相信任何人有特权可以不受批评。”这样一句很重要的话,在《选集》中也被删掉了。这说明他们是主张“有特权可以不受批评”的。

五、关于《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一文:原讲话记录是:“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包括我在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选集》编者将“包括我在内”五字删掉。

六、关于《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文: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济南干部会上的讲话和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的摘录。毛泽东同志在济南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种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

完成,八次大会作了结论,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这个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就要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工业国。”在南京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过去的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所以,现在是处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及文化革命。要改善生活,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但是似乎还有一些人不大清楚,不认识这么一种转变,”“总而言之,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毛泽东同志这些重要论述,在《选集》上全被砍掉。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正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的继续发展。砍掉这些重要内容,充分证明编者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和八大的路线的。

七、关于《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扩大)上的讲话。原讲话记录稿上的第六点讲到主要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东西。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同落后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时候有时候的原因。”这段话在《选集》上被改成“‘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篡改了讲话的原意。

八、关于《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一文:《选集》在题解中写道:“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批驳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而起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内通知。”其实此件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党中央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党内通知的第(一)项内容。毛泽东同志起草后,批交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伯达、彭真、胡乔木阅后发出的。通知的内容,毫无“批判”刘少奇同志的意思。编者却牵强附会地撰出了这样一篇《题解》来。

九、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一文:《选集》在题解中写道:“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这个部的负责人把民

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中间阶级的错误观点。”其实，原件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修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案)》时的一个批示，开头是这样写的“罗迈同志：此件已阅，略有修改，请再酌。”(《选集》上删去了这句)可见，毛泽东同志完全是商量的态度，并非是“批判”，说是“批判”，是与毛泽东同志的原意不符的。

十、关于《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一文：原件是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给刘少奇同志及杨尚昆同志的三点指示中的第三项和毛泽东同志对杨尚昆同志收到上述三项指示后的报告的批示。据我们所知，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以前，中央没有关于凡以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电报和文件均须经毛泽东同志看过方能发出(或有效)的规定，刘少奇同志和杨尚昆同志也没有所谓“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事。编入《选集》的这两段批示，同党中央历来强调集体领导和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三年在一次谈话中所说：“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原则”的精神是不相符的。是根本不应编入《毛泽东选集》的。把这两段话编入《选集》适应了要打倒刘少奇同志和杨尚昆同志的政治需要。这里顺便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等那样为广大党员和广大群众所熟悉的重要的著作，却没有被收入。可见编者是多荒唐！

亲切的回忆 深情的嘉勉^①

潘合定 齐得平

现在,我们的案头陈放着一篇二十年前毛主席为郭沫若同志修改的文章的手稿,它扣击着我们的心弦,使我们总想写下一点什么……。

那是1962年筹备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同意在《人民文学》五月号发表他三十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六首词。《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请郭老写些诠释性的文字,以帮助青年读者,郭老很高兴的接受了这个任务。

郭老于1962年4月下旬来中央档案馆,亲自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由当时的常务副馆长裴桐同志和中共中央档案资料保管部主任吴善昌同志相陪。郭老前后来好几次,每次都仔细地阅览了许多档案,还特别要求保管员给找一份详细的军用地图,与保管员一起研究毛泽东同志诗词写作的时间、地点和历史背景。每次郭老看完材料都和同志们一一握手,表示谢意。郭老的深入细致、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了我们很深刻的教育。

郭老看过材料之后,于5月1日写成一篇《喜读毛主席“词六首”》的文章。这篇文章把每一首词写作时的情况都介绍得十分清楚,对读者理解毛主席这六首词,有很大的帮助。郭老在这篇文章中还专门写了如下一段话:“尽管这六首词中有几首我已能够暗诵,对于各首写作的时期和环境,平时并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因此在了解上也只能得其皮毛。为了自己的更好的了解,我费了几天工夫,并且还靠着好几位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帮助,算把这六首词写作当时的情况弄出了一个初步的眉目。”郭老把文章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作了很重要的修改,尤其使我们激动的是毛主席把上面的那段话中的“特别是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帮助”改成“其中是中央档案

^① 此文曾刊于档案工作社编辑出版的《档案工作》1982年6期(12月5日出版)

馆的同志们的很大的帮助”，增加了“很大的”三个字。

毛主席为什么加了“很大的”三个字呢？这无疑是在称赞档案馆工作。因为这些诗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作品，年深日久，毛主席自己已经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他，他才回忆起这些词是1929—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经过档案文献考证，搞清了许多情况，毛主席看了甚为高兴！因此在郭老的文章里加上了“很大的”三个字，这是毛主席对我们工作的深情的嘉勉啊。

时隔二十年了，每当我们重读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过的这篇文章，特别是对档案工作的评语，心情都很激动。我们一定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更好地为党中央服务，为党和国家的各方面工作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

1982年8月

鄂豫皖红四军南下史实 和张国焘的《回忆》^①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

张国焘在其所著《我的回忆》一书中,对鄂豫皖红四军南下的历史,做了肆意的篡改。为了揭露张国焘的作伪,这里,我们汇编了有关的历史文献材料,同时也详尽地摘引了张国焘《回忆》中的有关记叙,做了些说明和评论。

(一) 红四军南下史实

一九三一年,以曾中生同志为首的鄂豫皖红四军的领导同志同张国焘发生了严重的军事战略分歧。这一段历史,徐向前老师在《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中,做了提纲挈领的论述。徐帅的文章在讲述了鄂豫皖红军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围攻之后,紧接着说:

“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已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四月,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区来。五月十二日,鄂豫皖区成立了党的中央分局。第二次围攻粉碎后,四军领导同志便同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并在以后成为党的叛徒的张国焘,在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发生了重要争论。”

当时,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在鄂豫皖区暂取守势,这正是我军转入进攻,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因此,四军领导同志建设:主力南下,出击黄梅、广济,恢复原十五军所在地区,威逼长江,配合中央区反围攻。但是张国焘借口所谓“巩固苏区”,一再否定了四军的正确建议。直到七月间,周围敌人仍无进攻迹象,同时由于援助中央区反围

^① 这篇“史料长编”,曾刊于中央档案馆1983年3月29日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上。

攻任务所迫和四军领导同志的一再坚持,他才同意了向外发展的意见;但却又从右倾保守转向“左”倾冒险,竟限令红军在一个月內打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

七月中旬,军部率六个团南下,八月一日一举攻克英山,全歼守敌一团。四军领导同志根据当前情况认为:红军应在巩固阵地的基础上向外发展;援助中央区,主要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牵制其兵力,而不在于进攻中心城市。如以六团兵力,通过四百余里的白区打安庆,无论敌情、地形,特别是群众条件,远不如南下浠水、广济、黄梅地区为好。而且这一地区恢复之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联成一片,便于巩固。因此,四军乃一面报告分局,一面举兵南下。

战局发展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四军行动方针的正确。我军西克罗田,南占浠水,并在漕家河全歼敌新编第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进占广济,威逼黄梅、武穴,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震动九江、武汉。何成浚除急调海军舰艇巡逻长江外,并派十军军长徐源泉率四十一、四十八两师各一个旅前来截击。于是我位于广济、英山的部队南北夹击,九月一日,与敌战于洗马畈,歼敌近千。至此时仅一月,我连克四城,消灭敌人七个多团,缴枪四千,俘敌旅长以下五千余名。黄、广、英地区的工作,也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农民纷纷起来斗争,分配土地、组织武装、肃清反动势力,大力支援红军作战。形势对我极为有利。

正当四军大力开辟当地工作,寻机再行歼敌之际,张国焘竟借口四军‘违抗分局命令’,强令北返。四军除执行分局指示外,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及其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进行了抵制。但是,张国焘无视四军南下的正确方针和胜利事实,竟将军政委员曾中生同志撤职。接着又借口肃反,排除异己,对不少优秀的领导干部进行了罪恶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此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领导,便在鄂豫皖区红军中逐步占了统洁地位。”

(二)张国焘的《回忆》

下面的引文都是摘自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三册一书,文中的着重点和按语都是我们所加。读了张国焘这些“回忆”将可看到,他完全隐瞒了命令红四军出安庆的错误主和,反而连篇累牍地编造了一个“过江说”。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张国焘的“回忆”:

“我们不愿因会议举行过久而延搁我们的军事行动。七月中旬,党代表大会刚刚闭幕,新任军长徐向前和新任政治委员曾钟圣(即曾中生,下同引者

注),就率领红四军全部向前线进发。他们由白雀园经金家寨开往英山,准备消灭驻在英山罗田沂水广济黄梅一带之敌,在那里发展苏区,并乘胜向北发展,与原有的鄂豫皖区打成一片。邝继勋则仍驻白雀园,编组原有的地方武装第七十三师。他那时还只掌握一千多人,正编组第一个团。这就是红四军出发后,留下保卫这个苏区的一支主力部队。”(第92页)

(按:张国焘把他当时给红四军定的“出潜太,威逼安庆,震动南京”的任务,在此作了上述的偷换。)

“一九三一年七月中旬(这是党和苏维埃刚闭幕的时候),我就病倒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拖延最久的一次大病。……”

“我的卧病,对这个区域工作的发展,自然不无影响。在我身边的同志为我的病耽忧,甚至他们会想到万一我一病不起,善后步骤应如何安排等。特别是在前线的同志,更因此为之不安。后来曾钟圣曾承认因闻我病重,深恐这个区域的领导权,将为他所最不满意的沈泽民所掌握。所以他有带着红四军脱离这个苏区的企图。”(第96页)

(按:这是张国焘为他的“过江说”做的伏笔)

“红四军于七月中旬开到英山前线后,接二连三的击溃了那一带的国民党驻军,缴获大批枪枝,俘掳敌军约两千名左右,乘胜占领了英山沂水两个县城。八月上旬曾钟圣由前线送来的报告,描述那一带富庶的情形。红军吃得很好,而且正在沂水搜集布匹,解决冬服问题。他还说到,据他们所知,国民党军队正在围剿江西苏区的红军,军情甚紧。红四军准备向广济黄梅行动,相机截断长江交通,并乘势在武穴附近渡过长江,直指赣西北,会同江西红军,消灭国民党的围剿。”

“这件要案提到中央分局和军委会时,我因病重没有出席,沈泽民等也因耽心我的病,而没有告诉我。会议决定由沈泽民草拟一封答复的信,内容大致是说红四军仍应照原定计划,在英山沂水一带发展苏区,扩大已有的胜利,壮大红军,决不可渡江南下;并说明配合江西红军行动,虽是红四军的主要任务,但红四军脱离了原有根据地和地方武装,孤军渡江南下,不仅不能给江西红军以有力的支援,反会因红四军的离去,使鄂豫皖遭到损失,这也是立三路线的军事冒险的想法。若照原计划执行,则不但鄂豫皖苏区可以扩大,红四军也可以壮大,而且能牵制更多的敌军,这是对江西红军最好的配合方法。”

这封复信不过是重申原有的计划,本是无可非议的。不料曾钟圣许继盛(即许继慎,下同引者注)等竟提出进一步的反对意见。曾钟圣说到这封信是泽民同志起草的,国焘同志病着不知道,泽民同志素来将红军视为保护他个人的工具,这种右倾的保守观点,是有害于红军的。许继盛更强调红四军的行动,应该由将领们为军事的前途打算,不必理会新集来的指示。

在红四军的将领会议中,曾钟圣将他的渡江南下的主张,描述成为原有计划的一部分。他说明原有计划并未规定红四军不能越过长江。在他看来,长江不过是一条小河流,红四军可以随时偷渡过去,也可以随时偷渡回来,国民党的海空军是不能阻拦的;因而他认为渡江南下的行动,可以由前方将领商决,不必征得新集的同意。”

“曾钟圣终于再向新集来一个哀的美敦书的报告。他夸大渡过长江和切断长江交通的重要性,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到某月某日仍未得到军委会的明确指示,便径行渡江。这个报告约于九月上旬到达新集,使我们大为震动。”

“这次会议决定派陈昌浩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赶往前线,处理这一事件,不仅应制止渡江的行动,必要时并可将部队撤回原有苏区来。军委会又命令陈昌浩继曾钟圣为红四军军政治委员,曾则调回新集;至于许继盛等应否免职,由陈昌浩相机处理。除这些正式的决定和命令外,我们还共同签名写了一封致各高级将领的信,鼓励他们遵守党的正确决定。我也当场表示,一俟我能起床行动,当赶往前线,协助陈昌浩处理一切。”

“不到几天,陈昌浩由前线送来了急报,说明一切都已照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全部即经由英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休息整理,要我不必再带病赶来前方。我因此就留在白雀园,等候红四军的到来。”

又过了两三天,陈昌浩带着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钟圣和许继盛回到白雀园。他向我报告,他这次前方之行,不仅纠正了反党的行动,而且破获了反革命的阴谋案件。他为此惊奇、兴奋,觉得幸能及早发现,否则要闹出大乱子。”

“陈昌浩接任军政治委员后,立即进一步调查红四军的内部状况。多数高级干部认为曾钟圣的主张是错了,但大体上还是忠实于党;许继盛和他少数亲信的态度,却有可疑之外;甚至第十一师中有人传说:‘第十一师在渡江后,要脱离红四军另找出路。’”(第97页至第101页)

张国焘的《回忆》,前有付笔(曾中生企图脱离),后有尾声(许继慎企图脱离),一连用了十一次“渡江”或“过江”,渲染成了一篇“过江说”。看来张国

焘的信条大概是“谎话说过三遍就能使人信服。”

可是，张国焘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请看下面的历史凭据。

(三) 红四军首长同张国焘战略争论的来往《信》

首先，我们来考查一下《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会给中生、向前的信》，这就是张国焘《回忆》中所说的“……不过是重申原有的计划，本是无可非议的”那一封信。

这封信开头用非常轻佻的文笔，极力贬低和抹煞红四军相机改变行动方向的意义和所取得的胜利，说：“详知四军于八月二日在英山改变行动方向后，三日即向武穴方面移动，中途因武穴水大不能进，遂不劳一战而据蕲水，在蕲水解决经济问题，发动当地及黄、广工作，留十二师在英山，当肖方同志于本月十七日离开英山返金家寨时，你们还在蕲水，军事上无任何行动，坐使红军主力部队停滞蕲水而不动，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不能有丝毫的完成”。

这封信的末尾命令红四军“接信后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

信的主要内容是指责红四军的“严重错误”。它同张国焘的《回忆》大相逖庭。它没有《回忆》中的“过江说”，反而在极力为张国焘所讳莫如深的“出潜、太，威逼安庆，威吓南京”的错误命令辩解，老实地承认同红四军领导的分歧点乃是“出安庆”或是“出武穴”之争。

下面是该信四大段文字的全文：

“一、援助中央苏区是目前鄂豫皖党的最重要任务，执行这一任务，除动员全党力量来坚决向敌人大举进攻外，特别是要红军主力拖出打击敌人要害，主要的是这一行动能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战线受到严重打击，击破其一点，即松懈或瓦解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全部战线，至少牵制敌人的主力和撤退进攻部队之一部分，这样来援助中央苏区。中央分局根据这一总的任务，于是有运动红四军主力攻英山，下潜、太，威逼安庆，威吓南京的决定。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而经你们同意，必须去坚决执行的，并大致规定这一行动以一月为期。谁知你们攻下英山后，突然转道出武穴，据你们的意见是与出潜、太、安庆其政治意义相同。武穴所在地，至多不过沿长江一市镇，在军事上占有相当地位，然而在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全部战线看来，武穴与安庆比较，其差太远，无论如何，安庆为安徽省城，长江沿岸要地，直接是南京门户，出潜、太、安庆虽不能幻想久据安庆，而对安庆有所行动，马上动摇南京，威逼老蒋的后方，这样能够使进攻中央苏区的敌军立即有后顾之忧，一方面使其前方部队有所撤回，使进

攻我们的力量立刻减弱,甚至于可破其全盘计划,而给中央苏区有莫大的援助。而出武穴,即令攻下武穴,至多也不过给武穴敌人以打击,而对于打击敌人要塞,援助中央苏区的政治意义是小得多,这是尽人皆知的。出武穴不能完成中央分局所责成于你们的总的政治任务,不出潜、太、安庆而出武穴,政治上、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

“二、援助中央苏区是与巩固赤区的任务不可分离而且紧密联系的,红四军主力下英山、出潜、太、进逼安庆,这是与巩固皖西北赤区有阵地作战,两者作战是相联贯的。中央分局对你们的总的指示是下英山作为攻潜、太的后方,下潜、太作为攻安庆的后方,这一包抄并没有脱离阵地与后方赤区。尤其是这样具体指示:你们去相机攻下安庆,如不能占据,很快的向桐城、霍山一带行动,迅速肃清这一带敌人,不但巩固皖西北赤区,还可以动摇安庆的整个反动统治而牵制敌人的兵力,有援助中央苏区之重大意义。这一指示是绝对援助中央苏区与巩固皖西北苏区相连贯的,而出武穴为脱离皖西北,与英山苏区又远,这是脱离后方的作战。如以发动黄、广赤区而与巩固皖西北及英山赤区论,证明同志还对这问题有不了解之处,发动黄、广工作绝不是单靠红军主力,而主要的是靠当地群众的斗争力量与党的领导。红军既不能长留该地(因为一月之后就要回来),红军拖走赤区的不能巩固,黄、广、蕲赤区既不能与后方打成一片,这样单纯靠红军去发动,发动之后又不能巩固,红军又要马上拖走,这样的发动仍是空文。发动黄、广工作分局不但不反对,而且是极端设法去实现,可是现在的道路绝对不是这次红军一溜烟的行动所能到达。如这样发动黄、广工作而放弃了皖西北日益发展与巩固的赤区,权其轻重,自然得不偿失。如据此理由而自圆其说出武穴之未脱离赤区,这根本不对,你们这次出武穴是脱离后方无阵地的作战,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不能达到,又脱离后方赤区,这点上看来,你们出武穴,又是错误的。”

“三、从敌我力量对比上看来,当你们攻下英山后,已经消灭了敌人一团兵力,同时消灭了由太湖出来之敌一部分,当时太潜并无重兵,都是陈调元部队,当我军已扑灭其英、太之部以后,敌人已经是如惊弓之鸟,望风而靡,我军乘胜直追,可以下潜山或太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作进逼安庆,这在军事上及敌我力量上看来是完全可能的事。武穴当时为夏斗寅部队,兵力强于陈调元远甚,该地敌人以静待战,我以长途进攻,纵武穴力弱,也较潜、太难攻,况该地为夏斗寅部,力量不弱。不〔如〕去有把握的打陈调元,消灭其部队,大缴其枪械,对于我们红军有莫大的帮助,对于赤区有很大的巩固,维不出此,而出武

穴,攻敌并无把握,若令有所失,则更不值。就势言之,武穴方面多水,行军不便,如行至中途不能进,则停止大部队不能动。出潜攻安庆径直走,这在军事观点看来,你们的行动更也是错误的。”

“四、解决经济问题倒是你们看得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前次蕪水之行经分局折回之后,一般红军干部并未深刻了解此次行动的错误,是斤斤于以急去解决经济问题作为红军行动的中心。当在西余集开会时,一般同志要出蕪水,经国焘同志的坚决反对而放弃此行。然而出蕪水解决经济却成为愈至迫不及待而跃跃欲试者,究竟同志们对于援助中央苏区为何要出安庆,其伟大政治意义以及分局此行决定的决不可轻易变动等等,同志们并没有把这看得比解决经济问题还严重。同志们并没有彻底了解解决经济问题是在完成总的政治任务之内去实现,决不是离开政治任务去单纯解决。一次去截断长江(按:这个问题本文将在最后一部分予以讨论),二次出蕪水未战,这次师至英山,自然蕪水之欲无法制止,于是放弃中央分局指示而转道出武穴,明知出武穴在任何方面为不当,结果明出武穴,实则却到蕪水,达到蕪水以后裹足不进,自然不能不公开也说出‘因出武穴不易所以暂留蕪水’这样的话。同志们在未入蕪水以前,又何曾不知‘出武穴不易’,英、潜工作及十二师同志都说出武穴不易,明早知其不易而偏要出武穴,未抵蕪水,并不说出武穴不易,既进蕪水然后说出武穴不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其说出[武]穴不易,‘大水’,即应尽着援助中央苏区使命很快折回行动,又如何停在蕪水十余日不进又不退?然则红军之解决经济问题是如此解决么。大军停蕪水,蕪水并非敌人要塞,谈不上蕪水有援助中央苏区意义。进蕪水遇敌人而未获得一枪一弹,所以据蕪水,久留蕪水,中心问题为经济问题已昭昭若揭。同志出蕪水目的达到,而中央分局总的指示放弃,经济问题解决,而后方苏区四面受敌。敌人有计划的到苏区割稻,假如后方秋收有失,失则以几万石计,前方解决经济,后方损失几万……的稻,得失如何?这充分证明了同志们不以政治任务为重,而以经济为归,经济问题形成了次红军行动变更的中心原因。放弃援助中央苏区,拒抗分局指示,放弃后方赤区,给敌人以良机紧攻中央苏区,给敌人以可能扰乱后方赤区与秋收,使后方二百万群众不能安全秋收,这样解决经济问题,是工农红军绝不出此,是负责党与苏维埃的使命来领导红军的同志绝不应当如此。”

结论是:“总之,这次红军出武穴停师蕪水,这一行动不是与中央分局的个别错[策]略路线问题的分歧,而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

其实,仅这一封信已足以证明张国焘《回忆》只字不提“出安庆”的计划。

而大造“过江说”是在作伪了。不过我们还要看一下红四军的回信,进一步考证《回忆》的真伪,并探讨一下分局上述回信是否果真如张国焘所说“本是无可非议的”?

与分局和军委会这封来信的估计相反,红四军获得了接连的胜利。继八月一日攻克英山,歼敌第五十七师一个团之后,红四军八日占浠水、罗田,十八日,以两团兵力自罗田南下,经一百二十里急行军,于十九日拂晓占蕲春以北的漕河镇,全歼守敌新编第八旅,俘旅长王光宗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余人,缴枪一千余支,炮十四门。接着占领广济,威逼蕲春、武穴、黄梅,与湘鄂赣红军形成夹江呼应之势。

时,敌人急调武汉警备旅增援武穴,并调鄂西第十军军长徐源泉率两旅到鄂东堵击我军,八月二十日,敌经黄冈占领浠水后继续东进,妄图截断我军后路。三十日,浠水之敌四个团占领洗马畈。九月一日,红四军主力分自英山、广济向洗马畈急进,乘敌不备,一举突入镇内,经数小时激战,歼敌三个团的大部,其余敌人突围逃窜后,复为我军包围于洗马畈东北的叶家湾。

九月一日,红四军接到上述分局的来信,不得不放弃歼敌良机,撤叶家湾之围北返。九月四日部队抵鸡鸣河,一面总结南下以来的工作,并对红四军主力北移后鄂东地区的工作进行了布置;一面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分局的来信,并一致通过了答复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信》。这次会议,在做法上有缺陷(不应把分歧提交全军连以上干部讨论),但会议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如信中所强调的“避实就虚,飘忽自主”;对“占领敌人要害”和“打击敌人主力”两者的权衡,提出“在今日技术拙劣之红军,其战略目的应后者超过于前者”,是很可贵的正确的战略思想。)是对张国焘推行错误路线的抵制。

下面我们摘引曾中生烈士遗留下的这篇雄文的有关部分。我们读过曾中生同志的这封信,自然会明白:无耻叛徒张国焘所说“曾钟圣终于向新集来一个哀的美敦书的报告,他夸大渡过长江和截断长江交通的重要性,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到某月、某日仍未得到军委会的明确指示,便径行渡江”等等,纯系无耻谎言。

这封信文中残缺较多,我们这里是原样摘录,未予考订。

《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开头说:

“八月十七日的指示(即指1931年8月27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会给中生、向前的信》。这封信实际上是8月27日从新集发出的,后来误为17日。——引者注),在九月一号晚在击溃徐源泉两旅以上的主力,并围困残余

小部的战局中收到。当于翌日决结束战争,集中兵力向英山、罗田一带行动,惟以昌浩同志还未达到前方,而胜利品及伤号尤其是英山方面和十二师工作均须稍加布置,然后可向福田河进发。乃于九月四号将部队开到鸡鸣河,一面整理蕲、黄、广、英山工作,并成立临时鄂东特委,一面利用时间召集全军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慎重讨论你们的来信。大会认为昌浩同志不到,中生不能离开部队,特先给你们一个报告,并由大会推举士奇同志赶来面陈一切。

这一指示的材料是完全根据昌浩同志个人早给了我们这一完全相同的信件,我们认为这是根本不合事实的,我们除在组织上采取绝对服从立刻开向福田河一带待命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会作极诚恳的申诉之必要,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责任,也是在全国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作紧张的残酷的不容松懈的斗争中代表党与苏维埃来领导红军的同志所必争的责任。”

随后《回信》理直气壮地全面驳斥了《来信》对红四军的无理指责,信中说:

“我们再四考虑,认为分局这种指示,完全凭借片面的根据和纯从主观的出发,与我们前方行动的事实意义和客观环境是绝对不相符合的,请容许我们分别申诉如下:

我们深深认为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是要以占领敌人要害打击敌人主力两者并重,而且在今日技术拙劣的红军,其战略目的应后者超过于前者。同时要能真正的巩固自己阵地,向敌人作有准备有把握的进攻,尤其是要整个苏区有全盘的计划与准备工作,才能集中主力向外发展,而更有全盘部署进攻有力阵势,如此才不致因为一局部问题而牺牲全部计划,这样与那绝对没有准备而发出命令去占领大城市和高喊进取安庆威胁南京的主张丝毫不相同的。我们根据这样的前提,从八月一日英山之战起到九月一日洗马畈之战止,共计一个月行动中,获得的结果:在军事上,占领英山、蕲水、广济、罗田及沿江之兰溪、彭思桥一带,消灭敌人七团以上的兵力,尤其以消灭之徐源泉两旅以上的兵力为更有意义,缴获步枪在四千以上,迫击炮二十八尊,机关枪二十六挺,侦信机(无线电)一架,子弹炸弹刺刀无算,俘获官兵夫五千以上。在政治上直接与孔荷宠部(宠部进击阳、大、黄石港……我部包围武穴、田家镇,这是直接联络配合中央苏区的行动)行动隔江联系起来。”

这里讲的仍然是江北的红四军与江南的湘鄂赣红军在行动上“隔江联系起来”;丝毫没有如张国焘的《回忆》中所称:红四军欲“在武穴附近渡过长江”

的意图。

“现在进而谈军事行动南下路线与攻击目标之改变问题。决定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则我们认为是：在巩固阵地发展上紧迫的配合中央苏区的行动，占据敌人的要害，尤其是要打击敌人的主力，分散和牵制敌人去江西的兵力。可是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不能不郑重估计敌方的力量与布署，行军的地利与群众的基础和自方的力量之大小及与敌方之对比，这不是单纯的军事眼光，这是以列宁对暴动的指示来估计军事艺术的。

“首先要说到我们的力量与群众的基础，当着打下英山之后，英山群众是没有旧基础的，没有相当时期工作，英山无疑的不能成为阵地（以联接皖西北苏区由英山到潜、太），故十二师留驻英山，不但可以于英山血战后得以休息整理，而且可以使英山成为阵地，以衔接皖西北苏区。由英山到潜、太尽是数百里的山地，群众无丝毫基础，反动民团常假山势之利，以做反革命的游击战争，这样如必肃清而成为阵地则必迁延时日，如不肃清则举军冒进，则必牵制军事行动，群众的帮助与拥护更不易言了，自己的力量虽号称三师，然每师均缺一团，十二师更缺一团以上，暂留十二师于英山既为必要，则前线上只四团，而欲以四团兵力突出数百里之非苏区而去占安庆，非共产党之夸大狂其谁信？如果得潜太而须留一部兵力驻守以固后方，则出安庆之兵力更不足两团了，能乎否乎？不留兵潜、太，而直取安徽（庆）虽有四团，则孤军冒出，稍有军事常识者，必曰必败，果而出此，吾辈将举鄂豫皖数年斗争的结晶，离开国际和四中全会的路线的立场，冒然送给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铁腕之下，生不为革命之罪人也笈希！行军地利呢，由英山到潜山二百七十里，等于三（百）里以上，由英山到太湖一百八十里山路，等于二百里以上，从太湖到安庆水路交错，平时也不易通过，由潜山到安庆九十里，合潜山到英山三百六十里（当四百里以上），以四百里非苏区的山路，又无群众基础，炎暑行军，病号日增（在英山已病了很多）如果经一恶战伤号至五百或千余人（现在三战共千二百人以上）亦绝对无法运送，即此一点，亦属兵家之忌。就敌情言，当时潜山一团兵力以上，太湖一旅，宿松望江一旅，潜山、太湖均有城，太湖城更坚固，城外有竹围，周围又是开阔地的沙滩，我们要走近二百里才可接触，又不能做到突击，如果敌人集中一点，死守待援，则我们粮食经济均在山地，不能解决，势必将徘徊于潜、太之间，安庆之夸大目标更不能得。而潜、太山地于全国政治影响更无甚轻重，其不能多少影响鄂、赣、湘的‘剿匪’布置，更不待言。这样又有什么配合中央苏区的意义？当然出潜山而转六霍这一前途是可能而且有意义的，我们也在力

求实现,然而如果没有鄂东沿江之行动,而英山以西没有屏障,敌人可用少数兵力牵制我们,而配合中央苏区打击敌人,以牵动鄂、赣‘剿匪’局面更谈不到了。这里说到另一方面了。在群众基础上来说,蕲、黄、广原有苏区与英山是毗连的,群众受过共产党的影响的,过去工作虽遭受失败,然而潜伏势力不少,到处都有梅花形的秘密组织,可以一呼而起(当我们在英山决定行动前一点钟,恰好蕲、黄、广秘密组织先后三四次派人来接头,报告武穴一带敌情和群众情绪)。事实上我军经过之处,无不送茶送饭和发动斗争,分配土地,肃清反革命与武装农民建立政权。即在漕家河、洗马畈两次剧战,伤亡约近千人,均能动员群众送到英山(这是潜、太一时不可能的条件)。在蕲水所得之物资,更是蕲水工会、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来运送的。特别是游击队与肃反工作,比英山还有力量,这完全是过去放下的革命种子。以路途地利言,则出武穴是居高临下,由高地而向平原,从英山到武穴不过二百四十里的坦途,急行军四天可到,得当地群众的帮助,侦察向导均较有利。此次先后能以敏捷手段打击敌人,这是有原因的。至于敌人之布署,虽武穴一团(当时所得消息)而蕲水、蕲春、黄梅、广济为敌人所疏忽的地方,迅速占领武穴以威逼九江(与)阳、大红军联成一气,其实际意义绝非空喊进取安庆来配合中央苏区之意义可比。事实上,敌人报载(阳新报纸)‘我们大江南北配合行动’和陈调元电告何成浚有云:‘共匪号称三师之众,声势浩大,有进踞广、武,渡江阳、大与孔匪联合,侵犯尚浔,与江西红军共匪朱毛合师之势’。这也使敌人注意我们,全国红军行动是协同动作的。其间虽以武穴早成泽国,不易进取,然而黄、广、蕲这一阵地,我们已事先布置,较敌是先占一着,如敌人进入这一阵地而各个击破之,这完全是我主敌客,而具有足以消灭敌人主力之基础。兵家所谓避实就虚,飘忽自主,给敌人以各个击破者正如是也。漕家河之战消灭敌人一旅以上;洗马畈之战,击溃强悍敌人四团兵力(以徐为敌部主力无疑,过去红四军如果见徐源泉军队集中四团以上兵力和必不敢战而退),这些结果自然是全军政治军事的坚决性使然,可是没有上述条件,难道可以偶然幸致的吗?我们二(一)个月占据了四个县城,自然不是你们所谓‘要塞’,然而击破敌人主力是相当做到了。徐源泉与夏斗寅是湖北反动政府两个支柱;徐之实力大于夏,将他两师之各一旅完全击溃,这不是无意义的(对黄、麻苏区更有意义);与对江孔荷宠部直接联络行动这不是无意义的;引至江西两师出来,把武汉警备旅也抽调到武穴来,武汉保安队也开到蕲春,刘峙部之胡宗南师,因此而不敢急赴江西,把鄂西长沙的徐部集中到此地来而击溃之,把王光宗部消灭,九江也动摇起来

(我们探到由九江派来的许多侦探),开展并恢复一块偌大的苏区,这都不是无意义的。自然这些意义万不及‘进取安庆威胁南京’那样的伟大。

然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是这样轻率不加准备而发出命令吗?武穴何地?我们答复的:是不及安庆远矣。然而安庆何地?我们不能不申言之,安庆之取是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长江海军与海员没有工作,城市工人贫民没有工作,城外近郊农民没有工答,城市驻兵没有工作,城市及近郊党的力量是根本没有关系,英山到安庆近四百里的非苏区,又是山地,清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探、干部又无多少的准备,只有一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进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了。去年红八军进取长沙之教训,主要的是没有充分的准备和没有与各方面的配合,而其条件尚比我们为优,其兵力在万枪以上,长沙距平浏赤区又不过七八十里,后方动员了五万以上的赤卫队到长沙,然而退出之后犹表现其零乱不堪的样子,这正是四中全会所估计的长沙失败是没有必要的准备,而发出过早的冒险的固执的指示所致的。安庆不比长沙为次,而我们的条件不及长沙,敌人的兵力又有两警卫团,一步兵团,合经常警察及沿江各镇一时可集者,至少也在两师以上的现代兵力。如此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武汉之命令有什么分别了。分局与军委根据昌洗同志意见,以为当我们已经扑灭英、太之部以后,敌人已经是如惊弓之鸟,望风而靡,我军乘胜直追,可以下潜山和太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进迫安庆,这在军事上及敌人力量上,看来是完全可能的事。这未免太近于纸上谈兵了,只要能够愿意明白当时之形势、敌情与自己的力量和近代战略战术的人们,则不加解释也了解这一种作用是用了一些空洞的描写去代替实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如果单就武穴不如安庆政治意义之大而言是对的,可是武汉、南京比安庆意义更大,我们能不能离开整个政治形势和大城市群众工作基础之估量,而下一进攻武汉、南京之命令,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事。”

《信》尾驳斥了所谓单纯解决经济问题的“薪水之欲”“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指责,在列举事实,指出这种指责不符合实际之后,说道:分局与军委所说“‘薪水之欲’放弃了政治任务而去单纯解决经济问题,”并“竟以‘司马昭之心’相诘责,我们以为这不适宜于党的领导所宜遽然加与我们的语句,因为这样说失却说服的主旨了。”

(四)《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

鸡鸣河会议后,红四军主力继续北移。九月十三日部队到麻埠后,陈昌浩到达军部,宣布接替曾中生的军政治委员职务。随即秉承张国焘“改造”红军的旨意,借肃反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开始在红四军大肆捕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国焘给中央的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中,曾明白供认:“派昌浩同志两次坐飞机去皖西,因飞机场不好,不能到达,因又折回,起程去四军,九月十三日赶到,在四军干部反对昌浩同志的空气之下,昌浩同志迅速进行肃反,因打破九月十五日许继慎周维炯之暴动计划。”)九月底陈昌浩把部队带到白雀园,张国焘便亲自坐镇红四军,主持肃反工作,进一步捕人、杀人。

在白雀园大肃反以后,张国焘才于十月上旬在光山以南的泼皮河召开有红四军团以上干部参加的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处理关于红四军南下方针的争论问题,作出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这个决议不得不承认张国焘控制的鄂豫皖军委要红四军主力进攻安庆,“在决定战略上是疏忽的”;它仍不顾事实诬陷红四军主力南下行动是“重复了立三路线统治时期的一切错误”,是犯了“有系统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决议提出了“改造红军”的四大“具体任务”,首要的就是“加紧肃反”。张国焘从此在鄂豫皖建立起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和军阀主义的统治。

尽管这个决议极度的自相矛盾,极力为曾中生同志罗织罪名,但是仍然还没有罗织出如张国焘《回忆》中那样的“过江说”。

下面作部分摘引备查:

“红四军此次在英山、蕲水、广济一带行动,在军事上获得了大的胜利,相当的发动了这一带的群众工作与游击战争,部分的进行了分配土地的工作。中央分局赞许红四军这种胜利,同时认为红四军在政治路线上重复了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这种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大大的削弱了红军此次行动的意义,减轻了他所应当获得的成绩,使四军不能完全完成这次行动所应完成的任务。”

“中央分局在详细研究此次四军行动的全部材料以后,认为四军此次胜利,除开英山一役以外,是侥幸得来的。因为在占领英山以后,四军擅自变更军委会攻下英山后出潜、太威逼安庆,使陈调元军转向东方面调动后,然后去扫六、霍的命令,自由决定了占领武穴,然后沿江岸往安庆的计划。但他的行

动被大水所阻,不能实现,才又临时改变方向到蕲水,到了蕲水以后,四军依然要进行占领武穴再进攻安庆的计划。这一企图又没有实现,因有与徐源泉部之战,那时四军被军委和中央分局的命令所召回了。如果不是由于这种客观条件去造成四军黄、广、蕲的行动和阻止四军所自由决定的计划之实现,那么四军将不仅在政治方面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并且要实际的在革命战争中酿成四军和苏区的严重损失。”

请看!“改变”他的“命令”,打胜仗便“是侥幸得来的”,——这是张国焘的“逻辑”!

《决议》再三再四地指责红四军是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之后,说:

在四军负责同志不同意于分局的批评而对中央分局发生路线上的争论的时候,在这些同志的信上反指中央分局是执行了立三路线,其理由是中央分局当初亦曾令四军占领安庆,认为这与四军占领武穴的计划相比较占领安庆是立三路线。中央分局指出:1、当初军委会在余家集与四军最高级干部共同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军委会所提出的出潜、太的计划是由四军最高级干部所同意的,如果现在要来责备到军委会和中央分局的错误,那么四军的负责同志就首先责备自己。这种缺乏自我批评的态度,是党内讨论政治问题所不容许的。2、军委会当初并没有决定占领安庆的计划,只是决定了相机进逼安庆的计划,(按:这又是游移命题的手法,其实我们前面在分局给红四军的信中,已经看到明白的写着“虽不能幻想久据安庆”和“相机攻下安庆”的文字,现在竟改换了腔调。)这和四军的占领武穴有很大的分别。3、如果军委会只指示四军以出潜、太相机占领安庆的目标,那么亦可说军委会的整个指示是错误的,但是当时军委是进逼安庆引陈调元的军队向这方面集中,然后去扫六、霍,这里的指示是在六、霍,所以军委的指示在根本上是符合中央分局对这一时期所采取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同时乘机打击敌人要塞,消灭敌人主力。他认为占领的策略不是正确的方针,在这一方针之下,进行了完全忽视巩固苏区根据地的立三路线的策略。4、同时中央分局依然以自我批评的立场指出:A、军委会对四军的这一指示,在根本上虽然正确,可是选择安庆的目标,而不首先详加考虑,从英山至潜、太至安庆,一般地形与群众斗争状况的不利之点,在决定战略上是疏忽的;B、决定到皖西北六、霍一带去不能到黄、广一带去,既然可以恢复这一带的苏区,而且更可巩固黄麻根据地,打通两个赤区造成对武汉包围形势等任务相密切联系;C、中央分局自身在军委会的西余集会议以后,未能指示会议这些缺点,早加纠正,中央分局也有疏忽的错误。5、但是一切这些绝对不

能用来模糊两条战线。四军改变了军委会的指示,并不是要到黄、广去恢复那里苏区,而是要到武穴,然后沿江再往安庆。而又不是相机进逼,而是占领这些城市(安庆、武穴),自己有了这样的计划,而仍然用安庆与武穴对比来诬蔑党的政治路线,这是武断宣传的手段,绝不是党内讨论问题的态度。

显然,《决议》用的是诡辩术,反把“占领安庆”说成了是红四军的计划。可是它当时不得不承认军委会“选择安庆的目标”“在决定战略上是疏忽的”。这比张国焘后来在《回忆》中换成“过江说”,还是老实得多了!

《决议》有一段专门指责曾中生同志的文字:

“中生同志当中央领导陷入立三路线错误的时候,他是最积极维护立三路线的人的中间的一个。来到鄂豫皖苏区执行的是立三路线,军事方面,第一次‘包围会剿’以后,红四军所执行的截断长江的计划,当中央分局成立以后,在决定中生同志的工作的时候,曾因为中生同志口头声明完全放弃立三路线,所以委托中生同志去担任红军的军政治委员,负全军军事政治领导之责。不料中生对于政治路线竟采取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派的行为,对于中央分局所指出的红军中的一切错误,丝毫不进行斗争,养成目前红军的各种现状。

同时中生同志自己屡次承认错误,屡次又重复错误,现在没有可能来一一计算这些错误,仅指出一点,就是中生同志前后三次重复了到长江边上去企图占领蕲水、蕲春、武穴的错误,历次都受军委会和中央分局的严格批评而不能改正。”

这里所说的“截断长江的计划”,和前面《来信》中所说的“一次去截断长江”的史实情况,在下面我们摘引的《红四军给中央的报告》中有说明。在本《决议》中虽然指责为“立三路线错误”,但其内容仍不过是说“到长江边上去企图占领蕲水、蕲春、武穴”,还未造出如《回忆》所编造的“过江说”。

(五) 红四军给中央的《报告》

这是一篇记载红四军南下行动方向的争论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其中关于肃清商光路线(亲区)反动武装的策略争论的叙述,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材料,是研究这段历史必须参考的。这篇报告的落款是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并署有“(中生稿)”,时间是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现将有关部分全文引录在这里。

“红四军是红一军、红十五军在今年一月间前特委指导下改编而成的。其时正在敌人第一次‘包围会剿’的严重时期,改编之后,立即受军事委员会

的命,与夏斗寅部六团之众剧战三日夜于麻城之磨角楼,这一恶战虽未将敌人击得逃之夭夭,由是全部包围黄、麻苏区数师之众,均相互观望而成退守形势。至此,过去红一军、十五军不能作持久战的精神为之一变。此次战役之后,红四军立即执行肃清苏区内部反动武装的任务,经十余日之包围与技术的准备,将梗在光、黄苏区的反动中心市镇——新集攻下,反动首领与武装全部消灭;同时许多农民武装(在反第一次“包围会剿”中建立的)攻下了许多反动寨子,解决了许多反动民团,苏区一时渐臻巩固。这时红四军是准备出京汉线的。先是前特委已于沿江汉线反动区姚老约的方面发动了群众的游击战争,这完全是使红军有阵地的到京汉线上去。红四军在新来胜利之下,亦马上加以内部的切实整理,开了全军党的代表大会,从根本上来建立了党的领导作用,特别纠正了部分干部对立(如大骏企图与笃三对立,继慎企图与继勋对立等)的恶倾向,相当开始改正个人的英雄的领导方式。全军一致提起勇气来执行到京汉线配合中央苏区行动的口号,结果消灭了柳林袁英部之一旅和双桥镇岳维峻部三团,岳维峻及三团官兵夫几无一逃者。此时红四军的任务,准备一面肃清亲区(商光路线)和保障苏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面准备出发广、蕲做恢复苏区的工作,同时截断长江以配合中央苏区。其时苏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刚要闭幕,红军长江行动并未成行,而敌人的第二次‘包围会剿’已从各方面严重起来了。恰恰国焘同志赶到了苏区,除一面取消了红四军到长江行动的意见,同时将红军主力移到皖西苏区,将盘驻独山、麻埠之敌完全击溃。不料×××、张印相两部侦察我们黄、麻赤区空虚,乘机而入,我们虽能以原有红军两团并集合农民武装三千以上与之剧战一昼夜于苏区中心之檀树岗,使敌人不能不迅速逃出苏区(连夜开跑),可是苏区之物质经济破坏不少了。未久,红四军从皖西西移,经过桃花,泼皮河数次剧战后,敌人是仍然各方采取堵截形势,我们又重新准备进攻了。至此,第二次‘包剿’又告一结束。这时候我们主要行动任务是肃清商光路线的反动武装,同时要准备大举进攻敌人的一切必要工作,这一前提是没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关于兵力的配备却有二种意见,一是全部兵力集中在亲区,限期肃清亲区以便将来红军大举进攻敌人;一是以一部分兵力留在亲区做发动群众工作来肃清亲区,大部兵力要迅速准备向外发展;后一意见是被拒绝了。结果,亲区是反动的游击战争,大军云集,已无用武之地,给养更成问题,加之两次‘包剿’以来,全军不但没〔发〕过一个零用费,而且衣服草鞋都弄到非常困难的地步。这样全军士气遂呈每况愈下的危险现象,兵士潜逃并日有所闻。这时红军中的负责同志一致向中央

分局建议,主张以两团兵力留在亲区,继续工作,以主力打下英山,直取蕪水,巩固阵地发展以配合中央苏区。因时紧迫,一面驾政治动员,开始移动部队,一面向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作了详细报告,请求批准这一决定。不意中央分局军委会指示这一决定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自然,这一行动计划取消了,而执行长留在苏区边境五十余天的游击生活。据当时中央分局的理由,是说红军干部过分估计了军阀战争,故急欲向外进攻,如果那时向外进攻,则敌人再来进攻苏区,苏区必又遭受危险。这一解释是不能说服红军干部的。当然红军干部在组织上是采取了绝对服从的态度。其时中央分局开扩大会议,中生、笃三、继慎等去出席这一会议,对军事行动经过多次的讨论,才决定了‘在巩固阵地发展上配合中央苏区是最迫切的任务的前提,而以少半数部队(五团兵力)留在苏区巩固阵地,大半数部队向外发展’。这一意见是首先得到了国焘同志赞成的,可是泽民再三反对,最后以多数意见取决,才把这一意见见诸执行。红军在这一决定下,即不想一切困难(如没饭吃、没夫子、没新兵、地方工作不能配合等)而坚决执行他们的任务,即于八月一日打下英山,将陈调元部一团以上的兵力全部消灭,自团长以下官兵夫县长县党部无一逃去,缴步枪一千二百余支,机关枪十八挺,迫击炮四门,子弹军用品无算。在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是要我们打下英山后出安庆的,我们估计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革命基础和配合中央苏区行动之敏捷,均不如转道立出蕪、黄、广直捣武穴为好。事前我们不知武穴沿江尽成泽国,迨抵武穴百数十里之地,始知无法达到这一任务,由此而进据蕪水,发动了此地群众工作(当地群众革命情绪俨如武汉时期),解决红军物质问题,和诱致敌军来攻而扑灭之,地方工作与群众武装都是有极大的进展的,经济问题除得到二十余斤金子,千八百斤银子,数万现×外,并相当的解决衣服问题。惟各路进攻的敌人徘徊不敢进,不是深沟高垒的死守,就是随时准备逃遁,因此我们不能不以飘忽行动迅速突溃敌之一路,乃于前日一昼夜而行百二十里之炎暑行军,拂晓即歼灭漕家河敌人王光宗部全旅(两团以上兵力),俘一千六百人以上,河中淹死者约三四百人,缴械一千二百余支,追击炮十四门,机关枪数挺,王光宗被擒,团长一被俘,一落河淹死。此一战役,我们以两团兵攻敌一旅以上兵力,约一小时半而全部战局告终,且是很复杂的地形,这不但是一件痛快胜利,而且证明红四军最近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了极大的转变。

“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黄、广、蕪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

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的发展而出安庆。这是否是错误,是必然要请中央指示的。”
(李云龙辑)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编辑情况介绍^①

齐得平 郑淑兰

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毛泽东同志题词很多,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已广为流传,深受群众喜爱,有的则还没有同更多读者见面。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并飨读者,我们编辑了《毛泽东题词墨迹选》,不久将同读者见面。《墨迹选》的编辑是在中央和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直接关怀下进行的。编辑过程中,还得到许多单位和老同志的大力帮助。

94

这部《墨迹选》,共收入毛泽东同志 1938 年到 1965 年的题词一百六十三幅。其中有关于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医药卫生工作、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群众路线的,有关于青少年学习成长、青年和妇女工作的,也有表彰英雄模范人物、悼念革命先烈和国际友人的,等等,内容极其广泛和丰富。一幅幅简短的题词,真实而生动的记载着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的科学预见、马列主义的精辟论断、热情洋溢的巨大鼓励和同广大群众的紧密联系。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在当年,曾经鼓舞广大人民群众为赢得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而努力奋斗;在今天,也必将鼓舞我们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四项基本原则,为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毛泽东同志的题词气势磅礴,读者还可从中获得书法艺术的启迪。

毛泽东同志的题词手稿,特别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题词手稿,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广大读者能够看到这些“墨迹”,是许多收藏者把它同自己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为使题词不受损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存下来的。

“努力学习,切实学习,不学好不放手,这是青年的首要任务。”这是毛泽

^① 此文曾刊于《档案工作》1983年第6期(12月25日出版);中国出版者协会编辑、商务印出馆出版的《中国1984年出版鉴》亦收入此交。

东同志 1938 年为艾生同志的题词。1939 年艾生同志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时,送给谭德同志。1943 年谭德同志病故后,其爱人高桐同志一直珍藏至 1976 年献给党和国家,转交中央档案馆收藏。

“失败者成功之母,困难者胜利之基!”原是晋绥军区司令部三处副处长赵同志收藏的,1948 年他参加太原战役时转送给解杰同志保存下来的。

“延安文化界活动起来,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族文化而奋斗”是戈壁舟同志献交的。他在叙述保存经过的材料上写道:“毛主席的亲笔字是我亲手从战火中抢救出来的,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从战争中保护出来的。”之后“放在自己随身一个挂包里,从此在战争年月里,它和我相依为命,常常觉得我在毛主席身边。”

“抗大是八路军的干部学校,它的精神,它的作风,都是八路军的。学习八路军的精神与作风,是抗大同志们应该注意的。”这幅题词原由三五九旅一位姓苏的同志收藏,他曾跟随部队从延安南下广东,又返回中原地区。1946 年 5 月他把这幅珍贵的手迹转交给钟英同志珍藏。钟英同志在中原突围时,在那连续数月的艰苦行军作战中,日晒雨淋,跋山涉水,头无草帽,身无雨衣,除携带两颗手榴弹之外,其他东西都因轻装扔掉了,唯独这份题词,他用油纸包严,随身带着。后来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无论是阻击或攻坚,还是轻装追击或长途奔袭,他都贴身带着这份题词。1949 年 4、5 月间,他曾怀揣这份题词,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青年团代表大会和青年代表大会。钟英同志说:“对我来说,它是我在战争时期的鼓舞力量,是唯一保存下来的珍品。”

毛泽东同志的题词是如何激励和温暖着革命战士的心啊!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些事例。

当年的生产英雄,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供给部长杨林同志,在谈到毛泽东同志给他题写“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奖状时说:1942 年冬季于延安,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由中共西北局召开的高干会议结束时,奖励了二十多位英雄模范人员,“在此次大会上我也光荣地受到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奖状”,“这是我一生的最大光荣。”

当年的生产英雄,陕某宁边区华池县县长李丕福同志,在回顾毛泽东同志给他题写“面向群众”的奖状时说:“毛主席的题词一直激励我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三十多年来,我努力按毛主席的指示,面向群众,热爱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

杨海泉同志在叙述毛泽东同志给他题写“与民众在一道,一刻也不脱离民众,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这一珍贵题词的经过时写道:“当时,我是八

路军何长工纵队第十五连队战士，1939年初调到延安抗大总校学习，久久盼望，幸福地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主席亲切的一一问了我们的名字，问了在前方与日寇战斗及工作学习情况，……之后，我提请主席写几个字，以作留念。毛主席很高兴给我写了这首题词。记得毛主席很风趣的见我拿出的笔记本是用碎纸片订的，太小，外页已揉搓的不成样子，主席笑着说：‘等我回去写好再给你们吧！’后不几日，因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一大队离开延安开到蟠龙，开荒生产，这一题词经由校交通站同志们亲送到我的手里，使我感动，敬仰，直激动的我数夜不眠。毛主席当时正指挥全国抗战，对这样一件事，能这样关怀，主席对青年战士是多么爱护！几十年来，南征北战，我将这一题词，放在我的一本地图的首页里，用纸包了又包，立下决心：有我在就有题词在，以此来保护它，我背包背着它，心里念着它，行动中记着它，在我长期革命斗争中，给予我指示、教导和无穷的革命力量，并常以此教育我之子女。”

王仲方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给他们几位青年同志题词“肯学肯干，又是革命的，必定是有益的，必定是有前途的”时说：题词“充满了革命导师对青年一代的热情期望和支持。我珍藏在身边三十多年，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无论是在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这幅题字，始终是我生活和斗争的指南。”

1938年9月间，在延安抗大结业时，毛泽东同志给吴伯箫同志在纪念册上题写了“努力奋斗”四个字。吴伯箫同志说：“三十八年来我无比珍贵地保存着毛主席的题词。接受毛主席的培养和教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毛泽东同志的题词，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它的出版，定将激励更多的同志，为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

我们收藏的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和其他著作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大都没有写明题写时间和为什么题的。有的收藏者说的题写时间也不一定完全准确。还有一些虽有说明，但经考证，并不正确，有的甚至是讹传。所以必须认真地进行考证。考证的方法是：

一、分析鉴定佐以查阅有关资料。如为生产英雄罗章等六人题写的奖状，有1941年、1942年和1943年三种说法。我们对奖状的样式、用料和毛泽东同志的书体，作了比较、鉴别，断定是同时题写的。为搞准确，又查阅了西北局高干会的有关档案和延安《解放日报》（报上载有西北局高干会对于领导经济建设成绩昭著而又刻苦奉公、在群众中有信仰之干部选拔王震等二十二名，予以隆重奖励的详细报导，并登有毛泽东同志为受奖同志王震、何维忠、罗章、惠

中权、刘建章、王世泰、杨林、马文瑞、马锡五、王维舟、李丕福、习仲勋、文年生、贺晋年、罗成德等二十二人的题词和他们的事迹),终于查清了这些题词的年份。再如“向光明大道前进,艰苦奋斗,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这一题词,原移交单位说是1942年韩忠良随国民党全国慰问总会北路慰问团到延安后请求毛泽东同志题写的。我们从书体上分析像是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的,而不像是1942年的。经查阅这个慰问团到延安的资料,果然证明这幅题词是1939年9月,而不是1942年。

二、要极其耐心深入地调查研究。如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的题写时间,几经查问,最后找到当时担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同志,才问清是1941年冬季。又如“国为牺牲,永垂不朽”这幅题词,报刊上说是1955年毛泽东同志为浙东洞头岛烈士公墓题的。从书体看,是1953年前后的。发函调查,回答是从石家庄烈士陵园复制去的。又函询石家庄烈士陵园,复信要我们向北京军区政治部联系。调查结果,这幅题词是1953年春为北京军区烈士陵园(后移交地方改为石家庄烈士陵园)题写的。

三、根据历史事件多方判定。为徐昆庭的题词“不屈不挠”,移交单位说是1945年3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祁连山窑洞内,为民主建国军总参谋部处长徐昆庭题的。经考证,民主建国军,是高树勋为反对内战,于1945年10月30日响应我军号召起义之后,由该军全军公决成立的,1945年3月,高树勋尚未起义,还没有这个番号。又鉴于因胡宗南进攻,我军于1947年3月19日撤出延安,题词的年代,不可能是1947年。因此断定这幅题词是1946年题写的。

此外,在编辑过程中还发现,有些题词,无任何记载,考证起来十分困难。这种情况,不仅建国前有,建国以后也有,原因是我们的文书档案工作制度不健全,材料不完整。在调查访问时,我们还发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一些题词仍散存在个人手中。说明我们文书档案部门,应进一步健全制度,加强对档案文件的管理。我们还应抓紧革命历史档案的征集工作,让收藏者都懂得,把这些国宝,贡献给党和国家的档案部门,才能在四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有利于长久保存下去。

我们在编辑工作中,虽然经过努力和各方面的大力帮助,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有些问题仍未查清,只好留待以后补正。同时,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一定会有尚未发现的问题和某些缺点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挚友和诗人^①

——毛泽东和郭沫若

齐得平

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毛泽东同志的手稿中,有一些论及郭沫若同志的篇章,并附有郭沫若的诗文手迹,这些墨宝,对研究郭沫若生平有重大价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同志怀着满腔爱国激情,从日本回到祖国后,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的工作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热情支持和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1942年郭沫若的剧作《屈原》在重庆上演,对当时“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黄任之(炎培)当时写诗赞曰:“不知皮里几阳秋,偶起湘累问国仇。一例伤心千古事,荃茅那许辨薰莠。”“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别有精神难写处,令人面目古人心。”沈钧儒《观〈屈原〉和任之韵》诗云:“春来何意忽惊秋,负剑长歎誓灭仇。湘水不流香草绝,遂令终古有薰莠。”“雷雨翻空作吼音,楚些原不是悲吟,祇凭一片荃荪意,结集人间亿万心。”柳亚子有《赠沫若新著〈屈原〉》诗云:“怀沙孤坟郁难平,千载犹传屈子名。猛忆嘉陵江上客,一编珍重慰幽情。”这些诗句,是郭沫若这一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历史剧《屈原》的演出,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给杨绍萱、齐燕铭同志的信中称赞“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笔者按:这封信曾在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过,但信中称赞郭沫若的这句话

^① 此文首先发表在1985年8月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辑出版的《郭沫若研究》第1辑,后又分别收入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交往录》和团结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和党外朋友们》两书中。

却被删除了。1982年5月23日重登时又恢复)1942年2月,郭沫若写成剧本《虎符》,这是国民党政府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之后,那时候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面目已经暴露。郭沫若那个剧本是有暗射用意的。剧本受到国民党当局严格的检查,在重庆只演出过一次。1944年1月9日,毛泽东请董必武同志转交郭沫若同志的电报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的著名论著《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于1645年陷于失败的惨痛历史教训。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同志写信给郭沫若,信中说: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绩,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毛泽东同志的信,高度赞扬了郭沫若的成就,把《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是党中央对郭沫若的最大信任。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款款写来,平易而亲切,谦逊而真挚,既抒发了深沉的怀念之情,又表示了殷切的期望之意。

郭沫若从日本回到祖国,就一直渴望能够奔赴延安,同毛泽东同志以及延安的同志们见面。但是,当时他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愿望无法实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郭沫若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多次同毛泽东同志见面。他看到毛泽

东同志没有手表,就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送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非常珍视这件礼物。他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并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不要叫别人拿去。这块表已经修过,表带也换过,但毛泽东同志生前一直戴着。这件事也体现了郭沫若和毛泽东同志深厚友谊。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毛泽东同志《沁园春·雪》发表的情况。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桂园寓所宴请柳亚子、王昆仑等人。柳亚子赠送一首七律,同时向毛泽东同志“索句”。毛泽东同志于10月7日复柳亚子,并赠《沁园春·雪》词一首。不久,柳亚子做了一首和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都想欣赏一下“毛润之的咏雪”原作。《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的编者吴祖光特请人搜集到毛泽东同志的原句,以《毛词·沁园春》为题,于11月14日在该报副刊显著地位上发表,并加“按语”云:

毛润之先生能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特,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此事立即轰动重庆。两周之后,重庆《大公报》又将柳的“和词”与《毛词·沁园春》集中在一起,以醒目地位刊出。

《沁园春·雪》传抄稿在重庆两度刊载后,短时间内,仅重庆一地就有10余种报刊连续发表了步韵、唱和之作与评论文章。人心所向,舆论沸腾,使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国民党中宣部头目“召见”了《新民报》的主持人。骂该报向共产党“投降”。不久,在蒋介石授意下,掀起了疯狂的“扫荡战”。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组织了一批御用文人,以“唱和”为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妄图称霸”;辱骂人民军队不过是“黄巢”之辈的“草莽”;并狂妄叫嚣要什么“完璧归赵”。《益世报》、《文化先锋》等则与之遥相呼应。但是,身居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进步文化人士,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当时在重庆的郭沫若同志,十分愤怒,投身到“反扫荡”斗争的第一线。他在柳亚子发表“和词”匝月之时,先在《新民报晚刊》副刊上发表了第一首“和词”,随后,又发表了第二首“和词”,反击那班“皮相轻飘”的国民党当局的御用“鹦鹉”。郭沫若这两首词是这样的:

(一)

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
 叹九夷入寇，^①神州鼎沸；
 八年抗战，血浪天滔。
 遍野哀鸣，排空鸣鹏，海洋仇深日样高。
 和平到，望肃清敌伪，除解苛烧。

西方彼美多娇，振千仞金衣裹细腰。
 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
 飞机大炮，后引中骚。
 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民力尽雕。
 堪笑甚，学狙公茅赋，^②四暮三朝。

(二)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
 看古今成败，片言犹折；
 恭宽信敏，无器民滔。
 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
 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娇烧。

传声鸚鵡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
 道红船满载，^③王师大捷；
 黄巾再起，蛾贼群骚。

① 《沫若文集》作“念九夷入寇”，见《沁园春·和毛主席韵》（其一），《沫若文集》第2卷第1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 《沫若文集》作“学狙公芋赋”，见《沁园春·和毛主席韵》（其一），《沫若文集》第2卷第1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③ 《沫若文集》作“说红船满载”，见《沁园春·和毛主席韵》（其二），《沫若文集》第2卷第1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嗟尔能言，^①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
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1945年10月上旬，毛泽东同志应徐迟的请求，题写了“诗言志”这寓意深长的三个大字。后来徐迟拿给郭沫若看。郭沫若一看就兴会勃发，挥毫在毛泽东同志题字“诗言志”的左边，写了这第二首词，驳斥易君左的一篇反动旧词。是年冬，郭沫若将毛泽东同志的词《沁园春·雪》和他的这两首和韵之作，一起抄赠翦伯赞。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常与毛泽东同志论诗和词。有时，毛泽东同志还请郭沫若为他润色诗稿。

1959年，毛泽东同志作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两首。9月7日写信给胡乔木，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于9月9日和10日两次写信给胡乔木，直率地提出了修改意见。9日的信说：“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4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10日的信说：“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胡乔木将两信转呈毛泽东同志。9月13日，毛泽东同志又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毛泽东同志根据郭沫若等的意见，将《七律·登庐山》中的两句做了修改。

1961年10月25日，郭沫若作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泽东同志看到后，于11月17日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笔者按：诗文略，见《毛主席诗词》）。1962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看到毛泽东同志的和诗，当天依韵和诗《再赞〈三打白骨精〉》：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迷雾聚成堆。
九千万里明真谛，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警惕报涓埃。

^① 《沫若文集》作“叹尔能言”，见《沁园春·和毛主席韵》（其二）《沫若文集》第2卷第1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金睛火眼无容赦，那怕妖精亿次来！^①

毛泽东同志看了郭沫若的这首和诗后，于1月12日高兴地写道：“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刚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毛泽东同志同时还将他的近作《咏梅》送给郭沫若看。

1962年筹备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同意在《人民文学》五月号发表他30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六首词。《人民文学》编辑部请郭沫若写些诠释性的文字，以帮助青年读者。郭沫若欣然同意，于5月1日写成一篇《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发表在同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和同日的《人民日报》上。5月9日郭沫若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送阅的小样，立即写信送请毛泽东同志“加以删正”。

郭沫若在文章中说，毛泽东同志的诗人人爱读，处处弦诵，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郭沫若举自己对《娄山关》的理解为例，说：今年3月初在广州的一次诗歌座谈会上，曾经为这首词请教过广州诗歌工作者，他们的见解就很不一致。这首词上阕写的是清早，下阕写的是晚上。我曾问过广州的同志们：这词所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他们的回答便有分歧，有的说是一天的事，有的说不是一天的事。可见，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并不一定真正首首都读懂。

文中还写首：“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曾经把新旧《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了由遵义城至娄山关是70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西风烈’，不仅是自然界的西

^① 这首诗见于郭沫若发表在1964年5月30日《人民日报》上的《玉宇澄清万里埃》一文中，全文是：“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风,也隐喻着受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军力量的相对强大。在这时拂晓的长空中,有下弦的残月,天上有南飞的归雁,地上有长征的红军。马蹄声零碎,喇叭声呜咽,气氛是悲壮的。但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便来了一个转折点。《娄山关》这一首词就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气势的生动的反映。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纠纠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但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或许有人会问:一首词中所说的一朝一夕为什么所表示的不是一天?这在我们中国的诗歌中倒并不是稀罕的例子。”

然而,郭沫若在广州诗歌座谈会上所说的话,竟是错了。这是毛泽东同志看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后告诉郭沫若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对《娄山关》这首的写作背景还作了如下的说明:“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2、3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100多华里,指挥作战,那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场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说明,对我们研究他的《娄山关》这首词是很重要的。

1962年4月下旬,郭沫若在写《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之前,为了把“词六首”写作时的情况弄清楚,曾几次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郭沫若在文章中写道:“尽管这六首词中有几首我已能够暗诵,对于各首写作的

时期和环境,平时并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因此在了解上也只能得其皮毛。为了自己的更好的了解,我费了几天功夫,并且还靠着好几位同志的帮助,特别是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帮助,算把这六首词写作当时的情况弄出了一个初步的眉目。”毛泽东同志看郭沫若这篇文章时,将文中“特别是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帮助”改为“其中是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很大的帮助”。这是郭沫若和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的勉励。

郭沫若是很重视我们档案馆的工作的。早在24年前,即1960年1月26日,郭沫若曾手书题赠档案馆:

事前不忘后事师,
自来坟典萃先知。
犹龙柱下窥藏史,
呼风舆前听诵诗。
国步何由探轨迹,
民情从以识端倪。
上林春讯人间满,
剪出红梅花万枝。

现在,我们上面所述及的毛泽东同志和郭沫若同志的诗文墨迹,都已被视同“坟典”珍藏“柱下”。它们将作为我国的珍贵文化遗产而流芳百代,香溢兰台!

1983年12月

沙窝会议辨疑(二则)^①

耿仲琳 田逢禄

一、时间考辨

我馆珍藏的《沙窝会议记录》的时间有问题。《记录》第一页的左上角上，有阿拉伯字码“6/8”(即八月六日)的记载，但“6”字下面还隐约盖着一个“4”字，都是铅笔笔迹。“8”与“4”字笔划纤细，似为原有的，“6”字笔划粗壮清晰，似为后加的。这是怎么回事？沙窝会议的时间是八月四日还是八月六日？抑或是八月四日到六日呢？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查阅了有关的党史著述材料，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是众说纷纭的：

(一)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1982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写的是“1935年8月6日”。并说“会议召开之前，政治局于8月5日草拟好了决议案。8月6日，会议开始以后，首先由洛甫(张闻天)就《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作了报告，接着大家进行了讨论。”“最后，会议通过了决议案”。

(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85年4月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送审本)中写：“八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当前的形势与任务，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的战略方针，反对南下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必须加强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必须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

^① 此文曾刊于1986年3月20日出版的《中央档案馆丛刊》第一期，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党史研究》1987年第一期转载。

(三)战士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中说:“中央曾利用在毛儿盖休息的时机,于八月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当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另外,还召开了一个沙窝会议。……我那时随部队到另一地方执行任务去了,没有参加。周恩来同志也没有能参加,因他肝病犯了”。

(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征求意见稿)中写:“8月4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右倾逃跑路线。5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朱德年谱》中写:“8月6日出席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上引著述的编者,很可能是查阅过《沙窝会议记录》,很可能推敲过《记录》上的时间记号,并经过各自的判断而采用了各自的说法,有的承认了“4”,有的承认了“6”,有的则存疑写“上旬”,并且按照自己的判断做了若干演绎(如说“会议召开之前,政治局于8月5日草拟好了决议案。……”等等)。

这些材料没有解决准确的会议时间问题,但它提示我们极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搞清这个问题乃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是义不容辞的。

我们首先排除了“8月6日开会说”。因为这个时间同我们看到的另外两个档案材料有矛盾:①1935年8月3日21时由张闻天署名下达的《在沙窝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中写到:“国焘、昌浩、向前:请准予明四日十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通知前面还标有“万万火急”等字样。②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即《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在标题之下明白写着“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我们分析沙窝会议很可能是4日开会,开了三天,于6日结束。我们仔细研究《沙窝会议记录》,觉得这个分析是接近事实的:

第一、沙窝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组织问题。洛甫(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向会议作了报告,并就大家讨论的意见作了总结。在讨论中,所有到会的十一个人人都发了言,而且有的人是两次发言。报告和讨论第二项议程,也有不少人发言,而且有的人是两次、三次发言。

这些情况都说明,会议开的时间比较长,不可能是一天。

第二,从《记录》笔迹上看,很明显是先后有两个人作的记录。原来会议时间的“4/8”,明显是前一个记录人写的。因为会议是8月4日开始召开的,究竟会议要开多长时间,他无法确定,当然只能写上当天开会的日期“4/8”。很可能是第二个会议记录人,记到会议最后结束的“6日”,他未经审慎考虑,率尔地把“4”字改成了“8”字。本来正确的改法,应当是改为“4—6/8”,即为“8月4日至6日”,而不该将“4”字改成“6”字。这个误改,就给后来人造成了不少麻烦。

我们自度上述判断是合乎情理的,是可信的。但这毕竟是判断,究竟能否成立,还应找到更直接的证据。而这样的证据终于找到了,这就是林伯渠同志的《长征日记》。林伯渠同志的《长征日记》中,关于沙窝会议有如下的记载:“八月四日晡。……中央在沙窝开会。”“八月五日雨。……今日中央继续在沙窝开会。”“八月七日晴。……得悉昨晚沙窝会议已告一段落,决议案已通过,仍驻原地整理一时期。”可见,沙窝会议确实开了三天,8月4日开会,6日结束。这个疑案解决了。

二、疑讹疏正

在考证沙窝会议开会时间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下列问题,需要予以订正或补充:

(一)关于沙窝会议的决议,中央档案馆保存有两个文本,一个是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接收来的,一个是原来党中央保存下来的。这两个文本都是油印件,从字迹和内容上看,是一个版本,所不同的只是从共产国际接收来的那个文本的封面上用毛笔写有“博古”的字样,文内第一句“帝国主义的更进一步,”用毛笔加了“侵略”二字,改成“帝国主义侵略的更进一步”,显然改得更确切了,其他都完全一样。我们分析这个本子可能原是博古存阅的,其中“侵略”二字也可能是他加上去的。档案保管人员在这个文本的首页上加注说是决议的“草案”。我们认为这个注不对,事实上,这个文件就是正式决议,不是草案。

(二)上面提到的《聂荣臻回忆录》中所说,他于1935年8月初参加了毛儿盖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另外还开了沙窝会议,他没有参加,周恩来同志因病也没有参加。这些可能有

误。因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是沙窝会议通过的,不是毛儿盖会议通过的。从《记录》中看,通过这个决议的沙窝会议的到会人中没有聂荣臻同志的名字,说明他确实是没有参加。他是参加了毛儿盖会议(《毛儿盖会议记录》到会人中有他的名字),但那是在1935年8月20日,而不是在8月初。他说周恩来同志没有参加沙窝会议。这也不对。因为从《记录》上看,周恩来同志不仅参加了,而且还在会上发了言。倒是周恩来同志因病没有参加8月20日的毛儿盖会议(《记录》到会人中没有他的名字)。

(三)中共中央书记处1941年在延安编印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所编入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在标题之下正确地写明是“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但还误加有“毛儿盖会议”等字样,应当予以订正。

(四)1942年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文献》中,也收入了中央沙窝会议的《决议》,但编者在标题之下注明的时间是“1935年8月9日”。查我馆保存的这个《决议》上,其标题下注写的是“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通过”,另在首页上还注有“中共中央印 一九三五、八、九”等字样。很清楚,“1935年8月9日”是决议的印刷时间,而不是决议的形成时间。《军事文献》的刊误,很可能是把决议的印刷时间当成了决议的形成时间,把这两个时间搞混了。

(五)我们还把我馆保存的《决议》文本同《六大以来》上刊载的文本做了校对,发现《六大以来》本有些地方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必要的修订,是正确的。但有些地方打了许多“××”,并伴有明显的错字。据我们判断是编者所据文本字迹模糊,无法辨认所致,应予补订:

(1)《六大以来》本第六部分第八项中:“当地白军工作委员会,必须广泛的×××工作组以×××体的材料(××军要标语)适合于当前环境的简单指示,使每个红军指战员了解瓦解白军工作×××部,这一工作的重要,与如何进行白军工作”。馆存本有关段落是:“各级政治部的白军工作部或当地白军工作委员会,必须真正的给连队工作以各种具体的材料(小传单、口号、标语),适合于当前环境的简单指示,使每个红军指战员了解瓦解白军工作的顺利环境,这一工作的重要,与如何进行白军工作”。

(2)《六大以来》本第六部分的第九项中:“红军到达陕北后,则须更大的建立与加强当地×××的工作。”馆存本这段文字是:“红军到达陕北后,则须更大的建立与加强当地地方党的工作。”

兰台稿存

(3)《六大以来》本第七部分第一段“×××义的×××川陕甘新苏区的过程中，……同时高山河流草地××××××给我们许多困难”，馆存本这段文字是：“毫无疑问的在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过程中，……同时高山河流草地粮食气候等还会给我们许多困难”。

(4)《六大以来》本第七部分的第三段中的“这对于×××××的任务是最大的危险”，馆存本这句话是：“这对于执行党目前的任务是最大的危险”。

很明显，《六大以来》上打的这许多“××”和伴有明显错字，不是编者考虑保密问题而有意隐去或修改，很可能是受当时所依据的文本条件限制造成的，应当予以补正。

《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 卖国宣言》作者考证^①

田逢禄 殷子贤

《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发表的时间是：1935年6月15日。署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这个文件已收编在《中央文件汇集》和《毛泽东著作资料汇编》里，说明编者是把它看成是中央的文件，而且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了。但据我们考证，这个文件并不是中央的文件，更不是毛泽东的著作。它的作者乃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养三同志。

111

根据是贺昌之同志（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之一）1935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这个报告原件现存于中央档案馆。《报告》中说：这个《宣言》是由养三（也是当时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之一）起草的，这个《宣言》连同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宣言，当时共印刷了一万份。贺昌之同志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还说，当时养三分工负责主办《捷报》。

这个《宣言》现在中央档案馆保存有两个稿本：一个是一份单独的油印件；一个是刊登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1935年6月22日出版的《捷报特刊》第二期上，也是油印的。从这两个稿本的字迹上看，是一个人刻写的。由此可以判断，那份油印件单行材料，很可能就是贺昌之报告中所说的当时印刷的一万份当中的一份。而在上海的养三同志于1935年6月15日起草《宣言》，于1935年6月22日在他主办的《捷报》上刊载，则是很自然并容易理解的事了。如果说《宣言》是由中央起草，送来上海发表，反而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当时中央跟上海临时中央局已无电台联系，假定这个《宣言》是由中央于1935年6

^① 此文曾刊于1986年《中央档案馆丛刊》第二期。

月15日写好后,派人从当时中央所在的懋功地区送到上海,再由养三编辑并于同年六月廿二日出版的《捷报》上发表出来,中间仅有七天时间,这怎么可能呢?

再说,这个《宣言》的单行油印材料的后面,标有“自己看过,转送他人,有人翻印,万分欢迎”等字样。它的意思是,要求大家广为宣传。如果它是由中央起草,从懋功地区发出,首先应该刊登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前敌委员会主办的《前进报》和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政治部主办的《战士报》上。可是,当时这些报刊上都没有刊登这个《宣言》,反而在上海的刊物上发表,这也可证明《宣言》不是中央发出的文件。

我们再从《宣言》的内容上看,它对白区工作情况讲得比较细,而对工农红军活动的情况,则讲得比较笼统,只说“红军及游击队且已发展到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西康、陕西、甘肃、山西、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十九省”。当时,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战役部署、以及党中央的号召是十分具体、十分明显的,而《宣言》如是中央起草发出,不涉及上述内容也是不可能的。并且,1935年6月22日的《捷报特刊》上在刊登这个《宣言》的同时,还刊登了一篇关于红军活动情况的信息,标题是《在川西懋功的东北我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这篇报道中说:“据路透社的消息,六月十七日中央红军已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的东北汇合了”。这说明《捷报》的编者亦即《宣言》的作者,是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得知红军的情况,而对当时红军一、四方面军的具体活动的情况并不够了解,因此在《宣言》中也就不可能说得具体。

再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上看:1935年6月29日,中央在两河口又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了“目前时局问题”。博古向会议报告说:从北方几个无线电材料看到,日帝向北京进攻,向北京城打了炮,打了永定门,同时张贴“华北国宣言”,北京政府已离京,现在我们应加强反日的宣传。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帝。会议最后决定:1.发宣言(通电);2.写文章;3.对白军中工作人员的准备。从这次会议所提供的情况看,在这次会议之前,中央还没有发表过抗日的宣言。这也可说明,在距这次会议将近半个月之前就已写好的那个《宣言》不是中央发出的文件。这就从又一个侧面证明了贺昌之同志报告中的说法是可信的。

两次中央会议时间考证^①

田 仲^②

我馆珍藏的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中,各有一次会议没有载明开会时间,给党史工作者留下了一定的疑难,我们应予考证清楚。

(一)关于1935年中央政治局的那次会议,从《会议记录》内容看,主要是讨论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苏区后的行动方针问题。出席这次会议有的:洛甫、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邓发、凯丰、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贾托夫等人。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党校教研室资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中,曾经对于这次会议的内容作了简要介绍。但是对会议召开的日期并没有讲明,而只是说: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及先期到达的红25军胜利会师。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开了一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还看到,《党史通讯》1984年第12期刊载的张志新《再论红军长征落脚点问题》一文中,也摘录了这次会议记录中的部分内容。对于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该文说是:“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与陕北红军会合以后,党中央于10月下旬在陕北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看来这两篇著述的作者,可能都已看过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因为记录上未载明具体召开的日期,所以他们都做了存疑。

113

我们根据《会议记录》所提供的情况和我馆保存的其他有关档案材料,推断出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开会时间是:1935年10月22日。

我们否定了“20日开会说”。1935年10月19日19时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中说:“一纵队本日到吴起镇”,“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

① 此文曾刊于1986年10月20日出版的《中央档案馆丛刊》第三期。

② 田仲,即田逢禄、耿仲林。

有红色政权，保安城关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该电又说：“明日请彭来吴起镇商行动方针，二、三纵队交叶、邓指挥”。有同志根据这个电报判定，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1935年10月20日召开的。我们否定这个判断。因为它同《会议记录》中提供的情况有矛盾。从《记录》中看，叶剑英、邓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在会上都有发言。而这个电报本身恰恰说明了叶剑英、邓发10月20日不在吴起镇。因电报中说彭德怀到吴起镇，“二、三纵队交叶、邓指挥”。“叶、邓”即指叶剑英和邓发同志，当时叶剑英任三纵队司令员，邓发任政委。再者，这个电报只是说“明日请彭来吴起镇商行动方针”，并没有说明日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基于上述这些理由，我们认为这个电报不能作为判定10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根据。

我们找出了《会议记录》中提供的考据线索：这次会议《记录》中记载的毛泽东“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中说到：“十月到十一月初约廿天，我们的方向应是向西和西北，……大的方向是陕甘，……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现在先向西，以吴起镇为中心。……昨天的胜利，可以给我们暂时休息”。这里所说的“昨天的胜利”是哪一天呢？查1935年10月21日13时半彭德怀、毛泽东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说：“我们率二十三分队到二道川口西端十里处之刘河湾，战斗情况如何望告”。同日20时彭德怀、毛泽东给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邓发的电报中又说：“本日已将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全部击溃，缴获正清查中”。1935年10月22日陕甘支队政治部印发的《庆祝我们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个大胜利》（连队讲话材料）中说：“昨日（廿一日）我军在杨城子、吴起镇附近回击追敌，敌人张学良骑兵第六师两个团、骑兵第三师一个团，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的骑兵团，共骑兵四团，完全被我军击溃，四散逃窜，……”，“这是我们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一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追击计划”，“使我们能在陕北站定脚跟”。《聂荣臻回忆录》中说：“10月19日我们正式进了吴起镇。这时，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和毛炳文的骑兵又跟上来了，紧追在我们的后边不放。……毛泽东同志认为，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我们很不利，总是被动。他给我们交代，要想办法打它一下，……。十月二十一日，二纵队在左翼，一纵队在正面，向正在迂迴吴起镇西北部的敌三十五师骑兵团的两千多骑兵出击。果然，我们出击不久，敌人就垮了。这次作战，我们不幸牺牲了第二大队队长李英华同志。随后，我们在杨城子以西，在齐桥、李新庄间，分别阻击敌三十二师和三十六师的两个骑兵团，又将敌人击溃。敌人骑兵这次垮了以后，一

段时间再没有敢来侵犯”。上引诸材料足以说明,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中所说的“昨天的胜利”,无疑是指1935年10月21日的这次胜利。所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自然是1935年10月22日召开的。

(二)关于193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那次会议,从《会议记录》上看,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三军(即二纵队)问题,南下方针问题和中央常委的分工问题。这次会议之前的一次常委会的开会时间是1935年10月18日,之后的一次是1935年11月3日。毫无疑问,这次常委会的开会时间当在1935年10月18日至11月3日之间。但具体开会日期究竟是哪一天呢?我们从《会议记录》中提供的情况和其他有关档案材料判定,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的时间是1935年10月27日。

首先,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谈到“南下方针”问题时说:“四方面军对我们有配合,现在他们已到金汤”。四方面军“已到金汤”这个情况,中央是在什么时候和如何知道的呢?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于1935年10月26日22时发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的一个电报中说:“我军于本月十三日开始进攻,当将绥、崇、丹、抚、懋次第占领,击溃刘文辉、杨森共十七团,俘缴各约三千,我伤亡不到三百人。现中路已到宝兴、金汤附近,右翼迫近康定,左翼已占牛头山,准备与刘湘主力在天、芦、邛、大决战”。张闻天、毛泽东、林彪、聂荣臻、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发了复电。复电说:“二十六日电悉。我一、三军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自九月十日由川、甘边出发,经过四十天横扫甘肃全省,行程二千余里,于十月二十日安全到达陕北苏区,沿途击溃鲁大昌新十四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奉军骑兵第三师、第六师、第七师(这些骑兵战斗力极弱,往往一击即溃)及马鸿宾之第三十五师,俘虏缴获人马枪械统计在三千以上,得到回汉民众的热烈拥护,坚持了而且达到了党的战略任务”。由此可见,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开会时间,不会是在四方面军来电(1935年10月26日)之前,而只能是在其以后。再从林伯渠《长征日记》中看,10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同他一起研究被服、西药、无线电器材、兵工厂器材等问题。《日记》中写到:“十月二十八日晴。早八时彭、毛招商被服及其器材问题,决定:(甲)(被服):(1)羊毛衣五千套(最急),(2)羊毛短裤六千条(最急),(3)羊毛风衣六千件(一千最急),(4)羊毛帽子五千顶(三千最急),(5)绑带五千双(三千最急),(6)羊毛夹被二千床(一千最急),(7)军布鞋一万二千双(六千急,余次急),(8)夹袜一万二千双(六千急,余次急);(乙)西药;(丙)无线电器材;(丁)兵工厂器材:A设采办处于凤凰镇,以杨至成为主任,B

拨款二万七千元交支队司令部,又拨三千元交采办处。”由此可见,10月28日这一天,研究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不大可能开常委会。10月29日,林伯渠《长征日记》中写:“十月二十九日晴。早八时行,行约五十里,到波罗寺宿营”。说明这一天部队已经开拔,更不大可能开常委会。

我们再从《会议记录》中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发言中还说:“上次政治局会议已说到行动方针,现已休息五天,连今明天,共七天,缩短三天,主要作战方面在南边,敌人是杨虎城等”。这里所说的“上次政治局会议”,无疑是指1935年10月22日的那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里所说的“现已休息五天”又是哪五天呢?10月19日19时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二、三级队明日宜靠近吴起镇,在其以南二十里左右地区宿营”;同日20时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顷据四大队报,二、三纵队已在一纵队来路宿营,为便于与敌作战,二纵队明日应移至吴起镇西北地区之梁家台,朱家梁、郭家沟门一带宿营,三纵队则移至吴起镇东北地区之彭家沟门、走马台、刘家坪一带宿营”。这些电报说明,10月19日至20日,陕甘支队一、二、三纵队刚刚分别到达吴起镇及其附近地区;而10月21日,上面引述的很多材料已经说明,这一天是在对敌作战。因此,部队的休息整顿,只能是从10月22日开始。此点还可以从另外一些电报中得到证实。如10月21日19时彭德怀、毛泽东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说:“明二十二日在吴起镇附近休息一天”;同时20时彭德怀、毛泽东给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邓发的电报中又说:“准备二十三日再休息一天”;10月22日林彪、聂荣臻给左权的电报中说:“我军决以战备姿势,以吴起镇为中心分驻,进行整理训练,征集资材,发动群众”。这些电报都说明,整个陕甘支队都是从10月22日开始休整的,而且是连续休整几天。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会上所说的“现已休息五天”,即指10月22日至26日这五天。他所说的“连今明天,共七天”,“今明天”即指10月27日和28日。前面已经说过,10月29日队伍就开拔了。成仿吾《长征日记》中说:“司令部决定在吴起镇休息七天”,这同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是一致的。查明了毛泽东在会上所说的“今天”即27日,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而且只有10月27日开会才能与上述各种材料相吻合。因此我们判定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开会时间是1935年10月27日。

这里还需指出,这两次会议记录都没有注明开会的地点,但因上面引述的各种材料已经清楚地说明,这两次会议都是在陕北吴起镇开的,所以就不必再多费笔墨了。

刘少奇的一大功绩^①

齐得平 许卿卿

我们整理这个材料，心情很不平静，随笔吟得一首小诗。又考虑到这篇文章较长，应分出若干段落才好，所以就这首小诗分插到文中去了。

——作者

一九三五年冬，中央决定刘少奇到华北，职务是中央代表兼北方局书记。党中央给他的任务是：指导华北党的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

117

平津危殆 国难当头

少奇离开瓦窑堡，经苏区南下到临潼，后乘火车途经郑州、北平，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旬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内地进攻，华北处于危急之中，亡国灭种的大祸威胁着全国各阶层的人民，保我华北、保我中华已成为党和人民迫在眉睫的任务。“一二·九”北平学生点起反日大示威的火炬，学生的反日运动遍及全国各个大小城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成为广大人民的呼声，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赞成。工人、农民，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迅速革命化，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赞成抗日的方面，当权的大资产阶级处于动摇之中。

当时，党在华北的组织状况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经历九年反动时期的摧残，在白区除保存了党的旗帜之外，党的组织一般都没有保存下来。仅在河北

^① 此文曾刊于1987年2月1日出版的《中央档案馆丛刊》第一期。

省保存一个省委组织和若干城市、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少数中下级干部。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华北党内乃被“左”倾错误路线统治着。如果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要执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不可能的。刘少奇的《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在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上发表,给了白区党以锋锐的精神武器。

谋我长缨 谁执金吾

刘少奇指出,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这是党在华北的紧急任务。要完成这个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干部问题就更加紧迫地摆在党的面前。党需要一大批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干部。党需要依靠这些人去联系群众,依靠这些人对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

漫漫黑夜 耿耿星汉 英雄儿女 铮铮铁骨

一九三一年前后,河北省委几遭破坏,大批干部被捕,关押在草岚子监狱即“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这个反省分院从一九三一年建立到一九三六年八月,先后关押政治犯约四百人。一九三二年大赦减刑无条件释放和因病保外就医的二十多人。有三百多人经自愿或由家属动员发表“反共启示”出狱,脱离了革命。坚持斗争仍被关押在狱的有五十多人。他们大多是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其中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入党的十六人,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六年入党入团的十六人(包括在反省院入党和重新入党的二人,由团转党的人五人);有不少担任过省委、市委、特委的书记、秘书长、部长、科长,团中央候补委员和团市委书记等职务的领导干部。薄一波等在狱中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并同外面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狱中党支部是钢铁的堡垒,领导着这些钢铁的巨人们同敌人进行了可歌可泣、顽强不屈的斗争。他们坚持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坚持拒绝在敌人拟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其中周仲英、赵林、马辉之、刘慎之、彭德等同志早已坐满刑期,因拒绝

在敌人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一直坐到一九三六年。王玉堂、张玺、赵明新、王鹤峰、刘聚奎等团员和群众，由于在反省院时对敌斗争坚决，拒不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出狱，而被狱中党支部吸收入党或由团转党。有的党员不听劝阻，自愿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狱中党支部即断然宣布开除其党籍。他们坚持秘密学习马列主义，在生活上团结互助，家属送来的钱，由党支部指定专人管理，给有病和生活真正困难的同志买些必要的东西。为了反对敌人的虐待和迫害，他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底的绝食斗争坚持了七天七夜。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由宋哲元签发的训令中载有：“案据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呈略称查本院押犯内有周斌（即周仲英）等三十余名均系因共党案被判处罪刑并受反省处分均早满期依照条例皆应具悔过书保释出院乃该犯等仍执迷不悟坚不履行反共手续……是以宁死院中亦不愿反省……。”这是狱中人包括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在敌人面前大义凛冽，正气浩然，坚贞不屈的铁的旁证。

火花闪闪 顿作明烛 熹微晨光 煦煦日出

119

少奇到达天津时，在北方局工作的负责干部有柯庆施（组织部长），林枫、李大章等。柯庆施向少奇提出：北平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少奇问柯庆施：你的意见如何？柯庆施答：可以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少奇迅即报告了驻于陕北的党中央。指出：北方白区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如不早办此事，日本人占领平津，就不能办了。可否，请中央赶快答复。张闻天代表党中央肯定和批准了这个决策。少奇收到中央的答复后交由柯庆施办理，柯庆施则是经过徐冰（当时叫邢西萍，北平中国大学的教授）指示孔祥祜，由孔祥祜写信秘密通知到反省院党支部的。

破彼牢监 踏我征路

详细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柯庆施在一次见到徐冰时告

诉他：在陆军监狱囚着一些同志，可以通知他们，叫他们写一个声明书（当然是有反共内容的话）可以出狱，为党工作……你手下有个关系（指孔祥祯）同他们熟悉，可以叫他写信到狱中去。又说，这是中央指示叫这样办的，你执行中央的指示嘛！有一次柯庆施还向当时担任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说：“何、梅协定后，北平很可能被日占领，要想办法把监狱的同志救出来，否则将会被日本人杀害。”当时李葆华正要到北海与徐冰碰头，柯庆施说：你见到徐冰时转告他，中央已批准叫监狱同志办一个简单手续出来。并嘱咐叫徐冰抓紧办。李葆华见到徐冰后，将柯的话转告了徐。

当时，孔祥祯在徐冰单线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他每隔半月到徐冰家联络一次。七月间的一天，孔祥祯照例到徐冰家接头，徐冰对他说：现在形势甚好，到处需要干部，但是干部很少，没有办法，听说北平军人反省院还有几十个党员，你曾在反省分院当过党的支书，对他们当然熟悉，现在中央有指示，叫他们可以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来。你可不可以把中央的这个指示送进去呢？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事，无论如何要设法完成才好。孔祥祯说：我已三年多和他们没能联系了，即使能送去，他们怎么会相信我呢？这些人在狱内的立场还是很坚定的。你说用自首和登报方式出来，这对他们是一个极严重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上级确实负责才行。徐冰说：这是中央的指示和决定，不然我怎敢和你说呢？你要知道中央叫他们自首就是假自首，中央一定要在政治上负责。孔祥祯说：这虽然是中央的决定，但我和他们没有联系，又怎么能把这信送去呢？同时狱内的组织有无变化，我不知道。徐冰说：你去想一想办法再说吧！这次谈话，孔祥祯接受了一项他没有想到的特殊任务。然而，他离牢狱毕竟时间太长了，现在情况生疏，手头上又无现成的“关系”，甚至连个亲友都没有。又决不能莽撞从事，须再多想想办法。一天，他在街上碰见一个保外就医的在反省院内常常大口吐血的老病号万曲非（即魏文伯）。得知狱内情况无大变化。孔祥祯问：我有一些东西想送到狱里，不知你有认识的人没有？魏回答有个族侄，叫魏茂林（当时叫王伯平），可以向狱内送书报和信，他是同情分子，非常可靠的。孔祥祯请魏文伯介绍认识了王伯平。王一口答应完全可以帮忙。向狱内送信可靠的人找到了，孔祥祯把这个情况告知徐冰，他很高兴。徐冰说：“你先与狱内的组织联系上，然后再把中央对他们的出狱决定送去。”殷鉴是孔祥祯出狱后接任狱中的党支部书记。魏文伯说，他出来时殷仍是支书。所以，孔祥祯按照徐冰的办法，给殷鉴去了第一封信。信的大意是：目前抗日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工作都要人去做，我与家内联系上了，家里让我

营救你们,如果平津失陷于日本人之手,再办就困难了等。意思十分含蓄。反省院党支部接到第一封信时,支部书记已换为薄一波,支委是殷鉴、刘澜涛,他们对来信有怀疑,认为中央和北方局不会作出这样的指示,担心是敌人搞的圈套,因而未作正式传达,没有执行。信送出半月有余,未见回音,孔祥祯十分着急,他找到王伯平,证实信绝对没有失落,确已送到殷手。孔祥祯把这个情况告诉徐冰,徐说:“送信人可靠,殷又是支书,干脆把中央让他们出狱的决定送去好了。”于是,徐冰口述,孔祥祯记录,第二封信写就,由孔祥祯交王伯平送殷鉴了。信中说:中央指示要你们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在政治上、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不执行,就是犯更大的错误。孔祥祯知道殷鉴是留苏学生,懂俄文,中央决定可用自首方法登报出狱等内容,在信中是用俄文写的。信到时,狱中支部又已改选,支部书记是赵铸,支委是张友清、杨献珍。他们认定确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便分头向全体党员作了传达并组织执行。有的党员虽仍有疑虑,但也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如刘锡五等听到传达后表示同意执行,但又要先出反省院的同导进一步核实情况,相约如确实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送他们一只鸡做暗号,表示是组织上指示出狱的。八月底,第一批同志出狱了,薄一波、周仲英、董天知先出来的三位同志和孔祥祯接头,又同徐冰在太庙(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内)茶馆里见了面。随后北方局根据狱中同志的联络暗号,派人送去了一只鸡,刘锡五等人也就出来了。北方局为了组织这批党员出狱,还通过统战关系,在反省院安插了一位管理员,暗中帮助他们办理出狱手续。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他们分九批先后出了“反省院”。此时的《华北日报》、《益世报》连登“反共启事”两三天。

这批同志出狱后,立即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及时地分配了他们的工作。当时亲自接待并负责分配他们的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和徐冰等同志。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王鹤峰、韩钧等到山西作统一战线工作;安子文到北平市委任组织部长;刘澜涛到绥东开辟工管,后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张友清到山西任工委书记,后任北方局统战部长;张玺到冀鲁豫特委任宣传部长,后任特委书记;刘锡五到中央组部任地方科长。

众星璀璨 可歌可哭

这批老干部,在十年动乱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

职务的,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马辉之、徐子荣、傅雨田、王鹤峰、李楚离、王德、侯振亚、王其梅、刘有光、胡锡奎、廖鲁言、张玺、李力果、刘锡五、彭德、刘子久、赵林等二十二人;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司局级职务的有:吴云甫、刘聚奎、刘镇之、赵明新、刘文蔚、刘尚之、冯乐进、唐方雷、王新波、朱则民、高仰云、胡敬一、贺致平等十三人。有十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他们是:赵镛同志于一九四一年在鲁南被敌人活埋;洗维勋、夏福海、马玉堂、段明道、王振林等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董天知任决死三纵队政委时牺牲于“百团大战”;张友清在一九四二年反扫荡斗争中被俘,坚贞不屈,牺牲于狱中;王墉(临汾八纵队二十三旅长)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于临汾战役;张曼萍一九四七年夏在安徽宿县地区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含冤而死。

汗青相照 丹心为谱

122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营救这么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是刘少奇为党做出的机敏决策,是他的一大功绩。这一段扣人心弦的史实,将永远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及康生等人,妄图把这批党的优秀儿女诬蔑为叛徒,妄图把刘少奇这一机敏决策,这一巨大的功绩诬为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可是他们终究未能得逞。终归于“邪不压正”,“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正大光明 如日中著

这里我们还认为有必要把有关材料摘录如下:

(1)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中央书记处给胡服(即刘少奇)的电报说“出狱同志请开始分批分期送西安。我们交通即日出发专接。”

(2)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毛、任、刘、康、周、彭德怀、彭真、高岗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汇报反特斗争问题时说到:“河南红旗政策下,假圣旨自首者,有真旨自首者(刘少奇允许薄一波)……”。康生所说的“真旨”,即是“真圣旨”,也就是说他早就知道这是中央的决定。

(3)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进行代表资格审查时,中央对薄一波等

同志出反省院问题进行过审查,有明确的结论。在这批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二人。“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他们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作了“本人不负责任”的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

(4)一九六六年揪斗刘澜涛时,周恩来同志起草了中央复西北局的电报:“二十二日电悉。请向……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周恩来报请毛主席审阅这份电报时写道:“……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主席指示:“照办”。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 张国焘的谬说^①

殷子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英明决策,这已是彪炳史册,世人皆知的事情。

可是,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却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乃是国际的决定,他说:“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十五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周恩来于十三日抵达西安”等等。这本来都是不实之词,但谬说流传,颇有影响,《明报月刊》编辑部为此书写的《出版者的话》中就说到:“……西安事变的‘解决’,竟非当时中共或张少帅等始料所及,亦不决定于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乃是由于斯大林根据当时国际关系所发出之指示。”所以,我们还需要根据事实,作一点澄清的工作。

根据档案文献的记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完全是中央自己决定的,在决定作出后,才收到国际来电。张国焘说:“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这是没有的事情。实际情况如下:十二月十三日午时毛主席的一份发报中曾提到:“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十七日又发报说:“我们对于远方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十八日,周恩来同志在西安致电中

^① 此文曾刊于《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中共党史风云录》一书亦收入此文。

央说：张学良“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国际有电来即告我”；十九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会议上说：“国际指示还未到”。由此可见，国际指示直到十二月十九日并未到达保安。那么，共产国际指示到底是什么时间到达保安的呢？现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时毛泽东同志致周恩来同志的电报全文抄录于下：

“周：

国际来电如下：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毛

十二月二十日二十时”

以上材料说明，国际来电是十二月二十日才到达保安的。下面我们还要说到，国际来电前，我党已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并为实现这个方针已经奋斗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当时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和态度是有错误的，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将军所属军队之叛变”，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是“助日本使中国分裂”，是日本“唆使中国个别军阀反对南京政府”等等（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社论），这就完全抹煞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主义性质。关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这个错误看法，十二月十九日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西安事变，日本说是苏联造成，苏联说是日本造成，双方对事变的实质，都有抹煞。林伯渠同志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中央会议上也含蓄的说到：“国际对于西安事件总的分析是对的，但有些没有顾到中国实际情形”。

二

西安事变前,从一九三六年四、五月到同年九月,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已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为此,中央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专门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总的方针是逼蒋抗日。”

我党统一战线的方针和逼蒋抗日的政策,得到全国广大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张学良在抓住蒋介石后,于当日寅时给我党中央发来了第一份电报称:“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126

张学良的这份电报说明:发动的原因是因为“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发动的目的是为了“迫”蒋抗日。事变前夕,蒋介石曾两次亲自窜到西安,逼令张杨“剿共”,如不从,则调东北、西北军到福建、安徽,由国民党中央军接防“剿共”,蒋介石最后死心塌地的把桌子一拍,向张学良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这样,张学良苦谏、哭谏均告失败;十二月九日万余学生救亡请愿示威时,蒋介石又下令要张学良“格杀勿论”。这一切,使张杨认识到“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因此,张杨被迫只有“兵谏”,于是,将蒋及其将领扣留。由此可见,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动政策的结果,张杨是被迫而为之,是革命的正义行动,不是什么“破坏中国统一”、受日本“唆使”、更不是什么“叛变”。

三

西安事变后,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支持抗日派,争取中派,打击亲日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争取和平解决。这个方针的形成,从十二月十二日已经初步提出,到十二月十九日已经完全确定了。这就是说,在共产国际回电以前已经确定。

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开会讨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提出:一、支持张

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革命义举；二、不正面反蒋（不是抗日反蒋），只是指出蒋介石的个人错误（对外投降，对内镇压，坚持内战）；三、不与南京政府处于对立地位；四、推动抗日派、中间派走向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五、反对亲日派的降日、卖国和内战政策。在十三日会议上，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打倒南京政府”的，只有一人，这就是张国焘。他在十三日会议上是这样说的：“……在西安事变的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他的这个错误主张，当即遭到大家的反对，大家发言中指出，应把西安事变看成是抗日的旗帜，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不是正面反蒋，只是具体指出蒋介石的个人错误；指出，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分化与孤立；指出，不应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方式；指出，发动群众，威迫南京，改组南京政府这个口号并不坏。

十二月十四日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十三日会议决定的方针又致电少奇同志，电文中说：南京亲日派正在调动大军，向张杨进攻，阴谋乘机扩大内战；指示应发动群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停止新的内战军事行动；要求立刻召开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指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不要同南京政府处于对立地位，但坚决反对亲日派的卖国、内战、镇压民众的罪恶行径；推动地方实力派响应张杨的抗日主张。

十五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政府的通电，就是根据十三日会议决定的上述方针精神发出的。

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于十七日到达西安，抵西安后，当晚即与张学良将军商定了与南京宋子文等进行谈判的五条原则，并在当晚立即报告了党中央：“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为了揭破南京政府中亲日派以救蒋为借口，发动大规模新内战的阴谋，周恩来同志在这个电报中第一次向中央提出保蒋安全的建议。他在电报中是这样说的：“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十八日，周恩来同志在电报中进一步指出：“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中央接到周恩来同志的这两个电报后，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于十二月十八日致电国民党中央，电文中说：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贵党如能实现停止讨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五项要求，不但国家民族得救，即

蒋氏的安全自当亦不成问题。周恩来同志的这一建议和党中央的这个电报，击中和击破了南京亲日派阴谋扩大内战的要害，并且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再次开会并决定发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党内指示，还决定发表《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即十二月十九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文件中分析了西安事变前后的形势，事变的意义，事变的两个可能发展前途，决定应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明确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决定用一切力量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进一步抗日。决定揭破日寇、亲日派妄图利用拥蒋、救蒋口号，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新阴谋，决定给“讨伐军”以严重打击，并指出，这是防御战，防御不是为了扩大内战，而是为了促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抗战的发动。决定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援助（包括军事的与政治的），以彻底实现西安的抗日主张。会议最后指出，这次会议的决定，是十三日会议确定的方针之进一步发展。

根据十九日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在同日给潘汉年同志发报，“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同日，还发报给周恩来同志：“甲、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乙、苏维埃、共产党十九日主张召集和平会议之通电^①，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丙、西安抗日军亦应本此共同之总方针而前进。丁、坚决消灭进攻之敌，为执行此总方针之重要手段。戊、红军决定向西安集中，配合张杨首先消灭东来之敌。”二十日，毛泽东同志又致电周恩来同志说：“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对日之主张”，“痛陈时局危急，内战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国是”。二十日共产国际来电后，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一日根据我党十九日中央会议决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吸取了共产国际来电中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条具体意见，给潘汉年同志发报，要潘向陈立夫接洽挽救亲日派制造危局，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的事宜。经过周

^① 即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

恩来、张学良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在西安与蒋介石、宋子文等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和斗争,终于实现了有利于一致抗日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见《周恩来选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西安事变的两个电报)。

张国焘说周恩来同志在“十三日抵达西安”,也与事实不符。根据当时的电报记载,周恩来同志等一行是十二月十五日早晨由保安动身出发的,十六日才到延安城外,十七日才在延安登上飞机,当晚六时左右才到达西安。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西安事变是张杨发动的。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张杨兵谏,是在特殊情况下,逼蒋抗日的一种特殊形式,与我党逼蒋抗日这一总方针是一致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事变的当天,即十二月十二日,中央已经提出;十九日已经完全确立;并已付之实施。这个方针的确定是在国际来电之前。中国共产党是始终支持张杨的正义行动的,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而且,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运用马列主义,独立自主奋斗的结果。张国焘的所谓“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以及和平解决是什么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决定,这完全不符合历史的真相。

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中央及时开会进行了总结,及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并发布了《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这个会议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开的。林伯渠同志在毛泽东同志发言以后,在会上有一很好的发言,他说,毛主席对西安事变的分析和估计是正确的。他说,党对西安事变的处置,所采取的策略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发表和平通电,使全国人民认识党的主张是正确的,所以党对西安事变的处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说,党的正确,不只是开始于处置这次事变,自从我党提出抗日统一战线以来,党的政策一贯是正确的。他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成功与胜利。他说,这一胜利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获得的,西安事变的正确处理,更证明党中央领导是正确的。

张国焘《会师与内争》考略^①

田 仲 齐雨兰^②

《会师与内争》是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以下简称“《回忆》”)的第十八篇。这一篇共分为“渡过嘉陵江”、“懋功之会”、“毛儿盖会议”、“分裂”等四章。在这四章中,张国焘用系统伪造和篡改政治局会议内容和党史重大事件史实的办法,妄图诱人相信他的如下谰言:“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历史如系事实的写照,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但中共的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张国焘《回忆》第十八篇第四章的第一段)本文仅依据我馆保存的有关会议记录和文电档案,对张国焘本篇“回忆”的主要部分,加以考证;《回忆》中波淫邪遁之辞,俯拾皆是,驳不胜驳,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多予理睬。

“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业”,在我们即将考察的领域内,这句话的真确性,将再次得到证明。看来张国焘的赌注是压在长征中的档案不会保存下来的设想上的。的确,如果没有档案文献,想驳斥他的“回忆”,可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我们党在长征的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居然把许多文电档案保存下来了,今天我们可凭借这些珍宝轻而易举地廓清张国焘的瘴雾,揭露出作伪者的卑鄙嘴脸,请他重返“耻辱柱”上。

(一)关于两河口会议

张国焘《回忆》说:“上午九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博

^① 此文曾刊于1987年2月1日出版的《中央档案馆丛刊》第一期;1990年5月《党的文献》编辑部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风云录》一书亦收入此文,题名为《张国焘是怎样歪曲历史的——会师与内争考略》。

^② 田仲、齐雨兰,即田逢禄、耿仲琳、齐得平、郑淑兰。

古)和我六个政治局委员以及参谋长刘伯承,齐集在毛泽东的住所举行军事会议。首先由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我继起发言,将我所知的西北情况和我的想法报告出来,供同志们参考。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三个计划:……”。“我们的会议一面讨论,一面交换情报,侧重研讨毛所提出的北进主张”,“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决议的。这次违反常例。”

张国焘的这些“回忆”可信吗?这次会议的实际情况是这个样子吗?

查阅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立即可以判明,张国焘的“回忆”,是无耻的伪造。

据会议记录所载,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的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计有:朱德、周恩来、洛甫、毛泽东、博古、张国焘、王稼祥、凯丰、邓发、刘少奇、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共十六人。会议主要是讨论“目前战略方针”问题。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作报告,根本不是张国焘《回忆》中所说“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周恩来在报告中,概述了一方面军撤出中央苏区后的长征情况,分析了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敌情,提出了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要继续北进,歼灭敌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之后,会议即围绕周恩来的报告进行了讨论,根本不是张国焘所说的“侧重研讨毛所提出的北进主张”。在讨论中,张国焘第一个发言。他的发言,主要是介绍四方面军的活动情况,还提出集中二十个团在松潘地区打胡宗南军的建议,根本没有《回忆》中所说的什么“在西北活动”的“三个计划”。毛泽东是继张国焘、彭德怀、林彪、博古发言之后,第五个发言。他的发言,首先表示“周报告国焘等发言我同意”。接着讲了五个问题,即建立根据地问题,战争性质问题,“高度机动”的问题,集中兵力问题,统一指挥问题。在讲到集中兵力问题时,还特别指出“主攻方面,如攻松潘,国焘说要二十个团是对的”。毛泽东发言之后,又有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洛甫等人相继发言。所有发言人都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和他所提出的北进的战略方针。最后,周恩来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了总结。他总结的第一句话就说“各同志都是同意的意见”。

《记录》最后还写有“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等字样。并且还写有，委托洛甫为政治局写一个决定。六月二十八日，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中央发布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说：“（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于向外发展。（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少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下发这个决定时还规定：“这一决定各政治部负责一直传达到团，但必须绝对保持战役部署的秘密。”

由此可见，这次会议并不是像《回忆》中所说的“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而是经过报告、讨论，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作了总结，并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发布了决定。说明《回忆》中说什么“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等等，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作者捏造的谎言。两河口会议整个开会过程，以至最后形成决议，由中央发布实施，这些完全都是正常的，张国焘却“回忆”出这次会议“解决问题的方式”，“违反常例”，这种谎话叠谎话的“回忆”，不禁令人惊叹：“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可是，张国焘如此这般地蓄意地、精心地、系统地、成套地扯谎，意欲何为呢？

显然，张国焘这里的如意算盘是先翻掉北上的战略方针是中央两河中会议的决议，反诬为“违反常例”强加给他的，藉以达到混淆是非之目的。殊不知记录尚在，如意算盘落空，他的这番心血，不独付之东流，反而给人留下了足堪捧腹的笑料。

《回忆》中说：“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如此

而已。”这也是扯谎。查当时有关的档案材料,实际是早在两河口会议之前,中央关于北进的战略方针问题就已经多次电告张国焘,并征求他的意见。比如:(1)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中央军委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名义,给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一份电报中说:“(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乙)目前计划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丁)我野战军于十二号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十八号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戊)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2)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给四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的一份电报中说:“(甲)木柅已放弃,但甲金山南之大碛磧、盐井坪在我手。我野战军现在大碛磧、大维、懋功、抚边一线,拟休息两三天。已令先念派两团进占崇化、绥靖、丹巴,控制大金川。东山已向水磨沟前进。(乙)目前形势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大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3)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国焘的一份电报中说:“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頌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向川西南发展。因此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只有坚决的川西南方针是出路。如此战役部署,则应以有力一部在东岸佯攻,西岸松潘方面亦不必使用多的兵力,主力速向懋功开进,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打去。这一动作关系全局。须集中二十个团以上突然出击,且

后续飞速跟进,方能一下消灭敌人大部,夺取广大地区,展开战局。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以上材料足以说明,张国焘在《回忆》中所说“我来到抚边前,即已决定北进,可是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这些话是骗人的。

(二)关于芦花会议

《回忆》中说,朱德为了调解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矛盾,“提出了军事统一指挥的方案”,“方案”的要点是:强化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负责指挥全军。以后关于战略问题由总司令部拟定,提交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核准施行。这个方案并未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仅以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的名义发表出来(中央政治局当时不愿意举行会议,似是避免谈到政治问题)。”这些也都是扯谎。从档案材料看,实际情况是,两河口会议以后,张国焘为了夺取领导权,借口解决组织领导问题,不顾中央集体作出的关于迅速北上的决定,迟迟按兵不动。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已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向前)陈(昌浩)速来集中指挥”。为了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六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曾开会决定,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地点,记录上没有写明,根据林伯渠同志《长征日记》及其他有关档案材料判断,很可能是在芦花。出席这次会议的计有:朱德、洛甫(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共九人。会议只有一项议题,就是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会议首先由洛甫发言,他提出:军委设总司令,张国焘担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人。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张国焘。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更扩大权力,前面部队都要他们指挥。洛甫讲完后,接着张国焘、邓发、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凯丰相继发言,大家都一致表示同意洛甫的意见。最后洛甫说:大家一致意见,很好,张国焘任总政委,徐向前、陈昌浩任前敌部队指挥,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根据这

次会议的决定,当天军委即发出《任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通知》,《通知》说:“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之后不久,中央军委又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接连发出两个《决定》:一个是《中央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中说:“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动,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特电知照。”另一个是《中央军委关于松潘战役军队布置的决定》,《决定》中说:“任徐向前为前敌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由此可见,张国焘所说朱德提出“军事统一指挥方案”、“并未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仅以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的名义发表出来(中央政治局当时不愿意举行会议……)”等等,这些都是不顾事实的胡说。

《回忆》中说:“毛泽东不仅不遵守军事统一指挥的方案,而且发动对四方面军的批评攻势,这就使各项调解努力均无效果。中央政治局突然通知召开政治局和军委会的联席会议,讨论内容我事先毫无所知。与会人物除两机构的委员以外,尚有徐向前、陈昌浩和军委会的主要参谋人员。主席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即请徐向前报告四方面军的军事状况,徐向前当即发表了一篇朴素的报告”,“毛泽东听了徐向前的报告后,不再详究,即开始批评,……他不仅没有一句话抚慰四方面军多年的艰苦奋斗及其策应一方面军的努力,而且迳直要求会议接纳他的检讨意见,作为定案。”“我当即起而答辩,指出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个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我的发言只有陈昌浩附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他似乎是为批评而批评。其他的到会者始终不表示意见,似乎无人愿意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

张国焘所说的这次会议,即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所纂述的这次会议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从这次会议的《记录本》上看,参加这次会议的计有:张国焘、陈昌浩、周恩来、朱德、洛甫、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共十三人。会议的议题是报告讨论四方面军的工作,会议共开了两天。第一天,即二十一日,会议开始,首先由张国焘作报告,主要内容是讲四方面军

从鄂豫皖、通南巴直至一、四方面军会合前的斗争经过情况,接着由徐向前、陈昌浩作补充报告。第二天,即二十二日,继续开会,进行讨论。首先是邓发言,接着是朱德、凯丰、周恩来、洛甫、毛泽东、王稼祥、博古相继发言,最后还有人作了“结论”(记录上没有写明是谁,从讲话内容和语气看,似是张国焘)。讨论中,所有人的发言,都首先肯定了张国焘的领导正确及四方面军斗争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许多人在发言中,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张国焘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张国焘的《回忆》集中对毛泽东的发言进行了攻击。毛泽东的这次发言究竟说了些什么?据记录所载,其基本内容为:

从鄂豫皖起到现在,国焘领导下总的路线是没有问题的。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巩固,红军与苏区配合无数次击破敌人,都证明路线是正确的。总的路线正确,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指挥问题,集中力量,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是有准备的,基本原则都是遵照了的。在十个月大战中,与刘湘打,向敌人一路打出去,这是特点。另外缺点,有些问题是缺点,今天我不说,材料不够。在鄂豫皖,对敌人四次‘围剿’是没有粉碎的。因为蒋介石大举进攻,首先对敌进攻,我们对粉碎‘围剿’没有充分准备。中央苏区五次‘围剿’没有粉碎,那时他是有准备的,但第二条怎么样打,这方面错误了。关于通南巴问题。使它成为了苏区,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从《干部必读》(这是四方面军编印的一个内部刊物)材料看,敌人用十分之八、九力量对付红军,红军有特别显著成绩。但对建立政权有不足与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性。我看只有一九三三年九月上半月比较注意了地方政权。放弃通南巴是个严重错误,找不出理由为何要放弃。在鄂豫皖苏区几次没有打下敌人,因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了刘湘,胜利后,进攻中,放弃苏区是不对的。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从上述会议的情况可以看出,《回忆》对这次会议的描述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任意编造的。他说毛泽东是这次会议主席,从《会议记录》看,开始是张国焘作报告,最后又是他作的结论,毛泽东只是第二天讨论时有一次发言,虽然《记录》未写明主席是谁,我们判断很可能就是张国焘。至于《回忆》说什么“毛泽东听了徐向前的报告后,不再详究,即开始批评”、“我当即起而答辩”、“我的发言只有陈昌浩附和”,这些都是虚构。《回忆》说什么“其他到会者始终不表示意见,似乎无人愿意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这是对与会同志的诬蔑,实际上,几乎所有到会同志都发了言。《回忆》恶毒地攻击毛泽东的发

言“没有一句话抚慰四方面军多年的艰苦奋斗”，上引毛泽东的发言不仅肯定了张国焘的领导正确，而且对四方面军同志的功绩也作了高度评价，如说“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巩固，红军与苏区配合无数次击破敌人”，“在十个月大战中，与刘湘打，向敌人一路打出去，这是特点。”“敌人用十分之八、九力量对付红军，红军有特别显著成绩”等等，都足以戳穿张国焘的谎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张国焘始终力图混淆两个问题：一个是把他同党中央的矛盾说成是同某一个人的矛盾；一个是把两条战略方针的矛盾说成是两军的矛盾。可是这是无法混淆的，张国焘孑然一身的溜走，早已把问题搞得清清楚楚，无论怎样鼓唇弄舌、舞文弄墨都无济于事了。

（三）关于沙窝会议

《回忆》说，“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地点是在中共中央机构驻扎地，离毛儿盖约二十里的沙窝，这里四围皆山，山上树林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由毛儿盖附近策马赶去参加会议。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口外迎候，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我虽指出陈昌浩系中共中央常委，可以列席会议，但他仍不接纳。于是陈昌浩只得暂驻在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我会后一同返回原地”。说得似乎有声有色，煞有介事，可是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至六日，中共中央确实在沙窝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议程有两项：一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一是“组织问题”。陈昌浩不仅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还在会上讲了话。根本不存在什么不让他参加会的问题。

《回忆》说：“到会者有毛泽东、朱德、秦邦宪、张闻天和我五个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二人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不对！从会议记录上看：周恩来同志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还讲了话：参加会议的计有：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共十一人。

《回忆》说，“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预先拟好的决议草案交给我看”，“我读完这个文件，递交给其他到会者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看情形他们不仅看过了，也许还讨论过，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从这次会议记录上看，会前是拟有一个决议草案，会议首先洛甫作报告，记录上注明“已有文件”，毛泽东在讨论发言时也说“草案在开会前昌浩、傅钟几同志商量过了，

同意的”。既然《草案》在会前已同时在四方面军工作的陈昌浩、傅钟等同志商量过,那么张国焘责难“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这个板子,能够打着谁呢?即或退一万步说张国焘这个是真话,不是假话,那也不能由中央负责呀!

《回忆》说“我第一个发言,……”“继我发言之后,到会者纷纷表示支持这份预拟的决议草案,其中仍以毛泽东说话为最多”,“毛所提出的决议草案,也未付诸表决”,“会议终于无功而散”。查会议记录,《回忆》所说的这些也都是瞎编的。实际情况是,洛甫报告之后,进行讨论时,首先发言的是毛泽东,并不是张国焘第一个发言。毛泽东发言后接着是朱德、邓发、凯丰发言,之后才是张国焘、陈昌浩发言,之后又有刘伯承、周恩来、傅钟、博古相继发言,最后由洛甫作结论。记录上还写有“基本上通过决议案,修改由常委”等字样。这个决议案即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可见,所谓“毛所提出的决议草案,也未付诸表决”,“会议终于无功而散”,都不是事实,都是对历史的伪纂。

《回忆》说“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也不对!查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两河口会议,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止,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三日、七月十八日、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八月四日至六日,共开过六次会议。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四)关于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

《回忆》第十八篇第四章《分裂》笔法特殊,是作者运笔着力最重的一段。劈头,张国焘就“奋笔疾书”了九十四个大字,“大书”“毛泽东”“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他的这段话,本文开头已经引过,这里不再赘引。现在倒是需要详细弄清张国焘搞了一些什么论据来支持他的这个特大的论点呢?

《回忆》说:“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支流,横阻在我们的前面,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

定回师刷金寺。

“我们把为水所阻的情况，电告毛泽东等和其他军事单位；并电令各军暂停前进，俟总司令到达刷金寺后，再定下一步骤。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回到刷金寺，归途中雨虽停了，但部队显极疲劳，疾病增加，非休息一两天不可。

“就在我们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率部攻下了松潘北面约一百里处胡宗南部驻守的一个要塞，守军一团，大部被歼灭，残部逃松潘，我军北进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

“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

“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在卓克基市镇上一栋房屋的大厅中，齐集着各军政首脑同志约三千人，心情显得悲痛而愤慨。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金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却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的。”

这些就是张国焘散布于《分裂》一章中的全部论据，其中的加重号是引者所加的，是提请读者注意张国焘所说的“为水所阻”；“我军北进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等语，我们将在后文适当的地方予以探讨。

《红楼梦》有一段叫《甄士隐梦幻识灵通》，张国焘这里也是“真事隐……”，他是把真事隐瞒起来，梦想引诱人们“识灵通”上当受骗，我们只需来个“真事显”，把张国焘隐讳的真事发显起来，打破他的梦幻，不上他的当。

历史文电档案证明，党中央之所以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由于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党中央才不得不紧急决定连夜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脱离险境。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继续北进的战略决定后，张国焘即极力进行阻挠，不少材料，上文已经谈过。当分为左、右两路军，分路北进以后，张国焘更加紧进行阻挠破坏。八月三十一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一）西固不会是敌空隙，敌已有备，一、三军单独夺取，不能制

敌,反为敌制。(二)九军九十三、二十五师共七团,须三天才能到班佑,左路其余(十七、二十三)即放弃所有医院赶进,亦须十四号才能到达班佑。(三)现在不是乘明过或隙尾过敌的封锁线,而是集中兵力打破封锁线,严重注意被敌截为数段。(四)弟等宜兵力集结,再大举前进。三军须休息一、二天,在包座须备与敌决战。请商政局速即复”。

九月一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复电张国焘:“(一)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东发展,如(甲)二、六军团在伟大胜利后,蒋不得不增调十个师去,吴纵队全部正抽调中;(乙)川敌除孙震外,似均不受蒋令;(丙)胡薛二个弱极,薛尤甚,截止三十日止,薛部主力尚在武平、广元、昭化线,蒋令胡部绕道文县开西固,计程近千里,胡请蒋令薛部开南坪、樟腊、松藩接防,才能集中开进,目前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线,一般空虚,无多敌,仅十二师及鲁大昌部或在此,但碉堡未成;(丁)于学忠仅一部在两当、徽县设防;(戊)消灭了四十九师后,胡宗南更须绕道才敢前进;(己)下包座地区去西固五天左右,去岷州六天,路大房多粮足,罗达以东即完全汉人区域。(二)依上情况,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破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二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的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三)目前蒋胡注意力集中西固以东方向,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徐徐前进,免致抛弃,乞考虑。”

张国焘根本不加考虑,九月三日,又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称:“(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成,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周恩来、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联名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考虑结果认为:(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

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进可能。(乙)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端严重,决难继续下去。(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即有较大的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以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南,开展新局。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中央这些详陈利害,苦口婆心地劝说,对于张国焘来说已经是不再会起作用了。这恰恰在同一个时间,亦即九月八日二十二时,不顾中央早经决定并且一直坚持的北进方针的张国焘,竟悍然电令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他们指挥右路军南下。这个电报说:“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在这同一天,即九月八日,张国焘还致电三十一军政委,说:“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张国焘已经剑拔弩张了。

九日,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至此,中央知道劝说张国焘共同北进已无指望,为避免火拼,脱离险境,只好决定率一、三军团连夜单独北上。九月十日凌晨,从巴西及其附近出发,天亮后队伍陆续到达阿西。待队伍齐集后,又向拉界、俄界进发。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二十四时,张国焘以他个人名义发出一电,内容为:“向、浩并转恩、洛、博、泽、稼:(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①向东突破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的行军,前途如何?②若停夏、洮是否

能立稳脚跟，③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④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说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人，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西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⑤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⑥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二十四时）当时的张国焘大概以为中央已经屈服于他的南下命令了，他踌躇满志了，连用朱德联署的形式也不要了，并明白地道出在张国焘看来北进决无“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的可能性，只能是一条“无止境的运动战”、无法“立稳脚跟”、“背靠黄河”、“再无南返之机”的绝路。在他看来北上的前途是一片漆黑，这才是符合他当时思想实际的“事实的写照”。可见《回忆》中所说“为水所阻”特别是“我军北进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等等，不过是他后来著书时机算尽的妙笔，是用来污蔑别人的。殊不知一旦拿来同他当年的文电相对照，等于他自掌耳光，他的渺小而丑恶的心灵，就暴露无遗了。九月十日中央在阿西发出给张国焘的电报说：“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同日，中央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全文是：

“指令”九月十日于阿西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历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卅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

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右令

陈昌浩
徐向前 同志

中央政治局

九月十一日中央再次向张国焘发出指令:“(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向罗达、俄界集中。(三)立即答复关于左路军北上具体布置。”

但张国焘置中央的指令和指示于不顾,一意孤行,坚决指挥其部队南下,造成红军的分裂。

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研究了“目前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经过情况,提出继续坚持中央早已决定的北进战略方针。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右倾逃跑的机会主义错误。不少同志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建议为争取教育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其他同志,暂不作组织结论。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一决定发给党的中央委员)。会议并决定将一、三军团及中央直属队改组成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率支队全体继续北进。

(五)结束语

档案是历史的凭证。分裂党和红军的是张国焘,这是历史的事实。历史是篡改不了的。事情是清清楚楚的,不需多费笔墨了。至于张国焘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这段历史情况,我们看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中,对此作有概括的陈述,现摘引几段,供读者参考,并做为本文的结束。

“去年六月,中央与四方面军在懋功理番区域会合,因为战略问题的争论,因为要求总的指挥权,他却在四方面军干部中公开煽动反对中央的情绪。关于战略问题,中央坚持北出陕甘的计划,他则要在西康及川边。当时敌人业

已封锁岷江与大渡河,西康川边区域全属番人,并且坚决与红军对立,雪山高寒,粮食缺乏,红军已经大受损失,绝无建立根据地的可能。只因国焘对革命形势、对力量估计不足,对敌人力量过分估计,惧怕松潘及甘南的蒋介石部队,所以怀疑陕甘计划之可能性。并且不了解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政治意义。后来勉强同意北上,但又须解决军事领导问题才肯出动,否则按兵不进。当时他采取了许多非正常的手段,如煽动四方面军干部胁迫中央,要求军职,公开批评中央右倾等。直至中央允许国焘充当红军总政委,他才肯发兵北上。在此时期中,中央为求团结两军北上,不惜委曲求全,但对于国焘的错误观点,在政治局上有所指出,然而他是不承认的。”

“八月两军北上,到了松潘南端的毛儿盖地区,国焘又动摇了行动方针,直接的原因依然是惧怕蒋系胡宗南部队,而主张走数千里草地,西出青海。中央对他任何委曲求全的说明,都没有效。他为达到西出目的,并在领导上征服中央起见,他就利用了一方面军的疲劳与减员,利用了敌人包围,番人反对的严重环境,还利用了中央与全国及国际的隔绝,举行了一个紧张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宣布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并提出他的十几个干部要求批准做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他认为遵义会议总结五次‘围剿’经验的政治局会议是党的调和主义,而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进兵。在中央机关的附近作了一个严重的军事示威,同时他在整个四方面军中封锁中央的影响,并作了一个反对中央反对一方面军的动员,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于一方面军异常恶劣的关系,全然不顾及中央所号召的两军团结北上的政治任务。”

“……在一个多月的合作经验中,尤其在毛儿盖时期,我们认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转变国焘与争取四方面军,必须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因此除对党的路线估计一点坚持原则的立场外,其余均向他让步。首先恩来、泽东退出了军委工作,任国焘为总政委,……求得了一方面军及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右路军,由毛儿盖经松潘附近北出甘南,同时亦只好让国焘及朱德率四方面军主力和一方面军一部组成左路军西出青海。我们明知出青海一路是走不通的,然而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八月下旬,中央及右路军通过五天草地,安全到达四川、甘肃交界之班佑地区,并消灭与击溃了胡宗南的一个师,胡宗南主力困守松潘一线未动。而朱张之左路军,经过极大困难到达四川、青海交界之阿坝地区后,阻于黄河与草地,再也不能前进。国焘于是不顾一切,不但坚决反对中央要求他们回到毛

儿盖取右路军道路继续北上之指示,而且下令要中央及右路军南下。中央此时便不得不采取同国焘在战略行动上分离的方针。”“九月中央率一方面军主力(一军团及三军团)再通过约一千里之番人区域,战胜甘肃之鲁大昌,打开天险之腊子口,达到了岷州附近的汉人区域,结束了西康川边三千里番人雪山草地的行军,以疲劳特甚的一方面军,通过甘肃全省,战胜张学良、毛炳文、王均的拦阻,于十月二十日达到陕北苏区,最后结束了整个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关于新民学会的宗旨^①

——史料札记三则

张景堂 田 仲^②

这里,我们力图详尽地、原原本本地摘辑有关史料,供研究本问题的读者参考。

(一)

新民学会的宗旨在 1921 年 1 月间,发生了质的变化。《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说得非常清楚:

“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1917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

^① 此文曾刊于 1987 年 6 月 1 日出版的《中央档案馆丛刊》第三期。

^② 田仲,即田逢禄、耿仲琳。

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当年,新民学会的组织者都听过杨怀中先生所讲授的《泡尔生:伦理学》,还都是唯心论者。这时候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新民学会宗旨的根本变化,始于1920年7月5日至10日在法会友的蒙达尼会议,成于长沙会友1921年1月的聚会。

在蒙达尼,有新民学会会员13人及工学励进会会员共二十余人,集会五天,确定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蔡和森力主组织共产党,采取俄国革命的方法。其情况是:

1920年6月中旬,前后分批抵达法国以及在法入会的新民学会会员已有十六人,有的在克勒佐、勒哈佛尔、圣伯尼等地工厂做工;有的在蒙达尼、枫丹白露等地学校补习法文。刚刚到法国的萧子暲、陈绍休等从国内带来半淞园会议情况的消息。根据半淞园会议关于‘巴黎等会员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召集’^①的意见,我们商定在蒙达尼举行一次聚会。7月5日,会员从各地来到蒙达尼。从6日至10日,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开了五天会。与会者有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萧子暲、张昆弟、罗学瓚、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以及萧子升(当时在华侨协社任职)等十三个会员。一些外省工学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这个会,共二十余人。

这次会议最主要的成绩是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会上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种意见是萧子升提出的,主张温和的革命,即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森提出的主张,对于多数与会者,特别是临开会前才到达蒙达尼的人们来得比较骤然,缺乏充分考虑的时间,因此对于两种相对立的主张,在会上没有能展开讨论。会议乃决定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毛主席,希望听取国内会员的意见。和森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详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

长沙会友关于学会宗旨问题讨论的详情,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

^① 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兰台稿存

“新民学会长沙会友因湖南政局影响，好久没有开会。九年（1920年）年尽，长沙政局略定，会友在此者亦达二十余人，遂谋聚会一次。此时评议员任期（一年）已满，不能开会，遂由职员何叔衡、周惇元、毛润之、熊瑾玎、陶斯咏等，先期商定开会手续，发出一张通告：

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因种种原因没有开成，今定从十年（1921年）一月一日起接连开会三天，为较长期的聚会，讨论下列各种问题：

- 1、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
- 2、达到目的须采用甚么方法；
- 3、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 4、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自述）；
- 5、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自述）；
- 6、学会本体及会友个人应取甚么态度；
- 7、会友如何研究学术；
- 8、会章之修正及会费之添筹；
- 9、新会友入会的条件及手续（附出会问题）；
- 10、会友室家问题；
- 11、个性之介绍及批评；
- 12、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
- 13、学会成立纪念问题；
- 14、临时提议。

上列各项问题，或为巴黎会友所提议，或为此间同人所急待解决，请各人先时研究准备，以便于开会时发表意见，而期得到一种适当的解决。开会地点：潮宗街文化书社。开会时间：第一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半；第二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各带餐费二角）；第三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半。务希拨冗到会，风雨无阻，并请严守时刻。

新民学会启”

“十年（1921年）一月一日，在文化书社开会，到会者十余人，是日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十时开会，何君叔衡主席，主席请毛润之报告开会理由及学会经过。毛君说：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去年以前，因种种变故，致未开成，现在算是不能再缓了，趁在新年，各处都放了假，特为较长期的集会，讨论同人认为最急切的各种问题。至于本学会经过情形，可大略报告：遂将两年来学会会友在国内国外各方面做事求学情形，大略报告一遍。毛君报告毕，主席

将要讨论的各问题提出。陈启民以开始三问题内容重大,主张压下到明日讨论,圈出其余问题之几个,在今日讨论。毛润之谓因其重大,今日宜略加讨论,但不表决,众赞成,于是开始讨论下面三个问题:

‘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

‘达到目的须采用甚么方法?’

‘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三问题有联带关系,故连带讨论。毛润之云:我可将巴黎会友对于上列问题讨论的结果,报告大众。巴黎会友讨论的结果,对于(一),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二),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则主用缓进方法;对于(三),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均见巴黎来信。熊瑾玎言:目的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抱这种主张,已不必多讨论了。毛润之不以为然,谓第一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彭荫柏云:改造世界太宽泛,我们说改造,无论怎样的力量大,总只能及于一部分,中国又嫌范围小了,故我主张改造东亚。物质方面造成机器世界,精神方面尽能力所及使大多数得到幸福。陈启民赞成改造东亚。谓欧洲有欧洲的改造法,我们不能为他们代庖。惟澳洲宜包括在东亚里,非洲我们也应负责。至于‘改造’‘改良’,我主张前者。因资本主义,积重难返,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设,所以我主张劳农专政,太自由不能讲改造,为的是讲自由结果反不得自由。谈到方法则此目的非二十年内所能实现。现在要用力的,不在即时建一个非驴非马的劳农政府,而在宣传。东亚一方面,尤重在促成工业革命。毛润之云: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讨论良久,主席宣告本日对此三问题(目的、方法、进行)暂停讨论。”

“一月二号为聚会的第二日,大雪越深,到会者十余人,(昨日到会者今日均到)因有昨天未到今天到会的人,主席(何叔衡)将昨天讨论及议决过的问题大略报告一番。继续讨论昨天未完的第一个问题:

‘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

用循环发言法,从主席起,列席诸人自左至右以次发言:

何叔衡:学会共同目的,应‘为改造世界’。

毛润之: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任培道:同 上

陶斯咏:同 上

易阅灰:同 上

易礼容:同 上

邹半耕:我对于改造两字极为怀疑,一般人都以为我们要根本改造,要根本推翻从前一切来重新建设,其实是做不到的。世界无论甚么事,不可一跃而几,是渐渐进化的。新民学会不宜取改造的态度,宜取研究的态度,将各种主义方法彻底研究,看那一种主义方法适宜东西民族不同,人类病痛极杂,决非一剂单方可以诊好。邹君发言极长。

陈章甫:言改造世界,范围较大,可以世界为家,心意愉快的多:故我赞成用‘改造中国及世界’。

张泉山:我另有一个主张今可不提;单就方才所说讨论,不宜以中国与世界并举,宜用‘改造中国并推及世界’。

陈子博:现社会为万恶的,改良两字和缓不能收效,宜取急进态度,所以我主张改造,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故我主张删去中国二字用‘改造世界’。

钟楚生:我们目的不妨大点,主用‘改造世界’。

贺延右:同钟。

彭荫柏:主张用‘改造中国与世界’,自愿抛弃昨日‘改造东亚’的话。

熊瑾玎:主张用‘改造世界’。

刘继庄:同熊。

李承德主张用‘促使社会进化’。

周惇元:同李。

都发言毕,相互略有批评。主席云:昨日曾言不取表决形式,但事实上无表决则不能明白分别某种主张的多数少数。众赞成表决。主席说:主张用‘改造中国及世界’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如下:陶斯咏、易礼容、毛润之、钟楚生、周惇元、任培道、陈启民、易阅灰、陈章甫、彭荫柏(十人)。主席说:主张用‘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如下:熊瑾玎、刘继庄、陈子博、何叔衡、贺延祐(五人)。以上二种主张文字上虽稍异,实质实是一致。

于是主席又说：主张用‘促社会进化’的起立！起立的如下：李承德、周惇元（二人）。周惇元声明云：我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促社会进化’两都赞成。此外声明不作表决者有邹半耕、张泉山二人。（目的问题解决）

讨论方法问题：

‘达到目的须采用甚么方法？’

首由毛润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议。并云：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 1、社会政策；
- 2、社会民主主义；
-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于是依次发言（此时陈启民到会）：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润之：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任培道：我也赞成何毛二位的主张。但根本着手处，仍在教育，如人民都受了教育，自然易于改造。

陶斯咏：从教育上下手，我从前也做过这种梦想，但中国在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我的意见，宜与兵士接近，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实行急进改革。

陈启民：赞成俄国办法。因为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提出改造方法，只有俄国所采用的办法可受试验的原故。其余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等，均不能普遍的见诸施行。

易礼容：社会要改造，故非革命不可。革命之后，非有首领专政不可。但专政非普通所谓专政，要为有目的专政。但在今日要有准备，要多研究，多商量，不可盲然命令别个。

易阅灰：声明对此无研究。

邹半耕：理论上无政府主义最好，但事实上做不到。比较可行，还是德谟克拉西。主张要对症下药。时间上积渐改进，空间上积渐改进。物质方面的救济，开发实业。精神方面的救济，普及并提高教育。惟教育如何增进速效？实业如何使资本不集中？尚是问题。

陈章甫：从前单从平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另一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波尔塞维克主义。

张泉山：第一步采过激主义，因俄国人的自由因平等而牺牲，所以第二步要采用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

陈子博：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

钟楚生：主张过激主义，中国社会麻木，人性堕落，故须采过激方法。中国社会无组织，无训练，须用专制。但往后宜随时变更。

贺延祐：主张推翻一切资本家及官僚。

彭荫柏：相信多数派的好，采革命的手段。吾人有讲主义之必要。讲主义不是说空话，中国现尚无民主主义，但这主义已过时不能适用。不根本反对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是主观的，天下不尽是克鲁泡特金、托尔斯太也。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试以中国的国情与德英美法各国逐一比较，知法之工团主义，英之行会主义，美之I. WW，德之社会民主主义，均不能行之于中国，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亦不必抄袭过激主义，惟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也。学会中宜有一贯精神，共同研究，较为经济。

熊楚雄：主张现在只要破坏，不要建设，不必言主义，只做破坏工夫。

刘继庄：于主义无研究，不谈。赞成熊君破坏说，惟建设亦须预筹。

李承德：对于采用俄国劳农政府的办法非常怀疑，主张用罗素的温和办法，先从教育下手，作个性之改造。俟大多数人都了解，乃实行全体改造。

周惇元：无政府主义不能行，因人性不能皆善，中国目下情形非破坏不行。惟于过激主义不无怀疑，束缚自由，非人性所堪。宜从教育入手，逐渐进步，步步革新。吾人宜先事破坏。破坏后建设事业宜从下级及根本上着手。

陈启民：言教育，言实业，须有主义，须用劳农主义。诊病须从根本入手，一点一滴，功迟而小。

循环讨论后，相与自由讨论。彭荫柏谓：一点一滴的改进，亦须趋向共同目的。任培道赞成陈启民诊病须从根本入手的话，惟谓病后宜有补剂，教育其

补剂也。邹半耕仍反对改造说,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言,谓人有人心道心,不能尽善,故须点滴改革。何叔衡云:建设亦须随时着手,随时变更,意不赞成熊瑾玕单要破坏之说。又云:不必说主义,但要人人作工。毛润之谓:人人做工,就是一种主义,所谓泛劳动主义。周惇元不赞成泛劳动主义,谓劳农势力之下,摧残天才,主张须有从事科学艺术之自由,不必人人作工。

方法问题讨论至两点钟之久,主席付表决,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何叔衡、毛润之、陶斯咏、易克穉、易礼容、陈章甫、张泉山、陈子博、钟楚生、贺延祐、彭荫柏、陈启民。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二人:任培道、邹半耕。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李承德。未决定者三人:周惇元、刘继庄、熊瑾玕(方法问题大体解决)。”

以上历史文献载明,新民学会宗旨的根本转变的关键在于它的组织者毛泽东和蔡和森的倡导。

(二)

记载毛泽东与蔡和森完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从而决定新民学会具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前身的性质的最重要的文献,是由蒙达尼会议到长沙会议讨新新民学会宗旨问题而形成的下列二封通信:

甲、1920年8月13日,蔡林彬(和森)给毛泽东信;

乙、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蔡林彬、萧旭东并在法诸会友信。

《甲信》中提到“来法会友上月在蒙集议一次,详情子升报告”。信中蔡和森告诉毛泽东,说他“现收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正在研究:“(一)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三)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四)俄国革命后之详情”。他正在就这四方面的问题,“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

信中说:“这四种东西,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此外。”“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

‘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

‘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

‘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所以我对于中国的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我想编的“四种利器”，亦是我这一回要与你具体商量的。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

信中还详析了中国政局的发展趋势——组织革命党的方法——他在国外拟“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酝酿”，情况——共产国际兴盛的情况——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中国革命的阻力比俄国大等等。信中强调：“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

要成立中国共产党，他看到：“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

《乙信》的内容有序文及（一）学会方针问题。（二）方法问题。（三）态度问题。（四）求学问题。（五）会务进行问题。（六）同志联络问题等部分组成，此处只摘其第（二）部分：

“（二）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甚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

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而和’。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升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敢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他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他相等的一力去抵抗他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他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他，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那有回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

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一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称帝。有袁世凯失败了,偏又有段祺瑞。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他打回,有几句俗语:‘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以上是第三层理由。再有一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这难以终其局。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亡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饭;(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于免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的。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毛泽东对于蒙达尼会议争论所作的这个决断,支持了正确的意见,团结战友走上正确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重要的贡献,其历史意义之巨大,是无法估量的。

(三)

新民学会会员“……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诸论,作成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说明学生是很崇敬先生的。毛泽东就曾说过: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西行漫记》第一二一页)

但是这里必须补充另一方面:先生更加崇敬学生。杨怀中先生,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接之地……人多务农……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务农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一师学生驱张干(校长)的学潮时,学校当局要开除毛泽东,杨怀中愤愤不平,在课堂的黑板上写下“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以示抗议。毛泽东就是他心目的“拄长天”的“大木”。他逝世前还写信向章士钊推介毛泽东和蔡和森,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说明他是一位眼力非凡、善识人才的教育家。

157

当然,毛泽东、蔡和森他们的超人“资质”乃是来自超人艰辛的刻苦求索。他们在一师求学时,即都是具有相当渊博学识的青年思想家了,他们是怀着一颗火热的救国的心,纵观博览,淘汰百家,艰苦跋涉,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说他在一师“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西行漫记》第一二二页、一二五页)但是他们抛弃了那些认识的不实之花,而找到了认识的长青之树。毛泽东重笔写下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给蔡和森信》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蔡和森重笔写下了“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

唯物史观

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的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给陈独秀信》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中说：“在上一世纪四十——九十年代这大约半个世纪期间，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以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检查成败原因，参照欧洲经验，终于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到：“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接着，毛泽东详尽地讲述了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的艰苦历程。当然，这些都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师”们所不屑一顾的——不过应当补正说：这些定将彪炳史册，是他们抹煞不了与不敢仰视的！

秋收暴动文献巡礼^①

孙慧娟

本文是作者关于秋收暴动档案文献的杂记,其中有馆藏情况的简介,有对若干文献的论疏,还有对一些史实的考据。为了纪念秋收暴动60周年,不揣浅陋,不避芜杂,希望能从档案工作者的角度,为利用者作一向导。

秋收暴动的档案文献是比较多的,主要见于1927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刊物《中央通讯》(又称《中央政治通讯》)各期,其中1927年《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二期又是《湖南秋收暴动专号》。

中央档案馆在1982年3月编辑,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秋收起义(资料选辑)》,该书一共编入了31份文件(包括附件),可以说《中央通讯》所收材料都编进来了。这里有必要把该书目录摘抄如下。

- (1)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1927年8月3日)
- (2)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 (1927年8月5日)
- (3) 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通过)
- (4) 中共中央给前委的信
——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 (1927年8月8日)
- (5)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
——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 (1927年8月9日)
- (6)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关于湖南秋收暴动办法 (1927年8月19日)
- (7)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 (1927年8月20日)

^① 此文曾刊于《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4期。

兰台稿存

- (8)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
——关于暴动问题 (1927年8月22日)
- (9) 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 (1927年8月23日)
- (10) 中共湖南省委来信 (1927年8月30日)
- (11)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 (1927年8月)
- (12)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 (1927年8月)
- (13)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
——对湖南暴动应注意几个问题的指示 (1927年9月5日)
- (14) 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
(1927年9月12日发表于《中央通讯》)
- (15) 中共中央给鄂北特委的信
——关于秋收暴动 (1927年9月13日)
- (16) 湖南马××报告 (1927年9月16日)
- (17) 苏先俊报告
——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 (1927年9月17日)
- (18)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
——关于执行长沙暴动计划问题 (1927年9月19日)
- (19) 林育南报告
——赴湘经过情况 (1927年9月22日)
- (20) 何资深报告
——湘北暴动的独幕剧 (1927年9月29日)
- (21) 任弼时报告
——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 附：湘省今后工作计划
(1927年9月27日)
- (22) 邓××对于醴陵暴动经过的报告 (1927年9月)
- (23) 任弼时报告 (1927年10月4日)
- (24) 湘省目前农民运动(农村暴动)行动纲要
(1927年10月5日修改发出)
- (25)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 (1927年10月8日于武汉)
- (26) 余洒度报告
——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
(1927年10月19日)

- (27) 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 (1927年10月下旬)
- (28) 平江报告
——暴动之经过与现状 (1927年9、10月间)
- (29) 中共中央致两湖信 (1927年10月29日)
- (30) ××关于安源近况的报告 (1927年10月)
- (31) 秋收暴动之始末(节录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二

这里我们首先对上述目录的第七个文件作一些说明。这个文件的标题为《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是不确切的。按我馆1983年6月编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对此文件的作者已经作出了判定,该书在题注上说:“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周恩来同志讲到1927年11月扩大会议时,毛主席有以下的插话:‘我在长沙发了一封信向中央提议:国民党的旗帜不要了,要共产党;不要国民革命军,要工农革命军;不要国民党政府,要工农革命委员会。’从中央文件上看,‘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已回湖南工作。本文的内容是与毛主席在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讲的符合,据此判定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的信。”

据作者所知,这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中仅存的两个文件之一,可惜这已不是当时他那封信的全文,而是经过删节的一个文件。此件最早见于《中央通讯》第三期,它是作为8月23日《中央复湖南函》的附件刊出的,当时刊出的标题就叫《湖南致中央函附(八月二十日)》。当时中央只把毛泽东的信中第(三)和第(四)两个问题摘出,是当作错误用附函的形式加以纠正,所以此信就残存下这样一部分。

三

关于秋收暴动的旗帜问题。1927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下。”(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着重点是原有的)上述毛泽东8月20日信件的第(三)部分,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说:“某同志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

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

当时中央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在其8月23日的复函中继续坚持政治决议案的精神:“政权形式,已在政治决议案中说明,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但不是照以前那样的工农赞助国民党。到了第三阶段才是国民党消灭,苏维埃实现的时候。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中央从各方面来证明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我们务须依此决议执行。”后来由于实际斗争和党内许多革命家的推动,1927年9月19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对此问题作了修正:“最近几月的经验(包括南昌军队中的暴动与两湖广东革命的农民暴动的爆发)指示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已经很快的把国民党变成政治的尸首,形式上国民党现在正经过分化堕落的过程。由其腐烂的尸体中产生出赤裸裸的军阀专政。所有共产党员的努力,打算创造秘密的革命国民党的组织,或稍为团结左派分子,一直到现在尚无成绩之可言,在别一方面呢,以前国民党在群众中的革命威信,已因资产阶级军阀之到处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实行流血屠杀、恐怖与压迫而消灭了,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可见土地革命的急剧的发展,已经使一切动摇犹豫的上层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战线。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

(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着重点是原有的)

四

上述毛泽东8月20日信件的第(四)部分讲的是土地问题,它的全部内容:“土地问题: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五人来省)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般解决。昨日与乡下来几位农民同志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大要是:(一)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二)土地分配时由区协命令乡协按户造册,造好交于区协由区协按册分配土地。(三)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于人口少于土地之乡。必如此而后分配略得其平,至于甲区移住乙区暂不可能。(四)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缺数字),办法分为……………(中略)四等:一等收百分之四,二等收百分之三,三等收百分(缺数字)等收百分之一。此草案昨日虽在省委会讨论一次,尚待多征询农民同志意见,然后再请兄处作最后之决定,兹先将草案录上借供讨论资料……………(下略)”。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的复信说:“土地问题,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没收小地主土地’的口号不提出,但我们不要害怕没收小地主土地,革命发展到没收小地主时,我们要积极去组织领导,其结果仍是没收一切土地。不马上提出这一口号,只是对小地主的一种策略,在没收地主土地的过程中,对于自耕农的土地不免有打击,我们也不避免这种打击,但我们更不要提出‘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口号,我们目前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之下进行革命,一旦地主阶级消灭的过程中土地国有只是一种法令问题而已。对地主家属则以能耕者给田,不能耕者则没收为原则,土地没收后由革命政府宣布简单的田税税率法(累进的田税,至多不超过收入百分之三十),每乡区提出救济贫民的基金(包含地主的老弱家属)。”

以上两个材料说明,当时我们党的土地政策是正在酝酿和形成过程中,这两个材料所讲的“自耕农”都还没有把富农和中农分离开。但是中央信中指出的“不要提出‘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口号”,当然是较为正确的。可是这里还需清楚,毛泽东信中所说的“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并不完全

是毛泽东的意见。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1927年10月8日《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就可明白。这个报告里反映了1927年8月18日省委会议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省委委员中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所列毛泽东的全部意见为如下四点“（一）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甲、泽东的意见：一、没收土地必有没收的对象，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二、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革命委员会（我们的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将全部办法，要农协或革命委员执行。三、这个没收土地的政纲，如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因此，主张在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及老弱的地主，应由农协在农业税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平均分配给此等分子。四、宣布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苛税，征收农业税。”这里，毛泽东并无没收自耕农土地的意见，并且彭公达的报告中还明白说明要没收全部土地包括自耕农的土地乃是另外一位委员的意见。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此点是需要搞清楚的。

五

关于湖南省委改组问题，人们通常说毛泽东和彭公达到湖南改组了省委。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所根据的，因为“八七”会议以后，中央确实给了毛泽东同彭公达一起改组湖南省委的任务。（此事详见1927年8月9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的最后列了三条：“1、由泽东、公达负责与湘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2、新省委以九人组织之，九人不限定都在长沙。九人中至少要有三个工农分子，三个工农运动的负责同志。3、中央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

可是具体而微的历史实际并不是这样。请看1927年10月8日彭公达给中央的报告：“公达十一日回湖南，泽东十二日在汉动身，约定十三日到长沙，十五日召集会议。后因泽东同志十三日没有到长沙，会议的时期改为十六日。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都齐全，惟泽东一人未到。当天本想停止开会，俟泽东到再开，因为时局紧张，召集一次会十分困难，到会的人均主张即日开会。改选的结果报告泽东，征求他的同意之后，再报告中央，当日除报告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及讨论后，遂改组省委。”

六

秋收暴动的计划,对革命形势是作了客观分析的。它要求在湘粤鄂赣四省举行暴动“他至少要动摇反动的旧军阀的政权,在湘粤则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的前途”。它对四省的要求各有所不同,在鄂它的要求是“政治上给现统治者一个扰乱,使其不能稳定,牵制其对江西压迫”;在湘它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并特别作了组织上的准备,成立了特委:“湘: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导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在赣它的要求是:“……夺取乡县政权”。在粤,它是设想南昌起义的部队要打过去的,所以它说:“革命军所占地方,原则与江西相同。军方暂未达到地方即起来暴动响应,夺取乡村政权,建设农会威力,并实行土地革命政纲。如有可能立即夺取县政权,用以引导革命政权夺取全省”。(上引材料均见《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165

从许多文献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秋收暴动计划中有他自己的特别强调的一个侧重点,就是要抓枪杆子,要准备部队这个农民暴动的杠杆和支柱。他征得中央的决定,从南昌起义的部队中抽出一团或二团的兵力参加湖南秋收暴动:①1927年8月8日《中共中央给前委的信》:“同时决定由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受前方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并供给相当的弹药,党内由泽东、郭亮、夏曦、卓宣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泽东为书记,在湘省委指导之下主持之,同时与前委发生关系。除派泽东克日动身往湘南工作,望兄处即遵照此信抽调兵力交郭亮即日率领前往目的地为要”;②1927年8月9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央又决定从南昌暴动的军事力量中抽调一团或二团交湘南特别委员会指挥,集合湘南现有的工农军等,夺取郴、宜、汝一带,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省农民暴动,规复全省政权。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③1927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这个文件是由毛泽东提出,经过中央常委通过的,这个文件不长,它的全文是:

“(一)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

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

- 1、使唐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
- 2、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
- 3、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

(二)军事方面：

- 1、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
- 2、浏平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
- 3、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

右三部分共兵力约一师，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

(三)湘南须受江西革命领导机关的指挥，革命的粤政府成立则受粤政府指挥，并供给其需要。中央应命令江西方面执行此计划。

(四)党的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

这些文件都说明毛泽东当时是极力想抓住几个团的兵力来作为农民起义的杠杆的。

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还包括有组织长沙暴动，《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言之甚详，这里也反映了毛泽东坚持依据实际情况制定计划的可贵的精神。报告中说：“湖南的秋收暴动计划，在开始是想鼓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暴动势力的发展，实行党的土地政策及夺取政权。暴动区域的划分为：一、湘中以长沙为中心；二、湘南以衡阳为中心；三、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四、在西南之间的要冲是宝庆。宝庆也是中心地点。四个区域虽然已经划分，但是要实行发动便困难，如人力、财力等。以后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

附注：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其时仅公达一人主张湖南全省暴动，并要泽东即去湘南，当时因想在长沙即刻举行一个暴动，于是没有坚持下去。”

历史确定是平行四边形的合力线，各种力量的交叉是十分复杂和难以预

料的,实际的历史事实是南昌起义的部队没有能来得及分兵支持湖南暴动,再加上多种因素,秋收暴动的计划没能实现。

七

湖南秋收暴动的经过,在彭公达的上述报告、以及《苏先俊报告》、《余洒度报告》、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等文件中,言之甚详,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引述了。但是有一个事实在这里可以说一下。我们读《余洒度报告》看到有这样的文字,就是关于秋暴失败后,毛泽东收集残部向井冈山进军的情形,报告上说:“(十)在江西之莲花县集合部队,尚有枪七百余,人六百。度即提议缩小范围,改为一团,以陈浩为团长。由前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指挥一切。(十一)军至宁同县,有同志袁文才率本地农军二百余,战斗力不弱,我部以枪不能动,乃送枪一百枝交袁同志收用,以为将来扩充农民自卫团之用。”《苏先俊报告》上也说:“九月七日接安源同志通告湖南革命委员会已组织成立,并决调各处军队进攻长沙,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即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泽东同志为书记,先俊等为委员。十一日修水第一团及新编之第四团向平江进发,第三团向浏阳前进,安源、醴陵部队向老关进攻,十二日第三团击败浏阳之敌后,即驻东门市。安源部队攻破醴陵后复于十六日进占浏阳城。湘东各处敌军皆纷纷退却。诘意第一团忽为假意输城之第四团击败,第三团亦受挫于东门市,军威因是不振。一、三团败后,入驻浏阳之安源部队乃孤立无援,四面受敌,十七日为敌袭击,竟致溃不成军。是日前敌委员会会议决退往湘南,二十四日抵芦溪(距安源三十里)宿营。因军事长官之疏忽,侦探不力,翌早出发为敌人追及,计是役损失步枪二百余,死伤同志数十,卢德铭亦失踪。芦溪败后即经莲花退往宁冈县属之龙头市,该处计有农军五百左右,领袖为王佐、袁文才二同志,名称则暂用中央直辖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第一、二营。该地多丛山峻岭,袁、王二同志熟习绿林生活,逆料不至为人所灭。”

上引两个报告也列袁文才、王佐事,又按我们读“八七”会议记录,在改组政治局时,毛泽东同志说:“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当罗迈提出“赞成加入东取消自己”时,毛泽东又说:“不同意迈的的提议,自己非外面去作工不可。”

毛泽东何时担任土匪工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他带领秋暴残部上井冈山,很快就同袁文才汇合,说明他对袁文才和王佐是早有了解和早有工作的。

八

秋收暴动失败的原因至今仍是议论纷纭的问题。当年有个国际代表马也尔,他把主要的原因归结到省委的领导上,他大发雷霆,要求中央“(一)派一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此地的工作;(二)中央决议严格的指出省委的决议是背叛的,临阵脱逃的;(三)派来的中央委员实行改组省委。”于是中央派了任弼时到湖南去处理这个问题。任弼时是体察实际情况的,他没有立即改组省委,也没有急于作出结论,他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当与省委讨论停止十六号暴动时,省委承认未定十三号发动是错误,而不承认停止十六号的错误,关于此一问题只好留在将来中央从长解决好了。错过了时机固然是长沙暴动未能成功的原因,但是没有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暴动,如鄂南农民一样,实为整个暴动失败的极大关键,”所以他说:“中央政局根据马也尔的报告,所决定的湖南工作方针是要苏、余继续向长沙进攻。长沙立时举行暴动,但至我抵长沙时,株萍路方面完全失败。平、浏已不在我们手握……,并驻有重兵。长沙城内据省委报告有敌军九千余人,约六千五百余枝枪,且军队布置非常严密,四郊农民又未发动,城内我们只有千余炸弹(因三分之二已用去炸铁路),且只半数能用(其他因使用不便,现正改造),另盒子炮二十枝,能起来参加暴动的,群众连同志共计只有千人左右(所谓三千战士,两千还须靠四郊农民暴动起来时方能起来)。湘西株、萍农民一时不能发动,湘东在初失败之后亦难立时反攻。此时长沙的暴动必大遭失败。因此,我与马也尔商量结果是:长沙暂不举行暴动,铁路破坏亦暂停止,目前须加紧城内及四郊暴动和铁路上破坏工作的准备,在湘西、湘南发展农民斗争,组织带游击性质的农民军,捕杀土豪劣绅抗税等,以鼓起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夺取土地与政权的暴动行动”。

关于秋暴失败的原因,毛泽东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结论。这在《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中有所记载:“泽东和礼容的意见: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就强调的提出来了,在秋暴中它的真理性得到了证实,当然它在中国革命的曲折的斗争中,一再得到证实。

张国焘被捕叛变问题的材料^①

耿仲琳 孙慧娟 荐稿

《中央档案馆丛刊》本期集中刊登有关张国焘被捕叛变问题的三部分材料,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老干部的欢迎。因为它可以使我们非常具体地了解张国焘是怎样扯谎的,从而对张国焘有一个深刻的而非肤浅的、本质的而非现象的了解。

第一部分是张国焘《我的回忆》的第七篇“五个月的监狱生活”,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1月版。第二部分是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叛变的档案材料,基本上按照《历史档案》(季刊)1981年第二期所载档案刊印。此次转载,又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我馆保存的档案原件作了认真校对,并刊登其中三张档案原件照片。第三部分是于吉楠编著《张国焘和〈我的回忆〉》的第五节“被捕入狱,出卖党组织”。

170

第一部分 五个月的监狱生活 (原载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一章

被捕后第一道鬼门关

1924年5月21日,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被捕入狱——几乎丧失了生命。这件事我虽事前获得消息,但疏于戒备。这种对于自身安全大意,而闯了

^① 此文曾刊于1987年10月1日出版的《中央档案馆丛刊》第5期。

大祸,似也是我充好汉爱冒险所应得的处罚。

我回到北京的当天(5月20日)下午,首先晤见李大钊先生,告以扩大会议的经过。他一面紧张的处理他的事务,一面打断我的话,郑重其事的告诉我,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勤先生今天上午通知,北京军警当局已拟定了一张即将逮捕100多人的黑名单,其中第一名是李石曾,第二名是他自己,第三名就是我。他表示他正在作必要的准备,要我赶紧回到自己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将文件收拾一下,从速躲藏起来。

他向我说明北京当局将大捕革命党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国共两党活动的扩张,反对曹锟贿选,以及打击整个北京政府的言论和行动,早为当局所嫉视。北京的民众运动、铁路工人过去的罢工和现在的活跃,都被认为是我们这些人干的;而我们又是国民党公布出来的中央委员。再则5月15日发生了外交总长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①,这虽与国共两党毫无关系,但颀颀的当局认为国共两党素来反对顾的对俄政策,因而判定这一炸弹案也是国共两党所为。于是,大捕革命党人的行动就如箭在弦了。李大钊先生虽催着我去准备一切,但他根据王法勤的消息,也很镇静的预料总还有两三天犹豫时间,北京军警才会动手。

我离开李先生的办公室,便到铁路总工会的秘密办公处。我先接见了好几位从各处铁路来的工人同志,解决了他们来接洽的事务;分别打发他们于当晚或翌晨返回各人原工作的地方。接着,我才向同事们宣布李大钊先生所说的紧急消息,要各人分别准备。于是各重要职员们都分途去藏匿;名册和其他重要文件也都运走了;只留下彭永和、李斌两人负责驻守。

我回到达教胡同我自己的住所已是晚间十一时了。在这座四合院的公寓中,我们夫妇住的是两间坐北朝南的正房。我的太太杨子烈是与我于1924年2月间新结婚的。她是1921年在武汉加入中共的最初女党员之一,这时她在北京担任《新民国》月刊的校对和发行工作。我们住两间房,一间是我们的住室,另一间就是这个月刊的发行处。我的太太就经常在这里办公。在这间办公室里,堆满了各期的《新民国》月刊,以及各种与发行工作有关的文件。她听了黑名单的消息,一时觉得无从收拾。

这座公寓的南屋住的是高尚德,西屋住的是范鸿杰。他们两位都是中共北京区委委员。我旋即与他们两位商谈有关黑名单的事。他们已经知道,并已作了必要的准备。但仍暂住在原处,因为他们用的是假名字,军警不容易发现。他们也预料实行捕人将是两三天以后的事;到那时再行躲藏不迟。他们

主要是为我这个军警心目中的“要犯”担心，希望我明天能够摒挡一切，离开这个住所。

于是我和我太太忙着烧毁重要的名单和信件。可是，我们这两间房里堆的文件确实太多了，一时清理不完。而且，夜已深了，人也累极了，心理上还相信有明天可以继续清理，所以在烧了一部分文件后，也就睡了。

谁知这次警探们的行动比我快了一步。第二天天色还没有亮，我的住所和铁路总工会的办公处同时被大批警探包围。公寓的掌柜来敲我的房门，我从梦中醒来，还以为是预定今早回去的铁路工人有急事来找我。我打开房门，警探们一涌而上，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说明原委，便把我和我太太都逮捕了。

警探们在我的房间内翻箱倒篋，检去大批文件。他们的言语态度极其粗野。我太太气得高声斥责他们是“土匪强盗”，没有经过法律手续，便乱捉人，乱拿东西。我悔恨自己的大意，更深恐牵连到同住的高尚德、范鸿杰两位同志，因即示意我的太太不要再讲，以便早点离开这里。幸好这次高范两位没有受到牵连。我们被押上一辆囚车，驰往前门外的警察厅侦缉处。

这个侦缉处是北京城内著名黑暗的捉人机关，处长高某是跟随曹锟多年的马弁出身，能直接向曹进言。他是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谈吐举止粗野不堪。看来，他似乎不识几个大字，更不懂甚么叫法律；而满面烟容，显然是一个吞云吐雾的老手。副处长姓张，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儿，与高某比较起来，谈吐文雅，容态慈祥，倒像一个读书人。那高某把他当作“绍兴师爷”，有点颐指气使；不过对于他的意见，似乎也不得不尊重；大概因为高某自己实在太无用，不能不依靠张老头儿的笔墨。因为重视我们这个案子，正副两处长亲自来审讯。

与我同时被捕的，除我太太之外，还有驻守铁路总工会的两位干事。彭永和是学生出身，主管收发工作，为人沉默寡言。李斌是石家庄的铁路工人，在总工会中管理庶务，经常是伙夫装束。还有《新民国》月刊的主编范体仁也被捕了。我们五人以我的情节最重。他们首先将一副九斤重的对付死囚的铁镣将我双脚扣住；关在一个侦缉班的屋里。其他四人则分别囚在别的监房。

审讯由当天正午开始。他们着重问的是有关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这件事是我到上海去以后才发生的。当作礼物被送到顾家去的木盒子，经他的仆人打开后，炸弹虽然爆炸了，但遗留下来的有木盒碎片和一些包裹的纸张，以及纸张上所写的字迹。他们就企图从这些木片、纸张和字迹中找出犯罪的

证据。

侦缉处承办这件案子，首先就假定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干的。他们根据这个假定，侦查的结果，发现我恰恰在此时到上海去了，因而怀疑是我干的。他们伪造了一些木片和纸张，硬说是在我住房里搜查出来的。他们从我们五人住所中所搜出的文件，去核对炸弹包裹上的笔迹。

我寄押的房间中住了一组 12 个人的侦缉班。这些侦探都能阅读报纸和写简单的报告，似是侦缉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他们佩带短枪，日夜监视着我，但也与我攀谈，企图找出我犯罪的一些破绽，特别要我写这样，写那样，那个拿个白纸扇子，要我题字；那个又来问我某某成语如何写法。但他们这些企图，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在第一天就泄露，在这次搜查中没有发现和炸弹包裹上同样的字迹，使他们甚感苦闷。他们又透露，他们所以如此热心的侦察，是因为顾维钧出了十万元的赏格来破案。

那天，审问开始时，处长高某首先问我：“这些木片是放在你床下的吗？”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这一类的木片。”他又问：“这些纸张是在你桌子抽斗中找出来的，是吗？”我看了看那些纸张，又回答说：“我抽斗中从来没有这些纸张。”接着，他拿着许多被搜出的文件，一件一件的问我，是甚么人写的。我都答以“不知道”，或者说：“写字的人已签有名字在上面，你们可以自己看。”

他们这样漫无目标的乱问下去，我有点不耐烦了。我反问他们：“你们问这些不相干的话，到底是甚么意思？”那个粗野的高某便拍案大叫：“你这个‘乱党’，反正是该死的。现在又犯了炸弹案，还不快招吗？还要我们费事吗？老实告诉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早点招免得吃苦，你自己瞧着办吧！”

他们企图从我口中逼出有关炸弹案的的口供；我却乘机向他们解释，我说明我根本不赞成暗杀，因而决不会做这类的事。我也告诉他们，不仅我个人如此，国民党和共产党人都是不赞成暗杀的，黄复生、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已过时了；我还讥笑他们的假设是走错了道路。

这样审问下去，情况似乎逐渐对我有利了。他们当初怀疑我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后才离开北京的；但从搜出的文件和我所提出的证据中，证明我离开北京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前约一个星期。侦缉处虽然伪造了木片纸张等无关重要的证物，但始终无法伪造我和同志们的字迹，也问不出那里来的炸弹和谁是送炸弹的人。这使他们觉得对付这些社会上有声名的知识分子，究竟证据不够充分，不能强加以罪。

但那位高某显然十分热衷于十万元的赏格，没有证据也想打出一些证据

出来。他许多次都大叫要用刑；最严重的一次，是将我勒跪在一堆铁链子上面，大约有半小时之久；跪得我满头大汗。左右还站着几个法警，拿着很粗的木杠，准备将我的双脚压住，让我尝尝“踩杠子”的苦刑。我只有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那高某逼不出口供，不停的恫吓，怒目高叫：“你这小子，还充好汉。马上一踩杠子，就要你的命了。”

可是，高某的满脸杀气，阻不住他鼻腔中流出的鼻涕；审讯的时间愈长，他愈无法支持；原来他的鸦片烟瘾愈发愈厉害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副处长便乘机请处长休息，改由他继续审讯，高某虽说还是满口粗言秽语，却身不由主溜到后面去了。张副处长看他去远了，便对我说：“你跪着不好说话，起来罢！好好的直说！”于是，由两个法警扶我立起来。我受此刑辱，愤怒万分，仍是一言不发。张老头儿只好又说：“你去休息休息再说吧！”

每次审讯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高某至多只能维持一个钟头，就要回到他的鸦片烟榻上去；再由张老头儿接替审问。而张老头儿的精力也不够实施疲劳审讯，因为他究竟是上了年纪的人；所以审讯的进行，总是时断时续。张老头儿从未向我发怒，至多只是说：“好好向处长说，以免受刑。”我却乘机向他进行种种解释，他也老是静听着，不置可否。

这样，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们讯问的目标就转移了。他们不再问炸弹问题，转而问我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铁路工会中的活动。我不否认这些活动，但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于我的材料。我还向他们抗议，指出我做一个国民党党员、共产党员和工会职员，根本是不犯法的。他们对于我的抗议，避开正面答复。至此时，他们有点无精打采，似乎想草草结案。后来听说这是由于顾维钧受到不可借此陷害革命党员的警告，撤销了10万元的赏格，所以他们也松劲了。

第四天，侦缉处的审问结束，由张老头儿办理移送到警察厅中去的手续。高某已经看不见了，完全由张老头儿来处理，他对我的问话只是关于他在公文手续上所需要校正的部分。一切情况都显得缓和多了，而且张老头儿还有同情我的表示，颇出乎我的意料。

他首先表示我们这件案子的情形很严重，现在要移送到别的机关去办理；我假若能象这几天一样稳妥的应付，也许不会恶化。高处长是最性急的，我能在他手下逃过苦刑的折磨，实在幸运。他慨叹他自己年纪老了，一向信佛；对于案件的处理，总是慈悲为怀。他说到他有四个儿子在各大大学念书，其中两个还参加过五四运动，他们曾向他称赞过我是一个好学生，而且是五四运动的领

袖。他表示现在时代的确变了,年轻人的想法和年老人不一样了,他的儿子们也是如此。最后他向我暗示,炸弹案大概没事了,其他的罪名总较轻些。要我好好去为自己辩护。

我常看见张老头儿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早知道他是信佛的;现在听他说了这样一段诚恳的话,因而向他表示谢意;并指出这几天来,他是很爱护我的,屡屡苦心的为我解围。他叹着气向我表示,像我这样一个人才,原不应遭受这样折磨。国家的事没有弄好,不应该由我们这辈青年人负责。他直率的告诉我他内心的矛盾,他在职务上是要严格办我的,但为年轻人的前途着想,又不得不寄予同情;而且他老在想着他那四个与我抱着相似观念的儿子,和他们平日向他所说的话。他这样说着,不觉掉下几滴眼泪来。

至此,我也颇为感动,我们之间似乎已没有审讯官与阶下囚的分别了。我反而安慰他,称赞他的仁慈和见识。他最后表示,他不仅对我如此,即对与我同案的人犯,也是一样宽大。除了我的那位厨子李斌——李这时只承认是一个厨子——受过刑讯以外,其他的人都没有吃过苦头。他还进而告诉我,我同案的人犯在口供上都没有牵连别人,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今天晚间就要被送走了,总算渡过了这一道难关。

在张老头儿宣布侦查已告结束以后,这一班看守我的侦探们,便奉命为我除卸脚上的铁镣。我当时颇不愿意,想带着这根铁镣上法庭去,当作侦缉处虐待人犯的证据。经过那些侦探们说好说歹,而我在当时情形下也不能够坚持,便只好让他们卸了。那些侦探们最初将我看作是扔炸弹的乱党,类似江湖大盗;并不知道甚么叫“革命”。经过我和他们几天的攀谈,不仅我从他们口里获得一些对我有益的消息,而且也乘机给他们上了一次政治课。这一课的题目可以叫作:“甚么是革命党?革命党人是不可以虐待的!”这一课对于他们似乎是不无影响。后来,中共的许多被捕者,多少都利用到我这次的经验。

第二章

受军法审判

当天下午7时左右,我们这一案的人犯都被分别押解到警察厅。警察们又将我带到1919年6月2日我曾住过的那间监房。我心里正在想:“这是我旧游之地,”果然有一个看守走过来向我说:“你又来了!”我也回答他说:“你

还认识我吗？怎么这多年你还没有升官？”他望了我一眼，似乎有些难为情，没说甚么就走开了。到了10点钟的光景，看守又把我带到警察厅的大堂内，问官只点了我的名字，没发一言，就由大批武装警察将我押上一辆卡车，直开出警察厅。

这时，我心里有点恐慌起来。我想：“这不是验明正身，乘黑夜将我送去枪毙吧？”我不由自主的问我旁边的一个警察：“将我送到甚么地方去？”他回答说：“警备司令部，一会儿就到了。”

将信将疑之间，车子已停在我所熟悉的步兵统领衙门的旁门口了。这里原是满清时九门提督衙门，民国后改为步军统领衙门，警备总司令部也设在这里。直系巨头之一、以嗜杀革命党人著称的王怀庆那时做警备总司令兼步军统领，所有侦缉处和警察厅承办捉拿革命党人的重大案件，都由他指挥。我此时知道此行确不是即时秘密枪毙；但想到：4天来走遍了北京城内三个可怕的机关，不知他们将要如何摆布我？接着，我被押进了步兵统领衙门的老监狱中。

这是一座老监狱，还遵行着满清的遗规。在一盏高挂着的昏暗油灯之下，监狱的看守长和狱卒们特别认真的搜查我，我的裤带和衣服上的骨钮扣都被拿走了，手帕被分作四块才留给我用。他们这样做，虽然使我非常不方便，但也使我估计到他们是想长期拘禁我。这里看守的人，比侦缉处的侦探们态度上要善些。狱卒们告诉我，这是他们自己的住房，关在这里，算是优待我了，要我安心睡觉。

第二天清早起来，我发觉我果然在受优待。我可以在四周围着高墙的院子里自由走动，其他的犯人在规定的短时间内才有这种享受。我知道了这里是这座大监狱的一个小部分，名为“看守所”。这座建筑物的正屋是看守人员的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其余有大牢，有隔离监，有女监等部分。在看守所部分，我住的这间房子里有一个可以容20人睡眠的大炕，占了这房间全面积的三分之二，此外还摆着一张桌子，两张长凳和两张木板床，有4个狱卒和一个卫兵住在里面。他们都是旗人，多数是从满清时代便在这里当差的，其中有两人大约已经超过50岁了，其余3人也在40岁以上。在这所房间的左面，便是看守所的监房，约可容纳40人，囚禁的都是一些罪名较轻的犯人。监房的对面是一个比较小的房间。听说原先驻扎过一班卫兵，这时只住了一个50多岁的老兵。看守所的中央是一块院子空地，40个犯人在里面散步和吃饭，可不觉得拥挤。看守所的四周，都是坚实的高墙，经常关锁着的小门，其宽度仅能容一

个人出入,门外站着武装的士兵。在我的住房内,还有一个四方的小洞,通到监狱里面,这是看守所内狱卒与内面监狱办事人员联络用的。

我除了看见李斌被关在看守所的监房里外,从狱卒们透露的消息,又知道其余的同难者也都分途移送到这个衙门来了。我的太太被关在女监中,范体仁和彭永和似是被关在后面监狱的隔离监里。在上午7时以后下午9时以前,我都能在院子里自由走动,也可以和狱卒看守们任意攀谈。我很想利用这种自由与我的同难者取得联系。

我找着机会和那位刚直而朴实的工人领袖李斌交谈。我首先慰问他在侦缉处受刑的痛苦,抚摸他背上所遗留的伤痕。他告诉我,他一口咬定他只是被雇用的厨子,甚么都不知道,再受刑也不会改口的。在侦缉处时,他和彭永和对过质,彭永和是一个甚么也不知道的学生,并证实他确是一个厨子。我则告诉他,我除了有确实证据的以外,甚么都不承认,要他坚持原有的态度,可将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牢头看见我们说久了便起而干涉,李斌亲切的嘱我珍重,我则伸出大姆指,称他是条好汉,彼此就含笑分别了。

这个机关虽名为警备总司令部,实际还是九门提督衙门的底子,犹有深厚的满清遗风。衙门里的人们似多具有没落和消极的心情。那个高大个子的看守所长,看来活像一个王公大臣;他手里老拿着两个核桃珠子,不断的玩弄,;胸前配戴着一个漂亮的鼻烟壶,不时的给鼻子擦上一点。他踱着上朝的步伐,倒也十分有气概。但在办事上,除了捞几文之外,甚么也懒得过问。那些狱卒们谈起吃喝穿戴就很起劲;可是穷得要命,每人所穿着的百衲军服,还是由棉军服将棉花抽出而改制的。他们满脑子想法不外“有了皇帝,天下才会太平”。甚么“民国”、“国民党”、“共产党”、“军阀”、“总统”、“曹锟”等类名词,他们一概不感兴趣。我和他们交谈起来,有点格格不入;我最初还以为他们因受过训练,守口如瓶,后来,才知道他们根本甚么也不懂,实在无从谈起。

这个看守所内,经常关着三十名以上的犯人,其中大多数是小偷,其次是吗啡客。这里,实行用犯人管理犯人的制度;看守所内有三个带脚镣的重犯,他们就是犯人中一正两副的头目,负着管理犯人的责任。其中正头目比较自由些,有时他可藉口处理事务到院子来蹓跶一下并和我交谈。他是被处三年徒刑的。他觉得我比他大得多;因为我是一个“造反的软犯”,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犯人;其实,他也并不知道甚么是“造反”。要向他宣传一些革命的道理很是困难。不过我嘱他不要苛待李斌,倒确收了实效。

我在这“优待室”里住了五天后的晚上,才被提去审问。在一间摆着许多

堆满案卷的公文架子的办公室里，靠窗摆着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瘦长个子、三十多岁的军法处长，看来是一个无精打采的“纨绔子弟”（后来我知道他是满清的贵族，也抽鸦片烟）。台子上放着一大堆有关我的案卷，他在那里一面翻阅，一面用笔圈注，再慢吞吞的向我发问，态度倒也不很凶恶。我站在他的台子前面。两旁站着两个高大强壮的卫兵，但无纪录人员。

那个军法处长首先向我表示：关于我的案卷他都看过了。但他没有再提到关于炸弹案的事，翻看一卷案卷指着说，根据报章记载和搜获的文件乃至我在侦缉处的口供，都可以证明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问我现在是不是否认。我答以绝不否认，并引以为荣。他进而问我：国民党由那些人负责，做些甚么事等问题，我就概以“不知道”三字答覆他。他也不理睬我的答覆，声言政府对于这些事早已知道了，他不过照例问问而已。第二次的审问仍在夜晚举行，主要问的是有关中共的问题，他同样提到根据各种证据，证明我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是一个负责人。我也同样不否认，并声言这是光荣，而不是犯罪。他对于共产主义似乎知道得特别少，老在说甚么“共产公妻”，几乎使我发笑。这次审问，也和上次一样，他们一无所得。

第三次的审问主要是有关铁路工会的问题，他透露出在汉口破获了一个铁路工人的“捣乱机关”，捕获了杨德甫等重要“罪犯”。从那里搜获的文件中他们的口供中，证明他们的“上司”是“张特立”，现在从我的住所所搜获的文件中，又证明“张特立”即“张国焘”。问我有何话说。我答以“张特立”是我的别号，我是做着组织铁路工人的工作。他即将这一点记录下来。

在这几次的审问中，牵涉的问题很是广泛。有一次他问我，为甚么国民党和共产党闹得满城风雨？是不是因为俄国人或者广州的孙中山，拿出了大批金钱的原故？我答以这点我毫无所知，我只知道民国以来，军阀闹得乌烟瘴气，有志之士，本爱国天良，不得不奋起救国。他听了我这番道理，面露得色；也许他是怀着“没有了满清皇帝，民国到底弄不好”的心情，因而对我的说法，从另一个观点去寄予同情。

最后一次的审问，距离第一次已经两个多星期。这次是颇具戏剧性的。那个军法处长首先向我说，他有一件公文，其中的一段扼要的记着我的口供，现在念给我听，要我站得远远的，他捧着这公文对我念起来了。其内容大致是：“张国焘，别号张特立，年龄××，籍贯××，出身××，经历……系孙文乱党的中央候补委员，重要共产过激分子，非法铁路工人组织的总干事……历次聚众滋事……图谋不轨……以上各节该犯均供认不讳……”等语。他念完

要我在这个文件上打手模，我立即反抗，声言这个文件未经我看过，所念出来的部分，也完全不是我的话；我愿意自写口供，却不能打手模。

他见我坚决反抗，便向卫兵示意来强制执行；两个卫兵将我的两手擒住，我竭力挣扎反抗，表演了一个打斗的镜头；结果，我的两手被扭在身后，前胸则被推靠墙壁。那个处长走过来，在我右手的大拇指上涂上了一些墨，将那件公文在我的拇指上印了一印。当他们实施强制时，我曾高声抗辩：“强迫打手模，没有效。将来到了法庭上，我是要控告的。”

那个处长声言这不过是一个照例的手续，现在审讯终结了；并声明这里就是军法的终级审判，不准上诉。我于是连声问他：“我究竟犯了甚么罪？”他怒声回答说：“你犯了内乱罪。”我又追问：“甚么叫内乱罪？”他一面向我高叫：“内乱罪就是内乱罪。”一面对那两个卫兵说：“把他带下去！”我被带出这间房门时，他又命令他的侍卫，将我的太太带来，与我见一面。不一会，两个女看守挟持着我的太太来了。她站得远远的，不准走近我，也不准交谈。只见我的太太泪痕满面，我则悲愤交集，一瞬间我们便分别被押回监房去了。

我回到看守所以后，满脑子都是一些“内乱罪”、“强迫打手模”和与我太太不平常的会晤。我推想这些都是置我于死地的象征。无疑的，内乱罪就可以判处死刑，如今又要我太太和我一晤，更似刑前的诀别。我推想我的脑袋有点靠不住了，但其他的同难者或可幸免。我决意设法挽救自己，首先设计和外面通消息。我几次以重价托看守传递消息出去，但一直得不着回音。

在审问我的期间，李斌也受了一次审问，他背上又增多了用军棍殴打出来的伤痕。我百般安慰他，想尽方法为他医治。我也知道了他还是一口说定他是厨子，并未因受刑而改口，审问官似也相信了这一点。因此，我判定他可以先我被释放出去。我和他计议着，如果他能早获释出，所应做的事，特别是如何救助我和其他同难者。果然，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李斌被释放了。这使我有说不出的愉快。

我在优待室中不觉已经住了两个多月。离审问的结束也有六个星期；可是我依然未获一点确实的消息，实在闷得难受。我屡次向看守所长要求给我书看，也大吵大闹过，但总未如愿。我于是实行绝食，以示抗议。在绝食的第二天，看守所长来问明了我绝食的原因，就向军法处长请示去了。

这天十二点钟的时候，军法处长又提我去问话，他首先问我：“是不是看守所虐待了你？”我反问他：“不给我书看，难道不算虐待吗？”他接着故示和蔼的向我说：“你是一个内乱未遂罪的嫌疑犯，要想很快的被释放是办不到的，

你耐心一点吧！要看书嘛，我吩咐他们给你一些佛经的书看，但不准用纸笔。”

我这次的要求总算有点结果。第一，我知道我已不是内乱罪犯，而是内乱罪的未遂犯。看来情节轻多了，而且那个处长曾明白暗示我只是一时不能被释放。第二，我可以得到一些书看。我在推测这大致是由于我的同志们为我在外面做了不少的手脚。当天下午看守长果然送来一部‘聊斋志异’，我也就停止绝食。

我在监狱中的情况，显然是改善了。就在我停止绝食后约一个星期的时候，居然有一位同拘禁在这所监狱里的新闻记者刘某与我隔着墙利用那个小方洞交谈起来。他首先告诉我，墙两面的看守人员都已藉故走开了，无论甚么事都可以谈。他递给我一份旧报纸，要我看。这份报纸上记载着一百九十名国会议员为我们被捕一事向政府提出质问，并要求立即释放。我看了这个消息心情为之一振。

刘先生还很高兴的告诉我，我们的案子现在是没有事了，最初在侦缉处的四天，是最危险的阶段；被送到这里以后，也可能依军法判处死刑；不过这种危险现在确定没有了。虽然当局仍有永远监禁我的意思，但事情究竟好办多了；说不定在这里住上一年半载，便可以出去。他还告诉我，这些话是王法勤先生前几天要他转告我的，他今天才设法得着狱卒们的默许，利用这机会向我传达。

我除向他表示谢意外，并问他自己的处境。他告诉我他是因发表反曹锟的文字而被捕入狱的，已在这里拘禁了八个月了，最初也是要杀头的，后来也由于王法勤先生等的奔走，缓和下来；还不知道甚么时候才能释放。他也说到我和他彼此都是国民党的同志，都是由王法勤先生负责援救。王先生凭着人事关系，为我们奔走很是卖力。

关于我之终能转危为安的内幕，后来，我出狱以后，王法勤先生曾面告我，这并不是他所能为力的；而是齐燮元的一句话，无意中发生了效用。原来，当王怀庆捧着我在上面打过手模的公文去见曹锟请示处理办法的时候，曹锟说：“把他毙了吧！”适在座的江苏督办齐燮元要卖弄他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领，因而从旁插言：“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大嚷的；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痲死狱中。”曹锟听了这番话后，便改口向王怀庆指示：“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这是曹锟随身侍卫所传出来的话，也是我所以由内乱犯变成内乱未遂犯的重要根源。

第三章

狱中的见闻与苦思

就由于这个料想不到的因素，我们整个案子都轻松了。我的太太因为有病，由女监移送到了医院。彭永和也被释放了。我和太太之间可以由看守传递一些小说书籍，我们还可以用烧过的火柴杆子在书内写几句话，互通消息和互致问候，但我仍被严禁与外间通消息。我手头没有一个钱，我每天两顿所吃的除一大碗气味难闻的粗米饭和一根约小指般粗的咸菜而外，就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衣着就只有身上所穿的。这大概就是所谓“庾死狱中”的办法的实施罢！

但当时我的心情是安定下来了；日常生活上的困难，我也在设法克服，我与看守所的犯人们维持着友善的关系，他们每顿吃的是两个窝窝头，我常将我的大米饭和他们交换，他们很高兴。我这样时而吃饭，时而吃窝窝头，在口味上有了调剂的作用。我每天都能洗身，有时也能借得一条短裤换一换。

其他的犯人则与我不同，他们可以由他们的亲友送进来一些衣物和钱财；除衣物由各个自理外，钱财则都存在看守所长手中，随时领取，作购买食物之用；这也是狱卒们榨取油水的主要来源。犯人们向看守所长领取存款时，照例由看守所长扣去三成至五成，再由值日的牢头拿这剩下的钱去购买食物，他又必从中至少扣取三成；食物买好或做好之后，再分成三份，牢头们、犯人头目及出钱的本人各一份。因此，出大洋一元的犯人，实际只能得着价值约一角的食物。这几乎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狱卒们要按着这个规定调整一个秩序出来，以便他们各人所得的油水相等。

如果有几天没有油水可揩，狱卒们就用殴打犯人的手段来设法榨取。如果某一天购买食物的犯人很多，总数在十元以上，就能成斤的买来猪肉，成包的购买强盗牌香烟（经常是零枝购买的），那就是我们看守所大家高兴的喜事。这时狱卒们会认真料理这些食物，大家吃完之后，还要大加品评。

这个看守所的犯人是整天被关着的，不需做工；每天只轮着两个犯人打扫院子，卫生条件很坏，疾病也很多。监狱里还迷信不能捕杀耗子，因此，耗子多得可怕，每当我吃饭掉下几颗饭粒在地上时，耗子大军就从各个洞口结队的向目的物搜索前进；我睡在炕上时，往往从破烂纸糊的天花板上掉落一个或两个

互相打架的耗子来,有许多次竟掉在我身上。臭虫也特别多,我曾用十天的工夫捉了一小盒,成绩似不下于名记者邵飘萍②。蚊虫每晚都在奏着曲子,与害疟疾的犯人的呻吟互相呼应。

这个看守所简直是一个无人干涉的小偷养成所。原来犯人中的多数本是小偷,而其中多数的惯贼又互相认识;他们在一道,终日无所事事,只有研究偷扒的经验与技术;就是初犯的,经过他们的熏染,也就入了这一行成为惯贼了。有一次捉进来一个未成年的小偷,第二天便被其他的犯人殴打,在那里哭泣不已。在犯人们被放到院子里来作十分钟的散步的时候,我问这小孩的年龄,他说是十七岁,但正确的算法还不满十六岁,他这次因饥饿偷窃食物被判处徒刑一个月。当我问他为甚么被同监者殴打时,他说是他们逼他拜师父,他情愿拖洋车,也不愿干这一行。谁知那个脚带铁镣的犯人头却因此怒目相视,我只有转脸向他说:“怎么?你不喜欢我管这件事吗?你可不能打这个小孩子!”

这个看守所也是吗啡客经常出入之地,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或者几个被捉进来和被释放出去。这些被捉到的吗啡客通常总被判一个月上下的徒刑,但实际上往往不到三天就被释放了。这些人的景象实在令人可怕。满身都是注射过吗啡的针孔;发了瘾的时候,呕吐不已,声音十分难听,似乎就要断气的样子,我起初还以为这个衙门是基于人道观念把这些吗啡客提早释放,谁知却另有内幕。

我同房住的那个看守兵向我泄露了这个秘密。这个兵油子是十足的旗人模样,当口袋里有几文的时候,就换过便服,大摇大摆的去坐茶馆;多数的时间,总在那里哭穷。他告诉我,步军统领衙门在满清时是个肥缺,现在变穷了,收益都被警备总司令部和警察厅侵夺去了,只能偷偷摸摸的收些吗啡捐。大宗贩卖吗啡有的有日本人,也有本地“棍子”。由这些批发商转卖给分布在北京城内的许多吗啡馆,这个穷衙门就向那些吗啡馆收捐,表面上却还要表示禁卖。他指出那些吗啡犯三天就放走了,正是明禁暗捐的道理。如果认真禁止吗啡,或将这些吗啡犯都强制戒绝,那么,这个穷衙门就连吗啡捐这点油水也措不到了。

我听了他这些话,不寒而栗;我向他指出这是伤天害理的事。他哼着回答说:“伤天害理的事还多着哩!”等我要求再讲些故事给我听的时候,他又笑着说:“得啦!留着脖子多啃几天窝窝头吧!这个年头,我甚么都不指望,一心只想袋里有几文,在茶馆里一坐,喝上一壶香片,日子就混过去了。”这个兵油子的这段话,活活刻划出当时北京衙门的景况和多数人的心情。

我在狱里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耳闻目睹的事,却已不胜枚举。这对我来说,无异是一个重要的课程,我因此对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有了深一层的了解。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改革须要很大的工程和很长的时间,我进一步了解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以扫除这一切的龌龊,在中国是何等的迫切与重要。

不仅如此,在监狱里,不免使人觉得度日如年。我还不算寂寞,而是孤单,即每天所接触的人,与我很少共同之点,我不能向他诉说我心上的事。好不容易挨到了九月间,气温已是深秋了。那位曾和我秘密交谈过的刘先生居然被释放了;他在临走时;还和我殷殷话别。我为他的出狱欣慰,似觉得我这个政治犯也增了出狱的希望;但也有些难过,因为此后我没有了一个唯一可以谈话的人,也少了一个通消息的人。我脑海中更引起许多幻想,刘先生出狱了,我却不能,这必定外面不易援助,也许还要坐上几年。觉得如能在狱中念几年书,或可在学问方面得些成就;可惜我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小说书。我仔细一面回忆已往所做过的事和所阅读过的书籍,企图寻找出一些新道理来。

那看守所的院子,是日常踱步、做体操的地方。有时我会测验一下那围墙的坚实程度,或量其高度,或试听墙外的声音,或踩踩脚步下的地基。我想逃出去,因此曾想到挖掘地洞、冲出牢门,用计谋或硬打出去等等。这一切,无非是幻想,自然难于找出头绪,不过发泄一下作为一个犯人的愤恨和反抗的心情罢了。漫长的时间总在左思右思,最初占着首要地位的是我自己和我太太以及其他同难者的安危,其次是外面我的同志们和整个革命事业会因我的被捕受到可能的影响,乃至他们工作的进展估计等等。日子久了,甚么办法都想不出来,自然就慢慢转到如何利用监狱中的时间来锻炼自己的问题。在散步的时间内,往往想得头昏脑胀,有时摇头,有时做手势,甚至高声喊叫出一两句话来,引得旁观人的惊奇注视,以为是神经病发作了。散步累了躺在炕上,天花板就仿佛成了银幕,海市蜃楼和各种形象都会映现出来。晚上也老是不能成眠。梦魇往往随着那些幻想的形象而来。这样我才深刻体会到,一个人没有师友的切磋、图书的参阅、孤单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的痛苦。无法接触广大社会,个人的思想不免会乱杂无章,抛不开感情冲动,免不了顾此失彼,思想也就不成系统了。

我在狱中的思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

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要领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马林对我所使用过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足怪的；如果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实在是自己当时的过于天真。

184

我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国共合作这个紧急的当前现实。又想起我入狱之前在上海参加扩大会议的经过，陈独秀先生当时所表现的那种狼狈状态，国共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党外合作的主张再度提出等等。我为国共关系前途担心。我一直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在西湖会议时我站在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反对马林那种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去的主张。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反对马林那种取消中共的倾向，坚持中共须独立存在与发展。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一见到孙中山先生就提出允许多党存在这一根本问题。接着又提出改组后的国民党，既然包括形形色色的革命分子，党章就不宜规定得很严格，而应具有广大的包含性。我入狱前的种种事实，不是又证明我有先见之明么？

但我反过来一想，我内心是始终根本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既然如此，又为甚么不坚决表明，还要讲求妥协，惟恐伤害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共党内的团结，岂非不够坚强？又觉得仅仅坚持反对意见不够，还要有主张，要提得出一个清清楚楚的完整的方案。如是又继续想到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我为甚么不策划一套联合战线的计划、实行方案和未来发展等等，为甚么不和同志们多作研究，多发表一些文章阐明联合战线是惟一可行的方案之道理？但也想到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能折服马林，他在西湖会议时所持的坚强理由是联合战线之所以成为左倾空谈，首先因孙中山先生不会赞成；任何无视孙先生意向，而主张联合战线的议论，都没有效用。我悔恨自己为甚么

在西湖会议后也觉得少数中共负责人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形成联合战线的方式是可行的,而没有深刻意味到很可能会发展为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去的政策,这是何等糊涂?因而我更悔恨我失去了机会,如果我在1922年9月间在张继家举行加入国民党仪式的时候,径行去会晤孙中山先生,向他提出改变那种“我即革命,革命者到三民主义旗下来”的想法,转而容纳多党存在,与中共和各派革命势力建立联合战线,说不定也可能获得接纳。这等于使他那间“独资经营”的“革命公司”,因时移势易,改为“合资独营”的“股份公司”,而他仍然是大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有何不可?我那时若与孙先生多接触,把他说服,对国事的影响该是多大?但现在只是事后的先见之明,失去的机会是抓不回来了。到了1923年6月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经过马林长时间的活动,孙越宣言,国民党已决定改组容共,第三国际的4月决议等等,已经是很迟了。但那时我仍可设法否决马林主张并径行向孙先生进言,很可能仍可挽救。可是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那已经是太迟了,我只好表示一点意见之后就扬长而去。

这样长时间的苦思,有幻想也有检讨,使我觉得自己的为人需要减少一些少年勇进,加多一点老成持重了。我想不清中国革命会如何发展,但认为有多种可能。我只希望往好的方面发展,即是国共不要闹得不能开交。事已至此,只有在党内合作的既成事实下,相忍为国,或采友善态度趁早改为党外合作。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了,国共也应避免彼此敌对,相打相杀。这些想法都曾反映到出狱后的言行中去。与我同时出狱的范体仁以及和我争论过的赵世炎等同志,都曾说我变得老成了,甚至有人讥讽我经不起监狱的折磨。我并没有完全否认这种说法,有一次还向赵世炎等说到亲身经历过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因反对全面加入国民党,几乎被开除中共党籍,在监狱中有机会细细回味这些往事,因而变得老成些是毫不足怪的。这也许不是退步了、右倾了,而是进步了、减少错误了。

10月初,直奉第二次战争的风声日渐紧迫,监狱的戒备也随着严密起来。关于苏浙战争,孙段张合作对直、直奉第二次大战已大规模爆发等一鳞半爪的消息,也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我热切盼望直系政权的垮台,那大概会增加我冲出这座监狱的机会。但我也不能露出声色,以免惹祸,因而还是和平常一样过日子。

10月23日,一个狱卒暗中告诉我,冯玉祥的军队忽然开回北京,连总统府都包围起来了。接着,我的房门被锁上了,我被禁止到院子中去走动。狱卒

们都慌张起来，严禁犯人们接触交谈。荷枪实弹的看守兵在监狱外面来回巡逻。24日，一个狱卒告诉我，王怀庆倒了，冯玉祥派了刘××接任警备总司令。这些事使我判断我真有出狱的机会了。

25日下午4时左在，我这个不明情况的人，心中还在作多种可能的推测。忽然一个狱卒将我的房门打开，引着我一直走到警备总司令部的大堂。这个大堂中站满了大小官吏，原来是冯玉祥所新任的警备总司令刚举行过接任仪式。那位新总司离开他的座位，站在台子旁边接待我。我的太太和范体仁也被带到那里。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在那里想着冯玉祥竟能这样好的对待我们，真是出乎意料。但我在极力约束自己，慎防可能再有不如意的事发生。

那位新司令提高声音问我：“你犯了甚么罪？”我回答说：“我根本没有犯罪，审判人硬说我犯了内乱未遂罪，我是不承认的。”接着他又问：“他们打你没有？虐待你没有？”我回答说：“我个人总算没有挨过打。”于是，他宣布：“无罪释放”，并说我是受了委屈，好好出去休养。接着他以同样的问题问我的太太和范体仁。我太太的回答是：“我没有犯罪，但受到非法的逮捕和拘禁。”范体仁回答的是：他犯了爱国罪，他要控诉他因此所受过的虐待。那个军人对他们同样宣告无罪释放，并含笑安慰他们。

我们这些政治犯走出监狱以后，同志们和朋友们曾多方慰问我们，这不必细说。范体仁并曾埋怨我为何不带头对那班直系军人提出摧残人权的控诉？我安慰他说：“政局的变化是五花八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让我们暂时饶恕他们，一心注意我们未来事业的发展罢！”

注释：

①1924年5月15日，有人以炸弹伪装礼品送到顾维钧家。顾宅仆人启视，爆炸，伤顾仆三人。此事与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执行部及中共均无关系。

②北京京报名记者邵飘萍第一次入狱被释放时曾将在狱中所捉的一瓶臭虫，面交司法官吏，要求改良监狱，曾轰动一时。

第二部分 关于张国焘 1924 年被捕叛变的档案材料 (原载《历史档案》1981 年第二期)

1、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拘捕张国焘文

1924 年 5 月 24 日

京师警察厅呈报侦缉队拘传煽惑路工首领张国焘等讯供情形由

呈为呈报侦缉队拘传煽惑路工首领张国焘等讯供情形呈请鉴核事。窃准交通部密函内开,据京汉路局呈称,武汉稽查处拿获工会党魁杨德甫等,讯据供出京、沪等处组设工党通讯机关并主要党人姓名、住址,抄录名单密呈。等语。查单中所开北京机关设在后门铁匠营二十一号,主任张国焘、张坤第^①。是否属实,应请严密查究,以遏乱萌。等因。准此。当即速飭侦缉队,按照所开地点,驰往拘传无著,仅传得彭子均、李凤林二名,当场搜出全国铁路总工会委状一纸。询其张国焘现寓何处,佥称不知。复督飭该队,赶紧设法侦查。嗣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查获张国焘同一女子杨子烈奸宿,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宣言书,并信函多件。研讯张国焘,现年二十五岁,江西萍乡县人,在北大哲学系四年级肄业。杨子烈,现年二十岁,湖北枣阳县人,在法政大学肄业。彭子均,现年二十二岁,湖南湘阴县人,北大旁听生。李凤林,现年三十八岁,大兴县东坝人,在铁匠营充茶役,张国焘、杨子烈各供自由婚配,尚未正式结婚。彭子均为张昆第帮忙,不知是何党系。李凤林供:张昆第已于前六、七日,由铁匠营往西车站出京。追讯共产党鼓动各路工问题,均极狡猾不肯吐实。查起出委状上列总干事张特立之名,讯之张国焘,是否伊之别名,则百方支吾。再证之检出李钟英由上海寄伊之函,内附有沿海省职工联合会、苏维埃华工总会致全国铁路总工程师会函,称伊为总干事,语为之塞,始认张特立即伊之变名。又讯彭子均,初供与共产党毫无关系。适驻铁匠营侦探接到保定狱中工人寄伊来函,始认充全国铁路总工程师会书记。再行研讯,仍属半吞半吐,闪烁巧避。查杨子烈系属女子,在法大修业,与北大男生张国焘发生恋爱,无异妍度,犹腆颜称为自由夫妇,形影不离,其对于张国焘行为

定当了然而坚称不知。嗣在伊所住杏坛学社,起出陈女士箱篋,搜出由上海寄伊函件,内附中国国民党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宣言一本,似与张国焘同志合作可证无疑。除函复交通部外,所有拘获路工首领张国焘讯明情形理合呈报钧部鉴核。谨呈

内务总长

京师警察厅总监薛之珩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2、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张国焘已移送卫戍总司令部讯办文

1924年5月29日

京师警察厅呈报传拘煽惑路工组设工党通讯机关张国焘等业送卫戍司令部讯办请鉴核由

呈为传拘煽惑路工组设工党机关张国焘等业送卫戍司令部讯办请予鉴核事。窃前准交通密函,请严密查究组设工党机关张国焘等一案,业将拘获张国焘等讯供情形呈报在案。兹复讯据张国焘即张克仁供认系国民党共产党派,偏重研究学理暨宣传,并在铁匠营二十一号为铁路总工会代收各处工人捐款,救护保府狱中工友。据彭子均供认:在铁匠营二十一号与张昆第同住,张昆第系全国铁路总工会会计,伊系该会书记。据杨子烈供认:住腊库杏坛公寓与张国焘自由结婚,伊知张国焘研究共产党学说。据李凤林供认:在张昆第处充当厨役,伺候张昆第、张国焘、彭子均等饭食,有何不法之事,伊不知情各等语。查该犯等,确系共产党。惟供多狡展,证以起获各种函件、委任状等物,均系鼓吹革命煽惑罢工。除飭缉逸犯张昆第等,务获〈证物〉,并将张国焘等连同证物送请京畿卫戍总司令部讯办外,所有此案讯供解送情形理合抄录供折、名册,呈报钧部鉴核。谨呈

内务总长

附呈抄供四纸、清折一扣、各铁路同志名册一本

京师警察厅总监薛之珩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张国焘、杨子烈供词

张国焘号克仁,二十五岁,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肄业。曾于去年十月间

与张昆第(即张守诚)赁住铁匠营二十一号北房三间。去年十一月间,即搬寓腊库十六号杏坛公寓,与杨子烈女士自由结婚同居。国焘历年受学校教育,研究经济学,颇以马克思主义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旨相符合,因信仰之。又陈独秀(即实庵)系北京大学学长,与国焘有师生之谊,彼此信仰又可谓略同。国焘素抱爱国热忱,于抵制日本诸运动曾亦参加。后又以非提倡平民教育不足以救国,陈独秀亦颇重视国焘之为。当独秀去京赴沪以共产主义旗帜相召集时,于民国十年间曾来函邀国焘一致进行。国焘亦遂以提倡平民教育,进行社会事业自任。去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国焘亦随之加入,故国焘可谓之国民党内之共产派。按国民党内容复杂,共产派系新加入,主张偏重反对外国侵略。国焘自去年加入该党后,并未任何项职务,可谓之挂名之党员。按中国共产派现尚幼稚,既无若何组织,人数亦尚少,故从来并无何项革命行动,事业多偏重研究学理及宣传。国焘在此派内,担任劳动教育及平民教育诸事。又国焘因曾做劳动教育事业,各处工人亦有很少数与国焘相识者,故亦颇知所谓铁路总工会。查铁路工人现多年已无工会存在,铁路总工会亦无正式机关。只以尚有十余工人在保定狱中,该项在狱工人均极贫苦,无人照顾,各处工友多有愿帮助此项在狱工人,故暂以铁匠营二十一号为通讯机关,说不上铁路总工会,只所须一种名义收到各处工人之捐款,故有铁路总工会之称。国焘与保定在狱诸人中二、三人颇有友谊关系。又国焘自问良心实用所信之主义,亦应处在帮助之地位,故国焘始终帮助铁路总工会之此项救济事业。案所谓工人周刊,出版已久,由工人周刊社编辑。在去年春间以前,国焘亦挂名为工人周刊社编辑之一员,但从未经管此周刊。此周刊被禁止出版以后,即久已停顿。

杨子烈(即杨毅),年二十岁,湖北省枣阳县人,现肄业北京法政大学。去旧十二月搬于腊库胡同十六号杏坛公寓,与张国焘先生结婚。每日到法大上课,上午的饭在法大吃,下午回来就在铁匠营二十一号吃一顿,每月交伙食钱五元。张国焘先生是研究共产派学说的,他既是我的丈夫,他所研究的学说,我因好奇心,所以也想研究一下。可是因为我们结婚的日期不久,同时我学校的功课很忙,虽然把关于此类的书籍看看,凭心说话,一本也未看完过。不但如此,老实说连共产二字的意义何解也是盲然的。但是,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诸大人的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铁匠营二十一号是铁路总工会暂时通信机关,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而为干事,到现在我才知道。又有由陈比

难箱里检出一封寄我而未发的信,我并不知道,这是诸位大人同我亲眼所见。当由她箱中取出时并未拆封而邮票还是未盖邮章的。致于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洪,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于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杨子烈亲笔附查抄张国焘信件摘录

谨将检查张国焘(即张克仁又名特立)、彭子均(即彭礼和)。杨子烈等由各方面寄到最要函件,摘录简明事由,编列号数,呈请钧鉴。

计 开

第一号:赵醒晨由九江来函,报告党部仍须设在南昌,及进行青年团方面工作与表同情各报纸。并嗣后通信若有最要话可用白矾水写字,免被检查。

第二号:田血成由上海来函,请示购工刊价值并关于“劳动新闻”及出版物共产主义能多购为感。

第三号:虎(约即江亢虎)是否选定铁工代表。系由沪来函。

第四号:实庵(即陈独秀)由北大来函,请其收存(一)致恺荫者,约赴太平洋运输工会会议,并言工刊不可停顿,常常报告路工运动于中局。(一)致守常者,催第三集社会学讲义。(一)致和寿者,请示京中读近几期向导如何批评。

張國燾係克己女王步江西洋館人北京
大學肄業曾於去年十月間與張國燾來函
守誠信住於區區廿一號北平之河於去年
十一月間即撤高階席十六號張國燾與其
楊子以女士自由格同各國空居子受其教
育。張國燾經濟學。而以馬克思主義其孔子
不思察而忠不均之。相符合因能使之
陳揚者(即家考)係北京大學其世國書
有師之信。於其信內又有信陳國燾
抱愛國之忱於抵制日貨等語。國燾亦
以此信提信于其教育不以此利用陳揚者
亦於其信內查之其人。當期其去其世
以共其其又被解相其其。於民國十年
國燾亦由出函查一政進行。國燾亦遂
以提倡其教育進行。社會事業自任。
去年陳揚者加入國燾後。國燾亦遂
二人之捕執。故有敘其終之令之稱國燾與
其亦為之。但從來信等四。
國燾。此國燾被禁止以後。即久已停頓。

張國燾筆供詞

楊子(即楊子)年二十歲湖北省東陽縣人現肄
業北京陸政大學。去年十二月間打賭庫胡
同十六號。其屬張國燾先生結婚
。到法大上課。去年以飯在法大。
就在職在。
是應該求諸大人的寬恕。使其有改過
自新之餘地。鐵道管工十號是鐵路總工
會暫時通信和國燾因受人之惠而
為幹事。到現有找才知過。又有陳比難
箱裡檢奏出的。一封年改的木青的信故
至不知過。這信信大人親眼可見。其由地
箱中取出時並未拆封。而郵局也並未蓋郵
章的。致有找的大夫張國燾此次假借
了事。也應該受懲。但。也。也。
向恩尚淺諸大人素來德量寬厚。許會
過遠。故敢請諸大人念情。國燾初犯
特別加打。寬恕。那不但於國燾和我。且
恩不忘。就是稍有知覺的人。也。也。
無匪矣。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楊子親筆。

楊子親筆供詞

第五号：实庵由上海来函，太平洋运输工会会期不出阳历六月，人选望速定。周天元等函民党上海部，痛诋京汉南段代表，速易人联络陇海、粤汉。工刊望勿间断，铁总经费速与鲍同志商定。如何情形，均望报中局。

第六号：实庵由上海来函，转汪精卫讨论京中执行部党务。

第七号：李钟英由上海来函，分答（一）预算铁总经费总期节省。（一）经费交付，一部分由国际交中局付铁总，一部分由国际交民中央付铁总。（一）铁路管辖及关系。附英文运输国际致中国铁路工公函。

第八号：李钟英由沪来函，东方运输工团定六月在广州开会，选派铁路方面与会。

第九号：李钟英来函、国际提前在六月开会、请物色京汉路在业工人、代表铁总赴会。附运输国际事函二件，内系沿海省职工联合会、苏维埃华工总部致全国铁路总工会者、称张国焘为总干事。

第十号：张秋厚由长沙来函、请来汉组织方面工作。

第十一号：夏白昊由汉口来函、报告新党在汉组织、宣传大部分工作与旧分子相排情形。

第十二号：夏白昊由汉口来函、报告杨德甫等受郭等煽惑、破坏我们组织、与京沪报刊登攻击启事，请速裁决。

第十三号：虎由沪来函：三、四月分经费，每月一百三十元均寄去。五月分经费另用新预算，约其赴沪商定。

第十四号：张克明由胶澳来函、报告合作社成立、请用铁总名义、拟出计划进行。

第十五号：张云鹏由石家庄来函、报告路工交涉奖金情形、请登载工刊。

第十六号：朱某由安源县来函报告，安吉地工刊消息、由贺元昌负责。至协助各地矿工组织团体，尚在沉寂时代、此间只可协助范围内基金工作。

第十七号：和劲、田真由唐山来函报告，五月一节筹备就绪。

第十八号：周善廷由汉口来函、请示是否开京汉代表会议、并辞谢前次委任、应候京汉代表会议后，方能受委。

以上系各方面寄与张国焘之函。

第十九号：彭子均之叔由保定来函、在保被警察暗中监视。内附英文译音吴汝民函一件，报告在狱工友悲哀情形、并望鼓勇解救。

第二十号：比难（即陈媿兰女士）由上海缮成寄与杨子烈之函、内附中国国民党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宣言一本。尚未付邮、

附彭子均供词〔略〕

附李凤林供词〔略〕

附各铁路同志名册〔略〕

3、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为咨送张国焘口供文

1924年6月2日

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咨送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名单希转令严拿讯办由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为咨行事：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及供出党魁李大钊等情形先后咨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等提讯明确。据称：伊等私组铁路总工会，即为实行共产主义之通讯机关。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李大钊为北方首领。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姓名一时记忆不清。辅助进行党务者：南方有谭铭三等。北方有张昆第等。各铁路均有工人在党，日前搜获名册、即系各路工人通信地点。先劝各路工人组织工会，将来要求增加工价，以便推倒军阀及资本家，实行共产主义。等语。查该犯等胆敢在首善重地，私组工会，以共产主义煽惑路工，虽未至实施暴动行为，而其意图紊乱国宪，实已毫无疑异。除李大钊等业经咨请严缉外，相应抄录各路工人姓名、咨行贵部查照。希即转令 体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路政，而遏乱萌。此咨

内务部

计咨送名单一纸〔略〕

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

中华民国十三年六月二日

4、王怀庆要求通缉李大钊致内务总长程克函

1924年6月14日

仲渔仁兄总长阁下：未晤大教，又数日矣，敬念，敬念。共产党人张国焘供出同党李大钊等，均以铁路总工会名义实行共产主义。前已咨请贵部转行各省通缉在案。查李大钊等时或潜匿京师，时或往来各省，到处煽惑，行踪诡秘。

若不缉拿惩办，深恐紊乱国宪，破坏治安。兹特再申前请，务祈转咨各省，一体通缉，以弭隐患，是所至禱。何日咨行，均行何处，统望示知，以便接洽，至荷公谊。专肃。顺颂勋绥。

愚弟 王〔怀庆〕拜启六月十四日

愚弟王〔怀庆〕拜启

致内务部程秘书长
仲渔先生 敬下 示 略
大教又教。夫教、念、若屋空
人清國崇借出同黨者子大針茅
均以能洽花工人名義嚮行共
產主義而之智法
貴部轉以各省通緝立案亦立
李大釗等時被踏匿京師時
或在未各省到據險感行蹤
詭秘若不緝拿懲辦深恐香
既國憲破壞治安若特再申
前請務祈
特請咨各省一體通緝以弭隱
患是所至禱 示以便接洽和為禱
初發

5、北洋政府内务部为密咨张国焘口供致各地文稿

1924年6月9日

内务部为密咨事：案准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咨称，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三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第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

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

省 长

治安,而遏乱萌。等因到部。除分行外,相应密咨贵

都 统

查照办理。

镇守使

护军使

此咨各省长、各都统、川边镇守使、淞沪护军使

中华民国十三年六月九日

内务总长(六月十一日发)

6、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拘捕范体仁文

1924年6月12日

京师警察厅呈为续获共产党员范体仁讯办情形请鉴核由

呈为续获共产党员范体仁讯办情形请予鉴核事。窃奉钧部训令第一五二一号开。准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咨,据张国焘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三等辅助进行。北方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第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咨行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等因。到部。除分行外,合亟密令查照办理。等因。奉此。查此案于六月二日准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法字第二五号函开:据张国焘等供认,共产党员北方有张昆第等,抄录所供党员及工人名单。函请查拿归案讯办。等因。立经飭属侦缉去后,旋据侦缉队呈称:六月九日下午六时余,在东安门骑河楼侦获交缉共产党人犯范体仁一名,当场由身上搜出国民党证一纸,新报社图章一个。复在骑河楼路南门牌十二号华成公寓范体仁寓室内,检出国民党证书、中华学生联合会徽章,民权运动大同盟各项戳记暨信函、书籍等物。先后带队讯录供词,连同证附各物,呈解讯办。等情。据此。提讯范体仁供称:年十九岁,湖南宜章县人。北大经济系学生,老国民党党员,代理新民国杂志事务。惟坚不承认与张国焘暨各铁路工会有联合情事。一再研讯,供词诸多避就。当将该范体仁,连同起获各证物并抄录供词,转送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归案讯办在案。奉令前因,除仍督飭所属继续严缉案内逸犯,务获究办外,所有续获共产党员范体仁一名讯办情形,理合抄录供

兰台稿存

词,呈报钧部鉴核。谨呈内务总长

附呈抄供一纸〔略〕

京师警察厅总监薛之珩

中华民国十三年六月十二日

7、北洋政府内务部密咨为如何处置嫌疑文稿

1924年7月

密咨交通部

内务部为密咨事:案准贵部七七七号密咨内称,据陇海铁路总公所电称,在徐州捕获吴鹏九一名,暂交铜山县收押,抄录原电,请酌夺电商江苏军民长官办理。又七九六号密咨内称,据湘鄂路局呈称,属路机车处确有叶云清,请酌夺咨商鄂督查拿惩办,以遏乱萌。又八一二号密咨内称,据京汉路局转据汉口办事处电称,汉口各党人除杨德甫、周天元业经拿拘获押洛阳外,尚有项德隆、武者二郎二名,请酌夺咨商肃巡阅使飭属拿办,以遏乱源。各以因到部。业经本部照咨转行各该省长官,分别查照办理在案。惟查京畿卫戍司令部前送各路工人通信地点各册,系据张国焘等所供出。究竟册内所载是否系完全服务各路工人,抑或服务路工,而其人现时已无发觉肇乱情事殊不可必。方今工潮日亟,工人众多。辗转牵连,动滋疑惧,似应由各该路局先行严密考查,加意豫〔预〕防。如能防弭患无形,尤为妥善。前次本部一五六三号密咨,咨请贵部筹拟防范方法,意亦以为此项工党,处分极难适当,过宽则无以示儆,过严又不可胜诛,办理稍一不慎,转有操切僨事之虞。即如此次湘鄂路局呈称,叶云清系帮铆工匠,其人素不安分,上次路局工风潮,该匠曾附和骚动。但其人对于工厂工作等事,尚未有旷误行为,且未得有煽乱证据,是以未便开除,以免激起全体工人疑惧。各等语。此种情形,各路局当亦不无类似者,似亦不必操之过激按名缉捕,以致风声传播,人人自危。况因而酿起意外之虞,亦甚非国家防患未然之本旨。此后对于此项嫌疑党人,究应如何权衡轻重、期臻妥协之处,相应咨商贵部详加查核,飭属体察情形,妥慎办理为荷。此咨

交通总长

内务总长

中华民国十三年七月 日

注释：

①张坤第、张昆第即张昆弟。

第三部分 被捕入狱,出卖党组织

(原载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张国焘离开党中央机关,调到北京,从事铁路工人运动。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以北京国民党组织的代表身份,前往出席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次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宣告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在新的形势下,工人运动走向复兴,农民运动也开始发动起来,我们党的力量 and 影响日益扩大。

这次大会还没有结束,张国焘就提前返回北京,准备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二月六日,大会秘密召开,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推选孙云鹏为委员长,张国焘担任总干事。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工作是有成绩的。张国焘在《“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中说:“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工会运动为之一振,各路组织,均有显著之进步,如胶济路会员之大增加,京绥路车务工会会费之能确实收齐,正太工会组织之大加整饬,皆其明证。”^①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发展,遭到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极端仇视。一九二四年五月初,直系军阀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出通电,要北洋军阀政府通令查禁“过激运动”,制造反动舆论。五月十三日,湖北督军肖耀南借口“据沪探称,此间过激党禀承孙文,联络苏俄,实行共产主义,派遣党徒,分往内地”,^②派出反动军警,分别包围汉口德润里二十三号湖北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刘芬律师事务所,逮捕了共产党员许白昊、刘芬和原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等几个工人。并通缉包惠僧、项英和廖乾吾。杨德甫被捕后,在肖耀南的军法处,投降敌人,供出了北京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负责人。

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接到京汉路局密函后,当即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五月二十一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三个分队,前往查抄北京

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会所。他们先到后门铁匠营二十一号,进行搜捕。因张国焘不住在这里,张昆第已于数日前离京,仅捕到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彭子均、李凤林二人,搜去了铁路工人名册和许多党的文件和来往信件。接着,侦缉队又去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京师警察厅总监薛之珩在给内务部总长的呈报中,说明了拘捕张国焘等人的经过:

窃准交通部密函内开,据京汉路局呈称,武汉稽查处拿获工会党魁杨德甫等,讯据供出京、沪等处组设工党通讯机关并主要党人姓名、住址,抄录名单密呈。等语。查单中所开北京机关设在后门铁匠营二十一号,主任张国焘、张坤(昆)第。是否属实,应请严密查究,以遏乱萌。等因。准此。当即速飭侦察队,按照所开地点,驰往拘传无著,仅传得彭子均、李凤林二名,当场搜出全国铁路总工会委状一纸。询其张国焘现属何处,佯称不知。复督飭该队,赶紧设法侦查。嗣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查获张国焘同一女子杨子烈奸宿,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宣言书,并信函多件。③

据京师警察厅呈文件附件所列,从张国焘等人住处搜出的重要信函有二十件之多,其主要内容有:

“赵醒晨由九江来函,报告党部仍须设在南昌,及进行青年团方面工作与表同情各报纸。并嗣后通信若有最要话可用白矾水写字,免被检查”。

“实庵(即陈独秀)由北大来函,请其收存(一)致恺萌者,约赴太平洋运输工会会议,并言工刊不可停顿,常常报告路工运动于中局”。

“实庵由上海来函,太平洋运输工会会期不出阳历六月,人选望速定”。

“实庵由上海来函,转汪精卫讨论京中执行部党务”。

“李钟英由沪来函,东方运输工团定六月在广州开会,选派铁路方面与会”。

“李钟英由上海来函,分答(一)预算铁总经费总期节省。(一)经费交付,一部分由国际交中局付铁总,一部分由国际交民中央付铁总。(一)铁路管辖及关系。附英文运输国际致中国铁路工会函”。

“李钟英来函,国际提前在六月开会,请物色京汉路在业工人,代表铁总赴会。附运输国际专函二件,内系沿海省职工联合会、苏维埃华工总部致全国铁路总工会者,称张国焘为总干事”④。

由于张国焘事先毫无精神准备,使上述涉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函件,落入敌人之手。同时,也使张国焘等人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张国焘等人被捕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动抗议运动。《向导》周报连续发表《工界厄运重重》、《汉口之党狱》、《告劳动平民和青年学生——为汉口北京党狱》、《北京之党狱》、《“六三”纪念与最近军阀列强之联合进攻》等文章，声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镇压革命的暴行，并展开营救行动。众议员李国珍等十九人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从宽开释”张国焘。众议员彭汉遗等十五人也致函内务部总长，请“开释”杨子烈。

但是，北洋军阀政府不顾这一切，对张国焘等四人，进行野蛮的审讯。上海《申报》的报道，透露了京师警察厅侦缉队对张国焘等人审讯的情况：

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鹤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并无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闻在张室中搜出之文件等，侦缉队认为关系重大者颇多，中且有派人赴俄护照一纸，上有加拉罕签字，侦缉队对此追究颇严，谓此护照究系俄国何人接洽得来，然关于此层尚无结果也。⑤

张国焘在狱中惧怕敌人的严刑拷打，很快就向敌人屈服了。据敌人档案记载，“追讯共产党鼓动各路工问题，均极狡猾不肯吐实。查起出委状上列总干事张特立之名，讯之张国焘，是否伊之别名，则百方支吾。再证之检出李钟英由上海寄伊之函，内附有沿海省职工联合会、苏维埃华工总会致全国铁总工会函，称伊为总干事，语为之塞，始认张特立即伊之变名”。⑥接着，张国焘又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是国民党中的共产派。张国焘在亲笔供词中写道：

国焘历年受学校教育，研究经济学，颇以马克思主义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旨相符合，因信仰之。……当独秀去京沪以共产主义旗帜相号召时，于民国十年间曾来函邀国焘一致进行。国焘亦随以提倡平民教育，进行社会事业自任。去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国焘亦随之加入，故国焘可谓国民党内之共产派。按国民党内容复杂，共产派系新加入，主张偏重反对外国侵略。国焘自去年加入该党后，并未任何项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按中国共产派现尚幼稚，既无若何组织，人数亦尚少，故从来并无何项革命行动事业，多偏重研究学理及宣传。国焘在此派内，担任劳动教育及平民教育诸事。又国焘因曾做劳动教育事业，各处工人亦有很少数与国焘相识者，故亦颇知所谓铁路总工会。⑦

杨子烈在审讯时，竟不惜用污蔑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言词，祈求敌人宽恕。她在亲笔供词中写道：

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

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诸大人的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铁匠营二十一号是铁路总工会暂时通信机关,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而为干事,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洪,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于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⑧

经过几天的审讯,北洋军阀政府京师警察厅认为,张国焘等,“确系共产党。惟供多狡展,证以起获各种函件、委任状等物,均系鼓吹革命煽惑罢工。除飭缉逸犯张昆第等,务获证物,并将张国焘连同证物送请京畿卫戍总司令部讯办”⑨。五月二十五日,京师警察厅将张国焘等四人,解送京畿卫戍司令部。北京《晨报》报道了押解途中的情景:

廿五日下午一时余,有人走至前门外鷓儿胡同警厅侦缉队公所门前,见有武装巡警多名,拥出男女犯四名,俱带全份刑具,装入汽车,复有马队警士二十多名,随同护送,解住警厅去矣。闻所解四人,一名张国焘,别号特立,江西籍,年三十岁,北大学生,住地安门内腊库胡同,坛杏公寓。一名杨子烈,系女生,湖北籍,国立法政大学学生,现年二十九岁,与张国焘同居,一名彭子均,号东隆,别名礼和,湖南籍,现年二十九岁,法政大学学生,住后门内铁匠营门牌二十一号。一名李凤山凤林,系彭子均之厨役。⑩

在京畿卫戍司令部的继续审讯中,张国焘进一步向敌人供出了在北京的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包括中共北方区委的主要负责人和领导骨干,李大钊、张昆第、黄日葵、李骏、范体仁、高君宇、刘仁静、范鸿劼、朱务善、陈佩兰、缪佩英等。根据张国焘的这一招供,5月30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密咨内务部总长,“请转令严拿共产党李大钊等归案讯办”,内称: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在谭铭(平)三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第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

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⑪

接着，张国焘又供出了全国铁路各路在党工人名单，包括京绥路七人、京奉路二十一人、胶济路三人、正太路二人、京汉路八人、津浦路二人、粤汉路一人、道清路二人、陇海路一人、广州二十四人，每个人都有具体姓名和通信地址。这一名单，把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和其他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如项德隆（即项英——编者注）、李振瀛等，都出卖了。据此，六月二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再次密咨内务部，要求按照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名单、“转令严拿讯办”。内称：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及供出党魁李大钊等情形先后咨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等提讯明确，据称：伊等私组铁路总工会，即为实行共产主义之通讯机关。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李大钊为北方首领。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姓名一时记忆不清。辅助进行党务者：南方有谭铭（平）三等，北方有张昆第等。各铁路均有工人在党，日前搜获名册，即系各路工人通信地点。先劝各路工人组织工会，将来要求增加工价，以便推倒军阀及资本家，实行共产主义。等语。查该犯等胆敢在首善重地，私组工会，以共产主义煽惑路工，虽未至实施暴动行为，而其意图紊乱国宪，实已毫无疑义。除李大钊等业经咨请严缉外，相应抄录各路工人姓名，咨行贵部查照。希即转令一体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路政，而遏乱萌。^⑫

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对王怀庆先后送来的两个密咨，一一照准。随即密咨交通部、教育部，密令京师警察厅，“严加注意”、“妥筹防范”，按照《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姓名单》和《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姓名单》，迅速缉拿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内务部还密咨湖北省长、湖北督军，拿办项德隆等共产党人。

京师警察厅接到内务部密令后，首要的目标是逮捕李大钊。李大钊闻讯转移，化装成商人，暂时避居到昌黎五峰山，全家也从北京搬回乐亭老家去了。就在李大钊离京的当天晚上，反动军警查抄了他在北京铜幌子胡同的住所，然后又追到乐亭老家去抓人。两次扑空后，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于六月十一日，发出了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通缉令，并咨行教育部及各省长、各都统、川边镇守使，淞沪军使，分令京兆尹、京师警察厅、一体查照办理。这时，李大钊在避居地接到党中央的通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已经秘密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也有一些同志，由于张国焘的出卖而被捕了。六月九日，侦缉队根据《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姓名单》，在北京东安门骑河楼逮捕了共产党员范体

仁。六月十日,侦辑队给京师警察厅的呈文中说:“抄录所供党员名单密函严飭查拿……因附名单一纸,奉此遵飭各队侦缉去后,兹据第四分队分队长张瑞林呈称:六月九日下午六时余,经长探等在东安门内骑河楼拿获交缉共产党人范体仁一名”,就是明证。

另一个被捕的是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孙云鹏是石家庄警察局根据《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姓名单》,在石家庄逮捕的。根据同一名单被逮捕的还有,道清路的吴鹏九,津浦路叶云清等人,被通缉的有郭恒祥等多人。总之,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郑州和胶济路各地的铁路工会负责人,被捕、被通缉、被开除的达四十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人运动,遭受了一次严重的破坏。

张国焘在京畿卫戍司令部的监牢里住了四个多月,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联合奉系军阀发动北京政变,赶跑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机会,设法从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监狱中,救出了“二七”以来被捕的工会负责人和共产党员。张国焘也随着出狱了。

张国焘出狱后,一直向党组织隐瞒他在狱中出卖同志的真相,直到全国解放后,有关张国焘被捕的全部档案回到人民的手中,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对这件事情,张国焘十分害怕,他在《我的回忆》中,极为力自己辩解,说什么,被捕的头一天,他到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办公处作了布置,名册和文件也都运走了;范体仁是和他同时被捕的。被捕后,受刑时,他“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问到铁路工会时,“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于我的材料,还向他们抗议”;问到共产党的组织情况时,也使“他们一无所得”。企图继续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读者。然而历史事实却是任何巧妙的言词都无法改变的。

注释:

①②《新青年》第二号(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

③《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拘捕张国焘文》(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历史档案》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④《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张国焘已移送卫戍总司令部讯办文》(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历史档案》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⑤上海《申报》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⑥《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拘捕张国焘文》(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历史档案》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兰台稿存

⑦《张国焘供词》，《历史档案》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⑧《杨子烈供词》，《历史档案》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⑨《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张国焘已移送卫戍总司令部讯办文》（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历史档案》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⑩北京《晨报》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⑪《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咨请转令严拿共产党李大钊等归案讯办文》（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日）。

⑫《北洋政府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为咨送张国焘口供文》（一九二四年六月），《历史档案》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张国焘“肃反”与曾中生、 许继慎被害^①

吴雪生

1937年2月27日，凯丰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中说：“国焘总想把肃反工作成为个人的工具，因此滥用权力发展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凡是与国焘个人意见有不同的，他就利用这个权力的机关去加以压制，结果使党内生活成为不可容忍的现象，许多好的干部，曾经与国焘有意见分歧的干部，都遭到他的这种滥用权力的压制。”“国焘的肃反政策发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许多干部“谈及国焘的肃反政策无不泪下！”

205

1937年3月31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问题时曾讲到：关于军阀主义肃反问题，国焘同志可以说，肃反错误决不只我这里，然则这肃反路线的实质是什么？其他苏区的肃反的目的，错误无非是在巩固苏维埃和党的目的下，而国焘的基本错误在于将肃反看作是反党反中央的斗争工具，只当作是巩固自己个人的威信的工具。这是绝对非共产党的罪恶行为，绝对不能容许的。

这两段论述，是较早地揭穿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肃反”实质的灼见。

张国焘杀害了红军优秀的军事家、将领、指挥员曾中生、邝继勋、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魏孟贤、吴荆赤、王培吾、黄刚等。张国焘还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富有经验的活动家和干部徐朋人、曹学楷、王秀松、戴克敏、方英、舒传贤、戴季伦、郑新民、王宏学、雷绍全等。张国焘把“肃反”作为手段，杀害了大批干部，其目的就是为了排斥异己，维持他的军阀主义统治。这一点张国焘自己也有所披露：“在四军干部反对昌浩同志的空气之下，昌浩同志迅速进行肃

^① 此文曾刊于《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6期，后又收入《中共党史风云录》一书。

反”——一语就泄露了他的天机。这里不能一一论列。本文着重就笔者所接触到的材料,将曾中生、许继慎被害经过的有关史实作一综述。

一、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前的基本情况

从1927年冬——1930年春,鄂豫皖边区党组织领导了黄(安)麻(城)、商(城)南、六(安)霍(山)三次武装起义,创建了三支红军和鄂豫边、豫南以及皖西三块根据地。1930年初,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到上海向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汇报了鄂豫皖三省边界斗争情况。不久,周恩来召集郭述申、许继慎和熊受暄开会,宣布中央决定:统一三省边区党的领导及红军的军事指挥:建立边区特委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部,任命郭述申为边区特委书记,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曹大骏任政委,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4月,郭述申召开了边区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根据党中央决定,成立边区特委,由郭述申、何玉琳、王平章,徐朋人等9人组成,郭述申任书记,统一了三块根据地党的领导。红军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委,重大问题由特委和红一军前委召开联席会议商定。6月,成立了边区工农民主政府。鄂豫皖根据地遂形成,实现了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在斗争中,红军得到发展,武器装备等方面得到加强。这期间,恢复了受立三“左”倾路线影响失去的皖西根据地,并趁新军阀中原混战之机,攻取霍山、英山等六个县城,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并基本纠正了立三路线。

11月,党中央派曾中生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领导党和军队。

1931年1月,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邝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辖两个师一个独立团,第十师师长蔡申熙,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2月初,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会议进一步纠正了立三“左”倾错误,改变了脱离根据地,攻打中心城市的政策,强调巩固阵地与加强红军。坚持“有巩固阵地”地发展,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从根本上建立了党的领导,“特别纠正了干部对立”问题,加强了内部团结。取得了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2月10日,曾中生向中央汇报说:鄂豫皖根据地“主要特征是涌现了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与工农红军。”“三个赤区都分配了土地,建立了政权,创造并壮大了工农红军,都在扩大与发展,而且正在企图打通着相互的联络。”赤区的政治影响,“的确使特区的周围几十县都有

望风响应之概”。“赤区的工农生活的确改善了，肃清了苛捐杂税，得到了土地，一切政治上自由平等都确定了，他们热烈起来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精神上物质上农民都能自愿的来帮助红军与政权。围绕着赤区周围的工农群众，都望着红军来，过去参加过红枪会、大刀会、联庄会、剿共会等都自动的一批一批的解散，连反动派的民团也说红军来了我们就缴枪”。“地主豪绅已无法维持其最后残喘。”“反动的武装力量大部分到了崩溃的高点”。“现在敌人力量虽然并未因此减少，但已完全变为死守的形势”，“始终不敢向红军进攻”。①曾中生等同志对苏区建设是有功的。

二、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排斥异己

在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中央领导权。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无视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以及红军的壮大与胜利，反说曾中生犯了“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是“十足的立三路线及公开的富农路线”。为此，决定成立鄂豫皖根据地中央分局，撤销特委，并强调，曾中生“必须在坚决的放弃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而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条件下，才能参加中央分局，与担任军委书记”。②

1931年1月，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过去他曾反对过王明。但在王明上台后，为了发展他在党内的地位，在《实话》上发表文章，吹捧王明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表示忠于王明。说什么“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反对王明路线的人是“企图利用派别观点来掩盖他们的反党反国际的行为，反对王明的人是“右倾分子”、“立三路线残余分子”，要对他们进行“严重打击”和“深入的肃清”，因而深得王明的赏识和重用。这样，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决定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主持领导工作。

张国焘于1931年4月到达苏区。5月，在新集成立了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书记和军委会主席，撤消了以曾中生为书记的原苏区特委，取得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权，推行“左”倾错误政策。之后，他便调整了红四军领导干部，邝继勋仍为军长，曾中生调任政委，陈定候任政治部主任；刘英为十师师长，康荣生任政委；周维炯任十一师师长，余笃山任政委；许继慎任十二师师长，曹大骏为政委；徐向前任十三师师长，陈奇任政委。

张国焘从否定苏区党的路线、政策入手,来达到否定苏区的正确领导。他说:“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他认为“当地同志和红军将士英勇的奋斗,由奋斗已获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并不能证明特区的路线就已经是正确的了。的确自中生同志等到后,虽然有了相当的转变,但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③在中央分局未成立以前,这里分配土地“还是执行对立三路线调和时代的土地暂行法令。”④他贬斥黄、麻苏区是“采取了土匪行为的政策,经过了烧杀、苦战”而建立起来的。诬蔑商城苏区对民团的工作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帜”,“或明或暗的反对共产党”。“这些所谓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改组派失势的时候就采取了脚踏两支〔只〕船的政策,明为共产党员,暗中与国民党左派勾结,成则为工农革命之英雄,败则摇身一变而为国民党”。“至于六、霍、寿县等地的党的组织,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⑤

6月底,分局在新集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张国焘认为,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传达到了苏区以后,局部上有些转变”,“但是因为这时期的工作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所以整个路线上的转变依然不能看见,反而掩盖了立三路线的实质。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助长了党内家长制度领导下面党内和平的倾向,所以四中全会的决议,虽然到达了苏区,他并不曾收到应有的效果。在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于四中全会路线的‘接受’是缺少了自我批评的,在这些会议的决议案中,政治上是依然继续三中全会的各种错误见解的”。“这在客观上是否认立三路线的危险。在这样领导之下,一切实际工作自然不能有彻底的较变,而是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所以重复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小团体倾向对群众的不正确的关系和其他立三路线时代所造成的许多错误与缺点,依然成为严重问题”。“各种工作<依>然保留许多立三路线的方式”。⑥这个苏区完全“执行富农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全盘否定苏区的工作以及纠正立三“左”倾错误影响后取得的成绩。号召全体同志“和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尤其是右倾机会主义斗争”。⑦

与此同时,他极力标榜自己。他说:“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负责同志到苏区组织中央分局,对于鄂豫皖苏区党的路线和工作给了一个有力的转变。”“改造了各县党的工作”,“改造了肃反工作和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在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府的口号之下进行着改造苏维埃……”。“最近又进一步采取了肃清亲区的策略,去完成打通两个赤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任务”。工作

“证明中央分局的领导确是坚决的执行着国际路线”，“确是有了不少的业绩”。要求中央分局“继续发展自我批评，在坚决执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彻底完成消灭立三路线、集中火力打击右倾机会主义及反对一切这些不正确倾向的调和主义斗争中间，把路线上的转变深入到每个支部中去”。^⑧

在政治形势的分析上，张国焘夸大反动势力的经济、政治危机，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提出了错误的斗争策略。他认为统治阶级“加速崩溃下去”，“世界革命和反革命的最后决死斗争已经列上议事日程”。^⑨提出动员一切力量进行“全国苏区和红军一致的大举进攻”，“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加速崩溃的过程中得到伟大的胜利。”

对于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曾中生等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张国焘就对他们进行残酷打击。在成立分局时，首先打击分局委员舒传贤，以没有在皖西坚决处置“改组派”为由进行批判审查，并开除出分局委员会，在“肃反”时被杀害。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因反对在春耕时节重新分配土地等政策，也被开除出党。陈定候因发表文章反对片面提高工人工资，影响工农联盟，而被撤了四军政治部主任之职。他还以“领导能力不强”等为由，撤了邝继勋军长之职。

三、南下行动方针的争论

1931年6月初，在军事行动方针上，以曾中生为首的红四军领导与张国焘发生了严重分歧。

对于这次争论，徐向前同志在《鄂豫皖苏区的反围攻斗争》一文中作了详细的分析。曾中生等领导人根据当时“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对“鄂豫皖区暂取守势，这正是我军转入进攻，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因此建议：留一部分兵力，结合发展群众，肃清商城亲区等地的反动地方武装，而集中“主力南下”，向外发展，“出击黄海、广济，恢复原红十五军所在地区，威逼长江，配合中央区反围攻”。同时，以解决部队经济方面的困难，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对这一正确主张，张国焘借口“巩固苏区”拒不采纳，反而说这是“立三路线的残余”，提出“巩固根据地和根据地土地一寸也不让敌人蹂躏”的口号，强令红军集中主力到“亲区剿匪”。6月下旬，由于亲区地主武装威逼群众，并进行反动的游击战，四军领导人看到以单纯军事力量无取胜把握，加之给养困难，曾中生再次建议张国焘采纳向外

发展的方针。张国焘强词夺理,说这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急欲向外进攻……则敌人再来进攻苏区,苏区必又遭受危险,”予以否定。

6月底,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曾中生、余笃生、许继慎等人再次提出南下问题。当时周围敌人无进攻迹象,因援助中央区反围攻任务所迫和四军领导同志的一再坚持,与会同志多数支持,张国焘才同意向外发展。会议通过了南下方针,但未决定具体进兵方向和如何使用兵力问题。为此,7月上旬,鄂豫皖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南下的具体用兵问题。张国焘“却又从右倾保守转向“左”倾冒险,限令”红军在一个月內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四军领导反对这一方针,认为“红军应在巩固阵地的基础上向外发展。援助中央区,主要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牵制其兵力,而不在于进攻中心城市,如以六团兵力,通过400余里的白区打安庆,无论敌情、地形,特别是群众条件,都远不如南下浠水、广济、黄梅地区为好。而且这一地区恢复以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联成一片,便于巩固”。曾中生坚持“我们估计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革命基础和配合中央苏区之敏捷,均不如出蕲、黄、广直捣武穴为好。”反对张国焘孤军深入冒险的方针。但张国焘仍以个人意见作出决定,强令红军执行。

7月中旬,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在组织上绝对服从之下,率红四军由商城亲区向东南开进。8月1日,攻克英山。这次战斗胜利后,曾中生、徐向前等详细研究和比较了潜、太、安地区的情况,分析了红军究竟进军到哪里更为有利,他们一致认为,进攻安庆,盲目冒险,毫无胜利希望;去蕲、黄、广较为有利,易于取胜,据此,四军领导决定改变张国焘东进计划。于是“一面报告分局,一面举兵南下”。8月17日,张国焘以分局和军委名义写信给曾中生、徐向前等,指责他们改变东进计划是重复“立三路线”,是“政治上、原则上的根本错误”,是“放弃援助中央苏区,抗拒分局指示”。四军领导人接信后,即向中央申明南下理由,同时继续南下。8月27日,中央分局和军委强令红军“火速回来,不得有丝毫停留”。红军不得不放弃歼敌良机,被迫北返。

9月4日,部队集中到英山鸡鸣河,总结南下以来的工作,布置主力北移后鄂东地区的工作,同时召开了鸡鸣河会议——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慎重讨论”张国焘来信。根据会议讨论意见,写信向分局和军委会申诉,表示“除在组织上绝对服从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会作极诚恳的申诉的必要。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也是在全国革命力量

与反革命力量作紧张的残酷的不需松懈的斗争中代表党与苏维埃来领导红军的同志所必争的责任。”批评攻打安庆的错误军事方针，驳斥张国焘的无理指责，强调南下的正确性。“并由大会推举士奇同志赶来面陈一切”。信中说，张国焘8月17日来信的主旨是：“（一）我们没有推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出武穴，是放弃了援助中央苏区的政治任务。（二）出潜太进攻安庆是有阵地的进攻，由英山出黄广往武穴而援助中央苏区既不能，而又脱离后方阵地。（三）陈调元力量弱，可乘英山之胜，直抵安庆。而X⑩广夏斗寅部力量强，且前者地势优过后者，后者军事或有危险更是不值。（四）经济问题成为我们主要问题之最中心。故再三要发泄所谓‘圻水之欲’，而不从政治上去解决经济。总之，放弃援助中央苏区，抗拒分局指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此，信中郑重指出：“我们再四考虑，认为分局这种指示，完全凭借片面的根据和纯从主观的出发，与我们前方行动的事实意义和客观环境是绝对不相符合的。”并强调说：“我们深深认为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是要以占领敌人要害打击敌人主力两者并重，而且在今日技术拙劣的红军，其战略目的应后者超过前者。同时要能真正的巩固自己阵地，向敌人作有准备有把握的进攻，尤其是要整个苏区有全盘的计划与准备工作，才能集中主力向外发展，而更有全盘部署进攻有力阵地，如此，才不致因为一局部问题而牺牲全部计划，这样与那绝对没有准备而发出命令去占领大城市和空喊进取安庆威胁南京的主张丝毫不相同的。我们根据这样的前提，从8月1日英山之战起，到9月1日洗马畈之战止，共计一个月行动中，”在军事上获得很大胜利。“在政治上直接与孔荷宠部（宠部进击阳、大黄石港……我部包围武穴、田家镇，这是直接联络配合中央苏区的行动）行动隔江联系起来。”这一行动调动了敌人，“牵动了统治阶级整个的军事布置，的确有重要而切实的配合中央苏区的意义。”至于地方工作，分配了土地，武装了农民，成立了工会、农会。“沿途作战，均有广大的农民群众送饭送菜、送伤病号以及运输胜利品。”“这完全适合巩固阵地发展阵地之土地革命的意义。我们认为因为有了巩固阵地之土地革命的基础，才使配合中央苏区的胜利得到相当的伟大。”

经济上，也得到相当充实。“这种胜利正是争取全部胜利的必由之路。离开这种必由之路而用左倾的名词——进取安庆威胁南京来代替这一脚踏实地的任务，不但是空想，而且会使革命力量遭受惨败的。这里我们不能不肯定的说出来，一个月而得到如此的胜利，在鄂豫皖区的红军是第一次的XX，你们的指示到了后，不能不将包围之残敌轻轻放走，更不能实行我们包围敌人一

点,而选设阵地来扑灭其援兵之计划,徒使前方上下不免减弱勇气,蹙然太息罢了!”^①

关于“军事行动南下路线与攻击目标之改变问题,”红四军领导说:“决定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则,我们认为是,在巩固阵地发展上紧迫的配合中央苏区的行动,占据敌人的要害,尤其是要打击敌人的主力,分散和牵制敌人去江西的兵力。可是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不能不郑重估计敌方的力量与布署,行军的地利与群众的基础和自方的力量之大小与敌方之对比,这不是单纯的军事眼光,这是以列宁对暴动的指示来估计军事艺术的。”

“说到我们的力量与群众的基础,当着打下英山之后,英山群众是没有旧基础的,没有〔相〕当时工作,英山无疑的不能成为阵地(以联接皖西北苏区由英山到潜、太),故十二师留驻英山,”“由英山到潜、太尽是数百里的山地,群众无丝毫基础,反动民团常假山势之利,以做反革命的游击战争,这样如必肃清而成为阵地,则必迁延时月,如不肃清则举兵冒进,则必牵制军事行动,群众的帮助与拥护更不易言了。自己的力量虽号称三师,然每师均缺一团,十二师更缺一团以上,暂留十二师于英山,现〔确〕为必要,则前线上只四团,而欲以四团兵力突出数百里之非苏区而去占安庆,非共产党之夸大狂其谁信?如果得潜太而须留一部兵力驻守以固后方,则出安庆之兵力更不足两团了,能乎否乎?不留兵潜、太,而直取安徽(庆)虽有四团,则孤军冒出,稍有军事常识者,必曰必败。”由英山到潜山,交通方便,潜山敌人力量弱,而由英山到太湖水陆交错,行军不易,又无群众基础,属兵家之忌,且太湖城坚兵众,“潜、太山地于全国政治影响更无甚轻重,其不能多少影响鄂、赣、湘的‘剿匪’布置,更不待言。这样又有什么配合中央苏区的意义?”“在群众基础上来说,蕲、黄、广原有苏区与英山是毗连的,群众受过共产党影响的,过去工作虽遭受失败,然而伏势力不少,到处都有梅花形的秘密组织,”从地势看,“出武穴是居高临下,由高地而平原。”“至于敌人之布署,虽武穴一团(当时所得消息)而蕲水、蕲春、黄梅、广济为敌人所疏忽的地方,迅速占领武穴以威逼九江(与)阳(新)、大(冶)红军联成一气,其实际意义绝非空喊进取安庆来配合中央苏区之意义可比。”“然而黄、广、圻这一阵地,我们已事先布置,较敌是先占一着。如敌人进入这一阵地,而(可)各个击破之。这完全是我主敌客而具有足以消灭敌人主力之基础,兵家所谓避实就虚、飘忽自主给敌人以各个击破者正如是也。”“我们两个月占据四个县城,自然不是你们所谓‘要塞’,然而击破敌人主力是相当做到了。徐源泉与夏斗寅是湖北反动政府两个支柱,徐之实力大于

夏,将他两师之各一旅完全击溃,这不是无意义的(对黄麻苏区更有意义),与对江孔荷宠部直接联络行动,这不是无意义的,引至江西两师出来,把武汉警备旅也抽调到武穴来,武汉保安队也开到圻春,刘峙部之胡宗南师因此而不敢急赴江西,把鄂西长沙的徐部集中到此地来而击溃之,把王光宗部消灭,九江也动摇起来,(我们探到由九江派来的许多侦探),发展并恢复一块偌大的苏区,这都不是无意义的。自然这些意义万不及‘进取安庆威胁南京’那样伟大。”

“‘进取安庆威胁南京’是这样轻举不加准备而可发出命令吗?”“我们不能不申言之,安庆之取是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长江海军与海员没有工作,城市工人贫民没有工作,城外近郊农民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城市及近郊党的力量是根本没有关系,英山到安庆近4百里的非苏区,又是山地,清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探、干部又无多少准备,只有一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进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了。去年红八军进取长沙之教训,主要的是没有充分的准备和没有与各方面的配合,而其条件尚比我们为优,其兵力在万枪以上,长沙距平浏赤区又不过七、八十里,后方动员了5万以上的赤卫队到长沙,然而退出之后犹表现其零乱不堪的样子,这正是四中全会所估计的,长沙失败是没有必要的准备,而发出过早的冒险的固执的指示所致的。安庆不比长沙为次,而我们的条件远不及长沙,敌人的兵力又有两警卫团,一步兵团,合经常警察攻沿江各镇一时可集者,至少也在两师以上的现代兵力。如此,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武汉之命令有什么分别了!分局与军委根据昌浩同志意见,以为:当我们已经扑灭英、太之部以后,敌人已经是如惊弓之鸟,望风而靡,我军乘胜直追,可以下潜山和太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进迫安庆,这在军事上及敌我力量上看来完全是可能的事。这未免太近于纸上谈兵了,只要能够愿意明白当时之形势、敌情与自己的力量和近代战略技术的人们,则不加解释也了解这一种作用是用了一些空洞的描写去代替实际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如果单就武穴不如安庆政治意义之大而言是对的,可是武汉、南京比安庆意义更大,我们能不能离开整个的政治形势和大城市群众工作基础之估量,而下一进攻武汉、南京之命令,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事。”^⑫

“我们在长期斗争中深深感到,红军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有广大的工农政权的力量维系着,则如是艰难困苦的生活,任何人也带不了的。因

此,红军的根本问题还是政治的坚定问题,一切英雄的个人单纯军事观念的领导,在此完全要失掉其作用。同时,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却忘记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苏区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缚在苏区范围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⑬

红军南下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军西克罗田,南占浠水,并在漕家河全歼敌新编第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进占广济,威逼黄梅、武穴,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震动九江、武汉。”“仅一月,我连克四城,消灭敌人7个多团,缴枪4,000,俘敌旅长以下5,000余名。黄、广地区的工作,也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农民纷纷起来斗争,分配土地、组织武装、肃清反动势力,大力支援红军作战。”有效地牵制了敌原拟调往江西的部分兵力,支援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战局发展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四军行动方针的正确。”

红军坚持南下的军事方针,是正确的,也是取得重大胜利的主要原因。但是,张国焘认为申诉信是“一个哀的美敦书的报告”,遂于9月上旬,在新集召开了分局与军委紧急会议,张国焘认为:“现在曾竟然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它办法。”便迫不及待地派陈昌浩乘飞机到达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分局决定,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替。随即借“肃反”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张国焘承认,“派昌浩同志两次坐飞机去皖西,因飞机场不好,不能到达,因又折回,起程去四军,9月13日才赶到,在四军干部反对昌浩同志的空气之下,昌浩同志迅速进行肃反,因打破了9月15日许继慎周维炯之暴动计划。”^⑭

四、许继慎被害

1931年8月,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破获一个所谓“AB团”组织。张国焘认为,在红四军中也“有反革命在作怪”,在苏区“必然有一个反革命极大组织”,必须严加清洗,并下令乱捕人。正在这时,敌人利用反间计,制造阴谋,被张国焘用作“肃反”的“证据”。红军占领英山后,师长许继慎率部留守。国民党特务曾扩情以黄埔同学关系,派钟梅桥送信给许,诡称许已与敌勾结,表示欢迎许投蒋。此人到后,师部马上将其逮捕,连人带信送到军部。曾中生、徐向前当即对来人进行审问。认为许一贯表现,立场坚定,“不会有什么问

题”，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随即将特务和信件送中央分局处理。关于这个问题，1931年8月20日曾中生所写的《徐向前、曾中生关于红四军情况及行动方针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一文中已很“郑重的报告”过，清楚地向党说明，“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可知曾中生对党对同志是多么之肝胆相照勇于负责呵！别有用心的张国焘如何能听四军军部意见！他假借此机，“在新集非法逮捕了鄂豫皖军委会参谋主任、原红四军党委书记李荣桂等人，以刑讯逼他们供出许继慎、熊受暄‘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所谓‘全盘的反革命计划’”。诬蔑四军南下，是曾中生等受了“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并在后方部队大肆煽动，接着陈昌浩在麻埠逮捕了四军参谋主任柯柏园、二十八团团长沙炳佛等，在斑竹园逮捕了三十团团长沙建斗、政委封俊，三十五团团长沙王明，三十六团团长沙魏孟贤，在余子店逮捕了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等。

9月底，四军北返到河南省光山白雀园地区。张国焘由新集赶到白雀园，亲自主持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四军的工作。他说：“现在红四军中发现大批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的活动，”“不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怎样不发现改组派！？怎样不发现第三党、AB团！？就是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竟把“白军过来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和知识分子干部作为肃反对象。”^⑮硬给坚持不同意见的许继慎等同志加上“反革命”、“改组派”等罪名，加以杀害。

国民党改组派成立于1929年。1930年，蒋介石派特务暗杀了其负责人王乐平，其活动就基本停止，1931年，该组织解体。“第三党”当时在苏区根本不存在。“AB团”是1927年1月国民党右派段锡明、程天放在江西组织的，4月就解散了。可见张国焘以“改组派”等罪名杀害许继慎等同志是毫无根据的。

许继慎，1924年经党推荐，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1月，在兴宁战役中，部队败退后，许继慎劝回已逃跑的某团长，击溃敌军。该团长因此升为少将。许从未谈此事。周恩来知道后表扬他机智、勇敢。

在黄埔军校期间，他和蒋先云驳斥右派分子贩卖谬论、打击共产党的行为，周恩来表扬他们不仅作战勇敢，也善于说理斗争。

北伐时，曾任叶挺独立团二营营长，参加过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是

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后任团长,参加了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

张国焘也承认许继慎的才干。在《我的回忆》中说:“我早认识的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是一个才华毕露的军人,爱谈政治”,“对鄂豫皖边区军事上有过很大贡献”,原特委和红四军领导人“处理这个区域内的军事和政治,”都很重视许继慎的意见,“师长之中又以许继慎为最能干。”起初,张国焘想拉许继慎,但“他批评中央一意巩固苏区的政策,认为这带有保守的色彩。”“他主张红军自由发展”,“以期获得迅速发展”,张国焘根本不接受。“我觉得许继慎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的倾向,非纠正不可。”

后来,张国焘因许继慎等支持南下方针,就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借口作风问题,指责许“在多方面保有军阀土匪的习气”,认为“反中央局领导的暗流”,“是许继慎拨弄起来的”。1931年8月,又利用敌人离间红军之计的信件炮制了以“许继慎为首的反革命阴谋案”,进行“肃反”,许始终坚持“没有做出反革命的行为,”“没有叛变的意见”。可是张国焘蓄意陷害,制造一起冤案——“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红军中”,“组织了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共九人”,“主席是许继慎”,许有把部队拖到长江边“去消灭去缴械,扯青天白日的旗帜,”投降蒋介石的计划,召开“秘密会议”,他们决定趁北返途中,在武穴“9月15〔日〕暴动。”^⑩等等。

利用信件离间红军,是敌人的惯用伎俩。1933年10月4日,沈泽民同志在《关于左倾错误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谈到,敌人“曾由飞机丢下一封刘峙给国焘的信,内容大致说,国焘派去的人已经会到,说国焘肯那样办法,真是中国民族前途之幸,请趁早下手云云,当时我自然付之一笑。”认为“显然是敌人挑拨我内部自相怀疑的一种把戏。”并没有以此对张国焘进行“肃反”,而张国焘却以同样性质的离间“信件”为由,竟除掉许继慎同志。

1931年11月,张国焘在白雀园杀害了许继慎。据肖永正同志在《从麻城起义到西入川陕》一文中回忆,在曹家河岸,许继慎同志被捆绑着,遭受鞭打,在张国焘喊着“绑到马上,拖,拖,拖拖”的吼叫声中,许继慎同志被撂倒在河滩上,“血肉模糊,奄奄一息”。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我鄂豫皖红军优秀指挥员,被活活拖死在河滩上。^⑪

许继慎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卓越军事指挥员之一。他为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为真理而宁死不屈。1945年,党的“七大”为蒙冤而死的许继慎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党籍,追认为烈士。

五、曾中生被害

曾中生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参加了党的“六大”。1930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党派曾中生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鄂豫皖苏区,建立了边区临时监委、临时军委会以及三省工农临时政权,统一了党政军指挥,取得了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巩固了根据地。

在南下分歧产生后,张国焘借“肃反”之机对曾中生进行迫害。当时因曾中生是中央派来的,在苏区讲究政策,作风民主,深受干部、群众拥护,而张国焘就采取先除掉曾中生周围的主要干部,后对付曾中生的办法。1931年10月上旬,张国焘在光山县泼皮河召开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在南下分歧问题上组织斗争曾中生。由于多数干部仍认为曾中生在军事方针上是正确的,张国焘便避开实质问题,以曾中生召开鸡鸣河会议和向中央直接报告为由,指责曾中生“动摇了党在红军中的威信”,并扣上“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名。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1931年10月)中并诬控:“在中央分局开始工作以来,全部鄂豫皖苏区的党,在路线到处虽有转变,唯有四军中这个转变没有开始。这里主要的负责者就是曾中生同志,……在中生同志的领导之下,四军中一般同志对于中央分局的路线是异常模糊的,对于立三路线错误实质是茫然不确〔解〕的。中生同志用家长制度的方式去领导红军,丝毫不进行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对于传达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有系统的怠工,所以至今红军政治路线上的转变还得从头做起。”“中生同志绝对不能再继续做四军的政治委员”,“决定撤销中生同志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

张国焘把这一处理决定报告了中央,得到了以王明为首的中央的支持,中央在给分局的信中指出:

“在详细研究了中央分局关于四军的决议,中央分局的报告及四军领导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后,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

“中央着重指出:四军领导干部违抗中央分局命令,自由决定占领武穴回兵取六安的策略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四军这计划如不被许多客观原因所阻碍,而得顺利实现时,将造成极大的罪恶,而使鄂豫皖苏区受

到严重损失。在组织上,四军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自由更改军事计划,拒绝中央分局的正确指示,召集非党会议来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印发中央分局的决议到地方党部及军队中、下级党部中去,并且不经中央局直接向中央报告,企图蒙蔽中央,是严重反党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布尔什维克所不能允许,而且是侮辱了工农红军的政治工作的光荣。关于错误的实质,原因与意义,中央同意中央分局的决议。……对于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红军积极分子会议的组织者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中央分局在重新讨论中生同志的问题时,应注意到这一点。”^⑩

面对打击迫害,中生同志坚持正义,从未妥协,他当着张国焘的面指出:“真理是掩盖不了的,是非总有一天要澄清。”

11月25日,张国焘在向中央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时说:“鄂豫皖苏区整个来说,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

直到12月黄安战役胜利时,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中生才被调任黄安独立师师长。

1932年12月9日,部队抵陕西南部城固小河口,曾中生同志挺身而出,与邝继勋,余笃出等商议,向中央反映张国焘放弃苏区,盲目向西转移,毫无目的的退却和军阀主义作风,请中央挽回危局。后改由曾中生书面向张国焘陈述大家意见。张国焘在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听取意见”,还让曾中生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表面上好象接受,实际上在伺机报复。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台开军事会议之后,张国焘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认为已站稳了脚跟,便在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上开展“反右”斗争,要除掉曾中生,把在小河口会议上抵制错误领导的干部当作“右派”、“反党分子”,先后秘密杀害了邝继勋、余笃山等,长期软禁了中央代表廖承志等。

8月,张国焘在《干部必读》上发表《右派的根本错误》和《托陈取消派之完全破产》两文,诬陷曾中生是“托陈取消派”、“右倾首领”。胡说:“曾中生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立三这种半托洛茨基的观点,无怪乎得到了惯于军事投机的曾中生的极端的拥护。”“象曾中生这样的分子”“党再也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随即,宣布撤销了曾中生西北革命军

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将正在撰写军事著作的曾中生非法逮捕,严刑拷打,强令写“自首书”,责令交代小河口会议和在苏区所犯“错误”。曾中生不服,遂被长期关押。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仍坚持著书,写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游击战争要诀》等军事著作。当时张国焘不得不承认“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本”。批准于1933年10月初正式印成单行本,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下发红军广大指战员。

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吸收了这本册子总结的作战经验,在书中写道:“……江西叫‘诱敌深入’,四川叫‘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战争开始阶段所采取的必须采取的方针”。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曾中生得知后,直接向张国焘提出要求释放并允许他向中央汇报、写信。

中央知道曾中生被非法监禁后,指名要见曾中生。张国焘害怕揭露真相,扣压曾中生给中央的信,不许他与中央领导见面。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将曾中生用绳索活活勒死,杀人灭口。他们却造谣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手段毒辣、卑鄙之极。

在张国焘封锁下,中央不知曾中生被害。1936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在陕北,特意请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垮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钟圣(即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属。”^①

刘伯承曾说过:“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徐向前也说:“中生同志很能干,军事上比较行,同时比较全面。”党的“七大”上,中央为曾中生平反昭雪。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寻求真理,英勇奋斗的一生,曾中生同志的功绩会永载史册!

注释:

①曾中生关于反“围剿”作战及部队会编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2月10日)。

②中央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1931年3月10通

过)。

③张国焘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1931年5月24日)。

④中央分局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1年10月9日)。

⑤⑭鄂豫皖中央分局国焘(向中央的)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1931年11月25日)。

⑥⑦⑧⑨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1931年6月)。

⑩原件抄者注,此处不明。以下同。

⑪⑫红四军给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信——为不执行鄂豫皖区中央分局指示向安庆进军的申明事(1931年9月)。

⑬徐向前、曾中生、刘士奇:关于红四军情况及行动方向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20日)。

⑮张国焘在黄安县委及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议上所作的结论(1931年11月)。

⑯陈昌浩在鄂豫皖苏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作关于此次肃反详情的报告(1931年11月22日)。

⑰《天津文史资料选编》第6辑(1982年2月版)。

⑱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信(1931年11月3日)。

⑲林育英为保全廖承志、曾中生同志的生命致张国焘电(1936年2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长征时期〉)。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文件校勘记

田逢禄

最近,我们在编辑中央文件选集的过程中,校读了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文件。有些问题,随手作了一些札记。现在整理出来,希望能为研究和利用这部分档案的同志,作一响导。

(一)关于会议时间

关于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开会的时间,过去出版的许多党史著述材料说法不一。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中说:“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8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说: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至七月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李雄汉的《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中说:“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央为贯彻共产国际训令,制定今后的工作方针,在上海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我作为江苏省委的代表列席了会议”;由萧超然、梁柱、汪其来主编的《中共党史简明词典》(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中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1929年6月25日在广州举行”,等等。这里首先说一下,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的说法恐怕不对。因为当时党中央的工作地点是在上海。《词典》上的这种说法,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致在狱同志及死难同志与在狱同志之家属书》中的说法相一致。这个文件一开头就说“我们党的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已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在广州开过了”,文尾还写有“一九二九年六月于广州”等字样。但是,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为了迷惑敌人的一种做法。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会议是在国民党统治的秘密环境下举行的。一位国际代表在致词中说:“今天我们这样秘密的这样酷热的在这个小房间内开会,我希望下次全会时在广大的群众的前面举行,那个时

候我们要把我们的敌人关在这个又热又小的房子内!”所以,为了迷惑敌人,免遭破坏,当时有的文件说成是“在广州举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此次会议是在上海召开的。

至于会议的具体时间,这确是相当难于判定的问题。下面列举一些材料,并说一下我们的大致看法:

首先,从这次会议形成的文件上书写的的时间看:绝大多数文件上都写的是“一九二九年六月”,只有六届二中全会宣言写的是“一九二九年七月五日”。

再从中共中央发出去的一些文件中的说法看:会议刚刚结束后的1929年7月9日《中央通告第四十号》中说:“六次大会后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业于日前开过了。此次大会开在六大会一年之后,……全会有过半数的中央委员及参加的同志六人,会期六天”;1929年11月2日(一说是1929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给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诸同志的信》中说:“二中全会开到六月底至七月初,大家在一致的精神之下,同意于中央一年来的工作路线,决定了许多重要策略及实际工作方针。”

再从会议记录中反映的情况看: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六届二中全会的原始记录不全,只有1929年6月29日和6月30日两天的。6月29日是由冠生(即周恩来)向大会作组织问题报告,6月30日是大会发言,讨论组织问题。两天到会的人数都是14人。从这份原始记录上看,1929年6月29日和6月30日六届二中全会开会报告和讨论了组织问题,这是肯定怀疑的。此外,我们还看到一些所谓的会议记录,计有:《政治问题报告记录》(85页),《组织问题报告记录》(87页),《士兵运动报告记录》(23页),《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报告记录》(20页),《上海工作报告记录》(15页),其中的“记录”字样,象是后来有人加上的,笔迹与其他文字迥然不同。这些“报告记录”的文字都抄写得十分整齐清楚,用纸也都一样,都是用的印有“上海文房洋行印”等字样的竖格纸。我们分析,这些都象是在开会之前写好的稿子,而不是真正的会议记录。这些所谓的会议记录,以及还有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向六届二中全会的致词,稿件本身都没有写明时间,都是在首页的戳记上写着“1929年6月25日”的字样。这些报告和致词材料,共计有230多页,这么多内容绝不可能是同一天之内讲完的。但是戳记上写的“1929年6月25日”这个时间,也决不会是凭空乱写的,它可以提供我们考虑,这很可能是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开始开会的时间。此外,我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还看到,1929年6月22日第四十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六届二中全会的大会议程,决定:“第一日,①

开幕追悼,②政治报告和讨论;第二日,①中央工作报告和讨论,②通过几个小决议案,成立军事、宣传小委员会(军委五——六人,宣传五——六人);第三日,职工运动报告和讨论;第四日,①组织问题报告和讨论,②通过宣言”。由此可知,在6月22日之前,六届二中全会还没有开会。

综观上述材料,关于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开会时间问题,我们认为:第一,“一九二九年六月”的说法太笼统,而且也不准确;“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的说法虽然具体,但是也不准确;“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至七月初”的说法比较好一点,但是它同1929年7月9日《中央通告第四十号》中的说法仍有矛盾。7月9日的这个《通告》中说的是“六次大会后第二次中共全体会议业于日前开过了”。这个在7月9日所说的“日前”,很难理解为是在七、八天之前的“七月初”。第二,现有材料还不足以确定六届二中全会开会的具体日期。第三,根据现有材料,将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开会时间写作“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比较稳妥。

(二)会议文件形成的经过情况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形成的文件主要有:(1)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2)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3)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案;(4)政治决议案;(5)组织问题决议案;(6)职工运动决议案;(7)宣传工作决议案;(8)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9)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10)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致在狱同志及死难同志与在狱同志之家属书;(11)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告柏林无产阶级书。

我们从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六届二中全会的许多文件,都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形成过程。早在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即1929年6月22日,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会议上,就开始讨论初步起草的六届二中全会的一些文件。这次会议先后讨论了准备提交二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与决议案,政治报告与决议案,以及职工运动决议案。会议讨论结果,认为政治局的工作报告写得不好。太平庸,太技术性了,决定推翻重写,由李立三重新起草,如果时间来不及可只写个报告大纲。关于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案,决定由周恩来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负责进行修改。关于政治报告与决议案,决定交李立三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决定交项英负责,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

1929年6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第四十二次会议,继续讨论六届二中全会的一些文件。这次会议先后又讨论了二中全会宣言,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以及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决议案。二中全会宣言是“毛子”提出的,会议认为这个宣言写得非常不好,根本不能用,决定由李立三重新起草宣言。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会议提出两个决议草案,一个是项英起草的,一个是“毛子”起草的。“毛子”认为项英起草的决议草案政治方面太多了;项英认为“毛子”起草的那个决议草案,未将职工运动发展的形势写清楚,对黄色工会改良主义写得太多,这个草案在工会里可以用,但用作党的决议不好。会议认为,可将两个决议草案合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起草。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周恩来发言说:瓦西列夫的草案仍可以用,惟须加些材料,特别是路线方面,并指出更具体的办法,还应加上:(1)自首问题;(2)妇女问题;(3)加紧干部训练问题。李立三发言说:纪律与教育单独写,这是一个严重问题。邓发发言说:干部训练问题应说一些办法。项英发言说:注意吸收女党员是很重要的,还有妇女群众问题也很重要,还有说服精神问题,应当加上一点。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案,周恩来发言说:其中有一句话改得不大妥当,即中央并未忽略吸收新干部,不仅没有忽略,而且很坚决。会议决定:修改。

1929年7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会议,比较集中地审查通过了一批六届二中全会文件,计有:(1)二中全会通告(即《中央通告第四十号》)——决定:修改通过;(2)政治决议案——决定:修改通过;(3)中央工作决议案(即《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案》)——决定:通过;(4)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修改通过。此外,会议还通过了几个小决议案,即:告红军书;告柏林无产阶级书;对国际右倾问题决议案;告在狱及被难同志及家属书。

时隔半个月之后,1929年7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六次会议上,又审查通过了二中全会的《职工运动决议案》。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闭幕约一个月之后,1929年8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四十八次会议,又讨论了由李立三起草的二中全会宣言。周恩来发言说:“毛子”主张加一段,说明党的努力。农村一段,将雇农加上去。项英发言说:青年,一句话不够,应多写一点。会议决定:修改通过。我们可以由此推断,1929年8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实际出版时间不是8月1日,而只能是在8月6日之后。因为这是一期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文件专号,其中载有二中全会宣言,8月6日之前这个宣言还没有最后形成。

(三) 版本考订

从上述文件形成经过情况可以看出,有不少文件,从起草到讨论修改通过,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有的还是推倒重写,这中间可能有过不少稿本,究竟哪个是中央最后讨论通过认可的稿子,必须仔细地认真地进行考证。现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文件及其版本很多,主要有:(1)1929年8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它是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文件专号,共编入文件11篇,即:《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书》、《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与精神》(即《中央通告第四十号》)、《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政治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中国共产党二中全会告柏林无产阶级书》、《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致在狱同志及死难同志与在狱同志之家属书》。(2)中国问题研究院1930年在莫斯科印行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材料》,这也是一个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文件专集,它也收入文件11篇,即:《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政治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共产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中国共产党二中全会告柏林无产阶级书》、《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致在狱同志及死难同志与在狱同志之家属书》、《二中全会的决议与精神(中央通告第四十号)》。(3)中共中央书记处1941年编印的《六大以来》,其中收入六届二中全会文件共6篇,即:中共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二中全会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二中全会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组织问题决议案、二中全会职工运动决议案。(4)一个1929年8月26日重印而没有署名编印机关的油印小册子,它是一个二中全会决议案汇集;共收入4个文件,即:政治决议案、关于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此外,还有不少零散保存的六届二中全会的文件,其中包括1953年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接收来的一些文件,以及《红旗》上刊登的个别文件。这些各种不同版本的文件,有的不仅在文字上有很大出入,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原则的区别。究竟哪个是中央认定的最后修改通过的文件,必须逐个仔细地进行对比研究,才能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和选择。同时,这些文件大都是经过反复转抄翻印而来,在转抄翻印过

程中难免发生一些错讹,这就需要在选用时对照一些不同版本加以校订。此外,有的刊物在刊印文件时,考虑到当时秘密工作的需要,对有的文件作了若干删节,在选用时也需要对照其他版本加以增补。因为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这里只能举几个例子说说:

第一,关于政治决议案。这个文件有四个版本,即《布尔塞维克》、《六大以来》、《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材料》和二中全会《决议案集》。前三个版本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但它们同后一个版本相比较,不仅在文字上有许多地方不一样,而且在内容上有的地方也有重大的原则区别。比如关于富农问题的一段话,前三个版本上写的是:“富农在中国特殊经济条件之下兼有半封建半地主的剥削,所以他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便要由动摇以至反革命,所以必须坚决的反对富农,才能彻底完成土地革命。至于富农还留在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战线的时候,党必须极力发展雇农贫农在思想上组织上斗争上的影响,以与富农争夺领导权。”而后一个版本(《决议案集》)上的这段话写的则是:“富农于中国国家封建制度残余的剥削下,在相当的斗争阶段之中,我们还有吸引他参加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的可能,所以无条件的反对富农的路线是很错误的。但当着农民与他的主要敌人地主豪绅决战的时候,富农中兼半地主或拥有多数雇农的分子必然跑向反革命的方面,故同样地不应放松雇农贫农对他们的阶级斗争。”这两段话显然有重大政策原则性的区别。与此相联系,我们看到,《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在刊登《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与精神》(即《中央通告第四十号》)一文中,在“目前农村斗争中,无条件的反对富农,仍是错误的”这句话之后,加了一条注释,说:“此句错误处在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指正信来后,中共中央已于原决议案上加以改正”。这说明,上述不同版本中,关于富农问题的重大政策原则区别,是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后,对原决议案作了修改。问题是中央这个修改是在什么时间?如果是在二中全会开过之后是否合法?修改前的版本与修改后的版本,何者为准?查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其成文时间是1929年6月7日。中共中央是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信的呢?《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诸同志的信》中说:“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秋白同志的来信,都还能在中东路问题发生之前数日到来,使我们对于农民问题——尤其是富农问题的讨论,能有进一步的了解”。这里告诉我们,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来信,是在“中东路问题发生之前数日”。那么,中东路事件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据《中国现代史大事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48年1月出版)中说:1929年7月“7日,张学良抵北平,与蒋介石、闫锡山会晤,策划中东路事件。10日,张学良部队占领中东路,查封苏联远东贸易局、煤油局、商船局、商业联合会”。这就是说,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是在1929年7月10日之前的数日。那么,中共中央又是在什么时间对二中全会原政治决议案中关于富农政策问题的上述那段文字进行了修改呢?具体日期,现在还没有材料供我们判定,只能大体上说是1929年7月上旬中央收到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来信之后至1929年8月1日《布尔塞维克》刊登修改后的这个政治决议案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二中全会闭幕后不久,1929年7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第四十三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央通告第四十号》中,对富农政策的说法还没有进行修改。由此我们推断,上述那段关于富农政策问题的修改时间,很可能是在7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会议之后,当然也是在二中全会闭幕之后。那么,二中全会的决议,在二中全会闭幕之后中央再作修改合不合法?我们认为,应当承认是合法的。会议文件,大会原则通过,会后中央修改定稿发出,这是我党一贯的作法。我们从上面介绍的二中全会文件形成的经过情况可以看出,所有二中全会的主要文件,都是在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通过的,而且有的是在二中全会闭幕之后很久时间,如二中全会职工运动决议案,是1929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第四十六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二中全会宣言,是1929年8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四十八次会议讨论通过的。

至于修改前后的版本何者为准的问题,当然应当承认是修改后的版本为准。对此,我们再引证一点材料,1929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中,在检查总结过去党对富农策略问题的错误时,说:“党对富民问题的策略发生极大的动摇,或认为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或认为无条件的反对富农是不对的(二中全会的总结通告)^①;或使党的策略路线受富民态度的支配(六次大会农民决议案);甚至提出联合富民的口号(如中央对朱毛的指导信),尤其错误的是因联合富民而牺牲雇农的利益(如江苏淮阴恐怕富农反对革命而要雇农减低要求)。这些错误,尤其是联合富农的错误,可以妨害党领导农民斗争完成土地革命之急迫的任务,而走上机会主义的道路。”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是,这里没有提二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由此可见,中央认可的是修改以后的那个政治决议案,

^① 即指《中央通告第四十号》。

而不是修改以前的那个政治决议案。

此外,我们从这几个不同版本的对比中还发现,修改前的这个版本,还存在其他许多重大遗漏和错讹,比如,修改后的《六大以来》等三个版本上写:“遂造成现在英日美互相敌视的三角冲突的形势。美帝国主义一贯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这是公开的攘夺英日既得特权的口号,尤其是最近一年来美帝国主义挟其庞大的财政资本的优势着着迈进,更引起英日的嫉视,所以现在太平洋上英日美帝国主义三角冲突之中。”而修改前的《决议案集》本上则写为“遂造成现在英日美互相敌视的三角冲突之中”,中间少了94个字,显然是转抄中的重大遗漏,很可能是抄写人将前后两个“三角冲突”看串了行。又如,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写为“门户开放机会等政策”;将“中国革命的危机是在一天天加深的”,写为“中国革命的危机是在一天天”;将“正确的运用斗争的策略”,写为“正确的动用斗争策略”;将“已完全失掉他的在革命中的作用”,写为“已完成失掉他的在革命中的作用”;将“对于不正确的倾向必须领导全党同志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写为“对于不正确的倾向必须领导全党同志与之作决定的斗争”,如此等等。但是,这个版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例如,修改后的版本中有这样一段话:“青年团的工作:(一)应积极的创造用团的无产阶级青年的基础;(二)加强团员群众政治生活,经过团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于青年群众中;(三)青年团应肃清前一时代非青年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创造新的青年工作方式与方法,争取广大的青年群众到赤色工会方面来,在斗争中争取青年的特殊利益;(五)加强反帝国主义的工作”。这中间有(一)(二)(三)(五),而没有(四),显然有问题。参照修改前的这个版本,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原来是在“(三)青年团应肃清前一时代非青年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创造新的青年工作方式与方法”之后,漏掉了“使团的工作青年化;(四)运用青年群众组织的特殊方式与方法”。

第二,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这个文件共有6个版本,即:《布尔塞维克》,《六大以来》42年版,《六大以来》51年版,莫斯科出版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材料》,二中全会《决议案集》,《陕北临时特委通讯》。在对待富农政策问题上,这个文件跟上面谈到的政治决议案有类似的情况,在这些版本中存在着重大原则性差别,显然也是中央政治局在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富民问题的来信后,进行了修改。从这个问题上看,二中全会《决议案集》和《陕北临时特委通讯》属于修改前的版本,其余四个都是属于修改后的版本。关于富民问题,修改前的版本中的写法是:“农会的组织成份应以贫农雇做中心,但富

裕的也应当吸收到革命运动中来,比较富裕的成份,则可使之加入农会”。而修改后的版本这段文字的写法则是:“农会的组织成份应以贫农民雇农做中心,在原则上要反对富民加入农会。当前有些地方富农还停留在农会中时,我们应号召雇农贫农领导中农与之作坚决的斗争,以肃清其出会。假使富民占多数的农会,则我们便应无疑地号召雇农贫农领导中农组织自己的农会,以反对富民的农会。更主要的,我们必须领导雇农组织自己的独立系统的组织,以树立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础”。此外,对照这些不同版本,还有几处明显的修改,比如:(1)将“在秘密条件下,党员虽不必人人作为工会会员,但在斗争的实际上,党员已不仅是群众中的战斗员,且必须是群众的先锋分子”,改为“每个党员在其生产部门,必须加入其所在的工会,在斗争的实际上,党员更不仅是群众中的战斗员,且必须是群众中的先锋分子”;(2)在“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正在逐渐开展”这句话之后,增加了“城市反帝运动与争自由的斗争也正在向着汇合的道路进展”;(3)在“庞大而不实,不如质量精悍的支部便于作战,于革命的发展更有利”之后,增加了“但这并不是说,对于没有力量的支部,就要将它取消,相反的,正要我们加紧努力,使它渐次成为有力的支部”;(4)将“在有些苏维埃区域甚至于非常手段看作普通纪律以造成党中的恐怖空气,这实是很严重的错误”,改为“在有些苏维埃区域,甚至以非常手段看作普通纪律,以造成党内的恐怖空气,这实是很严重的错误”,并在这段话之后还增写有:“嗣后各级党部应严厉禁止此种行动。如发现有党员反动,应提交中央处理”等内容。此外,我们还发现,修改前的那个二中全会《决议案集》,在其他文字方面的错讹现象也比较多,比如将“形式主义常伴着官僚主义的倾向”,写为“形式主义尝伴着官僚主义的倾向”;将“目前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发展”,写成“目前党内非无产阶级发展”;将“改造旧基础与发展新基础”,写为“改造旧础与发展新基础”;将“准备党所领导的斗争与行动”,写为“准备党所领导的与行动”;将“这与地方党部代替支部是一样的错误”,写为“这与地方党部代替支是一样的错误”;将“党员在失去了联络许久之后”,写为“党员在失败了联络许久之后”;将“党内小资产阶级意气之争”,写为“党在小资产阶级意气斗争”;将“群众自发斗争的开始复兴”,写为“群自发斗争的开始复兴”;将“要为本身谋利益”,写为“要为本身利益”;将“在现在革命阶级中”,写为“在现代革命阶级中”;将“于是一切城市贫民争自由的斗争”,写为“于是切城市贫民争自由的斗争”;将“这种现象的来源有二”,写为“这种的现象有二”,将“有可能时组织游艺会茶会邀请士兵参加”,写为“有可能时组织

游艺时茶会邀请士兵参加”，将“赤色组织多半消失”，写为“赤色组织多半自失”，如此等等。

经中央修改后的这个文件版本中，《布尔塞维克》、《六大以来》42年版和《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材料》这三个版本，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缺点是不够完整，有多处作了删节。我们判断，很可能是当时为了保护党的机密，免遭敌人的破坏，在刊印时有意作的删节，共计约四千多字。而《六大以来》51年版则弥补了这个缺陷，它是在《六大以来》42年版的基础上，参照其他比较完整的版本，将原来删节的内容作了校订补充。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版本。不过我们发现它也还有点问题，即还有一段关于济难会工作问题没有补上。这段话的文字是：“济难会的发展应超越党的范围，吸引广大群众走向革命同情的道路。济难会应坚决的脱离“党的救济部”的关系。他们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展互相救济的活动，决不是在党组织之外，依照党的组织系统，委派一些工作人员，去设立一些机关，所能建立工作的。愈如此愈障碍深入群众的工作，愈加将自己限在‘党的济难部’的范围之内。只有在群众中互相救济的活动发展之后，在非党群众中有了不拘任何形式的救济组织之后，济难会才算建立了自己的群众基础。故济难会的目标，是应超越党的范围，吸引广大群众，团结在互相救济的名义之下，逐渐的领导其走向革命同情的道路，以扩大党的活动范围。而党只应从中共起党团作用，决不是限于党的范围以内来专做党的救济工作。”因此，我们如果使用这个版本时，应注意将这段文字补上，加到该文件中的“目前党团的作用要建立在下层组织中，尤其是要使支部起党团作用”这个问题之前。

第三，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这个文件有五个版本，即《布尔塞维克》、《六大以来》、《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材料》、二中全会《决议案集》和一份单独保管的中央文件。《布尔塞维克》和《六大以来》两个版本基本一致，缺点是该文件最后第十一项的内容不全，只有最后的三句话。《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材料》这个版本，最后第十一项的内容也不全，只有开头的一部分。二中全会《决议案集》这个版本内容比较完整，但文字错讹现象比较严重，比如将“中央确能将六次大会所规定的原则在实际斗争中正确的运用”，写为“中央确能得六次十会所规定的原则在实际斗争中正确的运用”；将“应当防止左倾之盲动主义的残余”，写为“应当防止右倾之盲动主义的残余”；将“深入产业工人群众”，写为“深加产业工人群众”；将“中央的正确路线”，写为“中央的正确线”；将“中央政治局应严厉的督促各省纠正这种现

象”，写为“中央政治局应严厉的督促各省纠正这种这象”，等等。这几个版本相比较，还是单独保管的那份文件比较好，内容比较完整，文字也比较准确。但是它也隐去了被开除出党的两个中央委员的名字，在选用时，可参照二中全会《决议案集》将其补上。

第四，关于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这个文件有四个版本，即《布尔塞维克》、《红旗》、《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材料》和一份单独保管的手抄稿。前三个版本从内容到文字以至标点都完全一样，唯有后一个手抄稿存在重大差别。比如，关于国民党新军阀战争的一段表述，手抄稿上写的是：“现在蒋桂两系的新军阀战争已经开始了，其他冯系，闫系，奉系，这些强盗也在互相仇视，冯蒋奉闫的战争必不可避免的要继续起来”。而其他三个版本则是写：“蒋桂两系新军阀的战争早已开始了，现在蒋冯战争又在酝酿，再次爆发，更引动了闫系奉系，也参加这一冲突，也在互相仇视，故全国范围的战争的扩大，是一必然不可免的事实”。从当时的情况看，很明显后一种表述比前一种表述更符合实际。比如，蒋桂战争是1929年3月开始的，在时隔四、五个月之后的七、八月时说“早已开始”，比说“已经开始”更为确切。另外，当时确已在酝酿着新的蒋冯战争，并于不久后的10月即在河南开始了蒋冯战争。又如，前三个版本中将手抄稿中“举行八一示威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纪念南昌暴动！等口号，以及在八一要组织示威的一段文字去掉了。实际上，有关组织八一示威的问题，中央在二中全会的宣言中，在《中央通告第四十一号》里，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里，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和要求，因此在告红军将领士兵书中完全可以不说。此外，在文字方面，这份手抄稿也有不少错讹，比如将“将近几百万人都死在统治阶级刀枪炮火之下”，写为“当近几百万人都死在统治阶级刀枪炮灰之下”；将“已经走上他们崩溃的道路”，写为“已经走上他们崩溃的路道”；将“已经开始了建筑革命道路伟大的工程”，写为“已经开始了革命道路伟大的工程”；将“全国工人群众，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几个中心的区域，斗争已开始复兴，全国农民群众，尤其是湘粤干闽，反抗日益加强”，写为“全国工农群众，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几个中心的区域，斗争已开始复兴，全国农民群众，湘鄂干闽，反抗日益加强”，等等。使用档案的同志往往以为手抄稿可信，在这里不可持这种想法，因为这个手抄本并不好，它很象是一个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草稿。

四保临江文献资料摘述^①

田仲群^② 陈小枚

四保临江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的一次战略决战,它扭转了战局,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迫使其由攻势转为守势;其间,陈云同志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陈云到南满

1946年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为了加强南满的领导,坚持南满斗争,粉碎蒋军的所谓“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扭转东北战局,经中央批准,决定派陈云同志和肖劲光同志到南满,“陈云同志为南满分局书记兼南满军区政治委员,肖劲光同志为南满军区司令员”。(见1946年11月1日《东北局给各分局、省委、各纵队、各师旅并报中央的电报》)

关于决定派陈云、肖劲光到南满去的原由,1946年10月31日林彪给中央军委的电报有详细说明。该电报说:

“敌将进攻南满时及进攻开始后,我们前后有七八个电报,总是要他们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反对分兵把口,反对分兵进攻和反对只打游击。但他们恰恰没逃出这三个圈套。故打了很多击溃仗,每次伤亡大,缴获小,部队疲惫不堪,形势日益恶化。主要原因是领导太弱。现决派陈云、肖劲光两同志担任南满的领导,免得南满垮台。该地区有我兵力九个师,四个炮兵团,占整个东北我军兵力五分之二以上,武器弹药较北满部队更好,地区全为山地,下层干部甚多,气候人口条件均好。故只要领导加强,就能大有可为。否则影响整

^① 这篇文稿曾刊于《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6期,这次收入本册文稿,又根据《肖劲光回忆录》作了重要补充。

^② 田仲群,即田逢禄、耿仲琳、唐群。

个东北局势甚大。”

这个电报中所说,过去批评南满没有集中兵力歼敌的电报“有七八个”之多,我们看到的有:

(1)1946年10月18日,东北局林彪、彭真、高岗、陈云给南满肖华、程世才、罗舜初的电报中说:“如我不采取集中兵力,向敌进行各个击破的方针,而采取分兵把口,单纯防御的方针,则不仅不能对付敌有计划的大进攻,且不能打击敌之蚕食政策,则我兵源粮源区及战场日益缩小,其前途是非常危险的。故你们在现阶段,在东南满的战略方针,应为避免作大的防御战与进攻战,但必须集中兵力(要有围攻敌人的部队,同时又要有打敌增援的部队),采取主动进攻歼灭四个营以下的目标,打在运动中的敌人或驻止的敌人。如不坚决实行这一方针,则你们地区有全部失去的可能。如你们实行这个方针,而又坚持巩固与发展群众工作,则你们随时间的长久,会日益强大起来。”

(2)1946年10月19日,林彪、彭真、高岗、陈云给肖华、程世才、罗舜初并告各兵团并报中央的电报中说:“十师与十一师两个战斗虽然胜利,但均未打好,没有歼灭敌人。可见你们仍未集中优势兵力(应该用五、六个团围攻一个团,不应该用三个团打一个团),采取包围迂回,和控制足够兵力打敌增援。如不实行此办法,则只多只能打击溃战,而不可能打一个好的歼灭战。南满三、四两纵队今后应该好好研究毛主席战略学第五章及总部前发作战指示,要在思想上彻底解决集中兵力的问题。要彻底反对分兵把口的挨打方针,和分散兵力打击溃战的方针。”

(3)1946年10月20日林彪、彭真、高岗、陈云给肖华、程世才、罗舜初的电报中说:“此次你们应一心一意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每次用八、九个团打敌一个团(可用四、五个团左右的兵力担任直接进攻,以其余部队放在周围防止敌突围和打敌增援。”“尽可能少打掩护战斗,免得碰坏了部队,不可再重复清源的教训。”“望鼓励军民士气,说明斗争方式,以过去内战的经验和八年抗战的经验,来提高最后胜利的信心”。

(4)1946年10月24日林彪、彭真、高岗、陈云给肖华、程世才、罗舜初的电报中说:“你们必须集中兵力,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歼灭前进中敌之一部或一个单独的小股,以绝对优势打敌劣势,切忌避免打击溃战和打清源式的战斗(既打垮与打疲劳了部队,又丢掉了城市,今后如遇类似情况,则应放弃城市,保存军队)。你们近来几次战斗都是由于没有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故打成了击溃战。今后应集中八、九个团打敌一个团,即以四个团左右的兵力,配属

炮兵,担任进攻,其余放在战场周围,担任捉突围的敌人和担任打增援部队。”

(5)1946年10月26日东北局给辽东的指示中说:“自敌发动进攻以来,你们打的尽是击溃战,,或被敌击退。这种仗就会使士气愈打愈低,使敌愈加猖狂。你们所使用的兵力没有达到绝对优势,而又未注意断敌后路,故形成这种结果。望你们坚决实行六至九个团打敌一个团的方针(以四、五个团担任攻击,其他的摆在周围捉俘虏),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辽东形势。如你们不执行总部指示,则辽东局面将日益严重。”

关于调整和加强南满领导的问题,韩先楚(当时任南满四纵队副司令员)早就向东北局提出过建议。1946年5月6日韩先楚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南满是我顽斗争尖锐之地,要使我东北满巩固与发展,在南满应起一个左右手的力量作用。我个人感觉,南满之主要负责同志,在人的方面欠缺老练,特别是在武装斗争上,我意必须有一个稳重老练的善于掌握各方面的同志为宜。”之后不久,东北局曾向中央建议,“请许世友来南满任司令员。”(见1946年5月26日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1946年5月28日任弼时代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复电中说:“许世友能否调南满,待与山东商定后再告。”

1946年11月4日中央致电东北局,同意派陈云到南满,不同意肖劲光去。1946年11月9日,林彪复电中央毛主席,进一步申诉了派陈云、肖劲光到南满去的理由。该电说:“四日来电本日本才收到。陈云、肖劲光已于二日自哈尔滨向南满出发,估计现快到南满。此次令肖任南满司令,一则由于南满在军事思想上不能打通集中兵力的问题,总是分兵抵御,或分兵进攻,打击溃仗。……二则由于肖(指肖华一笔者注)程之间互不相上下,劲光则资格较老,便于统率,故派肖劲光去。现肖既已去,并已通知南满,故我意目前似暂宜让劲光接事,搞一时期再看为妥。但究应如何,仍由中央决定。”1946年11月12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复电说:“同意林九日让劲光接事做一时期再看的方针,但肖华仍担任副书记、副司令、副政委之职。”可知,林彪坚持了派陈云、肖劲光到南满这一重要决策。

二、分析形势与研究对策

根据我们的考证,陈云、肖劲光是1946年11月3日从北满的哈尔滨出发的;途经图门等地,经过二十多天的长途跋涉,于11月27日晚到达辽东分局所在地——临江。

关于陈云、肖劲光从哈尔滨出发时间和到达临江时间问题,1946年11月9日林彪给中央的电报中说“陈云、肖劲光已于二日自哈尔滨向南满出发,估计现快到南满。”1949年4月13日陈云同志在东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中说,他们是“十一月三日出发”,“十一月二十七日晚到临江”。以上这两种说法,经考证,还是陈云同志自己说的比较准确。关于他们到达临江的时间,我们还看到有如下的档案材料:(1)1946年12月20日陈云给林彪、彭真、高岗的一封信中一开头就说:“我们是11月27日晚到临江”;(2)1946年11月28日陈云、肖劲光给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也说:“我们于感日晚到达临江辽东区。陈云、肖劲光,俭日。”其中的“感日”即27日,“俭日”即28日。由此可见,他们是于11月27日晚到达临江,这个时间是确定无疑的。至于他们从哈尔滨出发的时间,除上面提到的材料外,我们虽未再看到另外的档案材料,但是我们知道,林彪当时是在前方指挥打仗,他对于陈云、肖劲光从哈尔滨出发的具体时间,不一定了解得那么清楚,他所说的“十一月二日”很可能是原定时间,而事实上是“十一月三日”才走。

关于他们中途经过的地方,我们在档案材料中看到,1946年11月1日东北局林彪、彭真、高岗、陈云给南满肖华、江华、程世才、罗舜初的一个电报中说:“为加强南满工作,东北局特派陈云、肖劲光两同志前来,请派人到平壤接候”。他们在途中究竟是否经过平壤,我们没有看到其它档案材料。但是,从陈云1949年4月13日在东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看,他们是经过了图门。他在发言中说:“到图门时,中央来电说不让肖劲光去,要陈云去(电报是高岗转去的)。肖劲光说任务大,搞不起。我回电东北局,说肖很谨慎。”可惜我们没有找到陈云给东北局的这个电报。

陈云和肖劲光1946年11月27日晚到达临江后,当时所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1949年4月东北局高干会议研究辽东斗争历史时,陈云在4月13日的会上发言,回忆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形势,作了如下描述:敌情是严重的,安东(今丹东)10月25日失守,通化11月2日失守,辽东地区只剩下五个县,临江、长白、濛江(今靖宇)、抚松、辑安(今集安)四十万人。辽东党内领导不甚团结,如果辽东失掉,对全东北影响很大。(见1949年4月东北局高干会议记录)

1946年12月2日南满军区直属队在临江召开庆祝朱德总司令六十大寿干部大会。刚刚到职就任南满军区政委的陈云同志,在会上发表了以“反动派一定要打倒,胜利一定要来到”为题的热情洋溢、鼓舞斗志、增强胜利信心

的重要讲话。他说：我刚从北满来，我可以代表北满的同志们，向在座的同志们，向南满的同志们致谢！有你们在这里扯住敌人的大腿，使北满能争取更多时间开展工作，巩固阵地。要按功劳说，南满的同志们是第一功。你们辛苦了！

今天朱总司令 60 大寿，我们应该庆祝他，祝他健康，寿比南山。

朱总司令是个老军人，远在辛亥革命时，他就和孙中山在一起。中华民国已经三十五年了，朱总司令领导革命军队也已经三十五年了。这中间因为袁世凯想当皇帝，朱总司令和蔡锷他们还领导进行对袁战争。以后他曾出洋到国外，最后到了苏联。他认为中国革命就应该照着苏联学习，回国后便参加北伐、大革命。到 1927 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朱总司令就又领导南昌起义，后来与毛主席领导的湘南农民起义到井冈山会合，创立了工农红军。以后就是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自卫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与东北抗日联军大会合，又成立了民主联军。这支人民军队已经整整有 20 年的历史了，这支 150 多万的人民军队，就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一手创造出来的。

这 20 年的历史经验，只有四个大字，就是“越打越大”，其实也是两个字，就是“打”和“大”，大是打的结果。在井冈山时，我们才只有一两千人，中央苏区全部人口才不过 250 万人。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们只有陕北几个县，到现在我们进行自卫战争，光战场就分东北、太行山、泰山、长白山，简直数不清了。我们的武器人员，更不知强大了多少倍。“打”是说明二十年所经过的曲折的道路，我们并不是早先就有地盘，慢慢地招兵买兵扩大起来，而是从长期艰苦奋斗中壮大起来的。越打越大，就是我们人民军队发展的规律。过去 20 年如此，今后还是如此。

现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又领导我们进行自卫战争了。这个战争的前途如何？毛主席朱总司令告诉我们八个字，也就是解放日报社论中写的“蒋军必败，我军必胜”。因为蒋介石有很多困难：

第一条，蒋介石野心太大，他样样都想要，想把解放区全拿过去，想把我们都全消灭。可是他的兵力不够，布置不过来，这就叫要求大，本钱少。

第二条，蒋介石统治区人民生活坏得很。在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被他发国难财，受剥削，还能勉强咬牙熬过去，名义上也算一切为了抗日；但在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打内战，更厉害地剥削压榨他们，老百姓就再也受不了了，老百姓就会反对他。

第三条，蒋介石虽有美械装备，比我们缴获的日式装备稍为好一些，但他

的兵心厌战,因此真正上了火线,拼上刺刀,他们就有许多缴枪的。这次歼灭25师,就有很多早先我们放走的俘虏领头放下武器。

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地说,这个自卫战争打下去,反动派蒋介石一定要滚蛋,最后当朝的,胜利的,一定是老百姓,是人民的军队。

现在我们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仗要打好。在正面,我们集中兵力,多打歼灭战,就象这次歼灭25师一样;在敌人后方,要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敌人越分散,守兵越少,就越容易被我们消灭掉。这是专对着蒋介石的第一条困难而来的。蒋介石兵力不够,就好比生着肺病,我们这样办,就好比给他打了一针,使他从肺病第一期发展到第二期,到第三期,一直把他送进棺材去。因为蒋介石消耗越大,他就要设法补充,就必须抓壮丁,抢粮食,必然逼起民变。民变就是反对蒋介石的第二战场。只要我们仗打得好,蒋介石内部起义,反内战的军队也就更多。

第二件,依靠人民。现在我们在农村,也就是要依靠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是:没有农民就要不得了;有了农民就是了不得!东北的情形,目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东北,我们有兵有干部,武器装备都好,只缺少个群众条件,有的同志以为东北老百姓落后,其实这是不对的。关里解放区的老百姓好,那是八年工作的成绩。现在东北的群众工作才只有半年,半年和八年相比,时间上相差十六倍。但是东北的老百姓一定能搞起来,一定能发动起来。原因就是东北人民有70%缺少土地,我们进行土地改革,解决他们的土地要求,群众就会拥护我们。当然东北农民没有军事经验,开始看见我们的军队走了,就以为大局已定,天下归了国民党,因此听见打炮就都吓跑了。反动的地主也无经验,也以为我们永远地走了,就报复鞭打那些翻身的农民。但是,我们却是“泡蘑菇”的,走了又回来,又把反动势力打下去,农民再翻身过来。这样,农民的军事经验就增加了,知道我们并没有走,就会欢迎我们,帮助我们了。东北农民的政治经验也不够,开始听我们宣传,对蒋介石是好是坏,总是半信半疑,一直到他亲眼看见蒋介石的罪行,他们的政治经验也就丰富了,明白了到底谁好谁坏。有的同志怀疑现在打仗,来不及搞群众工作。但我却说一定能把群众搞起来。因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才上井冈山时,连6个月的群众工作也没有,蒋介石去“围剿”进攻了,他们边打边搞。那时没有兵,没有干部,没有工作队,没有时间,也没有工作经验。现在我们在东北,有兵有干部,派下去的工作队不知有多少,又有积累了二十年的经验。现在的条件总比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好得多。我们依靠人民,第一条就是领导群众翻身,作群

众工作；第二条是我们的部队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农民看我们，开始先看我们对待老百姓的态度，而后才看政策。如果我们的群众纪律不好，老百姓讨厌我们，就等于打了败仗。反之，纪律好，老百姓说好，就等于打了个胜仗。

第三件，是站好个人的岗位，积极工作，加强责任心，我们要勇敢地去迎接困难的任务。那里有困难，就向那里去，战胜困难。退却逃跑，躲避困难，是可耻的。

只要以上三件事情做好，反动派一定要被打倒，胜利就一定要到来。

目前局部的从军事上看，是蒋介石进攻我们，但是更大的范围，从政治上看，是我们人民的力量在进攻。有同志问，战争需要多久？我可以回答，革命历史变化有一个规律，就是“越到后来越快”。我们算一算，据说地球的历史是二十万年，人类文化史也有五千年，共产主义的学说则才只一百年，而在这一百年中，前七十年只做了一件小事，就是马克思所亲自参加的巴黎公社，而且以后也失败了。后三十年却完成了一件大事，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力量更飞快地发展扩大着。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业，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便能战胜困难，快点爬过山顶，争取大反攻，争取胜利。

在我们面前有一面毛主席、中共中央的大旗，这个战斗的旗子的中心还写着一个大字“朱”。让我们共同在一起，严肃地、勇敢地、充满胜利信心地跟着这个大旗前进！

1946年12月3日，肖华（原任辽东军区政委）从前方回到临江，4日即召开会议，会议内容：（1）关于分局人选问题；（2）合并地区问题；（3）军事问题。会后，肖劲光即到前方（七道江），陈云留在临江，分别找同志谈话，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参见1949年4月东北局高干会陈云同志发言记录）

1946年12月13日，陈云根据掌握到的情况，起草了以陈云和江华名义向东北局和中央所作的关于辽东敌后情况和对策的报告。报告写道：

（一）敌情：1. 以正规军为主，附保安队、警察（即前土匪）、大团（早在敌占城市组成）四种武装，设点清剿，先公路，后山沟，先中心村，后普通村。2. 按官立宪，招收伪满警特村长复职。3. 宣告退地退粮，公地归公，私地归私，分什么退什么，分多少退多少。4. 对本地干部和地方武装，则欺骗布告，缴枪论赏。暂留我民选村长职务，作收买派差。勒令军属找回子弟，回家无罪，不回则罚家属。勒令献出八路寄存物资。据现有材料，敌欺骗政策，一时收效小不。5. 警特顽兵强指民财为八路物资，任意勒索，并有奸淫。6. 敌利用顽占区群众抢

我区村东西,挑拨本地与外来干部关系。

(二)地主态度:被斗争清算过的地主,多数积极反动,勒令村长、农会长负责退田退粮。过去献地之中小地主,观望居多,个别地主尚不敢收田。边缘反复区与远敌后反复区,中小地主之态度有硬软之分。

(三)农民、区中队、民兵与本地干部态度:1. 现在农民已分出共产党好,国民党坏,除个别外,一般已无过去那种袭击我少数撤退人员事件,且有个别掩护我者。对国民党幻想,非接敌区还有盲目现象,但原接敌区已无盲目现象。2. 普通农民、区中队员、民兵及许多本地干部,都认为兵力上国强共弱,又因不知我反复斗争,均认为八路大势已去。民兵多数叛变,县区武装则少部叛,大量逃。原区村干部仍被迫为敌服务(在敌未到之村亦如此)。农民献出物资,个别县有杀押老干部的(其中有坏分子,多数为保全自己)。新干部已退出,大多溜跑,仍留者亦不安。3. 多数农民不愿将分地分苗所得粮食交地主。他们的办法就是十分之一放在谷仓,十分之九藏于密窖,以“收成坏”、“八路吃了”,来应付地主。此种藏粮手段,我可普遍用为保粮斗争办法。用一切办法让农民享受分地所得粮食,必增土地斗争决心。4. 地主必追田粮,被清算者必报复。国民党抽丁,许多缴枪的区中队员、民兵被押,有利于我军敌后活动。

(四)我情:1. 已无经常地方工作,只有敌后武装活动。计:①安奉、南满两铁路间(辽东省委),有较强之独立师,孤山、安东附近吕志恒部原有二千左右;②安奉路东营盘、兴京、桓仁、浑江以西,有十二师一个团及三四地委共三千余武装;③南满、吉奉、平梅三铁路间各县地方及武装曾全退,现有一部挺回去。2. 敌后各县,区县干部牺牲不少,现均集中,随军活动。3. 现随军活动之新干部,每县有二十左右。另有一部退临江,拟给以短期教育。还有许多新干部,既知民情,又很有希望。必须强调,无本地干部,我会失败。在新干部中要多给阶级教育,说明革命大势,并以实例证明,回家必受害,不回家无害家属,国民党决不能杀几百万个参加八路军的东北人的家属。4. 因战前未疏散精简体弱与妇女,许多地方部队被迫退还安置。5. 各县物资,事先未藏于敌一时走不到的远后方,均被截去或献出。

(五)对策尚待与安东省委讨论,但拟议如下:1. 南满只剩5个县40万人口,坚持敌后是成败关键,须派出相当主力去敌后。2. 打击反动地主警特,保护农民已得粮食,破坏抽丁。3. 力争游击区存在,创造游击根据地,以便适当时机恢复某些根据地。4. 调整敌后干部,注意精干、经验、坚定、团结、共甘苦

等条件。5. 特别注意培养本地干部。6. 对受骗被迫服务的村长、农会人员，一般不以反革命对待。7. 可能失守的县区及敌后，须分散掩埋必需物资，必须亲自动手埋，不损失。

三、七道江会议

1946年12月中旬，正当南满的国民党军队集中兵力，准备向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时，辽东军区党委在七道江召开一次极其重要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研究了敌我斗争形势和部队的行动方针问题。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中，我们没有发现七道江会议的档案材料，只看到陈云在会后谈到这次会议的两个材料：

(1)1946年12月20日陈云给林彪、彭真、高岗的一封信中说：“十三日之前我都在临江，十三日晚十二时我到前方去处理一个大的行动问题，因为有争论。十五日回临江又讨论了一天，此后如给你们电报。”这里所说的“到前方去处理一个大的行动问题”，就是指七道江会议，决定南满部队的行动方针问题。

(2)1949年4月东北局高干会讨论南满工作时，4月13日陈云同志在发言中谈到七道江会议的情况时说：12日这一天，据说师以上干部开会，有不少人认为办法不多（彭嘉庆说有），有向北转移一部兵力之意，但未作决定，要我与江华到前面开会，且叫当夜就去，说是有重大问题。我考虑了一夜，第二天才走（13号），江华留在家。第二天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多数主要负责同志发生了反复考虑，肖劲光、程世才、彭嘉庆、莫文骅、罗舜初认为到北满不好，与其到北满，不如在南满打游击。肖劲光压住了一个行动。当我到前方时，决定的方向是要到敌后了。这是我13日到前方时亲眼看到的。13日晚十时到前方，当晚我提议不开会，与肖华及前述诸人及曾克林都接触了。主张将一部或大部主力转移北满是问题的中心。其理由为打运动战，南、北满一样，大兵团塞在敌后有危险。第二天开会时我的意见是：（1）退到最后还是不能打运动战，而打游击战，北满变成南满，将来没有今天；（2）到敌后无全军覆没之危险，因为有群众，有长白山的地形，可在山头上转来转去，瓦房店等地鸭绿江结冰，这些条件决定，决不会全军覆没。东北对全国有重大关系，辽东不能随便丢掉，如果不坚持，影响后果很坏。这样，就决定在敌后作文章。……最后即决定四纵队出去。（见1949年4月东北局高干会议记录）

现在,我们有了肖劲光的回忆录,他对七道江会议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材料(摘自《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我和陈云同志来到临江,正是南满形势最严重的时候。1946年10月19日,敌人集中8个主力师,10万余,分3路向南满根据地进攻。南满我军主力3、4两个纵队不足4万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行了英勇的还击。11月2日,我4纵在新开岭地区全歼敌25师,俘敌65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但在敌强我弱、敌人步步紧逼的形势下,辽东军区被迫放弃了安东。不久,敌人又攻占了通化、辑安等重地城镇,进而向长白山压缩。我南满根据地只剩下临江、长白、濛江、抚松四县和两道大沟。在这种情况下,是坚持南满还是退到松花江以北,是我们到南满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到临江后不久,我们召开了由南满地区的军队和地方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成立了南满分局,统一领导南满地区党、政、军的工作。陈云同志任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亦称南满军区)政治委员,我任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同志任副司令员,重新调整了军区领导机关。陈云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及东北局对南满工作的指示,肯定了辽东省委、军区过去一年的工作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陈云要求大家,不论先来后到,不论有部队没有部队,都要讲五湖四海,团结一致,坚持南满的对敌斗争。对于能否坚持南满,当时在军区领导认识上是够一致的。我们到来之前,由于局势严重,我南满主力部队3纵、4纵已做了必要时撤过松花江,与北满部队会合的准备,地方武装也在积极准备上长白山打游击。因此,对我们坚持南满的主张,一部分同志一时转不过弯来。我在这次会上说:“南满可以坚持,不过要经过几个来回,象武松打虎一样,经过几个来回的反复搏斗。”我的话音刚落,一些同志不以为然地笑了,一时竟成了笑柄。那次会议以后,我曾准备在热水河子打一仗,用一个纵队打敌一个加强营,把一次战斗当成一次战役来打,这本来是较有把握的。但研究作战方案时,一些领导干部却通不过。说是弹药不足,兵员要补充,没有把握等等。领导干部中的这种想撤出南满的消极情绪,对部队影响很大。当时对我们来说,天寒地冻、衣食困难、根据地狭小、敌人嚣张……都不可怕,可虑的是我们自己形不成“武松的拳头”,没有“打虎”的坚强决心。我们深感思想工作任务的艰巨。

南满到底应该不应该坚持,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这成为我们辗转不眠,日夜思索的问题。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和陈云同志分头开座谈会,逐个找同志们谈心,开始了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南满的情况确实严重:美式装

备的敌人大军压境,分局和军区机关及主力部队三、四万人被压缩在长白山脚下的狭长地带。这一地区,满打满算只有23万人口,23万穷苦百姓要担负三、四万部队的支前工作,本来就很难,加上土匪、特务、伪警察、地主武装到处活动,不少干部被杀害,被胁迫,我们的一些地方武装哗变,广大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不敢与我接近,使我军的处境更加困难。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我们部队不少人没有棉衣、棉帽、手套御寒。吃的是冻得啃不动的窝窝头和酸菜,住的也很困难,部队经常露宿在冰天雪地中,靠烤火过夜。由于环境艰苦和领导上消极情绪的影响,部队中对南满的前途和命运议论纷纷,突出的思想问题是“向何处去?”有的同志认为,南满坚持不住了,再待下去就要“到鸭绿江去喝水”,“到朝鲜去留洋”了;有的对放弃城市,且战且退有怨气,说“领导要让打那里,就要丢掉那里”。可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不愿放弃根据地,特别是4纵歼灭了敌25师以后,振奋了部队,认为“我们完全有力量,为什么不打?”这些敌情、我情、军情、民情,联系到全国和东北全局的形势,都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离开哈尔滨时,东北局给我们的指示是:贯彻“七七决议”,发动群众,坚持南满根据地,完成军事上牵制敌人的战略任务。就南满此时的情况看,要完成这一任务,确有不少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并不是不能克服的。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全面地分析了形势,坚定了坚持南满根据地的决心。

首先,南满必须坚持。南满的战略地位对于东北的全局是至关重要的。其一,敌人的战略方针是“先南后北”,我如果北去,正中敌人下怀,免除其后顾之忧。而在南满坚持,则可以牵制敌人的力量,争取时间,促进东、西、北满根据地的巩固,从而打乱敌人的整个部署,粉碎敌人“先南后北”的进攻计划;其二,南满的地理环境,是整个东北的最好地区,人口多,工业基础雄厚;其三,从沟通朝鲜、大连、保持与华北的联系以及将来反攻的意义上来看,也十分重要。可以这样说,坚持南满是我决胜东北的一着棋,意义重大。

第二,南满能够坚持。全面分析敌我兵力情况和群众条件,说明坚持南满斗争的条件是具备的。从敌情方面来说,虽然国民党军队在武器装备和数量上占有优势,但却有不可克服的弱点。战争的非正义性,决定他们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内部矛盾重重;兵力不足,决定他们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出现此紧彼松的现象;在我军的打击下,敌军中老兵减少,新兵增多,军队素质下降。所以敌人是强中有弱。从我军情况看,虽然目前有不少困难,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上都不如敌人,但我们却有不少有利的条件。南满根据地并不孤立,有各根据

地的配合和支持;有主力存在,尤其是4纵全歼敌25师的胜利,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也显示了部队的战斗力,地方武装也有一定的基础;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广大的基本群众内心向我;从地理条件上看,我无后顾之忧,又有北满为策应,反攻亦有依托。另外,我们还有一大批久经锻炼的干部。条件比当年的抗日联军要好得多。抗日联军在那样弱小的情况下,还坚持了10年。由此看来,我们坚持南满根据地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善于运用这些条件,扬我之长,攻敌之短,扩大敌人的矛盾,暴露敌人的弱点,不断削弱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

第三,坚持南满要立足于战争,以战求存。面对南满的严重局面,我们深知肩上担子之重。要扭转局面,确非一件易事。我和陈云同志反复磋商,一致认为:在大敌当前,根据地紧缩,群众尚未发动起来的情况下,要巩固发展长白山区,坚持南满根据地,唯一的方法就是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内线中的外线作战。我们必须把全力放在战争上,打退敌人进攻,以战争改变形势,增强内部信心,发动群众,求得根据地的生存。陈云同志很放手,他说,军事问题由你们考虑决定。

大政方针既定,紧接下来的工作便是统一干部思想,坚定信心,研究具体的军事指导方针和战术问题。这是一项较为艰巨的任务。12月中旬,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在前线指挥所七道江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我从临江到七道江后,便与大家坐在一起谈自己的想法。扯来扯去就很自然扯到基本问题上来:坚持不坚持?打不打?怎么打……意见就不一致了。12月11日,在七道江会议上,我提出了军事行动方针,即“以军事反‘清剿’,恢复广大乡村,恢复政权,迟滞与打击敌人新进攻。主力集中于适当位置,准备于敌人进攻中,消灭其一部,配合游击战争”,并对具体作战方案提出意见。我在分析了敌我形势之后说:“从目前来看,南满的严重情况已经到来,而且可能发展。但这决不能改变我们坚持南满的决心。我们要有克服困难长期打算的思想。在任何情况下,应坚持南满。”

我的报告引起了与会同志的激烈争论,基本是两种意见。一种是少数同志同意我的意见,长期打算,坚持南满斗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长白山区地形狭窄,我大兵团作战没有回旋余地,同时兵员、武器装备不足,寡不敌众,对坚持南满没有信心,提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主张主力撤过松花江,保存力量,日后反攻。会议连续讨论了二三天,各抒己见,相持不下。这期间,得到敌情通报,敌人的两个师已向我梅河口、辑安进犯,形势紧张。我的心情

当时是很复杂的。坚持南满，事关全局。但由于时间短，这一战略意图还未被大多数同志所接受，具体的战斗方案更无法进行研究。我虽是司令员，也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能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说服大家。搞通思想，才能行动一致。然而，敌人的进攻迫在眉睫，时不我待，必须从速决断。这样，我就不得不向陈云同志求援，请他做最后的决定。13日晚，陈云同志顶着大风雪赶到七道江，同大家亲切交谈，了解情况，直到深夜。次日，陈云在会上讲了话。他循循善诱，形象地说，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陈云全面分析了形势，对“留下”和“撤走”的利弊反复比较，说明留下坚持的重要意义和可能性。他说，如果我们不坚持南满，向北满撤，部队在过长白山时要损失几千人。撤到北满，敌人还要追过来，还要打仗，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会损失几千人。如果我们从南满撤了，敌人可以全力对付北满，那时北满也很可能保不住，部队只得继续往北撤，一直撤到苏联境内。但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总住在苏联，早晚有一天还要打过黑龙江，打到北满，打到南满。在这些战斗中，以前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要损失几千人。而且，当初主力撤向北满后留下来的地方武装也会受到很大损失。这样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向北满撤会损失1万多人，占当时我们在北满部队人数的一半。相反，如果我们留下来坚持南满，部队可能损失 $\frac{3}{4}$ ，甚至 $\frac{4}{5}$ ，但只要守住南满，就不会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敌人大批部队，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打北满。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而且，敌人当时在南满的兵力也不够，我们坚持南满是完全有可能的。最后，他加重语气说，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我们在背靠沙发（指苏联、朝鲜的支援）的形势下向前，虽然是艰苦奋斗的前进，还是比退到北满最后被敌人打出国境线再打回来要合算。陈云同志的话虽然不多，但掷地有声，分量很重，意味深长，中心意思是南满一定要坚持，3、4纵队全部留下，一个人都不走，坚持就是胜利。这是关键时刻决定性的一板。这是陈云对坚持南满斗争的一大贡献。陈云同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实事求是，看问题全面，同志们对他怀着崇高的敬意，对他的领导心悦诚服。陈云同志讲话以后，肖华同志率先表示赞成坚持南满的决定，多数同志也表示了赞成的意见。尽管有部分同志的思想还不太通，但基本上统一了大家的意见，使会议在

坚持南满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转入具体作战方针和作战部署的研究。最后,会议通过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三大块(即辽南1分区、辽宁2分区、安东3分区)”的总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密切配合,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军事作战指导方针。并决定,首先由4纵出敌不意挺进敌后,牵制敌人,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及分散之敌,破坏交通线,打乱敌人的部署;3纵担任内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顶住敌人,打掉敌人几张王牌,挫其锋芒。巩固现有根据地,为改变局面打下基础。

16日,我们将会议的决定和讨论的作战方案报告了东北局。东北局很快回电,并转来党中央12月14日的电报。中央要求东北局:“望你们采取热河方面的经验,自盖平至四平以东整个山地皆应成为你们与敌周旋的地区,……(除)利用我们抗战八年敌后坚持的经验外,并可利用在我区内经我反复打击的胡匪活动的经验。他们全无群众条件,但至今能存在……,我们则有群众条件,又加以在组织上、训练上、斗争经验之各方面,均强过胡匪,故应更能存在。望你们提高干部信心,密切结合人民群众,采取灵活坚决的斗争方法,坚决争取自己的存在和发展,促使敌人被我消耗与歼灭……”。东北局的电报说:“南满的斗争必须准备如同热河或冀东及华北抗战困难时期的那种局面下的奋斗,主要是巩固内部,结合群众,依托广大的山区,加强下层领导,采取大胆而精细的处置,各个歼灭分散的敌人。使敌人不敢分散,使敌人劳而无功,且常被我逐一消灭。只有在这种斗争中采取局部的坚持,以待东北与全国形势之逐渐好转。”这些指示,说明了我们在七道江会议上的决定符合中央及东北局的战略意图,从而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决心和信心。

七道江会议的意义,就在于统一了大多数同志的思想,确定了坚持南满的基本方针,并决定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作战方针,为挽救南满的危局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坚持南满斗争的基石。在此基础上,才有以后四保临江,夏季攻势的胜利以及坚持整个南满根据地的胜利。因此,七道江会议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四、繁忙的12月16日

陈云从七道江回到临江后,紧接着又于12月16日在临江召开把问题“说死”的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研究部署工作。陈云在回忆总结南满工作时

说:16日开临江会议,召集把问题“说死”的会议,肖劲光、肖华都在。此时劲光对三纵队打濛江之敌不放心,怕有被迫向北撤之危。我即召集会议,肖华迟来一点。我说打好濛江之战,我们就能存在,否则可能割断我们。要把三、四纵队都放在南满,或全部转到敌后,打光了就算。我这样讲,大家同意。我问肖华,是否下决心把三、四纵都放在南满坚持?肖华同意了,辽东全党全军即一致了。接着分配了各个人的工作:肖劲光去前方传达,肖华也派到前方指挥,江华、刘澜波布置地方工作,吴克华负责伤兵工作,莫文骅搞长白山的粮食供给工作,我担任给东北局、中央写电报。(见1949年4月东北局高干会记录)

1946年12月16日陈云同志起草的以肖劲光、陈云、肖华、程世才名义给林彪、东北局并中央的电报中说:

(一)杜已下令攻辑、濛、临、松,企图歼灭我主力于狭窄的长白山地区。其进攻兵力为驻桓仁之九十一师、二师、一九五师、三十师之一部集结三源浦,二十二师已接防梅海,尚有两装甲兵团已到龙梅,二〇七师一部已接防永陵、兴京,十四师主力布于安奉路两侧“清剿”。据密息,八十八师已南下集中八面城,意图不明。

(二)在此情况下,已决定四纵全部伸向通化、桓仁、浑江以西,在安奉路两侧“大闹天宫”,消灭弱敌,调动敌人,支持地方。如敌围歼计划不变,则决以三纵一部坚持长白山区外,主力亦到敌后。那时除长白外,其余县城均将被占。估计两个大兵团到敌后作战,在伤兵、减员、补充等问题上极端困难。但不经反复、长期艰苦斗争,不能坚持南满。

(三)我们希望:(甲)东、西、北满能牵制住当前敌人;(乙)北满给我们一万吨粮。

以上各点妥否?请示。重读此电时,在电尾注有“不等复就行动了!”(这个电文已收入《陈云文选》)

1949年4月13日陈云同志在东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中还提到,1946年12月16日下午在临江还召开了坚持南满的干部动员大会,肖劲光、肖华和陈云都在会上讲了话。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讲话稿,这里仅将我们看到的陈云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抄录如下:

12月16日在分局县营干部会上讲稿(临江)

(1)东北的重要(胜利多大?)南满重要,“全党全军坚持南满”。

(2)反复,长期,艰苦的斗争——不是三天、两天,一日二日,家务可以打

烂的。

(3) 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主力。

南满吃苦,为了北满。

地方部队与主力部队——兵贩,粮贩,钱贩。

(4) 敌后可以站住的,而且必须站住。原因:

1. 农民:要粮要地的。政治军事经验在增加,客观阶级斗争存在。

2. 敌兵力不足:东方不亮西方亮,关内关外,南满北满,主力与地方,此地方与彼地方。

3. 镇压反动,但应适当。低头者不能算反革命。

4. 有运动与根据地配合的游击战。

5. 本地干部。“东北人随风倒”的说法不对。

6. 创造经验,善于使用经验。

7. 敌后游击战之重点在吸引敌人——不要怕自己身上背多!

(5) 工作是十分艰苦的。

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地方同志,男女,伤病——穷人不怕苦,山沟小道,吃好吃坏。

站稳岗位——反对退却逃跑——研究对策,克服困难。

(6) 反动失败,革命胜利——古今中外,蒋必败,我必胜。东北要胜,南满要胜。

拼死斗争的决心——人生干什么?反革命,不革命,干革命。

五、一组来往电报

林彪、彭真、高岗收到陈云同志起草的1946年12月16日的那份电报后,立即于12月17日发出复电。复电说:

一、十六日电悉。如你们估计集中兵力在内线能寻得好仗打时,则可采取先在内线打一仗,后再看的办法。否则,可采取一个纵队出到敌后去,一个纵队留在内线作战,或采取少留内线,主力出到敌后。以上三种方式,望依照具体情况酌量决定,并不失时机的实施之。但南满的斗争,必须准备如同热河或冀东及华北抗战困难时期的那种局面下的奋斗,主要是巩固内部,结合群众,依托广大的山区,加强下层领导,采取大胆而精细的处置,各个歼灭分散的敌人,使敌人不敢分散,使敌劳而无功,且常被我逐一歼灭。只有在这种斗争中

来争取局面的坚持,以待东北与全国形势之逐渐好转。

二、此间已迭电西满与东满在康平、法库、伊通、双阳、磐石间积极行动,以牵制敌人。我松花江北岸之主力,则由于德惠、农安一带敌人工事巩固,交通便利,策应甚速,故无法开展攻势,故目前暂不采取大的攻势行动,而只派出小部队活动。

三、粮食问题,决照来电办理。

陈云等收到林彪、彭真、高岗 12 月 17 日的复电后,经过研究,又于 1946 年 12 月 24 日 12 时以肖劲光、陈云、肖华的名义给林彪、彭真、高岗并中央军委发出一份电报。该电说:

(一)大家认为,现敌主力靠拢向内圈压缩中,我已无好仗可打,且有可能被迫转移,于我不利。不如将主力一部伸入敌后,则虽有困难,但可使敌难以前后兼顾。且敌后我现有地方武装,对敌既无还手之力,亦难招架,需主力撑腰。故四纵(缺四个营)已于十八日到敌后创造根据地。先头部队收复八里甸子(桓仁西),歼灭伪警一百七十余人,并顽军一个班。现主力正向平顶山前进。十二师正向辽南岫岩一带前进。

(二)二十二日敌占领辑安。今后敌先打我内圈,抑先对付四纵,或同时并进,尚不明。(此电已收入《陈云文选》)

林彪、彭真、高岗收到肖劲光、陈云、肖华 12 月 24 日 12 时的来电后,又于 12 月 26 日 8 时复电说:

(一)同意你们 24 日 12 时来电关于行动的处置。

(二)盖平、沈阳、四平以东的广大地区皆为山地,但内部无巨大的河流阻隔,人口条件亦较好,且皆为汉人。故在加强干部坚持苦斗的决心,加强群众工作,加强部队的军政教育工作的条件下,三、四两纵队必仍能在此广大地区内生存。即令在坚持过程中,偶有部分部队遭到损失,亦应放在估计之内。但这种坚持意义则甚大,使我们仍能保有广大领土与人口,使敌不能全力向北,摧毁北面的根据地,使我南北能互相依存。因此,盼你们一切打算都放在如何使三、四两纵队放在南满坚持的上面,运用热河与冀东的经验,运用四一、四二年华北的经验,以争取存在。

(三)我西满地形,则全为平地,人口太少,且有蒙古问题。东满人口亦太少,山太大,缺粮房。北满则有河流阻隔,或为荒山,或数十里、或数百里不见人烟,而人口较密之地区多靠河流,将来仍有失陷的可能。在困难条件下,大部队的坚持奋斗,则南满条件较其他区域更有利,只要在开始时以忍耐与冒险

渡过难关,使部队成为习惯,群众亦逐渐稳定时,以后便好了。

1947年1月16日陈云又致电林彪并彭真、高岗说:

(一)我们同意你们十二月十七日及二十六日两电,准备在象冀东、热河及华北抗战困难时期的那种局面下奋斗,并将一切打算放在三、四两纵队坚持南满这一目标上。现因我北满发动攻势,敌兵五团北调。我正利用时机求得歼敌一部,力争不但保住长白山区,且求在桓、辑、金、辉四点中收复几点。如此,则南满仍不失为东北重要的侧翼战略阵地,可以北出吉奉,西出安奉。在敌不能增兵关外及我在北满胜利的条件下,只要努力,这种可能尚未失去。

(二)力争上述较好局面不是轻易的,必须经过多次中小规模的对敌歼灭战,而我又需付出一定代价。过去安东、通化未失守前,主力兵员不充实,平均每师仅六千多人。主力经过战后伤亡减员,而地方武装在敌进攻下损失很大,据不精确统计可能在一万人左右,现已无地方武装可补充。加之现有之长白四县,总人口二十二万,规定旧历正月底止扩军一千,能否完成未定。沦陷区短期内扩军则无望。以上原因,使主力目前得不到补充,且不断减员。因连队不充实,干部怕伤亡大,战斗信心降低。至于求打胜仗,争取俘虏补充,亦须一个过程方能解决。

(三)为了消灭敌人,补充兵员是严重困难。如过早缩小师,可能不利且影响情绪。可否北满方面除给一万吨粮食外,再在兵员上于短期内给南满组织两个大的新兵补充团。补充团干部此间可派去,棉衣请代缝,我们还布。

(四)鉴于南满地区缩小,人民情绪下降、兵员困难的经验,请考虑北满应否利用时机,大扩一次军。(此电已收入《陈云文选》)

六、南北策应和陈云的决心与机断

我们看到的有关四保临江,坚持南满斗争的作战指导方针、战略战术原则、军队的组织指挥等军事方面的档案材料很多,除上面已经提到的外,这里再按照时间顺序摘要介绍如下:

1946年11月1日,东北局林彪、彭真、高岗、陈云致电南满肖华、江华、程世才、罗舜初,指出:

(1)你们必须把保存的武器、弹药迅速转到××境内,免得打掩护仗和失掉东西。

(2)敌人要攻占什么地方就让他攻占,我只根据能歼灭敌人的仗就打,不

能歼灭敌人的仗就不打,作为行动的最高原则。因此不要又准备在通化以东狭小地区内打防御战,以免又白挨一顿打。

(3)你们既然已不可能打一个团的敌人,则今后专打一个营到一个连的敌人,兵力编组以此自定,但须准备在以后有利条件下,恢复到打一个团敌人的目标。

(4)目前你们的根本任务是,削弱与扣留敌人,保存自己,坚持根据地。故你们应注意休养补充兵力,提高士气,竭力避免不必要的调动,以免疲于奔命,应以足够的兵力分散去恢复敌后的乡村工作与剿匪,同时控制足够兵力专歼灭敌一营左右分散活动的小部队,应动员与发动所有的地方部队与群众(主力亦须)力求参加破坏敌人的公路、铁路,使敌难于前进与后撤。

(5)目前长春北部空虚,且距结冰期不远,我拟乘隙集中大力向南出击,歼灭敌人。目前你们应极力削弱与扣留敌人,无论如何必须完成这一扣留敌人的战略任务,以便我军歼灭北面之敌,并继续向南进。你们更须准备敌人向南满抽兵北上时,猛力歼灭敌人,这是整个东北战略形势上极端重要的一着,但目前必须严守秘密,切勿声张,切勿下达。你们必须具体计划与组织切断敌向长春方面增援的道路,分派得力干部率领部队执行此一专门任务。

1946年11月11日,林彪致电肖华、江华、程世才、罗舜初、曾克林并报东北局和中央,该电说:(1)北满部队正在向南行动,昨日与敌开始接触。(2)南满部队应分成三种:一部散在地方打敌清剿与打土匪,坚持根据地,稳定群众;而以精锐结成 一个突出的拳头,准备在安东、通化两地区内打运动战,或围点打援敌,或打易打之点和准备追打北调之敌;另以约两个团,而主要是要派得力干部率领,附带电台,进到敌人后方,采取发明的翻路方法,实行大翻路,钳制敌人,打敌运输与兵站。一切地方部队与群众工作人员,必须在原地坚持地方群众工作。

1946年11月15日,林彪致电肖华、江华、程世才、罗舜初并报中央和东北局,该电提出:你们必须一面坚持群众工作,一面集中兵力,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和打下易打之据点,各个击灭敌人,每次皆应以绝对优势打敌劣势,并以主力进行迂回攻击(不要采取以主力打正面,以少数打迂回),每仗使敌人失去一整股力量,而我能得到一整批俘虏,以补充缺额。

1946年12月24日,林彪、彭真、高岗致电肖劲光、陈云、肖华、程世才、罗舜初并报中央,提出:

(1)鉴于敌第二次发动对你们的进攻,我北满部队决定第二次出动,主力

向南作战,配合你们。

(2)望你们用死打硬拼的精神,拼掉敌人一部;望注意集结优势兵力与实行一点两面战术。

(3)东北我军,由于群众条件的不成熟,我甚难秘密接近敌人,所遇敌又较强,非一打即垮,又由于敌铁道、汽路太繁,增援甚快,故甚难求得通常优越条件各个击破的歼灭战。但为了打掉蒋军的王牌,为了降低敌人的猖狂,为了使半生不熟的根据地成为完全成熟的根据地,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地在半生不熟的状况中),在一定限制内(以数个师的兵力,不以全军),有时即遇条件不充分,亦需断然猛打,争取成为歼灭战。如不能歼灭,只要惨重地打击了敌人,虽无多的缴获,亦算胜仗,因它的间接胜利甚大。故最近我们除过去所谓歼灭战、游击战之外,现在提出一种新型的作战,即名“硬拼战”。其打法(严格侦察地形,实行一点两面战术)与打歼灭战一样,并争取成为歼灭战。这种作战与过去的不同点,则为不是有十足把握才打,而是只有七、八成胜利把握即决心打,打时打得极顽强,打的结果可能成为歼灭战,亦可能双方都伤亡惨重,但我方却并不将全部主力统一投入硬拼。此间我们拟如此办,盼你们亦注意运用,并且事先告诉各级干部,以免在战斗后,撤下时,精神上的损失。

1946年12月28日,肖劲光、陈云、肖华、罗舜初、吴克华致电林彪、彭真、高岗并中央,报告南满敌我动向,该电说:

(1)敌22师分布于金川、山城镇、柳河、通化地区清剿,195师分布于通化、兴京、桓仁地区清剿,91师进到杨木桥子、果元桥一带,有向鸭园、四道江进攻模样,2师主力在辑安及其以北地区,一部守备沙尖子、宽甸,52军军部及新25师在安东,30师之88团在辉南、金川地区,暂21师第3团守备柳河、三源浦、孤山子,该师第2团及182师544团在辉南,14师主力分布于凤城、爱阳边门清剿,该师之41团在皮口及以北清剿,184师残部分布于瓦房店、普兰店一带清剿,独9师分布于岫岩、庄河、孤山县区配合清剿,207师分布于兴京、永陵、抚顺、清原、西丰、西安等处守备,88师之一部分布于西安地区清剿。

(2)敌后我辽南部队及独一师约4千余人,被压缩于大连以北地区活动,独三师两个团活动于清原铁道线南北地区。四纵队主力以平顶山、八里甸子为中心,正向碱厂、清河城、救兵台、田师付、双山子之敌进击,现永、桓间已无敌情。我大队挺入敌后,伪警团闻风而逃,敌小部分不敢活动。12师缺4个营向辽南前进中。敌后行动目前最困难的是气候寒冷,行军时宿营分散,了解敌情困难,伤兵困难安置,缺鞋袜冻坏手足者很多,如敌人回师合击,新的困难

更多。在敌主力稀薄地方团队发展很快,流氓、土匪、警察、特务、地主成为敌统治的中坚力量。我薄弱的地方部队及营以下的主力部队难以活动。目前三纵队控制于临通铁路线上,打击进攻的敌人。九师及独2师主力展开金、辉地区活动,并控金濛线。如敌集中兵力向长白山区进攻,重将依靠长白山有利地形,进行顽强的防御战和消灭战。长白山区山高地险,森林丛密,道路有限,人烟极少,粮食困难,有利于大运动战,利于防御战,尤为严寒酷冷攻难守易,我们准备在这样条件下进行硬拼战。今天在敌人集中主力进攻南满情况下,我们依靠前后两条战线的密切配合,以分散敌人,回扯敌人,各个击破敌人,争取南满的坚持。我们对于硬拼战的方法很同意。在南满以及东北作战,根据地不成熟,机动地区受限制,敌强我弱,紧迫压缩,以及我主力存在的条件下,事实上不得不拼掉几个棋子,以改变力量。

北满出兵,对南满是一有力援助。在此严重酷冷的季候下,宜充分注意部队的装备,特别是鞋袜手套。

1947年1月18日,东总向中央报告南满反蚕食战绩说:(1)南满敌195师主力于2日向我通化北之四道江、六道江、果松航进攻,均被我击退,将敌追回通化,收复夹皮沟、头道崴子据点,歼敌5、6百人,缴轻机1,重机2,步枪60余支。(2)孤山子、三道沟(柳河南)、抚民屯(辉南东南)敌据点均被我收复,攻克太平哨、沙尖子、永甸(宽甸东)、救兵台、上下肥地、大甸子(抚顺东)、旺清湾甸子(抚顺附近),辽南之白羊沟、小孤山(析木城东南)等34据点,计毙伤敌营长以下323名,俘敌760名,缴重机1,轻机9,子弹万发,炮5门,长短枪368支,冲锋机6,大车23,马14,汽车7辆。我伤87名,亡14名。

1947年1月22日,肖劲光、陈云、肖华致电林彪、东北局并军委、中央:

(1)敌195师584团19日企图向蚊子沟增援2师,其一个营(5个连)进到小黄沟(头道崴子南),被我7师全部歼灭,毙伤敌150余,俘营长以下500余,缴重机3,轻机30余挺,六〇炮10余门,步枪500余支,汽车3辆,弹药一部。同时,由头道崴子南援之敌亦被我击溃,毙伤敌100余,俘40余,缴重机3挺,步枪10余支。

(2)18日追截2师,我四纵俘敌100余,缴重机1,轻机6,小炮5,步枪60余支。

(3)以上两次战斗,我伤亡不到百人,惟夜间行军战斗,冻伤4百余人。

(4)敌195师及第2师暂以巩固通化,其封锁通辑线计划第二次为我打破。敌22师主力、14师一个团、2师6团正围攻沙尖子,并封锁浑江,第二步

有再东进企图,完成通辑封锁。

1947年2月8日陈云致电高岗,提出:

一月十八日你们关于难补兵给南满电,经我详细考虑后,有下列意见,请再考虑一次。

(一)南满吸引着敌新六军、五十二军及六十军暂二十一师全部,另一八四师新编之两个团,尚有不少保安独立师。南满对北满是一个重要的牵制敌人的力量。

(二)今后南满可能有两种前途:(甲)保住临、濛,使长白山区有完整四县(二十二万人口),进而夺回辑、柳、金、辉中二、三城,如此坚持敌后亦易。因山上与敌后互可呼应,对敌北进牵制力亦大,形成有力的犄角之势,此为上策。(乙)如临、濛不保,大部主力在敌后处于敌兵四面包围中,根据地不易迅速建立,那时敌情又有两种可能:其一,敌以少数兵力对南满,大兵北压;其二,则利用松花江开冻,北满主力无法南渡击敌,敌可集中东北重兵先扫南满,使我无立脚喘息之机会,而这种可能是很大的。敌采取各个击破,先清南满再攻北满,那时南满减员必大,扩兵短期无望,经过一时期后,南满对敌北进牵制力必减。由上估计,我必须拼死反复力争第一前途,只有在不得已时,才走第二前途。我们也准备了第二前途的。

(三)力争第一前途必须勇敢、积极地大量歼灭敌人,必须主力打运动战(南满现在应该是广泛的游击战,必要的阵地战,主要是运动战)。但主力兵员的补充,目前南满是极端困难的。地方武装叛逃万余,悔已不及。现在地方武装编并殆尽,每县所剩无几。过去所谓一、二、三独立师,共只五个小团,都在敌后边沿单独担任任务,不应再并。我们一再研讨,兵员来源如下:(甲)争取伤兵百分之七十归队;(乙)争取俘虏百分之五十留连队;(丙)地方动员一千新兵;(丁)抽机关及警卫人员下连队;(戊)讲求战术,减少死亡,巩固连队,减少逃亡;(己)韩光处扩兵,大体上只能补辽南。这六种来源并不能立见效果,须先找到一批兵员才能接上气,因此想到北满的地方武装县大队中可否在三月份补我们三千人。

(四)利用与保持南满有利的环境与阵地,北满只给以几千新兵的支持,使其达到阻抑敌兵北进的效果,我以为这是十分“价廉物美”的。

(五)按常理,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要新兵粮食是不合理,且不能持久的,但想到南满如有较好局面,对于拱卫北满之更大作用,又估计到改善南满局面的客观条件的存在,故我力争上策之心未死,一再求援。我请求你们对援

助南满兵员问题再考虑一次。

(六)南满的有利条件是全满其他地区所没有的,除暂需兵员及粮食帮助外,我估计都可以自力更生。(此电已收入《陈云文选》)

1947年2月9日肖劲光、陈云、肖华致电中央,报告在三源浦歼敌一团战果。该电说:三纵7、9两师乘胜围攻通化北三源浦敌207师第3团(缺1个营),自7日16时开始战斗,至8日8时结束战斗,敌全部被歼,战果正清查中。

1947年2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致肖劲光、陈云、肖华的庆贺电中说:庆祝你们在高丽城子及三源浦两地歼灭敌人之胜利,一切有功将士应予嘉奖。

同日,毛泽东代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肖劲光、陈云、肖华并告林彪的电报中提出:在目前情况下,你们是否以集中两个纵队主力(4个至5个师)在一起作战为有利,望考虑见告。

1947年2月11日陈云起草的陈云、肖劲光致中央军委并告东北局、林彪的电报中说:

(一)军委十日电悉。

(二)十二月十八日四纵全部伸出敌后,又因北满出击,敌七十一军九十一师北调,一月中旬四纵主力六个团即回长白,与三纵合击通、辑地区五十二军的一九五师及二师,敌均逃脱,仅消灭一九五师五个连。此后,四纵主力四个团及三纵全部都集中作战。四纵十一师全部则仍在浑江以西、安奉路以东,进行钳制敌人的作战,配合及扶持地方武装。十二师师部率主力三十四团会合辽南独立师,目前虽被压缩,背靠关东州休整,但吸引了敌新六军二十二师四个营,十四师五个营,六十军一八四师两个团及两个省防师。由于敌后地区广大,交通便利,过去地方武装在敌进攻中垮了不少。为达分散敌人目的,我十一师全部及十二师一部,分散在敌后,对全局是有利的。(这是答复中央不集中两个纵队的理由,着重点是我们所加——引者)

(三)现敌七十一军之九十一师又到梅河口,准备第三次进攻长白山,我正准备粉碎其进攻。目前辽东敌是:新六军、五二军全部,七十一军九十一师及六十军暂二十一师全部,六十军一八四师两个团,并有几个省防师。

(四)我们将利用松花江开冻前积极歼敌,求得改善南满形势,并准备应付松花江开冻后北满欲援不能,而敌集中大力单对南满时的困难情况。

(五)目前长白山区内四个县只有二十二万人,敌后扩兵一时尚无望,最

大困难是兵员,正以自己努力并向北满求援。我们认为南满目前虽有广泛游击战,且有必要的阵地战,但主要仍是运动战。

(六)劲光仍在前线指挥。

(此电已收入《陈云文选》;陈云在这个电报的首页还亲笔写有“二次粉碎敌之进攻时答中央军委电”15个字)

1947年2月13日林彪在师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中说:我们南满绝大部分城市已失,刚建起来的根据地受很大的损失,部队很疲劳,地方部队大部垮掉,因此敌人为了进攻北满,必须先搞掉南满。如南满被搞掉,东北将产生很大情况,敌人即可将南满兵力抽出,敌兵力增加,兵源区增加。如南满站住,敌很大兵力被牵在南满,无法北进,使我们北满有机会深入与发展根据地建设。因此,南满是否站住,是东北局势好转或劣转的一个重要关键。应当把南满与北满看成一个有机的联系,为保证北面的根据地,就必须保存南满,所以必须配合与支持南满,必须打这一仗。

1947年2月23日,肖劲光、陈云、肖华关于辽东战况的一个电报中说:
(1)敌二师师部、4团全部、5团一个营在西高丽城子被我8师包围中,6团主力在大拢东沟城南拢之长春沟。昨日我10师向该敌攻击时,高丽城子、通化敌向我南北夹击,我退出战斗,10师师长杜光华牺牲。(2)敌九十一师师部与二七三团、二七一团在半截荒沟、杨木桥子,刻已包围两个营。(3)杜已令该两师向西南突围,并派二十二师之六十四团及一九五师之五八五团向通化北策应突围。(4)我十一师两团已迫近安奉线,敌十四师四十团全部及四十一团一营尾追,已进抵赛马集及以北之将军石一线。(5)辽南报告,原在瓦房店之二十二师六十五团,日内北调,去向不明。

同日,肖劲光、陈云、肖华关于辽东战况的另一个电报中又说:我2月21日晚开始向九十一师反攻,激战至22日晚,将大北岔、大小南岔、椅子山及南北山占领,歼敌二七二团及工兵营,另将二师迂回至小荒沟西南之一个营歼灭,共俘敌2407人,余敌准备向通化逃窜,我正继续各个压缩围歼中。

同日,前梯的一份电报中说:在南满方面,我21日至22日在大北岔一带(通化以北)歼灭九十一师之二七二团及工兵营,另歼二师六团一个营,俘敌2400余,现向敌进击,此乃我粉碎敌犯临江计划之第二次。

1947年2月24日前梯的一个电报中说:我南满一部于2月16日将胡家堡子(赛马集西北)保安团两个营击溃;另一部于2月21日将碱厂敌二〇七师一个营全部及警察大队、独立团各一部歼灭。以上共俘营长及保安团副以

下850余,毙140余,获长短枪500余,轻重机枪30余,六〇炮12,迫炮2。

1947年2月24日,毛泽东代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份致肖劲光、陈云、肖华并告林彪的电报说:你们又歼敌一个团两个营,极为欣慰。我山东军于23日在莱芜地区歼灭李仙洲所部17个步兵团及24个直属营,共约5万之众。

1947年2月28日,林彪给肖劲光、陈云、肖华并报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说:

(1)松花江大约还有25天到35天就要开江,开江后敌必以一部兵力利用长春以北之松花江、饮马河、三河钳制北满我军,而抽集其主力,仍实行对南满的进攻。

(2)由于我去年下半年发动了群众,肃清了土匪,扩大了主力军,建设了炮兵,提高了士气,确定了长期作战的思想,破坏了松花江以北的几条敌人北进的铁路;又由于敌人方面兵员(被俘、死伤、逃亡)与士气均较从前大为降低,关内增援可能已较从前大为减少,敌我力量对比有极大的变化,因此敌极少北进的可能,故我在北满无须控制重兵的必要,开江后我主力不是北返,而以部分兵力北返,主力准备留在江南。但由于长春东北有三条河,又有三条铁路,不便于我主力立足于其间。

(3)为了粉碎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南满的计划,我北满主力在上述情况下,开江后拟插到吉林、伊通、双阳地区。总的趋势是,北满主力将南下与南满主力会合,以便利用南满之广大山地,在敌铁路尚未完全通车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和避免敌人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我南满。以上方针盼考虑,并预为准备。

1947年3月3日前梯关于2月下旬的战报中说:南满我粉碎敌第三次攻临江计划,21日开始反击,至23日将敌91师273团全部及师属工兵营、小炮营与二师44团一个营全部歼灭,并克碱厂;歼敌207师2团及地方部队一部。24日晚向辑安攻击樾头南之马塘,26日攻克柳河。以上共伤毙敌2000,俘敌5350余,缴山炮2,迫炮18,火箭炮10,重机44,轻机189,六〇炮13,步枪1000余,汽车21,弹药大车270辆,电台1。

1947年3月7日,肖劲光、陈云、肖华电复林彪:

五日九时、五日十二时(敌放水雷)及六日敌一八四师调郑家屯、估计九十三军可能调东北三电均悉。我们从南满及东北全局着想,意见如下:

(一)九十三军来后,估计敌不能南北并攻(兵力仍不够),也不能南守北攻(三、四纵队对敌威胁很大),料敌仍是先南后北,企图将我各个击破。

(二)如北满主力不来,敌先南后北,估计南满将被击破,北满不久必危险。

(三)北满主力南来后,敌南守北攻的企图也可能,但那时我南满兵力很大,极可能阻住敌之北进。万一阻不住敌而哈市失守,则比之敌先南后北哈市仍不保的情况较好。因我南北阵地仍在,全东北仍可保持长期斗争、南北互为依存的有利阵地。

(四)北满主力南来后,在敌集中兵力进攻下,南满仍被击破的危险也是存在的。但更大的一种可能性是,我以南来主力及三、四纵队利用南满山地陆续消灭敌人,而达到保住南满、迟敌北进甚至保住北满的目的。只要消灭新一军、新六军的两个师,东北困难就可减少,关内再来顽军,战斗力也必较低,则今后东北就好办了。

(五)再退一步想,在拼死力争之后,南满仍被击破,那时除必要留在南满敌后的部队外,一部主力可以转到东满、北满,不致全部陷死于南满敌后。

(六)北满主力南下时,抢占桦甸黑石镇很必要,能占磐石及其他地点则更好。但很可能桦、磐都占不了,被迫在金、辉、柳地区与三、四纵队会合,即令如此,南满仍有消灭敌人,保持与扩大局面的可能。

(七)北满主力抽多少个师南下,请你依全局考虑酌定。如确定南下,可否将路线略告,以便配合。

(八)主力南来,今后兵员、财力必须仍靠北满支持。

(九)小丰满放水,不知下游尚能渡兵否?如逼着要走丰满上游,则需力争在化冰前过江。

以上意见请考虑。(此件已收入《陈云文选》)

1947年3月27日,林彪致中央军委并南满的一个电报中说:我南满方面,去年结冰前,他们曾要求以一个纵队北移,只留一个纵队在南满活动,我们当时决定仍全力留南满坚持。最近,我们要南满考虑将北满主力转南满时,他们来电原则上同意,但已提出许多地区上的困难,和以夺桦甸、黑石镇等地为先决条件。现在我们拟采取一面以主力在长春西北地区牵制敌人,一面将兵力逐次进入南满。

敌人在东北的确定方针是企图先解决南满,后进攻北满,而以河流牵制我北满。故今年南满之战斗必非常紧张与异常困难。敌13军全部及93军大部皆可能使用于南满,新一军与71军亦各可能抽出一个师使用于南满。我北满部队虽极力配合南满,但因地形限制,不能象冬季时期的有利配合。

为策应南满，盼军委令热河方面及晋察冀方面能采取大部队进攻作战。倘热河及晋察冀能进行有利之作战，则敌13军及93军可能调回去。

1947年3月28日，林彪、彭真、高岗给陈云、肖华并转肖劲光、程世才的一个电报中说：

(1)敌驻热河的两个军业已有五个师调入东北，另一个师据报亦在向东北转运中。敌热河原有兵力将全部使用于东北。已建议中央令晋察冀与热河两地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使晋察冀不能调兵到热河填防，迫使敌调入东北之部队返防。

(2)松花江已在开冻，我军正在前郭旗、扶余一带跨江休整，今后之一切行动皆以策应南满为目的。

(3)敌之肯定方针为“先解决南满后解决北满”；因此，你们须准备应付今年异常困难与紧张的战斗局面。敌由热河调来之大部或全部兵力必用于南满，目前及今后你们的作战应以运动战为主，消灭在进攻中间的敌人，或以围城方法（不必攻守兵多的城，但应拔小据点），求得打运动战。对于必须巩固之地区，则择险要（并须撤毁城市的工事）等工事，利用敌攻击精神不旺盛的弱点，牵制敌人和便于反击敌人。你们在地方与军队的干部中，均须有应付今年斗争的思想准备，建立斗争的决心与信心。

(4)此间已准备3千新兵补充南满，我北满主力准备在长春西北方面牵制敌人（但该地粮房皆甚缺），此外正在组织战略骑兵插到长春、沈阳地区大活动。

(5)望你们考虑在桦甸、黑石镇不能掌握在我们手时，我北满主力是否可将兵力以师为单位，逐次自四平以北地区插到南满去，直接与你们会合，以增加南满兵力。

1947年3月31日，肖劲光、陈云、肖华、程世才复电林彪、彭真、高岗：
二十八日电悉。

(1)肖、程已回临江讨论部署。我们认为，目前南满的敌情是严重的，今后更严重。但是敌兵虽多，目前其主力只二十二师两个团及十三军四个团。其他各师或则不强或已残缺。我只要再给二十二师及八十九师以相当歼灭，则渐次粉碎敌进攻是可能的。我们已集中两纵队五个主力师打运动战。我们下定决心、不惜将三纵、四纵队打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决心之大，非比寻常——引者注）以争取较完整的长白山。从全局来看，这种决心十分必要。又因为此次及今后敌兵多，且靠拢，因此决心打几个恶仗、硬仗、较冒险仗（仍

是运动战)。如无此决心,则必然这样也不便打,那样也不便打,其结果必然部队拖垮,山头失守,贻害全局。我们经验证明,愈怕损失则损失愈大,不怕损失则损失反小。从二月五日打到今天,共八仗,俘敌近万,我主力则伤亡三千。

(2)对北满建议如下:

(甲)暂时不必加兵南来,因在敌区中被敌重重堵追,干部思想必恐慌(辽东敌后的经验),避战则减员,作战无法安置伤兵,很可能既有损失仍不达目的地,即使达到亦必疲惫应战,不如以此代价协同北满主力在长春西北死硬打较有利。

(乙)可否由北满派一个主力师到东满加强桦甸方向,其作用是积极向敌活动,带出东满部队战斗作风,并保持我们与东满交通,必要时可转到南满。

(丙)北满主力可否提前出击,以免敌再增兵到南满。

(丁)你们准备给南满更多新兵,壮了我们的决心。我们希望来得快,给得多。第一批速南来,并请给两个现成的补充团,七天后,我们组成三个补充团架子(班长以上)来北满,以便陆续接兵南下。只要你们给人力支持,我们将以无比的勇气打仗。

(此电已收入《陈云文选》;此电首页还有陈云同志写的“答林彭高关于敌人四次进攻和辽东的决策电”)

1947年3月31日中共辽东分局发出关于全党动员起来粉碎敌人四次进攻的通令:

由于辽东主力及敌后、正面全党、全军的努力,由于北满主力三渡松花江出击,过去三个月中粉碎了敌对临江前后三次进攻,俘敌的近万,歼敌二十营(敌后我军歼敌在外),收复五城。但这些胜利不应使我们麻痹。敌利用松花江开冻,北满主力对我配合较前困难的条件下,首先集中兵力击破南满的企图是不变的。敌已从热河、平津增来东北五个师(大部或全部可能用于南满),并开始了第四次对长白山的进攻。敌鉴于过去的三次失败,目前进攻兵力与组织都加强了。但我南满阵地必须坚持。现辽东本身条件亦有改善,敌兵力虽多,其主力只二十二师及八十九师,因此敌之进攻应该而且可以被粉碎。

目前辽东全党的任务如下:

(一)在部队的高级干部中弄清粉碎敌之进攻,保持南满,有全东北全国的意义。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决心打若干恶仗、硬仗、大仗,以消灭敌之力量,粉碎敌之进攻。在连续战斗中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以局部损失去换取全体胜利,正是保证每个局部取得恢复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敌后部队应继续保持不叫苦的精神,积极活动,严格执行配合正面作战的任务。要随时随地发动农民,保护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春耕。同时,应预先准备必要的物质补充,以防战时交通隔绝和更困难的情况到来,这里同样要有局部服从全体的精神。

(三)地方的、后勤的、机关的工作同志,都须继续并更积极地工作,以无限责任心去改善工作,保证前线胜利。

(四)我们的斗争将得到全东北我军尽量的配合与人力物力的支援,但全部精神必须放在自力更生上,避免依赖和等待。(此通令已收入《陈云文选》)

同日,肖劲光、陈云、肖华、程世才、罗舜初、吴克华、莫文骅、唐凯向辽东各兵团首长发出《粉碎敌人四次进攻总动员令》(此电标题是陈云在东北局高干会上写在电文上方的):

目前敌人已经集中较大兵力,开始进攻南满。我们必须下定坚强的决心,粉碎敌人的进攻。对于坚持南满的斗争,不应有丝毫的动摇,在敌人面前不应有任何的畏缩与恐惧。从安东失守到现在,南满坚决粉碎了敌人三次进攻长白山的计划,歼灭了敌人两个师以上的兵力,生俘万余,收复了五个县城,振奋了群众,坚持了敌后斗争。这种形势的转变和开展,固然由于北满三次出兵,给了南满以胜利条件,但也由于我党政军民全体的努力和坚强的奋斗,尤其是我主力军给了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因此相当地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改变了南满的形势。事实证明,只有坚强的奋斗,抱定歼灭敌人的决心和信心,敌人的进攻是能够粉碎的,敌我力量是能够改变的,形势是能够改善的,南满是能够坚持的。在今天,粉碎敌人进攻的条件,比上次更为有利。敌人经过我们东北各个战场连续打击以后,战斗力降低了,而我们越打越强了;群众经过国民党的蹂躏后,对我们的认识和同情心提高了;东、西、北满对我们的配合并未因松花江开冻而放松。今天增加到南满的敌人主力军并不多,大部都被我们打垮过。此外,还有战斗意志比较脆弱的云南军。敌军建制杂乱,后备力量有限,数量虽然增加,但其质量比前降低。今后只要歼灭一两个师,南满形势即可发生基本变化。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战斗意志,发扬打硬仗、打大仗、打恶仗的坚强决心。战争胜利的要诀,就是积极地争取主动性,努力造成敌人弱点,积极寻求和抓住一切有利机会,即使是微小的,也不应该放过,以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如果我们以消极的畏首畏尾的态度,这样不能,那样不好,只想等待适合口味的机会,结果我们越退缩,敌人越靠拢,我们处处被动,敌人总是主动。这样就会始终得不到机会,打不成好仗。

被动的结果,必然是失利。要打硬仗、打大仗、打恶仗,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牺牲代价。为了打胜仗,歼灭敌人,这种代价是要下决心付出的。保存实力,只有付出一定的代价,换取敌人更多的代价,才能得到。就是说以一定的牺牲换取的胜利,这样才能减少牺牲,保存自己,壮大自己。我们要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在大敌当前,表现英勇无畏;以积极、负责、努力和坚决、勇敢、顽强的精神,来狠狠地消灭敌人,这便是我们革命军人最高尚品质的表现。这样的指战员应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尊重、爱戴和欢迎。战争是最艰苦、最残酷、最严肃的斗争。全体将士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努力完成任务,严格遵守纪律,爱护根据地人力物力。每个指挥员要很好地了解敌情、地形,细密地组织战斗力,随时注意配合、协同与联系,反对莽闯、乱撞的战斗作风,提高从战术上爱兵的观点。为加强和统一前方部队的作战,已决定由曾、韩组织前方临时指挥部。韩于四日到达十师后,即与曾一起指挥作战。(此电已收入《陈云文选》)

1947年4月3日东总发布的3月下旬战况中说:南满我军占桓仁后,20日围攻通化,23日兴京出援之敌25团(欠两连)及四团一营之三个连,于兴京东北旺清边门遭我围击,全部歼灭,俘敌副团长以下1100余,毙敌副营长以下400余,缴迫炮12,六〇炮19,战防炮2,重机7,轻机46,步枪709支,马30匹,电台1部,敌后部队于20日夜炸毁渭津(西安西南)洋灰桥一座,铁轨428根。

1947年4月4日总东向中央军委的一个战报中说:“南满我军本月3日于红石拉子油家街(通化柳河间)将敌13军之89师全部及54师162团包围,经10小时激战,全部歼灭。初步统计,俘敌8000余,该师所有辎重弹药全部缴获。另在湾口镇(柳河南)附近之暂20师被击溃,详细战果正清查中。”

1947年4月7日肖劲光、陈云、肖华、程世才发出关于粉碎敌四次进犯临江的简报。简报说:

敌利用松花江将开冻之际,贯彻其先南后北的方针,约集10师之众,分由宽甸(25师75团)、双山子(14师40团)、清河城(207师主力)、新宾(22师主力、2师6团)、旺清(86师及54师162团)、清原(暂20师)、梅河(184师)、海龙(182师一个团)于3月27日起,对我辽东地区进攻。我为集中主力歼敌左侧翼之一路,以利敌后战争之开展,粉碎敌第四次进攻临江计划,除以独二师45团及四分区巩固辉、金,11师主力正面控制通化,32团于桓仁利用浑江开冻,配合三、四分区阻敌进攻,力争巩固桓仁外,决集中三纵、四纵10师、军区野炮营于柳河、三源浦地区,视情况歼敌。4月2日,敌89师、54师162团,除红石拉子(三源浦西南)留一个团外,全力东犯。89师占陈家街、六磐家子

兰山,162团占油家街、小东沟,暂20师由南山城子大沙滩东犯,主力占东岗子湾口镇,一个团由高力子迂回湾口镇东南之清沟子,184师550团由六八旦(梅河南)向谢家营进犯(柳河北)。22师主力及2师6团一部进至快当帽子(通化西),主力于大城子(桓仁北),援助207师及14师、25师部队向桓仁进攻。我为贯彻决心歼敌于三源浦以西地区,除以9师25团于柳河以北扼守谢家营,阻击184师一个团于湾口镇,以进攻姿态阻击暂20师,以10师30团位于大横道河子(通化北)向通化警戒,保证主力作战侧翼安全外,决集中7、8师及10师主力、军区炮兵营歼敌89师。于3日6点开始总攻击,8师以一部抵歪石拉子(三源浦南)至孤山子线阵地正面,抗击前进之敌,主力由歪石拉子经柳条沟、高力道岭,由东面突击,先歼油家街、陈家街之敌,尔后一部攻击红石拉子,与10师靠拢,歼灭红石拉子及西北之敌,7师主力由小街子(三源浦)经石庙子向南迂回攻击,先歼黑石沟、油家街之敌,以一个团抢占602高地(红石拉子西北),控制大群岭,尔后向兰山川、东西葫芦(红石拉子两山)攻击,10师主力由小堡(三源浦南)向西进攻,先歼灭小东沟之敌,继向西向北向红石拉子及北山迂回攻击,一个团经西腰子沟攻红石拉子,一个团经×××沟攻549高地,并以一个营控制612高地,向南警戒,以断敌后路,歼敌于红石拉子。战至十点,敌向红石拉子北山溃退,我四面围击,将敌压缩于油家街西北之兰山,并将902高地及红石拉子西南西山占领,敌继向红石拉子溃退。经激战至当日16点,共经10时之战斗,敌89师全部及162团,除万宅仁及两个团长以下400余逃跑外,余全部为我歼灭,伤敌团长以下300余,俘敌副师长张校堂、政治部主任陈世杰以下7564名,缴获山炮10门,战防炮18门,火箭炮33门,迫击炮19门,六〇炮50门,重机枪38挺,轻机枪207挺,冲锋式529支,步枪2386支,短枪54支,骆驼3,马623,电台10部,电话机172付,总机7部,法币67万元,我伤302,亡9,失联络6。另外,湾口镇、谢家营抗击战,毙伤敌364,俘敌78,缴获六〇炮3,重机3,轻机11,步枪35,冲锋式5,我伤97,亡34,失联络4。红石拉子遭遇战伤83,亡25。至此,敌第四次进攻临江计划被我粉碎。现184师退回梅河口守备,暂20师小部留南山城子,余退英额门守备,22师北援至大石咀子、大英吴沟后,退回旧门(新宾东)担任机动。68师于旺清(新宾北)收容整顿,二师守备永陵、新宾,195师守备通化,207师及40团于浑江西岸扫荡。平项山、八里甸子地区有重兵组织再犯企图。我三纵、四纵10师于三源浦、红石拉子、湾口镇一带备战休整,以一个团在三棵树、通化间活动。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言人谈东北地区 1947 年扭转战局经过时说:当去年秋季敌人占领安东、通化及南满广大地区时,其攻势实际上已达顶点;但他们却仍妄图采取南攻北守之势,继续于“肃清”南满后转兵北越松花江。今年的头三个月(一月六日至四月三日),敌曾先后集中了其可能集中之一切兵力,对南满临江一带之狭小地区,连续进行了四次进犯。我军则以确保南北满根据地,打破敌先南后北之作战方针为目的。我南满部队在歼灭敌 25 师后,又顽强地进行了有名的“四保临江”的作战,每次均曾给敌以歼灭打击。我北满主力则在敌人每次进犯临江时,都主动出击,进行了有名的“三下江南”的作战,冒零下 40℃ 的严寒,进击吉长以北,并直接威逼吉林、长春,每次均使敌不得不抽兵北上,有力的配合了南满,打破敌人进攻。结果使敌遭到南北夹击,首尾失顾,遭我各个歼灭。这一春季攻势中曾将敌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打成残废,特别最后一役,南北配合,曾先后消灭 71 军之 88 师及 13 军之 89 师全部,最后将敌“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全部粉碎。三个月的作战,歼敌 4 万 3 千,收复城市 11 座,基本上停止了东北敌人的战略性进攻,迫使其转到全面防御。

七、四保临江战史

《肖劲光回忆录》把四保临江的战况说得清清楚楚,又是他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珍贵史料:

“七道江会议结束,战争随即来临。1946 年 12 月 17 日,敌人纠集 5 个师的兵力,在郑洞国的指挥下,由西而东向我临江地区发动了第 1 次进攻。敌兵力部署:以 52 军 2 师攻占辑安,91 师协同;52 军 192 师一部由通化向临江方向佯攻,主力向六道沟门进攻,妄图配合 91 师歼我主力于八道江;新 1 军 30 团 88 团及 60 军暂 20 师 1 个营向临江佯攻;14 师主力于灌水为预备队;新 22 师在梅河、柳河清剿。敌人企图第一步完成对通辑铁路线的封锁,然后进攻临江。

根据七道江会议确定的作战方案,12 月 16 日,我主力第 4 纵队经过紧张的战斗动员,跳出敌人的封锁圈,象一把锋利的钢刀,出敌不意地直插敌后,纵横驰骋在安奉线两侧地区,开辟了敌后战场。出击 10 天,即打掉敌据点 10 余处,收复自永桓公路以东、八河滩大清沟以北纵横 150 里的地区。接着,又奔向清河城、碱厂、赛马等地扩大战果,打乱了敌人的部署。4 纵挺进敌后的果

敢行动,成功地调动了敌人,迫敌将 22、91 两个师回调,减轻了正面敌人对我临江地区的压力。1947 年 1 月 2 日,我北满主力也开始了一下江南作战,敌人又不得不将 91 师及新 1 军 30 师北调。这样,敌人 5 个师撤走了 3 个。

我担任正面战场作战的 3 纵队,乘敌主力北调之机,开始向通(化)辑(安)线反击。根据敌 2 师已进占了辑安,195 师出动至六道沟门,企图掩护 91 师向桓仁南调,巩固通辑封锁线这一情况,我决定先歼六道沟门敌 195 师 1 个团,以减轻通化、辑安方向对我的束缚,争取控制一块地区并巩固和扩大,然后将主力向通化以北转移,实施机动作战。1 月 4 日,我集中 3 纵主力及 4 纵炮团、12 师 36 团攻击六道沟门。敌人察觉我意图,惧怕被歼,立即后退,我进至头道崴子,歼敌一部。此时通辑公路已为我切断。辑安敌 2 师 5 团 4 个营及炮兵营出动北援。我即调 3、4 纵队主力部署于辑安附近,以 4 纵队 12 师 36 团进攻辑安,调动敌 2 师回返,以求在运动中歼敌。1 月 18 日战斗打响。4 纵队主力于大蚊子沟(辑安北)向北出击,3 纵 7 师由杨木桥子向南出击,8 师于天桥山截敌,9 师向通化警戒。19 日,敌 2 师见后院起火,慌忙南返,被我南北夹击击溃。敌 584 团南援至小黄沟,亦为我歼灭 1 个加强营(5 个连)。此次战斗打破了敌人企图打通通辑铁路、公路对我实行封锁的计划,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基本完成了任务。从 4 纵挺进敌后到 3 纵的通辑线反击战,历时 1 月有余,共攻克敌据点 37 处,歼敌 4000 余人。敌人的第 1 次进入临江的计划被粉碎了。

首战临江,意义非凡。这是分局成立以来决定坚持南满后的第一仗,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打胜的第一仗。新开岭战斗后,4 纵还未来得及休整,就又担负了挺进敌后的艰巨任务。内线作战的 3 纵亦很艰难。当时我们的兵员、武器、弹药、被装、粮食都很困难。我们从机关和地方部队抽调了一部分人力物力补充战斗部队。陈云同志和我都解散了警卫班。尽管这样,人力物力还是不足。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下,我们不少同志由于没有棉衣棉裤,不得不将草绑在身上御寒。在伤亡的人数中,冻伤多于枪伤。我记得战斗打响以前,我让参谋通知保 3 旅旅长彭龙飞到指挥所受领任务。彭龙飞冒着风雪赶到指挥所时,连个大衣都没有,胡子眉毛上都是冰,冻得浑身哆嗦,半天说不出话来,我一阵心酸,连忙让他坐到炉子边烤烤火,彭龙飞半天才缓过劲来,他流着泪,向我报告了部队坚持斗争的艰苦情况。一个旅长冻成这样,部队也可想而知。我立刻让参谋连夜到临江拿 50 万元北海票给彭龙飞。我安慰他说,告诉部队,坚持住,狠狠打击敌人,形势会好起来的。然而,在战前,就我这个指挥

员来说,到南满仅个把月的时间,不仅对敌情了解不够详尽,对自己部队的战斗能力亦不太摸底。为打胜这一仗,在实践中了解敌我双方,做到知己知彼,我带了两个参谋人员,乘一辆吉普车,日夜往返于3纵的7、8、9师之间。当时在部队中,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理解不深,信心也不很足。就个别战斗来说,打得并不理想。有的部队打个击溃战就罢休,不敢实行迂回包围,歼灭敌人。但就整个战役来说,我们是胜利了。这一胜利,给部队鼓舞很大,增强了指战员的信心。战后,部队进行短暂休整。我们针对这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组织部队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战例,着重研究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大胆包围迂回、连续作战、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通过总结,提高思想和战术水平,以利再战。

1月30日,敌人调整部署,在赵公武的指挥下,以4个师的兵力2次进攻临江。敌52军195师由通化先出动,企图由北迂回六道江,配合2师、新22师向临江进攻;207师由新宾到三源浦驰援195师;暂21师向金川、濛江地区扫荡。我们分析敌情,195师孤军深入,侧后完全暴露,抵抗力小。暂21师增援的可能性小。2师、新22师增援须三五天才能到。于是决心抓住时机,集中3纵全部,歼敌于高丽城子地区,突击点选择敌侧后。那时天气奇冷,大雪没膝。既开不动汽车,又骑不了战马。我们踏着积雪,到高丽城子地区,勘察地形,选择战场,来往于部队之间指挥战斗。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战士爬冰卧雪,忍饥受寒,服从指挥,战斗中非常英勇顽强。2月5日拂晓,战斗打响。激战一天,黄昏时,3纵7、8、9师三面包围了高丽城子。晚间10时,敌向通化方向突围,被歼2000余。我部队乘胜连续作战,挥师三源浦,直指增援的敌207师。2月8日,向敌阵地发起勇猛的冲锋。主攻部队战斗情绪高涨,吃苦耐劳,大胆实行迂回包围,灵活运用战术,火力组织严密,一举消灭敌207师第2团(缺一个营)及保安团一部近2000人。至此,敌人又以失败告终。

两战两胜,大大提高了全区作战部队的斗志和信心,仗越打越好。但部队作战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战术技术问题,也有信心问题。因为虽然打了胜仗,但我军在南满的被动局面并没有就此改变。南满能否坚持得住,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半信半疑。进一步增强信心,就要引导大家把眼光放远,胸怀全局,从南满的艰苦斗争看到胜利的前景,看到全国军事斗争的大好形势。同指战员反复说明,尽管南满形势如此紧张、艰苦,但天下并不都是如此。有的地方出太阳,有的地方下毛毛雨,有的地方发生暴风雨。南满虽是“暴风雨”区,但北满、东满、西满集结一切力量准备打击敌人,前途光明。我常对干

部们说,南满的局面好象一条船,如舵掌得不好,船上的人三心二意,就有翻船的危险。但如果把舵掌稳,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危局,船翻不了。即使船上有些地方漏点水,也不会淹死人,我们还有码头可以靠岸。而敌人不是坚不可摧,对付不了的,它有不可克服的弱点。关键是看我们的仗打得如何。当前,固然应当解决战术技术素养不足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强的信心。从这些考虑出发,我南满各作战部队,在整个保卫临江的战役中,始终坚持做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这一点,就没有指挥员的决心和信心,就没有战斗员的士气和勇敢,也就没有保卫临江战役的胜利。

敌人第2次进攻临江失败之后,杜聿明亲自出马,指挥5个师分4路向我临江地区发起第3次进攻。敌70军91师由四平经梅河口、山城镇进至杨木桥子、大北岔一带,迂回大荒沟,企图向我八道江实施主要进攻;52军2师进至高丽城子、大龙枣沟门一带,协同91师进攻八道江;新6军22师占领热闹街,企图经六道沟门向八道江、临江迂回;暂21师主力到通沟;195师两个团由通化赶来增援。我们分析敌情认为:正面敌91师、2师战斗力强、兵力多,纵深有195师及新22师主力,可随时增援。但敌人侧翼暴露,我侧翼则有机动区。因此决定,先打敌侧翼的暂21师,争取打胜;然后再打敌91师主力,先拦腰切断打其侧后,乘胜向柳河、金川发展,尔后视北满主力作战情况,再扩张战果。2月18日,我3纵主力全歼通沟敌暂21师2个主力团。21日,又向高丽城子之敌91师和2师发起猛烈进攻。首先在大北岔地区摆下战场:3纵9师由五道沟、大青沟进攻,割裂敌91师与272团的联系,配合8师歼灭大北岔之敌。尔后,向高丽城子迂回攻击。4纵10师向大龙爪沟、闹枝子沟方向攻击,12师36团向六道沟门警戒。辽宁地方部队破坏朝盘线、四梅线向北出击,配合正面主攻。安东军区的部队破坏安奉线、永兴线。战斗结果,全歼大北岔敌91师272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接着,我军主力向高丽城子敌之主力展开进攻,歼敌2师6团3营。溃败之敌在敌195师、新22师的接应下,窜回通化,同时被迫放弃辑安。2月22日,我北满部队二下江南作战,消灭敌一部分有生力量。2月27日,南满我军继以4纵活动于宽桓、通辑广大地区,积极捕捉战机,打击敌人;3纵北上,收复柳河、辉南,扩大了根据地。辽南部队与4纵12师继续在敌后作战,创造辽南的独立局面。3月7日,我北满部队三下江南作战,敌人被迫回兵长春路。在我南北紧密配合下,敌人疲于奔命,处于被动挨打状态。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我南满部队收复金川、辉南、柳河、桓仁、辑安5座县城,敌人5个师被我打垮3个,毙伤俘敌近万人,彻

底打退敌第3次进攻。

三保临江的胜利,使敌人逐渐转入被动,我们开始扬眉吐气了。战争改变了形势,实践教育了消极观望的同志。这些同志先后都转变了思想。内部团结了,力量壮大了,部队士气更加高涨。正当正值过年前后,我和肖华等几个同志去陈云同志处拜年。当时,物质上很困难,冰天雪地钻山沟打仗,吃不饱、穿不暖,但精神上我们是乐观的。大家聚在一起,心情十分激动。一方面,打了胜仗,信心提高,团结增强,大家都很高兴;另一方面,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面临着敌人可能的再度进攻,心情仍很紧张。在那样情况下,陈云同志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积极做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思想工作,克服消极情绪,努力开展地方工作,发动群众支援部队。由于陈云同志既坚持原则,又团结同志,使分局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南满能够胜利坚持的根本保证。

三四月间,大地回春,松花江即将解冻,南满最艰苦的隆冬季节过去了,形势向有利于我们方面转化。杜聿明虽3次惨败,仍不死心,趁我北满主力回渡松花江之际,又拼凑了7个师的兵力(十几个师的番号),第4次进攻临江。敌207师、14师的41团和25师的75团由清河城子、双山子、宽甸向桓仁进攻;新22师及2师的6团由新宾向通化攻击;刚从热河调来的89师和54师的162团由旺清、新宾向三源浦攻击;暂20师由英额门向安口镇攻击;184师、182师、暂21师由梅河口、海龙一线南犯。这样,敌人摆开一个宽大的正面,于3月28日开始,向我临江地区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进攻。

战争帷幕即将拉开。从敌我力量对比看,形势很严重。我们只有4个主力师(其他两个师已去敌后),每个师平均仅6000人。部队连续作战,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于是,又产生了怎么打的问题。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了分局、军直干部会议。会议分析讨论了战争的形势和任务,重申了坚持南满的方针——坚决地打,准备付出3/4或4/5的代价,打赢这一仗,把敌人牵制在南满。陈云指出,要准备打大仗、恶仗、硬仗,只要有利于全局,南满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会上,我作了“树立坚持南满斗争的正确思想”的报告,针对部队的思想状况,提出处理好几个方面矛盾:(一)胜利与牺牲。只有用正义的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才能根本避免战争的伤亡。打仗就要有伤亡,打硬仗打恶仗更要有伤亡。伤亡有两种:一种是怕伤亡而伤亡,消极保存力量,结果降低了部队士气,增长了敌人气焰,形成被动挨打;一种是胜利的伤亡,付出必要的一定的代价是为了换取更大的胜利,以局部的牺牲换取全局的胜利。将敌消灭了,就不再有伤亡,地区扩大了,兵源增多,就能壮大自己。也就是说保存自己

就要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要付出一定代价。当然,不怕伤亡并不是鲁莽的不讲战术。而必须从战术上爱兵,缩短争取胜利的过程,减少伤亡。反对不了解情况主观主义的乱打、乱拼、乱冲的鲁莽军事家。(二)啃骨头与吃肉。一个战役中,没有几个啃骨头的硬仗,一个战斗中不经过几个反复的冲杀,不能完成战役和战斗的任务。有的同志只想吃肉不愿啃骨头,是缺少全局观念。啃骨头是战役战斗中的关键。作用大,影响全局。不啃骨头就吃不上肉,骨头啃掉了肉更好吃。啃骨头是第一等,骨头中带肉是第二等,肉中有骨头是第三等。(三)胜利与疲劳。要不怕疲劳,不失时机,争取胜利,即等于争取恢复疲劳的时间。否则困难增多,错过了胜利的时机,让敌人存在,延长战争过程,更增加疲劳。(四)奖与罚。战争是对干部品质最确切可靠的检验,是评定选拔干部的标准。凡积极努力负责、坚决勇敢顽强指挥作战的就奖,否则应罚。(五)战术技术与政治思想。我们的战术是革命的战术,是建立在正确的政治思想基础上的。政治思想是战术的原动力,积极勇敢顽强就是创造和发展战术。(六)军队与群众。加强群众观念,爱护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认识群众是基本的血肉脉络,没有群众即没有战争的胜利。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认为,无论战争多么残酷,也要打下去。只能打胜,不能失败。陈云最后逐一征求意见,如果付出的代价大,要准备承担责任。他反复问大家,对这样的决定后悔不后悔。大家一一表态“不后悔”。于是,陈云诙谐地一拍桌子说,“我们学上海交易所的规矩,成交了。”3月31日,辽东军区为四保临江发布作战指示,指出:“……今天粉碎敌人进攻的条件,比上次更为有利……今后只要歼灭敌人两个师,南满形势即可发生基本变化。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战斗的意志,发扬打硬仗、打大仗、打恶仗的坚强决心。战争胜利的要诀,就是积极的争取主动性,努力造成敌人的弱点,积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虽是微小的也不应该放过,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我们要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在大敌当前表现英勇无畏,以积极负责努力和坚决勇敢顽强的精神,来狠狠地消灭敌人……”

四保临江,我全军指战员以高昂的斗志,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争取了先机。先敌展开,先敌占领阵地,先敌进攻。我集中7、8、9共3个师,打红石砬子的敌人主攻部队89师。在兵力部署上,采取以7师一部迂回敌后,断敌退路;以8师一部控制歪头砬子阵地;8师的主力与10师一起,由东向西进攻敌89师;9师一部控制柳河,主力控制湾口镇阻击暂22师,保证正面部队作战。4月3日5时半攻击开始。突击方向打得坚决,同时展开强大兵团进攻敌人

纵深,实行两翼包围迂回。结果,全歼敌 89 师全部及 54 师 162 团,俘敌 7000 余。这一路是进攻之敌的主攻部队,又是从热河新调来,气焰嚣张,装备也较强。将其全歼,打破了敌人整个进攻计划,迫使各路之敌仓惶退兵。从而粉碎了敌人第 4 次进攻临江计划。

南满我军,自 1946 年 12 月 16 日至 1947 年 4 月 3 日,经过 3 个多月连续作战,在北满部队三下江南配合下,打退敌 4 次进攻,共歼敌 3 万余人。我们总结经验认为:首先,胜利来自决心的坚定。客观条件虽那样艰苦,敌人那样嚣张,但为了贯彻坚持南满,用战争改变形势的既定方针,我全体指战员团结一致,英勇奋战,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敌人 1 次进攻,打! 2 次进攻,打! 3 次、4 次进攻,还是一个字,坚决“打”! 第二,选择正确的主攻方向,在指挥上争取主动。一保临江,是由于我 4 纵挺进敌后,实行外线出击,变被动为主动;二保临江,是由于我先将敌之孤立、暴露的侧翼打掉,转而实行机动作战,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三保临江,是由于先歼侧翼通沟之敌,减少后顾之忧,尔后集中力量打击了敌主力部队;四保临江,则是采取迂回包围,选择敌之主攻部队打,将其全歼,打破敌人进攻计划。第三,抓住有利时机,连续作战,在战斗中不放弃任何歼敌机会,扩大战果,集小胜为大胜。如二保临江时打了敌 195 师,接着打三源;三保临江时打了敌 91 师又乘胜攻取柳河、金川、辉南,收复广大地区,扩大了根据地。仗越打越大,越打越主动,伤亡也越来越小。一保临江,敌我伤亡的比例是 3: 1;二保临江时为 4: 1;三保临江时为 9: 1;四保临江时为 14: 1。从而赢得了这场战争。

“四保临江”是关系东北战场全局的关键。这一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企图,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迫使东北敌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而我军则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是一个战略转折点。不仅很快地迎来了夏季、秋季、冬季攻势的胜利,改变了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也为东北战场的战略决战——辽沈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段历史是值得纪念的。

八、存尾

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是战略配合的杰作和典范,这好像并非兵家之共识,《孙子兵法概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作者陶汉章将军就有不同看法,他说:

兰台稿存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在林彪指挥下,有时形势是处于被动地位。他围攻长春,三下江南等行动,基本上都是被动应战,打不开局面,争取不到战略上的主动权,更谈不上用兵的灵活性。”(见该书第49页,文中的线和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谨存此说,供研究者参考。

一九四八年中共接收沈阳情况概述^①

田仲德^②

今年的11月2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四十周年纪念日。现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接收沈阳的一些档案文献摘辑出来,以资纪念。

(一) 准备接收

在沈阳解放之前,1948年10月17日,中共东北中央局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电报中开始提出加强对沈阳工作的问题。电报说:锦州打下,长春60军起义,东北形势正在急速变化。东北局今晚开了临时的全体会议,研究商讨了目前的形势与工作,认为目前东北形势已进入最后消灭敌人的阶段。决定:(1)要将目前有利形势向东北全党阐明,提高各级组织及所有干部争取胜利的积极性,发挥高度的进取精神;(2)长春解放后,东北工作的重点,将是全力解决沈阳及锦西的敌军。要利用各种关系,主动的争取瓦解敌人,加强对沈阳、锦西敌人的广播工作和政治攻势;(3)要加强对沈阳的工作,主要是利用一切关系及办法,瓦解敌军;贯彻经济封锁;号召一切技术人员、工人、职员保护机器财产;配备干部。

10月20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复电中,则明确提出准备接收沈阳的任务。复电说:10月17日东北局关于目前形势与几项工作的决定阅悉,很好,必须要作这样的认识与工作布置。只是在东北敌情的分析上,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长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依现态势西退或转向营口经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如此两种可能均告失败或无法实现,则只有退集沈阳,依靠空运撤退一部。故你们目前最紧急的工作,除继续争取瓦解敌军与巩固并准备逐步改造起义、反正及投降的部队

① 此文曾刊于《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10期。

② 田仲德,即田逢禄、耿仲琳、马淑德。

外,还应立即动员大批得力干部,不仅去接管长春,而且要准备接管沈阳及抚顺、本溪;加紧训练俘虏及投降的士兵,以便补充;同时要立即进行修通中长路陶赖昭至四平街段,以便沈敌解决后好迅速修通中长路全段,并向北宁路逐段推进,以利支前。

1948年10月25日,东北局召开常委会议,重点研究了准备接收沈阳的工作问题,并预计到沈阳的解放至迟出不了11月2、3号。接着,10月27日上午,东北局召开全体会议,下午常委又开会,进一步研究了准备接收沈阳的问题。同日,东北局根据几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致电中央,提出了关于接收沈阳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该报告说:

(一)沈阳及周围之抚顺、鞍山、本溪等重工业城市,即将为我解放,很好的接收和保护这些城市,对今后恢复与发展东北的工业建设,以及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经济条件,具有决定的意义。

(二)鉴于过去接收鞍山、营口的经验,如果在入城前缺乏充分准备,势必造成混乱,使国家的宝贵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与破坏,给以后进行恢复和建设增加很大困难。特别是沈阳久受围困,工厂关闭,工人失业,周围地区因今年天灾,毫无收成,加以大规模战争的破坏,群众生活极苦,解决群众吃粮供应,为极严重的问题。且此次大战后,又有大批散兵游勇,及敌之老弱、伤兵、残废等,须加安置。因此,接收沈阳及其周围的工业城市,将是目前一件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和艰巨的组织工作。

(三)为此,经东北局会议讨论结果,关于接收沈阳,得到以下意见:

(1)沈阳解放后,我主力必须经过补充休整,故沈市之卫戍部队由肖、肖^①指定两个纪律较好的独立师担任。

(2)东北一级政府各部委与财经部门,以及各省市,均已分别抽调大批干部,共计三千到四千人,统一编组,具体分工,准备接收沈阳。另外,附近各城市,除工业部派人外,因干部缺少,暂时指定抚顺、本溪两市由安东省委配备干部接收;鞍山、辽阳等地,由辽宁省委配备干部接收。

(3)所有入城之部队,以及地方干部,均须事先进行教育,讲清入城各种政策及应注意事项,强调集中统一,严格遵守纪律,并规定所有各系统接收人员,只负看管保护之责,绝无分配处理之权。否则,将受严厉处分。工作之第一阶段,主要的任务是:保证所有之工厂资财、各种设备、档案均能原封不动的

^① 即指时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的肖劲光和政委肖华。

保管看守起来,不受丝毫破坏。绝对禁止搬运。对旧有人员,开始一律留用,并要他们负责办理点交。

(4)为了保证以上任务的完成,须严禁乱抓一把本位主义,并规定各单位首长的负责制,严格约束自己的干部。如各个系统派出的干部,发生破坏政策,违犯纪律的现象,则由各单位首长负完全责任。

(5)限定最迟于11月底以前修复四平至沈市或清源至沈市的铁路。在铁路未修通前,决定先拨一万四千吨调剂粮,现在即着手准备交通工具,以便及时解决城市粮食的需要。至于附近乡村群众的吃粮,责成各省自行调剂解决。

(6)组织沈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陈云同志为主任,伍修权、陶铸为副主任,王首道、陈郁、张学思、朱其文、陈龙为委员,全权处理沈市接收事宜,并暂以伍修权兼卫戍司令,朱其文为市长,日内即率干部前去沈阳附近。

(四)沈阳解放,东北即成为完整一块的解放区。这一新形势,将要求我们对今后整个工作方针和计划须从长期着眼,作统一的全盘布置。除主力准备进关作战外,后方工作:

(1)必须将恢复与建设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军事工业,提到首要的地位,并以大力修复北宁路,与准备修复关内可能与必须修复的铁路,生产大量军火武器,支援全国作战。东北局的领导将以沈阳为中心。

(2)以大力编组和训练大量俘虏(估计约有三十万),至少争取其一半参加补充主力;1949年继续动员与训练十万新兵,补充主力。

(3)更有计划的大量训练军事的、地方的各种技术干部,办好各种大学教育。

(4)准备提前正式成立东北人民政府。

以上意见,请中央审查指示。

东北局给中央的请示报告,被值班秘书压了几天,中央领导同志发现后,立即于11月5日向东北局发了复电。由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复电说:“完全同意你们西感^①电对沈阳及全局的方针及布置。”周恩来在东北局向中央请示报告的这个电报首页上批道:“此件为值班秘书压在办公室传阅文件中,一直未给我看,今日此室方查出,已给康××以口头批评。”毛泽东批道:“此件是否已复?如未复,请发拟电如另纸。”由此可见,中央对东北局这

^① 即10月27日。

个电报是十分重视的。

根据10月27日东北局会议的决定,10月28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欢送去沈阳工作的干部动员大会。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铁岭的敌人已在前线起义了,(鼓掌)我们很快就要进沈阳了。(鼓掌)前方的同志打了大胜仗,轮到我们去接收,这不是去开玩笑,或者去玩一玩,是担负着很大的担子。如果军队打得好,我们接收不好,就要记大过一次,责任重大。这次去的干部有一千二百人,里边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党员,有关里来的老干部,也有关外参加的新干部。经过了两三年,有超过半数的新干部和我们一同去接收沈阳,这表示我们已经在东北有根了,生长起来许多新干部。希望老干部、新干部,去接收要接收得好,不要搞乱了。这里向大家说明几个问题:

第一,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是怎样组成的?里面包括一些什么?包括卫戍司令部(伍修权),市政府(朱其文),经济委员会(王首道),财经委员会(易秀湘),市工委(陶铸),东北政委会办事处(张学思)。

第二,接收的方法:接收的好不好,关系重大。人家打了胜仗,我们要去接收好,不要搞乱了。我们这次去,要考验一下,考个60分马马虎虎,考个59分,或者打个圈圈,就不好。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接收的方法有好多种,也可能是你拿你的,我拿我的;也可能是只要机器不要文件;也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不是自上而下的。这次要改变一下,要统一接收,原封不动,全部保管,机器文件统统要。沈阳是我们的了,不要慌。接收的方法,就是要把他们的头子找到,大头子追二头子,二头子追三头子,三头子追四头子。比如国民党的经济委员会,下面有几个部?有几个工厂?要问清楚,要把文件、人员都交出来,我们接收,交军事管制委会打了收条,签了字,才算完成任务。要自上而下的按系统接收,接收以后要看守好。东西能不能搬出去?不能。比如哈尔滨水利局去找一条皮带,很需要,能不能搬?不行。要原封不动。又如看到洋房子很多,都是我这个部门的吧,到处贴封条,行不行?不行。要统一分配,不能乱来,不能零零碎碎的自下而上的,见什么拿什么,不要搞乱了。有人讲,这些东西哈尔滨很需要,搬吧。不能搬!又有人说,飞机要轰炸的,搬吧。我负责,不要搬,因为一搬就乱了。

第三,有什么重大的问题?同志们考虑一下。沈阳是东北第一个大城市,在中国也是一等城市,那里什么人都有,中国人,外国人,各种各样的人。我们接收的好或坏,消息都能传出去。一定要做好,如果做不好,人家会说解放区不好,民主政府不好。我提醒同志们注意:

(1)头一条,外交问题。那里美国、英国、法国领事馆和新闻记者都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在外)。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我们反对不反对?反对。但是不是要一脚踢开?还不能,要采取慎重的适当的政策,按中央的规定、人民解放军口号办事。另一方面,要警惕,不要麻木。外国人找我们谈话,不要什么都讲,不要随便暴露消息。向外国人发表谈话,只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人可以,别的人不能谈;没有经过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批准,任何人不能对外国人谈话。

(2)不能打人,不能抓人,不能杀人。只有公安机关和卫戍司令部可以抓人。杀人只能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要杀了怎么办?那里杀的人那里赔命!对反革命特务问题怎么办?要抓,治安要维持,破坏治安不行。

(3)不能乱没收,不能乱封门,只有经过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才行。

(4)同志们要准备,那里没有粮食,要估计到,一百五十万人,要赶快修好铁路运去粮食。钞票问题也要想想如何解决。原则上一条,稳当一些,要多想一想,多请示一下。这样慢了一些,有点损失,但这比冒冒失失犯了错误,那一样好?宁可稳当一些,不要冒冒失失。

第四,所有去的单位,大的机关,同志记得要带上关防、图章,职员证明书要有,不然入城后不好辨认。

第五,什么时候出发?今天晚上就准备走,今晚十时到十二时要全部出发。

(二)接收情况

1948年11月2日,在沈阳解放的当天,以陈云同志为首的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率领干部一千二百人,立即进入沈阳市区。关于开始接收的一些情况,11月4日陈云、伍修权、陶铸给东北局的电报说:

现将昨日(三日)情况简报如下:

(一)沈阳最重要的大工厂,兵工厂、机车厂、冶炼厂(铜)、机器厂、电工器材厂、汽车制造厂、桥梁工厂等,均完整接收。兵工厂昨落弹百余枚,损失较大。铁路有机车四百台,马上能用的八十台。有许多工厂并未停工,电力一到即可复工。主要工厂均已派军事代表。抚顺送电已到,部分有电。

(二)各系统自上而下接收顺利。警局枪支基本缴收。市府各局长,生产管理局长、副局长,银行、各工厂、各机关正职副职或次要负责人,均出面办理交代。大体东北人均未走。部分关里人也未走。召集讲话后,反映很好。

警局人员对宽大政策甚感激。商会已允借粮七十万公斤。

(三)当前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为物价与金券^①的处理,商店均未开门(票币与轰炸均有关系)。现决定明日对公教职员人员预支工薪每人十万,估计约十五万人,发一百五十亿,公布靠近沈市之开源、安东等地物价,并经百货公司公布收买物资的价格,以便商人作参考。银行送来东北票^②,尚有一半在路上,到后拟采适当办法,部分兑换金券。如筹码仍不足,则再找其他办法补救。金券发行据说有二亿,确数尚未查出。

(四)沈市有弹药,确数未查清。因一、二、三日敌机轰炸,昨已星夜疏散四十八车皮,仍在搜疏。

(五)尊林、罗、刘^③指示,决定一、二、十二及辽北共四个师为沈市卫戍部队,师长即任分区卫戍司令,均于今日接防。

(六)昨天发生的问题:(1)沈阳站被破坏抢劫,幸电话线路尚在。其他次要机关、少数小仓库及敌官员住宅,有少数被抢,主要是散兵及流氓,也有附近贫民乘机而来。估计散兵仍有三、五千,各纵仍在搜集。(2)卫戍司令部与部队过去无建制关系,命令传达普及太迟,白天街上站岗战士仍在断绝行人来往,少数则乱放。(3)散兵俘虏住民房学校,拆烧家俱,并有小的抢劫事。

(七)三日来我们感触最深者:(1)为人心向我,许多机关、工厂的公务人员,有条不紊,保存物资文件,等待接收。(2)为哈市及北满随来的东北公务职员的忠勇努力精神。(3)为地下工作者(包括一切情报关系者在内),在敌军将溃及已溃时,向各机关挺身而出,号召保护资财,等待接收,起了不小作用。

东北局收到这个电报后,于1月8日转报中央;中央收阅后又批转华东局、中原局、西北局、华北局、晋绥、豫皖苏、热河等地参阅。

1948年11月11日,沈阳市军管会陈云、伍修权、陶铸又致电东北局并报中央,对接收沈阳的情况,作了比较详细报告。报告说:

(一)情况:

(1)散俘原有二、三万,成为治安最大问题,各纵、卫司及政府收容后,除旧城内尚有游散外,街上已无成群者。最高估计,游散及换便衣者尚有三、四

① 指金元券,是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为解决法币贬值而发行的一种纸币。

② 指东北解放区的东北银行于1946年3月开始发行的地方流通券。

③ 指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

千。但长春遣俘续来,除一切可争取当兵者外,估计有一、二万老弱俘兵官须遣送唐山、平津,正派遣干部按站发钱南遣。沈阳俘兵,早由国民党发了棉衣。

(2)沈市所存弹药甚多。据已发现分藏各仓库之弹药、炸药,估计约可装六百车皮。已运出疏散二百四十车皮。敌机轰炸兵工厂与弹药库,兵工厂受损失较大,弹药因分存,所损尚小。已由周纯全、刘居英、江泽民组成三人团抢运,如能安全运出,将大有利于全国作战。

(3)沈阳周围各县高粱颗粒未收,但市内民粮存储好于长春。七日来,小市售粮不缺,每斤我币三千以内。只要解放区各县对沈开放粮禁,可能不发生大危机。蒋军西撤时售出军粮,故缴获粮只三百万斤。需由沈阳供给的我军人马要三十万,必须请安东、辽北大力运粮来沈,才能解军粮之荒。此事务请李、叶^①督促。军粮问题上,另一危机是沈、安将无空车皮,因疏散之弹药未易卸车,运来粮车悉装出弹药,如弹药不能快卸,则必粮弹两误。

(4)从蒋银行账看,敌九省券^②已收兑很多,未收回者只一万五千亿。金元券,在东北敌发出二万万五千万。金元券在物价上所表现的市价,七日来,由我票八百换金券一元,跌为我一百至二百换金券一元。八日,我以一(金)比一百(我)挂牌收兑,三天兑入百余万。现锦州,我币二千换金卷一元。估计金券将向两锦西去。因贫民有九省券,我即照国民党三十万九省券比一金元券价,以三千(敌九省券)比一(我票)收兑。八日,兑入敌九省券八十亿。估计我只费五亿本币,即可收拾全部敌九省券,所费甚微,而得人心。

(5)据查,沈市原有商店二万余家。自去冬孤立沈阳后,只剩七千。八日前,由于散俘多,币价未定,商店未开。至昨日止,已有一半开门,大铺多数开门。因我预先公布沈市附近地区物价及百货公司收买价格,故物价一般平稳,无大波动。现行人热闹。电灯、电话,三日下午修复。邮电,于五日即与全东北开通。自来水,六日修复。电车,八日上街。群众对我迅速恢复,很佩服。

(6)铁岭至沈阳,三日通车。安奉路,六日通车。中长南段,只差太子河桥。沈至新民,已通。目前全力抢修营盘至清源路,只缺椿木。但因疏散弹药和防止特务逃跑,故未卖客票。营、清通后,全力抢修西南。

^① 即当时的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副主任叶季壮。

^② 指1945年12月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的一种流通券。因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投降后曾把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等九省,故称九省券。

(7)接收情况:八大工厂(即兵工厂、汽车厂、机车厂、桥梁厂、炼钢厂、电器厂、橡皮厂、机器厂),除兵工厂、橡皮厂被轰炸,部分受损外(主要是厂房),均原封接管。其他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均已接管。旧人员报到上班者日增。全体职工均发临时生活维持费十万,影响甚大。沈市公教职工十七万,连家属在内,可占现有人口三分之二。他们与我们血肉关系。在保存移交中看出,与三年前正相反,人心已向我。最可注意者,许多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高级职员,如:联勤之将官,工厂厂长,银行经理,学校校长,铁路局处长,市政府各局长,亦陆续报到上班。目前,人事一般未变动,我只派一个军管会的军事代表。许多工厂企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是哈市与北满带来的东北的新干部,他们既熟练,又忠勇,十分可爱。军管会接收方法,即在军管会下,按系统自上而下只派军事代表,命令旧人员留职,呈报情况,等待接收处理。用此办法,主要工厂、企业、机关接收之后,已开始系统的接收附支机关。接收内容,是资产、人员、档案。移交接收签字手续不妨延迟,求快必乱,易被偷漏。已派军代表者,凡可开工的即开工。

(8)沈市警察,原五千五百人,现上班四千五百人。我们的办法是,交出武器(除部队已收的外,共一千三百支),徒手服务。现交通警察,在一切原岗,指挥交通。我们的分局长均已派下去。依现有经验看来,像过去哈市处理的一样,旧警察的武装必须放下,将来必须彻底改造。但在大城市中,暂时利用其徒手服务,又是必要的。目前,城市交通中危险问题,是车辆靠左靠右问题。全国各大城市靠右,新汽车构造适于靠右,许多新雇和俘来的司机习于靠右,但东北政委会因伪满时靠左习惯而久,已通令靠左。为了适应沈、长各市与将占大城市情况,东北政委会通令,改为靠右为好。敌电台已查出十五部,情况由陈龙另报。

(9)留沈美、英、法领事馆,到我各主要机关找人拜访,侦我动向,我则无经验。朱其文回拜各领事时,谈话错误,已有专报。现规定,非经军管会决定,任何人不得接见外人。接见前,必有对方先提书面问题。每次会见前,规定我方谈话范围,不准说出范围,也不答复书面以外的问题。

(10)五日,只以三、五干部,利用原中央日报的工人,校对出了《沈阳时报》。现辽东日报人员已到,有关沈市的一切布告,中央及东北局的政策决议,为市民职员字字细读。在大城市中的报纸,是传布政策最大机关。我们深觉此工具之重要与关系重大,故拟刘白羽、华山、姜丕之组织报导委员会,住在军管会,陈云、陶铸决定看大样。

(11)最重要的是,我军在此次进城后,对工厂、企业做到了不搬机件器材,而且严格保护。部队中城市政策教育收到大效。个别的仓库中,拉些细粮是有的。但这是久战缺粮的必然现象。且我们的供给工作尚未做好。即此,亦仅个别现象。市民对我军纪律是很赞许的。我们正以大力准备全军每人一份慰劳品。

(二)困难:

(1)各项政策,中央和东北局都早就定了的。但人多手杂,经验甚少,执行中共、东北局政策时,一不小心,易出岔子。而沈市为中外全国观瞻所系,故我们抱定方针是,遇事不燥,宁多研究请示,而迟延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让草率从事而出岔子。前者损失小,后者损失大。例如:目前对于高级技术人员、高级战俘或放下武器的军官,以及对于隐藏或报到的简任级文官的处理,正在研究情况与处理办法。

(2)哈市介绍来青年,宣传等部门工作的人,已有好几批。但许多部门来的人行动,大半忙于接收房产与安家。我们在为找房子与争夺接收对象的问题上,与后来人员发生了许多应付上的困难,抵销了对外工作的力量。我们请求后方暂时不要派各机关人来,只派专到沈市工作者来。

(3)工厂与房子分配问题。目前决不能分配,一分即乱,势必忙于内争,而疏于对外接收。只有再过一、二月,东北局讨论之后,再以合理使用的原则来分配。关于房子问题,现野战军、军政后勤机关及卫戍机关,沈市的主力纵队,他们在沈有短期工作与驻留,目前必须首先保证大战之后正在休整的野战军所需的房屋用具,只要让他们好好休整,就是增加今后作战的力量。故北满机关不要派人来打前站,找房子。必须等野战军离开沈阳之后,才能合理调整房子。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圈阅了这个报告,中央并于11月16日将此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参考。

此外,关于接收沈阳兵工厂的情况,1948年12月2日东北局给中央及军委的一个报告中说:

兹将接收沈阳兵工厂的机器人员数目及原生产情况呈报于后:

(一)现在使用的机器:车床1503部,洗床594部,刨床116部,磨床94部,六角床142部,压力机213部,枪炮弹专用机540部,铲齿机3部,枪炮专用机34部,其他杂机677部,共计3966部。

(二)需要修理及不能修理的机器,共有3277部。

(三)工人已报到者 10049 名,职员及勤杂人员已报到者 1340 名(内技术人员 263 名)。

(四)原生产力:每月新造七九步枪一千支,改造七九(九九式改)两千支,制美式冲锋枪五百支,制七九轻机枪一百挺,制八二迫击炮 24 门,制四一式七五山炮 6 门,制子弹四百至六百万发,制八二迫击炮弹二万余,制六〇弹三万发,复制十二公斤重迫击炮弹五千发,制四一式七五山炮弹五千发,制改一式手榴弹(无木把)二十万发,修理炮十余门,修坦克五辆。

(三)经验总结

关于接收沈阳的经验,上面介绍的材料中,有的已经带有经验总结的内容。此外,我们还看到有两个集中谈接收沈阳经验的材料:一个是 1948 年 11 月 28 日陈云同志亲自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的经验简报,一个是 1949 年 2 月 10 日东北局关于沈阳接管经验之补充报告。

1948 年 11 月 28 日陈云同志在他写的《简报》中,全面地总结了接收沈阳的主要经验,共提出如下七点:

(一)关于接收的方法,军管会在出发前即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具体作法即:(1)各按系统——军管会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按系统进行接收。依现有经验来看,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收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2)自上而下——入城后即布告通知原有机关主管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负责人不在,即由第二或第三级办理。(3)原封不动——旧人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接收步骤,第一步是资产档案,第二步才能整理人员。(4)先接后分——各部门只有接收权,无占有权、支配权,资产档案一律不准搬走。各部门不对原来上级负责,只对军管会负责。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无条件服从,待全部接收完毕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在入城之前,应连续广播我之政策、办法(此条很重要),要预备布告、信封、图章、通行证、警察袖章等,并预做招牌,以便在进城后几小时即能摆开办事。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既能防止乱,又能保证快(两天都接上了头)。如果不按系统,不分上下,乱接一通,必然损失很大,影响很坏。

(二)怎样才能迅速恢复秩序,并做到比较稳当而无大波动,有五个关键问题要解决:(1)首先要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电灯不亮,电话不通,自来水

没有,电车和火车也无法开动,变成一座死城,秩序就无法控制。沈阳靠外面送电,抚顺解放后即送电来,群众称道。但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有一先决条件,即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技工。这次哈尔滨系统共带来新的技术干部数百名,他们忠勇而熟练,一个晚上在万难的情况下,即开出疏散弹药的火车,使本地人员惊异,无“共产党土包子不懂技术”之感。(2)要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为避免外地商人来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收藏,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现象,先介绍了解放区近来各地的物价表,使商人有底,敢于开市。对金元券处理,则先观望了四天,当金元券一元跌至我东北币一百五十元时,即挂牌以一比一百的比价,收兑一星期,使之自动向关里流出。敌九省券以我一敌三千的比价,亦兑一星期。两者兼兑,共兑出东北币二亿元。沈阳解放一个星期,凡能开市的买卖,大体已开市,市面很稳定。(3)敌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交通警察尽快站岗,消防队各守原位,户籍警察大部可留。(4)稳定人心,传布政策,主要靠报纸。城市的人有看报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对我宣传品,各阶层都是字字细读。除安民布告等预先准备好外,可先准备几期报纸稿件,一进城就立即出版。内容首先只能是刊登一些基本政策文件,各种布告和解放区一般新闻,不能一下子苛求内容生动,适合新区群众口味,但转载旧的文件,要有选择。一切布告,必须字斟句酌。要审阅大样,对广告都要过细审查。(5)工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沈阳(连抚顺、本溪)有公教职工约十五万人,如不注意工资问题,则人心不定。因工资问题不能一下合理解决,我于入城后五天,首先普遍发生生活维持费(兼有货币占领市场作用),11月份发临时工薪。沈阳系围城,解放前粮食奇贵,故工资标准不能按解放前折粮数发。目前基本上根据国民党的底薪等级,工人、职员、技师从每月八十斤到四百斤,因比围城时提高很多,故一般已满意。

(三)要迅速处理俘虏和疏散弹药。这两项工作处理不好,将严重影响治安秩序。如沈阳这样后方基地性质的大城市,敌之后方机关系统众多,我一进城首先就碰到散兵游勇收容处理问题。此次事前准备不够,这一工作延迟时间较长,对治安影响最大。现在感到应先准备好几个解放团的架子,以便收容。弹药疏散是入城后才碰到的问题,事先更无准备。沈阳原处在作战情况下,又是补给基地,不少弹药已经装车待运,各弹药仓库皆有铁路叉道可通,有许多弹药在仓库附近未卸车,头几天敌机轰炸目标,首先就是这些地方。我们发现后,组织三人委员会,动员很大人力,连夜疏散,力争搬动数里或数十里,幸而保存了这些弹药,未受损失。如果重要弹药仓库被炸,沈阳可能半城被

毁。现在看来,入城时需有充分的铁路人员和保护车站的武装,以保证交通和疏散。

(四)军管会内部做到减少扯后腿、抵销精力之事。军管会各负责人,要坚持接管原则,秉公办事,全力制止争房子、争汽车、争工厂等纠纷。这次能做到一般未发生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军管会本身坚持原则,不偏不私,模范行动。

(五)关于重大事件,容易出乱子的问题,必须先有充分精神准备。军管会首脑要有足够时间来考虑研究重大问题。

(六)要保证接收的好,最重要的还必须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此次入沈部队很多,都懂得保护工厂、保护城市。今年以来,城市政策教育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七)此次接收沈阳,使我们有一感触,即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陈云同志的这篇《简报》已收入《陈云文选》

1948年11月30日东北局将陈云同志写的这个“接收沈阳经验简报”电告中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圈阅了这个电报,中央并于12月14日将这个“经验简报”转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中央在批文中说:“此报告甚好,供你处接收城市时参考。”此外,中央在转发这个“经验简报”时,还在“简报”第七项建议组成专门接收班子问题的末尾处,在文内加了如下的批注:“此项提议甚好,请华北局、华东局、中原局、西北局在接收和准备接收大城市中即做准备,以便将来依次接收各大城市。”

1948年12月15日,中央又致电陈云并告东北局说:你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及关于外交工作检讨两电,均甚好,已转发各局各分局及各前委阅读。你提议各区要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甚好,已告华北、华东、中原及西北在接收和准备接收大城市中,即作此准备。望东北局也准备将接收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着明年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目前如有可能,从沈阳的接收人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干部,给黄克诚带往天津参加接收工作,也很有必要。如何,望东北局电复,并望以后将沈、长经验继续总结,电告我们。这个电报是由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传阅修改后发出的。

1949年2月10日,东北局向中央发出《关于沈阳接管经验之补充报告》。

说：沈阳军管会正在总结接收经验，以下各项经验过去未注意，对新收复城市可能有用，兹转上，供参考：

(一)根据沈市近月来破获盗匪案件统计，原在国民党监狱中被我入城部队释放之惯匪所组织抢劫者占三分之一以上，故今后新收复城市入城部队必须与军管会公安机关协同处理国民党监狱在押人犯，除对政治犯经过审查可释放外，对窃匪等犯不宜即释，可于秩序安定后，另设游民教养院之类，集中管训，以免徒增治安困难。

(二)此次甚感有专门卫戍城市部队之必要。这种部队不在多而在精，经过专门训练，纪律好，有相当城市知识，一个可抵数个用。今后接收每一大城市，应由这样的特别警卫部队入城。尚未训练好这种卫戍部队以前，最低限度也要求卫戍部队不要几天变一次，因为变动一次，交接之间终有损失。

(三)从哈尔滨出发前，各系统原拟各带武装部队，负责接收看管各自之工厂、仓库、房产等，后考虑怕因而弄乱，遂统一由卫司派出武装，结果曾因卫司手中无机动力，应付不过来，入城后最初几天，有的机关仓库等受过些损失。现在看来，即使卫司有足够兵力，由于卫戍部队本身之更替，及其与各系统间的技术联络等有不便之处，也造成看管与警卫任务执行之困难。因此各系统与卫司均同感各系统应自带负责看管工厂、仓库等之专门接收部队，归各自建制。是否引起乱的中心关键，不在各带部队，而在能否确实执行军管会的各项接收原则。

(四)军管会下设之财政处，因当时部队云集，来往干部又多，因此供给任务超过接收任务。此次幸人力物力准备较充分(单运粮汽车即达百辆)，尚未发生断粮事故。新入一城市，当货币问题未解决时，首先就有吃不到饭的危险。因此，新收复大城市之军管会下面必须配有强有力的供给处，专管供给工作。

(五)接收之工厂愈快复工愈好，最好是立即复工，这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工人生活的基本环节(否则，工人不安，必生偷窃)。生产出来的东西，总会有用处。首先复工，其次再解决订生产计划等等问题。

(六)此次税务局因带干部太少，怕旧人员贪污(一定贪污)，最初一时期税收中断，约损失一百亿以上(每天最低四、五亿)。这是因小失大。因此，在我干部来不及配备时，一般旧税务人员可暂时利用一下，使税源不断，以便再逐渐训换旧人员。

(七)城市内的电话簿子很重要，有些系统是从电话簿中才发现新接收

对象。

(八)新区知识青年渴望解放区书报,应随军管会尽快带大批书报入城,首先有计划散发赠送各学校、各工厂、各机关一批。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我党接收沈阳是搞得很成功的,为在全国范围内接收大城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中间,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读毛泽东《群众工作问题》一文札记^①

孙慧娟 田 铸^②

1937年6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5日,发言整理成了文字稿《群众工作问题》。毛泽东在这个整理稿的首页右上角写了“妥存”二字。现在这个文件珍藏在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至今尚鲜为人知,特别是在党史界迄今还很少有人提到它。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解放史上的一座丰碑,是批判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的重要文献。可是如此重要的文件被长期湮没无闻,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党史研究与宣传上的一大缺憾。因工作关系,我们阅读了毛泽东的这篇重要讲话,并了解到这篇讲话问世前后的一些背景情况,本文想就此作些介绍,并结合谈一点我们的看法,供研究这篇珍贵文献者参考。

285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讲了七个问题,即:(一)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二)这个问题在今天提出是因为什么?(三)少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四)少奇的错误;(五)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六)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七)几个问题——合法非法问题,少奇过去的问题,今后对付这类问题的态度等等。

我们认为,这篇讲话最重要的论断有二:一是对刘少奇的极高评价;二是对刘少奇的重大论点的强有力的支持。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于刘少奇的工作和领导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少奇同志对于群众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在实际工作中,在党内生活中,

^① 此文曾刊于《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9期。

^② 田铸,即田逢禄、耿仲琳。

在华北工作中,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一生的工作,很少失败。今天我们党内干部中,象他这样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少奇写给中央的几封信上,……在他具体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时,他也基本上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的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不仅对中央当时召开的会议有重大影响(我们将在第二部分有所介绍),而且对于以后党的历史发展和形成新的中央领导核心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还对刘少奇的许多重大的意见都表示同意和强有力的支持。比如,关于我们党内是否存在“左”倾错误传统问题,这也是当时会议争论得极其激烈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果断地支持了刘少奇的意见。他说:“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在这点上,我是同少奇、凯丰、罗迈、伯渠同志的意见大体相同的。”接着他又具体分析产生“左”倾错误传统的原因。他说:“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1)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2)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份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3)党还只有十五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4)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的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中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接着他又分析了存在“左”倾错误传统的一些具体情况,他说“这个传统是一切领导机关与一切干部与党员都有的吗?不是的,一般说来,他是部分领导机关(主要由中央负责)部分干部与党员的。为什么某些不良习惯相当普遍呢?这是由于部分的人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些人在第一领导机关中占多数)其他的人也被迫着或半被迫着这样做。有些则知道错误发生不满,又说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或竟不准他们说,因此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实在的情形。”接着他又强调指出:“从洛甫同志分析中也证明这个不良的(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的存在。因为洛甫同志指出党在四中会后犯下六个个别原则上的错误[(1)没有估计部分资产阶级的变动;(2)对革命持久性、复杂性、不

平衡性估计不充分；(3)战争中‘左’的及右的错误；(4)群众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及对此错误斗争的不够；(5)不会利用敌人的间隙；(6)思想斗争与干部政策上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全党内，就在今天说，还是没有全部彻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许多地方机关与许多干部与党员都犯了的，其中有的错误(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是原在四中全会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试问有了这些错误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的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又如，关于人民政府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人民政府问题，当时应该是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这个问题过去没有解决是不对的，因为当时不但有小资产阶级的全部(这是新的)而且有中产阶级的一部与大资产阶级一小部起来斗争了，并且在当时的整个时期，我们没有认真的干统一战线。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损失。少奇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对的。”又如，在评价洛甫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报告提纲时，毛泽东指出：报告提纲“对于少奇提出的问题——‘左’倾传统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否定了少奇的全部。……否定其积极方面的东西(全文没有提到，并在开始就应提出)，说得很对的东西，是不妥当的。”关于少奇同志向大会提出的报告及少奇同志写给中央的几封信，毛泽东也是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他说：“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少奇写给中央的几封信”“也基本上是对的”。毛泽东在发言中，还对中央过去处理少奇的问题提出批评，他说：“过去处理少奇的问题，一般不正确的。”“把少奇正确的地方，他的问题的中心(在今天还是一样)也批评掉了，是不对的。在对少奇问题的处理态度上是完全不对的(不分皂白的打击，不尊重他的意见，几次的组织结论——并以之对付一个中央的领导同志)。少奇在他的第四封信上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应该作出正确的结论”。这些都是毛泽东在这个发言中对刘少奇的有力支持。从当时会议记录反映出的情况看，当时的情况十分严峻，许多人发言都对刘少奇提出尖锐批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个长篇发言，旗帜鲜明地表示对刘少奇的保护和支持，刘少奇有可能被彻底否定，我们党的历史有可能走一段更加曲折的道路。

二

毛泽东这篇讲话的历史背景情况,我们从当时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十分充分的材料:

1937年6月1日至4日召开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继党中央于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之后,紧接着又于5月17日至6月10日召开的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本来,中央决定由刘少奇向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提出报告,并已写出报告提纲,于5月16日(即大会开始的前一天)首先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报告。报告共三个部分,即(一)关于白区工作的一般估计;(二)对北方工作的估计;(三)报告的提纲。在第一部分中,少奇同志历述了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所犯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指出党的六次大会提出的争取千百万群众的任务,在苏区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而在白区方面,直到现在成绩还是不多的,比四中全会前没有加强。原因在哪里?客观上是敌人叛徒奸细的破坏,然而主观上的错误是很多的,存在着“左”倾关门主义、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的传统。四中全会后的缺点:(1)反对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不够,在实际工作中部分的保存着立三路线;(2)没有着重提出秘密工作;(3)斗争方式不甚妥当,没有继续着重反对“左”倾,直到现在没有着重批评白区工作的错误。白区工作的转变,一定要承认这一错误。会议主持人洛甫对刘少奇的报告极为不满,他在会上当场宣布:详细的讨论再召集会议,在白区代表会中,第一部分暂不报告。这次政治局会议对刘少奇的报告没有展开讨论。

5月17日上午8时,白区党代表会议开始举行,刘少奇向会议作了题为《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他原在政治局会议上所讲的第一、第二部分都没有讲,只讲了第三部分《报告的提纲》。他这个报告共讲了十一个问题,即:(1)彻底的转变;(2)今后工作的目标与方针;(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4)党与群众的关系;(5)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6)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7)争取与组织工人阶级的大多数;(8)关于农村工作;(9)关于青年运动;(10)争取一切武装部队坚决抗日;(11)党的转变。[此报告已全文收入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下)107页-125页]

5月20日、21日、22日、23日、24日和26日,大会对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即:关于对过去白区工作的估计问题,白

区工作转变的两重性质问题和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针问题。会上先后有 24 人次发言。从发言的情况看,一个方面,是多数人的发言都对刘少奇的报告提出批评,而且有的批评十分尖锐,如有的说:少奇同志的报告“不象开白区会议的报告,而象是党校的讲义”,“少奇同志忽略了过去,刚好自己是犯了形式逻辑”的错误,“少奇是机械论的,死板的,不灵活的”,“少奇同志的报告,只念左派幼稚病,而在今天,应是两个策略问题”,“少奇同志的报告有点喧宾夺主”,“少奇的报告没有反映实际工作”;有的说:“关于清算过去的错误,不应抹煞一切,不应从现在看过去,不应把个别错误与总的路线混淆不清,少奇同志的报告就犯了这些毛病”,“他认为‘左’倾盲动是党的一贯的历史的传统,这种了解是不正确的”,“六次大会是正确的,少奇说种下了立三路线的根源,是不妥当的,立三路线是‘左’倾盲动,但他在实际工作中是遇到了布尔塞维克的反对的,不但在四中全会上作了决议,并且四中全会后,在实际工作中是有了彻底的转变的,在苏区有成绩,在白区也是有许多成绩的,所以少奇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概括来说,少奇报告有系统的观点,是只反‘左’倾,不看到右倾,这是非常不对的”;有的说:报告“对于过去的错误太强调了,对于一个路线的转变,是要有一个相当的时期,不要随便骂,空谈形式主义”;有的说:“我们不能否认过去的正确,对于过去好的十年经验,是不能抹煞的”;有的说:少奇的报告“好象否认了过去,说过去都错误,我觉得应该对于过去有正确的估计,不能站在现在看过去”。另一个方面,有些同志也不赞成对少奇的报告全盘否定,不同意某些过激的批评,说:“根本否认少奇的报告,及认为是右倾的,我不同意,同时,对他有些求全责备,也是不妥的”;有的说:“有同志发言,说少奇同志的是非辩证法,形式逻辑,把他的整个精神否认了,是不妥的”;有的说:“关于少奇同志的报告,有的同志不同意,甚至有的根本否定,这是不甚妥当的”。也有同志发言,对少奇的报告表示“完全同意”。从会议记录反映出的情况看,会议争论的焦点和实质问题,是党中央过去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存在“左”倾错误的传统?大多数的发言认为,中央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即使发生过某些错误,也不存在错误的传统;也有的同志发言,表示支持少奇同志的意见,认为过去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存在着“左”的错误传统。

5月27日至6月5日,白区党代表会议暂时休会。在此期间,6月1日至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了党对白区工作的方针路线问题,会议首先由洛甫提出准备提交白区党代表会的报告,以取代刘少奇5月17日向大会

所作的题为《党与群众工作》的那个报告。洛甫的报告共三个部分：(一)十年来党的方针政策路线问题；(二)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三)华北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报告的第一部分，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报告和刘少奇1937年3月4日(《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见《六大以来(上)》803-812页)而发的，批评少奇同志的报告和给中央的信都是错误的，认为过去中央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并取得很大成绩，他说：八七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其错误是在土地问题上，是右的错误，不是“左”的错误。盲动主义是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而产生的，不是八七会议的根源。六大大会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胜利，既反了右倾，也没有放弃反“左”倾，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立三路线是半托洛茨基主义，其错误不是六大大会的根源。四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立三路线，打坍了右派的反攻。四中全会后犯了一些错误，然而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不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且对于这些部分的错误，都经过自己的力量而克服与纠正了。四中全会的成绩，十年来的艰苦奋斗，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仅在苏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有资格成为全国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苏维埃红军的胜利，是在全中国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是全国革命开的花。他说：“少奇同志的信，其错误：(1)忽视党的历史的发展；(2)看不到党是从两条战线中发展的；(3)对党的错误缺点的批评缺乏具体性，是主观主义的错误；(4)夸大了部分的错误”。报告的第二部分，已全文收入《六大以来(下)》，题为《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会议围绕洛甫的报告展开讨论，多数同志发言都表示同意洛甫的报告，并对刘少奇提出许多批评，有的甚至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毛泽东的这个长篇讲话针对性是很强的，是在会议讨论的第三天，已有八位同志发言之后所做的长篇发言。从当时会议记录反映出的情况看，刘少奇有可能被彻底否定。但是毛泽东发表了这个长篇讲话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连带头批判刘少奇的会议主持人洛甫，在他的6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发言里，也不得不表示“泽东同志的意见，我是同意的”，并承认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少奇同志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绩的”，承认过去“对少奇斗争的方式、组织上的处分是不对的”，表示要对他的报告“准备加以修改”，并于6月6日在他向白区党代表会议报告里，加进了若干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说：刘少奇“是一个做实际工作多年的同志，他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他在实际工作中懂得辩证法。他过去与中央有过争论，很多地方是对的。中央解决他的问题，过去有些是不对的。他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样，虽然洛甫还是取代刘少奇向白区工作会议重新提

出报告,但刘少奇并没有被排除在中央领导之外,这次白区党代表会议最后还是由刘少奇作结论,并根据洛甫的提议,会议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全体一致通过洛甫的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从这次白区党代表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关于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还只能算是第一次在会上初步交锋,当然也是十分激烈的交锋,虽然与会者对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路线的错误性质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但毕竟开始提出了清算“左”倾路线错误的问题,为全党冲破“左”的思想禁锢,为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以后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左”倾路线,在组织上、思想上奠定了基础。正如刘少奇6月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所说“我们的讨论,开了四天会,这是我自入党以来第一次,这是党的进步,尤其是讨论‘左’的问题,我是很满意的。过去,我提过许多,没有详细讨论过。不过,这次讨论,还有些不够,然而这是开始的工作。”

三

毛泽东在这个长篇发言里还对刘少奇提出不少批评,在他所讲的七个问题里,就有一个问题是专门谈所谓“少奇的错误”,说:“他的错误主要是在于解决总的问题,即认为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总的错误,许多时候说得十分不妥当,把这个问题扩大化一般化了”;“就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问题)说,在他叙述这个问题的发生与发展时,也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他没有看见问题是两方面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在这方面是不能发气的,不能过分强调能动性”;“少奇还有一个错误,就是他有时忽视了‘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最后他还概括说:“我以为少奇错误,是在于以下几点:(一)扩大化;(二)非辩证法的发展观;(三)过于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四)社会根源问题”。与此相联系,毛泽东在谈到“党的路线是否正确”问题时,他说:“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但是党“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和立三时期),就是说我们把错误迅速地纠正了”,“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中‘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不能免”。这就是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还不是总的路线的错误,只是在若干个别问题

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我们理解毛泽东讲的这段话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当时全党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对于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危害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在五月初召开的苏区党代会上,王明还被推举为主席团名誉主席,在中央还占据着重要的领导地位。在当时的会议上,如果说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人是在若干问题上犯了原则性错误,他们还可以勉强接受,如果说他们是犯了总的路线错误,不用说这些人会起来坚决反对,即使在当时出席会议的其他绝大多数人当中也是通不过的。刘少奇虽然在会上尖锐大胆地提出这个问题,(如他说:“我觉得似乎我们的错误是有这么一套,我觉得是一贯的,好象是路线的样子,文件是有的,人也是有的,是有这样一条线,如果说没有,我是有点不了解”)但在遭到多数人的激烈批评之后,他也只好承认自己的认识有片面性,是把问题扩大化了,承认自己有错误,并表示对洛甫的报告“一般的是同意的”。林伯渠在他的发言里,一方面表示了对刘少奇的同情支持,说“少奇同志整个的报告,有些问题的提出,我非常同情他有这样的胆子”,但另一方面他也不能不表示同意洛甫对刘少奇的批评。可见当时要彻底清算王明路线错误的条件还不成熟。同时,也不合历史时宜。当时的历史情况是,日本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全国的抗日战争即将爆发,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即将达成协议,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团结党内外国内外可以团结的一切抗日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准备对日抗战,而要彻底清算党的王明“左”倾路线又决非轻而易举的事。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在他的这个长篇发言里,一方面对刘少奇的领导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在多方面给予有力支持,另方面对他提出一些批评,并在指出王明路线的一些重大原则性错误之后,又在总体上给予肯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与制约而很难完全避免的。

清算张国焘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张国焘错误问题的情况介绍

田仲群^①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旋于3月23-31日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共开了八天,其中25日休会一天。这次会议有两项议程:一、研究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党的任务;二、讨论张国焘的错误问题。这里只将会议讨论第二项议程的情况作些介绍:

293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3月26日完成第一项议程的任务后,从3月27日起到31日止,共用五天的时间研究了“国焘同志的错误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按会议记录的顺序是:毛泽东、洛甫、博古、张国焘、朱德、凯丰、林伯渠、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郭洪涛、高岗、吴亮平、董必武、肖劲光、罗荣桓、傅钟、冯文彬、刘长胜、杜理卿、廖承志、李见珍、刘亚楼、刘群仙、王林、周兴、徐特立、王观澜、朱光、毛齐华、胡耀邦、蔡树藩、阿金、周纯全、邵式平、何畏、戴季英、罗世文、乐华民、莫文华、郭潜、何长工、王维舟、陈赓、李井泉、仇志亮、曾希圣、谢富志、康克清、刘转连、张振坤、谭家述、谭玉林、杨秀山、余代生。此外,从会议记录中看,还有袁克福、周光坦、丁武新、段家石到会发言,揭发问题。这样,参加这次会议的共计六十人。

27日会议开始,首先由张国焘作报告,朱德作副报告,接着有周纯全、凯丰、傅钟发言;28日,傅钟继续发言,之后何畏、王维舟、谢富志、仇志亮、李井泉发言;29日,罗世文、彭德怀、廖承志(又名何礼华)、林彪、余代生、贺龙、袁克福发言;30日,康克清、毛泽东、周光坦、邵式平、何长工、丁武新、乐华民、陈赓、莫文华、戴季英、段家石、任弼时发言;31日,博古、洛甫发言,之后博古提

^① 田仲群,即田逢禄、耿仲琳、唐群。

出请有关同志表态,接着周纯全、何畏、张国焘相继表了态,最后博古又讲了话。许多同志的发言水平很高,内容极其丰富。原在四方面军中工作的傅钟、王维舟、仇志亮、李井泉、陈赓等同志,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发言中具体揭发了张国焘所犯的许多骇人听闻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比如:“肃反”杀人问题;军阀主义作风随便打骂士兵和群众的问题;进行小组织活动,分裂党,分裂中央的问题;造谣挑拨一、四方面军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干部政策上任人唯亲,重用提拔忠实于他的人,打击陷害对他有意见的人;随便处死白军派来的谈判代表和投诚红军的人,等等。对于这些情况和问题,这里不能一一进行介绍,下面仅将毛泽东及当时党中央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的讲话要点作一摘述:

张国焘在会上做了长达四千五百多字的报告,检查了他犯错误的经过和事实。他的报告的结尾(第五部分“总结”)中承认:“我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发生了很严重的错误。在鄂豫皖时,路线是正确的,错误是严重的,在川康错误更多而严重,但路线还正确。以后,便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的错误,军阀主义的错误。原因由于对政治形势估计不足,对党的领导的忽视。”

“这种错误不简单,过去犯了家长制度、不发展自我批评,对群众关系不好,采取行政自上而下的关系,没有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对苏维埃政策的错误;对落后现象没有克服;对政治工作、党的工作注意不够;对白区党了解不够,这些过去工作已有它错误的来源。”

“南下问题,不仅政治上是反党反中央,而且战略上是错误。”

“这种错误是农民意识流氓无产阶级的俘虏,是很严重的,如不纠正,要阻碍党的一致,阻碍革命的发展。这种痛苦的经验,是花了很大代价得来的。”

接着朱德作副报告,指出:今天国焘同志的报告,比以前的文章是进步多了,尤其是对南下问题上承认更诚恳,但对于错误的来源与实质,还没有说清楚。在鄂豫皖苏区,反立三路线,表现上是反对了,但没有用布尔什维克方法反对立三路线,而是站在右的立场反左。右的来源就是这时产生的。

肃反问题的确是很严重的。对群众关门,命令群众,强迫群众,对白区根本不要群众,养成最狭隘的农民观点。中央派去的人不相信,老的党员不敢用,因此形成了这一时期干部相当困难。在这时,国焘同志完全成为个人指挥党。国焘同志的错误是不相信党,不相信阶级。这是思想上如此,并不是因为

指定他做中央代表才这样。因为国焘同志需要这样个人的党,不需要布尔什维克的党。苏维埃,党,红军,都是有组织原则的,但国焘同志并没有要这些原则,所以他费了很大力气,并没有把工作做好。

国焘同志的错误,是从鄂豫皖时期起,一贯的形成了路线的错误,他并不是遇到了中央才突然发生错误,而是由于历来的错误。及与中央会合后,他因坚持自己的错误,才发生与中央对立的错误。有些人以为国焘同志是老同志,但是错误是一贯的。还有,国焘同志引证列宁的,如说:“三个人监视一个知识分子”。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所以他也可以反对中央。这种自命列宁,实是诬蔑列宁。不过他对国际还是尊重。他对于苏维埃政策没有很好应用,苏维埃的组织多是用强迫,很少开代表大会。对于肃反,错误很严重,四川同志说:红军不来,我们还发展了一些党员,红军来了把我们杀光了。同志们带武装来,不优待罢了,我们总不应该要他们的命。这种把革命同志当反革命是罪恶。有些地方,把整个地方肃光了。群众说:“白军杀,红军又杀”。这是多么严重啊!另外,坚壁清野,就是烧房子,的确烧了不少。盲动主义还是烧土豪的房子,也不烧农民的房子。

在会合时,他对中央极不尊重,自命为列宁,这也是他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来源之一。自宣布“中央逃跑”后,更是蔑视中央,根本不顾到中央的威信,只有到现在,才把中央威信提起来。后来,他召集会议,反对中央。我说:我是总司令,我不好参加。国焘同志骂中央,当然我也是在被骂之列。从阿坝会议到松江会议,反党反中央做了不少的罪恶。在松江会议上,我指出:“不要与中央对立。”在这个会议上,的确是有些改变,说一方面军还是有些好的,要学习。对十二月会议,相当的接受了些,但还是不敢放胆去做,对刘湘不敢派人去接洽。自西康直到这里,统一路线工作没有很多的成绩。

当二方面军会合时,他们讨论,要向二方面军去宣传中央的错误。我说:“不要宣传,无论如何弼时同志是宣传不到的。”他不相信,而且发火,说向我进攻。老实说,我是向他进攻了一下。以后在西北局讨论,很多人都主张三个方面军会合,下层干部都有这样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些转变。后因过不了黄河,才转而与我们会合。

国焘同志是个老党员,人很热心,但是他的思想是机械唯物论,只看形式不看内容,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只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地去做,做出结果,对群众对革命没有利益。放弃党的领导,想自己另造一个党。这是宝贵的教训。我希望国焘同志承认错误不仅从事实上承认,而且要从哲学辩

证法去了解。

这一经验是很宝贵的,应以列宁主义为中心,把党放在前面,不要忘记了党。只有相信党才能领导革命,脱离了党的立场是没有出路的。

这次会议,用不着攻击与扩大,而是他的错误事实俱在,要自觉的彻底的了解。

希望这次会有很大的成绩。

彭德怀在发言中说到:国焘同志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经过同志们的发言,说明鄂豫皖、通南巴以及南下时的错误,都是一贯的。国焘同志以为机械唯物论比唯心论好些,这就是他错误发生的重要根源。

他在大革命时,不赞成与资产阶级联合。就现在看,他是要和半封建联合的。他对南昌暴动不赞成。他在六次大会,是以小组织反对国际路线的。他在反对对立三路线时有些转变。他在汕头杀过两个同志,认为不要紧。他这些错误,在苏联学习时并未克服。

国焘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确实是胜利冲昏了头脑,犯了左倾机会主义。以后便转入右倾,遇事都争后梯队。在鄂豫皖,因为在左的掩盖下而转到通南巴,当时是后梯队好位置。后因中央红军突围而来,就妨碍了他的后梯队,所以又要向西移而争取后梯队。放弃通南巴是不对的。为什么打胜仗而又放弃通南巴?机会主义的路线在通南巴是形成了的。在鄂豫皖是萌芽,因为当时有沈泽民同志的反对。到以后发展到反中央。他只认识只反中央,没有反国际。他以为事实只成立第二中央,没有成立第五国际。他不知道,反党反中央,同时也就是反国际。

一、四方面军会合,在两河口以前,不知有多么亲爱,而我们也热烈欢迎国焘同志,但是以后关系就弄坏了。当时一、四方面军的一部,如不是苏维埃主席去调停,便要发生火并。这完全是自两河口后,国焘同志用尽一切政客手腕来破坏团结。在两河口后,国焘与中就开始了对立,并非下面的不好,而是国焘的阴谋。这种阴谋只能对付敌人,不能对付自己人。俗话说:害人终害己。请国焘同志想一想。

两河口后,机会主义企图夺取中央。当时给他做总政委,他就统而管之。有一次,一方面要我改编队伍,但又在底下玩把戏;这种手段是最卑鄙的,企图把军事权柄拿到他荷包里去。他的反党反中央,不是简单的突变了,而是蓄谋很久的。

南征与北进问题,我们应该肯定说:北进是对的,南征是不对的。胜利了,是同志们英勇坚决取得的,但不能因此而说是路线的正确。

张国焘为什么想南进?仍然是争后梯队的的作用。争为战略的后梯队,是他一贯的计划。他对胡宗南确实是怕,但四方面军是不怕的。他这样做,就是以为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

他把苏维埃旗帜卷起来,有人说是“先见之明”。但事实上,他把苏维埃旗帜卷起来,是不相信统一战线会成功的,而认为是幻想的。所以,他是无前途的,是机会主义。国焘同志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的第二中央的成立,是因当时打了一个胜仗:他这时是机会主义的最高峰,以后就呜呼哀哉。他用几根枪杆子来产生中央,这是糊涂。如果不是糊涂,便是有意破坏革命。我们应该估计到:第二中央的成立,就是国焘路线破产的一天。

一方面军为什么分开?中央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应该反对不正确的南下的意见。中央很耐心的给以说服,他总是赖皮的不执行。因为说不上,所以不能不坚决行动。因为如果这时还不坚决行动,那就要跟着机会主义跑,那还成话吗?国焘身为总政委,竟做出叛党叛中央的行为,真正该当何罪?!

最后,说到机会主义的碰壁,他在二方面军,开始就遇到王震同志的抵抗。昨天在报告中,他也不能不这样承认。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阴谋,他象帝国主义一样,还要企图最后的挣扎。他在哈达铺时已遭受到四方面军中干部的反抗,但他还要西进,以至付了一些代价,甚至有人整连的跑走,留下信说,等到你们真正革命时再见面。这说明一、四方面军中间没有什么界限,只有机会主义与国际路线的分别,这是机会主义的最后破产。

军阀主义与土匪主义的问题,这不是四方面军的问题,而是国焘的问题,他的军阀主义简直比蒋介石更厉害,卅三军和十五军,许多干部都被他以改组派杀了。不但如此,他对五军的办法也是不对的。他改编队伍,到底是什么意思?完全是军阀手段,他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这是非常痛心的。这是机会主义糊涂的恶果。至于打人,一个总政委随便打人,这是原则问题。在红军建设上,他以为纪律是绝对的。我们说是铁的纪律。这不是字眼的不同,而是原则问题。绝对纪律是军阀主义。他认为党的纪律是自由的:这是没有半点列宁主义的气味。如果说是列宁说的,那完全是诬蔑。土匪主义,中央在沙窝会议反对土匪主义倾向。现在根据同志们的发言,岂但是倾向,简直是不知发展到怎样的地步?何畏等人惨绝人寰地残害妇女,强奸妇女,这种土匪主义是发展到什么地位啊!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由于国焘路线的机会主义非阶

级路线的结果。在国焘机会主义路线下的坚壁清野，完全是放火烧房子，是非阶级路线。在第二中央成立后，更乱抢群众东西，杀革命同志等，这都是罪恶。红军建设，没有纪律，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没有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在四方面军的政治委员只有一人，首先总政委就不知道总政委的任务。在红军中没有开展自我批评。今天同志们发言，如果是以前就不得了，就要进保卫局。干部政策，他是一塌糟糕，没有耐烦的艰苦的教育干部。不但没有培养，而且杀了一些进步的干部，干部遭到了不必要的牺牲。西路军问题就告诉机会主义者，四方面军不是没有干部，由于路线的错误，葬送了很多干部。

最后，关于四军与卅一军，现在与群众关系跟以前是完全不同。卅一军自纯全同志离开后进步更大，他们的学习情绪更提高，组织马列主义小组会，他们发言，现在讲得很多道理。他们打电报，反对国焘路线！他们现在是进步了。这就答复了纯全的话，他说：上面路线没有错误，而是下层不好。这是狗屁。打骂人的现象，现在一般的纠正了。

国焘同志经过这次会议，一定会很好的了解错误。我们很欢迎这样做，不机会议的害怕承认错误。

贺龙发言说：立三路线，上山路线，取消路线下，我干了好几年，我在军阀底下搞了几十年，也没有这么搞过。何畏是乱弹琴的工人，你老实要承认错误。

我在武汉时候要求加入 CP，国焘就不准我入党。后来我官司还是打胜，我加入了。

南昌暴动八月一日开始，国焘三十一日就打电报来停止我，我就老不高兴。要三百亩以上土地才没收，就是他搞的。他在莫斯科写个假声明书，就回来。后来中国革命就吃了他的亏了。

我在湘鄂西的时候便写了一个信给他，要求他援助。洪湖苏区天天打仗，他却什么也不管。洪湖失败了，他就有计划的向西逃跑了。他在鄂豫皖的时候，就准备了石印的布告，向川鄂几省的布告，他不是向西逃跑是有鬼？

看见了国焘的向西逃跑，才使得我们也跑。那时有现成成的苏区他不要，有什么办法？！

究竟国焘怎样搞个第二个党？这其中究竟有个什么鬼？那时候你究竟在毛儿盖有什么心肠？你是要逮捕中央？我是一个军阀，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由军阀进向共产党，你由共产党退向军阀，我老实比你进步！（大鼓掌）你的

把戏只有四川最落后的军阀才干得出来。

你那时候对二方面军的态度究竟如何,你老老实实说出来吧?!我那时候老老实实对你放了警戒。这对别人是混蛋,但对国焘是对的。我对你的印象确实不好。

最后,我说,国焘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根源及实质,要说出来。你成立第二中央的实际企图怎样?你对朱总司令的企图究竟怎样?你对二方面军的企图究竟怎样?如果你再不承认错误,倘若还要做投机的声明,你再不够做共产党员。

毛泽东发言说:国焘一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没有完全彻底的深刻的承认自己的错误。纯全和何畏也相同。

关于一般承认机会主义、军阀土匪主义、退却路线等方面,我也同意。这一方面的批评是值得欢迎的。少数拥护国焘同志的带有罪恶性质的错误,在长期间内不曾觉悟,即到会合中央以后半年也曾经过艰苦的教育,但在今天还只是一般的承认错误。一年半期间获得如此代价,才达到今天的水平。今天的进步,国焘、何畏、纯全的进步,是值得欢迎的。这以后,可以转变到完全彻底深刻地承认错误的道路上去。也可以深刻地影响到国焘及其他人。这利益不仅在国焘一人,而且在其错误路线下不了解的同志们也可以得到帮助。自然,西路军的失败是极不幸的事,但是四方面军还留有二个军在这里,还有大批干部在这里,进步的力量在这里,那在将来中国革命是很大的基础。

对国焘和其他同志虽然一般承认错误,但尚未达到深刻水平的现在,各同志们的无情的揭发,可以帮助他们更往前进步。这是党、红军和革命的利益。

国焘路线毫无疑问是全部错误的。倘若这些同志不能完全转到更深刻的水平上,那还是我们的损失。我们欢迎他们的转变,即使是滔天大罪,我们欢迎这些同志们完全转变过来。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正确路线也正是如此的。

国焘同志错误的本质,因为大家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很引起我的兴趣。国焘主义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经验论只相信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国焘同志也只承认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革命运动中的原则概念在他脑中实在不看见的,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脑中并没有贯串一切的观念。他老是将自己描写成实际家,恰恰证实自己是真正的经验论。北上没有去过,所以他反对。我说阿坝去不得,他却死也愿意到黄河边。后来南进的时候,他由经验中相信走不通了。他要到西去,走不通主

要也不是中央的问题。一定等到眼睛看见的东西,老实下雪了,他才相信。我们那次接到捉了蒋介石的事实以后,他就老实举出几十点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后来眼睛看见日本人要来挑拨内战了,那他才来承认了。

反党的问题也同样。许多人知道党是反不得的。国焘一定要自己来反一下,才知道反党之要不得。

最后他的认错观念。他的认错是看一步做一步的,只要有一步掩护的可能,他就掩护一下。根据今天开会的经验,我知道他必定会进定步的。(大笑)

我们后来开一个决议给他,他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了。

因此我主张国焘同志要改正自己的错误时,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否则以后的错误会否重复,还是不会有保障的。他只看到局部,不看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所以中国的老生常谈就说:“老子连一条牛吃得,微生物吃不得?”国焘不仅需要眼镜,而且还要带上望远镜和显微镜,即是说要带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望远镜。这对各个干部都一样,否则如国焘一样,无名肿毒层出不穷,那就糟了。(大笑)

如对蒋介石的问题一样:因为我们预见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估计到民族阶级的变动,所以才安心来估计蒋介石,这是由科学的分析来的,可以预见运动的法则。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才正是国焘同志所缺乏的。因此事务主义便正是国焘的特点,因此他除了十个钟头的电话之外便感觉余无别法了。因此我们要准备大事情,就必须首先放弃经验论。

关于他的机械论的问题,这特点不论中外都是一样的。这机械论只看形式,不看内容。共产党内也有斗争,这斗争就是自我批评和党内教育。机械论永远不承认这些,只看见外在的矛盾,不看见本质的变化。国焘主义是变了几变的,但是机械论不承认这些。即对于内在矛盾和本质的变化老不了解。他的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其基础是把敌人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黑暗的魔鬼,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是这样的魔鬼。过去国焘同志只看见两个高潮之间,于是只争取后梯队的的作用。这是为何只看见日本和蒋介石的力大无穷,而不看见这其中的种种复杂矛盾。为什么中央的估计能够是另外一样?为什么我们能有胆子敢到陕西和山西?这对国焘是永远不能设想的。所以他以为十倍于现在的力量都不能战胜日本的力量。他的烧杀主义就是望风而逃,断绝来路,对中国革命完全绝望。唐三藏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究竟还是沿着原路回来的。望风而逃,结果就必须面靠高山,身居草地才算安稳。西康和弄堂根据地

理论,也是同样。因此中央苏区之失败使他大吃一惊。中央还可以挡挡魔鬼,中央也出来了,于是乎他就唯有席卷通南巴,而死都在黄河边的口号也提出来了。这样他只有杀蒋介石,让杨虎城和蒋介石玩外交,而要“集中主力去打胡宗南”。凡是右倾机会主义,都会把敌人的力量看作是魔鬼,把其中的矛盾看不出来。历史上常例也正是如此的。其实敌人的内部充满着矛盾,这是我们看到的。

蒋介石害过恐日病,现在好些了。国焘害的还有恐蒋病和恐日病(十倍于现在力量也不能打胜日本等等)这是证明他脑中以为日本是不可抗的恶魔。这样才产生他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

关于内部的问题。他也不承认内部的矛盾和本质的变化。他不知道在红军中、共产党中、农民中、阶级中都有矛盾。各种落后意识反映到党内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东西造成落后意识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国焘如何看?以为没有矛盾。我们正因为看到这种矛盾,这才来加紧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党内民主来消灭这些矛盾。阶级存在一天,这样的斗争还是继续的。即使斯大林同志也天天在学习,否则自高自满,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那便完了。国焘也正是如此。他否认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必要,否认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农民的作用。他在高级干部之中完全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他想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消灭。他想把进步的思想降低到落后的思想的水平上去。我们只想将落后的水平提高到进步的水平,而他正与此相反,把无产阶级的积极性降低到流氓的无产阶级方面,把农民的积极性转到另一方面的坏的黑暗方面去,发扬这些黑暗的东西,而实际上把农民的思想降低到黑暗中去了。

国焘思想和工作中没有建设性,唯有破坏性。只看见他的杀人放火,恐怖阴谋,不看见别的。他把党降低到非党的方面,土匪、梁山泊都不愿做的水平去。国焘究竟是晁盖还是王伦?

红军建设代表白军中最坏的制度,甚至把国民党的反革命手段也用来了。“毛、周、张、博”不特笔之于书,而且用在标语、歌谣、游戏、戏剧中去。这些实际上连国民党的界限也消灭了。

在一切服从战争的口号下,把民众的利益和红军利益对立起来,用抢、烧、杀的政策混合起来,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自己的。

苏维埃政治制度和土地革命都完了,红军也几乎完了,因为一切都统一起来了。最后党和中央也完了。卓木碉以后不也就是这样么?因此在他脑中纪

律也完了,什么也完了。他要全国统一到大黑暗中去,想将全中国沉沦到海底里去,连孔子说的仁义、公正,把民族的进步趋向,都想开倒车到经书上也都不屑道的黑暗中去。照他的制度,唯有是黑暗世界,最后至于消灭。他把一切的界限都消灭,而统一于黑暗。这是第一部分。

这里,我们得出教训,黑暗与光明有分别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间有区别的。界限是森严的,这是绝不能混合的。不管在那里,我们要把这些界限森严起来。如果把这些界限混合起来,那是有危险的。

不过有几点他想区别:

他想把中央路线和国焘路线区别起来。因为他想降低中央正确性、而提高他的机会主义的“威信”。开始时是如此。后来他又混合起来了。他在文章中说“他和十二月决议很自然归于一致”,这混合是需要的。他说“我与中共中央原则上完全一致,没有丝毫原则上分歧”。今天在他的结论未做以前,我不能承认这一点。中央要放蒋,他要杀蒋,这自然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他接到告国民党书时,认为是韩退之祭鳄鱼文,这不是原则上分歧是什么?他说是“执行着党的路线”,你执行的是什么“路线”?根据通南巴后一段材料,最少是反中央路线的。

他又说“我不是反对派,特殊见解和苏维埃运动中的特殊形式”。他不只“派”,而是组织第二党。他将中央骂做是反革命了。这是造一个党来消灭党的问题。他的土匪主义,军阀主义,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这完全是特殊的政治见解,这完全是苏维埃运动中的特殊形式。他恰恰是代表红军某一系统和实力派。这些事情要说清楚。要区别的地方,他就极力区别起来,后来他又混合来了。并且推卸责任,说“下级做的,我不负责”。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他的机会主义史。

开始时候,我颇晓得一二。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正在“五四”左右。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代表还有三个在这里,董必武、我、国焘。那时候全国只有小的左的团体。并且在会议以前他还做过职工运动,这些光荣的功绩,当然要希望他恢复的。

可是他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就闹小组织。闹得天翻地覆。

其次他反对党加入国民党,他不懂得中国的形势的不同,他只拿出西欧的例子机械搬到中国来。

第三次大会上,他整个反对党的决定,因此他的中央委员弄掉了,他老不高兴。后来派他到唐山,他就说“充军到唐山”去。

他反对加入国民党以为“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可是后来他变了。他以为工人不要加入，只要小资产阶级加入。后来就全部执行陈独秀主义，完全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

四次“围剿”时是“左”倾机会主义，他那时候认为国民党只是帝国主义的“偏师”，他这完全是“左”倾空谈。后来敌人来了，他就“你这样厉害，老子怕了你呀”，就一溜烟跑了。

因此过去对国民党的问题上，他由“左”倾机会主义转到一塌糊涂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四次“围剿”中，他也由“左”倾机会主义一转而为一溜烟的右倾机会主义。

必须说，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

在通南巴时代，你脱离了群众，还有什么路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在阶级上群众上，基本点正在于此。后来的向西退却，整个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只借口秘密为词，而不做报告，但是同一个密码，还用到保安。

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并要造出一个政治局。联邦政府上，我问他：“我归你吧？”他说：“你归我呀！”民族政策是炸弹案，先文后武喽等。后来给他一个副主席，他非常不满意了。所以后来他就公开要主席做了。我们以后就要迅速北上，他却按兵不动。后来中央尽力迁就他，他好像老实起来。后来安他一个总政委，似乎好一些，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来审查中央的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他要来干涉中央的成份和路线，根本失却了组织原则的常识。红军中也有界限的，红军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因红军是军队，是以军委的命令为绝对的。国焘在红军分裂的问题上是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

所以，我们对中央的路线的问题，我们却硬得很。可是除了这界限以外，我们都让步。可是他却拼命用枪杆来压迫。

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的时候，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为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没有丝毫责备的态度。因为“中央”也成立了，只有用软的办法。那时候他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公开的文件一点也没有。是的，当时通过了中央的反对国焘错误的决议，但是这只发给中央委员

的,所以谁都不知道。

他对二方面军是完全想包办二方面军的办法。他用阴谋来想操纵二方面军。渡河的时候,他要全部过去,过了三军我们才知道,于是只好顺水推舟,“批准”了。后来我们打电问西路军的情况,他只回答“与回民很好”,实际上是假报告。

总结起来,国焘的机会主义史还曾有过一些正确的时候,自他加入党以来,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路线下的。他发起了中国共产党。但另一方面,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他的石头今天应落地了,从今后,他应该从头干起。今后的开会,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国焘的转变,其次应该要求他特别是放弃他的错误。

至于韩退之祭鳄鱼文的事,现在今天的会议,你一般的承认了错误,已经提高了一些了,现在再要求他们转变,并且欢迎他们的转变。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欢迎的精神,那就不好了,因为否则不能使这些同党了解自己的错误。今天我们为的是团结党,我们不想干部继续错误。我以为只要努力,大家一定能够达到这一任务的。

任弼时发言说:我只讲及两部分的问题。

第一、关于二、四方面军的会合。

二、六军在湘鄂边的时候,是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后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发生党内争端的问题,直到甘孜才知道,以前是完全不知道的。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材料,可是不清楚的。

一方面军北上以后,才建立起了和国焘电报上来往的关系。因为敌人新的“围剿”,我们突围了。我们向朱、张提出突围的需要。现在我们看,我们在那里尽了前梯队的的作用,牵制了许多的敌人。敌人首先想给予我们以相当的打击。后来国焘还给我们指示,叫我们不要走,还在那里,实际上是想要我们在那里尽前梯队的的作用。后来我们突围了,比较在长征中条件最好的时候,有过一个月的停止,并且增加了二三千人。我们虽然有相当疲劳,但是敌人比我们还要疲劳。那时,我们知道还有可能在长江南岸保存有生力量,这对于长江南岸的苏维埃运动有推动的作用。

今天可以看见,国焘想将这一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来,又要我们渡河。我们告诉他,说当时还有可能在那里创造根据地,渡河与否由他决定。他的回答就是估计苏维埃运动已有低落,最好渡河。后来我们渡河了。分析起来他有三

个企图：1. 想二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以后，能达到二、四方面军来一致反对中央；2. 在二方面军到四方面军以后，逐渐的来采取过去老办法，所谓“吞并”问题；3. 在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在甘孜不好立足，便想换一个地方。要二、四方面军一块儿向西退却。今天检查起来，确实有如此的布置：

1. 二方面军未来之前，首先西北局召集会议，只准说一方面军坏，不准说四方面军的缺点。并且在四方面军干部队中加紧学习，以便将来到二方面军中做工作。

2. 二方面军向甘孜前进时分为两个纵队。首先向六军工作，因此他下令要六军交给他指挥。那时他便派了一个委员会来，其主要目的是到二、六军中做反中央的宣传。

3. 准备调换二、六军首长。到甘孜第一天晚上，要我离开二方面军，另派政委，国焘还准备与我谈话，这是非常明显的。

六军到甘孜的时候，是给了他们的宣传一些抵抗。我们到了甘孜以后，我便到总司令。在会合以后，向北前进行过程当中，在其中首先在会合的时候，在离甘孜八十里地遇到了八十八师，听见了他们谈到了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情形。我以前还以为中央确实在那里的。但是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并且讲得很坏，并且这种教育是相当深入的，因此我停止将这些文件（国焘发来的反中央的文件）发下去，并把文件烧了。我便向他表明态度，说明唯有在十二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的。这样停止了一些反党的活动。我当时也找了一些同志谈话，中间慢慢感觉到党内的统一的必要，便尽力求达到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来促进会合。在谈话当中都感觉到很好。在同昌浩同志的谈话中，都得到他们的同情。直到岷州的时候，感到党内统一的推进是有办法的，我并且提出召集六中全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国焘那时也没有不同意。这其中慢慢进行了解释的工作。西北局会议中，我就提出，说是“中央是路线上错误”，我不承认中央的领导是路线的错误，政治上有些关门主义的错误，但这并不是路线的错误。我利用了好几次西北局的会议来进行这一解释工作。我提出六中全会的中心应当是当前工作。当然那时会议是得不到结论，但我以为党的团结已颇顺利了。国焘对我说陕北是北方局，这方是西北局，我还不清楚，但是由机要科的翻译的文电中，我就知道了。

在岷州的时候，他虽然知道二方面军来的时候，企图是受了障碍，但并未放弃这个企图，要我当副书记，我利用了这位置做了相当的工作。

于是国焘就尽其最后的尝试，经纯全来对我说两方面军首先要一致。纯

全要我首先召集二方面军的干部会,来求取“一致”。他的企图,是想利用这样的会议来找出的一部分同情。我敢说,那时候如果召集那样的会,那么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反对这会议的召集,因为造成上层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但国焘就非开这会议不可,我就说:“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国焘才吓倒,再不召集这会议了。

到了哈达铺以后,我看到很难继续这种情形,于是二方面军便单独出去了。

北上的过程中,国焘的意图是明显的,不是和一方面军会合的。我便问国焘,出了草地之后怎么办呢?在那里创造根据地?国焘始终始终没有答复我。他口头上只说岷洮西,可是并无这样的实际布置。他是准备由齐哈玛过河的,我对这点提出三点理由:1. 两广事件起来了;2. 应配合一方面军突破张学良的“围剿”;3. 配合全国作用放在黄河河西不行。因此国焘放弃了这企图。

但是后来国焘的布置,还是用主力去夏洮,次要在西固方面的部署。那时我觉得这部署是不对的,我主张主力出岷州配合一方面军。这也顺利了,主力全部后来出岷州。后来二方面军便出于左侧翼了。这看出,国焘的北上,目的基本意图是过黄河以西,并拒绝与一方面军的会合。在这过程中争论的问题,不详说了。

这当中要说明的,当着二方面军会合再不起前梯队作用的时候,就想拉二方面军一路向西去。国焘这意图是失败了的。

我这里要指出,这会合提高了二、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士气,四方面军的动员也很大。双方战士是很亲热的。国焘意图的失败,我们还争取了三十二军。

这简单说明二、四方面军的会合,国焘确是实行了一些军阀的办法,可是没有结果。

第二、国焘路线的实质和恶果。

同志们指出,这机会主义的错误确是有其根源的。在八七会议前后,他表示出:关于农民土地斗争问题,党提出(武汉中央会议)要发动农民土地革命,他对土地革命的了解是不能领导这斗争的,以为土地革命的发动会引起党内的分化,许多学生党员会反对土地革命。

南昌暴动中,国焘主张三百亩以上土地才没收,并且还想停止这暴动。六次大会中,发生“左”右两种倾向。左的代表是秋白,比较接近国际的。右的领导者是国焘,罗章笼等。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大体上,是:决议案中提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国焘派就反对了这意见,以为广暴以后革命浪潮会继续低落

下去的。而国焘的提议,便是停止国内农民的暴动。在会上几乎通过了,只差一票了,后来国际代表说话了,才把这提议打下去。

这说明国焘在八七会议到六大会议当中是代表极右的思想的,他到国际后才发表了声明书,承认自己的错误。

国焘对中国革命从右的方面估计,在方法上,机械的分析问题上是他自己承认。后来我们关于统一战线的争论,他以为这是幻想。我们当时争论的最好目标便是东北军。后来关于蒋介石问题,他更发展了幻想的骂法。争论便更加扩大了。他只是说一点可能也没有。我们便说他根本不相信统一战线。于是乎他便发挥一种理论,以为机械唯物论总会比唯心论好一些。因此他估计形势总是由机械论出发,他总不晓得如何估计阶级力量的变动。他做了许多工人运动,便从此来反对初期的国共合作;后来国民党叛变,便由反对土地革命至反对革命高潮很快到来的估计;他看不到阶级力量的变动,于是乎他对统一战线始终是怀着不相信的态度。他看到红军数量少了,便唯有向西退却。他主张退到西康西宁,再有机会才出来。

这是看不到革命的形势,看不到阶级力量的变动,于是乎看不到革命的力量,因此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战略上不能不向西跑。

在西欧是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中国,国民党和军阀的传统在党内也可能产生。国共合作中,CP许多加入过国民党,这种传统可以传染到党内来。只有在马列主义强烈地方才可以避免这些传染,否则这一传染很可以发展起来。他是我们党中标本的东西。他是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中党内反映最明显的表示:如家长主义,干部政策,独裁,否认党的领导,等等,确实是如此的。国民党的政客式的办法,在国焘同志身上反映出来许多。他是代表,并且发扬了许多。实际上这正是反映许多封建的办法。他把这一传统拿到党内发挥了,并且土匪主义的发挥比国民党的军队还坏。烧杀政策比任何国民党的军队还坏得多。这是降低党的作用,并且他的恶果还无限制的发展。这是他在四方面军中军阀主义充分的发展。

国焘在党内的很深的派别成见是不可分离的。六次大会当中,他的右的倾向是受了严厉打击的。于是他就大不满意。他在莫斯科时,充分表现了他的派别活动,反对了支部局,反对了东方部。他的派别成见在向国际承认了错误之后,依然没有消灭。

及至四中全会后他回国,他根本看不起那时的中央,以为绍禹、洛甫同志他们都是书生。到了鄂豫皖以后,他根本不愿意传达中央的指示,及至到通南

巴接到中央的指示,便更不高兴了。及至看到中央红军到时,看到部队的疲劳,便借此机会充分发挥其国民党的办法,想争取党内的领导,于是用了一切政客式的手段和阴谋。

国焘路线是由于这些东西产生出来的。他的机械的认识,加上国民党的意识,再加上军阀土匪主义,便形成了路线。在鄂豫皖时还不能说已形成一个路线,因为那地方已有党的基础。肃反路线是形成了。三次“围剿”后,开始了退却路线的萌芽。我承认当时中央的估计,退出鄂豫皖为过早是正确的。今天根据材料可以下这个结论。当时他应当可以配合各苏区,巩固根据地。

及至到通南巴时期,在占领巴州的期间以前,这中间还不是路线的错误。开始进入通南巴时还未形成路线。当收紧阵地以后,刘湘的进攻又来了,经济困难了,地方又小了,于是路线便形成起来了。和群众脱离起来了,群众的关系很坏,杀人又多,于是路线上的错误便开始。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发展到最高峰。

到十二月决议传达后,他表面上承认了这东西。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转变。由向西受打击以后,他开始放下这东西,但并未了解自己的错误。他并没有认真了解自己的错误。

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是很大的。若不是这样恶果,中国苏维埃运动可以不致仅仅是如此的局面。鄂豫皖不退出,可以保持湘鄂西,或者在那种情势下,不必招致中央苏区的军事错误,洪湖也不必退出。这是受了很大的损失的。

如果一、四方面军会合时,那时正是我们(二、六军)打破了敌人“围剿”的时候,我们估计那时一、四方面军会合一定打川陕甘以及鄂豫的地区,则蒋介石必定用很大力量来对付我们,我们在长江南岸可以保持很大的影响。但是并没有能够如此,这是很大的损失。使得我们也不能立足。

会合以后,张国焘不能依照川陕甘地区的创立,是第二个大的损失。如果那时候能够如此做,则力量可以增大两倍以上,二、六军在长江南岸也可以有很大的发展。那么统一战线的影响可以更大。这对苏维埃运动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的南下实际上是极大的错误,南下使四方面军的力量消耗了很大。

国焘路线使党的影响也受了削弱了。这对苏维埃的威信降低了。四方面军的损失——西路军——一是国焘路线造成的严重的恶果。

由国焘的错误估计其前途。他的估计和罗章龙右派有其共同点。六次大会上他的同盟者正是罗章龙,还提议陈独有仍然当中央书记。他们和取消派

也是共通的。六次大会不久,独秀不久就退出去了,罗章龙后来也同样出了党,及至南京一路去了。国焘在莫斯科的小组织中,和托派是接近的,这接近并不是偶然的。国焘的估计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六次大会的否认高潮到来的理,这和托派的估计是共通的。陈独秀的理论还不至于如他一样的封建影响有所带上。国焘是不同意统一战线的。他如果在这时候不受到党大力的洗礼,将来继续发展可以完全反对党的策略,和陈独秀、罗章龙、派托同流合污,而受日寇利用,反对中国革命。

今日当然不是说已到如此地步了,今日还是党内的斗争。

国焘有许多错误,但也有许多成绩(党的创造者),我们希望他深刻的揭露自己的错误,回到列宁主义的路上来。他过去思想上是反列宁主义的发展,现在应该放弃派别的观念、反列宁主义的思想,而恢复列宁主义的观念,否则会抹煞自己的光荣的。他应该放弃自己的错误。

博古的发言:同志们,几天会议已经把国焘路线的实质经过与恶果,都揭破了,这证明党的进步,首先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很热烈的发言,剩下来的话已经不多。

国焘路线形成的出发点:首先是对整个形势的估计:他在道孚报告中说目前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所谓两个高潮之间,就是处在反动时期。他认为五次“围剿”中央红军退出苏区,他便以为是反动时期,所以他整个策略便在这一基础上,所以他拼命的反对“吹牛皮”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作这样估计。国焘同志所谓冷静的估计,是冷静到没有血的估计,他所谓“堪察加”。丁文江曾申明这一计划,主张中国要退到四川,以为四川边境为堪察加。在他的“告同志书”内说得很明白。正在中央苏区红军粉碎四次“围剿”时,他要鄂豫皖游击队为前线,他自己带四方面军为后方。在通南巴时,他自己对于革命很“谦虚”的,他对担当革命任务上只是组织后方。谦虚是要的,应该对于党内领导上,占领地位上谦虚些!而于革命任务应该勇敢些,不然,便是革命斗争中开小差。关于建立根据地问题,我说:建立根据地应在领导全国革命意义上。他对革命根据地便根本没有决心,发明一种建立根据地要在最落后地区。我说:你错了,不是最落后,而是比较落后。并且争论是一事,而他的行动又是一回事,他是要离开中国本部而到牧游地区。他说中央要到苏联去,其实是他自己要到苏联去,他要离开中国,离开苏维埃运动。他第一步改为联邦政府,以后就卷起来。王稼祥说,你的路线发展下去一定要苏维埃旗帜变色。事实

完全证明了。

国焘同志悲观消极到什么程度？他对一、三军团的估计，是认为一定要被消灭的，中央被消灭，他便以伪中央来代替。总算马克思在天之灵，我们都胜利的到达了陕北。可是不幸得很，没有满足国焘同志的愿望。如果国焘同志那时把四方面军也带来了，中国的统一战线形势更好。无论怎样看，国焘路线完全是退却的。

十二月决议，是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国焘认为是反对一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他同我们新的路线的分歧：①我们主要的敌人是日本，而他认为是“一切帝国主义”。②我们是民族统一战线，而他认为是下层统一战线，而对于上层统一战线一口拒绝。并说那个要建立上层统一战线是幻想，一指陕北同志，就是说中央。③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到底那个重要没有说，实际就是反对中央对于民族革命为主要的提纲，就是拒绝中央基本的提纲。

他这种“理论”，就发展至成为西安事变时候的主张杀蒋介石，而实际上是依然退却逃跑的路线。他在西安事变刚发生的时候，就提出“四十八个质问”，其中有“西安事变失败后必来一个大反动时期，那时怎办”？这种议会质问的方式中充分表现出他的退却逃跑观念。

因此不论那一时候，我们和国焘始终有路线上原则上的分歧，这两个是很基本的东西。国焘在由现在看过去中，始终表明“没有路线上的分歧”，但是实际上他承认为“分歧路线”期间只有两个半月。如果照他的话，鄂豫皖和通南巴时候是“一般正确”的，路线上错误实际才在“会合以后”。总而言之，他明白了在党的全体压力下，红大同志们明白了国焘路线的实质下，不得不承认是路线上错误了，但尽力缩小其错误，化小事为无事之类的观念到处表现出来。

关于军阀主义、肃反问题。国焘同志可以说，肃反错误决不只我这里。然则这肃反路线的实质是什么？其他苏区的肃反的目的，错误无非是在巩固苏维埃和党的目的下，而国焘的基本错误在于将肃反看作是反党反中央的斗争工具，只当作是巩固自己个人威信的工具。这是绝对非共产党的罪恶行为，绝对不能容许的。（鼓掌）

党的建设的理论，第一，他说党是自由的，因此纪律上不能如军队一样，要自由；第二，他说国内革命战争中党内民主要限制。这是自己打嘴巴。但是实际上，第一是对中央的，要他行动自由；第二是来反对下层干部的，好维持自己的地位。

党的领导威信问题。国焘路线下“反领导”可以成为到保卫局的罪名之一，但是他自己有完全的权力可以反中央。

关于工会政策。贫农团，苏维埃的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决议案和实际工作完全不相同。这些决议案许多写得不错，但实际上证明这些决议只是拿来骗党员的，骗中央的。这些决议那个写的？坐在保卫局的廖承志写的。决议案可以在保卫局中有“反革命嫌疑”的人来写，这证明机会主义的本领，实际上只是拿来骗人。因此问题的本质是实际工作的执行，不要看什么决议案。五天的会议中都是实际工作的检查，而动手放火的人也在这里，这怎么办呢？

干部政策，用拍马代替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影子都看不到。用个人独裁代替集体领导。

关于国焘路线的历史根源。这里讲的人许多了。首先必须说明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军阀的混战，封建的残余等。这种环境必定会反映到党内的。党内有许多进步的人，但开始时也参加了许多离开共产主义很远的人物，如戴季陶便是一例。

在全国斗争运动中间，新的力量团结起来了。有些老的份子给推出去了，有些吓倒了。首先戴季陶出来了，其次陈独秀出来了，这个苏维埃高潮中，又有新的人动摇了，可是一般的党内更加巩固了。

国焘是代表“五四”时代小资产阶级意愿，自称为共产主义的人物。因此在每次斗争中，他总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各种各式的形式。国焘是党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机会主义发起人之一。这话是有部分的真理。一九二四年以前，他反对加入国民党。大革命时代是一百八十度的机会主义。再过一个时期，在农民环境包围的时候，便表现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肃反中成为疯狂的屠杀。因此在中国革命的每一阶段的斗争中，都和反对国焘的机会主义不可分离。如果不反对土匪军阀的方法，那就使苏维埃运动不能得到胜利。

我希望中国革命今后的历史上，国焘也可以成为与以前不同的名字，再不是机会主义，而是拥护党的路线。我们愿意加强革命阵线的力量，但不愿意掺杂以捣乱的力量。因此我们不得不要求他们立即放弃他们的阴谋和手段，小组织，回到党的路线下面来。

洛甫的总结发言：这几天的讨论，已将国焘路线表现的罪恶行为充分的揭发出来了。这对全党及犯这错误的人都是教育的重要工作。

(一)什么叫国焘路线?

许多人已说及了。这是政治上的错误出发由对革命的机会主义的估计出发。否则不能解释这个问题,而这正是国焘所不愿说的。我们却非说不可,因为路线不是开玩笑的。

他这机会主义的估计,是由于估计革命的不足,以为反动时期的到来,夸大敌人的力量(如夸大日本的力量,红军即使有十倍也不能打日本等),把日本描写成为很大的力量,与五十年抗日论,堪察加理论差不多的,国民党还不曾这样做,国焘就老实执行起来。对于蒋介石也最怕的。他看见胡宗南就跑。在右倾的空谈中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国民党的统治中有许多矛盾,过份的夸大敌人的力量。可是对自己革命的力量却估计得少得很(如对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估计)。因多了几杆枪,革命形势高涨了;枪少了几根,革命形势低落了。看枪杆的多少来决定问题,对革命形势是悲观失望的。对全国革命形势的估计同是如此。西安事变的时候也预备了开小差的计划。表面上要打胡宗南,实际上要开小差到甘肃的弄堂。因此他自己感觉无限的孤立,躲到蒋介石部队不准来的地方便是最好。这是必然的,唯有是逃跑,开小差。

因此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

其次是军阀土匪主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两者差不多的。他在军队中只创造个人的系统,实行他个人的独裁的制度。四川是军阀制度,因此也来个粉红色的军阀制度。这样自然不能要求红军中绝对的党的领导。于是乎红军中传令兵制度建立起来了,为的要建立他的个人专制,他由这些传令兵中提拔自己的干部,当师长当军长当团长,为的对自己的忠实。对干部总用欺骗拢络的办法,由此出发而产生出他的肃反,反对他的,忠实于党的同志,就“肃”掉了。博古同志说得正确,他的肃反和一切别的苏区的肃反目的不同,而是保障张国焘的统治。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别人调动不了的军队的办法。张国焘建立的军队正是这样的。

他正是实力派,他是中国共产党中标本的实力派。

什么是实力派?枪杆子高于一切。我们会合了,他一看,这只有这么多枪?于是乎一切吞并的手段和阴谋都来了。后来公开展发展到要记书当,要当总政委等。枪枝的多少决定了他以后的一切,军权超过于一切。以后所有的这些都是这一套,完全与共产党相反的。

于是群众问题就完全可以不讲。如何压迫群众,剥削群众,就是他的想头。抢、烧、杀,这一切都是违反群众利益的。国焘路线下的东西就是派粮派

款派捐,这正是军阀的手段。他的这一路线只是军阀主义的新的发展和阶段。他不特是个军阀的残余,而且是标本式的军阀主义,还是满硬扎的东西。

这个军阀主义杀人厉害,也许说是张献忠主义还妥当。

其三他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

由上面看来,反党反中央——自然客观上就是反国际——的活动自然非常明显。他的反党反中央的活动从鄂豫皖时反中央分局便已开始,肃清中央派去的干部,反对泽民等。他加尾巴的那封信还是温和的,以前还有更厉害的一封信。所以中央派进去的干部,他总请进保卫局。他对中央只是发捷报。自然中央只知道他缴了好几十万枝枪,全四川俱是苏区了。

他到了通南巴以后,依然是反中央。他的反党反中央的根源老早开始了的,因此他成立第二中央是必然的结果,他的反党反中央是和国焘路线密切联系起来不可分离的。

总之国焘路线或主义就是:

1. 右倾机会主义,
2. 军阀土匪主义,
3. 反党反中央的主义。

(二)国焘路线的发生、发展以至破产。

第一,国焘在鄂豫皖时一般是正确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因为第一,那里有群众的基础,有党的气味,有党的老的基础;第二有中央分局的领导,并且后方苏维埃党的工作不归他管,他只是在前方,地方党的工作主要是由泽民同志主持的,前方的工作还有曾中生、倪志亮一下子未肃清的“残余”。自然,那时候他是在未经过步骤发展之前,他自然不能这么快来。他四中全会时说过很多漂亮话,所以他还是不能把这些话一时丢掉,何况那时鄂豫皖和中央还有密切的关系。

那时候国焘便已开始了他的错误。

首先,与泽民的争,破坏一切拥护党的干部的威信。

其次,他拼命搞红军以建立他个人的威信,以造成前方和后方的对立。他这些错误已经在开始,不过未敢明目张胆而已。

这时期,肃反的开始,虽然许继慎之肃反正确^①,可是及至最后已全部错误了,形成为他个人巩固地位的工具。

其三,他对许多政策已经不了解,以“打”打替一切。原则问题他弄不清楚,红军和地方的关系已经乌七八糟了。

其四,他轻易地脱离苏区,连贺龙同志追了四天也追不上。确实一溜烟地跑了。连泽民也不知道。

因此在鄂豫皖时已开始他的错误,许多问题已发展到严重的错误(肃反)。这时候一般还是正确的。西征中他的错误继续发展。

第二,通南巴便是他最后完全的形成路线上错误的时期。

这时候不论从那一方面的工作都是错了的。没有一个正确的路线去指导工作。同志们也如此说,事实上也如此。

为什么初到通南巴时红军能有发展?

一、四川军阀的压迫下群众的痛苦,群众要求革命,有如此的基础。

二、共产党红军的威望在群众中是很高的,红军在长期斗争中建立了威望。

三、四川有地方党的组织,等你来大家起来响应。如王维舟同志。

四、开始的时候,多多少少执行了代表红军的政策。开始打土豪,减低捐税等。

所以我们说,四方面军到四川后得到群众的拥护,是有原因的。但后来越来越坏了。收紧阵地的困难,使错误路线的实质完全暴露,以至被群众赶出来,许多地方起了暴动。结果最后的证明便是群众的反对,群众反对这样的军队。所以军队越驻越久,群众便越来越少。因此国焘到一个地方并没有创立根据地的企图,只是吃橘子一样,汁完了他就跑了。通南巴并不是苏区,是红军经过地区而已。

为什么会打胜仗? 国焘说打胜仗还是有正确的路线?

1. 有这样好的环境,这环境确实是最理想不过的了;

^① 许继慎:中央追认为三十个军事家之一,安徽六安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在国民革命军中历任排、连、营长、叶挺独立团参参谋长、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团长等职,北伐时有战功。后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3月任红军第一军军长。1931年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和中共皖西军委分会主兼第十二师师长。曾对张国焘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同年10月在河南光山白雀园被杀害。

2. 四方面军中有许多英勇的共产党员,他并不是来拥护个人的,是来革命的。所以才能要胜仗。

3. 大家以为国焘确实是代表党的,许多人都以为他就是党,于是大家连他的说话都学起来,他利用党的威信来进行私人的工作。那时候他的马脚还没有暴出来的。

打胜仗是有原因的。这不能证明他路线上正确,而是有些原因。因为这个部队还是红军。

他的所谓有群众拥护,有打胜仗的解释,是要附加解释。

第三,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时期。路线在通南巴时已形成,这时是张国焘路线形成第二党的开始。这再不是小组织了,这是公开的“开除”中央的第二党。他是反对共产党的第二党。

第四时期,他取消“中央”成立西北局,这是国焘路线破产的开始。这有许多原因:第一,南下失败,雅州占领失败了。第二,番民区域的根据地创不起来,他那时候只是肃清草地;于是乎他唯有北上了。他是总要摸一摸才知道的。第三,而后来二方面军来了,二方面军反抗他的路线,于是他在此压迫下,唯有放下“中央”的招牌。及后,四方面军中的干部,做了许多耐心的解释工作,(如朱德同志、伯承同志等)给他们作了重要的解释工作。第四,中央的路线胜利,使他感觉到这样下去不大妙,我们那时用了极大的忍耐,每步每步地引诱他,给他由洞中诱出来,否则大批干部与力量牺牲。于是乎我们给他打了许多电报,给他钩出来了。第五,四方面军中干部起了分化。许多同志开始怀疑他的路线,并且中央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问题。如昌浩、傅钟在洮州会议的分化,便是四方面军中最高干部的分化了。这一斗争是他最伤心的,因为众叛亲离,并且战士用脚来表示他们的反抗。国焘知道这样下去他唯有土崩瓦解。那会议上反对西北局会议的唯有国焘、纯全、李特等。所以国焘不得不北上,完全不自然的,不得已会合的。给人家硬推过来的,他自己并没有放弃其路线,并没有放弃其反党反中央的活动。十二月决议的分歧便是一例。他到了岷州之后还想向西,假如以后不是胡宗南的来一手,那队伍会向西的。他又将一切干部搞下去(如妇女团,青年先锋团),生怕给中央拿了这一力量。

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央非常痛心的,也是红军未有的耻辱。这是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这是血的教训。

这对于党是严重的教训。西路军同志的英勇艰苦,我们是佩服的。但是失败了。想这将责任推向中,这企图是不成功的。如果不是胡宗南来,那四

军、三十一军也无疑跟过去的。

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和其过去的错误有联系:

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主义,南昌暴动,六次大会,中大学生中的小组织,(右派和托派的勾结)等等。这些历史是不必要多说的。由此可知,他的机会主义错误和过去的错误联系着,这些观点是他错误的一贯的线索,他的错误必须由其过去的一贯性去看。

国焘路线的社会根源:

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的产物。是流氓农民意识军阀在党内的反映。党是和其他阶级发生关系的。一切意识可能渗进党内来。在城市的时候,国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俘虏,在农村的时候,他是流氓农民的俘虏。党在各阶层的影响下,可以影响到党内,所以必须斗争,加紧党内斗争。

国焘路线产生的恶果。

只能说,是说不尽的,实际上的反革命的、下流无耻的行为。你杀群众,杀共产党员,究竟帮助了谁?客观上完全是反革命。在党史上造成了最不洁的一页,降低了党的威信,是中央极大的污辱。给了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特别是西路军的失败,是空前绝后的耻辱。

一个错误路线一定会发生很大恶果,所以党必须和这些一切倾向作严重的斗争。

中央对于他曾经用尽一切手段,和各种的办法不断向他作斗争,给了他电报指示,解释工作。我们只救得争取战略方针的实现。我们用尽了让步的冷静的方法,企图说服他,但他总不听。右路军甚至过了草地,后来拖转去蒙受了最大的损失。达到最后,我们坚决执行我们的方针。这些文件俱在的。

我们向同志们慢慢进行解释,我们今天才召集这个会议,也不是太迟了的。他初来时也不便如此提出来的。因为教育工作还没有开展。道理总是讲得清楚的。这些都是斗争,方法是需要的,并且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政策。

国焘同志的承认错误问题。

他的报告比较那篇文章进了一步,因为红大大部分的同志都认识为路线上的错误了。

但是他的报告合不起头,他总说一切是正确,错误只有两个半月。一切是纠正了的,一切都正确的。

实际上他承认的“基本错误”还差得很,他还没有基本上了解自己的错误。实际上我们对他的估计到现在还是正确的,但没有今天了解的如此丰富,

了解其罪恶的如此黑暗。他的“承认”只是表面的，抽象的，没有生动的活的内容。我们说他的承认错误是不够的，应该丝毫不保留的揭发自己的错误。我们要求国焘同志从新来检查自己的错误，不要故意来争执数量上的问题，并由列宁主义的 ABC 从新学起。他到处杜撰列宁，这也正是他反对知识分子的原因。他所讲的列宁，其实列宁都没有讲的。冒充列宁是危险的。国焘要从新放下他的武器，由 ABC 学起。他的主义全没有列宁主义的韵味。

与国焘路线作斗争中应注意：

1. 无情揭发国焘主义来教育全党，教育同志；反对忽视这斗争，躲避这斗争的观点，否则党内不能一致的；过去的经验和现在不能脱离的；揭发过去的错误，是帮助将来的。

2. 要把反国焘主义的斗争和四方面军干部分开，反对以为反国焘主义就是反四方面军干部的反宣传和观点，这种观点是替国焘主义打掩护的。这责任是国焘担负的。四方面军干部大部分是英勇艰苦的；他们过去跟国焘走的原因，就是他取消了党内教育（国焘是愚民政策）和这些同志以为国焘就是党，实际上受了国焘的欺骗；以及国焘的恐怖政策。因此要将国焘主义的错误和四方面军干部分别开来。我们帮助他们来反对国焘路线，帮助他们的进步，加深他们的进步。现在国焘的老办法再不能奏效了。这证明四方面军下面的干部都是很好的。

对国焘路线下牺牲的同志，中央是非常痛心的。

3. 对犯错误的同志，不应采取报复主义。主要用说服教育的立场，使之转变，我们欢迎他们的每一步的进步，我们帮助他们的进步，我们主要的目的，在于帮助何、周、张的进步，帮助他们揭发自己的错误，要用同志的说服的办法。并且希望他们好好了解自己的错误，其犯错误的程度是有大小的，不应一律看待。自己犯了错误的要老实地揭发出来。

4. 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不要轻易相信，要看实际，要看具体的表现，只要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才想信。

5. 要彻底消灭张国焘主义，应注意以下问题：加强党内教育，使之能原则上解决问题，如此党的路线才能有保障，才是最好的保障。明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才可以“根绝国焘路线”。民主应该大大扩大。发展自我批评。这精神要发展。使干部成为勇敢积极的分子。

提高全体同志的警惕性，对每个不正确的活动都能立即看出来，对每一小倾向都能克服，这才能保障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巩固。

最后对国焘同志怎么办？

许多同志提出组织上做结论的请求，开除其中委，政委、政治局委员，副主席、党籍等。我以为继续在红军中做工作是不行的，总政委、副主席是不行的。

党的组织方面结论，现在不做结论。估计到几个问题：

1. 国焘同志是老同志，创设党的同志；虽有错误，还有功绩；

2. 国焘同志已开始承认错误（座中说：假的假的！），他已开始承认错误，我们应该帮助他。

3. 我们须要原则上团结一致，还要他在中央工作，这是主要的。以后在六中全会，七次大会上讨论他的问题。我以为党内不要太心急了！（鼓掌）

会议在洛甫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之后，博古提议停止讨论，要国焘、纯全、何畏几个人表示态度。会议通过了博古的这一提议。纯全、何畏、张国焘即相继表态。

纯全^①：听过各同志发言，我认为非常正确。

这次会议又给我打了六〇六的针。

我向来是自骄自大的，我以前初会着中央委员，我骂得很凶。现在我知道中央委员的行为完全与我所说的不同。我曾写信给前方及步兵三校，把我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承认了，但还不了解是路线上的错误。

我认为在通南巴工作，不能说路线错误，而是机会主义的错误。现在这次

^① 周纯全（1905 - 1985）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三年参加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边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省苏维埃保卫局局长兼鄂豫皖游击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师政治委员，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兼川陕苏区游击总司令，红四方面军后方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陕北公学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副校长、校长，滨海行署副主任兼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省、安东省实业厅厅长，辽宁行署主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东线战勤司令员，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于国委员会委员。在中共第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会议揭发了,我很同意。

国焘错误,军权高于一切,我是左膀。

对于蒋介石问题,宗教问题,国焘是没有答复,证明他在政治领导上是破产的。

对于供给制度、政治制度上,我都认为他是破产的。

我在这次斗争中表现调和是由于狭隘经验,现在也是破产了。

四方面军同志在这次斗争中是有进步的,这证明党的领导正确。

我以后对中央领导是坚决拥护的,我坚决以行动担保,并要同志大家监视我。

我反党的经过,对博古骂书生,对毛主席骂他老大官僚。我反党的原因,由于农民意识狭隘经验。

我在鄂豫皖党的斗争中,我采取中立态度。我对国焘的信任不是偶然的,在鄂豫皖斗争时,第一次是与××作斗争,我表示不满,与中生作斗争,我曾退席。我的宗派观点就是这时发生的。我虽然反对他,但对他的错误理论是赞助与发挥的。

开始我对中央是没有怀疑的,在那次常委会上国焘是起了鼓动作用的。对于联邦政府问问题,因为中央批评,我就觉得我没有错误,实际我对少数民族政策不了解。

我打三个电报给中央,我是拥护国焘的。

我对沙窝会议是积极反对的。

对武力解决中央问题,我说:中央带这么多红军不打敌人,是自己解除武装。用武力解决中央我是没有说的。

这次红军的损失要昌浩、国焘负责。

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我要负积极领导的责任。

何畏^①:中央宣布国焘路线的破产,凡是革命者没有不同意的。

我在国焘路线上犯了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反党反中央的严重错误。我只有诚恳接受这一错误。我坚决来改正我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① 何畏:根据一九三九年四月八日毛泽东在抗大检讨工作总结晚上讲话:“抗大也有一个何畏的溜了。”“本来到晋东南打游击的,可是溜掉了。一查是溜到西安去打游击了。”可知他已叛逃。

我对过去错误,我失去了阶级立场,我坚决来改正错误。

国焘:各位的发言,特别是几位中央局同志的发言,使我更得到教育。我了解我犯了严重错误,恶果很大。我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大革命时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莫斯科又没有正确的立场,在四中全会,我是回到党的路线来。我的错误是由于派别观念的来源。是机械唯物论,是不懂共产主义ABC,是自高自大,第二列宁,如同志所说“土司”。在错误中间对中央不尊重,发展到无原则,的确是罪恶。

同志与我作斗争,我采取压制自我批评,如对陈赓同志的侮辱,以及对何礼华、朱光同志等的陷害,都是我极大的罪恶。

我要坚决与我的错误作斗争。

我对中央现在的路线是完全同意的。虽然有些不了解的地方,但没有对任何人说。同时,要声明在此没有小组织活动,但我因为我自己错误路线没有了解,没有积极帮助同志改正错误,这是我的错误。

在这时,不是继续错误过程,而是改正错误过程。

我现在宣布我的错误的破产,以前种种昨日死,以后种种今天生(座中冷笑),同志们不要笑。我这种错误是不能再重复的。

我必须声明不是辩护错误,在讨论中不能联系当时情形是有的,但所说的都是原则上的。我再没有理由使我说在通南巴路线是正确的,象轮奸妇女等等,是路线的错误。在鄂豫皖肃反,在后期也是路线的错误,对白区问题,就是不是路线错误,也是很严重的。十五军问题,肃反错误也是很严重的。对四次“围剿”,的确是犯了左倾,以后便转右倾。我认为突围是必要的,突围以后便犯了向西退却错误。

在通南巴问题,我还不知道犯了这严重错误,现在事实上是路线错误。特别肃反问题上。但我还要声明几件事:……(这里他推卸杀害曾中生、旷继勋等的责任,并污蔑旷继勋“犯了反革命错误”等,另外对一些具体问题,做了不少解释,本文从略)。

这中间,张国焘在谈到关于抢劫、杀人,烧房子等问题时说:的确如泽东同志所说,这种烧杀,是断绝来路,永不再来。这是非常对的。

接着,张国焘说:对于中央统一战线,我的确没有彻底了解。我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我不反对同志们对我的愤怒与无情的揭发,我同意要给我组织上的结论。

但我有一点不同意的,就是不把我当党员看待,当反革命看待,当然是个别的同志。

我认为与托派陈独秀等叛徒是有区别的。我的错误很严重,如同志们所说的无名肿毒等等,都是对的,但基本上的不同,我是站在共产国际方面的。

虽然我错误的实质是反国际的,但另一方面我坚决愿意站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所以我有权利还请求把我当党员看待。

我承认我是开始改正错误。我的支票相信是能兑现的。

在张国焘表态后,博古说:听了三个同志最后的发言,虽然有程度的差别,但承认错误是更进一步的,这是值得欢迎的。

在目前形势下,需要布尔塞维克的一致团结,所以,他们的进步了解错误更值得欢迎。

我提议在今天不是组织上的结论,因为改正错误要在实际行动中来改正,应该有一个时间。

另一方面,他们都有地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国焘同志表示所开的支票兑现。所以,我提议在今天不做组织上的结。为得挽救同志,是我们领导机关所应采取的态度。

最后,洛甫说:同志,对博古同志的提议怎样?

座中说:同意!(会议终)

本世纪最珍贵的档案文献^①

(答记者问)

齐得平

关于毛泽东手稿、文稿概况

访问人^②:据我们所知,广大读者对毛泽东的手稿、资料的有关情况,包括它的收集、整理以及保管非常关心,您长期从事这项工作,获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能否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齐得平:可以。关于毛泽东的文稿,包括他的手稿、抄件、讲话记录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等,有几万件,如果每件平均 1000 字,就是几千万字。这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一份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毛泽东手稿是宝中之宝,是无价之宝。他老人家一生读书不辍、著述不辍,基本上都可在这几万件文稿中得到反映。

访问人:有一次,听王明哲同志说,毛泽东的文稿有 4 万多件,这比你的估计要多一些。

齐得平:是算法不同的缘故。王明哲同志说 4 万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阅览的部分文电和报刊。

访问人:毛泽东的手稿,保存最早的是哪一年的?

齐得平:1912 年学生时代一篇作文《商鞅徒木立信论》和 1913 年的《讲堂录》,这是建国后征集的。在我们党的档案中,能大量见到毛泽东的手稿是 1940 年以后的事。1939 年以前个别的也有,比如 1922 年 6 月 20 日致施复亮

^① 此文先发表在《档案学通讯》1993 年第 6 期,1995 年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说不尽的毛泽东》(下)卷。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边彦军、张素华。

并团中央的信,1931年7月30日准备攻击东固、龙冈的决定,8月8日消灭龙冈之敌的命令,1937年5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8年2月23日毛泽东起草的《战略意见》等,总之,留存下来的手稿是很少的,大量的是电报抄件。

访问人:1937年、1938年毛泽东的书信已经有手稿了。

齐得平:毛泽东的书信好多是后来收集的。现在我馆收藏的毛泽东1913-1939年的书信有50多封。信发出去,有心人会留下,也就保存了下来。电报稿的情况不同,全部是在我们党的档案文件中保存的。我曾问过搞秘书工作的老同志,为什么毛泽东起草的电报手稿在1939年前很少,1940年以后才多了起来?他们说,那时为了携带方便和保密,凡是发出去的电报,都集中抄在本子上,原稿烧掉。到1940年,大概由于环境好了一点的缘故,不再把电报原稿烧掉,而是保留下来。

访问人:这是谁讲的?

齐得平:这是原来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的常可均同志说的,他在那儿工作了许多年,60年代曾调到中央档案馆工作。我觉得他说的合情合理。

访问人:看来这个违反保密制度,是坏事变成了好事,为我们后来保管和整理党的文献提供了方便。

齐得平:这确实是为后人编辑出版党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文献保留了最可靠的依据。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和文件不只用他自己的名字,而多是用中央的名义,军委的名义,还有几个人联名的,如“毛朱王”“毛周”“洛毛”“彭毛”或以别人的名义发出的。毛泽东的手稿保存下来,一看就明白是毛泽东起草的。1939年以前的就难办了,除了中央会议记录上记载的毛泽东的发言,或写明致××电为毛泽东起草的外,大量的署名“中央”“军委”的电报,还有几个人联名的电报,就不好确定是不是毛泽东起草的了。

访问人:二战时期的就更加难办,从1927年毛泽东上井冈山,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只有少数几份毛泽东手稿。有些电报尽管多人署名,但其中毕竟还有不少是毛泽东起草的。最难办的有些文稿署的名字不是毛泽东,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极可能是毛泽东起草的,同时这些文稿又很重要,比如,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但查遍毛泽东的所有档案只有两份非常简单的电报。大量的电报都是朱德等署名发布的。非常遗憾!

齐得平:这是很难办的,只能从逻辑上、思想、语言特色上去分析,毛泽东的东西和其他领导人不一样,有他的特色,但分析总归是分析,还不能更直接

更确凿地认定哪一份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这是1939年以前没有保留下来手稿给我们今天造成的困难。

毛泽东书体的发展和演变

访问人：根据你多年的接触和研究，毛泽东书法的演变过程大体可以分几个阶段，如早期是什么模样，二战、抗战、解放战争，直到建国以后各是什么模样？

齐得平：根据我的观察，毛泽东书法的演变，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年时代可谓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我馆收藏的1920年前的30多封书信的手迹，多为楷书，字体工整有力，有些写的特别工整，如《商鞅徙木立信论》，《讲堂录》中的“离骚经”，1916年1月28日和1916年2月19日给萧子升的两封信，1917年春为萧子升的读书札记写的《一切入一》序，1919年春给日本白浪滔天的信，1918年8月11日给罗学瓚的信，1919年4月28日给七、八舅父的信等。充分体现了青年时代毛泽东书法功底之深。其字形1916年前略长，之后字型形扁。

1921年到1949年，可谓第二阶段。在建党初期，特别是在三、四十年代那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运筹帷幄，起草文电时的注意力是如何把党建设好，把军队建设好，把根据地建设好，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而不在书法。为使机要人员传达准确迅速无误，他起草的文电多是行（书）而不是草。从他写下的大量文电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书体是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变化着。如1922年6月给施复亮并团中央的信，1923年9月给青年团中央的信等，同以前相比，又有变化，变的有点像后来的字形。从我馆收藏的手迹看，毛泽东书体在30年代中后期已独具风格。如1936年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1937年致范长江的信、致文运昌的信等，字体清秀、字形略长、上下自左向右略有倾斜。1941年以后变为自右向左略有倾斜，如1941年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及其前后起草的大量文电等，以后还在不断变化。

1949年进北京以后，可谓第三阶段。进北京后，情况变了，条件好了，老人家除起草公务活动的文电外，还写了一千多封回复亲朋故旧和宿不相识的群众的信。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字越写越好，越写越草。然而，他的复信是视对象而别。给高级民主人士、老先生、科学家、教授等的书信多为草书，有些写得

非常之草。反之,对文化程度低的人,字都写得比较清楚工整。

访问人:毛泽东的字变化显著的是哪几年?

齐得平:毛泽东的书体,从学生时代到五、六十年代有很大变化。一般来说,年代相隔越远,其变化越是明显,然而,其变化又是逐步的。时间相离越近,其变化越不明显。但是,细心观察是可以看出其变化轨迹的。除前边说的以外,明显的变化我认为就属50年代了。一个不知道毛泽东青年时代字体的人,用来同他五、六十的代的手迹相比,就不晓得是出自他一个人之手了。

访问人:是不是有笔的问题,比如说买了一批好笔,写出的字比较清秀?

齐得平:笔有关系。新笔写的字笔锋更明显更突出。我看主要还是他的工力和字体变化。毛泽东的字体变化,除从其总体上观察外,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他的签名,你们看1943年以前“毛泽东”的这些签名,“毛”字一般都是从上面下来,再这么一转,一笔写出来。1943年以后,“毛”字写成四笔,先点三点,然后竖弯勾,分四笔写出来。到1948年、1949年,又变了,从1948年2月他修改中央一个文件时写的几封信到1949年9月给宋庆龄的信、任弼时的信,“毛泽东”三个字同以前相比,“毛”字变化不大,“泽东”二字变化比较大。

50年代以后,毛泽东的字又发生变化,写得非常之好看。

访问人:这是不是和他50年代以后练字有关系?

齐得平:有关系。进城以后,毛泽东的工作虽仍然十分繁忙,但客观条件比进城前好多了,可以看到历代书法家的碑贴,当时中办秘书室陈秉忱同志就专门为毛泽东购买书籍,收集字帖,收藏各种碑帖数百部。50年代毛泽东休息时书写了数百首古诗词,一首诗往往书写5、6次,6、7次,甚至10来次。他的自作诗词也多是书写许多次,多为草书,而且很规范。毛泽东的书法最好的时期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例如他书写的诗词,给华罗庚、章士钊的信件等,都非常漂亮,非常之美,达到自然传神之境地。一位朋友对我说,看毛泽东手迹是一种享受,看过后再看,还想看,每看一遍都受到启迪。

访问人:毛泽东练书法,他主要学哪家的字体?

齐得平:从我馆收藏的毛泽东1920年以前的手迹,特别是1916年前的手迹看,他青年时代习魏碑,1949年进城后他收集阅览了历代名家字帖。我以为他是博采众长,不是专门摹仿哪个人,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现代书法家,一个是他的勤奋,有好的功底,再一个是他吸收了古人前人的长处,继承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传统,写出了自己的风格。我看毛泽东的字,谁

的也不是,是自成体系,就是他自己的,可以叫“毛”体。

访问人:研究毛泽东字体的变化,有什么意义和用处吗?

齐得平:书法是一种艺术。研究毛泽东书法,可以得到启迪。就毛泽东手稿的管理工作来说,搞清楚他的字体变化,对判定毛泽东写的文电和书信的年代有很大用处,在毛泽东起草的文件、电报和他的书信,有许多当时没有注明年份,只写了月日,有些只注明日,连月份也没有写,个别的连日也没有。我们在整理这些文电时,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首先须判定成文时间。准确判定一个文件的写成时间,才能知道它当时起的作用,也才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判定成文年代一是看文件内容,再就是看他的字体变化。比如1943年12月24日写给刘少奇的信,原件没有写年,只有月日,从内容看,写这封信,肯定是刘少奇在延安,不是在华中或其他地方。刘少奇是1943年1月初回到延安,这封信应是1943年或1944年的;从毛泽东的字体看,放在1943年也比较合适。这样还不能完全肯定,究竟是1943年还是1944年的?我又拿来其它相关文件对照,结果发现,1943年12月24日同一天,毛泽东还给彭德怀写了一份电报,用纸完全一样,字也完全一样,最后判定为1943年12月24日。又比如给符定一(号宇澄)先生的两封信,是1976年8月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整理图书时,从一本线装书的夹页里发现后经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交来的。这两封信,一封年月日全有,写的是1936年11月28日,附有信封,写的是“剑英同志转陈符宇澄先生收 毛寄”。另一封没有年份,只写有“9月30日”。从字体看,我认为这两封信不是1936年的,而应是1946年的。为了判定这两封信的写成年份,1981年我还曾向1946年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过的原中直党委书记刘华峰同志请教,他同意我的看法。1983年编辑《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时,准备收入9月30日那封信,还是把它当作1936年的。我反复看了信的原稿,仍觉得9月30日那一封信的笔体不是1936年的,应是1946年的,但我手头没有资料可查,不知道符老先生的历史情况,他究竟哪一年去过延安或和毛泽东联系过。在1983年3月召开的专家讨论《毛泽东书信手迹选》书稿的会上,我把我的意见提了出来,并建议向符先生的家属调查。随后,中央文献研究室找符定一之女符德芳调查,得知其父1946年夏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延安。不久其父先回北平,稍后她回北平时带了毛泽东9月30日给符定一的这封信。调查结果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如果熟悉了毛泽东字体的变化,对他那些没有注明年份的文件,大致可以判定年代。

访问人:除从文件内容考证和从字体变化判定这两个方面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参考证据?

齐得平:还有,就是从毛泽东书写用的材料加以判定。比如1947年1月16日给陈瑾昆的信,这封信原来也没有年代,从内容和字体看,不早于1945年,也不应是1948年,1946年也不是,因为他这时还在张家口,没到延安。于是我拿出当时的文件一对照,和1947年同时写的几份文件用纸上对上了,上下宽窄,裁纸的刀口也对上了,毛泽东在那一段时间用的是同样的纸,这也是比较准确的。又如,1943年毛泽东为劳动英雄的题词,个人交来时有不同说法,有说是1941年,有说是1942年,有说是1943年的,前后相差3年。但从所有材料看,都是写在印好的同一规格的布质奖状上的,字体相同,像是同时写的,不可能相隔3年。于是我查了西北局有关档案,又查阅了延安的《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登载了毛泽东为王震等22位劳动英雄的题词,题词内容也对上了,这就判定了这些题词的年代。

总之,从文件内容考证,毛泽东字体判定,再加上书写用纸和其他书写材料的参考,对未注明成文年分的毛泽东手稿的大致年代一般便可判定,为我们整理、编辑和研究毛泽东的文稿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手稿保管工作沿革

访问人:你从哪一年开始接触毛泽东手稿?

齐得平:我原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改名为秘书局)工作,秘书处住在丰盛胡同,分管文件和历史档案,1954年经党中央批准实行文电合一管理。这是我们党的文书档案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随后我们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接收了1949年以前党中央的历史电报,我就是从那时开始接触毛泽东手稿的。接收之后,我们将这个时期的文电重新进行了整理。

访问人:在这段整理档案中,你们把毛泽东的手稿单独分出来了吗?

齐得平:还没有。1959年中央档案馆成立,我跟随我保管的中央档案一起进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1959年底,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裴桐让我把1945年8月日本投降至1949年9月前的毛泽东讲话作一个目录出来,我照办了。新年过后,中共中央档案保管部30多人全体动员,突击了一个月,把解放战争时期的所有文电全部查了一遍,把毛泽东起草的全部文电编了目录,并推荐提供了许多文稿给编委会。这个工作完成后,馆领导决定将

毛泽东手稿集中单独保管起来，一同考虑的还有刘少奇的手稿。领导决定让我作这项工作。从这时开始，将毛泽东手稿从中央档案中抽出集中，单独设专人管理起来。从此，我的一生也就交给了毛泽东手稿的管理工作，除在“文革”一段时间外，我一直做这个工作。

访问人：领导让你管理毛泽东手稿，当时给你交待了什么任务，或工作内容一类的项目吗？

齐得平：为做好这项工作，领导曾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做好手稿的管理问题。裴桐同志提出：“一、全面收集毛主席、刘主席的著作（手稿与非手稿）与反映两个主席思想的材料（按收集手稿著作范围），目前要为《毛选》增订版和刘少奇同志选集收集稿件。二、熟悉两个主席的历史和他们的著作，研究他们的重要著作中的思想发展，汇编材料。三、整理编目，编制参考工具书，保证查找工作进行。四、保护原稿，作好保管工作。”几十年来，我一直是按这个要求工作的。

后来，在“文革”中，我也受到株连，给扣上“反党分子”的大帽子，大会批小会斗。这些不说了。我于1969年1月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一直到1975年才又回到馆里来。这时的机构全变了，原来的中央部、国家部都没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三等老领导回馆来主持工作，将机构作了调整，成立了中央处、国家处。处下设科，手稿科就是这时成立的，我任手稿科科长，专门负责管理毛泽东手稿。这时，档案接收也越来越多，毛泽东手稿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亟需整理。我根据“文革”前的经验，提出整理方案，将毛泽东文稿分为九类：一、毛泽东起草或署名的文电，他修改的文电和同别的领导人联合署名的文电；二、毛泽东写的文章和他修改的别人的文章；三、毛泽东的书信；四、毛泽东的题字题词；五、毛泽东的自作诗词，代别人修改的诗词和书写的古诗词；六、毛泽东的讲话稿和记录稿；七、是毛泽东的选集、文集；八、毛泽东阅批的图书；九、毛泽东的其他手迹。这个方案经馆领导批准实行。

访问人：你觉得，毛泽东手稿的保管工作是不是非常重要？

齐得平：我一直做这个工作，我清楚，非常重要，毛泽东手稿是我党和国家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什么这样说？首先，毛泽东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一般的领导人，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通过他的手稿可以反映他一生的活动，也反映党的主要活动。再就是，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讲，它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体现。反映这个结合的，最能体现的还是他留下的大量手稿和文献。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保管好毛泽东

文稿的目的是为了用,用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出版毛泽东著作坚持和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服务。为了说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下边介绍一些情况,或许对了解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是有益的。

在60年代初,为增订《毛泽东选集》,我向领导推荐了毛泽东1941年写的一篇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重要文章。毛泽东非常重视此文,一九六五年五月,他看后将题目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并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同志传阅。毛主席在批语中写道:“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1964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我从干校回馆工作后,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这个批示中对我馆工作的肯定褒奖,高兴极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80年代初,我们汇集了《毛泽东未公开发表过的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部分论述》、《为什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这两份资料刊登在我馆编印的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的内部刊物上。前者说明毛泽东对自己是一分为二的,它有助于正确的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后者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成功的经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十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争论之激烈,同志们是会记得的。1982年,我发现毛泽东1963年11月18日在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中亲笔写下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十分高兴,立即向领导作了汇报,建议将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手迹复印报送中央。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出专刊发表了这一手迹,当时在党校学习的老同志争相传阅。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的手迹“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思想理论界的重视”。

1983年初,我在刚从一个单位接收来的档案中发现毛泽东1965年在《农村调查》一书清样中,亲笔写的一篇关于认识论的按语,推荐给中央文献研究室,该室领导很重视。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我同我馆耿仲琳同志多次研究,于1983年12月将毛泽东同志1941年写的那篇重要文章中关于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一段编印在本馆供领导参考的内部刊物上,胡乔木同志看后即批示在1983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以上两件,1986年以《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为题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中。

长期的工作,我深感从事毛泽东手稿的管理工作是很荣幸的,任务是艰巨的,要做好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要做好这项工作,要充分认识它的重要性,要熟悉研究文稿内容,除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做好服务外,在了解到有关部门或社会需要的情况下,还应该主动地有目的地向党中央和有关部门提供所需要的有关文献资料,更好地发挥毛泽东文稿的作用。我觉得这项工作,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关于毛泽东手稿的保存

访问人: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这也是广大读者十分关心的,就是毛泽东的手稿形成已经有50年,甚至70年时间长了,现在保存情况怎么样?

齐得平:可以让大家放心,毛泽东手稿保护得非常好,有专人管理,专库存放,为了保护原稿,同时也为了研究和提供查阅,我们不仅搞了复制件,还搞了缩微,非经特别允许是不动用原稿的。

访问人:从保存的角度讲,毛泽东手稿可以保存多少年?

齐得平:如果不出意外,大部分保存几百年没有问题。因为毛泽东手稿的用纸多是宣纸,在所有纸品中,宣纸是最好的,手稿绝大多数是用毛笔书写的,所以可以长期保存。为了保存好这些珍贵档案,保管条件现在有了很大改善,基本上做到了恒温恒湿。总之,广大热心的读者可以放心。

访问人: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些情况。

1993年5月15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翰墨留香 风范传永

——《刘少奇手迹选》介绍^①

齐得平

今年十一月是刘少奇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逝世二十五周年。

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中央档案馆和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刘少奇手迹选》(以下简称《手迹选》)。

邓小平同志为这部书题写了书名。

刘少奇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写作了大量的文章、文件、电报、书信和题词。可是，一九四二年以前，因长期在白区和敌后工作，他的手稿保存下来的很少。一九四三年初他从华中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四五年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之后他起草的文件、电报的手稿才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刘少奇手迹选》是从中央档案馆珍藏的他的大量手稿中选出的，共收入了他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的手迹一百二十七件。这部《手迹选》定会使读者感到亲切而喜爱。

现将其若干内容介绍如下：

(一)

一九三八年冬，刘少奇同志出席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会议决定了发展华中的方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原局，以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原局委员，以刘少奇兼任中原局书记，负责指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党的工作。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年

^① 此文曾在1995年1月2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

五月后任华中局书记。一九三九年初,刘少奇同志前往河南确山竹沟安排中原局的工作,在党内军内传达了党中央在抗战开始以后的正确路线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全体干部的精神为之大振。《手迹选》收录的《为抗战的正确路线而斗争》,就是少奇同志在这一时期为号召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而题写的。《为大众文艺的创作而努力》(一九三九年)是少奇同志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纪念而题的。《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三九)是少奇同志写的一份报告大纲。《致刘瑞龙金明江华张爱萍同志》(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七日),是少奇同志为详细了解苏北的情形而写的。《致黄克诚并转金明诸同志》(一九四一年五月三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根据地的建设、抗日反顽斗争及群众工作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后来少奇同志在总结华中三年的工作时说:“由于中央的正确指导,北方局和八路军的援助,华中我党我军全体干部党员和指战员的英勇奋斗,除开个别地区以外,我们的工作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儿幅手迹,反映了当年华中局为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火热的斗争和刘少奇同志孜孜不倦地为开辟与发展华中根据地所耗费的心力。

(二)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国处在和平建国和内战的十字路口。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苏美英三国都曾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二十八日党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赴渝谈判。在毛泽东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等同志从八月二十八日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发表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回到延安,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仍在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同志回到延安后,因劳顿过度,休养一段时间,少奇同志继续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蒋介石在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迅速调动兵力沿平绥、同浦、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截至九月中旬,已调集 37 个军 73 个师的兵力,其中大部用于进攻华北解放区。第五战区司令官刘峙出动四个军包围中原我军。为正确指导对进犯之敌的作战,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刘少奇同志致电郑位三、李先念同志。收入《手迹选》的这份电报说:对国民党军队的作

战,我们的干部在指挥作战中,要“严格遵守毛主席的以多胜少的原则及其他原则。”“毛主席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说的很详细,望你们详细的反复的研究这本著作,在所有高级军事干部中讨论这本著作,作为你们以后作战的指导原则。”电报说:在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中,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是极精采、极有价值的著作,我们每个军事干部必须加以熟读。”众所周知,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这个指示鼓舞了中原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对进犯的国民党军作了坚决的斗争,保存了实力。

一九四五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被迫宣布辞职。是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布对华政策的变动。中共中央就美国对华政策变动和我党对策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发出党内指示。收入《手迹选》的少奇同志起草的这个指示中,首先指出:“由于我三个月的坚决自卫斗争,已使赫尔利在美国倒台,使杜鲁门在本月十五日发表对华政策的声明,宣布中国内战要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要结束,并约束在华美军的行动,使不影响中国内争的过程;这就是说,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指示指出:“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指示说:“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我们不可存幻想”。“在美国对华政策这种新的变动下,马歇尔即将来华,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开幕,恩来、剑英同志等已到重庆,我们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开展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斗争。”这个指示还规定了各解放区在军事、宣传和在对在华美军及美方人员应采取的态度和须要注意的事项。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马歇尔出任美国总统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使美国对华政策原形毕露。在此后的一年中,我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不断揭露,尤其对美军驻华、干涉中国内政,侵扰解放区,运送蒋军及美政府以租借物资、剩余物资、经济借款、军舰、飞机、军事顾问和技术训练等等援助蒋介石政府和军队打内战的罪恶行径,不断予以暴露和抗议。一九四六年八月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溜走。回顾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中关于“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我们不可存幻想”以及所列我党对策,人们会慨叹少奇同志斗争艺术的高超。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同日下达停战令。停战协

定和停战令规定,双方军队应在一月十三日午夜就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但蒋介石在下达停战令的同时,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接着又不断地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

对停战协定和停战令,我党我军是真诚拥护,决心认真执行的。在停战协定公布的当日,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我党中央就发出通告,要求我军一切部队,解放区的各级政府,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严格执行停战协定和停战令的各项规定。《手迹选》收入的,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五月中共中央的五份电报,体现了我党对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和停战令的诚意,当然也表现了我党中央没有忘记历史的经验。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少奇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中原局电》说:“停战谈判已有结果,命令可能在日内下达,如果不发生中途大的变化,和平新阶段可能即从此开始。但你们仍领准备国民党中途变卦,继续战争。”一月十日《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说:“国共停战命令今日已发表……但蒋在今日又秘密命令各军尽快尽量秘密控制军事要地并解除日军武装以免共军利用之。为此,我各地部队应即遵守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但必须十分警惕,防止国民党的进攻,如彼来进攻,应坚决彻底消灭之,并迅速报告延安。”五月八日党中央向周恩来同志通报蒋介石内战阴谋的电报说:“蒋介石辰冬(即五月二日——笔者注)秘密到新乡,两小时即走。国方之内战阴谋中心似在陇海路沿线,而不在武汉。蒋在西安对将校班训话,共党问题必须用武力解决,不要幻想和平解决,要即刻准备好。”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告诉全党:“全国性的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各地应根据中央过去指示,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以便能配合军事上的自卫斗争粉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指示刘邓对付国民党军队继续进攻我水东区问题,即向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新乡小组发出照会,说明国民党军进攻水东情形,“要求执行部命令顽方立即停止进攻,并退出侵占区”,否则,“我将被逼不得不采取必要之报复行动,其责由顽方全部担负。”“在报复后可经小组调处,将我占地区与顽占地区交换,彼停我亦停,彼退我迹退,否则不停不退。”这些电报和当时党中央的许多电报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为实现国内和平的愿望、诚意和为争取国内和平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同时表明我党中央和少奇同志对国民党中途变卦不守信义破坏停战协定和停战令是十分警惕的。由于我党坚定的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严正立场,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艰苦斗争,才取得了自卫战争的不断胜利。

(三)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以后,为垂死挣扎,采取了召开伪国大、驱逐我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代表机关,宣布国共关系破裂等项步骤,又采取了进攻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步骤。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一九四八年四月底,党中央、毛主席从陕北来到华北。五月九日党中央宣告:中央已与中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消。少奇同志圆满完成了,党中央的重托。

《手迹选》收入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至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期间的六件手迹。其中,《致毛主席电》是报告印发毛主席一九三三年论查田运动的三个文件之事。《致黄敬信》是谈对战争形势的估计问题。《致林铁并彭真电》是关于冀中新华书店出版《论党》一书的问题。《致杨得志、罗瑞卿等电》是指示我晋察冀野战军,在石家庄战役后,争取时间休整,准备进行了一次更为巨大的战役和配合东北我军作战问题。《中工委致东北局电》是要东北局代表中央指导在莫斯科的孩子们的学习的问题。

为了更加有利于革命战争向南发展和集中力量进行生产节约支援前线起见,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刘少奇起草的《中央工委致中央电》建议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两个中央局、两个军区、两区政府一道合并。为解决金融贸易问题,拟成立华北银行,发行新钞,统一两区货币,进而统一华北、西北、华东的货币,统一组织对外贸易,与国民党作经济斗争。此前,少奇同志曾向彭真、聂荣臻、薄一波同志征询意见,提议两区完全合并。考虑到两区合并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有极大利益,还可抽出大批高级和中级干部到黄河以南去工作,发动两区人民的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与华东。同年五月初,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行政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及其人选的决定。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又谈到“我们已在华北四千四百万人口的区域建立了统一的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人民政府,并决定由这个政府将华北、华东(有人口四千三百万)和西北(有人口七百万)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事工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统一起来,以利支援前线,并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将东北和中原两区的上述工作也统一起来。”(见《毛泽东选集》1345页。)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达到根本转折点,被敌人长期

分割的客观状况已基本上不复存在的时候,少奇同志及时提出了两大解放区合并的问题,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了过去时期的工作,研究决定了今后时期的任务。一九四八年九月少奇同志撰写的《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一文,明确提出了“我们在现在及将来在全国胜利以后,应该怎样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的问题。他写道:“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在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后,除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以外,必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少奇同志说:“现在人民解放战争虽然还没有在全中国胜利,但是已经在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的地区胜利了,在这里,必须立即从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我们要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所有,以消灭封建主义。要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以消灭官僚资本主义”。“在完成这些革命的任务以后,我们就在旧中国的废墟上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他告诉说:“如果我们没有清醒的头脑,我们犯‘左’的或者右的错误,我们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会要失败,无产阶级对于国家的领导权就要被推翻。反之,如果我们有清醒的头脑,执行正确的政策,紧紧团结了小生产者及其他劳动人民在自己周围并跟随自己前进,善于经营管理经济,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能胜利”。

一九四九年三月,即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夜,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根据毛泽东同志报告通过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同志在报告里,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各种成份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批评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倾向。但是这个问题,在党内甚至在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并未完全解决。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邹大鹏同志写信给少奇同志,反映我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少奇同志根据邹大鹏同志来信和他巡视天津时所发现的问题,起草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央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电报。指出:“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至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望东北局召集会议”,“然后将东北局讨论的结果电告中央。”毛泽东同志审阅了这份电报稿,并在电文中“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后加写了一段话:

“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刘拟电文“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要性……”毛泽东将“目前时期”四字中间增加了“及今后一个长”六字,加重成为“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在电文谈“左”倾错误造成的不良后果时说:“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之后,毛泽东还加了“的路线错误”五个字。毛泽东同志在审阅这一电报稿的同一天,即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另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给各中央局、山东分局、平津沪宁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的指示电:“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即五月三十一日——笔者注)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给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建国初期,正是由于我们党执行了正确的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对城市的生产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四)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在毛泽东同志访苏期间,他代理党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一九五四年九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在这一时期(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六五年九月)收入《手迹选》的文献90余幅。

其中有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稿《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部分)》(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的一部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的一部分)、《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的提纲)、《关于发展生产的初步设想》(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关于改进我国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制度问题》的意见(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等。

其中还有为党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文: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兵团进兵云南和解决云南问题的《中共中央军委致林彪、谭政等电》、《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关于加强沿海边防与岛屿工作的《中共中央致华南分局电》;关于由贫雇中农劳动起家的新富农是否可以被选为劳动模范问题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关于土地改革应注意防止犯“左”倾错误问题的《中共中央致中南局并华东局等电》;为转发北京市政府党组关于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报告之《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电》;关于青年团工作的《中共中央致团中央并转各中央局电》;关于煤矿工业中安全生产问题的《中共中央致全党组转煤矿工会党组等电》;《中共中央关于坚决制止滥发统计表报的第二次指示》;为解决工矿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的《中共中央转发钱瑛报告的批示》;关于援助越南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问题的《中共中央致罗贵波、韦国清等转胡志明电》;《中共中央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部分)》;关于改造洼地问题《中共中央对赵克报告的批语》;关于劳动管理和整顿劳动组织的经验之《中共中央致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信》等等。

收入的书信,有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同志的信电,内容有关于矿山的开采管理问题;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问题;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决议事项的办理问题;军委会议和政治局、书记处开会情况;宪法起草工作;向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报告稿的修改问题;向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问题;送审陈云同志有关经济工作的意见和讲话稿等等。

还有致邓小平、陈云、彭真、彭德怀、罗荣桓、李富春、张闻天、薄一波、杨尚昆等的信电。

还有致起义将陈明仁信、致华昌丝厂工会并全体工人同志信、致安源镇工会范明庆信和致亲友信等。

收入的题词有:为“六一”儿童节、为中央民族访问团、为纪念任弼时、为抗美援朝书画义卖展览会、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昌舰、为日本商品展览会、为学习雷锋、为河北省抗灾抢险展览会、为纪念万隆会议、为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题词等。

(五)

《刘少奇手迹选》仅仅是他大量著作中的一小部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几十年如一日,为党的巩固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建立了不巧的功绩,可知他赢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决非偶然。

刘少奇同志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勤于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并善于他把实践经验提到理论的高度,他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在职工运动、白区工作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在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文化教育事业、外交工作等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少奇同志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捍卫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为巩固和发展党的队伍,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为党的生活基本准则,为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言行一致,他对广大党员提出的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实践了,堪称全党楷模。

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进。我们相信《刘少奇手迹选》的问世,必将启迪和激励广大读者,努力学习和继承少奇同志的博大革命精神和风范,更加满怀信心地奔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的锦绣前程。

1993年11月

叛徒的末日，恶棍的下场

(根据1994年10月23日吴瑞林讲话录音,由田逢禄整理)

今天我们讲“叛徒的末日,恶棍的下场”。

这个问题发生在三十年代初,东北军驻天津的时候。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领导人,天津市委书记,解放后的一机部的部长黄敬。陈伯达那个时候也在天津搞地下工作。东北军张学良,那时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共,抓人。东北军里边有一批共产党员。给我揭发情况的人,既不说名,也不说姓。这个人说话的口音,好像是河南的商丘或山东曹县边上的人,鲁西或豫东边上的口音,可以听得出来。他说,当时东北军的51军24师的侦纠处长,这个人叫谢芳,共产党员,把陈伯达给抓住了。陈伯达是个草包,他把地下党的全部情况都讲了,交代了。给我讲情况的人说,是航报部一个姓陈的处长,派一个参谋,把他带来了。他说,他已经把这个事情写好材料,于1948年10月4日交给×××了。×××当时是付总长兼北京卫戍司令,是林彪的干将。他觉得这没问题,就把材料交给×××了。而×××根本没有把这个材料交给党中央,既没有交总理,也没有交主席。他把材料交给陈伯达了。他想了几个月,觉得不行,就找到航报部。航报部当时在天津支左。航报部姓陈的处长据说现在已病故了,一个姓张的参谋把他带来。他说姓陈的处长说:你有重要的问题,可以去找海军的吴付司令,他在南海舰队打了很多仗,86海战,627空战,你们都知道,他是坚决执行毛主席、周总理指示的人。我记得是1969年的1月4日,早晨两点钟他打电话,我的秘书接了电话。他说有一个人要找吴付司令,亲自谈极其重要的问题,他说我同意他来。航报部的人都知道我的工作习惯,早晨七点钟吃饭,吃饭以后,或者是开会,到会场去了,或者是到办公室去了。正好到了七点,我下来吃饭,到饭厅里准备吃饭,他们两个人进来了。我说:好,田秘书早就告诉我了。他说,我是当年做地下工作的,吃了不少苦头。他说我是地下党的天津市委的联络员。我说你当联络员,我当交通员,我们是同行。我过去当童工,入了团以后当交通员。他就感觉到很同

情。后来我说，好吧，先吃饭，吃了饭再谈。那时候做饭的老师付是吴师付，共产党员，他又炒了一个白菜，一个菠菜，加了两个菜，下了两碗面条。我们几个人一起吃了饭以后，我看他不愿意讲，在楼下接待室里他不愿意讲。我说，走吧，我们到楼上我的办公室里，没有什么人，他就给我讲了。他说，三十年代初，东北军驻天津，一个人叫谢芳（就是后来在高等军事学院国防大学的前身的谢芳），把陈伯达给抓了。文化大革初期，陈伯达一上台，就把谢芳抓了。当时，陈伯达不知道他是个联络员，是灰色的，在天津搞一些文艺活动，掩护工作。陈伯达交代的问题，他全部交给天津市委书记黄敬了。黄敬一看，就把它隐藏起来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隐蔽了几十年。从三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整整三十多年了。我知道是在1969年。当时我感到这个问题很重要。他讲完以后，是上午九点。要找总理讲话，必须是上午九点，下午三点，晚上九点，别的时间他不接，特别的军事情况例外。我就要总理，我说有极端重要的情况，报告你，看什么时候，时间不会长，但是这个事情必须要你知道，报告你。总理说：好吧，你现在就来，你到人民大会堂，走北门，有人接你。我就去了，把这个情况向总理报告了。我说把材料交给×××了，问总理，总理说不知道，他说他准备问问主席，说主席也不知道。陈伯达被捕以后，1937年从福建到了延安，给毛主席当秘书，在领袖的身边，在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身边，知道我党内的很多情况，我觉得很不妥当。特别是在南海工作的时候，在广东工作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他去了，我们一般的都称他是秀才，唯独×××这些人称他为状元公，拱手，状元公。他是什么状元公啊！他无非是多读了几年书而已。有文状元，也有武状元嘛！我们拼死拼活打了那么多仗，也没称个什么玩艺，他称什么状元公？听起来很不舒服。不光我听起来不舒服，有些人听了也感到不舒服。唯独×××称他为状元公，当然，中央机关有些人也称他为状元公。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大，就报告了总理。总理说，这个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我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要报告主席？总理沉默了两分钟，考虑沉默了两分钟后说：现在这个问题条件还不成熟，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我反正是听总理的，我说：那我就等你的指示吧。

后来，党的九大的中间，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发下来的时候，头天晚上发下来的，因为我要回来处理工作，没有看。我记得大概是5月20日左右发下来的，交代表协商、通过，以后选举。我刚要准备看的时候，服务员来找我了，说海军的吴付司令，大会秘书处有人找你，在楼底下，要接你，有事。我说好吧，就向组长请了假。组长是刘亚

楼，整个代表团中南组的组长是罗荣桓，副组长有三个，一个是刘亚楼，一个是黄永胜，一个是陈再道。罗身体不好，就由刘来传达。楼底下有大会秘书处的一个红车，就把我接到人民大会堂，直接开到西北角一个小的停车场，进到四川厅。我一到那里去，就看到董老坐在那里，董老站起来跟我握了手，我敬了礼，董老紧紧地跟我握手。董老问了一下会议的情况，会议的问题。我就向他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我说，这次会议，开始我不愿意当代表，我发现了问题，我发现他们在搞鬼，利用群众组织，选什么人，不选什么人。我说我写了报告，总理批评了我。西北组的组长，夏明瀚，兰州军区的政治委员，现在人还在。还有一个人叫张达志，去世了。总理说，你这个报告送到我手里了。我说我写就是写给秘书长的，总理是秘书长。我写报告，不当代表，总理批评了我。总理说，你不当代表，人家会顺水推舟的，你不当谁当啊！让那些造反派当吗？现在很多人都在争啊！我写这个报告是有针对性的，我看到有些不正常。本来中央的规定，是由过去的领导人，党委的常委提出意见，然后再组织进行协商。而我们海军，则是由李作鹏先跟派派们的头头进行协商，圈定了，然后由我来组织进行协商。我拒绝了。因为我感觉这个不对。我听说广东也是这么干的。上海也有人说，上海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是有针对性的来写的。实际上，我是针对他们的这种卑鄙办法，揭露他们的。总理批评我了，跟我说了以后，总理当场拿火柴把它烧掉了。我谈了以后，董老说，这是总理曾经讲过的一件事情，没有通知你，是时机不够成熟，现在时机成熟了，总理让我跟你讲，需要你说话了，×××就在你们组，你可以质问他，你问他去年10月份那个揭发信送到哪里去了？当场一问，我们这个组18个人都很紧张，都问他，你这个×××怎么搞的，你送到哪里了？质问他。他说：送给上面了。送给上面，送给谁了？他不说不说，他拒绝说。这样就把×××的问题弄出来了。×××的问题出来以后，就把陈伯达的问题扯出来了。当时董老问：你理解到我的意思没有？我说我理解了。董老说，你说说你理解的意思是什么？我说需要毛主席说话。这是第一。需要毛主席说话，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少死人。董老微笑着跟我握手。他说，你理解的很深，就是这么个意思。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排上了名了，结果暂时弄个中央委员，把付总长也撤掉了，卫戍司令也撤掉了，调到成都军区当付司令去了。

×××这个坏蛋，在林彪住广州的时候，解放战争中在东北，他给林彪送东西，送吃的，特别是在广州，问题就更多了，做了很多坏事情，搞破坏，连毛主席的指示他都破坏嘛！援越抗美，他破坏嘛！打匪船，由于他的破坏，使我少

打了六条蒋介石的军舰匪船。这个问题，一直到62年底暴露了。我们都包围了，我们南海舰队的人都知道，蒋介石的舰队出来，我们都掌握的很清楚，都有计划，都有登记。就是他要让跑到越南打；结果跑到南越的××加油，加油到北部湾，从越南一侧登陆，准备进入广西的十万大山，八万大山。在这个时候才发现为什么我们不打掉了。毛主席看到这个材料了，生气了，为什么南海舰队不打？！这个问题，估计可能有情况，估计可能有些问题，陈老总说：我跑一趟，我去广州，我一定把吴瑞林提拎回来弄清楚。如果是吴瑞林的事，我就把他带来，带到北京来。当时我说：陈老总，我们对蒋介石的这几条舰船，不仅南海舰队的同志，而且机关的同志都参加了研究，都有具体方案，第一次包围，第二次包围，第三次包围，每次包围都没有这个情况。这个材料军区有，我们报了军区，也报了海军，总参谋部也有，你可以去查。上面，你可以查这些。下面，你可以到观通站，几时几刻那一天，那一小时，几刻，都有详细的登记。陈总可以查上面到军区作战室，当场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舰队的，我就不给你了。舰队的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我们舰队的领导同志都在，我在家是如此，我不在家也是如此，凡是打仗都是集体讨论研究决定的。陈老总说：哦，那我搞球错了，我叫你站了20分钟，坐下坐下坐下，对不起，坐下坐下。我也不到下面去看了，我就到军区去看。先看军区，回去看总参谋部，再看海军。所以，这个12海里的问题大，使我们少打了敌人六条舰船。我们的作战方针，决策，我们的作战司令、付司令都在，参谋长都在，作战处下面的人都在，当时下面的情况怎么样，我是怎么处置的，我的决心是什么，第一次包围，第二次包围，都有。结果，这个情况，陈总看了以后说：你不跟我去北京了，谈的太具体了嘛！责任不在你了。是在军区，还是总参谋部？我还要查清楚。后来查清是×××干的。他提出12海里的问题，借口怕打到外国的军舰，怕出事，实际上他是在搞破坏，破坏我们的作战计划。我们只打了十一条。×××这个恶棍，我可以理他，也可以不理他，你是付司令，我也是付司令，后来的方正平也是付政委，我们可以不理他那一套。可是他利用林彪的名义，那我就不敢了，因为林彪是国防部长，管军委的第一线。

毛主席是采取分割解决的办法，先解决×××的问题。因为×××是林彪推荐的，他就有责任，主席警惕了这个问题。同时，主席警惕陈伯达是个坏人，在主席身边那么多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当文革小组组长，整死多少人！江青还是付组长，再加上康生这伙子人，他们整死多少人！这个事情，现在还有人不清楚，我想把它讲出来，录下来。

为什么在1969年1月份没有采取措施,而是在党的九大的时候,在有理有利之时,求得把问题彻底解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确是有毛主席说话,才能把问题解决。因为陈伯达是毛主席的秘书,而且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又是文革小组组长,必须主席说话才行。而×××是林彪的人,林彪又是付统帅,×××是付总长兼卫戍司令,掌大权,整彭老总,整贺老总,整陈老总,整这些元帅们,把彭老总关在牛棚里头,把贺老总关在西山,想吃一点猪肉,吃一点猪肝,不给,坏呀!×××这恶棍,混进高级领导层,做了很多坏事情。

陈老总回来把问题查清,报告主席以后,毛主席说:以后海上作战,一律归南海舰队指挥。这是1962年的事。陈老总说为什么改变中央的计划?12海里是从哪里出来的?查的结果是×××提出来的。当然总参谋部也有责任,怕出漏子。我们不会出漏子,我组织一系列的工作,我先整了部队,整了观通站,整了勤务团,整个部队都进行了整顿,要不可以打17条,有6条放跑了,结果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坏蛋做的坏事很多。现在我们中央的领导同志都没有人知道的,包括小平同志,彭真同志、陈云同志、薄一波这些同志,他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当然,总理给他们讲过没讲过,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我必须把它说清楚。

所以,党的九次代表大会,先解决×××的问题,主席已经很清楚了,以后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会议上,把陈伯达的问题也提出来了,解决陈伯达的问题。

这个事情我是报告总理的,没有报告董老。所以董老找我谈,他说总理太忙了,身体还有不舒服的地方。我知道总理有心脏病,但是不知道总理有癌症。他说总理一是忙,二是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总理让我跟你讲,有很多事情总理都跟我讲了,总理的总司令的指示你都执行的很好,要我来告诉你。这个问题处理的过程就是这样。

×××的问题,陈伯达的问题,六十年代初才暴出来。多少年的问题,作威作福,做了很多坏事,连主席的指示都不执行。实际上,打仗都是毛主席定的,援越抗美是毛主席定的,南海歼灭之战是毛主席定的,是中央决定的,保卫领海的完整,这都是中央考虑决定的,有正式文件的,他公然反抗。

这个历史情况,我想把它记录下来。现在写不行了,我的眼不好,不能写。本来应该是写成文字,送给中央领导同志。现在我眼睛不行了,只好录音,把它记录下来以后,送给中央领导同志,让中央同志考虑去。

最后处理,最后公决,历史反革命分子,叛徒,恶棍,遭到公决。审判四人

帮，审判黄吴叶李邱，四人帮包括陈伯达。

这个问题，我曾经提出过，遭到有的人反对。那时有些人不清楚，不掌握重要情况。我说我去参加写，不同意。而是弄了个坏蛋去，弄了个付参谋长，原来是个情报科长，情报处长，后提为情报部长，付参谋长（叫×××？）去。当时我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我已经挨整了，不让我去。所以我现在必须把它记录下来，准备送给中央。这就是今天我要谈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本来我的问题是明确的，韦围请当主任的时候已经解决了的，结果一直拖到后来害人，使很多人犯错误。所以，我不能把它带到火化场去，不能不让中央知道。这个问题，我早已下了决心要录音。这是今天讲的第一部分，极其重要。

在党的九次代表大会时，我又看出他们上海、广州、总参、总后、海军、空军提中央委员的问题。我又写了一个报告，提出我不当中央委员。这个有简报可查，登在简报上，简报发给主席团。肖劲光说：老吴啊，你写这么大的问题，不跟我商量一下，我也写一个吧。我说：你呀，不应该，海军，你必须当，中央委员，海军你必须当。我写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后来才知道，王宏坤也写了，张秀川也写了。晚上我的门的钥匙我是拿起走了，他们找服务员把门开开，把我的抽屉开开，看了我的稿子以后，他们也写了。他们写的时间跟我不一样，都登了简报。这一些人，扇动也好，……也好，有的人还不是党员，来参加会，要当中央委员，临时突击介绍入党要当中央委员，这种怪情况。我写出了这些，登了简报，毛主席会看到，大家会清楚，我吴瑞林是什么样的态度。计数的时候，少五张票，其中有我的一张票，我自己没有投我自己的票。海军里边，我的票数还相当多，这是可查的。

这个录音，再复制一份，一份送中央，一份留给我的子孙后代。我这个人挨整，我反复想过，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党的，没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更没有什么对不起同志的。对叛徒、对恶棍，我是毫不客气的，这是我一贯的。我从小时候，对地主，对地主的剥削，地主收租子，糟蹋贫雇农佃户的妇女，那些我都看在眼里，我一定要打倒地主，我从小就立下这样的志向。加入团以后，哦才知道什么军阀、官僚，要打倒军阀官僚，要推翻旧社会，这是我入团以后的志向。一直到现在，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挨整了，我毫无怨言。但是，这些情况必须报告党，我认为现在是时机，小平同志还在，彭真同志还在，陈云同志还在，陈云同志是看了简报的，是看了简报上我写的材料的。薄一波他们是都被关了的，挨过整的。所以要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带子上送，另外复制一份留在家

兰台稿存

里,给我们的孩子们,这是时候了。不然我的孩子不知道,糊里糊涂挨了这么多整,而且牵扯到我的儿子、女儿、儿媳挨整,你看××的头发都搞光了,关的,搞个终身残疾。我们刚刚生下来几天的孙子,都挨整嘛,“913”,他是九月四日生的,都挨整,几代人挨整。所以,把这些事告诉中央是应该的,告诉我的孩子们也是应该的。

毛泽东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 理论与实践^①

王根广 齐得平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得好,党就团结,就进步;否则党就受损失、遭挫折。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毛泽东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遭受严重曲解和割裂,以致现在有些人一提起批评就与“整人”联系起来,在党内外造成不良影响。

347

毛泽东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理论的要点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问题上,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就要停止。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反对消极情绪和自由主义。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象天天扫地洗脸一样,防微杜渐,把错误思想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这是我们党防止腐败的有力武器。

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问题上,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之一。我们党不惧怕批评,因为我们党没有任何私利,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党的事业,我们的同志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牺牲生命在内,那还怕批评我们存在的缺点错误,而不愿去改正吗?因此,要求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共产党员、党员干部,都要接受群众监督,都要执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自觉开展自我批评,尤其党员领导干部,更要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决不允许有特殊党员存在。

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任务问题上,强调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党员政治

^① 此文曾刊于《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上、组织上的错误,不断清除侵袭党的肌体和腐蚀党员思想的政治灰尘、政治微生物,保持党的纯洁性,增强党的战斗力,以完成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问题上,强调必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通过批评或斗争,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两个目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对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问题上,强调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要科学地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并切实执行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他还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好方法,并且可以把它从党内推向党外,推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中去运用。

在判断是非的标准问题上,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围绕党章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批评者应持的态度问题上,主张应该辩证地对待一切: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能讲情面。但是要认真、适当,并注意启发犯错误者自己多做自我批评。分析错误,要注重当时当地主客条件的分析,不要侧重个人责任的追究。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说话要有证据,防止主观武断。既要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又要注意批评的灵活性与艺术性,把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要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不要把批评庸俗化,更不能把批评变成泄私愤、图报复的工具。不能搞大哄大喻,“一言堂”,允许反批评,允许被批评者有认识错误的过程,允许他们申辩。批评者要有为党的利益牺牲一切的精神,不惧怕打击报复,敢于向压制民主的现象作斗争。除了不可救药者外,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促使其向正确方向转化,不能全盘否定,不能歧视和冷落。

在被批评者应持的态度问题上,认为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被批评者应一分为二看自己,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要掌握自我批评的主动权,多做自我批评。具有民主作风,光明磊落,不惧怕批评,鼓励群众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切实执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不要对批评者求全责备,不要计较方式方法。反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的主观主义作风,更要反对挟嫌报复。以积极态度对待错误,善于做转化工作,摒弃消极悲观、自暴自弃和满不在乎两种倾向。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应

率先垂范,做自我批评的榜样。

在批评过程中党组织应发挥的作用问题上,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党章所赋予的权力和义务,维护党的团结,严肃党的纪律,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对党员的监督和教育。保护正确的批评和批评者,纠正错误的批评和违纪现象,指导批评正常开展。对那些错误严重屡教不改的党员,要执行党的纪律。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掌握领导的主动权。

毛泽东不但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倡导者,也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实践者。在为中国人民奋斗的一生中,他始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运用于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工作中。他晚年虽然犯了“左”的错误,但就其一生来看,仍然是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楷模。

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正确的路线,加速夺取政权的历史进程,是毛泽东这方面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批评了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农民和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农民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批评了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不做军事运动的错误,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为党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评了对时局估量上的悲观情绪,不愿做艰苦工作创造农村根据地的流寇思想。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他领导全党逐步清算了几乎葬送中央苏区的“左”倾路线,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与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党的奋斗方向。抗日战争时期,他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制定了对大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方针,坚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和领导权,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导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他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形式,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经验,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范例。他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批评了能否打败国民党的怀疑论和惧怕美帝国主义等思想,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夺取胜利的信心与决心。1948年,他又领导了整党运动,保证了土地

改革顺利进行,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参军支前的积极性。

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巩固发展党和政权,是毛泽东这方面实践的又一重要内容。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预见到全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的骄傲情绪和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这个预见在全党发生了深刻影响,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1950年,毛泽东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整风运动,接着又领导了“三反”、“五反”运动。整风整党对于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组织状况,起了重大作用。在此期间,他还为党中央起草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及《解决“五多”问题》等党内指示,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报告。这些指示和报告,对克服官僚主义,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增强党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中,他批评了革命意志衰退、热情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闹名誉、闹地位的现象多了等倾向,勉励大家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他还批评了把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对立起来的观点,论述了政治、经济、技术的辩证关系,为党员和知识分子指明了一条又红又专的道路。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批评了党内民主问题上存在的错误,深刻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党的民主建设起了重大作用。总之,由于毛泽东从严治党,极大地消除了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的现象,使党经受住执政的考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毛泽东不但是批评的楷模,也是自我批评的典范。他无论在会议讲话里,还是书信中,只要认识到自己错了,就坦诚地自我批评,表明了一个无产阶级领袖应有的品格。

1944年11月21日,在复郭沫若的信中,他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他的评价时说: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犯过错误,决议案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

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过错误。这些东西都没有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在七大总结报告中谈到审干问题时,他又说:审干搞错了许多人,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1945年2月15日在延安中央党校讲话时,毛泽东说:前年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别的地方搞错了,谁人负责?也是我,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1953年8月12日,在全国第二次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从六个方面做了自我批评,其中谈到有人撕他的像时说:过去在延安,雷打死了一个县长,有人说,雷怎么不打死毛泽东。我得出一条结论,公粮是要的重了!……撕了我的像,因为他认为不好嘛!因为干部危害了他们的利益。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千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4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帐……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公开改正。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又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毛泽东对自己性格中的缺点同样勇于自我批评。1921年1月28日他在给彭璜的信中说: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1944年10月25日他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报告中说:我曾经发过很多脾气。解决了问题没有?没有。……因为这脾气伤了他们,心里是难过的,人家也难过。你们要引以为戒。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曾数次因批评错误路线而受到处分。在错误处分面前,毛泽东毫不气馁,不退让,而是继续钻研马列主义,坚持做社会调查,进一步认识中国国情,探索革命的规律。这种处于逆境而发愤作为的精神,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出版毛泽东手迹应当严肃^①

——评赵德昌主编的《毛泽东手书宝典》

齐得平

《毛泽东手书宝典》，主编赵德昌，1993年12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正文550页，前头有主编写的“序言”。“序言”中说：“本《宝典》收进了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重要手书，其中有些为首次正式发表”。

笔者一见到《毛泽东手书宝典》，喜出望外，非常高兴，一口气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不料发现其中有重要差错，为防止继续以讹传讹，有些问题需要澄清，现举例写出，供编者、出版社和广大读者参考。

一、误以假当真

《宝典》第333页这个“题词”，编者说它是毛泽东“1940年为军委机要工作的题词”。从书体看，这不是毛泽东的手迹，而是别人摹仿的。这个所谓毛泽东题词和当年毛泽东的书体毫无相同之处，熟悉毛泽东书体演变的同志，一眼便可看出真假，细心的读者如同当年毛泽东的手迹对比，亦可分明真假。看来摹仿毛泽东字体的人，对毛泽东当年的书体并不真正了解。下面是毛泽东当年的手迹。



^① 此文曾刊于《档案学通讯》1995年第2期。

2.《宝典》第 529 页这个“手迹”这句话，是 1948 年 4 月 2 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第三段中的一句。它根本不是毛泽东的手迹，是别人书

毛泽东

我们的报纸
也要好好大
家来办
全党人民群
众来办
全党人民来
办，而不能
只靠少数人
办好。

写的。据我所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根据谈话记录整理而成的，并无手稿。

三、擅自改变手书

1. 1936 年 10 月 5 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是毛泽东用铅笔写

的。原稿一直保存在中共中央的历史档案中，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原手稿第 1 页第 8 行中“只要国民党军队不向红军进攻”一句中的“不向红军进攻”这六个字，是毛泽东当时亲笔划掉了的。请看原稿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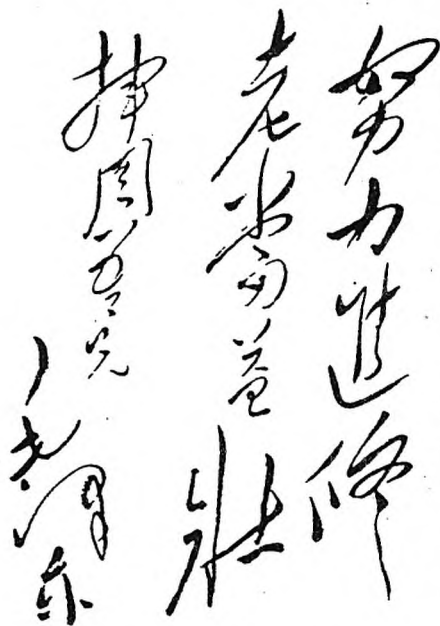
而《宝典》中（第 406 页）却将“不向红军进攻”六个字恢复起来。编者是从那儿搜集到这篇手迹的，我不晓得，为什么要将原稿中毛泽东划掉的内容恢复起来，是何人所为，亦不得而知。这封信早在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派各军各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并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仅不承认和平解决内战的态度，而且当红军的军事进攻时，还在湘南等军深入陕甘地区，先其所作，即部队相持，相持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门区在执行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向红军进攻，不向红军的抗日斗争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的政策是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以静待国民党当局之覆辙。但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因在特殊的方式上，与国民党当局之覆辙。因此，国民党当局，是内战与无战。因此，中国国民党政府，如能顾及中国民族之利益，决不出兵，决不出兵，决不出兵。

1983年已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信末尾注明“根据手稿刊印”。十年后,《宝典》却将毛泽东亲笔勾掉的内容恢复起来,并出版发表,不知是何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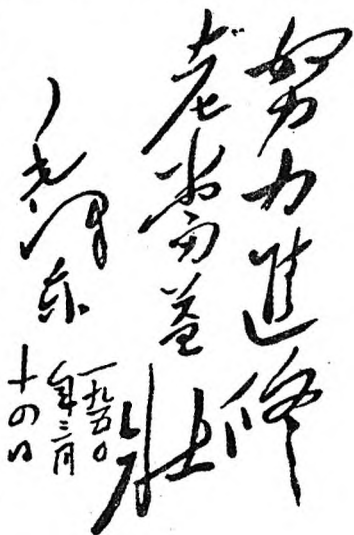
二、此信原稿中“本人因在军队中不便写信,故由周子文代写,但本人仍亲笔题词,此信作周子文手迹,与周子文手迹不同,特此声明。”



2. 毛泽东给挥周的题词,原稿收藏在中央档案馆里,为何人所题写的清清楚楚,原本是附在1950年3月14日毛泽东写给张挥周的信之后的。张挥周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这幅题词已经编入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题词墨迹选》(中央档案馆编辑,人民美术出版社、档案出版社出版)。《宝典》(第377页)中这幅题词却改变了模样。第一点,“挥周吾兄”四个字被删掉了,看不出是为何人所题;第二点,署名“毛泽东”三个字向上提了两个半字的位置;第三点,将毛泽东给张挥周信

上落款处的“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移到了原题词“毛泽东”署名之下的位置。显然是经过精心考虑后重新组拼的,不知这又是何故?

3. 1950年9月11日毛泽东给陈郁同志的信,《宝典》中(第299页)上款却少了“陈郁同志”四个字。其实原稿上“陈郁同志”四个字是有的。198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辑的《毛泽东书信手迹选》中收入此信,是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原稿照相制版的。我想《毛泽东书信手迹选》这部书《宝典》编者应当见到了的。《宝典》一书在《毛泽东书信手迹选》出版十年后编辑出版,信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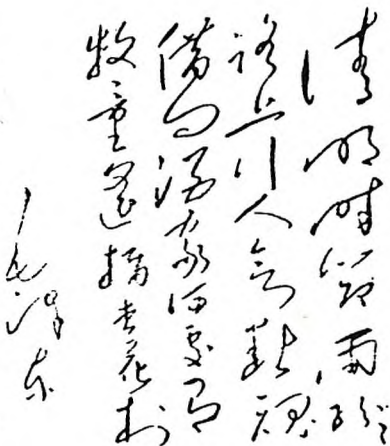


竟却少了收人的姓名,读者看了会疑惑不解,毛泽东怎么写信连收信人的姓名都不写呀!亦不知这是何故?

4. 毛泽东1951年题写的“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和“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两幅题词,原稿上都落有“毛泽东”亲笔署名。《宝典》第162页和第196页上只印有题词,“毛泽东”亲笔签署的名字却不见了。不知编者为什么将“毛泽东”的亲笔署名去掉?

5. 毛泽东手书古诗词多是工作之余,当作一种休息而写的,且多不署名。杜牧的《清明》一诗的手稿末尾并未具名。《宝典》(第525页)上这首诗末尾却有“毛泽东”的名字。看来“毛泽东”三个字是从别处移来拼在一起的。

在这首诗下边编者写的说明是“1961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饮过杏花村汾酒后,题写了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诗》。”从书体看,这幅手迹的书体同“说明”的年代的书体是不相吻合的。不知编者根据何在?



《宝典》中收入的毛泽东手书多幅被改动,这是很不严肃的,是不许可的。其道理,编者是应当懂得的。这究竟是何缘故?是需要请编者给以回答的。

四、无说明和说明不对

编者在《序言》中说:本《宝典》“对每件手迹都注有写作时间、背景、为谁题写”,其实并非如此。

1. 无说明。例如1940年为五四青年节题词“目前中国青年的唯一任务就是打胜日本帝国主义”(《宝典》第359页)、1943年为八路军留守兵团在延安南门外举办的生产展览会题词“一切为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宝典》第62页)、1951年1月15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 保卫国防”(《宝典》第237页)、1952年4月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一面工作 一面学习 注意业务 又注意政治”(《宝典》第301页)等都是如此。1941年冬为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题词中极

为重要的一幅。《宝典》(第317页)只说是“毛泽东题词”,不能帮助读者了解这幅重要题词的意义。

2. 说明不对。

(1)

“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

无 上 光 荣

毛泽东”

《宝典》(第398页)说这是“为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题词”。其实不是。这幅题词手迹是1967年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移交到中央档案馆的。移交说明书中说“在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酝酿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烈士陵园,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为陵园的建立,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题词‘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 无上光荣’”。“大会结束后,由参加大会的晋冀鲁豫代表团带回。1946年3月27日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在邯郸建立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送交陵园。”另外有一种说法,说这是“毛主席1953年为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的题词”。从书体看,这幅题词象是1945年的,而不象1953年写的。1983年我们编《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时,为查准是何时为何处所题,写信向杨老请教。杨老说他未经过手,不了解当时题词的情况,将信转交当时他委派主持修建邯郸烈士陵园的张芥士同志回答。张芥士同志复信说:“我是1946年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委派主持修建这个烈士陵园的”,“在烈士陵园奠基礼之后不久,军委宣传部长张际春同志把毛主席的题词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题词一下交给我的。张际春部长是烈士陵园的建设委员会委员。他告诉我:题词是七大会议期间写的。”我们对这幅题词题写时间的判断同移交单位和当事人的证明是一致的。肯定是1945年所题无疑。《宝典》说是“为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题词”,属以讹传讹。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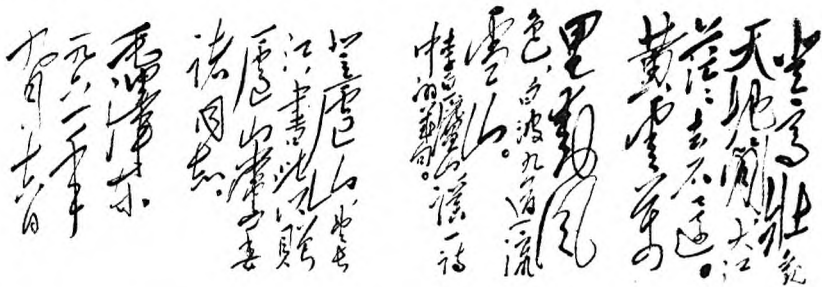
“为国牺牲 永垂不朽

毛泽东”

《宝典》(第399页)说这是“为浙江洞头岛烈士公墓纪念碑题词”是不准确的。为查清这幅题词是何时为何处所题,1983年我馆曾致函浙江省档案局帮助查询。回答称:洞头岛烈士陵园同志说是从石家庄革命烈士陵园(即华

北烈士陵园)复制的。我馆又分别致函河北省民政厅和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查询。回信都说:原件存北京军区政治部。随后,我去北京军区政治部查阅了有关的档案资料。查明“为国牺牲 永垂不朽”这幅题词,是1953年初毛泽东为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题写的。

(3)《宝典》(第139—142页)编者将1961年9月16日毛泽东书赠庐山党委诸同志的《李白庐山谣一诗中的几句》



这幅手迹的说明写成“1961年庐山会议上书赠常委诸同志”。其中,毛泽东书写的“党”字为繁体草书,编者未辨认出毛泽东草写的繁体“党”字,把下面的一横(即“…”看掉了,误认为是“常”字,“党委”也就变成了“常委”,又把它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就将说明写成了“1961年庐山会议上书赠常委诸同志”,成了笑话。

《宝典》中类似上面的错误还有,为节省篇幅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五、《宝典》编者认为自己可以出版和发表毛泽东手书,这是完全不对的。

出版和发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是一项很严肃的事情,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早在198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经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审阅同意的国家档案局《关于开放历史档案阅览的报告》中就明确规定党和国家的“档案是党和国家的历史财富,公布和出版历史档案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公布权属于党和国家,由党和国家授权档案馆执行,特定档案由党和国家授权有关部门执行,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均无权公布和出版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由国家授权的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公布;未经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公布。”为了维护出版这类著作的严肃性,保证出版质量,中央早

有明文规定。199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闻出版署又联合发文,除重申认真执行以前的规定外,特作出补充规定。对有关规定,编者和北岳文艺出版社应当是知道的。《宝典》这本书是否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我不得而知。我想,如果书稿报送主管部门审核,书中的许多错误也会纠正。看起来出版《宝典》这本书未按有关规定办理。

《毛泽东手书宝典》这本书中的问题说明现在我们的出版工作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地加以整顿。

以上意见如有不当和错误之处,请《宝典》编者、出版社和读者批评指正。

1994年12月

毛泽东科学明哲的论断和主张^①

——中共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委

齐得平

中共八大党章为什么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是一个被讨论已久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曾被作为刘少奇、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条主要“罪状”，以后，虽曾有许多学者就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见解，但时至今日，还有一些海外出版物提出与史实完全不符的论调，很有必要加以澄清。早在1966年10月，周恩来在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时，针对有代表提出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回答说：“八大党章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现将笔者所见有关资料列举如下，借以说明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毛泽东本人多年来的一贯主张。

1948年8月13日，吴玉章为了准备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致电周恩来说：“华大号日（‘号’是韵目代日中的20日——笔者注）成立典礼，我想在大会上说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作如下的定义：‘毛泽东主义，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向前的发展，它是以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而产生出来的’。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毛泽东于8月15日电复吴老，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

^① 此文是作者向纪念中共八大40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供的论文，先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后又收入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纪念八大4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的信中进一步提出:将“青年团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一点,请会商决定”。1948年12月下旬,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草案)》时,将其中“在青年团员与青年群众中,广泛地进行毛泽东思想的系统的教育……”,修改成为“在青年团员与团外青年群众中,广泛地有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教育工作……”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总则中的“它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团员”改成为“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教育团员”;并把《草案》中另两处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作了类似的修改。随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写信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冯文彬说:“关于青年团的决议和团章已看过。写的简明扼要,完全可用……有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下。请你们考虑是否应在一月一日至五日的中央会议上通过……似以通过一下为好。如果不必在此会上通过,可即于一月二日以后发表。”因1949年1月初各地开青年工作会议,故决定将建团决议按照毛泽东的修改,1月2日由新华社播发,3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个决议。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针对王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所以,不要做这种定义。”

“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所以现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

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作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审阅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示（草案）》时，将其中国歌歌词应注会之“（3）毛泽东思想”改为“新民主主义”。

1950年8月19日，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央政治局同志同意，将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选集》将《决议》中的“毛泽东思想”改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或者删掉。

1951年7月20日，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会议上所作《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而奋斗》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以‘星火之火’到全国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广泛传布并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相结合的发展过程，就是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发展过程。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指针。”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在上文最后一句的“毛泽东思想”后面，增加了“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这种思想”21个字。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时，将提纲中“毛泽东思想”5字勾掉，并批示：“邓拓同志：此件已阅，……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草案）》、《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宣言草稿》时，将其中5处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全部勾掉，并批示：“彭真同志：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字删去。”

1953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军训部部长萧克报送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命令、队列条令三个草案的报告上批示：“萧克同志：（一）可以付印；（二）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如内务条令11页）”。

1953年6月4日，毛泽东在对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队第二期教育计划的批语中又写道：“彭德怀同志，此件还你。未细看，望了一下，有几处修改。”在其

中一处就是删去了训练要求的第一条“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5个字。

1953年6月审阅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团代表大会报告的附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修改草案草稿》时,将《团章》总则第二条、第一章第二条和第五章第二十五条中三处所写的“毛泽东思想”字样全部划掉。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第二次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1954年4月1日,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关于颁发毕业证件的请示报告时,将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

1954年12月5日,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起草,经毛泽东修改,中央几位领导同志传阅后发出的中央宣传部通知说: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必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的著作’等字样。”其中最后一句是毛泽东审阅通知稿时加写的。这个通知下发时离宣布召开八大只有3个月,离八大召开也只有1年9个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955年10月20日,在由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八大新党章修改稿初稿中,已经没有七大党章中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了。在初稿之后,新党章又修改了5次,才向八大提出修改稿。在这5次修改中,也没有哪一位中央领导提出加进七大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的部分。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修改稿后批示:“退小平同志:两件改处都看过,同意这些修改。”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早在八大前,多次在中央文件和有关文件上删去“毛泽东思想”,并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的正是毛泽东自

己。二、毛泽东不同意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同意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提，而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的提法，是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误解。三、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经中央书记处同志和中央秘书长传阅后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等文件，已经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坚持的意见集体作出的决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而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委。

1996年6月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红军东征^①

耿仲琳 田逢禄 唐 群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作出了红一方面军东征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红军进行的东征战役,表明我党我军决心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联系起来,紧急动员全国民众,猛烈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发展中求巩固,实现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一、红军东征的缘起

365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甘苏区,终于找到了一块落脚点。但是,这块根据地作为新的革命大本营还太小、太穷,也不够巩固,仍然面临被“围剿”的严峻局面。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号召:“从现时起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在这个报告中已经蕴含着去山西的思想。当天晚上,在给张闻天的电报里,他明确地提出东讨阎锡山的思想。电报说:“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第二天,他同彭德怀致电张闻天、周恩来:“如阎军渡河西向,我军开进决迎击并准备乘胜渡河东向。”

当时,关于战略攻击方向的选择,有三种意见:毛泽东主张向东,张闻天主张向北,彭德怀主张向南。张闻天11月20日及25日给毛泽东写信说:红军主力应迅即向北进攻宁夏,夺取绥远五原、包头地区,接近外蒙,打通苏联,取得国际援助。毛泽东12月1日复电张闻天:“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

^① 此文曾刊于1996年11月15出版的《党的文献》第六期。

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立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彭德怀认为，以现有力量进攻宁夏及五原、包头，是不可能的，有极大的危险性。他建议目前战略方针应以发展关中游击战争，巩固南线为中心。他同意红军突入山西，目的是调动陕北晋军回援，在运动中歼灭晋军，扩大红军，求得在黄河一段巩固发展。林彪也曾提出要到陕南打游击。

毛泽东坚持选择山西为红军的主要作战方向，是根据全国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作出的决断。在他看来，东征将会带来很大的战略利益。

(一)日本帝国主义在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加紧对中国侵略的步伐。蒋介石继续执行卖国政策，阎锡山亲日反共立场十分嚣张。在抗日爱国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红军东征山西，打击汉奸亲日派阎锡山的气焰，宣传我党我军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声援北平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用实际行动号召和动员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山西、绥远地处抗日前沿，如果红军在山西站住脚跟，便于开赴前线直接对日作战；出山西、绥远，还可接近外蒙，便于打通苏联取得援助。

(二)东征山西，可以在阎锡山统治区域扩大红军、补充给养、筹措款粮、征集物资。这样，以主力红军冲破黄河防线到外线作战，一方面，可以减轻对陕北苏区经济上、兵源上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可能在山西创建新的根据地。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即“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

(三)红军东征有利于对张学良、杨虎城等的统战工作。红军选择阎锡山为主要打击对象，可以避免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正面冲突，为西北联合局面创造良好的环境。毛泽东指出：我们“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

二、决定东征山西为主攻方向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瓦窑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23日,毛泽东代表中央作军事问题的报告。经过反复讨论,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并在当天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的报告分三部分:战略方针、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和行动计划。他指出:党的目前战略方针,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实际行动上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把红一方面军的行动与苏区发展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向红一方面军下达了关于40天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

1936年1月17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毛泽东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他指出:今年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及打通苏联。我们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扩大抗日的力量及主力红军。2月至7月,我们的行动在山西。由山西到绥远的转机,要看日本对山西、绥远进攻的程度及我们的力量如何而定。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东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在陕北要扩大自己的力量,使它能担当保卫陕北的任务。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政治局随军行动,陕北组织中央局。常委会议决定:彭德怀、林育英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何凯丰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可参加会议。

三、东征战役全面展开

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2月20日,红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从南起河口北至沟口100余里地段同时渡过黄河,开始了东征作战。渡河成功后,阎锡山急调晋军防

堵,也把入陕的晋军撤回参加防堵。

2月24日,红一方面军为打破晋军的防堵和建立作战根据地,决定:除留一部兵力围攻石楼外,红军主力迅速占领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阵地,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的第二步任务。

面对我军突然攻势,阎锡山一面请求蒋介石派军队来晋增援,一面把能够机动的军队集中起来,组成4个纵队向我反击。我军主力奋起还击,将敌两个纵队击溃。我河西红28军乘入陕晋军东撤之际,进占了宋家川、吴堡等重镇,收复了陕北苏区一部分被占地区。阎军节节败退。3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为进一步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在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决定分兵南下北上:以红1军团全部及红15军团1个师为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迅速占领临汾、洪洞、曲沃等县,视情况向晋东南行动;以红15军团两个师为左路军,在掩护红1军团南下后,北上相机占领文水、交城,直逼太原,向晋西北行动;以总部特务团和黄河游击师组成中路军,转战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敌军,担任控制渡口、交通等任务。此时,红28军已进入神府地区,收复神木、葭县大部失地后,向黄河沿岸活动,策应东岸红15军团行动。

当此东征开始之际,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分别在晋西大麦郊上贤村、隰县石口、石楼城西四江村等地召开政治局会议,通称“晋西会议”。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红28军向东调的可能性和正确性,指出向华北发展不会动摇陕北的巩固;有民众的援助和支持,不但要在山西争取对日直接作战,还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中进行运动战。在27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还论述了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即:(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义与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区别开来,要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使民族改良主义中的右派同蒋介石进一步分离,使其中的左派同蒋决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三)向蒋介石提出的五个条件,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对李克农的外交训令,今天仍然适用。此外,毛泽东还代表中央提出了对张学良的策略。这次会议,是瓦窑堡会议的继续和重要补充,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确定了红军的行动方针。

3月下旬,阎锡山将已调入山西的五个师编为第五、第六、第七纵队,将其他调入山西的三个师三个旅集结在同蒲路南段和晋东南地区。蒋介石派陈诚担任入晋军队总指挥,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敌军首先夺取我军控制的黄河

渡口,采取堡垒战,企图歼灭我黄河东岸的主力红军。

红军抗日先锋队总部鉴于此种情况,于4月3日决定:逐步收拢兵力,准备集中歼敌。经过转移和激战,实现了我左右两路军集中的计划。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在致周恩来、林聂、徐程、叶杨电中指出:在山西,阎锡山、蒋介石军队共有51个团,采取堡垒主义向我围攻;在陕西,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杨虎城向陕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但陕北神府地区、三边地区和甘肃环水地区及其以西均空虚。“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我军决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渡河时机、渡河秩序及集结地域之区,分别命令定之。”“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

四、东征战役的重大战略意义

5月2日,红军抗日先锋队总部下达西渡黄河的命令,至5月5日全部渡完。东征战役是一次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在历时75天的作战中,共消灭敌人约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炮20余门,迫使晋绥军由陕西撤回山西。红军取得江河作战经验,提高了战斗力,扩大新兵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征集大量物资,并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5月初,红军西渡黄河后,毛泽东在陕北交口政治局会议上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在总结东征战役时指出:红军东征动员了全国,军事上、政治上打败了阎锡山,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推动了各派军阀的反蒋运动。红军执行了政治任务,对山西和全国都有动员作用,说明红军是抗日先锋队,人民的救星,说明红军是有力量的。我们的同志中,长征以后觉得自己小了,山西的胜利,扫除了这种观念。我们打败了阎锡山——西北第二个大军阀,其各部皆受重创与打击,商震也吃了一点亏,攻开了两城,消灭了一些民团和封建基础,扩大了红军,争取了资材,陕北敌人退出,总之是胜利了。他还具体分析了战役的得失,指出山西行动的主要缺点,即未立即出河北。后来蒋以

51个团来时,再到河北去,则危险了。此时已不能挽救。因此,一着之误,乃失去了在山西创建根据地的可能。隔断归路,是无论如何不许可的。保持后路,是战略上的一个原则。

瓦窑堡会议后,我党我军在红军东征期间,一面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准备东出同日军直接作战;一面采取实际措施,进一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是我们开展新局面的关键。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统一战线的力量,需要各阶级、各政治派别“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力量,同时在党内也要反对关门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国革命的力量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

但是,如何把抗日和革命力量汇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战线呢?这是我党我军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权的关键。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动东征战役,既声援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又促进了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在山西20多个县的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号召和动员群众抗日救国。党的正确主张和东征战役的进行,动员了山西民众,也动员了全国民众起来抗日救国。

在东征战役进行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主动发出信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这个工作对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行动。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首先取得重大的胜利。

“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体现了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打击反动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发展革命势力的策略思想。在新的全国大革命即将来临的时候,为扩大红军力量和巩固苏区根据地,准备东出直接对日作战,毛泽东提出应大胆地采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到外线去打击卖国贼阎锡山,调动他入陕的四个旅兵力,避免新的“围剿”,是正确的决策。通过东征战役,可以说达到了打击阎锡山、逼蒋抗日的目的。

毛泽东保护北京文化古迹纪实^①

郑淑兰 齐得平

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北京解放四十八周年。在此之时,我们将毛泽东关于保护北京文物的指示作一介绍,以帮助读者了解当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

祖国的首都北京曾是金、元、明、清等朝代的国都,建都历史达七百多年。由于历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创造,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文物古迹。在北京即将解放之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对于如何保护我们中华民族这些文化瑰宝,作了极为周密的部署。

一九四八年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之时,中共中央军委在毛泽东战略思想指导下,调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和华北部队一百余万人,发起了平津战役。为了接收和管理好古都北京及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十一月八日毛泽东函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解放在即,即须准备接管干部及党政机构的配备,务于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内准备完毕”。十二月十三日六时,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准备接管平津给聂荣臻、薄一波、叶剑英、黄敬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及黄克诚的电报指出:“此次接收平、津,影响中外,你们务必办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及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济南之后”。同日十六时,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接管平津,任命领导人员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的电报中说:“聂荣臻为平津区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长。聂、彭、叶、黄等均于今明两日率干部由平山乘车分向平、津附近前进”。至此,接管北平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① 此文曾刊于《人民政协报》1997年1月22日第四版,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北京海外联谊会主办的《诤友》1987年第12期转载。

毛泽东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等:“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十七日十八时,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注意保护北平工厂文化古迹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的指示电指出:“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十八时,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积极准备攻城的部署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指示电中指出:“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瞭,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瞭,那些地方可以攻击,那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为此,你们必须召集各攻城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以精确地指示。为此,你们指挥所要和每一个攻城部队均有准确的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进展均须放在你们自己的指挥和监督之下”。

当时为了完成保护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这一重大任务,攻城部队迅速传达中央军委的指示,迅速进行补充调查,明确那些地方可以攻击,那些地方不能攻击。北平市地下党根据华北局和平津总前委的指示,绘制了北平的详细地图,送到了总前委。图上标明了北平应该重点保护的文物古迹位置,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住处和攻城时不能打的居民区,以及一般要打和要狠狠打的目标。北平市地下党为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还具体作了攻城时保护文物和护厂、护学的准备工作。东北野战军总部制定了《部队入城纪律》,其中规定:派兵“保护学校及文化古迹名胜,如平市各大学、图书馆、公园及故宫博物馆(院)、西山、香山、中南海、北海等名胜”,要“防止偷窃与破坏。在秩序未恢复前,拒绝参观”。为了切实保护好文化古都北平,平津前线司令部一月十九日决定,以原东北先遣兵团第四纵队为基础,成立北平警备司令部,担负北平解放后维持治安和警备任务,四纵接受任务后,党委作出决议,明确指出担负北平警备任务的重要意义,要求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北平的工商业、市政文化建设、名胜古迹、学校以及仓

库物资等等，“只许看管，不许动用；只许保护，不许破坏；空手进去，空手出来”。原四纵政委、北平警备司令部副政委莫文骅回忆说：“在颐和园值勤的34团一连，把他们保护文物的决心书贴到墙上、大门上，请群众监督。他们十分珍惜园里的一草一木，每天都要认真巡逻。一个在颐和园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工人激动地伸着大拇指说：‘你们是天底下顶好的军队，真象爱护眼珠儿一样爱护颐和园’，‘30团负责守卫团城、北海、故宫、景山、太庙、六国饭店等重要地方。几位团首长几乎每天都去值勤点上检查。守卫故宫的部队交接班时十分仔细，有时发现墙上多了一个钉子眼，都要查清是谁钉的。兄弟单位的同志想去看看故宫……值勤的同志婉言相劝，始终没有放一个人随便进故宫’，‘由于全纵上下一齐努力和北平的军政、军民相互支援，我纵出色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受到北平各界群众的热情赞誉，许多知名人士和群众代表，纷纷向纵队各师赠送锦旗、牌匾，称赞我军‘秋毫无犯’是‘仁义之师’。当年北平各界群众赠送的‘仁义之师’大旗，至今还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起草的，一月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致傅作义的公函指出：“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守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公函严正指出：“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破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此公函系一月十六日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当面交给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将军。一月十七日邓宝珊将军偕解放军代表入城联络。随即，傅作义将军决心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示，愿令其所属部队出城听候改编。一月三十一日，傅部主力移动完毕，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受北平防务。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世界

驰名文化古都北京,宣告解放。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北平获得和平解放,这就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都于北京准备了条件。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傅作义将军发表通话说:“北平的和平工作,自一月二十二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毛泽东主席四月二日复电傅作义将军,高度称赞傅将军:“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电报说:“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上述征引可见,毛泽东对于保护古都北京,对于保护北京的名胜古迹是何等的重视和关心。北平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制定的对国民党政府军进行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周密实施计划中,运用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谈判取得的伟大胜利。北平的和平解放,经历了复杂的谈判过程。在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对傅作义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首先看到傅作义虽然执行了反共“戡乱”政策,但蒋、傅之间是存在深刻的矛盾,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即将垮台时,傅作义是不愿为之殉葬的。同时,也看到他有爱国思想,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来往。因此,中共中央对傅作义耐心进行了争取工作。只要能保护文化古都;接受和平改编,就既往不咎,宽大为怀,使傅作义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用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达到了完整无损地保护古都文化古迹和历代文物的目的。这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非凡的胆略,高超的指挥艺术的体现和结果。当今国内外那些旅游观光者亲眼目睹我中华民族的宏伟建筑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时,怎能不感慨万千!那些有志青年为实现祖国四化,为建设高度文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跨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勤奋学习时,怎能不激起更高的爱国热情,奋发图强呢!

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①

读吴瑞林著《鸭绿江——嘉陵江》

耿仲琳

我在晚年能够读到老司令员的书,并有机会写一写心得,研究一点历史问题,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并以此抒发我对老司令员的崇敬与怀念。

—

50年前,吴瑞林初到鸭绿江畔的日日夜夜,给人留下了一位对革命无限忠诚、大智大勇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简列五事如下:

1. 收凤城下安东(今丹东)的同时,他协助肖华完成了我党历史上空前浩繁的组织任务,迎接了千军万马——为响应党中央“抢占东北”的号召而由各老解放区汇拢来的干部和部队。他敏捷而有预见,井井有条,关心干部战士如和暖的春风。高崇民到安东,吴瑞林问寒问暖,亲自为他安排好房子,安排好伙食和警卫。他从吴瑞林身上,看到我军的本质,慨叹:“仁义之师,不可战胜!”

2. 部署指挥了剿灭日伪残匪的战斗。剿灭了“满洲国府”、伪通化省府、安东省府30多个伪县府及其所辖宪兵、警察、特务,毙13000余人,俘35000余人。其中剿灭伪安东省府的三股流之役,是吴瑞林亲自指挥的,毙伪省警察局长王里明、伤伪省长曹成宗、俘伪省顾问日军中将以下780余人,其中含日军官320余人。战役部署主客观吻合,完全达到预期效果。

3. 日伪残余势力与国民党特务相勾结,利用肖华带机关赴本溪迎击国民党军进犯的空隙,于我安东市保安司令部内设指挥部、于我公安局和汽车队内设两个分指挥部,决定1946年元旦凌晨2时举行暴动。吴瑞林于1945年12

^① 此文曾载于1997年3月改革出版社出版的《最可爱的人》(146-170)。

月31日下午6时才得知这个情报,真乃千钧一发!他立即采取断然措施,亲自带队,先发制人,破坏了敌人的3个指挥中心,总指挥、副总指挥、参谋长等要犯,全部落网。并以军事手段和政治攻势相配合,连续广播了7个通告:第一号通告,要求参与反动暴动计划者,一律要在1946年元月1日上午7时,将武器交到安东市保安司令部,自动投降者不予追究,宽大处理;元月1日上午10时发出第二号通告,参与暴动的国民党特务已全部落网;元月1日上午12时用日语发出第三号通告,敌暴动总指挥、副总指挥、参谋长已被我活捉,一、二、三分区指挥官亦被我活捉,号召所有参加暴动人员到市保安司令部交待;元月1日14时发出第四号通告,向外逃跑的暴动分子、亦全部被我军和苏联红军活捉;元月1日18时发出第五号通告,参加暴动者被俘和自己交待的已达1000余人,限2日7时前一律自动投降,否则论罪;元月2日6时,发出第六号通告,策应安东市暴动的凤凰城、五龙背的暴动亦被我军粉碎,参加暴动的反动分子全部被俘;元月2日12时发出第七号通告,我军本着宽大政策,已释放部分被俘人员。这样,经两天三夜,这次反革命暴动被彻底粉碎,平息了一场大动乱。是役,清查出日军中将7人,少将11人,校官130余人,尉官350余人,士兵1000余人,缴获机枪30余挺,步枪1000余支,子弹30余万发,战刀2000余把。在平暴中与苏联红军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建立了战斗友谊。可以说是留下了一个平叛艺术的丰碑。

4. 吴瑞林谒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是一桩趣史。1946年1月,他带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电文,以肖华的参谋长的名义到旅大拜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机警的元帅对这位精干的中国青年将领总觉得有些不放心。他友好地接待客人,海阔天空地攀谈起来。他仔细询问了客人的经历,询问他有没有负过伤,他查看了客人的所有伤痕并用手摸了客人身上的几处藏有弹片的伤疤。他继续攀谈山东抗战的情况,特别提出岱崮保卫战要客人讲讲。岱崮保卫战是1943年11月中下旬,我以一个连的兵力,阻击日军二十三师团的一个旅团3000余人的进攻。我凭借天险,仅以伤7亡2的代价,阻敌18个日日夜夜,取得毙伤敌300余人的奇迹。这个战役恰是吴瑞林指挥的。新华社当时发了这个捷讯,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都有报道。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很喜欢这个战例。所以,当吴瑞林讲明情况后,他完全判明了在他面前的青年将领是久经沙场的英雄,他高兴极了,竖起大拇指,连声喊:“毛泽东捎达子乌拉!”于是,马帅如待贵宾般盛情地款待吴瑞林,并介绍贵宾到平壤北面的火车上去见梅科夫斯基元帅,又受到热烈欢迎。于是这位贵宾获得13列火车军火,有各种

炮千余门,轻重机枪 2000 余挺,步枪数万支,炮弹、子弹数百万发。

5. 金日成、崔庸健一行路经安东回国,吴瑞林代表分局接待了他们。中央的指示精神是力所能及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吴瑞林和南满分局很好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给贵宾以热诚的款待,特别是给他们带走了干校的朝鲜族分校,带走了李红光支队。数日相处,吴瑞林同贵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送别的宴会上,洋溢着动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宾主都流了许多泪,相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依依洒泪而别!

这五点事实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试想,如果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素质,怎么可能完成这样多的重大使命而又完成得那样之好呢?!

我的看法是:川陕斗争和 8 年抗战,已把他冶铸成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恰在这时,经罗荣桓提议,东北军区任命他为安东纵队司令员,这是一项知人善任的英明决定。

二

《第一次鞍、海战役》一文,老司令员只给我们留下了 800 多个字,太珍贵了!老司令员讲了战役的缘起,决策经过,作战过程和战果,没有谈此役的经验及意义。

当时(1946年5月),敌猛攻四平,我东北军区电令南满发动攻势钳制敌人。罗荣桓主持会议,吴瑞林依据敌我情况提出“先打鞍山再打海城,得手后,再攻大石桥和营口”的意见。韩先楚同意。肖华同意。罗荣桓政委当场决定:由四纵队韩先楚副司令员、安东军区的吴瑞林司令员 2 人负责执行此任务。结果,我军连克鞍山、大石桥、海城,歼敌二个团,使敌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师部及一团起义。调动敌东北剿总派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统率 22 师南下,敌 14 师东向,两路在敌机配合下向我反攻,达到了钳制敌人的预期效果。老司令员写出了这些情况,给军战史留下了重要资料。关于这个战役的经验与意义,老司令员没有说,留待后人去研究。这里我想冒然说上一句:据我看,这个战役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迫使蒋介石、杜聿明只能无可奈何地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注定了他们永远到不了哈尔滨。它的绝妙的政治意义,是挽回了我军在四平的损失,这也反映了东北军区领导决策的英明。

三

在《生死攸关的鏖战》章节里老司令员向我们叙述了小孤山突围和熊岳城歼敌的那场恶仗。

1946年10月,敌大举进犯辽南。敌新六军军部驻海城,集结十四师、十二师于海城、大石桥一线;敌新一军军部驻鞍山,集结三十师、三十八师于辽阳、鞍山一线;敌五十二军军部驻本溪,集结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于本溪、新立屯一线;敌六十军一八四师残部和敌独三师集结营口一线,加上地主还乡团、宋大校的保安旅等共计10万余人,由敌东北剿总杜聿明亲自在海城指挥。敌军在十几架飞机、十几辆坦克及重炮配合掩护下,分五大路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妄图一举消灭我辽南独立师以及地方党政机关,两个军分区的县、区地方武装共1.5万余人于析木城至岫岩一带,然后攻占安东与我南满主力决战,妄图实现其“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和“先西后东”的战役部署。

老司令员用闪电般的速度迅速判明了敌人的意图并确立了我之决心。当时分省委正在岫岩开军政扩大会议。吴瑞林从前线打电话给分省委书记林一山,建议他立即散会,向普兰店转移,一地委向摩天岭、五地委向步云山转移,就地坚持斗争……电话未打完,电话线已被敌机炸断。部队已经打得很紧张,一、三、四团都在抗击敌人的疯狂进攻,敌机已轰炸我纵深。连接辽东军区三道命令,要求死守析木城。老司令员判明了敌之意图,看清形势不对,不能在原地死守,决心以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边打边撤,以减少伤亡。撤到析木城以东三家子、小孤山一带,激战一天一夜。老司令员召集一、三、四、炮团团,部署突围:三团为第一梯队打开缺口,占领公路两侧高地,顶住敌人封锁山口;师前指、炮团为二梯队,采取快速行动通过封锁线,向步云山前进;一团为三梯队断后;在一梯队攻打突破口的同时,组织两连向敌人实施一次反突击,以迷惑敌人,而后迅速跟进,通过公路后,快速前进,抢占步云山口,掩护三团向步云山转移。这样,从10月5日至8日同强敌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恶战,胜利地实现了突围,并粉碎了敌人逼我向岫岩、安东后撤“聚而歼之”的美梦。

在突围中我军牺牲了3个主任,还有一个主任重伤被俘,一团副团长丁学策、一团政治处主任张同新负伤转后方,我伤亡5000多人,其中二团伤亡1500多人,四团伤亡1000多人,一、三团各伤亡500多人。损失山炮两门,九二步兵炮一门,轻重机枪三四十挺。我付出了严重代价,但保存了主力,保存

了干部——由于转移方向对头，分省委直属机关以至区、乡干部，大都保存下来转移到普兰店以南。

杜聿明用飞机散发传单，用黄金和官衔来挑拨离间我指战员，说活捉“吴瘸子”（即指吴瑞林）给多少金子，捉人头去给多少金子，打死给多少金子，活捉给少将军衔，捉人头给大校军衔，打死给上校军衔等等。对此，老司令员在书中写道：“我广大指战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些分裂伎俩对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政一致的人民军队来说，是毫无作用的。相反激起我广大官兵更加愤怒，奋发无比的勇气，越战越勇，用人民的铁拳给杜聿明以有力的回击。”

敌人造谣说辽南独立师被消灭了，“吴瘸子”被打死了，余部溃不成军了等等。可是，敌人造谣话音未了，“人民的铁拳”就砸下来了：10月中旬，一团进攻，三团打援，经一天一夜激战，歼灭了侵占熊岳城之敌，毙伤敌500多，俘敌团长、副团长以下700多人；随后又在袁家屯由三团攻击一团打援，经14个小时激战全歼新六军输送团，毙伤团长以下600余人，俘副团长、政训处长以下800余人；同时，敌十四师的一个团，从貔子窝来援，被我一团击溃，毙伤敌200多人，俘虏60余人。在胜利突围之后，一个月之内就打了3个击溃战，两个歼灭战，把新六军二十二师，从桓仁、宽甸之间拖了回来，形成了与我对峙局面。

老司令员在书中写道：“敌人在数量上十倍于我，在装备上更优于我。我军的唯一的就是各级指战员有为广大劳动人民而战的**坚强意志和聪明智慧**，这是敌人永远无法与我相比的。”（着重点是本文笔者所加）我们知道，这也是老司令员的一个信条，他每临战都要提醒我们，一定要比敌人聪明。

这里我想探讨3个问题。

首先是关于对敌战略意图的观察问题。中央是英明的，对敌动向早有察觉。1946年8月29日，中央给东北局的复示电中明确指出：“（一）蒋军可能于十月向你们大举进攻，望利用九月加紧准备一切作战条件；（二）蒋军进攻之主要目标，是哈尔滨、牡丹江及安东。”这个电稿是毛主席拟的，任弼时阅后发出的。东北局亦有察觉。对此，1946年9月19日东北局致各分局各省委各兵团并报中央之《准备粉碎敌人进攻的指示》共分五点，其第一点即明确指出：“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特别军事会议以后陈诚飞沈，东北敌顽之将领集会，各地顽军调动频繁，一切象征证明，反动派即将向哈尔滨、安东、通辽等地大举进犯（敌之主攻方向尚待判断），并在南满、辽西已开始试探性的进攻，东北暂

时的休战情况即将为大规模的战争局面所代替,我全党全军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准备粉碎反动派的进攻。”

老司令员因与敌切近,所以观察得更加清楚。1946年7月中、下旬,他曾同分局和军区的肖华、江华等领导同志讲了对战局的看法,提出要加紧防备敌人“声北击南”的阴谋诡计。他刚讲完,多数人还未讲话,有位同志就站起来对着他发火,说:“什么‘声北击南’,中央没有讲这个话,东北局、军区也没有讲。现在是要全力保卫哈尔滨,你这样说,不是冲淡了全军保卫哈尔滨的精神吗?”肖华同志打圆场说:“你从前线回来,还是讲点敌人的具体动向吧。”吴坚持说,敌人大张旗鼓地宣传要进攻哈尔滨,但他没有行动准备,光打雷不下雨,敌人进攻锦州、沈阳不都是新一军、新六军并用吗?上面发的材料也是讲他两军并肩作战。目前,新六军在海城、鞍山、大石桥没有任何行动,这是第一;第二,敌人从海上增兵,营口的船只多了,火车到大石桥、海城、鞍山的也多了;第三,在与敌对峙的正面,我歼灭他两个连,他们没有报复。在我前沿阵地每天出动个把营带七、八门炮,打一阵就回去,这似乎是对我大石桥、海城、鞍山对峙带搞试射,是敌人向我们搞火力侦察。对此我作了具体布置,减少前面部队的数量,各放一个排称连,营称团,团称师以麻痹敌人。炮火也是今天在这,明天在那地移动位置与敌人周旋。这就说明老司令员早有精细的观察,早有提防,所以才能闪电般地识破敌人的诡计作出正确的决心与部署,指出正确的撤退方向,粉碎了敌人的图谋。这也就是兵谋上策而胜敌罢。

其次是关于死守或突围的问题。老司令员曾给我讲一段故事:有一次国庆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礼,老司令员向总理请示他可不可以去见杜聿明,陈毅老总在旁应声说:“你说话可要和气喽!你就伸出手说,我是你非常熟悉的陌生人……”老司令员果是这样说了,杜聿明问:“您尊姓大名呀!”老司令员笑着说:“我就是你悬赏擒拿的吴瑞林呀!”杜聿明合手作揖说:“罪过!罪过!”他们在谈到那次突围时,杜聿明说:“我破译了你们的电报,以为你会死守,不会突围,又以为你会向岫岩方向节节抗击,想不到你会向山里撤。”他承认老司令员高明。

老司令员说过,这是毛主席给的权,叫做机动处置权。指挥员有根据实际情况为捍卫革命利益而随机应变的权责。

事实上没有机械执行“死守”的命令,成功地“突围”并相机歼敌的结果,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受到了表扬。至今中央档案馆还保存有如下一个电文:

南满台来

肖江程罗曾致吴林周转辽南全体指战员并报林

军委电：嘉奖辽南部队

吴林周转辽南全体指战员并报林军委电：

你们攻克了许家屯许家店等四个据点，将守敌一八四师五五一团五个连全部歼灭，毙伤俘人枪六百余，这是辽南反击战的光辉胜利，望再接再厉，克服任何困难，集中兵力，寻求敌弱点，继续争取更多大小胜利，特此传令嘉奖。

肖江程罗曾
筱

(1946. 11. 17)

最后，我还愿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次鏖战应当算是胜了呢还是败了呢？如果此役算是我军的胜利，那么，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老司令员所指挥的战役战斗就是创出了全胜的纪录。老将军就是常胜将军，所属部队就是常胜军了！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典型，他的诀窍是什么，就值得我们过细地研究了。

381

四

《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写的是1947年6月底，我以两团的兵力攻克大石桥全歼守敌独三师，将增援四平的五十二军、六十三军4个师及1个保安师拖回辽南。中央来电嘉奖，誉为“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部队士气更加高昂、群众也受到极大鼓舞。这是辽南独立师又一模范战例，凸显了决策的英明。老司令员常说这一仗是“天定”的。

怎么是“天定”的呢？

原来正值雨季，山洪暴发，河水猛涨。部队住在大石桥与海城之间的山村，师里正在派部队帮助群众抗洪抢险。忽接军区转东总电，令辽南部队在48小时内袭击鞍山之敌，配合我军攻打四平，钳制敌人北上增援。因电台功率小，又加风雨干扰，四五个小时才将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收译完。虽然师指已向部队发出准备作战的命令，但时间只剩下40个小时了；部队驻地至鞍山相距320华里，中间有五条河正在涨水，奔袭鞍山已不可能了。前指开会，老司令员分析利弊，提出用狠打大石桥的办法，把增援四平之敌拖回来。大家一致同意，遂火速将情况和作战意见上报军区，军区不同意，还是命令执行东总

电令。这就很为难了，时间太紧迫了，不允许再犹豫了。老司令员说：“我们决心去打大石桥吧！错了由我负责。”有的同志尚有疑虑，副政委李辉坚定地说：“打了再说！”这样，决心下定，全军振奋，士气高昂，部署周密，步炮协同，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冒雨进击，出敌不意，经过一整夜的战斗干净利落地全歼守敌。大雨之后又有大雾，敌机不能来援，省了很多麻烦。干部战士都逗乐说：“天助我也！”老百姓也都说：“得了天助啦！”我只有一个营的兵力，抗击来援之敌5个师，在18华里宽的战线上硬是阻敌一整夜，等这5个师的敌人赶到大石桥时，敌独三师已经“报销”，俘虏已经带走，我部已经撤出。敌人还想追击，我在山顶上的两个野炮连向他们回敬了两排炮弹，敌人就这样狼狈退去。

老司令员总结此役经验的第一条，就是“遵照毛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就是根据“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决定的作战方案和决心。是啊！这就证明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最聪明！

我曾经问过老司令员，你这个仗符合不符合“十大军事原则？”“当然符合！”老司令员回答说。我质疑说：“十大军事原则要求以多胜少呀？”“不，不能那样机械地理解，要领会其精神还是不打无把握的仗，没把握的仗不能打！”

五

现在讲一点校雠的问题。

老司令员在《奋战辽鞍间 打出我军威》一章中，讲到打鞍山时写有如下情况：

“部署攻城时，我独一师被作为预备队，主攻任务由兄弟部队担任。当下，我向兄弟部队提出：如果你们打不开缺口就由我们接着打。果然未出我之所料，兄弟部队担任的主攻点经过3次冲锋，均未突破。我即向兄弟部队提出意见，请他们让路，由我们独一师来攻。他们同意我的意见，给独一师让开了路。”

“我请炮纵的匡亦农副司令、邱创成政委用炮火支援我独一师，他们完全同意。我独一师的部署和实战经过是：三团为第一梯队，一团为第二梯队，二团为第三梯队。军区炮团逼近敌人并在炮纵二团的配合下，用20分钟的猛烈轰击，将敌人的铁丝网鹿砦木寨城墙，打开一个缺口。我三团又分3个梯队，

在炮火支援下猛攻神社山，完全用小包炸药和爆破筒，炸开敌人的明堡、暗堡，占领了鞍山制高点神社山。一团尾随三团之后，向鞍山钢铁公司猛攻，逐个攻克据点，在一团团长丁学策率领下，攻占了鞍山钢铁公司制高点。二团尾随一团之后，从神社山东面，用小包炸药、手榴弹、爆破筒，攻占了鞍山市政府。”

“在我占据制高点之后，即用火力压住敌人，掩护我主力四纵六纵攻入市内。随后，我将制高点交与兄弟部队，我们撤出城外。”

“炮纵首长确是对我部有很好的印象，他们说：‘你们辽南部队的攻坚能力很强，不论哪个部队拿出来都可以攻。’”

这个重大传奇式的情节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心和责任感，驱使我要核对一下这个情况。于是我去查档案。还好，查到了《辽鞍作战军事总结》，但是对此没有明文记载，更使我放心不下。1993年11月，苏克之到“三口一”医院看病，我有机会见到他并向他请教，他说的和老司令员的回忆相符，一下子解除了我的疑团。

六

老司令员用《严峻的考验》为标题，叙述五纵队在辽沈战役中的表现，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部队素质好，作风过硬，经受住了考验；一层是此前领导思想不统一，战争的实践使那些错误的思想观点破产而达到了认识的一致。

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12日全面开始的。我五纵队奉命在秀水河子、彰武县、新立屯镇，阻止廖耀湘九兵团的五个精锐军迂回增援锦州和破坏北满到锦州的铁路、公路的运输线。9月12日夜，我骑兵侦察连在秀水河子与敌新六军二十二师先头部队相遇，俘敌排长以下10余人。据俘虏供称：敌人的企图是先抢占秀水河子、彰武县、新立屯镇，破坏北满到锦州的补给线，然后从侧后增援锦州。经纵队领导研究部署：先以十一师抢占秀水河子北山一带至彰武一线，以十四师部署在彰武，十三师抢占彰武河南面，占领有利地形，保护铁路桥。我十五师四十五团在秀水河子北山坚守。

敌新六军二十二师，于9月13日开始对我秀水河子四十五团展开了进攻。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一天的时间里就猛烈攻击了10多次，均被我四十五团击溃。敌伤亡500余人，我亦牺牲团长石坚同志，伤营连干部以下200余人。我在秀水河子至彰武一线进行了7天阻击，新六军才进到彰武东南5里处的万宝城，且只有一个加强营，立刻被我严阵以待的十四师四十

团包围,经10余个小时的激战歼灭了全部敌人。敌新五军(原新六军十四师扩编)在辽河东岸,10多次妄想向辽河西岸强渡、偷袭,敌人强渡过河的一个加强营,被我十三师在河西的团子山歼灭,敌后续部队陆续强渡、偷渡,亦被我十三师顽强抵抗,全部击溃。我六纵队刚赶到就在彰武东面歼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营,迫使廖耀湘兵团在我五、六纵队正面进展缓慢,致保持在秀水河子至彰武、新立屯一线的阻击防御战达25天的时间。任务完成后,我纵奉命放弃彰武、新立屯镇一线,主动转移到彰武河南的五峰、两家子镇一线,廖耀湘兵团强渡辽河的企图宣告失败。

此时,在正面,我军已开始进攻锦州。我纵奉命转移到阜新市休整待命,放敌深入黑山、大虎山、北镇一线。至此,我纵在辽沈战役中,于辽河两岸阻击廖耀湘兵团破坏我北满至锦州的运输补给线的任务就完成了,也就是我纵和六纵队在辽沈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暂告结束。

当我东北主力攻歼锦州范汉杰兵团的任务完成后,廖耀湘兵团已进到黑山、大虎山、北镇一线,我纵队又奉命与六纵队一起转移到绕阳河、大凌河两岸,断敌廖耀湘兵团败逃沈阳的退路,不使一兵一卒从黑山、新民沿铁路、公路退回到沈阳城。铁路(含)以南归六纵,以北归五纵。我纵切断廖兵团回沈阳的退路后,采取了进攻手段。吴司令率十五师四十一团为先导渡过绕阳河。据侦察参谋报告:“敌人正集中为一大片,约有几万人在讲话,声言要打回沈阳。吴司令一面告知四十一团团长王道全同志这个情况,同时命令集中全团迫击炮、六口炮、掷弹筒、轻、重机枪、步枪向集中之敌猛烈轰击,全团上好刺刀,猛打猛冲之后,将廖兵团的新六军、新一军及新五军的一个师打散,我军其他后续部队陆续赶到,经过5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俘虏新六军副军长文少山以下4万余人。我们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全歼了廖耀湘兵团。我纵经阻击、堵击合围,直至全歼敌人,经过反复激烈战斗40余天。我十五师师长彭龙飞受伤不下火线,坚持指挥作战,团长朱蕴山、团政委张同新、团政治处李文智同志以下3500人负伤,牺牲团长石坚同志、营、连干部以下900余人。战争的实践证明,五纵是政治素质极好的英雄部队,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在领导思想方面的分歧,主要是有的领导同志有过高估计敌人,过低估计自己的错误认识。他们没有看到敌已变弱,我已变强的这个发展变化。所以老司令在书中说道:“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这支部队,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点对于高级干部更为重要。”

老司令员说:“在新建五纵初期向总部写综合报告时,对以上谈到的部队

素质上的特点,虽然有过认真、严肃、耐心的交谈,但当时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通过这次辽沈决战的实践,才统一了认识。”我查了一下档案,确有这样一个上报材料,是1948年7月10日油印的,名称为《五纵的一般情况和十三师的几个问题》,确是把部队说得一塌糊涂。所以它的结论性的意见是:“甲、五纵在最近时期内仍应以政治整军为主,请上级研究材料后,对整军的方针给予具体指示;乙、五纵队的工作在今天这样的情况 and 基础上,不能与其他部队有同样要求,应按照具体情况定出适当的步骤与要求,……;丙、五纵干部应加强,特别是营团两级干部,政工及参谋干部亦感缺乏。”战争的实践证明这些悲观的论断确实是错了!

七

五纵队“追赶”上来了!在平津战役中更加显露了它的品格,抢占和固守丰台这一跃,竟成了全军关注的骄子和明星了!老司令员的文章也写得紧张动人,很值得一读。

中央档案馆珍藏有一份当年五纵首长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值得在这里介绍一下。

电报是1948年12月15日22时发的。标题为《删日敌约五个师强攻丰台》。电文是:

“因丰台系傅匪北平附近军事仓库及战车部队修理厂所在地之一,故敌自今晨即以九二军全部、九四军一个师、保一旅共五个师(均有俘虏),附坦克、装甲汽车各十余辆、铁甲火车两列,山野榴炮二十余门,从正面对我丰台以东之樊家村、孟家园、西芒坟、小井、马芒盘、古庙线进攻;另一个师(番号未详)从南苑、西红门方向迂回我右翼,其中以沿平丰段铁路十三师阵地上为最激烈。一天内大规模进攻共三次,均被击回。阵地经反复肉搏争夺数处。共击毁敌坦克、装甲汽车各两辆,毙伤敌最少在千人以上(士气与防守信心均高)。敌虽经此打击,估计明天仍将重组较大力量再进攻。我坚决守此傅匪目前志在必夺之要点,以大量消耗敌有生力量。为此,对目前钳制与未来夺取北平均为有利,请通知十一纵与华北七纵密切配合,并建议三纵能积极向南苑活动,以策应我们。以上请指示。”

这个电报报头上有周恩来副主席亲笔批示:“电话告滕赵嘱其电告7C与5C取联系 周”。批文前加一“已”字,并有一黑线引向“涛”字,说明由李涛

兰台稿存

同志已打过电话。(见附图 I)

125.40

320
1254

巨劉朱周任項楊高喬關

劉 (Handwritten signature)

軍法共隊 (Handwritten notes)
158
特之官告軍 (Handwritten notes)
No: 1K
第 5C (Handwritten notes)

PC 號 NO. 235 林羅台來

附註 已告抄一局

等級 AAAC 作戰類 1948

刪日敵約五個師進攻丰台

於通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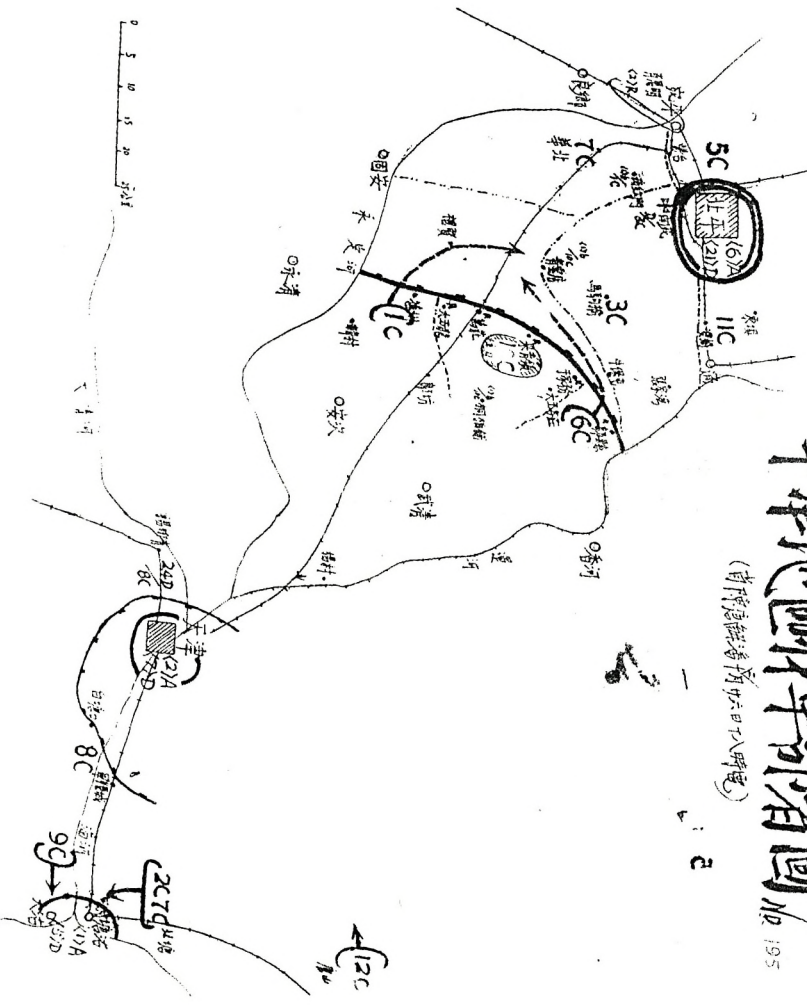
因豐台係傅匪北平附近軍事倉庫及戰車部隊修理廠所在地之一，故故自今晨即

中央档案馆还珍藏有根据肖(劲光)、陈(伯钧)、唐(天际)、解(方)、潘(朔端)1948年12月26日18时电绘制的一幅《平津地区我军部署图》，一目了然，无需多所说明，附在这里，供关心这段历史的同志们研究。(见附图 II)

平津地区我军部署图

(前所编《平津战役》中附图)

1949.12.19



八

补国史之不足：

书中《深谋远虑的安、新之役》一章，老司令员写的是朱总司令的深谋远虑。这个战役是朱总司令亲向吴瑞林部署的。总司令详细地讲了敌情，讲明了安阳守敌全是惯匪，依靠城墙高大、工事坚固，弹药充足，还有两道水城围护所以很狂妄，他们认为‘固若金汤’，我们攻他一年半载也攻不下。所以朱总司令指示要多带炮弹、多带炸药，千万不要轻敌。为了不让这些惯匪再逍遥法外，称王称霸，再出来残害人民，总司令说：“你们要为民除害，不许漏掉一个亡命徒！要一网打尽！”朱总司令说：“新乡的工事也很强，是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部的一个师在那里守备。但不要紧，只要你把安阳打下来了，他们就会投降的。你不必担心。”当时五纵已改编为四十二军，军部驻涿县，遂跨十八县南征，千里奔袭，按照朱总司令的要求，一无漏网地全歼安阳守敌。果然不出朱总司令所料，慑于我之军威，新乡守敌投降。所以老司令员写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安（阳）、新（乡）战役是朱总司令亲自向我交待与部署的任务。他对安阳、新乡之情况，了如指掌。他提出对安阳城的打法，也是正确的。战斗过程及结果，全在朱总司令的预料之中，实在使我佩服。”

中央档案馆保存有安、新战役的全部电报，但我们疏于职守，没有考证出这些战电乃是贯彻了朱总司令的深谋大略。所以，《朱德年谱》一书，也漏掉了这桩大事。可见老司令员的书，确是补了国史之不足。至于为什么朱总司令亲自向吴部署这一战役，这与华北部队曾多次攻而未克有关。

九

他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党史资料……

《解放川陕老革命根据地》是一篇寓满深情的文字。

1949年10月1日，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当时四十二军军部驻郑州，军直属队和机关参加了郑州市委市政府召开的隆重的庆祝大会。吴瑞林代表当地驻军在大会上讲了话，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讴歌了新中国的建立。2日，四十二军告别郑州，配属二野，在刘、邓指挥下向大西南进军。他要解放他的家乡了。

吴瑞林率部入川势如破竹,4个多月,大小战斗32次,消灭了罗广文、孙震兵团,歼敌9300余人,受降敌正规军、保安旅和江防舰队共12300余人,两项合计为21600余人。主要战斗有巴东、建始的五峰山之战,巫溪县的三合蒲之战,川北广元县北的阳平关之战。阳平关之战是老将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战,攻克天险阳平关,歼灭了胡宗南的精锐手枪旅。战后把阳平关打扫得干干净净,全军满怀豪情地迎接贺龙老总过关。

老司令员在这块土地上度过惨苦的童年,也在这里投身革命,成长为革命军人。在故乡的土地上流过汗、流过血、流过泪,与家乡人民血肉相连。这里又是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家乡。朱总司令的家乡是仪陇,刘伯承的家乡在开江,陈老总的家乡在成都,王维舟的家乡在宣汉,所以倍感亲切。他反复教育部队,要更加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的利益,严明纪律,更好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军民关系,给家乡人民一个好影响,扫除张国焘路线在川陕苏区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此,他感慨殊深地回忆到川陕苏区的历史,回忆到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给我们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边境后,当地地下党组织与军队联合起来,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扩大红军的运动(简称“扩红”),至今还流传在民间。那时在川陕苏维埃工农政府的号召下,川、陕青年男女踊跃参军,使红四方面军一年内由16000人扩大到10万余人,由原四个师扩编为五个军,即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二军。此外还有8个独立师,各县设独立营、保卫队。各区设区中队。普遍建立了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创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位居全国第二大块的革命根据地。

“由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竟想放弃通、南、巴。他开始带主力军向汉中进军,受阻后又折回川北西逃。先留周纯全和我等四人,组织川陕游击军,在该地区坚持。不久又将周纯全调走,另派于震江,又派袁克,后又派徐长勋,一年之内川陕游击军,四易其人。最后张国焘将通、南、巴地区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全部都调走。留下鄂豫皖的干部刘子才,留给他300多人枪,让他们坚持。由于他们失掉了与党的联系,又未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红四方面军撤走一年多的时间内,刘子才的川陕游击军就被川军完全地消灭了。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错误,不单是丢掉了川陕地区,丢掉了川陕苏区500万人民,对当时中国革命是一个严重的损失。我党及川陕人民至今牢记这个惨痛的教训。”

老司令员讲的非常明白、透彻、服人,用事实雄辩地讲清楚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及其危害,是不能翻案的。我想党史工作者一定会珍视这段文字。

十

一个专列，满载着光荣的四十二军官兵向北方急驶，火车要把这些战斗英雄们送到黑龙江省的北大荒，他们要拿起犁铧耒耜，为国家生产粮食，为人民创造财富，由战斗队转变成生产队。这个时间是1950年2月中旬。

列车停在丰台这个他们曾浴血战斗过的地方。军长吴瑞林被一个黑色的小轿车接走。他见到了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向他说到：“你这个军是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解放军要参加经济建设的号召，去北大荒屯田开垦的第一个军。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同志们，看到你们的电报都说，四十二军这个军是能战斗、能工作、能生产的部队。这次你们到北大荒去开荒生产，你们一定能搞出好成绩来……。你们搞生产，但不能忘记手中的枪，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和宣传队，只要世界上帝国主义存在，战斗队的任务依然是长远的。”“你们到东北后，一定要尊重东北党政各级领导，搞好党政军民关系。要团结各阶层的人民，爱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北大荒是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长的地区，受的苦难也最严重，要体察民情，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爱护人民。这几项工作做好了，你们的生产任务就一定可以顺利地完。”

老司令员在书中写道：“总司令的话语重心长，刻骨铭心。我向总司令表态说：我一定把总司令的指示带回去向军党委传达，在军党委会上作出决议，把总司令的指示作为我军在北大荒实行开荒垦田的指导方针，坚决执行。”

于是生龙活虎的四十二军在北大荒热火朝天地搞起了生产，鸡鸭满埭，肥猪满圈，牛羊成群，膘肥马壮，麦浪滚滚，歌声阵阵……。可是时隔不久，朱总司令的话又应验了！朝鲜半岛弥漫硝烟，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四十二军被迫又拿起武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为中朝人民立下了更加辉煌的殊勋！那是后话，那些史诗般的故事老司令员写在即将问世的《抗美援朝中的42军》一书中了。

老将军解甲以还，不肯虚度光阴，伏案奋笔，记叙了一生的战斗历程，已出版的有《战斗在川陕苏区》、《鸭绿江——嘉陵江》；即将出版的有《鏖战齐鲁》和《抗美援朝中的四十二军》。可惜书还未写完他就走了，不无遗憾地走了！他不惜金钱，拿自己的伤残费去出书。是呀，留下点钱好呢还是留下几本书好呢？本文所探讨的只是他书中的片断，但已可看到他为研究党史、军史和军事科学留下了珍贵的材料，他的书是有价值的。唐诗有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但愿他的书彪炳日月，永世流芳！

一篇科学名著形成纪实^①

张锡江 齐得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发表40周年了。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科学名著之一。《正处》原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有180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长篇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经本人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补充后,于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正处》的发表,是我国在50年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时国内外对毛泽东这篇重要的科学名著,甚为重视,影响很大。据有关的资料记载,该文发行的单行本,即达120多种版本,其中汉文版10多种,少数民族文版20多种,外文版80多种,盲文版4种。国外有美、苏、日、德、意等20多个国家出版该文单行本。到1958年已印行21357000册。在纪念这篇重要科学著作发表40周年的时候,笔者对毛泽东为什么提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重大问题和对记录整理补充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供读者参考。

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问题,不是毛泽东突然提出来的,而是他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毛泽东认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很好研究。……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又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任务,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迅速地改变旧中国的面

^① 此文曾刊于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会主办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貌,使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全国六亿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过去革命的经验,提出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见《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页。)当时,我国正处在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关于这个转变,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这样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种时期,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八大大会作了结论,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就要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个工业国”。3月19日、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阐明由革命到建设这个转变之后指出:“但是似乎还有一些人不大清楚,不认识这么一种转变”。他强调说:“总而言之,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在我们国家处在“由革命到建设”的重要转变时期,毛泽东为什么提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问题呢?毛泽东《讲话》开宗明义,头一句话就说:“同志们!我讲这么个问题,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中,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当然,我们面前仍然有两类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讨论第二个问题。”又说:“人民日报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作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在此之前,即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国“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这里所说的“别的方面的矛盾”,“新的矛盾”指的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这类事件不断发生,有一些临时性的原因,但是这种现象不只是暂时的。这类事件的发生,说明有关地区有关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存在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从当时的情况看,不少地方和部门对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

误是造成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至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结果。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些闹事的不能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学生闹事“究其原因,主要的是官僚主义跟学生的幼稚”,毛泽东提出要“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恰当的处理矛盾,那人家就不罢工,就不闹事了。”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成了能否顺利渡过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和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在《正处》发表稿中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这个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另外,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深刻的经验教训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批评斯大林有两个方面的性质,一方面实在有好处,一方面是不好。揭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揭掉盖子,使大家解放,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因为他的办法不对,没有做过好好分析,一棍子打死,这么一个方法,引起世界去年下半年的几次大风潮,后来又引起了匈牙利、波兰事情。”

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不只是苏共一个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问题。“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见《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6页。)《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精神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后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就不像赫鲁晓夫等人那样,丑化斯大林,诋毁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两篇文章集中表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看法。斯大林曾经在一些问题上离开辩证唯物主义,陷入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本世纪30年代,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他领导和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因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错判过一些好人,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国共产党认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错误,必须采取正确的立场和方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所犯错误的原因,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相反,1956年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引

起世界几次大的政治风波,后来又引起了匈牙利、波兰事件。中国共产党认为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分敌我,把斯大林的错误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斯大林,使亲者痛,仇者快,这是根本立场问题。

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市发生的骚乱事件和同年10月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的注意,多次开会讨论波匈事件及其教训。毛泽东和党中央所以十分关注波匈事件,是因为这两件事,不仅关系到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影响。关于匈牙利事件,毛泽东说:“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事件表明,能否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成败,也关系到人民政权的存亡。特别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尤为重要。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才能巩固人民政权,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这次长篇《讲话》和往常多次讲话一样,没有讲稿,只有一个不足3000字的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提纲。讲话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讲到6点40分。讲话时由速记员作了记录。后由胡乔木将记录整理成文,1957年3月30日报送毛泽东。口头讲话,不论在逻辑方面,还是在用语方面,同事先写好的稿子总是有差别的,讲话时言意未尽,是难免的。随后《讲话》在全国广为传达,形成学习热潮,要求发表《讲话》的呼声很高。当时一些兄弟国家也很重视。毛泽东与来访的朋友,多次谈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问题。有的朋友说:“主席对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有很深入、全面的研究”,“主席的报告十分重要”,“这个报告不但对中国,而且对所有兄弟国家都有巨大的意义,我们很想看到全文”。毛泽东回答说:以后可以得到全文,全文我正在修改。讲起来很容易,几小时就够了。写成文字就困难了。2月27日讲的话,到现在还没有整出来。要发表,对记录整理修改补充是必要的。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从1957年5月上旬至6月中旬,毛泽东化了很大精力,对《讲话》整理稿作了多次修改和补充。毛泽东对自己的著作向来是严谨的。他写文章、起草文件都精心修改。周恩来说:“主席经常说,我们看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是精心修改的。主席也是这样,他写的东西都是几易其稿。”《正处》就是典型的一例。从标题、结构、逻辑、文字,

字斟句酌,《正处》在毛泽东著作中修改次数之多,征求意见之广泛,是首屈一指的。毛泽东对《对话》的整理、修改补充情况是读者所关心的,主要情况是这样的。

(一)5月7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修改稿上,将讲话题目《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二)对《讲话》中12个问题的小标题作了修改,改成发表稿中的题目。将第六节《关于节约》同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的前后顺序作了调整,通篇文字作了修改。

(三)发表稿将《讲话》中列举的许多人和事,大都删去。

1.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在《讲话》中篇幅是很大的,发表时一句也没有了。

2.《讲话》中对若干“左”的和右的倾向的文章的批评,在发表时也删去了。

3.《讲话》时列举的其他各种各样的事例,发表时也删去了。

4.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在原始记录中记有毛泽东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的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是专门的名家,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发表稿中也没有了。

(四)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一节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两类矛盾,性质不同,处理方法也不同,首先要分清敌我,分清是非,专政所适用的范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行政命令的方法和武断压制的方法,只能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解决。发表稿首先阐明了我们的国家除台湾等岛屿外是空前统一的,全国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还存在着矛盾,认为

已经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在我们面前有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了正确认识、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界线,对人民的概念,在我国现在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民主集中制,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方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等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使《正处》这个主题在理论上进一步的系统、丰富和完善。

(五)发表稿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方针作了更严密、审慎的说明,在第一节所作的理论论述的基础上,其他各节修改和补充的重要内容,如经济方面实行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探索发展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思想,科学文化方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及团结、教育好知识分子,搞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处理好少数人闹事等等,都是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方针的进一步的论述。

(六)发表稿增加了在转变时期,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和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问题的必要性一段论述:“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七)发表稿增加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论断的内容。

1. 第一节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论断:“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

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2. 第十节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是决定中国的穷国将变为富国,在国际上无权将变为有权的条件的论断:“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奋斗。”

3. 第五节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靠我们的辛勤劳动”的思想:“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397

(八)发表稿增加了关于我国今后根本任务的内容:

1. 第二节第四段关于对我国今后根本任务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2. 第一节第六段在论述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时指出:“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3. 第十二节讲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时,强调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正确地反映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

(1)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

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

(2)关于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4. 在第七节中,批评了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相抵触的小圈子主义,提出“不要把一切事一切都由政府包下来”,应当由人民政府指导社会团体和群众去做的主张:“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的这样做。”

5. 第十一节中增加了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的内容:“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批评了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后写道:“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九)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的论述和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增加的重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 发表稿第八节第二段论述,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增加了关于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述:“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2. 发表稿第八节第三段增加了作为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的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3. 发表稿第八节中增加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

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十)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在第八节中增加了六条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同时明确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六条政治标准是毛泽东在5月25日修改时写的。那种关于六条标准是从6月8日反右派斗争开始到6月18日公开发表这10天里逐步形成的说法只是一种猜测,是不确实的,是不对的。

在修改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征求党内同志的意见。为了征求意见,写了不少批语,比较重要的有:

(1)5月10日,他批示将几经修改后的稿子作为“草稿第一次稿”在小范围内印发征求意见,写的批语是:“印小型12份,大型三份,连原稿送来。版留。”“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毛泽东五月十日”。

(2)5月24日,他批示将“第二稿”印发征求意见,写的批语是:“再打清样(大本),即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五月二十六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毛泽东 五月二十四日”。

(3)5月25日,他批示将“第三稿”印发征求意见,写的批语是:“田家英同志:即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今天到会各省市负责同志(三十余人),务于今日晚十二时以前送到各人手里,特别是各

省市来的人。毛即”。“各位同志: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六月五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4)5月27日,他批示将“第四稿”印发征求意见,写的批语是:“田家英同志:请再印,印数如此次到会人数,于今天晚上九时以前发到到会各人手里。改处校正勿误。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各同志: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

(5)5月28日,他批示将“第五稿”印发征求意见,写的批语是:“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每省(市,自治区)一份,另发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每人一份,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各一份。将以前几次所发各稿全部收回。原稿退毛”。“各位同志:这是第五稿。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毛泽东 五月二十八日”。

(6)6月9日,毛泽东在他自己标明的“六月八日修正稿”上批示:“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毛泽东 六月九日上午二时”。

从前面毛泽东的批语中,可以看出,在这篇讲话发表前的修改过程中,先后两次印发在京中委、候补中委;三次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两次印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征求意见。并多次提出“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毛泽东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也采纳同志们的意见。例如:陈正人1957年6月7日写给毛泽东的对《正处》第三稿的意见信。信中建议在稿中“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这一句前在加上“革命时期”四个字。并说:“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两个革命——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胜利,革命(社会改革)已基本结束,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种斗争,不但表现为长期的思想上的斗争,也表现为政治的及其他形式的斗争(如经济的)”。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处》一文采纳了这一建议。

《正处》发表稿同《讲话》记录整理稿相比,虽然作了修改和重要的补充,但是并未改变《讲话》主题的基本精神,而且使之更丰富和完善。

《正处》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

盾,正确地提出和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名著,是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研究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门科学的结晶之作。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40年来,国际国内重大社会主义事变实践证明,他提出的理论观点、方针不仅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的。实事求是地运用他提出的理论、观点、方针,就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反之,不仅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还会影响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晚年所以犯错误,不是因为《正处》的理论观点有错误,而是因为他自信是正确的,而实际上违背了自己阐明的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提出的各项正确主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急于求成,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60年代曾经说:“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正确地总结了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是举世公认的。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兴旺发达指明了方向。现在深入研究,全面理解、掌握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重要科学著作的精神,对于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7年4月

对西路军问题的一点意见^①

齐得平

西路军问题现在搞成了一笔糊涂账。本来是明明白白的问题，竟然搞得一塌糊涂，使人啼笑皆非。

明明是张国焘蓄谋过河，硬要说是“中央军委指示”，“中革军委命令”渡河。中央何曾有过这个“指示”，哪里有这个“命令”，能拿出来吗？牵强地把中央《十月份作战纲领》说成是渡河的“指示”行吗？《纲领》是1936年10月11日下达的，明确规定：“十一月十号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的执行新任务。”“四方面军以一个军……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628-629页）为什么十月二十四、二十五号就匆匆忙忙地渡河呢？而且是要整个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过去了三个军加总部，还有两个军由张国焘率领，走到距河边几华里处被胡宗南堵回来了。《作战纲领》哪有这种精神，这种“指示”？至于说“命令”更是拿不出来。专门翻这个案的人，征引了许多中央指示造船的电报，但是他们无法引出中央命令渡河的电报。事实上中央军委渡河命令是没有的。唯一的似乎可以鱼目混珠的电报是1936年10月25日张国焘、朱德、彭德怀联名的电报。有人就是拿这个电报蒙人的，在文章中摆出来的“命令”就是这个电报。按照这个电报所说的徐陈提议，不独四方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主力也要统统赶快渡河。这明白的是张国焘的逃跑跳线，决不是中央军委的意图。1936年10月24日毛泽东即致电彭并朱张、贺任、徐陈，指出“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632页）。10月25日中央军委致红军总部和一、二、四方面军电，再次指出“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毛泽东军事文

403

^① 这是1997年11月20日齐得平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为修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征求党史专家意见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

集》第一卷 634 页)这和全军西渡决然不同。何况毛泽东看过 25 日张朱彭联名的电报以后,10 月 26 日 21 时即致电彭德怀指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毛泽东年谱》上卷 602 页)为什么说是鱼目混珠呢?有张国焘,有朱德,又有彭德怀,这样的联名的电报,还不可以称“命令”吗?可是历史不容混淆:彭德怀 10 月 27 日给毛泽东、左权、聂荣臻的电报中严正申明:“前二十五日前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可见,这个电报是张国焘的假冒伪劣产品。

经有人这么一翻腾,《毛选》注释也被修改了。原注是说:西路军渡河是根据“张国焘命令”。现在完全倒过来了,把西路军渡河说成是“奉中央军委指示”,把失败的原因说成是“敌众我寡”(有人强调是中央指示多变)。多少懂点逻辑,稍有军事常识的人,能够接受这两种说法吗?中国工农红军从它产生之日起,不就是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吗?如果按这种逻辑红军还能生存发展吗?至于所谓中央多变就更离奇了。谁不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呢?两万多队伍打光了,能赖中央指示多变吗?他们是唯唯诺诺者乎?敢于不经中央独自作出×××、×××离队的决定,为什么别的决定就不敢作?真是令人不可思议!1937 年 3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是这样说的:“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集 167 页)不从主观上总结真正的经验教训,能向后人交代过去吗?

我们认为,西路军问题是张国焘逃跑路线的产物,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破产。档案文献俱在,历史的真实必须维护,中央有关的正确的决议必须遵循。我们认为,《党史》中有关西路军部分,应按照历史本来面貌进行修改。

毛泽东三封书信写成年份考^①

齐得平

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毛泽东上千封书信中,有三封信的时间同是“十二月廿九日”,没有写明年份。这三封信是分别写给钟学坤^②、孙艳^③和周世钊^④的,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到中央档案馆收藏。收信人和有关机关在上交时,对每一封信的写成时间都作了说明。给钟学坤的信为1959年,给孙艳的信为1960年,给周世钊的信为1956年。根据长期对毛泽东书信发展变化的观察,我认为这三封信是同时写的。1983年编辑《毛泽东书信选集》时,我曾对此提出过质疑。现将有关年份的情况及我的考证简叙如下。

405

钟学坤本人1977年2月22日的说明,称毛泽东给她写信的时间是1959年。给孙艳的信,根据孙艳本人的回忆,1977年2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在“毛主席著作原件说明卡”上写明:“这是毛主席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给孙艳的复信”。关于给周世钊信的写成年份,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1977年11月25日填写的“毛主席著作原件说明卡”上说:“这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主席给周世钊先生的复信”。从以上说明看,这三封信写于三个不同的年份,即1959年、1960年和1956年。毛泽东给钟学坤和周世钊的两封信,1983年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和《毛泽东书信手迹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写成时间是按1956年编入的,为了考证这三封信的写成年份,我曾多次认真地同毛泽东的有关手迹作过比较,与有

① 此文曾刊于《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

② 钟学坤,曾在庐山疗养院担任护士。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开会时,她被安排为他做保健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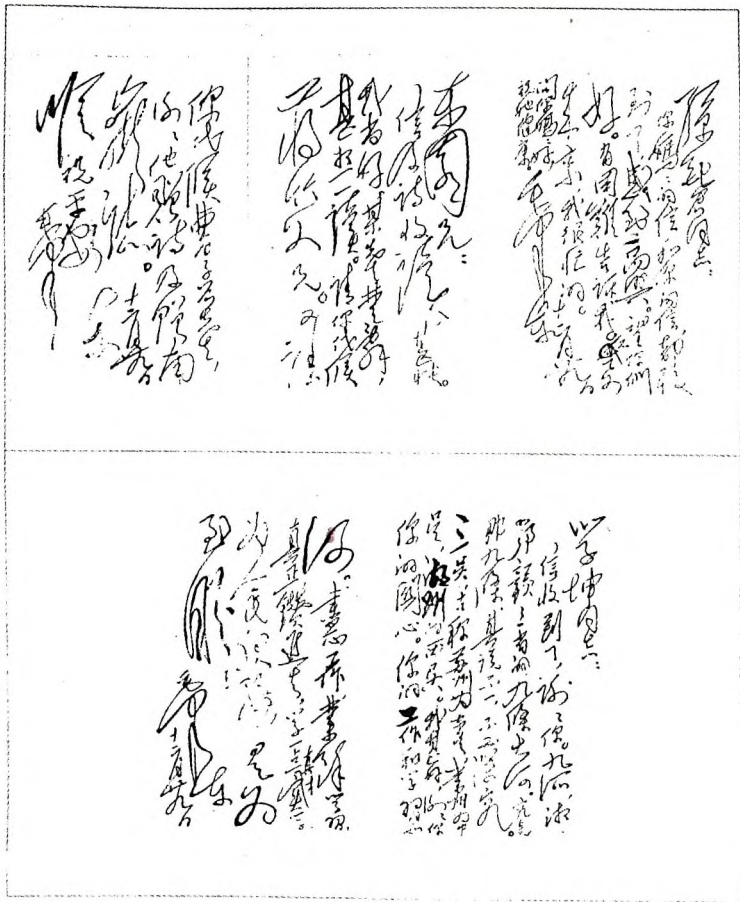
③ 孙艳,陈玉英之女,又名孙佩君。陈玉英,1926年冬—1931年春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家当保姆。

④ 周世钊,字惇元,又名东园,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窗好友。

兰台稿存

关同志探讨,向有关同志调查,都证明,毛泽东这三封信的写成年份是1959年。根据有四:

其一:这三封信书体相同。请看手迹:



毛泽东的书体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有其独特风格和发展轨迹。他在学生时代的书体同后来在各个革命时期的书体及五六十年代的书体,有很大差别。而同一时间的书体风格则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几个不同年份的书体风格完全一样,不大可能。毛泽东这三封信全为竖写,其墨色、通篇布局、格式、署名及所落月日的写法和信中许多字的笔锋几乎完全一样。由此可见,毛泽东这三封信是同一时间连续写成的。

其二,这三封信都是用同样的白宣纸写的。纸质相同;纸张的长宽相同,比16开稍大,并且都是手工裁成。从我所见到的毛泽东书写用纸,因时间不

同,所用纸张的大小、格式、纸质也不一样。在前后几个不同年头的同一天,用同一手工裁的同样质地的纸写信,于理不通。

其三,前有先例后有同例。毛泽东对亲朋故旧、知名人士和群众来信,除特急者外,一般是积几封一起处理,一天写几封回信是常事。同一天写的回信落款处或者年月日全写,或者只写月日不写年。这三封信就是都只写了月日没有写年。同样的实例还有很多。如:1950年3月14日致龙伯坚、刘揆一的两封信,1950年4月18日致毛森品、李淑一的两封信,1950年5月7日致文涧泉、张鼎的两封信,1951年1月14日致徐悲鸿、李思安的两封信,1955年5月1日致陈嘉庚、张四维、文炳璋、蒋竹如的四封信,1958年2月11日致陈玉英、杨开智的两封信,1960年9月2日致张维、田仕清的两封信,1961年12月26日致周世钊、臧克家的两封信,1964年3月18日致华罗庚、高亨的两封信,1965年7月18日致郭沫若、章士钊的两封信等,都是同一天同一时间连续写成的。竖写则全是竖写,横写则全为横写。其书体、通篇布局、格式、署名及所落时间和信中许多字的写法几乎都是一样的。由此可见,认定毛泽东致钟学坤、孙艳、周世钊的三封信为同年所写,是有理有据的。

其四是调查所得。

钟学坤在1977年2月22日上交说明中写道:1959年7月—8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毛主席作过登庐山一诗,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她请毛主席写一份给她作纪念。毛主席欣然提笔书写了一幅给她。钟学坤说“当时我读登庐山这首诗时,觉得里面有些句子不理解,于是在9月下旬,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向他老人家问好,另一方面问了问诗意(信是由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同志转给主席的)。到60年元月份我收到主席的回信(是由江西省公安厅的一位同志面交给我的)。”毛泽东在信中回答了钟学坤的提问。说毛泽东给钟学坤回信是1959年,我认为是完全可信的。

1994年6月7日,我问孙艳:毛主席“十二月廿九日”给你的那封信,究竟是1960年写的,还是1959年写的?我看比1960年要早一些。孙艳答应回湖南时帮助查查。同年10月13日,孙艳告诉我:“毛主席12月29日给我的那封信,是我在湖北音乐学院学习时,由李昭帮老师转交给我的。这封信是1959年12月29日写的,不是1960年12月29日写的。过去说是1960年的,是当时回忆时间仓促记错了。”同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唐洲雁为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向我询问12月29日毛泽东给孙艳的那封信的写成年份,我将孙艳的回答告诉了他。为了慎重起见,我还请他再向孙艳同志

核实。孙艳几次回答,均肯定12月29日毛泽东给她的信写于1959年,而不是1960年。上交原稿时,时间仓促,回忆不准。因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决定将这封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1959)中。

为了考证毛泽东给周世钊那封信的写成年份,1992年6月11日,我同周老的女婿吴美潮探讨过。我说,我认为比1956年要晚一些。他赞同我的意见。我请他查查周老有无对此事的记录。同年6月30日,吴美潮同其夫人周老之女周彦瑜写信告诉我:“关于1956年12月29日的信,确实时间错了,经我们再三研究辨认,查阅周老的记录,现已可初步确定为1959年12月29日。以后如有所得,必整理成文寄上。”吴美潮后来说,1956年12月5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过一信,说“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非有急事,不到一个月再次写信,是不大可能的。我认为吴美潮的看法很有道理。1997年初吴美潮又告诉我:“周老的秘书陈明新(现任湖南省政协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编著的《领袖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中说那封信是1959年的。书中写道:“我从1958年起至1976年止,任周世钊的秘书,时间长达18年。在这期间,我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和周世钊的许多次交往”,“我留心作了部分记录”,“仅从1958年我任周世钊的秘书以来,由我经手的毛泽东来信就有10余封”^①。该书“三十 毛泽东的诗友究竟是谁?”一节中例举了毛泽东给周世钊的12封信。其中“第七次是1959年12月29日,毛泽东复信给周世钊说:‘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读完此书,我写信询问作者认为“十二月廿九日”的信写于“1959年”的根据。答复是:关于毛主席第七次给周老信的问题,“我查了一下记录,没有记是哪天收到的。但是当时的情况我记得很清”,“请您相信,我是对的。”问题已经十分清楚,毛泽东“十二月廿九日”写给周世钊先生的那封信是1959年,而不是1956年。

综上所述,我认为,根据书体、书写用纸、当事人和有关人员的证明,可以肯定,毛泽东“十二月廿九日”写给孙艳、周世钊的两封信和毛泽东写给钟学坤的信同是1959年所写。

1997年8月

^① 陈明新:《领袖毛泽东与周世钊》第1、186页,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的考证^①

陈小枚 齐得平

中央档案馆收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份文献,是迄今我们看到的最早记载中共一大情况的、最具有权威性的重要历史文献。它详细记述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出席会议的代表、会议的经过情况、会议研究的问题,以及会议对某些问题的争论等等。但是,由于这份文献没有标明作者和成文时间,又是从莫斯科接收回来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俄文翻译而来,因此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未把它放到应有的历史地位。在由中央档案馆编辑并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也只是把它当作“附录”收入。

最近,我们重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董必武1929(?)年12月31日给何叔衡的信,并且查阅了这封信的档案原件。此信是董老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写给何叔衡同志的亲笔信。此信原件存放在从莫斯科接收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它的主要内容是回忆中共一大的一些情况。我们把这两份文献对照,可以看出它们所谈问题大体都是一致的,相吻合的,只是一个比较详细具体,一个比较概括简略。董老这封信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我们的特别注意,信中说:“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50年代我国从莫斯科接收回来的共产国际的档案中保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份文献,恰好回答了董老给何叔衡信中提出的:大会向国际作的《中国情形的报告》“这份材料不知国际是否还保存着?”的问题。而董老给何叔衡的亲笔信,对判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

^① 此文曾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会》这份重要文献的作者又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我们认为,信中所说的大会“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就是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文件,它是由李汉俊和董必武起草,并经大会通过的。如果上述判断不错的话,那么中共一大形成的这份未署名的文件,其作者也就不言自明了。

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份文件的形成时间,依据董老信中所说,这个文件是“经大会通过”的,即大会最后闭幕时通过的。那么大会闭幕究竟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从它和董老的信中提供的会议情况推算出来。文件中说:“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主席张同志(即张国焘——笔者注)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即指7月23日和24日这两天。“根据希夫廖特同志(即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笔者注)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这就是说,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起草文件。“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专门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作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作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作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这就是说,大会经过7月25日、26日两天休会之后,于27日、28日、29日三天时间,即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专门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问题,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后作出决定,而对党员能否到政府作官和当国会议员问题,还是不能得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里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这个侦探的到来,没有使党受到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之后,很快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董老给何叔衡的信中说:“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应是

南湖——笔者)船上,将会开完。”这就是说,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7月30日深夜原本在李汉俊家里召开,会议开始即遇到险情,“隔了一日”即7月31日,休会转移,于8月1日大会继续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研究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有的回忆材料说是8月1日晚上等游船上的游客走了之后才开会的。如果大会到一、两点钟才结束,那就是8月2日了。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另外,有的材料还说是8月5日闭幕(见1921年10月13日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因此,为了稳妥起见,可把一大闭幕日期判定为1921年8月初。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的形成时间。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与本文有关的两个问题:

1. 1959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筹备处曾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三份有关一大的文件送请董老帮助鉴别。同年9月5日董老在复信中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如果把载明年份的两个文件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对照着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有关大会‘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并研究了纲领和工作计划等句,可见载明年份的两个文件在没有载明年份的文件里可以找到他们的联系。可否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看作是某种组织或某人向第三国际的报告,而其他两个文件是附在这个报告里面的文件呢?这三个文件有漏洞,只有俄文而无中文,作者未具名、无年、月、日或仅有年份而无月日,无收发文的地点等等,作为唯一可靠的材料是有问题的,我认为‘较可靠的材料’是就我看到的某些关于一大回忆录时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谈到的问题,有些引起我的回忆,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这也是我认为‘较可靠’的一点理由。”董老在复信中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是“比较可靠的材料”,“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但也留下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看来,如果在1959年能把董老1929(?)年12月31日给何叔衡的亲笔信,连同一大的那三个文件一并送请董老鉴别,当会引起董老更多的回忆,作出更加明确肯定的答复。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能

将董老的这封亲笔信送去,借过了难得的机会。

2. 1983年中央档案馆编辑、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本)》一书中,不仅收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等文件,也收入了上述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当时,编者对信中“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这段重要的文字未能给予重视,没有把这封信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联系、对照,作进一步的研究,因而在“考证”中仍然只是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从内容上看,可能是一位‘一大’参加者在一九二一年‘一大’开过后写的”,未能作出更明确的回答,仍然给读者留下疑点。

我们认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如果将来再版,应当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作为一大的正式文献收入,而不应是“附录”。

重温刘少奇关于理论学习的若干论述^①

齐得平 田逢禄 陈小枚

少奇同志关心文书档案工作，建国后第一个文书档案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就是他主持批准的。我们当年的档案工作者也有幸为他做过多方面的服务。尤其是编《刘少奇选集》的那段时间，大家热情很高，积极查寻文献，走访熟悉刘少奇的老同志，编写简要的刘少奇年谱，建立“刘少奇全宗”；可以说，《刘选》的编辑，没有中央档案馆是不可能的，这里也显示了档案工作的重要性。

今年11月24日是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他是1969年11月12日经“文革”动乱之残酷迫害不幸病故的，离开我们快要29年了。历史沧桑，令人浩叹！为了缅怀这位伟人，我们重温了他关于理论学习的一些论述，以兹追念！

413

（一）

在少奇同志看来，共产党员必须锻炼修养，因为共产主义是历史无前的艰辛事业，没有修养不可能胜任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他在延安讲这个问题时，恰当地引用了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天降大任就是历史赋予我们以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荣伟大而艰巨的使命，修养就是为了“增益其所不能”。而首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为什么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少奇同志的回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如

^① 此文曾于1998年11月23日在《中国档案报》上摘要发表，标题为《高瞻远瞩 英明睿智》。

果我们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甚至可能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成为各种机会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应声虫。”“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的问题;谁是直接的同盟军、谁是间接的同盟军、谁是主要敌人、谁是次要敌人的问题;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同盟军,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联合次要的敌人,去打倒主要的敌人的问题;在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及时地改变战略和策略的问题,等等,都是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正确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果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度修养,要在革命斗争的一切重要问题上,站稳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要在情况复杂和变化剧烈的环境下,在需要走迂回曲折道路的时候,都能够确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都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根本无法做到的。”^①

“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这是饱噙血泪的经验之谈,这是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这应成为我们活着的共产党员的座右铭。这个话是1941年7月13日,少奇同志在写给当时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工作的宋亮(即孙冶方)同志的信中说的。他说:“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②

“不学行不行?少学行不行?不行。”这又是震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之声。这话是1948年12月14日,少奇同志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沟口《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讲的。他说:“为什么要办马列学院,为什么要学马列主义呢?特别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学行不行?少学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他首先作了一般的分析论断:“‘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列宁的有名的话,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党在提高理论修养方面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干部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对蒋介石斗争,对地主阶级斗争,艰苦奋斗,这很好。

① 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16-117页。

② 见《答宋亮同志》,《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0页。

但缺点是理论修养不够,许多同志最重要的缺点就在这里。就整个党来说,我们是不是有个马列主义理论的党呢?是的,是有理论的,而且从来就是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党。党中央、毛主席的马列主义修养,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多数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缺点。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马列学院办起来,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再回到工作中去,把工作做得更好”。^①他又进一步作了特殊的分析论断:“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了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所以现在采取许多办法,如在党内反对地主富农思想,反对资本主义意识,进行批评、斗争以至处分、撤职等等,都是为了挽救堕落的干部。否则,堕落的人会很多,会使革命失败。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②今天我们来重温他的这些论断会倍受震撼,益加感到他的英明睿智。

对于教条主义,刘少奇觉察和抵制甚早,概括起来指出其危害,也比较早。培育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他也是着力甚多的人。在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他就提出:“在党内必须克服严重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表现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我们的某些干部中他的毒很深。他只注意事物的表面与形式,而不注意事物活泼的内容;他只记得马克思主义的条文,而不能将这些条文活泼地运用到具体环境中去;……由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所产生出来的错误,给我们党的损失是

① 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09—410页。

② 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2—413页

很大的。”“我们的同志必须坚决抛弃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①

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进一步论述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否则,是学习不好的,是学习不到的。”“有一种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不能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只是肤浅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他们虽然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但是,不能把这些书籍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运用到活生生的具体实际问题上去。他们以背诵个别的原理和结论而自满,甚至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然而他们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活动方法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相反的。”^②“另一种人就完全和前一种人相反。他们首先把自己看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他们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他们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同时又着重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们不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要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上,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身体力行,活泼地去指导一切的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他们自己。”“只有这种人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③

“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把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互相割裂开来。我们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④这又是刘少奇留给我们的至理名言。他解释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的。只有彻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以无产阶级的理想为理想的人,才能彻底了解和掌握它。没有坚定纯洁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是不能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的。”^⑤“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党员,在他们参加

① 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71页

② 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6页

③ 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7页

④ 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12页

⑤ 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13页

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立场不很坚定和明确,思想意识也不很正确和纯洁,还有或多或少的、各种各色的、旧社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残余。显然,这些东西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直接相冲突的。但是,由于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在这种冲突中也就有了不同的结果。有的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时候,把这种理论学习同他的思想意识的修养正确的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去抵制和克服自己思想意识上的旧东西,这样,他就端正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纯洁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并且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去处理实际问题。这样的党员是很多的。另外有的人则走了相反的道路,他身上的旧东西积累得很多,有许多固习、成见和个人的物欲私念,而又没有改造自己的决心。在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时候,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去批判他思想意识中的这些旧东西,相反,他企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达到他个人目的的武器,甚至用他原来的成见去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因而他就不能够正确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不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他在处理革命斗争中各种实际问题的时候,就会因为他有旧社会的习惯和成见,有个人主义的打算,而患得患失,顾此失彼,徬徨动摇,不能无障碍地洞察事物,不能勇敢地拥护真理,不自觉地以至自觉地掩蔽和歪曲真理。这种人根本不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也就不能敏捷地、正确地、实事求是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去处理各种实际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没有正确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要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革命斗争的武器,是不可能的。”^①

这些乃是刘少奇为捍卫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

在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今天,重温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是很有意义的。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毛泽东带领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上空前振奋活跃起来。一九四一年九、十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

^① 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14-115页

扩大会议,大家在发言中,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理论作了高度的评价。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李维汉说:毛主席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朱德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刘少奇为纪念党的二十二周年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学说”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概念。文章说:“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①

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第一个明确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是王稼祥。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王稼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写道:中国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外国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②

^① 见《刘少奇造集》上卷第300页。

^② 见《王稼祥选集》等344、346、347、350、353、353页。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六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他在八月二日欢迎会上的演说中说道：“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①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说：“遵义会议之后，党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一九四四年七月，罗荣桓为纪念党的二十三周年而写的《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一文中写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上发展起来，继承了中国革命百年来的历史传统而民族化了的思想。”我们党“以毛泽东思想为遵循的方向”。

以上这些都是七大之前的情况，是研究毛泽东思想之提出的极其珍贵的材料。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实际是七大的预备会）上讨论“七大”政治报告和党章草案时说：“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出发点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以毛泽东思想贯串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第一次正式肯定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使用了“毛泽东思想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等概念，并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由于坚持了这一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

^①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8页。

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与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与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这十年内有了伟大的发展。”“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特郑重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着重于中共党史与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了。毛泽东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群众、党员群众与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与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与不可战胜的力量。”《决议》满怀信心地预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党章》第二条关于党员的义务,规定有:“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刘少奇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对于毛泽东思想进一步作了科学概括与全面论述。

刘少奇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刘少奇论述道: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伟大斗争及其丰富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

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斗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和国内国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投降路线、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原则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刘少奇概括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他说：“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刘少奇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封建残余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毛泽东同志“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刘少奇说：“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因此，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

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他深刻地预言:“在党内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那我们就可以预期,党内将会有一个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高涨。这就从思想上准备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历史已经证明了刘少奇的这些论述是完全正确的。

(三)

“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这是1964年9月30日刘少奇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提出来的。信中尖锐地批评道:“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应当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总结你们那里的实践经验,正确地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如果你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这样一篇讲话,那是应当要各级干部学习的。可惜,你的那篇讲话,不是这样的一篇讲话,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你的缺点在这里。由于你是大量地摘引和重述别人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即使都是很好的话,对其中的任何一段任何一句,都找不出错误。可能你是要保险不出错误,但是你却犯了一次教条主义的错误。”他分析根源说:“你为什么不能在我们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一篇能够解决问题的好的讲话呢?原因是你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许多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也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此,在你们的领导工作中,就不能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他发人深省地提出了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最近我在几个省委的干部会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你们省委、地委、县委领导基层干部更多一些,还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呢?我根据许多事实感到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而且是那些不大好的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因为你们听的汇报,看的表报,绝大多数都是从基层干部那里来的,基层干部的意见,你们是认真听的。好的代表多数群众利益的基层干部,是能够向你们反映群众意见的,但是却有相当多的基层干部不代表多数群众的利益,不向你们反映多数群众的意见,而你们又没有或很少认真地去直接倾听贫农、下中农和其他群众的意见。因此,在这些基层干部领导下的多数群众的呼声和意见,你们就听不到或很难听到。你们听到的,只是这些基层干部的意见。这些基层干部常常讽刺、指责那些代表多数群众利益的基层干部,使那些好的基层干部不大能说话,不大能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即使他们向上级反映了真实情况,有些上级领导同志也不大听他们的,

或者根本不听他们的。有许多基层干部对于你们的指示和党的政策,是愿意执行的就执行,不愿意执行的就不执行。到底有那些没有执行,你们又不清楚,并且不容易弄清楚。因此,我感到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而且你们常常是接受一些不好的基层干部的包围和领导。”

为了帮助干部从思想上解决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刘少奇在信中还讲了一段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了解情况、自以为是人,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二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我们常说的走群众路线。如果我们不能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不能直接听到群众的呼声,就不能参加和看到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不能从群众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客观真理,那我们就只能凭自己的头脑里想象的和文件上规定的许多框框办事,或者在别人的指挥之下盲目地行动。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并不怎么困难。这就要我们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去直接参加和观察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就能够听到群众的呼声,当然也要听基层干部和其他干部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就能够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要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就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再认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一直到行通了为止。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迷信了。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这段话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加写的,加写后的文字又经毛泽东斟酌修改过。这段话深入浅出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和方法,指明了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一的方法。

这封信毛泽东审阅过两次,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看了信的草稿后,即在批语中写到:“少奇同志:你的信及附件都看过了。你的信写得很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他第二次看了准备正式发出的信稿后,又在批语中写道:“少奇同志:我再看了你给×××信的全文,觉得实在好”。这封信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圈阅后,于1964年

10月20日中央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总政,并要各地再转发各地委、县委,要求联系实际认真地进行讨论,犯有类似错误的人,包括中央的和中央各部门的,都应当进行检讨。

这是刘少奇的最后一篇著作,给我们留下了研究党史的重要文献。

(四)

少奇同志是品德高尚的人,是坚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晚年在劫难中给我们留下的更是可歌可泣崇高伟大的形象。

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时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①这是老实话,而历史恰恰是证明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派人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在谈话中提出:(一)这次(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②“使党少受损失”,“使国家少受损失”,这是给毛泽东的忠告,可惜毛主席他老人家执迷不悟!

4月6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再次批斗刘少奇,当造反派问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时,刘少奇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③这是多么之义正词严!

4月14日,针对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刘少奇向造反派交出一篇答辩材料,逐条说明事实真相。其中在回答“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

^① 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6—647页

^② 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53—654页

^③ 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55页

阶级反动路线”时说：“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要读的其他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这个错误。”^①证明他坚持独立思考，决不随声附和。

8月8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②这是严正的政治声明。

1967年4月9日，他对家人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对子女们说：“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③

这如同在奏国际歌，好象在呼唤“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好象是在向党向人民宣誓……抒发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的纯洁的情操！

① 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56页

② 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58页

③ 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55页

对《毛选注释》和《党史》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改动的不同意见

潘合定 齐得平

周恩来同志指示,档案工作者要用档案印证历史,这是他赋予我们的崇高的职责。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来印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注释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91年7月版),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改写不符合历史真实面貌,是不正确的。谨摘述有关文电,以资印证。

426

一、中央的正确战略和张国焘的避敌退却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2月北平发生“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十二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方针问题及军事战略问题,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及《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规定“党在1936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红军要做“抗日的先锋队”,准备开赴前线抗日。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亲率红军抗日先锋军总部,从瓦窑堡出发,开始了东征。2月17日,先锋军发表东征宣言。2月20日,先锋军进入晋西地区,阎锡山不顾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调动全部兵力阻拦抗日先锋军去路,同时引进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协助堵截。3月1日,以先锋军总司令彭德怀、总政委毛泽东名义发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指出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次声明,在民族危亡的形势下,红军愿与一切爱国志士、仁人、军队联合起来,一致对日。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号召“全国红军与全国海、陆、空军集中华北打日本。”经过东征,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扩大红军八千余人,消灭敌人七个团,缴枪四千余枝,筹款三十余万

元。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为达到直接对日作战,号召“全国凡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5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西征,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指出红军西进“是实际准备抗日的必要步骤”。

8月12日,毛泽东等向二、四方面军提出战略方针的建议,希望三个方面军会合后,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边区,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出兵绥远,推动全国抗战之实现。10月14日,毛泽东等致电二、四方面军,“拟以红军各将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电,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红军愿作前驱。9月14日18时,毛泽东等关于占领宁夏的部署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一方面主力……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9月27日,毛泽东等还将占领宁夏服从大局的重要性电告张同焘说:宁夏有人口一二〇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之省,“与陕甘苏区联成一片……与绥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为劝阻张国焘不要西去,9月14日,中央告诉他们,如果一定要到甘西去,也要等到宁夏战役完成之后再去,同时给他们的任务是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10月或11月初取靖远,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并希望三个方面军用最大努力团结以赴。为了尊重他们的意见,还将张国焘要去甘西的电报转报共产国际。9月19日,毛泽东又将共产国际回电精神转告二、四方面军,指出我们的战略“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因此,夺取宁夏不仅可以打通苏联,而且对红军发展对全国统一战线上创造西北新局面上以及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9月24日,中央再次指出:现蒋介石调胡宗南20个团入陕,企图压迫削弱红军,隔断中苏,隔断东北军与红军之间联系,然后迫我就范,成立妥协。我之对策,第一步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敌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控制胡敌,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的一环,如红军因分散而不能达到目的,尔后将发生极大困难;至于第三步则在占领宁夏之后,

那时如已得到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再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但张国焘北上又发生动摇,对中央的战略方针和部署仍表示怀疑。9月16日,在岷州召开西北局会议,他首先发言说:目前西北敌人集结已很强大,这些敌人“也未睡觉”,“部署是要打我二、四方面军。”其四方面军的最好出路是“同新疆盛世才联合,取得安稳的地方。”又说一方面军现仅占有“环县、豫旺等九县,人口四十多万,地瘠民苦。”怀疑能否养活众多红军。会后9月22日、26日,张国焘连给中央数电,还是要准备渡河西进,他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地区,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9月26日12时,张国焘等关于四方面军西进致中央电中认为“红军集中在一块是不利的”。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环。”很明显仍不放弃脱离中央自成一个局面的打算。张国焘的主张和行动部署受到朱德、陈昌浩等的反对和抵制。26日12时,彭德怀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中也指出了张国焘的不良企图,“目的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相宗尚,使该敌以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所谓“一部出中卫援助一方面军夺取宁夏,这完全是鬼话。”当日,中央致电二方面军领导人,请他们向国焘力争北上,指明“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同日,毛泽东与林育英等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等,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分则两处均难占领”。在中央、二方面军和朱德等的坚持和督促下,张国焘被迫北上,10月10日三个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

为统一三个方面军的行动,10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规定:“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十一月十号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重训练,以便有力的执行

新任务。”

虽然三个方面军会合了,但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并未放弃,中央军委的部署并未执行,他却时刻企图藉执行宁夏战役调兵西进。在10月3日张国焘就提出四方面军要过河,并报告军委他们有造船工人和器材。当10月中旬蒋介石调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针对此情况,10月25日中央军委致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电指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张国焘对党中央领导部署始终怀疑,对阻击南敌毫无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部署,但不断提出异议,同日,即10月25日16时,他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名义致电中央军委、贺任关刘、徐陈电,通报三十军渡河成功,“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迅速渡河。”10月26日,徐、陈致朱、张、彭电:“我们即遵二十五号提议之电,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上述动向引起军委的注意,察觉出张国焘仍有西去的意图。10月26日2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二、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当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统一指挥全军。10月27日,彭德怀致毛泽东、左权、聂荣臻电,揭露张国焘“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池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并声明25日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即同意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的电报——笔者注)是“发后才给我看”的,这是“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10月28日12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电张国焘、朱德等,指出“目前我们已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力量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中央军委为阻止南敌追击,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以停止其追击。但10月28日,张国焘给中央军委电,找借口称:很难“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提出要“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待“取得物质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10月30日,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朱德,指出目前方针仍是“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但张国焘对打击胡宗南部始终无信心,使胡敌向宁夏急进而丧失战机。同日,中央关于红军布署

致共产国际转王明电指出：“我现处南北两敌之间，中间回旋地已极狭”，“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11月2日，徐、陈致电朱（德）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此方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建议“向于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出动待敌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极大困难之境况中。”“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2月12时，毛、周致电徐陈：“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11月3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及王明、陈云致中央书记处电：“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为克服困难，11月3日22时，毛（泽东）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

11月4日8时，率三军及总部两万余人已渡河之徐陈致电朱张，提出：“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制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

11月5日14时，张国焘趁机命令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根，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11月6日已渡过黄河的红四方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决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集中三个军向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前进，并准备于12、13日出动。张国焘当日即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批准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电报称：“你们的独立行动，对实现党的策略路线和战略方针有极大意义。”“你们即在甘北、宁夏西部、青海东部大大扩大活动区”。7日，张国焘又电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陈：“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为（以）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从此，过河部队完全脱离了宁夏战役部署，根据张国焘命令向西面去。

二、西路军的失败

西路军西去完全背离了中央关于集中打击胡宗南部队的部署和东出抗日的战略总方针。由于长期受张国焘退却路线的影响,争取广大指战员到党中央正确路线上来,要有一个过程。为此中央对张国焘作了重大让步,同意成立西路军,同意他们从新疆打通苏联。但这条道路十分艰险,又属少数民族地区。敌人除马步芳、马步青之外,加上民团地主武装有 11 万余人。路程东起凉州,西迄高台,长达数百里。北面沿龙首山脉和古长城外的荒凉大沙漠,南面为终年积雪海拔四千五百米的祁连山,中间宽不及百里,村庄冷落,人烟稀少,其中永昌、山丹两县在百余里的狭小地带,人口只有 11 万,回汉杂居,没有党的工作,在敌人长期欺压下,回族群众对红军不了解,对作战极为不利。11 月 18 日毛泽东又将邓发去新疆遇到的困难情况去电告诉他们。从肃州到安西有 8 天坏路,人烟稀少难行,安西到哈密有 1500 里,全为沙漠无人,而盛世才规定去新疆需有个人护照,以示要慎重考虑。

11 月 11、12 两日,毛泽东、周恩来又先后分到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朱德、张国焘,询问西路军“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11 月 12 日,西路军领导人复电中央军委,红军总部:“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

11 月 13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

由于威协陕甘宁边区和阻拦红军东出抗日的主要敌人胡宗南部队,中央部署山城堡战役的同时,立刻派周恩来去前方红军总部与朱德、张国焘商量西路军是否东返和如何配合河东红军打击胡宗南部队问题。

11 月 14 日,朱德、张国焘关于西路军行动问题给西路军领导人并中央军委电中认为“东追之敌并不多,守甘、凉、肃之兵力亦不充足,最利你们各个击破敌人,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你们必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11 月 15 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意西路军向凉州进。同日,朱德、张国焘向军委报告,西路军“虽处在严寒结冰而缺衣环境中,士气仍旺,”“该地人户近万且丰富,粮柴亦不缺。”11 月 17 日 8 时,徐

陈致中央电称：“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

11月19日，周恩来到达前方红军总部，商定了西路军行动，并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四人致电徐面前陈昌浩，西路军“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并传达了远方“经哈密接济你方已原则上同意，”“大约以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接济，现正急谋小部接济，大的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你方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克服一切通新疆方面的交通和气候上困难的准备是必须的”。

11月中旬，西路军右路第三十军绕过大靖，包围了土门子，迫使守敌三五〇人投降，又乘敌主力被我左路第九军吸引在古浪地区之机，先围凉州，继占四十里铺（今永丰）和永昌，一部兵力于21日进占山丹。随后第五军进驻山丹，第卅军主力集中于永昌至四十里铺一线，西路军总指挥部也到达永昌。其间，第九军在袭占古浪之后，遭到敌人步、骑兵五个旅及民团的连续反击。我军据守城垣及外围驻地，顽强抗击三日，毙伤敌二千余人，但自身亦伤亡甚大，于18日晚撤出古浪，转移四十里铺。

11月23日，毛泽东、张闻天关于西路军作战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

11月25日，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因苏联反对西路军去新疆，同意物资运到安西，11月27日，中央发出西路军不要进入新疆作战方针的指示。此时马步芳则利用红军刚深入甘西地形不熟给养困难的情况，集中兵力不断寻求红军作战，敌人除以主力辗转猛攻红军主要据点之外，并以骑兵深入红军控制中心到处袭扰，切断各点之间的联系，控制红军活动。11月底至12月初，我军在永昌、山丹与敌决战，予敌以重创毙敌约六千人，但敌人却得到源源不断补充，实力得以及时恢复。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为抵御亲日派调兵威协西安，张学良、杨虎城要求西路军一部出靖远，并协同河东各军测击胡宗南部。12月20日，周恩来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央军委，要西路军东进，并建议：“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

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学忠）部打通，张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

22日，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征询他们对部队东返的意见。23日12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给中央军委复电提出：西路军如东进，存在着道路、气候和沿途敌情等许多困难，其策应主力行动的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价，而“迅速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

12月24日24时，军委主席团再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可以箝制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关（麟征），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并要他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12月25日10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告电复军委主席团表示：“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又强调“估计到国内战争的长期性及目前西路军实际情况，此间23号12时致军委电中所述各节请予考虑。”并提出“西路军东进前，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兵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东进”。27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西路军领导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12月底，西路军从山丹、永昌地区继续西进。1937年元旦拂晓，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五军一部攻入高台，其余各军和总部到达临泽地区，分驻于临泽之沙河堡、仇家营子一带。

1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西进。”

1月7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到安西，送致肃州是不可能的”，“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

1月中旬，敌人集中步、骑兵7个多旅于甘州以西，以一部兵力牵制我西路军主力，以约5个旅兵力，向高台五军发动进攻，高台城于20日失陷，西路军损失三千余人，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牺牲。

1月21日1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电告军委主席团，准备东进，“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取）凉、古，接通兰州。”毛泽东接电后，于凌晨

2时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1月24日，西路军领导人电告军委主席团，西路军全人数一万四千余人，内战斗部队不及五分之二，并提出：“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

1月25日，军委主席团再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通报了我党与国民党谈判情况，“蒋已允红军主力驻陕北，一部驻陕南，西路军驻凉州以西”。

2月24日，西路军进至甘州，顺利地在这里驻敌一个骑兵旅及宪兵团击溃。陈昌浩等认为这是敌人崩溃的转折点，又决定重返倪家园子，准备继续西进。敌人复以重兵围攻，经苦战半个多月，我伤亡惨重，全军已不满三千人，至此，西路军归于失败。

西路军失败后，军政委员会于3月14日决定（未经中央批）：主要领导人“徐、陈脱离部队”返回陕甘宁苏区，将余部二千多人分成三个支队，在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深入祁连山区打游击，有四百余人进入新疆。

三、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

1937年3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张国焘错误进行了初步批判。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等。毛泽东说：张国焘对政治情况估计不清。原来是要他去进攻宁夏的，后来改变方针在西方建立根据地。他们对蒋的联合始终不相信，总是要在甘北，总觉得在西边好东方不好。政治局从未采取向西向甘北的方针。他们自我批评精神很差，对于他的指导，总是不回答或是作夸大报告，多是假的，打了败仗反说打胜仗。西安事变后，要他们调兵向东南，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两个条件，实际办不到。张闻天说：西安事变中央要他们回来，但拉也拉不回来。

与此同时，凯丰在中央党刊——《党的工作》上发表《党中央与张国焘分歧》一文，指出在甘南，国焘同志主张西进（至青海甘西），在全国红军会合后，国焘私自调动部队渡过黄河向甘西退却，说明张直到达中央前还是没有解除他自己的武器，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同时也说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

3月23日至31日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共开了8天,有两项议题:一、研究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党的任务;二、讨论张国焘的错误问题。3月26日完成了第一项。3月27日到31日进行了第二项: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洛甫、博古、张国焘、朱德、林伯渠、彭德怀等六〇人。

27日会议开始,首先由张国焘做了长达四千五百多字的报告,检查了他犯错误的经过和事实,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的错误,军阀主义的错误。原因由于对政治形势估计不足,对党的领导的忽视。”

毛泽东发言中说到:西路军的失败是极不幸的事,国焘路线毫无疑问是全部错误的。国焘主义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相信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北上没有去过,所以他反对。我说阿坝去不得,他却死也愿意到黄河边。后来南进的时候,他由经验中相信走不通了。他要到西去,走不通主要不是中央的问题。他为何只看见日本和蒋介石的力大无穷,而不看见这其中的种种复杂矛盾。为什么中央的估计能够是另外一样?为什么我们能有胆子敢到陕西和山西?这对国焘是永远不能设想的。所以他以为十倍于现在的力量都不能战胜日本的力量。结果就必须面靠高山,身居草地才算安稳。中央尽力迁就他,国焘在红军的分裂的问题上是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

渡河的时候,他要全部过去,过了三个军我们才知道,于是只好顺水推舟,“批准”了。后来我们电问西路军的情况,他只回答“与回民很好”,实际上是假报告。

任弼时发言说到:在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要二、四方面军一块儿向西退却,还准备调换二、六军首长。我便向他表明态度,说明唯有在十二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的。国焘的北上,目的基本意图是过黄河以西,并拒绝与一方面军的会合。他对统一战线始终是怀着不相信的态度。他看到红军数量少了,便唯有向西退却。他主张退到西康西宁,再有机会才出来。

他看不到革命的形势,看不到阶级力量的变动,看不到革命的力量,因此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战略上不能不向西跑。四方面军的损失——西路军——是国焘路线造成的严重的恶果。

洛甫发言说到:由对革命的机会主义的估计出发,如夸大日本的力量,红军即使有十倍也不能打日本。对于蒋介石也最怕的,他看见胡宗南就跑,表面上要打胡宗南,实际上要开小差到甘肃的弄堂,躲到蒋介石部队不能来的地方

便是最好。

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央非常痛心的,也是红军未有的耻辱,这是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这是血的教训。

这对于党是严重的教训。西路军同志的英勇艰苦,我们是佩服的,但是失败了,想将这责任推向中央,这企图是不成功的。如果不是胡宗南来,那四军、三十一军也无疑跟过去的。西路军的失败,是空前绝后的耻辱。

张国焘最后表态说到,我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我现在宣布我的错误的破产,以前种种昨日死,以后种种今天生。

由于张国焘错误严重,中央解除了他对红军的指挥权,一切重大军事决策归到军委主席团,但仍准他参加中央会议,后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是年秋,陈昌浩回到延安也先后作了两次检查,承认没有“拒绝执行国焘同志的渡河计划”,“还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至少三十一军继续渡河,以免分散四方面军。”“西安事变后,中央及军委诚心是想调我们东返,只因为我们立意西进,最后亦只得电允西进。”由于陈昌浩在岷州会议时,力主与中央红军会合,中央从宽处理,同意他到苏联去学习。)

3月3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详细阐明: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决议》是中央政治局听了张国焘关于四方面军工作的报告,并详细检查了四方面军各种文件及材料之后作出的。是有充分根据的,这些文件及材料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四、我们的看法

《毛选》第二版对“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的注释作了修改,并有编者的校订说明,这里只能全文引述:

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第1版182页倒6行,注[19];第2版198页倒6行注[25])

【原注文】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

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新注文】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校订说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于一九三六年六月末七月初在甘孜会合。七月五日,二、六军团奉命组成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甘孜出发北上是在七月上旬。此时正值夏季,不是秋季。

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前,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的抵制和斗争,张国焘已经被迫同意北上。两军会合后,红四、红二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今金川)出发,于十月分别到达甘肃会宁、将台堡,实现了第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根据上述情况,新注文作了适当修改。

原注说,“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事实上,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从十月二十四日晚起相继渡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五军和九军共二万一千余人,当时并未称作西路军。过河以后,在宁夏战役计划未能如期实现,河西部队与河东红军主力被敌军隔断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才于十一月十一日正式授予河西部队以西路军称号,并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行动。

原注的“渡黄河向青海西进”一语,应改为“渡黄河西进”,因为五、九、三十军渡河后是向河西走廊一带(甘肃西北部)进发的。

原注说,“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事实是,西路军从十一月下旬开始至十二月上旬,在凉州、永昌、山丹等地曾同军阀马步芳等部的优势兵力连续战斗,半个多月里毙伤敌六千余人;而西路军自身由于长期孤军奋战,补充无源,虽然由过河时的两万余人减至一万五千余人,但尚不能说基本失败。西路军是从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开始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等地区与七万余马家军血战中逐步陷于绝境而于同年三月最后失败的。根据这些情况,对原注作了修改。

《校订说明》对原注中存在的一些具体史实问题作了订正,自然是必要的,也是一种贡献。但却否定了两个具有根本性质的历史事实,即否定了原注中指出的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后“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和张国焘违背中央部署,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二万余人(即五个军中的三个军加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非“一部”所能准确表达的提前)西渡的史实。对前一个史实的“适当修改”,则根本否定了被迫作出北上转移的张国焘长时间内仍拒绝承认中央、拒绝与中央会合、坚持其向甘西退却的历史;对后一个史实的“适当修改”,则根本否定了红四方面军主力提前西渡是张国焘畏敌避战、破坏中央关于宁夏战役部署、企图在甘西形成与中央分庭抗礼的独立局面而命令和策划的历史,变成了“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无须讳言,这种“适当修改”是极不适当的,即使对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作出了一些必要的适当修改,也难以掩盖这种根本原则性的错误。读者会从中引出疑问,修订者是否在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翻案?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改动是: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

对《毛选注释》和《党史》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改动的不同意见

宁夏战役计划。”(上卷 419 页)^①

“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虽然毙伤俘敌约 2 万人,但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终于遭到失败。”(上卷 421 页)

从史实上看,不仅四方面军的九军、五军和四方面军总部的西渡黄河无中革军委命令,就是三十军渡河也无中革军委命令。请我们的党史研究工作者仔细查一查,中革军委发出过要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和四方面军总部及五军在什么时间渡河的命令吗?对于失败的原因说成是“敌众我寡”,缺少关于张国焘路线问题的论述,则是回避了党史的真实的历史经验。

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改动应当严肃地重新研究。

2000 年 8 月。

439

^① 《中国共产党简史》改称:“1936 年 10 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二万多人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2001 年版第 45 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又改称:“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 10 月 25 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2002 年版第 508 页)

忆在毛主席身边做速记工作

田逢禄

我过去主要是在中央机关做速记工作和档案工作。今年七月一日,是我党的八十周年华诞。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想写一点在毛主席身边做速记工作的一些情况,以资纪念。

我是1946年2月从抗大七分校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速记室学做速记工作,住在延安杨家岭。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47年2月的一天下午,到食堂吃饭的路上,看见毛主席从窑洞里出来,只见他满面笑容,用力甩动着双臂,兴高采烈地走向延河边散步。他那魁梧的身材,正如我想象中的样子一样,但他为什么那样高兴?就不得而知了。在食堂吃饭时,遇到抗大的一位同学,他当时在中央机要处工作。他对我说,他们刚刚收到从山东发来的一个电报,说我们的部队在山东打了大胜仗,消灭敌人五万多人,还活捉了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李仙洲。他们把电报翻译出来后,就立即送给毛主席。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也十分高兴,同时也及时解决了毛主席为什么那样高兴在我心中的疑团。那时我正在速记训练班学习和实习,还没有正式参加速记记录。

我正式参加速记记录,是1947年3月中央撤出延安,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以后,在那里,先后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军工会议、敌工会议等会议的速记记录。此外,还到阜平县城南庄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土地会议和在石家庄召开的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的速记记录。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场地方很小,没有安排速记员参加记录,只安排了廖鲁言、师哲、曾三、伍云甫四人做汉字记录。

在西柏坡期间,有一件事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大约是在1948年10月的一天,组织上突然宣布机关要准备搬家,沿滹沱河西去,转移到平山县与山西五台县交界的地区。过了没几天,又说情况有变化,不走了。后来才知道,当时突然得到消息,说傅作义的轻骑部队沿京汉路迅速南下,而我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大都部署在怀来地区,准备在那里寻机歼敌,在西柏坡以东沿京汉路以

西地区,根本没有部署部队防守。当时傅作义的部队已抵达距离西柏坡不到一天的路程,情况十分紧急。所以我们一方面机关人员准备迅速搬家,向西转移,以防不测;一方面急调部队连夜东进至京汉路以西地区。幸好,当时傅作义的部队怕中我军埋伏,没有敢再冒然前进。由此可见,傅作义的情报工作并没有做好,同时也说明我们根据地的人民和部队的保密工作做得又是何等好啊!

1949年进京以后,召开各种会议很多,一个接着一个。开始机关住在香山,而我们因工作需要,大都住在城里。在北京,先后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全国政协筹备会及第一次全国政协大会、第一次全国文联大会、工会工作会议、宣传工作会议、组织工作会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高饶问题座谈会、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八届一中全会、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及武昌会议等等会议的速记记录。这些会议记录,现在大都收存在中央档案馆,成为中央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参加这些会议记录过程中,有些情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1950年6月,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会前已写好向大会做的书面报告,题目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在会上的讲话,主要是对书面报告的说明。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任务很重,因此,我们现在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要尽可能多团结一些人,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说这就是我们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他的这个书面报告和讲话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同志是我们党的财经工作的权威和专家,他在讲话中深刻分析了当时国家面临的财经工作状况,提出许多克服困难的办法。但因他讲话的上海口音很浓,有些话我们听不懂,加上他讲话中列举了很多具体数据,所以记录起来十分吃力。在会议休息时,毛主席来到我们的记录桌旁,看到我们记录纸上的许多速记符号,弯弯曲曲,问道:这就是你们的速记吗?我们回答说:是速记,是汪怡式速记。接着他又关心地问道:你们都能记下来吗?我们说:陈云同志的讲话不好懂,有的听不懂,记不下来。毛主席又笑着说:不要紧,你们都还年轻(当时我们都是20多岁),以后要注意锻炼提高听话的能力。我们几个速记员异口同声

地说：“谢谢主席的关心”。说罢，毛主席便到休息室休息去了。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使我们终身难忘。

1956年9月，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八届一中全会，会议要酝酿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会前，中央已提出一个名单草案，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是邓小平，并且规定由党的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酝酿讨论时，邓小平提出，他不能当总书记，理由是一不行，二不顺。毛主席说：我跟小平同志共事多年，我感觉，他这个人办事比较公道，比较会办事，他能容人，能团结人。我们的这个总书记，就是你这个中央秘书长现在的工作嘛！怎么不行呢？接着彭真同志发言说：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我认为小平同志一行二顺。其他许多同志也发言表示同意小平同志做总书记。会议选举结果，中央提出的候选名单顺利通过。后来的历史事实也完全证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是很得力的，为党中央扎扎实实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442

1957年8月，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另外还特邀了两个右派分子参加会议。会议从早晨7点开始，早餐也是在会场上吃的，由服务员送到出席会议的各同志身边。毛主席在会上分析了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他说有的人趁我们党整风的机会，向我们猖狂进攻，气焰十分嚣张，并说他当时拉肚子，发高烧，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下不了床，心情很沉重。会上，他还特别讲了邀请两个右派参加会议的问题。他说：听说我们有的高级干部，我们的部长，对于我们邀请两个右派参加会议很有意见，思想不通，反映很强烈。说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现在毛主席召开会议，右派可以参加，而我们却不能参加，有意见，想不通。我说，应该想通。不错，你是老资格，参加了打天下，立过战功，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是我们的部长。可是，我们召开的是我们国家的最高国务会议，要研究决定国家大事，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你的意见，有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完全可以代表，而右派的意见你能够代表吗？说到这里，会场上先是笑声，接着就是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我当时听了这些话，心情也十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深深感到毛主席的胸怀是多么宽广，分析谈论问题又是何等的尖锐深刻！

1958年11-12月的武昌会议，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中央会议的速记记录。这次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召开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和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二阶段是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

在这次会议中间,毛主席提出,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他的这个提议,受到与会同志们的强烈反对。后经过反复做工作,说明不担任国家主席的好处,可以省去许多送往迎来的礼节性的事务,可以集中精力多考虑一些党和国家以及世界性的大事。并且毛主席还一再表示,如果情况有变化,一旦国家需要,他还可以再出来担任国家主席。会议经过多次反复酝酿讨论,并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向家里打电话,让全国各地同志一起酝酿讨论,征求意见,做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最后终于统一了与会同志和全党的认识,同意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改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待以后人大开会作出正式决定。记得在这次会议酝酿当中,毛主席还曾说过,他考虑将来适当时机还要辞去党的主席,请同志们委他做党的名誉主席。

毛主席在武昌会议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都具有两重性,它们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从本质上看,从发展中看,它们是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并不可怕。但在具体实际的斗争中,它又是真老虎,铁老虎,活老虎,是要吃人的,成千成万地吃,决不可掉以轻心。毛主席的这一精辟论述,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文的题解里。

关于速记和录音的问题。我们进城后不久,50年代初,为了配合速记,保证记录的质量,中央特会室从香港购买了两台钢丝录音机,由速记室掌握使用,主要是配合速记。后来,又从莫斯科接收档案时,带回两台磁带录音机,并带回一批录音磁带。从此速记室配备了录音员,并建立了录音档案。这时的录音员,除配合速记工作外,还兼管了录音档案。

过去我们许多领导同志讲话,很少是事前写好稿子,在会上照本宣科,都是即席讲话,顶多写个讲话提纲,讲起话来生动活泼,很随便,尽情发挥。当看到会场出现录音以后,开始有不少同志很不习惯,害怕录音,甚至有的人提出,如果要录音,他就不讲了。为了避免引起麻烦,我们在录音时,只好将录音机放在后台隐蔽的地方。

速记室的建制原来是在中央秘书处(后来是秘书局),住在中南海的外边,所以有时中央临时决定开会,来不及组织速记和录音。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大都是即席讲话,没有稿子,有时讲话很精彩,汉字又记不下来,无法补救,留下历史的遗憾。有鉴于此,杨尚昆、曾三等人即研究决定,将速记室划归中央机要室。当时的中央机要室是由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中

兰台稿存

央领导同志的秘书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等同志组成。这样，把速记室划归中央机要室，中央召开各种会议，就可以及时安排速记和录音。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说机要室保存的一批录音档案要销毁，在销毁之前要把它记录整理出来，我被指定参加了其中有的录音的速记记录。

本来，录音是为了配合速记和保存档案。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诬蔑杨尚昆等人搞秘密录音，是特务活动，并由此牵连伤害了许多无辜的好同志，被打成黑帮反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同志都已得到彻底平反。

一代伟人毛泽东，虽在晚年犯有严重错误，但他光辉的一生，他的英名，将永世长存！

2001年3月28日 北京

关于一封电报的考证^①

齐得平

[摘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收入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这份电报是张国焘盗用了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出的。张国焘打着“宁夏战役”的幌子,兜售其逃跑主义路线,对抗中央“击破南敌”的正确决策,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445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收入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这份电报需要鉴定和诠释。请看电文:

“中央军委、贺、任、关、刘、徐、陈:

甲、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

乙、我们的意见:

一、一方面军将来主要在全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以从王堆子渡河为次要,必要时可从五佛寺渡河。

二、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

三、我军若以一部在海固线以南活动,可维持较宽活动区。若让海固线给东北军,可缩小胡敌进攻正面,发生阻挡胡敌前进作用。究以何者为宜,上述

^① 此文曾刊于《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后收入2004年10月出版的《中国精典文库》。

兰台稿存

三点请中央军委指示。

丙、纲领：

根据中央军委历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时期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活动地区和尽量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扩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斗（略）目的。

丁、布置：

一、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左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二、二方面军除四师向七营开进，接替一方面军任务，另外主力应以海原东二十里之马营和其西之靖西、安州为重点，组成若干支队，在硝河城、将台堡、王家河、新营、赵化川、孙家原一带，为有力之活动。目前应尽量保持单家集、平峰镇在我手中。该军目前部署、当面敌情、地区情况，应否经常电告。该军应设法吸引敌人于自己阵地前方，如敌不进应在海固直到西兰大路这一地区开展工作，情形适应以运动防御迟滞之。

三、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关城堡地区，准备渡河技术，其在海原附近之七十五师，应俟二方面军接防后开始归还建制。

戊、上述任务约于十一月十七号前完成，执行方法，另以个别命令指示之。关于政治、军事、对内对外各项工作，仍按照中央关于十月作战纲领电所指示继续执行。诸同志有何意见，请即电告。

朱、张、彭”

经考查，这个电报的作者只是张国焘本人，其内容与中央的战略决策相反（中央要打他要走）。张国焘盗用了朱德和彭德怀的名义。

当时（10月22日）蒋介石已到西安督战，毛炳文、王均、胡宗南等部，正由南向北大举进攻。张国焘上述电文表明，在他看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此外别无出路。他打着“宁夏战役”的幌子，来兜售其逃跑主义的路线，引诱红军走入歧途。可是，张国焘的算盘和伎俩，没能逃过毛泽东的明察。毛泽东看过张国焘的电文，立即（10月26日21时）打电报给彭德怀，指出：“国焘有出

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这也就是说张国焘以“宁夏战役”为名,实际上是避战逃跑。彭德怀随后(10月27日)给毛泽东、左权、聂荣臻电,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了:

“甲、大帅(指张国焘——笔者注)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池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

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钟)、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

丙、本日决去找徐陈面谈。

丁、前廿五日前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彭德怀上述电文中的“发后才给我看”等文字,明确无误地澄清了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联名电乃是张国焘盗用朱、彭名义的“一种阴谋式的”行为。

中央的正确决策同张国焘的避敌退却是泾渭分明的。事情很凑巧,恰好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等,提出“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然后再集中向北。这才是中央正确的决策。彭德怀电文中的朱德等同志“拥护中央”,说的就是拥护中央“击破南敌”的英明决策;说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指的也就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击破南敌”的正确决策。

2001年10月

关于西路军渡河问题的材料校评

田逢禄 耿仲琳 齐得平

我们不同意关于西路军渡河问题对《毛选·注释》和《中共党史》的修改。趁我们的头脑尚清楚之际，整理出这份材料，以备查阅，略偿我们做为档案工作者的应尽的职责。

(一)这份电报需鉴定

这份电报需要鉴定和诠释。请看电文：

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时)

中央军委(及)贺、任、关、刘、徐、陈：

甲、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

乙、我们的意见：

一、一方面军将来主〔尔后〕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以从王堆子渡河为次要〔〕，必要时可从五佛寺渡河。

二、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形〕较窄，一则〔须〕四天露宿〔路程〕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

三、我军若以一部在海固线以南活动〔可〕，〔应〕维持较宽〔少〕活动区。若让海固线给东北军，可缩小胡敌进攻正面，发生阻挡胡敌前进作用。究以何者为宜，上述三点〔项〕请中央军委指示。

丙、纲领。

根据中央军委〔历〕〔前〕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时期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活动地区和尽量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和〕扩

大活动〔西兰大道的北广大〕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斗(略)目的。

丁、布置〔部署〕

一、一、四方面军布置〔部署〕,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等〕古浪一带地区重,〔要〕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扼〕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必要〕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在〕河左〔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均〕必须渡河时,其〔余〕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二、二方面军除四师向七营开进,接替一方面军任务,另外主力应以海原东二十里之马营和其西之靖西、安州为重点,组成若干支〔牵制〕队,在硝河城、将台堡、王家河、新营、赵化川、孙家原一带,为有力之活动。目前应尽量保持单家集、平峰镇在我手中。该军目前部署、当面敌情、地区情况,应否经常电告。该军应设法吸引敌人于自己阵地前方,如敌不进应在海固直到西兰大路这一地区开展工作,情形适应以运动防御迟滞之。

三、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关桥堡地区,准备渡河技术,其在海原附近之七十五师,应俟二方面军接防后开始归还建制。

戊、上述任务约于十一月十七号前完成,执行方法,另以个〔分〕别命令指示之。关于政治军事〔纲领〕,对内对外各项工作,仍按照中央关于十月〔份〕作战纲领电所指示继续执行。诸同志有何意见,请即电告。

朱、张、彭

廿五日十六时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之839-840页。错字漏字很多,“□”内为错漏,“〔〕”内文字为我们所校对订正。而一方面军渡河时间,把原电之“尔后”二字改为“将来主”三字;把表示四方面军渡河部队范围的“均”字,改“如”字,大大弱化了“全军西渡”的原意,似乎是蓄意篡改。)

经考查,这个电报的作者只是张国焘本人,其内容与中央的战略决策相反

(中央要打他要走),张国焘是盗用了朱德和彭德怀的名义。

当时(10月22日)蒋介石已到西安督战,敌毛炳文、王均、胡宗南等部,正由南向北大举进攻。张国焘上述电文表明,在他看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此外别无出路。他打着“宁夏战役”的幌子,来兜售其逃跑主义的路线,引诱红军走入歧途。可是,张国焘的算盘和伎俩,如何能逃过毛泽东的慧眼,毛泽东看过张国焘的电文,立即(10月26日21时)打电报给彭德怀,指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这也就是说张国焘以“宁夏战役”为名,实际上是避战逃跑。彭德怀随后(10月27日)给毛泽东、左权、聂荣臻电,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了:

1936.10.27

“毛左聂:

甲、大帅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池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

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

丙、本日决去找徐陈面谈。

丁、前二十五日前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彭德怀”

彭德怀上述电文中的“朱德同志拥护中央”、“发后才给我看”等文字,明确无误地澄清了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联名电乃是张国焘盗用朱、彭名义的“一种阴谋式的”行为,只能代表张国焘个人不能代表“红军总部”。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个电报时必须知道这些情况,否则便会上当。

中央的正确决策同张国焘的避敌退却是泾渭分明的。事情该多么之凑巧,恰是同一天,中央发出了击破南敌的如下电报:

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

甲、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

乙、因此，部署应如下：

(一)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三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攻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

(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二方面军除派赴七营部队外，尚余其主力。对南敌不须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励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

(三)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

(四)在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如何盼复。

毛 周

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这才是中央正确的决策。前引彭德怀电文中的“朱德同志拥护中央”，说的就是拥护中央“击破南敌”的英明决策；说“大帅（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进击的计划。”“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指的也就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击破南敌”的英明决策。

张国焘在电文中说：“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这里需要摘引徐、陈二十四电文：^①

“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向发展。四军在马家堡、干沟驿抗敌，节节后退。五军位郭城驿并封锁靖远。而后五、四军续渡北岸。”“建议一、二方面军另由靖远以北抢渡。”

这是全军西渡的意见，已与《十月份作战纲领》完全脱离。在三十、九、五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未收录此电，是有意不收还是无意遗漏，不得而知。

军已经西渡黄河后,1936年10月30日,张国焘又挟四、三十一军渡河,在离渡河点四华里的地方受胡宗南部阻击,渡河未成。后来敌人封锁日甚,张国焘才被隔在东岸,他的全军西渡的图谋才未能实现。

事实告诉我们,部队渡河,完全是根据徐、陈24日电报和张国焘25日电报行事,和《十月份作战纲领》相悖,更无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这是清清楚楚的。由此可知,竹郁所说“事实告诉我们,部队渡河,完全是根据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和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行事的”,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诡辩!

(二)竹郁的要害是把张国焘(25日电)这根“鸡毛”充作了“令箭”

《西渡原委与“西路军”由来》是竹郁的奇文,胡编滥造,任意扯谎。谨将其要害部份全文引来。我们的校评,用黑体字注于其文内,供读者审阅。

西渡原委与“西路军”由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党中央和军委鉴于陕甘苏区粮食和经费“困难已极”,难以支撑下去,同时蒋介石又调集兵力,准备组织“通渭会战”,妄图将红军消灭在河东的西兰通道地区,故决定将冬季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提前执行。(着重点为校评者所加,下同。“决定”“提前执行”者是谁?中央决无此决定!!!胡编滥造,任意扯谎,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时,东北军之何柱国骑兵军位于海原、李旺堡地区,王以哲六十七军位于固原、平凉、隆德地区,于学忠五十一军位于兰州、定西地区。蒋介石之嫡系胡宗南第一军进至秦安、清水地区,王均第三军及关麟征两个师向天水、甘谷集结,毛炳文三十七军向陇西、武山、榆盘集结。东北军虽与我党有统战关系,但在蒋介石严令出战的情况下,不得不摆出向红军进逼的姿态;而蒋之嫡系精锐则忠实执行其灭共旨意,疯狂向我进攻,其中,尤以胡宗南部为最。

(一)十月份的作战纲领

党中央和军委根据夺取宁夏的战略方针和敌我情势,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主要内容如下: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作战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按：在今宁夏阿拉善左旗地区，当时苏联拟向这里运送支援红军的军用物资）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豫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张国焘不要向南防御了，要跑，要“全军西渡”和《纲领》有何共同之点？）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庚、十一月十号前各部队注重休息（为何10月24就要“全军西渡”了？）补充、扩大，尤其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地执行新任务。

在此同时，中央为统一军事指挥，团结张国焘，完成夺取宁夏的任务起见，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因准备与蒋谈判，暂不参加），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和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组织指挥。《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全部任务，亦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张国焘自北进以来，虽没有向党承认其路线错误，但因已与党中央取得了召开六中全会解决已往分歧的一致意见，中央和军委又如此信用，故亦持团结姿态，一再表示与党没有政治上、军事上的分歧，同意中央的方针和部署。朱德则根据上述决定，名正言顺地行使总司令的职权，这与南下期间的情况相比，自是迥

然不同，霄壤之别。

既然部队渡河的时机以造船情况为断，造船问题，就是关键的一环。红军总部认为，需造五十只木船方有渡河把握，但根据四方面军现有技术力量及材料，仅能造船十余只，显然不敷应用。毛泽东当即通知彭德怀，着一方面军火速从前后方，大力搜集木板、铁钉、桐油、石灰、棉花、破布等材料，寻集木匠、铁匠等技术人员，支援四方面军，以保证提前完成造船任务。

红四方面军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和红军总部的指示，将部队集结于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静宁一线，形成扇形防御阵地，顽强抗击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各敌的进攻，控制西兰通道，屏障陕甘苏区。同时，确定以三十军为渡河先头部队，开赴靖远附近，在一方面军大力支援下积极造船，并勘察地形，选择渡河点，加速进行渡河攻宁的准备工作。十月十三日，中央电令前线总指挥彭德怀提出宁夏战役计划的纲要。十六日，告二方面军和朱、张：二方面军进至常家集、硝河城地区后，即可开始休息整理，该地比较丰富。待一方面军执行新任务时，接替对南防御任务。“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进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取迟滞其前进方针，判断在敌情地形等条件下可能达此目的，即使船渡不成，我亦应坚持此方针，方于尔后行动有更大利益。”（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电）。但四方面军的主要兵力正顶住敌人约五个军的疯狂进攻，打得很苦，伤亡颇大，事实上根本无法养精蓄锐，休息整理。现有阵地，亦有被敌突破的危险。

四方面军和红军总部提出部队早日渡河的问题，中央复示：“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二十号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电）。二十四日，朱德和张国焘抵打拉池与彭德怀会见后，他们根据中央的指示，着重商谈了宁夏战役的部署问题，朱、张对彭德怀提出的宁夏战役计划要旨，表示“完全同意”。（10月24日10时，毛泽东、周恩来给彭德怀的电报是：“朱、张已见面否”？“请与朱、张详商下列几点：（1）西兰大道及北线坚壁清野问题；（2）大道以北海靖以南地区构筑防御阵地问题；（3）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4）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竹郁腌割了电报的真实内容，篡改改为“着重商谈了宁夏战役的布署问题”，这显然是在扯谎。）这时，因毛泽东电告日寇进攻日急，蒋介石亟欲迫使红军就范，拟亲赴前线督

战；敌已占领华家岭、会宁、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正拟全力向郭城驿、打拉池和海原方向突击；四方面军已造船十六只，有争取渡河的可能，朱、张遂令三十军当晚渡河。但因渡河点选择不当，未能成功。次日，复令三十军继续偷渡，（这里所说的“这时”，应该是指10月24日。上引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确有：“因日寇进攻日快，蒋介石除欲给我打击外，便迫使就范。因前线将领胡、毛、王、关等与蒋介石存在着若干矛盾，故蒋拟亲赴前线督战”。这段电文是让张国焘备战，而不是让他逃跑。是说蒋介石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可以利用矛盾，寻机歼敌，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竹郁断章取义，竟把它编织成为张国焘命令红军渡河的根据。真是煞费苦心了！”）并着九军一部及五军速反占会宁阻敌，以确保三十军渡河成功。同时，对敌我情况和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作了如下的判断和部署：“估计胡毛王关占领西兰大路后，略加布置，即将继续向我进攻，如三十军今晚渡河成功，敌主力或即向兰州移动的企图在兰州、北通、永登线实行拦头政策；如渡河未成，将以会宁、定西、兰州为后方，主力向郭城驿、打拉池进逼，企图压迫我军向海原、同心城转移。”因此，四方面军为完成渡河任务，必须对北进敌为有力之迟滞，而后河西、河东所需兵力，视情况再行区分，目前以四、五两军作海靖线防御及维持与同心城的交通，至为必要；一方面军主力最好于结冰前在宁夏地区渡河，抢占定远营；二方面军须担任海原、固原一带的防御任务。（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致徐、陈并军委电）。

十月二十五日晚，三十军先头部队从靖远城西之虎豹（河包）口渡河成功。捷报传来，全军振奋，欢呼声响彻云霄。朱、张、彭当即于打拉池致电军委及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向军委建议：一方面军将来主（原电为“尔后”，竹郁篡改为“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必要时亦可以从五佛寺渡河；四方面军渡河部队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取定远营，地形较窄，须四天露宿，似以从宁夏渡河之部队（即一方面军）直取定远营为好；我军若以一部在海（原）固（原）线以南活动，可维持较宽阔地区，若让海固线给东北军，则可缩小胡敌进攻正面，发生阴挡胡敌前进的作用。上述意见，请军委定夺。朱、张、彭对于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作了如下部署：第一，原则上同意徐、陈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和阻止兰州北进之敌。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适时协助一方面军

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吸引和迟滞会宁方向之敌，如将来必须渡河时，（“如将来必须渡河时，”八字，原电为“将来均必须渡河”七字，真乃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在靖远下游到五佛寺渡河。第二，二方面军除四师向七营开进，接替一方面军任务，另外主力应以海原东二十里之马营和其西之古西安州为重点，在硝河城、将台堡、王家河、新营、赵化川、孙家原一带为有力活动，目前应尽量保持单家集、平岭镇在我手中。第三，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关桥堡地区，准备渡河技术，其在海原之七十五师，应俟二方面军接防后开始归还建制。上述部署，要求各方面军须于十一月十七日前完成之。（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电）。据此，徐、陈拟以三十、九、三十一三个军全部渡河，尔后以一个军压迫兰州敌，两个军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带；另以四军于河东扼阻会宁、定西之敌，以五军担任守船及监视渡口两岸敌人的任务。徐向前当即跟三十军过河指挥。

这时，中央复（用个“复”字，就是企图混淆）提出先击破南敌、后全力北向的计划。（这是中央在同一天下达的“击破南敌”的决策，与张国焘的“全军西渡”截然相反，不容混淆。）指出：“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至二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北向。”因而部署如下：第一，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湾曲处西岸大卢塘、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第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二方面军除派赴七营地区的部队牵制南敌外，主力对南敌不须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工事，鼓励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第三，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之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由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渡河。第四，在南敌因受严重打击而迟滞前进后，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的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知。（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电）。二十六日，中央又电示彭德怀：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不便利不失时机。”并指出，四、五、三十一军及

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打法;一方面军则速集结同心城休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电)。据此,九军才开始渡河。

(请看电文:“绝密 彭 一、国寿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要注意。二、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重要。三、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不失时机。四、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五、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毛 廿六日廿一时”

这里露出一个重要情况:竹郁掌握毛致彭的绝密电,但他腌割掉至关重要的第一条(张国焘要跑),又进一步歪曲为“据此”九军才开始渡河,成了九军渡河的命令了!多么可笑?)

(这里特别要注意到,竹郁给李先念筛选的那一大堆电报,其中恰恰没有毛泽东的这份电报和彭德怀揭穿张国焘“阴谋”的那一份电报,暴露出竹郁蓄意腌割!多么可怕!)

关于拨造船技术力量二分之一给一方面军造船渡河的问题,徐、陈认为,困难很大。因为原来的造船材料,是一方面军费了极大力量才搜集来的,现船钉已用完,无法再造;而现有船仅十六只,敌每日轰炸,也有遭到破坏的危险。故提议趁我军控制渡口之便,利用现有船只,载四方面军部队全部渡河,以四个军速出中卫、宁南,并放船到大庙、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一起渡河,迅速完成宁夏战役计划。对此,朱、张复电指出:军委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意击破南敌,停止其追击,各部均应照此指示执行。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及总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已过河部队,速占大卢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驿、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争取战略要地定远营。四军、三十一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决战,消灭敌之突击部队。(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电)。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这一部署,认为“朱、张二十七号五时电正合(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争取胜利之目的,望各部坚决执行之。”“九及三十军速复(赴)河岸西,向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徐、陈根据上述指示,指挥河西部队向敌展开凌厉攻势,主力向一条山、景泰地区进击。五军继续担任警戒船只、渡口及牵制靖远东北方向胡敌的任务。四军、三十一军则与河东的尾追之敌,激战于郭城驿城南一线。红四方面军自北进以来,连续行军、作战,从未得到休整。但是,广大指战员为完成中央和军委的战略计划,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

精神,英勇战斗在黄河两岸,狠狠地打击敌人。

十月二十八日,为执行三个方面军在海原、打拉池一线集中主力消灭南敌的部署,朱、张电令四军、三十一军脱离四方面军建制,直接归红军总部和前线总指挥彭德怀指挥。旋又根据徐、陈提议,向军委建议派三十一军渡河,加强河西的力量。指出:“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四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估计九、三十、三十一三个军,可于三十日到十一月一日陆续到达一条山、大卢塘,先头师可于三日到达中卫。如此在十一月十日前,四方面军主力能达到占领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之目的。四军牵制敌人于打拉池以南,直到十一月十日尚可做到,必要时还可用二方面军一部去协助四军。”“取得物资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电)。二十九日,军委电令:“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迅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这时敌已逼近靖远,我在虎豹口的船只随即顺流而下,驶至三角城渡口。三十军奉令向这里火速开进,准备立即渡河。但因彭德怀部署三十一军应继续在河东作战,阻击和牵制敌人,以实现击破南敌的计划,三十日,军委又电令三十一军仍照德怀的部署执行任务,待胜利后再由中卫地区渡河。朱、张遂令三十一军停止西渡,(如前所述张国焘挟三十一、四军渡河,在距渡河点四华里处遭胡宗南部阻击,未能渡成。)返向麻春堡阻敌,并电告徐、陈:“关敌今可能逼近打拉池,决以一二方面军主力及三十一军集结麻城(春)堡附近,消灭突进之敌。”“三十一军、四军均甚疲劳,现已令三十一军今由打拉池经干盐池向麻城(春)堡进。”“五军在靖远警戒,已令渡到三角城,同时将所有船只下开三角城左岸。”(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电)。当日,五军(原四千余人,因在会宁损失近千人,只剩三千人左右)大部随船过河;为完成警戒靖远东北方向之敌,掩护打拉池翼侧的任务,留两个营在河东。次日,敌推进至郭城驿,大卢子地区,并进而控制靖远附近的河岸,这两个营即撤往河西;徐、陈将五军布置于三角城地带,仍担任守船及控制渡口的任务。我河东、河西部队,至此即被敌切断。河东红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总部的命令,诱敌深入,逐步向东转移,以求在有利地区寻机歼敌。

红四方面军两万多人西渡黄河的主要原因和经过,就是这样。事实告诉我们,部队渡河,完全是根据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和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行事的。目的是策应红一方面军从金积、灵武地区渡河,共取宁

夏,打通苏联。所谓“张国焘擅自命令部队渡河”之说,压根儿站不住脚。(非经过查证,张国焘擅自命令部队渡河!这个史实是竹郁翻不掉的!)

(摘自中国革命博物馆 1983 年 9 月 20 日出版之《党史研究资料》第 9 期)

竹郁发表此文时,邓小平同志尚健在,杨尚昆同志管党史,可能是中央有所干预,致使这期刊物停止发行,已发者收回。请看有关的《通知》:

通 知

请各订户将《党史研究资料》第九期立即退回我组,缺期另补。特致歉意。

中国革命博物馆
《党史研究资料》编辑组
一九八三年十月四日

459

此前李先念把竹郁意在要求中央给翻案而写作的说明和筛选的一批电文送邓小平和陈云,邓、陈批示“存档”了事,中央并未予以翻案处理。这一切都说明中央和小平都是反对竹郁的翻案活动的。

后来,胡乔木竟然本照竹郁的说法,篡改了党史,形成了重大错误。我们估计,胡乔木因不知有毛泽东“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和彭德怀“以联名电报作为无效”的两电,不知张国焘 1936 年 10 月 25 日电是盗用朱德彭德怀名义,是搞鬼,受了竹郁的蒙蔽。这点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本应及时把毛、彭的上述电文及张国焘搞鬼事实告知胡乔木,但因王明哲阻挠未能送出,遭致难以挽回的后果,令人痛心!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明晃晃地落下一笔,“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篡改了史实。多么可悲!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一书的相关记述,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本问题的参考材料

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被迫中止

1936年10月11日,党中央和军委为了贯彻已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根据当时敌我双方情况,向全军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对夺取宁夏的各项准备和各部任务作了具体部署。其要点如下:(1)11月10日以前,全军主要是休息补充,抓紧训练,做好进攻宁夏的各项准备工作,对南线敌人尽量迟滞其前进。在此期间,红一方面军主力应逐次转移到同心城及其周围地区休整,红二十八军以及新从东线西调的红二十九军集中于定边、盐池,以一部逼近灵武,侦察宁夏情况;红二方面军逐次转移到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迟滞其西进,尔后准备以主力或一部接替固原以北地区红一方面军防务;红四方面军以1个军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取得攻击中卫与定远营(即阿拉善左旗)之渡河点并加紧造船,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筹粮和休整,派出几个支队同南线敌人保持接触,尽可能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2)从11月中旬起,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的3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必要时抽一部参加进攻宁夏。16日22时,中央军委电示红二方面军并致朱、张:“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取]迟滞其前进方针”。

10月20日,敌人十几个师,乘我军从会宁及其东西地区北移时,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歼灭我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22日,蒋介石亲自赶到西安督战。其部署:以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两个师为一路,王均第三军两个师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为一路,均经会宁向靖远攻击前进;胡宗南第一军4个师为一路,经静宁向打拉池、古西安州担任主要突击;王以哲、何柱国指挥东北军步兵5个师、骑兵3个师以及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残部为一路,由隆德、固原地区北进,保障胡宗南军右翼安全。同时在西线和北线,以东北军第一一四师由兰州附近进抵一条城,以邓宝珊新编第一军一部固守靖远城,以马鸿逵新编第七师担任中卫、中宁及其以东地段河防,马步青骑兵第五师担任中卫、靖远段河防,均防堵我军渡黄河北进或西进。

10月22日,敌第三十七军攻占华家岭,23日进占会宁,继续向靖远方向进攻。敌第三军和第二十五师攻占通渭,经会宁向郭城驿、靖远方向进攻;敌第一军进占静宁、界石铺,向打拉池、海原方向推进。

10月23日,朱德、张国焘到打拉池与彭德怀会合。当日晚,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在红嘴子地区西渡黄河未成,准备另选渡口再渡。24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对今后行动提出如下部署意见:“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尔后“五、四军续渡北岸,最后以两[个]军向兰州、平番[即永登]方面活动,全部主力至少三个军向中卫、宁夏发展”;并建议一、二方面军另由靖远以北抢渡。(全军抢渡方案出笼了!)

10月25日凌晨,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由靖远城西南之虎豹口(今河包口)渡河成功。同时,朱、张、彭关于我军行动部署致电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提出:“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四方面军布署,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到五佛寺段渡河。”^①

10月25日,中央军委致电红军总部和一、二、四方面军,指出:“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

^① 引自朱德、张国焘、彭德怀1936年10月25日16时致中央、军委、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电。10月27日,彭德怀曾致电毛泽东、左权、聂荣臻,揭露张国焘把自己意见强加于人的恶劣手段,申明:此电是“发后才给我看”,“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并指出,朱德等同志是拥护中央的。(这个注太好了,好像专门为驳竹郁而注,使其用张国焘25日作伪电冒充中央军委命令的美梦难圆。《战史》还客观如实地说出“全军抢渡”是“24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提出”的“部署意见”。不言自明地拆穿了竹郁的“中央和军委……决定将冬季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提前执行。”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央和军委”不独没有“决定”“提前执行”,而是恰恰在10月25日指出:要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扯谎者还有何说?田耿齐评。)

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至二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因此部署应如下:(1)以九军以外之1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1个军攻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2)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3个军及二方面军主力对付南敌,坚壁清野,透其深入,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可停止南敌。(3)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4)在南敌因受严重打击而停止前进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

10月26日1时半,中央军委电示朱、张、彭:“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同日2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又指出:目前以打击胡敌、夺取定远营两着最为重要。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夺占定远营,这是攻取宁夏的战略枢纽。四、五、三十一军及二方面军应以打击胡敌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取诱敌深入。

10月26日,徐、陈电告朱、张、彭:今17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并遵“电示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大力压迫,两个军速控五佛寺、一条山、红水一带战略地区,而留五军在河两岸监视靖远、一条城之敌及守船任务,四军位现阵地扼阻会、定敌人。”27日又“提议四方面军全部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对付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

10月27日5时,朱、张电示徐、陈:毛、周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重击破南敌。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头卢塘、眼进堡、大营盘、三塘驿、五佛寺地区,以1个军向中卫延伸,1个军准备争取战略要地定远营;四、三十一两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决战,消灭敌之突进部队,而停止其前进。

10月28日12时,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电示红军总部及一、二、四方面军:“甲、完全同意朱、张二十七号七[五]时部署。乙、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

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朱、张二十七号五时电,正合紧靠作战争取胜利之目的,望各部坚决执行。丙、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照张电位置于眼井堡、三塘驿地区,准备以一军向中卫,一军向定远营,其余以坚决击破南敌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

这时,敌人胡宗南部先头已进至硝河城地区,正向海原、打拉池之间急进;其左翼毛炳文、王均两路,先头进至马家堡、蒋家大路之线,均向靖远前进,蒋介石判断红军经其“痛击”,正向西北撤退,于是命令各部乘势猛追。我中央军委为阻止南敌追击并加强对各部红军的统一指挥,于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敌胡宗南部。28日19时15分,朱、张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该三个军,至少以三个团扼守一条山、大卢塘阵地对两马,指部^①即率两个军以上兵力迅出中卫,先头精干一个师袭击中卫附近要点,以便接引主力进入中卫以东地区消灭马鸿逵部,迅以一个军出定远营。五军暂位三角城一带休整,将来可移到五佛寺、中卫间休整。四军即在郭城驿、打拉池线迟滞敌人。”

10月29日12时,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同日,前敌总指挥部下达三个方面军主力协同消灭胡宗南部的预先命令,要求第三十一军在打拉池以东集中,准备协同一方面军一起打击北进之敌。

10月30日7时,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计划,规定:红一方面军主力6个师集结于古西安州、麻春堡、陈家湾地域,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一军集结于打拉池以东干盐池地域,以上两部为突击集团,准备从东西两面求歼胡宗南部先头一至两个师;第四军和第五军主力在郭城驿、靖远、打拉池之间占领阵地,钳制敌人毛炳文、王均两军,保障我突击集团的右翼安全,红二方面军主力转移到海原以北和西北地域,保障我突击集团左翼安全。中央军委立即批准了海打战役计划,通令全军坚决贯彻执行。同日,中央军委致电朱、张指出:“为战胜胡敌,三十一军即照彭德怀二十九日二十时电命令布署执行任务,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

30日,张国焘却命令第四军撤至贺家集、兴仁堡,第三十一军撤至同心

^① 指部,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

城、王家团庄；(这就是前文反覆指出的张国焘挟三十一军和四军渡河被胡宗南部阻回的驻地。田耿齐校评)第五军已经西渡黄河，因而海打战役的部署未能落实。31日，敌第二十五师已进抵靖远，向东湾子追击；第三、第三十七军正向打拉池方向进攻；第一军已进到古西安州南之张家塘；马鸿宾部也由海原西南之米家塘向我军进攻。这样，在海打地区求歼敌人的计划未能实现，红军主力由打拉池地区向东转移。途中，红一方面军一部31日在海原西北地区击溃堵截之敌第三十五师和骑六师各一部，俘获人、枪各1000余。

在这种情况下，前敌总指挥部为贯彻中央军委继续争取实现夺取宁夏的计划，又在11月初作了如下部署：集中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两军，统归彭德怀指挥，在海原以北、同心城以西地区消灭胡宗南部一两师；同时由红军总部电令河西方面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之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即在一条山、五佛寺、眼井堡、红水一带，乘胜向中卫、宁夏(今银川)方向相机进取，在不攻坚的条件下，消灭马敌。河东我军主力在麻春堡、关桥堡地区多次设伏歼胡宗南部，未达到目的，而敌人则已进至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并隔断了我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被迫中止。

红军主力向东转移，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

11月8日，党中央根据情况的变化，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计划设想，其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军主力11月份继续在现地区作战，并以一部兵力佯示我军欲渡黄河，引敌北进宁夏。12月上旬以后，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逐次南下，第一步占领镇原、宁县、正宁、合水地域，第二步向东占领淳化、耀县、宜君、洛川、郿县地域，第三步继续向东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扩大苏区，扩大部队，解决给养；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爆发后，逐次向东发展，沿安边、横山、榆林到达神木、府谷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地区；于适当时机，南北两路分别在延长、延川地区，清涧、绥德地区，神木、府谷地区造船，准备再渡黄河进入山西，寻求直接对日作战，或在晋、冀、鲁、豫、皖、鄂、陕、甘等省进行机动作战。其目的在扩大我党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同南京政府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计划还提议：“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中央指出：“上述新计划暂时还不作为最后决定”，请朱、

张、彭、贺、任慎重考虑见复。

11月12日,红军主力开始由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之线东移,准备经毛居井以东地区南进。至15日,红四方面军之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分别移至红城水、萌城、甜水堡和石堂岭附近地区待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移至豫旺堡东南、东北和以东地区待机,红二方面军全部移至怀县以西地区休整。

此时,敌人第三十七军正准备西渡黄河,参加“追剿”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同我有统战关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经我劝阻,前进缓慢;第三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唯有胡宗南之第一军行动积极,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

中央军委根据上述敌情及前敌总指挥部的建议,于11月14日至16日接连下达指示,着重指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速上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中央军委还规定: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须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命令,军委及红军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16日,我军各部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这时,敌人粮食极为缺乏,胡宗南屡电蒋介石告急。蒋介石令其急占定边、盐池,解决给养,控制战略要点,并继续向东打通榆林。17日,敌人第一军分三路向定边、盐池前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由惠安堡东进,中路第一师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由西田家原向山城堡前进。第九十七师和第四十三师为第二梯队,进至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当日,敌人中路第二旅在萌城以西地区被我第四、第三十一军击溃,伤亡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

19日,我前敌总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求歼敌人第一军之右路第七十八师。部署如下:第一军团荫蔽于山城堡以南之罗家沟至于家湾之间地区待机出击;第十五军团以小部诱敌东进,主力荫蔽于山城堡以东及东北山地待机出击;第三十一军荫蔽于山城堡北之田家庄附近待机出击;第四军主力荫蔽于山城堡东南地区待机出击;第二方面军主力在山城堡与洪德城之间的水头堡集结,准备策应各方;第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敌人左路第一旅;第二方面军之第六军团以及第一方面军之第八十一师,特务团、教导营在洪德城、环县一线以西地区,迟滞东北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山城堡东南之于家湾。

20日,敌人左路第一旅进占红井子,第九十七师跟进到大水坑;中路第二旅撤回豫旺县城整理,第四十三师接任中路,向保牛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小台子,风台堡等地,并派出两个连沿山城堡至洪德城大道向南侦察,在八里铺以南遭红一军团一部突然打击,大部被歼,少数逃回山城堡。

我前敌总指挥部决定迅速发起歼灭敌右路第七十八师的战斗,尔后向北横扫敌之中路第四十三师等部,部署是:以红一军团第二师协同红十五军团向山城堡西北的哨马营方向进攻,截断敌之退路;红一军团之第一师和第四师由山城堡以南向北进攻,第三十一军一部由山城堡以北向南进攻;第四军由山城堡东南向西北进攻。

21日,我军对山城堡之敌发起攻击。当日黄昏,敌人开始向山城堡以北之曹家阳台一带山地撤退。我军乘机一举攻入山城堡,接着转入追击,将溃乱之敌大部压迫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至22日9时,将敌大部歼灭。

这一仗,我军歼敌1个多旅,给了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击,迫使该敌全线退至大水坑、萌城、甜水堡及其以西地区,从而停止了敌之进攻。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正确决策和三大主力红军团结战斗的成果。它大振了我军的声威,对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着重点是我们所加。20天后即发生了“西安事变”。试想,如果红军都按张国焘10月25日电“全军西渡”了,张学良还敢于发动“西安事变”吗?田耿齐评)

山城堡战役胜利后,我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战备姿态,在环县、定边、盐池之间地区休整,为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作准备。

为了适应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新情况,从组织上保障红军的统一指挥,开展更大的局面,中央军委主席团于12月7日转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命令决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详、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应向、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等23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军委主席团;以毛泽东为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国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同时任命刘伯承为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详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在此以前,中央军委还任命了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为前敌总政治委员。

关于西路军渡河问题的材料校评

(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87 年 3 月编撰、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第 348—357 页)

(2001 年 12 月 2 日完稿)

《周恩来军事文选》和《周恩来年谱》 若干错情辨析^①

许虹 齐得平

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以下简称《文选》)和《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以下简称《年谱》)中,有几处错情。

468

《文选》第100页《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作战》(1950年11月17日)一文,是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至彭德怀、高岗的电报。印文注明是“根据周恩来手稿印刊”。其中“由中国周恩来统一指挥”实为“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

我们知道,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境内统一指挥作战的是彭德怀同志,而不是周恩来同志,我们怀疑《文选》上此电文文字可能有误,为了搞清楚这个重要问题,我们查看了这份电报的原稿和与之有关的同年11月13日毛泽东为了解决朝鲜境内作战的统一指挥等重要问题,给菲利波夫(即斯大林)的电报的原稿和斯大林的复电原文。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高岗的电报原稿中写的是“他复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而不是“由中国周恩来统一指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几处说的都是“中国同志”、“中国指挥员”,不是说“中国周恩来”。《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作战》一文就是转告斯大林“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这个意见。编者将原稿中的“同志”二字误认为“周恩”二字,并与后面的“来”字连起来,于是,文中“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就变成了“由中国周恩来统一指挥”。我们认为,这个错情应予纠正。

^① 此文曾刊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辑出版的《军事史林》2003年第2期。

此外,我们在查阅上述电报的原稿时,看到斯大林给毛泽东复电的时间是“11月15日”。而《文选》第四卷(第100、101页)注【1】【6】将斯大林给毛泽东复电的时间,注为“11月16日”是不准确的也应予改正。

二

《文选》第154—155页《对敌反击的部署与十九兵团的开进》(1951年2月11日)一文中,有一段非本电的电文误为本电的一段电文。这份电报是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军委给彭德怀并高岗及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的。文下注明“根据周恩来手稿刊印”。

《文选》中收录的这份电文中,不仅有一段内容与十九兵团开进情况衔接不上,时间也不对。如说:“宋兵团二十六军,应令其于二月十日夜赶到铁原、涟川……”军委2月11日电中竟出现令二十六军于2月10日夜赶到之事?我们和有关同志怀疑电文有误。经查阅周恩来起草的这份电报原稿,发现《文选》第154页第7行“我十九兵团当可于”以下到第13行“朔州、价川、成川线”之间的电文与手稿原文完全不同。《文选》刊出为:

“东线歼敌一两个师,打开缺口,则西线敌人冒进,可能被停止,但也须设想敌进占汉城后侦知我西线正面力薄仍有继续前进逼我东线后退可能。

(二)为防止上述不利情况发生,请令邓华集团在寻机歼敌部署中切忌仓促应战,如敌冒进,宁可让其深入利我围歼,如敌不进,必须寻敌弱点,利我分割歼其一部。宋兵团二十六军,应令其于二月十日夜赶到铁原、涟川”

这段电文,与《文选》第147页《同意第四次战役的作战方针与部署》(1951年2月4日)的第8—15行的文字完全相同,显然是不可能的,经查2月11日的电稿原文应为:

“三月十日起开始到达上述指定之线。从目前形势看来,后一种可能较大,但美帝也正如蒋介石一样,早晚市价不同,亦很有可能在自以为大胜时急进。果如此,我们必须考虑在平壤元山之线以南地区予以反击,而不可能准备在敌人进出三八线时即予以反击。

(二)十九兵团现在正运送至安东、长甸河口、凤城地区的途中;其在国内需一百零四列车,过江后如车运,因列车拖的少,需二百四十列车,按三路每夜只能共发九列车,需二十七天才能运完,按两路则需四十天,且到达平壤、龟城转场后,仍需步行,而一切物资都将停运,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事。过江后如步行,依原计划沿新义州平壤线及”。

上述错情，必然会影响读者对周恩来军事思想和有关史实的研究与认识，应予纠正。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周恩来年谱》中关于1951年2月11日周恩来以军委名义起草的这份电报的条目中，所引的电文也是错误的。《年谱》是这样写的：

“2月11日就彭德怀九日来电称对横城地区之敌发起反击一事，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和杨得志、李志民：‘在这次战役中，我如反击不得手，敌人确有进入三八线可能。’‘为防止上述不利情况发生，请令邓华集团在寻机歼敌部署中切忌仓促应战。’‘我们认为第十九兵团开进计划，基本上仍按原规定者不变为妥。’第十九兵团入朝后，‘第一步以向平壤成川地区前进为好，便于机动’。部队分两路的行进路线和到达地区的具体位置，由彭发布命令规定。”

第一，开头一句称谓不对。2月11日电署名是军委，不是周恩来。但从文字上看是周恩来，而不是军委。第二，其中引文“为防止上述不利情况发生”中的“上述不利情况”是指“在这次战役中，我如反击不得手，敌人确有进入三八线可能。”是有误的。原因是“在这次战役中，我如反击不得手，敌人确有进入三八线可能”和“为防止上述不利情况发生”，根本就不是一个电报中的话。前一句是军委二月十一日电报中的话，后一句是军委二月四日二十时电报中的话。《年谱》中的这个错情也应予以纠正。

三

《文选》第411页《关于隔日炮击金门的广播稿》（1958年11月2日）的文下注和文后注释是不确当的。

这份广播稿是毛泽东起草的，原稿仅34个字：

“金门群岛军民同胞们注意：明日，十一月三号，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

毛泽东在写出这个广播稿后，即由秘书用电话告周恩来，播出前，周恩来在电话记录稿上“明日”前加写：“今日十一月二号，是个双日，我们一炮未打，你们得到补给”一句。《文选》中收录的《广播稿》就是周恩来在电话记录稿上加写了一句话的稿子。199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491页，收录有这个《广播稿》，文下注明“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文后注释中对周恩来在“明日”前增加了一句话的情况作了说明。1997

《周恩来军事文选》和《周恩来年谱》若干错情辨析

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文下则注为“根据周恩来手稿刊印”，文后注释为“这是周恩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起草的对金门诸岛的广播稿”。同一篇文稿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两部著作中作两种不同的注释，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认为，《文选》中的注释予纠正。

2001年12月

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手稿考^①

齐得平 田逢禄 耿仲琳

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原保存于莫斯科,1957年1月接收回国,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手稿从21页开始至28页共计8页,每页约600字,没有署名,没有成文时间,标题上冠有“(乙)”字。

1984年11月,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一书,收入了这份手稿的全文。编者删除“(乙)”字,加“传达提纲”四字,将标题改变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判明成文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还作出题解:“这是一九三五年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提纲的手稿。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时间尚难确定。”1986年,此文收入《陈云文选》,仍袭用了这个标题和题解。经考查,我们认为,上述标题、时间判断和题解,都是不正确的。

一、手稿题目上标明“(乙)”,即是说前面还有“(甲)”。查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无“(甲)”的部分。但1936年初《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载有“施平”(陈云在莫斯科用名)的一篇文章:《英勇的西征》。又查,《陈云年谱》上卷有一段相关的重要记述:

“10月22日^②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报告说明了长征的目的并列举了达到目的三点根据,即保

^① 此文曾刊于2003年6月20日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第6期。

^② 《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刊登施平《英勇的西征》一文时的按语中说: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的时间是“1935年10月15日至22日间”。《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发表的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

全了红军有生力量,和红四方面军胜利汇合,建立了新的实力更强资源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报告分析了长征前期失利的原因,指出:(一)出发前,在党内、红军内以及群众中没有来得及做应有的解释工作,使准备工作感受很大困难。(二)所带行装和粗重机器装载太多,妨害行军,阻碍军事行动,使后卫部队往往比先锋队迟到十天,基本部队变成了行装护卫队,减弱了红军战斗力。(三)总是按照纸上画好的直线笔直前进,而地图上往往画得不对,常常因此陷于绝境,不得不折回重走。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对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反对继续直线前进的做法。原来的领导人竟要把反对他们意见的人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回答说:应该交付法庭审判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终于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占领遵义后,召开了有政治局委员、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军长和政协委员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进军四川,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使党加强了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从此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报告还分析了长征所以成功的原因,指出:(一)红军有真正英勇不怕牺牲的战士。(二)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特别是领导都成长起来了,培养出了如毛泽东、朱德这样的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三)到处都得到群众的拥护。报告最后指出:过去我们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正确的政治方针,否则西征时期会取得更大的成绩。统一战线在今天绝对必要的和唯一正确的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第一个报告。此后有人将这个报告整理成文,题为《英勇的西征》,署名施平,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它是在世界革命阵营内,最早宣传红军长征和中共与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文献。”

我们认为,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经过的和遵义会议情况的内容,就是“(甲)”《英勇的西征》和《(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的内容。由此可知,手稿的成文时间不是1935年2月或3月,而是1935年10月。这里附带说一下,《英勇的西征》约有一万五六千字,大致与手稿前缺20页容量相近。

二、遵义会议明确规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即李德)同志的名字”,“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手稿不仅点了李

德、博古的名字,还点出了周恩来同志的名字,还写出了凯丰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等这样一些不宜下达的内容。身为中央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怎能不顾中央决定,而要随意向下传布不宜下达的内容呢?可见手稿不是向下“传达”的提纲。

三、手稿中写道:“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即指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笔者注)——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在传达之前,怎么能把传达后群众反映也写进“传达”提纲里呢?亦可说明手稿不是向下“传达”的提纲。

四、遵义会议决议最后四段是激励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鼓舞斗志、增强信心的话,而手稿对此却只字未提,也可说明它并非是向下“传达”的提纲。

五、手稿中写道: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陈云传达会议精神,同时又对会议的决定提出批评,这是不可思议的。“今天来观察”的这个“今天”,也不可能是会议刚刚结束,正在传达会议精神之时。我们推断陈云在1935年2月或3月还不可能有这种认识。《英勇的西征》一文中,提到西征已经历了八个月、胜利渡过了大渡河、与四方面军会合等情况,表明陈云在泸定桥会议后离开红军时已知中央有酝酿改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这时才可能有批评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是错误的认识。这又说明手稿只能在1935年2月或3月之后形成,而决不会写于2月或3月。

六、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陈云秘书电话的问题。下面是中央档案馆的一个业务电话记录: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十八点,陈云同志的秘书朱佳木自杭州来电话,记录如下:

四月二十三日送来的《遵义会议经过》一文,昨天拿给陈云同志审阅。他

仔细地看了那件复印的手稿后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记(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在由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因为过了泸定桥中央决定我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长征的队伍。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一开始留下的被其他同志带到了延安。’”。

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陈云同志认为这份手稿是从延安来到北京的，而不知是从莫斯科来到北京的；而又时隔四十六、七年，以致作出不准确的回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陈云同志这份珍贵手稿，是他在1935年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以后为向共产国际汇报而写，不是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为向下传达而写。写成时间当在1935年10月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之前，而不是1935年2月或3月。

对《(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份珍贵手稿的考证，不仅可以确切判定它的成文时间和地点，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出它对共产国际了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及其坚持的正确路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习毛泽东哲学著述摘记六则

齐得平 唐 群 田逢禄 耿仲琳

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我们作了这篇摘记。文内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为引自《毛泽东年谱》。我们都是档案工作者,议哲学是门外谈,又兼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头,难免语无伦次;所述意见是否有当,欢迎批评指教。

(一)毛泽东世界观的飞跃

1919年7月21日《湘江评论》第二号出版,刊载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此文在该刊第三号(7月28日)、第四号(8月4日)继续连载。文章宣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认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文章热情称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而在中国则“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文章指出:当今中国种种方面都要解放,“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强调中华民族有伟大的能力进行改革,“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毛泽东说:“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 诸君! 我们总要努力! 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 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这是企望呢,还是预见呢!

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跃然纸上!

这里面跳动着新世界观的因子。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页),这句话

是毛泽东 1921 年 1 月 21 日《给蔡和森的信》中说的,这是他承认唯物史观的最早的表述,标志从此开始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个思想的飞跃距中共一大召开只有半年的时间,可知他也是边干边学。

(二) 中国革命军事辩证法滥觞

1936 年 10 月 27 日,开始为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发生。

12 月,完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前五章的写作。原计划写作的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而搁笔。本书是对十年内战经验的总结,是当时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部著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着重批判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党内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本书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诸条件,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规律和特点,并由此规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军战争的指导路线,规定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书中讲述的关于人民战争的路线、战术的原则,主要是:要掌握“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在一定条件下为着进攻所必须采取的退却和诱敌深入;要实行集中兵力这个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把运动战作为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要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把歼灭战作为红军作战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特别是辩证法和认识论。书中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又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也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当时曾以这部著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过讲演。一九三七年五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一九四一年曾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在延安出版单行本。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

1941年2月23日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铅印单行本时写了如下一段话：“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目的在总结内战的经验。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战略转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许多问题，没有工夫再写了。四年来只有油印本，兹应军政杂志社之请，用铅印出版，借供党内同志们参考。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论军事的经典，又是一部极好的哲学教程。她突出了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她的精髓）：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所以他特别强调：“战争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见《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在这里首次写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真言，并在《实践论》中再次写入，不可忽视。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我们分析，这句话可能是1937年5月出油印本时加上去的，因在讲课时西路军还未失败，张国焘路线还未受到清算。查油印本上有这句话（“为敌人嚇倒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是这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文字稍有出入，内容完全相同。1941年本上也有这句话。

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见《毛泽东选集》）是呀！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出了多少能征善战的将军呀！

（三）中国革命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财富。

《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这篇文章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核心，全面地阐明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对于认识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指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社会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文章论述了基于实践的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即从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文章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指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

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文章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表现形式及特征作了分析,指明教条主义者不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经验主义者不承认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文章从哲学的高度,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本质,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同本年八月写出的《矛盾论》,都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为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论据。

1937年8月7日 写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并以此为讲稿在抗大作过讲演。这一节后来经作者作了部分补充、删节和修改,以《矛盾论》为篇名收入《毛泽东选集》。《矛盾论》是作者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文章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文章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特别着力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阐明了中国革命的辩证法,也就是阐明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经验,他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

“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

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

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区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那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文章论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出“半殖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

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久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

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文章论述了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同性包含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矛盾的斗争性是指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有条件的相对的同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毛主席阐明的这些基本的东西是动摇不得的,瞎翻腾,想动摇它也是徒劳的。给张国焘翻案、给陈独秀翻案、给教条主义翻案都漠视或抹煞中国革命的辩证法亦即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亦即篡改党史军史,这如何使得?!

(四)论孔墨

1939年2月1日 关于陈伯达写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毛泽东致信陈伯达。信中说:“《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毛泽东的意见,主要有:事物的“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关于中庸问题,“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

‘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2月20日毛泽东致信张闻天，对陈伯达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提出商榷意见，主要有：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正确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正确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二、关于中庸问题，“伯达的解释是正确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孔子的中庸观念，包含着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思想。“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三、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得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1939年5月（以后），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毛泽东写有两段话：

“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

“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

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这是毛主席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的话。

毛主席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我们应当以之为榜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吸收历史遗产,不可迷路。

(五)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经典。我们认为她又是毛主席哲学著述的重要篇章。为了温习他相关的讲话,谨作如下摘述:

1942年5月2日 出席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关于立场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关于态度问题,指出“歌颂和暴露两种态度都是需要的,问题是在对什么人。对于敌人,应当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对于人民群众、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则应当赞扬,使他们团结、进步、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关于工作对象问题和工作问题,指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要了解和熟悉各种人,了解和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

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关于学习问题,指出:“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还要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这个讲话和五月二十三日作的结论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5月23日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在朱德讲话后,毛泽东作结论,讲了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首先,讲党领导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目前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其次,讲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他说:一个是源和流的问题。一切种类的文学家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这要区分清楚。但借鉴是必要的,“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一个是普及和提高的问题。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第三,讲文艺工作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

革命任务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第四，讲文艺批评问题，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结论还批评了抽象的“人性”、“人类之爱”等错误观念，澄清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动机和效果、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关系问题上的许多糊涂思想。第五，指出延安文艺界中还存在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1944年1月9日晚上，观看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逼上梁山》后，写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齐燕铭：“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我们以为，重温毛主席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有现实意义。所以摘来附在《讲话》之后。

（六）典范的学习生活

一九四三年六月，刘少奇同志起草了给续范亭同志的一封信，其内容主要是论述“人性”问题。毛泽东同志对信稿加了较多的批语，并于十二月十七日写了短信给少奇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批语，批评了刘少奇同志关于人性的一些不正确观点。少奇同志认为“对我们益处很大”，因函送弼时、恩来、朱德同志一阅，并注明“德怀、康生同志已看过”。周恩来和朱德同志都圈阅了，朱德同志并写有：“我看过了，很好很好，多次争论以免认识错误。朱。”可见，这是

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关于“人性”问题的一次堪为楷模的同志式的讨论和学习。

我们把毛批结合少奇相关信稿逐点摘录如下(信稿下的横线和问号是毛主席划的):

大概如我们到了四十岁以上的人,对于各种哲理问题是特别感觉兴趣的,因此,这也可以当作一种游戏。(毛批:这样说不妥。)

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毛批: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只是缺乏通俗的宣传,缺乏拿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的工作,不能说还没有解决。)

何谓人生?

所谓人生,应该也是和一切物质的属性一样,即是人这种东西的属性。(毛批: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

一切事物,均具有一定的实质,(毛批:即该物之特性。)而与其他事物区别。一切物质的属性,均是从各该事物的实质中发生出来的。当这个事物不与其他事物接触时,它的属性是蕴藏着,并不外现出来,这个事物的实质即不能被认识。但这个事物一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时,它的属性就表现出来,人们就可从它表现的属性去认识它的实质。(如真金有不怕火烧的属性,用金与火接触之后,人们就可认识金的实质)。当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了全面的(全过程的)深刻的接触时,就要暴露它全部的实质,(毛批: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并也暴露它最深刻的最基本(毛批:比较深刻。)的实质,即暴露它的本性与本质。人们就可深刻的认识(毛批:认识也是无穷的。)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这对于人也是适用的。

人这种东西,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物质性(或称物性,即来信所说的“宇宙的共性”,宇宙万物的共同性,即万物的物质性)。

* 概指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88年恩格斯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谈到马克思的这个《提纲》:“这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08-209页)

人这种东西,又是动物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动物性(或称兽性,即来信所说的“动物的共性”)。

但人这种东西,又是一种特殊的最高等的动物,一种发展到了最高形态的动物,不独可以与其他物质区别开来,而且与其他一切动物也有显然的一定实质上的区别。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与动物性之外,还具有特殊的为其他一切物质一切动物所没有的人性。所以一般的说来,人性也是一种物质性、一种动物性;但是特殊的来说,即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一般的动物性又应该也可以区别开来。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绝对区别开来的人性哲学(如许多宗教家及绝对的唯心论者)都是错误的;但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不加区别的哲学,也是错误的。

人与其他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

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毛批: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人的脑筋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之发展过程,能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其他动物至多只有思想的萌芽,而无完备的思想而不能制造工具)。这只有人才特具的。这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其它一切的区别都是形式上的,不是本质的)。(毛批:这是进化了的人,不是原始人,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因为人是最高等的有完备思想的动物,(毛批: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之外,人还具有特殊的主观能动性,即灵性、(毛批:动物亦有。)理性等。即人能够思想,能够用思想去把握各个客观事物和各个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能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之后使自己的行动去适合这种规律,使自己的行动具有意识性、计划性,自觉的不逾越客观规律之外。即是人的思

想行动之能够自觉的规律化。亦即孔子所说的能够“从心所欲，不踰矩”。（毛批：这些在人类是历史地进化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地进化的，小孩子不懂得规律性，孔子七十才不踰矩。阶级社会内没落阶级不懂得规律性。）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毛批：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

人能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并利用自然界去改造自然界（相对的与自然界对立起来）。（毛批：这也是历史地进化的，不是一下子如此的。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己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也是历史的，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不同。）

但是人所特有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灵性、理性等，即人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是一种特殊的物性——人脑的属性。这种属性也和其他物质的属性一样，要人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要在六、七岁以后），并须要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经过五官的感觉）之后，它才能产生，才能表现出来，否则人就不能有思想。

人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产生，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物质的属性，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毛批：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

所以人不论是怎样的“为万物之灵”，但人决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东西，人永远不能作神仙，即人永远不能解脱自己的物质性与动物性，（毛批：否，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主观能动性永远不能超越客观的限制性，思想永远不能离开外界的物质而独自产生与独立存在，完全不是如佛家（其他宗教家本质上是相同的）所说的那样，“无声无色，湛然寂然”，“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起波动”（来信用语），完全解脱红尘，（毛批：红尘即社会。）往天上去，去到空虚，而又似乎是存在。所以人不能有神性，（毛批：人不能离社会而为神。）人性不是神性、鬼性。人没有神性、鬼性。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毛批：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

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把它们混同了。)

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又把人与妄诞中的神仙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质。把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区别开来,又把人性与妄诞中的神性鬼性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毛批: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孟子说:“食色性也”,王阳明强调“好好色,恶恶嗅”的“人性”。但孟子与王阳明在这里所说的人性,不独是没有说出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也没有说出来。因为食色之性,好好色、恶恶嗅之性,不独是人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是有的(毛批: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根本区别。)(其他许多动物都好吃好的东西,甚至比人还长得更美色,都有恶恶嗅的嗅觉。)(毛批:但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他们在这里只说出人的动物性的一部分。(毛批:人的食色并非动物性而是社会性。)如果把这当作人性,就是片面的说法,就是偏向。就不能把人性与兽性区别开来。(毛批: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毛批: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程颢程颐与朱熹则是相反的,他们抓住人的理性这一面,故意强调起来,主观的机械的制作许多规律来限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来摧残人们的自然性。(毛批:应说来摧残人们的社会性,程朱把人们当作非人所谓“圣贤”来处理,所以是错的。)(程朱已经察觉到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把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毛批:正是错误的二元论,实即唯心论。)但他们认为义理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人能克制气质之性,发扬义理之性,就成为圣贤,并以克制气质之性的多少为标准,认为学道功夫就在这里。如是就主张尽量的去故意摧残人的自然性。)(毛批:摧残正当社会性。)这也是一种偏向。(毛批:是完全错的,不止偏向。)因此我希望你在摘引他们的说话时,应该注意。

因为人有思想,而思想是人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的统一,所以人就有犯错误甚至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之可能〔只有人才可能犯错误,其他一切动物差不多都无犯错误的可能,(毛批:不妥,竞争生存的学说,说生物由竞争而遗传而择种留良,避免淘汰,就是避免犯错误的要求,只有矿物才无此种要求。)尤其无犯系统严重错误之可能],人也一定要犯错误(因主观与客观矛盾,可以说完全不犯错误的就不是人)。人是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的(虽然人可以避免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所以人在看自己的时候,常常忽视自己主观的能动性,把人降低与普通动物平列,或者又常常夸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人说成神仙那样。这是人在看自己的时候的两种偏向。

以上是说人的自然性。〔毛批: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畴,美国“行为派”(以庸俗唯物论为表形的主观唯心论)正是如此。〕

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种本性,人还有另一种本性,即是人的社会性(毛批:二元论。)。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二者互相限制,也互相推移。(毛批:这个观点不妥,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种族存续,它就是当作社会的人的存续,再无别的。)

何谓人的社会性?

因为人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必须有维持社会一切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规律,这种社会规律,是限制着人们的自然性、自然欲望(毛批:不妥。)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发展。

因为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思想行动能够自觉的规律化,(毛批:人的自觉是历史地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人也就最容易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下而引起自身的变化,比一切其他“冥顽不灵”的东西不同。(毛批:人同冥顽不灵的猴子的最初区别,仅仅在于用工具劳动。)人们在不断的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改造着自然界,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本质与本性。(毛批: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手、脑、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种不同社会结构,改变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只应这样来解释人的性质的改变,否则就是唯心论。)人们的思想形态,是由这些人们经常接触的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来决定的。一定形态的人们思想,又指挥着人们在一定形态上去行动,并逐渐改变

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

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们相互间在一定的劳动样式的基础上,发生一定样式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毛批:这些是对的。)

人们长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去劳动,去生活,(毛批:但是长久地不自觉地,自觉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是也就使人们的思想行动按照这种规律相对的定形化。一定的经济性质,一定的社会性质,决定人们一定的社会意识的性质与伦理道德的性质。一切人们的理性,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毛批:只是社会的。)

人的自然性,是先天的,是从人这种东西的根据中产生出来的。如人的体质、聪明、本能等(这些东西受后天的影响,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被后天所根本改变)是先天生成的。人的社会性,是后天的,是从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中养成的,如人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等,是人在生产中斗争中养成的,学会的。〔毛批:但前又把思想意识归入自然范畴,又把聪明归于自然(先天)范畴。〕(如驯养很小的野兽,也可使野兽具有某种驯性。)

〔毛批: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

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

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移(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移(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入唯心论。〕

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成为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人们的社会性,就被各人在生产斗争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社会性,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们的阶级性。特定阶级人们的阶级性,分裂了掩盖了人们共同的社会性。(毛批:是分裂了,不是掩盖了。)比如现今社会中各阶级人们所特有的各种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

等级性、神秘性、残酷性,资本家的垄断性、竞争性、自私性,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进步性、组织性、集中性等)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人们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成为人们的党派性,特定阶级人们的这种阶级性党派性,就贯穿在这些人们一切具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以致使各种军事、政治、学说、艺术和道德等等,都表现着一定的阶级性与党派性。

过去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把自己的阶级性,看作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阶级人们的阶级性看作是违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恶劣的表现。把他们看作是无人性的人,把他们看作是不够人格的人。过去一切统治阶级都讳言人们的阶级性,并且讳言人们的社会性, (毛批:实在也由于不知道,连最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也不知道。)都把人们的阶级性社会性看作是人们先天的自然性,因为这样,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在过去各种人性学说上,都明显的表现其阶级性。所以有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也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一分子(在阶级社会中还是一定阶级的一分子),人又是社会人(或阶级人)。所以人同时具备着自然性与社会性,这就是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人这种东西所有的两种基本属性。(毛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但这就是说,它是社会人,不是所谓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社会人。)

何谓善恶?人们的善恶观念是由什么决定的?

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一切对于人们有利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善;一切对于人们有害的事物,人们就认为恶。(这是以人类为本位来说的。但有些中国佛教家的善恶观念还把动物界包括在内来说,所以他们戒杀生,认为杀害动物也是恶)。(毛批:佛戒杀生,恐有其社会的原因,如英国戒捕鸟,中国农民戒杀牛,是因为鸟少牛少的原故。)

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如是个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与整体的利害、暂时的利害与长远的利害之间,就时常是发生矛盾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彼此之间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恶观念。比如剥削阶级认为善的,被剥削阶级就认为恶;被剥削阶级认为善的,剥削阶级又认为恶。如果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不同利害关系,还可以用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的办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话,还有人类社会全体共同的利

害关系的话,(毛批:“人类”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时我们这个概念的。至于“人类共同利害”,从来就没有过,只待将来阶级消灭后才会发生。)那么,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即使人们真的能够好善恶恶(而不是好善恶善),那末,各阶级人们之间的善恶观念及其好恶也是不能一致的。孟子与王阳明只在人们的食色之间,好好色、恶恶嗅之间,去找人类共同的好恶及人类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们也很难找到人类的共同善恶及好恶了。〔当孟子说到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等等人类共同心理时,只能举出一个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还没有思想的,(毛批: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希特勒的小哥儿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打救。)无善恶之可分的。(毛批:否。)如果说成人的话,那孔子对少正卯,孟子对杨朱、墨翟、盗跖诸人将入于井,是否还有那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那就很难说了)。

在(毛加:“将来”。)无阶级的社会中,人类社会全体是还有共同的善恶观念的,是还有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与辞让之心的。因为在这时候有社会全体的共同利害。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恶标准,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也没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与我们的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横死,我们也并不会会有恻隐之心)。故关于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的争论,(毛批:是抽象争论。)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复的。因为没有一致的善恶标准。至于说人性无善恶,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毛批:否,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但人们的善恶观念,是人们的一种社会观念,说到人性的善恶,只能是就人的社会性来说,而人的社会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体的人来看具体的社会的后天的人性,那就总是有善有恶的,因为这是由具体的人所处具体社会环境的善恶(对于一定的人们来说)来决定的,比如我们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场,对于一切具体的人都能确定他本质上的好坏,就是因为我们站在具体的立场,有具体的善恶标准,能测量一切相当成熟(毛批:不成熟也一样。)的具体人们的好坏。所以人性无善恶的说法,还是抽象的说法,唯心的说法。如果具体的来说,不独是人的自然实质有好坏(体质秉赋有强弱)

(毛批:秉赋也是社会的。)就是人的社会实质也有善恶,不过各阶级之间所认为的善恶不一样就是了,在告子与孟子的争论中,告子的缺点就在这里(自然告子的意见比孟子是要正确多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这是人类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也自然就爱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来爱好的力量。但是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常常是无情的与他们的利害相反。在这种时候,一切剥削阶级就都不爱好真理,不爱好进步了,都爱好自己的利益,爱好反动,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来处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观是非来处理事物,都要故意来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骗群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剥削阶级主观上的是非,与客观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们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当作绝对真理)。(毛批:这些都说得好。)因此,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他们的是非与他们的好恶、与他们的善恶观念,都不能是一致的。(毛批:这一点不妥,虽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剥削者的善恶总是以他们所谓是非为标准的,二者大体是一致的。)是者,他们常常不好,不认为是善,非者,他们倒常常好,不认为是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好好恶恶,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作不到的。(毛批:他们是其所谓是,非其所谓非,善其所谓善,恶其所谓恶。)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毛批:他们统一其所以来的东西。)何况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彻底认识客观真理。所以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批: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梭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眼光。)你企图把王阳明的四句话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难作到的。(毛批: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来信所改四句,也还有可议之处。

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三千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制度,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也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伦理哲学。但是这种哲学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同时又是封建阶级的政治纲领与封建国家的宪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拥护这种哲学的言论行动,都在实际上是拥护了中国的封建残余,阻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批: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眼光。)中国现在有人著了一本书,名《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上全部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封建阶级的“固有道德”及其伦理哲学,坚决的反对现代思想共产主

义与自由主义；然而他们又在大大反对什么“封建割据”（如果是民主割据，他们就不反对吗？）对于这些人，你还有什么是非可讲的呢？他们是不是还有是非之心呢？

人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这在中国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说：“义：利也”，利是义之实，又说“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张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会全人类的共同的利益为其道德的标准的。墨子是第一个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伟大的哲学家。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反映。中国的封建道德，封建的伦理哲学，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内）利益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建立在使大多数人受苦的基础上，这就是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天性及其道德的标准。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天性及我们的道德的标准。

一切剥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恶劣的人性，（毛批：当着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还在破坏旧制度建设新制度时，他们是有其历史作用的。）他们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上去求得自己兽性高度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发泄（如三宫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劳动的被压迫阶级的特性，都是当时社会上最善良的人性，他们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为人的。

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加：“以及将来的人类”，）才能深刻的认识客观真理。（毛批：这是对的，但与篇首论人为万物之灵一节矛盾。）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动按照认识了客观真理自觉的规律化，方能有最高的自觉的纪律性与原则性，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才能完全作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好者好之，恶者恶之，才能具有人类中最优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德性”），才能创造最优良的社会秩序。也才能把人类特出的理性、人类的天才发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优良的人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毛加：“及将来的人类”），它的利害与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全体人类解放的利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坦率的爱好真理，（毛批：当资产阶级对封建革命时候，他们是代表了社会进化利益。他们也爱好他们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约论与进化论。）爱好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爱好社会进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样自然；恶恨邪说，恶

恨人类共同利益的破坏者,恶恨反动,如恶恶嗅那样自然,也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的解释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并把这种哲学提高到最高的程度。

我的意见,略如上述。

尊意以为如何?望加指正!

顺 祝

痊 安!

刘少奇

六月二十八日

(毛批:总评:缺乏唯物的历史的观点。)

附：毛泽东同志致刘少奇同志信

少奇同志：

一气看完了你的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大体说来，凡论人性（前半部居多）的地方我以为是错的，凡论阶级斗争的地方（后半部）则是对的或比较对的（但有某些错处）。其原因，我以为你还没有将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作一个全面的了解，由你自己苦想出来的多。我的意见，与其苦想，不如研究马恩。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我愿与你当面辩论一回，彼此或都有益。

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早

过了一周，12月24日毛主席又致信刘少奇，向他介绍《从猿到人》一书中编入的恩格斯的两篇短文《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和《人类进化的过程》（《〈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一段），“十分精彩，可以看”；编入的郭烈夫（苏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一篇，“亦可一阅”。信中并说：“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他们认真、勤奋的学习热忱多么感人呀！

再有，毛主席关于二元论的批示是十分精辟的，蕴含唯物辩证法之一分为二并不导致二元论的原理。在他的哲学著述中论及这个范畴不多，属凤毛麟角。

（这个材料文献研究室已分别公布在《毛泽东年谱》和《刘少奇年谱》中，其结果，割裂、混淆、疏漏、失真，不堪卒读。——摘者）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注释值得商榷

齐得平 耿仲琳 田逢禄

我们知道,原来的这条注释,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审定的。注释所注之正文,是集中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而修改后的注释,却根本避开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注释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正文。如果注释脱离正文的内容,根本不谈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修改后的注释,说“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我们都是在中央档案馆工作了四、五十年的档案工作者。我们查遍了所有有关的档案文献,包括会议记录、来往电报、中央的指示、决议等,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从来没有主动指示或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这种说法完全是虚构的。相反,我们倒是看到很多张国焘等人急忙要四方面军渡河的提议、指示或命令等等档案材料。关于张国焘在长征路上不愿同中央会合,分裂党分裂红军,先是要四方面军南下,后来又要他们到甘西去的情况,胡传章、齐仲田同志在《张国焘退却路线的发展及其最后破产——红军长征及西路军重要史料钩沉》(见《追日集》70~115页)一文中,大量摘引了第一手的档案材料。为了节省文字,我们在这里不再摘引,仅将1936年10月中旬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合后,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的一些档案材料摆出来,即可充分说明,究竟是谁指示或命令渡河的。请看下面材料: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纲领》明确规定:“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会静地区就粮体整……”“十一月十号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的执行新任务。”(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628—629页)《纲领》说的是作准备,而且是十一月十号以前都是作准备,何时渡河

没有说,更没有说要急急忙忙去渡河。

10月13日17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请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要“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627页)。

10月16日15时朱、张致彭、贺任关并毛周电提出:要一方面军在打拉池之七十三师“协助三十军渡河”,“四方军于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进”。(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以下简称《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822页)

10月16日22时毛周致任贺关刘并致朱张电指出:“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迟滞其前进方针。……坚持此方针,方于尔后行动有更大利益。”(见《毛泽东事文集》第一卷第630页)

10月16日朱张致电党中央军委称:“十六日二十时(从上电看,应是二十二时——笔者注)电收到,我们完全同意。”(见《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824页)

10月18日朱张致电毛周称:“三十军电谓二十(日)晚即可开始偷渡”。(见《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828页)

10月19日13时毛周致电朱张,告之“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河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二十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见《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828页),可见,中央是不同意三十军马上渡河的。那时中央清楚,根本不让三十军渡河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采取委婉的办法应对。

10月20日21时,徐陈致毛周电称:“三十军已成船六支。”(见《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830页)

10月22日徐陈致各军、朱张电称:“三十军在靖远附近,决明(二十三)晚抢渡。”(见《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831页)

10月23日9时彭德怀就宁夏战役的部署致电毛泽东。电报说:“宁夏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第四方面第四、第三十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633页)

10月23日朱张电令“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73页)

10月24日朱张致徐陈、贺任并报中央军委电称：“我们昨十六时到打拉池与德怀、海东晤谈”，“关于根据新任务由德怀同志提出之战役计划要旨，我们完全同意。”（见《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835页）

10月24日朱张致徐陈电称：“三十军渡河尚未成功”，“今晚应再偷渡”（见《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835页）

10月24日朱张致徐陈电称：“如三十军今晚渡河不成，应在靖远上游至营房滩之线继续佯渡河吸引敌人注意该方，同时速移一部兵力在靖远下游东面陡城堡秘密造船渡河。”（见《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836页）

10月24日24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致朱张、贺任，徐陈电说：“同意二十三日九时电之计划。”敌“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32页）

10月24日徐陈提出全军西渡。电报说：“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向发展。”尔后“四、五军续渡北岸”。并“建议一、二方面军另由靖远以北抢渡”。（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349~350页）

以上两个24日电的想法可不一样呀！一个是“击破南敌”，一个是“全军西渡”。可是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马上得到张国焘的支持，第二天，即10月25日16时张国焘以“朱张彭”的名义，致电中央军委、贺任关刘、徐陈：“三十军渡河成功”。“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见《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840页）10月26日徐陈致朱张彭电称：“我们即遵二十五号提议之电（即指张国焘以“朱张彭”名义发出的那个电报——笔者注），决心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见《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843页）10月26日17时朱张同意四方面军作战部署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电称“同意你们布署”。“你们应以一部在靖远下游陡城堡、东海一带……四方面军（后卫）将来从该处渡河。”（见《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843—844页）

10月25日徐陈致朱张及各军电称：“我三十军已渡河成功，今夜三十军可全部过河”，“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见《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838页）

10月26日^①朱张致中央军委电称：“我三十军于昨晚在靖远上游十五里

^① 《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编者注：“据前后文电对照，应为10月25日。”

之虎豹口渡河成功”。(见《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842页)

10月25日毛周为击破南敌致电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指出：“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在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634—635页)

10月26日2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张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见《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02页)这就是说张国焘以“宁夏战役”为名，实际上是避战逃跑。

10月27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左权、聂荣臻，电报中说：“大帅(指张国焘——笔者注)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池柏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前二十五日前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见《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第91页)这个电报清楚说明，上引10月25日16时以“朱张彭”名义发的那个电报，是张国焘盗用朱彭名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卑劣“杰作”。

陈昌浩于1937年9月30日向中央写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说：“渡河行动：十月二十日总部离开会(宁)，事前只决定了三十军到大芦子造船渡河，三十一军分途在后阻敌，总指挥部迟两天开动到打拉池，其他问题没有确定。二十二日指挥部离开会宁，这时毛炳文正积极由马营向五军锐进，胡宗南部向通渭压迫，我们当时才决定由九军一部、三十一军、五军及四军一部在会宁附近予敌打击，但因五军退走太快，未照命令扼守会宁，使计划未能实现。此时三十军已渡河成功(二十四、二十五日晚)，九军、五军急向北开进，四军、三十一军扼阻大路。敌人急进之下，指部本总部命令，随九军、五军渡河，三十一军亦准备渡河(直属队大部已渡河，随后又开返河东)。”“我们率三(个)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违反军委意图的。国焘同志纵〔命〕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是执行自己一贯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三十一军、四军均已渡河。”“宁夏战役计划决不是分散主力，无条件的避过敌人，而是要在有利时机(诚如会靖线上及以东)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争取消灭其一部，借以巩固自己的根据地。当时三个军渡河无疑的是违反宁夏战役计划的，是退却路线支配下之行动。”“我们当时是以为总

部命令是在军委指示之下的……,(在渡河后才知道军委不赞成三个军渡河)……当时军委同意用一个军在河西,这是因为已经过了河,事实上已无法制止之后(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军委并不知道)”。(见《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979—980页)陈昌浩在这个报告中,承认了西路军渡河是执行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

1937年3月30日,在有张国焘等60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延安会议”)上,讨论张国焘的错误问题时,毛泽东在发言中说:“西路军的失败是极不幸的”,“渡河的时候,他们要全部过去,过了三个军我们才知道,于是只好顺水推舟‘批准了’”。

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写道:“张国焘野心不死,竟又借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结果过去了一部分,渡口即被赶来的胡宗南部控制。已渡的部队,照他的预定计划,西进至甘州,肃州地带,即被国民党军辗转包围。虽经英勇抗击,但终于遭受失败。”(见《星火燎原》(3)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2月版第13页。《刘伯承回忆录》第14页)

1972年6月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及西路军失败的情况时说:“张国焘到了西北以后,又变了计划了。这个人因为是个坏人,他总是动动摇摇的,总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个阴谋家。他又下令给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五军团西渡黄河。这时已经到了陕甘宁边区了,六盘山的左右了。他忽然又分兵,他先把四方面军总部调过去,向前同志他们过去了,然后许多军队也过去了,五军团也过去,幸好当时有一个军队挡住了,就是关麟征的部队。关麟征也是归胡宗南指挥的,是那个时候跟我们在甘宁地区作战的部队之一。张国焘一听关麟征是胡宗南的部队,他就停了,他就没进,否则他也过去了。又加上朱德同志、刘伯承同志在一起,所以还是把他接到陕甘宁这边来了。已经过去的就受苦了。渡过黄河以后,在甘肃的那个弄堂里头,就是凉州,甘州、肃州一带,在祁连山之北,不顾长途跋涉和马家骑兵的袭击(因为那个地方是宁夏、甘肃、青海马家骑兵出入的地方),地形又不熟,就在那一个窄狭的胡同里行动。他的目的,仍要往西逃跑,打通苏联的道路。……因为他反中央,另立新中央,所以他不愿意再回到主力红军一起,想跑到西北去。结果呢?几乎全这覆没,只有李先念同志率领的三、四百名红军到达新疆,那个时候只有三四百人。那时我们已经可以同莫斯科通点消息了,通知了莫斯科,就派陈云同志、滕代远同志去接李先念同志,以后接到新疆。当时新疆盛世才跟我们还有关系,他那时候反蒋,跟苏联有关系。这样

他们就到新疆。经过训练以后,经过休息以后,多数都回到陕北了。”

从以上引述的档案材料中,我们不难看出,急忙下令让红军渡河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国焘。《毛泽东选集》原注中所说的“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两万余人渡河没有错,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而修改后的注释说成是“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应当给予纠正。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修改后的注释中说:“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妥的。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人民军队。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党的军队,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长期处在敌众我寡的极端恶劣的环境中逐渐成长发展起来的。

西路军两万余人,过河后不到半年时间,即几乎全军覆没,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同志,他们很多人的牺牲是壮烈的,是可歌可泣的,永远值得我们怀念。问题是出在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身上,他们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在他们头脑中,张国焘的到甘西独创局面的逃跑路线没有完全克服,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曾经两次发电报,请他们考虑“东返”的问题,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一心要到甘西去独创局面。当时的西路军主要领导人之一陈昌浩,在向中央检查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后,中央及军委诚心想调我们东返,只因为我们立意西进,最后亦只得电允西进”。(见《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第992页)1937年10月3日中央常委会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时,张闻天同志说:“当时中央怎么拉也拉不回来。”

实际上,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中央早已作出结论。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就指出:“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第167页)在《毛泽东选集》中也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有人就此大做文章,说什么《毛选》上的这个话是后来加上去的,极力为修改这条注释制造舆论。经查,“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个话,确实在毛泽东的初稿中没有,是后来在一个油印稿上毛泽东加上去的。这个话最早出现在1937年3月31日张闻天同志在那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里。他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央非常痛心的,也是红军未有过的耻辱。这是国焘路线最后的

破产。这是血的教训。”“这对于党是严重的教训，西路军同志的英勇艰苦，我们是佩服的。但是失败了。想将这个责任推向中央，这企图是不成功的。如果不是胡宗南来，那四军、三十一军也会跟过去的。”

有的人不顾历史事实，硬要推翻中央原有结论。修改后的《毛选》注释是如此，中共党史也是如此。对此，我们是不敢同意的。我们认为，任何个人或部门，都无权随便修改中央的《决议》。并且这些修改也是不合法的。

总之，从大量的档案材料中看，原来中央关于西路军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这笔账应当算到张国焘头上，硬要把责任推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上是不行的，这个案不能翻。

2004年7月1日

四野纵队称军时间及首任军长考

陈小枚

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番号,启用一、二、三、四野的番号,纵队改称军,兵团、军、师、团番号全军统一排列(简称整编),是在平津战役结束后全军休整期间(1949年2月以后)统一进行的。可是若干年来,有关四野的许多史著、小册子错误地把这个时间说成是1948年11月;并对首任军长做出很多错述。有必要予以厘正。

508

一、整编时间1949年2月以后确凿无疑

请看五部《战史》的记载: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我军在平津、淮海战役结束后的休整期间,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于2月至4月先后进行了整编”(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研究部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7月第一版,第三卷317页)

“为了适应全国范围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1949年1月15日又发出了《关于各野战军按番号顺序排列》的指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西北野战军从1949年2月1日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纵队改称第一军。”(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95年5月第一版,201页)

“1949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中原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由第二纵队编为第十军……”“在中原野战军整编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其他野战军也进行整编。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华乐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东

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原华化之第一、第二、第三兵团依次改称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90年2月第一版266、267、268页)

“(1949年)2月9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番号的决定,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并颁发了整编命令,”(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南京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96年7月第一版317页)

“东北野战军在平津地区休整期间,遵照中共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颁发的《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和1949年1月15日《关于改各野战军番号事》的电令,于1949年3月1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东北野战军所属之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2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电令和11月17日电复,依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第39、第40、第41、第42、第43、第44、第45、第46、第47、第48、第49军(新番号在天津解放后陆续正式使用),……”(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组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98年10月第一版442、443页)

上列五部战史都清楚载明全军整编启用新番号的时间是在1949年2月以后,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了!(附记:“(新番号在天津解放后陆续正式使用)”这句话费解;依我们看来,四野各纵称军的时间似应在3月11日以后,而不应超前。)

二、1948年11月改称说站不住脚

《中国雄师第四野战军》(翟唯佳、曹宏编著,中国党史出版社2004年4月北京第二版,简称翟书)坚持四野纵队称军的时间为1948年11月:

“第四十军(1948年11月由第三纵队改称),军长:韩先楚 罗舜初(后),政治委员罗舜初 卓雄(后) 袁升平”

“第四十五军(1948年11月由原第八纵队改称)军长 黄永胜 陈伯钧(后、兼) 政治委员 邱会作”

“第四十六军(1948年11月由第九纵队改称)军长 詹才芳 政治委员

李中权”

“第三十八军(1948年11月由第一纵队改称)军长 李天佑 梁兴初(后) 政治委员 梁必业”

“第四十七军(1948年11月由第十纵队改称)军长 梁兴初 曹里怀(后) 政治委员 周赤萍”

“第四十九军(1948年11月由第十二纵队改称)军长 钟伟 政治委员 袁升平 徐斌洲(后)”

“第三十九军(1948年11月由第二纵队改称,1949年8月改归第十三兵团建制)军长 刘震(兼) 政治委员 吴法宪 吴信泉(后)”

“第四十一军(1948年11月由第四纵队改称,1949年8月改归第十二兵团建制)军长 吴克华 政治委员 莫文骅 欧阳文(后)”

“第四十二军(1948年11月由第五纵队改称,1949年8月改归野战军直辖)军长 万毅(满族) 吴瑞林(后) 政治委员 刘兴元”

“第四十三军(1948年11月由第六纵队改称)军长 洪学智(兼) 李作鹏(后) 政治委员 赖传珠(兼) 张驰明(后)”

“第四十四军(1948年11月由第七纵队改称)军长 邓华 方强(后) 政治委员 吴富善”

“第四十八军(1948年11月由第十一纵队改称)军长 贺晋年(兼) 政治委员 陈仁麟”

“特种兵司令部(1948年12月30日由炮兵司令部改称,兼炮兵司令部)司令员 箫华 万毅(后、满族) 政治委员 钟赤兵”(分别摘自《翟书》第380至390页)

《翟书》坚持1948年11月改称说,有什么根据吗?我们以为是没有的,只可能是误判。其一是《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立即生效了,所以判定改称时间为“1948年11月”。可是这个《规定》的第六项说清楚了,不是立即执行,请看:“(六)对于上述各项的规定,五大军区可先进行若干必要的准备。具体实施,必须在野战军部队和地方部队进行整训期间公布执行。”(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十七册第451页)《规定》说的是“先进行若干必要的准备”,要等到“整训期间公布执行”,并非立即生效,所以不能凭之认为1948年11月就改称了。其二,东北军区接到通知后,在做“若干必要的准备”工作,于当月形成了一份系列表,这个表只是草案,并未实施,整编中干部作出许多调

整,这个表不能反映调整后的实际情况,所以既不能依据这个表说改称是在1948年11月,也不能说这个表上的军长政委名录就是首任军长政委。这里顺便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修改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编著,1990年第二版)。其中第781页至790页收录的《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序列(二)(1948年10—12月)》就是在统一番号的准备工作中形成的草案,是《草表》,并未实施,并未反映整编中干部调整的实际情况。其中的一些注文,把各纵称军的时间都说成是“1948年11月”,明显是错误的。而其名录与上述《翟书》所误相近。使用者须明审,勿其名录与上述《翟书》所误相近。使用者须明审,勿受误导。

三、1948年11月17日改称说同样站不住脚

多年来,四十二军政治部党史办一直认为该军是1948年11月17日改称,万毅是首任军长。他们在《双鬓多年作雪 寸心至死如丹——怀念老军长吴瑞林》一文中,有如下陈述:

“1948年11月13日,林(彪)罗(荣恒)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遵照军委11月1日电令,第1纵队改称为38军,第一师改称为一一二师,其余总队及师类推。12个独立师,可从一五一师排起,按次序编入各纵,即一五一师归三十八军。”

“中央军委11月17日复电(摘要):批准你们第一纵队至第十二纵队改称为军后,其番号由三十八军排至四十九军,其所辖之师,由第一师至第三十六师,改定番号为第一一二师至第一四七师。每个军辖步师4个。除上述原建3个师外,另辖1个独立师。此12个独立师其番号由第一五一师排至一六二师。(见中央档案馆文件)”

“纵队改称军后,纵队首长改称军首长。可是,四十二军奉东北野战军司令部11月21日命令为入关部队右路纵队的先后后,于11月23日由义县出发,向北平以东三河地区组织开进,以至在整个平津战役作战中,上下往来电报仍称四十二军为五纵队,各级称万毅、吴瑞林仍为万司令、吴副司令。”(见耿仲琳、彭绪一主编,改革出版社出版《最可爱的人》第275页)这个矛盾应如何分析化解呢?

经查,确有这个来往电,而且复电是周恩来副主席的手迹。这个复电虽然没有限定公布时间,但决不能成为误解的理由。因为林罗刘13日请示电上已

经有“各纵师在隆重的祝捷大会，宣布新番号”的文字，说明请示者已经明了军委《规定》“必须在……整训期间公布执行”之精神，复电当然无须赘述。随意删除请示电的这些话，把往来电割裂开来，引出错误的结论，不是很荒唐吗？！请参见原电：

军委：

（一）遵照军委十一月一日电令，我们决定在这一整补期内，将各独立师编入各野战纵队。使每个纵队，辖四个师。其番号亦遵照军委电令，以第一纵队改称为三十八军。第一师改称为一百一十二师。其余纵队及师类推。而十二个独立师，可从一百五十一师排起，按次序编入各纵。即一百五十一师归三十八军（一纵），一百五十六师归四三军（六纵），各纵师在隆重的祝捷大会上，宣布新番号。

……

林罗刘

十三日七时

“各纵师在隆重的祝捷大会上，宣布新番号”下的着重点是本文笔者所加，以证并非立即宣布新番号。

其实，到了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电令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改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时，电文的最后仍说明“请各区各军即照此电在整训期间公布施行。”（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8卷第34页）电文中着重点是笔者所加，说明此时仍未公布施行，更彰显出1948年11月17日改称说之决不可信！

至于42军党史办提出的问题“可是……以至在整个平津战役……仍称五纵队……”等等，只能说明此时尚未改称，不需多加讨论了。

不过，有二本专题描述四十二军的书，值得在这里讨论一下。

平津战役尚未改称，这几乎是常识。可是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谢甦、胡支援著《急起》一书，在其“平津战役·抢占丰台围困北平”一章中，就改了称，如称五纵为“四十二军”（该书138页倒数10行）；称五纵司令员为“军长万毅”（该书140页第7行）；称五纵副司令员吴瑞林为“副军长吴瑞林”（该书140页第9行）。“平津战役”这一章从138页到176页共36页，统统把“五纵改为“42军”了，”引不胜引，只引此三例吧！这是明显的讹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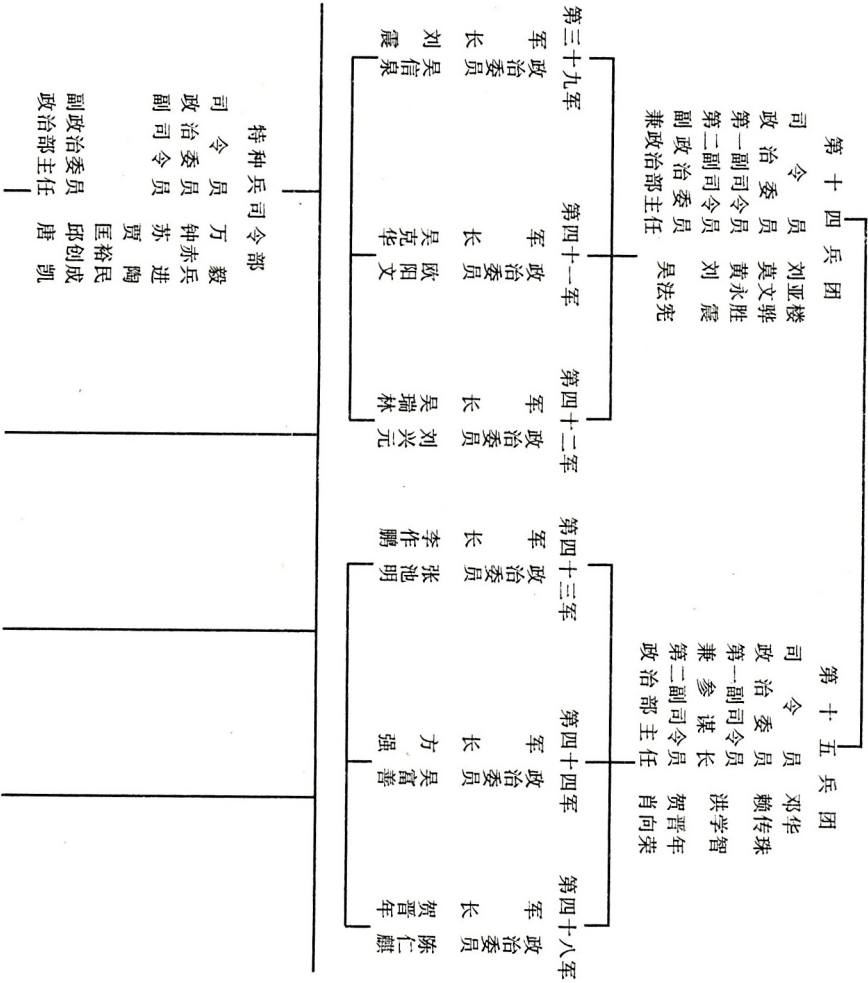
“42 军的前身是 1948 年新春成立的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首任司令员万毅……同年 11 月,改称第 4 野战军 42 军。”(见张永枚著《美军败于我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 12 页)

这个说法欠清晰,试想 1948 年 11 月 29 日林彪、罗荣桓还在沈阳,此时何来“四野”之称谓?

“首任”也含混,因为五纵司令员唯有万毅,并无继任,何来“首任”?如果是指四十二军,怎好称“司令员”而不称“军长”?

四、首任军长政委名录

据我们考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7 月版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之《附件一,各战略阶段敌我序列表》很精审,它没有收入前文分析过的 1948 年 11 月形成的《草表》,没有受《草表》的干扰与误导。它收入的改称后初见的相关系列是《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 1949 年 6 月》系列表(见该书“附表 63”),现将其相关部分的图样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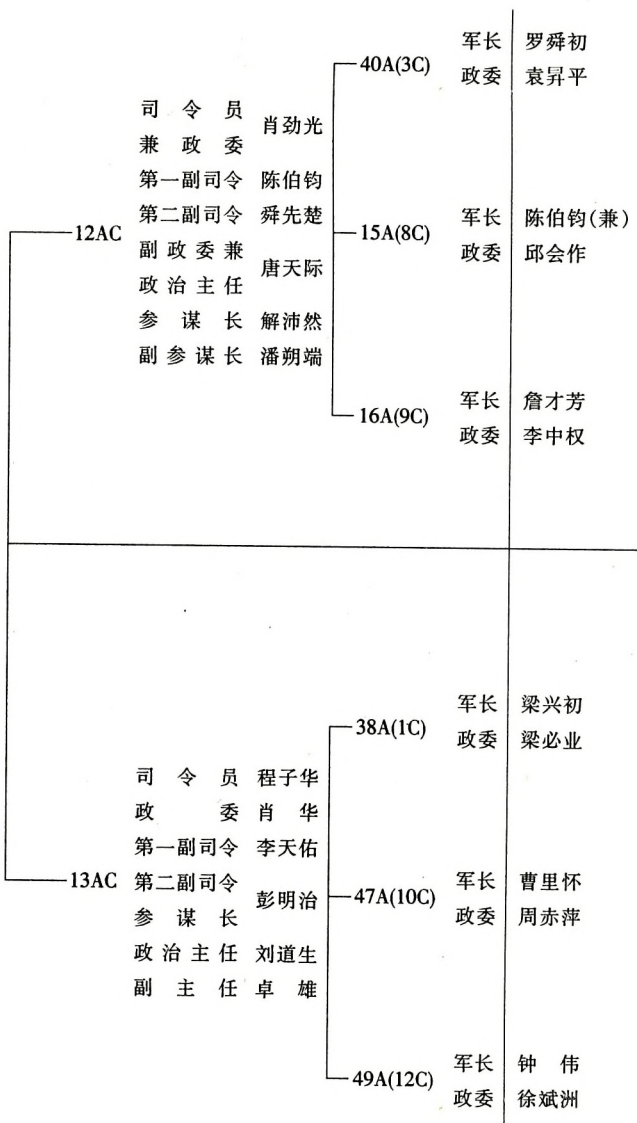
兰台稿存

中央档案馆珍藏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序列(00001号)》，这是军委一局在全军统一番号后于1949年6月30日制成报送毛主席的。其中四野纵队称军后的军长政委名录，与上引《军史·附表63》完全相同。现将其相关部分图样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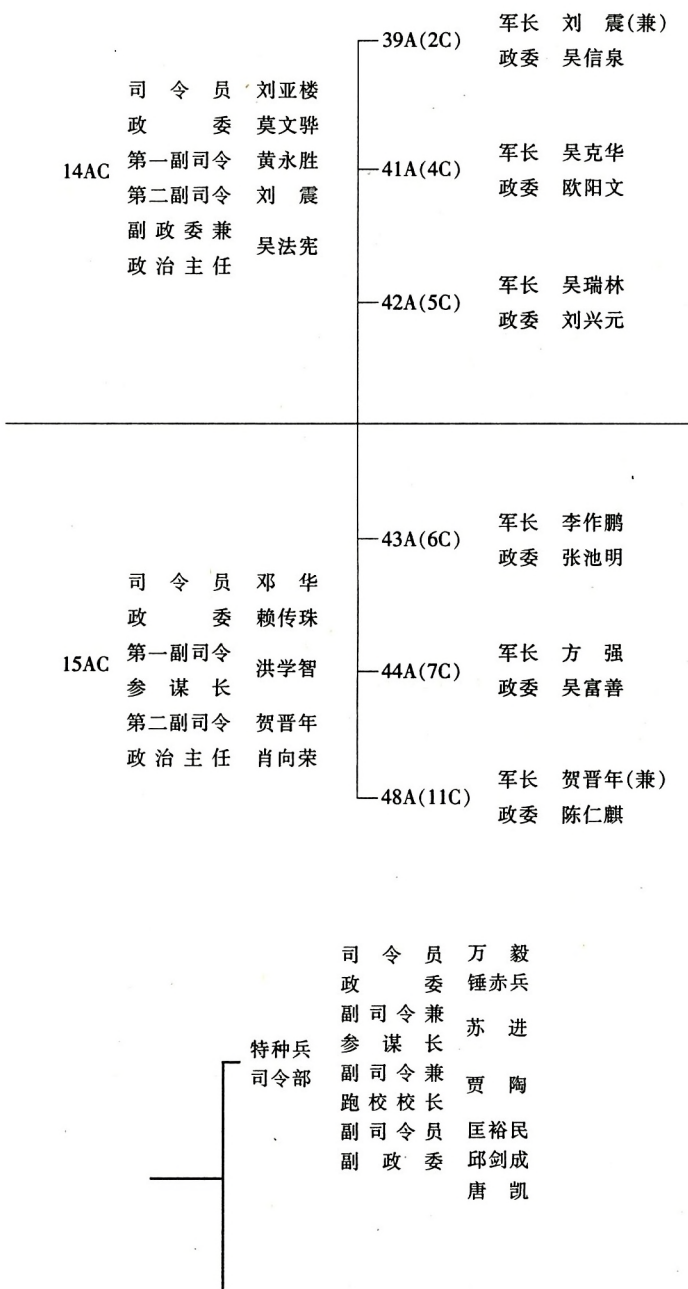
516

第四野战军

司令员 林彪
 政委 罗荣超
 郑子恢
 第一参谋长 肖克
 第二参谋长 赵尔陆
 副参谋长 聂鹤亭
 政治主任 谭政
 副主任 陶铸



四野纵队称军时间及首任军长考



这两个表皆编成于1949年6月,是纵队称军后即时编就的,因而可以推知其中军长政委名录皆为首任军长政委。而四十二军首任军长为吴瑞林,万毅调任特种兵司令员了。以这两个名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443至446页所述军长政委名录相校则发现《战史》有许多错误:

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误为李天佑;三十九军政委吴信泉,误为吴法宪;四十军军长罗舜初、政委袁升平,误为韩先楚、罗舜初;四十一军政委欧阳文,误为莫文骅;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误为万毅;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驰明,误为洪学智、赖传珠;四十四军军长方强,误为邓华;四十五军军长陈伯钧(兼)误为黄永胜;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误为梁兴初;四十九军政委徐斌洲,误为袁升平;特种兵司令万毅,误为箫华。

五、四十二军首任军长是吴瑞林不是万毅

经过上述考证,四十二军首任军长是吴瑞林而非万毅,已经毋庸置疑。但是遵守“充分现由律”,这里可再做进一步印证。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吴瑞林著《鸭绿江——嘉陵江》的193页记载:“辽沈战役胜利以后,我们率五纵队,随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下,平津战役大获全胜。全军统一编制后,五纵队改称为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四十二军,我任军长,军部驻河北省涿县。”这里讲的时间序列都很准确,与史实相符。万毅调走了,升任特种兵司令员了,因原来是拟由箫华担任这个职务的。我们从吴瑞林个人档案中,见到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

兹委任吴瑞林为第四十二军军长

此令 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周恩来 公历一九四九年四月”

这是1949年4月发的,这是刚刚启用番号之后,这可是个宝贵的凭证。它直接证明了四十二军首任军长的问题,又间接地证明了我们全部印证的确凿可信性。

印证历史,是周恩来总理赋予我们档案工作者的一项职责。本文是履行这一业务的学习尝试,谨供有关方面参考,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2004年8月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范例

——读山城堡战役决策电感言

齐得平

1936年11月21日黄昏至22日9时,彭德怀指挥红军取得山城堡之战的胜利。

“这一仗,我军歼敌1个多旅,给了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击,迫使该敌全线退至大水坑、萌城、甜水堡及其以西地区,从而停止了敌之进攻。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正确决策和三大主力红军团结战斗的成果。它大振了我军的声威,对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第356页)

我认为毛泽东关于此役的决策电,是珍贵的军事辩证法教材,我们、尤其是军事院校,应当重视研究。

1936年10月24日24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击破南敌”的方略,他在复电彭德怀并致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时指出:“胡、毛、王、关^①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予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②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10月25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致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再次力主“击破南敌”:“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

^① 胡、毛、王、关,指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

^② 南敌,指从会宁、静宁至隆德、固原一线由南向北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各部及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等部。北敌,指沿黄河一线布防的国民党军邓宝珊、马鸿逵、马步青等部。

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二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历史证明“击破南敌”是英明、正确、伟大的决策。

10月26日2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进一步明确“以打胡为中心”，指出：“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可惜五军董振堂已西渡，没有机缘参加打胡了。

10月2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甲、胡敌以我避免决战，十分轻我，向打拉池锐进，王、毛^①向靖远进。乙、我三个方面军主力应依兄等二十七日部署，立即集结在有利阵地，在数日内坚决突击消灭胡敌先头一个师至两个师，以小部抗拒靖远王、毛。丙、九及三十军速复河岸西向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丁、此是消灭敌人开展局势最适当之时机，请兄等速图之。”毛主席密切观察敌人态势、捕捉敌人的弱点。敌“轻我”“锐进”，正在授我以战机。

520

同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各军首长及政治部主任，电报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力量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现当敌人轻我锐进之时，正是我们打胜仗时候，必要时拟请德怀赶前线指挥此次战役。在政治上立即开始大动员，坚决消灭南敌。

同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完全同意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同志俭日七时之海打战役战略计划^②，望各兵团首长动员全体红色指战员下最大决心，努力争取整个战役的全部胜利，开辟今后伟大的战略胜利之途径。”

10月29日2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与南敌决战，关系重要。现

① 王、毛，指王均、毛炳文。

② 指彭德怀十月二十八日提出的在海原、打拉池地区打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战役计划。

敌轻我锐进，胡敌先头又是郭华宗^①旧部周、孔^②两师，打得好可获大胜。”同时提议：“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以野战军^③全部为主力，从二方面军抽二分之一辅助之，专打周、孔两师。四方面军为右翼钳制队，或任右翼之部分突击，专对付胡之西路及毛、王两路。”“实行打时要在有利之地形条件下，首战限于打两个师，并首先消灭其一个师。不合此条件时再退一步，总以胜仗为目的。”毛泽东最懂得集权给彭德怀、排除干扰，是发挥我军战略战术优势，克敌制胜的重要性。

10月30日16时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④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这个“中心关键”，实际是伟大的科学预见。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6年10月30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撤至贺家集、同心城。三十一日起，国民党军陆续向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进攻，隔断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海打战役计划以至夺取宁夏战略计划被迫中止，红军主力向东转移。

11月14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指出：“据彭电胡敌继续向豫旺进攻，不消灭其一部不能南进。似此有打胡敌之机会，自以集中一、四、十五、三十一军在数日内打一仗，再南进。“究应如何，统由彭依前线实况决定可也。”本日，毛泽东又给彭德怀连发两电，提出：“朱、张来保安后，前线部队统交你指挥，当可放手做去。”“打敌办法，如两翼伏击不便，可以一翼伏击，正面敌前进与之遭遇而消灭之。请依情况酌定。”又进一步加强了彭德怀的统一指挥。

11月15日关于一、二、四方面军集结准备对胡宗南部作战问题，毛泽东

① 郭华宗，一九三一年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师长，率该师参加过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被红一方面军歼灭一部。

② 周、孔，指周祥初、孔令恂，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和第九十七师师长。

③ 野战军，指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④ 彭德怀十月二十九日发布关于各兵团集中协同消灭胡宗南部的命令，其要点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在古西安州、关桥堡、麻春堡一带，第十五军团在盐池一带，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一军在打拉池一带，以形成对胡宗南部作战的有利部署。

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蒋介石仍坚决打红军，与南京妥协一时难成，我们应坚决粉碎其进攻。”“胡宗南占领豫旺后之行动，两三天后即可明白。”“目前两三天内，四方面军即在甜水堡、保牛堡集结，二方面军在毛居井及以北集结，一方面军在环县西集结，各兵团鼓动作战准备，胡敌东进时消灭之。”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甲、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人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的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乙、我有打破敌人之许多有利条件，敌情、地形、群众等方面，都有利于我作战，粮食困难是敌我共同的。丙、一切具体布置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十六日，红军各部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山城堡之役蓄势待发了！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 11 月 7 日在宁夏盐池县萌城地区设伏获捷，击溃胡宗南部第一师第二旅，毙伤敌六百余人。为此，11 月 18 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四军萌城抗战甚为得力，请鼓励其继续抓紧阻止该敌，以利一方面军与三十一军之突击。”“现胡军已露疲惫，兵力又颇分散，一战而胜前途大佳。”“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

11 月 18 日毛泽东同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联名向红一、二、四方面军各兵团军事政治首长发布《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动员令说：“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次进攻，开展新的局面。”

11 月 20 日五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胡军现陷在困难中，遵蒋令由保牛堡改向定边、盐池，解决给养，控制战略要屯，其主力进路必经红柳沟，但丁师^①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我以集结四个军从其右侧后打去最好，四军则从正面吸引之”。“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个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二十三时毛泽东又电彭德怀：蒋介石令胡军向定边、盐池急进，丁、周^②两师受阻，不得不向山城堡。“我可集全力放手作战，消灭丁德隆，

① 丁师，指丁德隆为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一军第七十八师

② 周，指国民党军第一军第四十三师师长周祥初。

则全部有利矣。”二十一日，红军向进入山城堡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师的一个旅另一个团发起进攻，消灭其一个多旅，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此后胡宗南部被迫全线后撤，国民党军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实际被停止。

11年23日12时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我们的任务是捉住这些矛盾，更加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忍受与克服一切困难，不失每一个有利时机，灵活调动部队，准备连续战斗，坚决地各个击破进攻之敌，首先是彻底地击破胡宗南。”

以上电文及注文，皆转引自《毛泽东年谱》，其中的着重点，都是笔者所加。

我认为这些电文是绝好的哲学教材，其中蕴涵着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我只想指出三点：（一）“击破南敌”这个英明决策是建立在对敌我形势和矛盾的客观的精辟的分析判断之上的。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综合分析当下中国的各种矛盾得出的雄韬大略。对敌看清了其四种基本性的矛盾并捕捉运动态势中的“轻我”“锐进”等弱点；对我也洞察弱点，克服之。如放手让彭德怀集中指挥，以充分发扬优势。这是能动的睿智的“知己知彼”的认识论。（二）“击破南敌”是毛主席捉住了当下中国革命历史链条的中心环节。他在稳稳地紧握中国革命巨轮的航舵，胸怀全局，把当前的作战和革命全局紧密地联系起来，所以他看到“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三）“转入佳境”，历史证明这乃是毛泽东的科学预见。山城堡战后二十天，即发生了西安事变。毛主席不是算命先生，这个事变非所预知。但是你也不能说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为用“打”，用红军的胜利战斗，打出抗日统一战线来，这是毛主席早已料定了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三天，1936年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弼时电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这里的“前途甚佳”和前面的“转入佳境”是一脉相承的。西安事变决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其基本因子来考查，它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雄韬大略的硕果，它验证了毛泽东思想的威力。

击破南敌。

集中注意力于击破南敌。

兰台稿存

胡敌锐进十分轻我，
此是消灭敌人开展局势最适当之时机，
政治上立即开始大动员，坚决消灭南敌。

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同志，
全体红色指战员，
下最大决心，
开辟今后伟大的战略胜利之途径！
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
究应如何，统由彭依前线实况决定可也。
前线部队统交你指挥，当可放手做去，
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命令，
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
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

524

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
当前的这一个战争，
关系于苏维埃，
关系于中国，
都是非常之大的！
而敌人的弱点，
我们的优点，
又都是很多的！
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
要勇敢冲锋，
多捉俘虏，
多缴枪炮，
粉碎这一进攻，
开展新的局面！

先打胡敌，
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

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
一战而胜,前途大佳!
集全力放手作战,
消灭丁德隆,
则全部有利矣!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前途甚佳!

以上毛主席电文集句多么像一首歌呀!我们就题为之《山城堡战役之歌》吧!自然,她又是拥有马克思主义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而谱写的一曲军事辩证法的凯歌!

愚者之见,抛砖引玉,敬请读者指正。

2004年11月

动乱春秋

耿仲琳

吴瑞林回忆录最详备,在中国革命战争涌现出的诸将军中,堪列第一。但是缺少关于“文革”经历的叙述。《动乱春秋》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是研究吴瑞林之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提 要

吴瑞林蒙受的是大冤案。档案全在,极易查明。“九·一三”事件后,张春桥、苏振华诬陷吴瑞林“上了林彪的贼船,积极参与了反革命政变阴谋。”“四人帮”倒台后,苏振华倒打一耙,诬陷吴瑞林“投靠了‘四人帮’”,押送广东、广西、湖南残酷欧斗。1982年军纪委甘谓汉亲自查明吴瑞林与“两案”没有任何牵连,决定让吴瑞林去广州军区当顾问。1983年春,韦国清、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甘谓汉、史进前亲到海军会商解放吴瑞林,遭到□□□、□□□、□□□的抵制,史进前通知吴瑞林:“你的问题因海军意见不一致,还需要做工作,你等着吧!”1948年9月海军党委和军纪委做出《决定》,承认吴瑞林“与‘两谋’无牵连”,但不仅不予平反,反而诬控吴瑞林犯有严重错误,给了撤销党内外职务,降职离休处分。吴瑞林拒绝签字,并向中央军委申诉,在他弥留之际还嘱托刘军为其向党申冤。

(一) 留书百万言,供党和人民审查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那么吴瑞林将军在劫难逃并不足奇,离奇的是这场劫难伴随他直到临终,历时24年,占其生平的30%。他56岁被罢职,经过十年残酷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相对而言有了一些自由的空间。漫漫余生使他怆然。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又是一个倔犟的人。怎能甘于虚度年华呢?! 为了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有个清楚的交代,也为了对自

己的子孙负责,他拚弃了一切观光旅游、探亲访友的活动,俯首几案,艰难地操起了笔杆,决心留下自己一生的真实经历。后来眼睛看不清了,就口述让老伴刘军代笔记录。早起晚睡,辛勤耕耘。其文虽朴质无华,但坚实刚烈宛如再造甲兵。已出版了《战斗在川陕苏区》、《鏖战齐鲁》、《鸭绿江——嘉陵江》、《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镇守南疆》等回忆录九十五万三千字,另有“文革”经历《散稿》数万言。他小时候没有上过学,是在革命队伍里学的文化。但他是能够创造奇迹的人,以前是在战场上,现在是在写字台前。他用他的伤残费出书,因为他欣赏如下的名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留下的史料诚可使黄金失色,本文凭借的也多是留下的史料。

(二) 疾风知动草,国难识忠奸

文革之来,如晴天霹雷风雨骤至,谁有准备,谁知道它要来???

吴瑞林当年是广州军区付司令员,南海舰队司令员,肩负着守疆卫国和援越抗美的繁重作战任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冲击着部队;南湾舰队文工团拉出造反组织——鬼见愁;蒯大富“通辑黑帮女子”;“文攻武卫”酿成流血;事件曾出不穷,吴瑞林也手忙脚乱了!

好在周总理给他一条热线,于事就向总理请示,有总理给撑腰,他“倒”而复起地支撑着。

江青搞“文攻武卫”。吴瑞林反对给造反组织发枪并制止部队参加武斗,林彪、黄永胜说他右倾,把他“打倒”,弄到“三〇一”医院,不让他管事了。周总理扶他,说他做的对,黄永胜到“三〇一”医院向他道歉,请他回南海舰队继续指挥作战。

方正平政委受冲击处境危险,吴瑞林报经周总理同意把方正平藏到舰艇上保护起来。外地串来的造反派纠缠“抗老血清”问题揪方正平,吴瑞林不交人,并耐心解释说这个问题已经处理过了……造反派责罚吴瑞林令他“坐喷气式”、罚站、罚跪、扭打,残酷揪斗一正天,吴瑞林忍受着,始终拒绝交出方正平。

优秀指挥员战斗英雄樊玉振执勤守卫作战室,造反派疯狂冲击,妄图占领,在门栅即将被冲垮的情况下,樊玉振依据军委规定下令鸣枪警告,无效,樊令神射手击中为首者腿部,暴众一哄而散,保住了作战室的安全。事后造反派闹事游行,索要“凶手”。舰队党委常委开会讨论,吴瑞林力主:“忠实执行军委规定是正确的,不能交人!”樊玉振说:“首长的肩膀能扛千斤、万斤,因有首

长勇于承担责任,我樊玉振才幸免于难!”

南海舰队付司令员王全珍遭受严重冲击,吴瑞林把他藏到奥州岛上保护起来。

吴瑞林指令广州基地、湛江基地两处岛上农场,收容“舰后”干部子女吃住劳动,不让他们参加派斗,嘱咐农场负责人说:“要好好保护我们的革命后代,不要让他们做无谓的牺牲!”这两处数十人的被保护对象中,有董必武老的孩子,宋任穷的孩子,金明的女儿等。吴瑞林死后,霍士兼还特为写纪念文章《光明磊落无私助人》,讲到吴瑞林“在‘文革’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不怕受连累……在我最困难的情况下,对我家的鼎力相助……还帮助了许多受父母株连的孩子。瑞林同志就是这样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不顾个人得失,义无反顾地帮助那些处于困境的老同志及他们的子女。”(见《最可爱的人》395页)

1967年秋,柳州铁桥被造反派炸毁,使我援越部队、民工二十多万人处于弹尽粮绝的险境。吴瑞林上靠总理支持,下靠樊玉振等一批精干的指挥员的机智勇敢,用开辟海上漂流航道等多种方法,运去弹药、粮食、器材两百多万吨,使援越军民脱险。

吴瑞林全力抓住了保护干部稳定部队这个环节,保持部队稳定能战,所以打掉多条敌船,击落多架敌无人驾驶飞机,还亲自指挥了著名的“6·27”空战,击落一架美军鬼怪式先进飞机。

有位同志名田松,因“炮轰”吴瑞林被延长候补期并受到敬告处分,吴瑞林得知后,请张太和同志向相关支部党员做工作,取消了处分,并按时转正。加强了团结。

为了稳定部队,他批示邢会林带领“鬼见愁”等各派头头到军区学习班集训。同学习班的其他单位的学员派斗不止,打得头破血流,唯南海两派经邢会林细微工作,提高了觉悟,自消自弭销声匿迹分化瓦解了。

也有强烈反对吴瑞林的造反派,他们在湛江可马路宽刷写大字标语:“吴瑞林是南海的谭震林!”张太和等追忆当时的情景说:“吴司令真是党性坚强的好领导、是不可撼摇的大山!”

那时候海军各大单位都已发生死人现象,唯南海未死人;当时董必武老在广州,针对这种现象,高兴地给吴瑞林写了一幅对联:

“风景这边独好
江山如此多娇。”

这幅对联的上款，董老题“集主席句为瑞林同志书”，落款题“董必武一九六八年四月于广州”。

关于这段历史情况吴瑞林生前记叙：

1967年5月，总理派专人送一半导体保密送话机，通话后，总理指示有若干个师装备的轻武器，准备在湛江港装船，要保证援外任务完成，不能被群众组织抢走一支枪。我为此带病坚持工作，与湛江港务局同志合作，完成得很好。特别在八月份，柳州至南宁铁路被群众组织破坏，有苏联接越作战装备和我国援越作战的装备武器器材，要从海上运越南海防港，共有六、七十万吨。总理交代任务后问我有什么困难吗？我答：“无有高射炮”，总理指示调舰艇作掩护。我又提：“无运输船”，总理指示：“把远洋公司十余条万吨轮船交你指挥”。又问：“还有什么问题？”我回答：“没有了，坚决完成任务！”任务完成后得到总理的表扬。此事外交部、总参、装备部、湛江港务局均可查证。

一九六七年九月间，五十五军代军长吴纯仁接管军管和支左后，调一个侦察排，运了一个连的轻武器，半个连的重机关枪，半个连的无坐力炮，他声称是按上级“文攻武卫”保护造反派，运入湛江水专的一栋楼上，酿成了激烈的武斗；还让军区动员部长转给我他的一封亲笔信。（此信可向海军党委要回做证。）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我从海上返回舰队将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你是广州军区付司令员，可找五十五军首长谈谈，他们是错误的。你解决了报告我，解决不了也报告我。”我找他们谈时，他们很骄持，我才讲，我是奉总理指示与你们谈话的，你们听取我的意见，撤出部队和武器；如不听我的意见，我再报告总理派人解决。他们才同意撤出部队和武器。解决了湛江较大的武斗问题。

一九六八年四月底，海南军区内部发生了问题，榆林要塞和一三二师，和舰队十一支队武毅参加，据广州军区讲要夺海南军区的权，军区将榆林要塞政委和一三二师政委等关起来了，也要舰队处理武毅的问题。我在三〇一住院，将情况报告总理，总理指示要我等着。第二天黄永胜派车到三〇一医院接我到京西宾馆说：海南军区内部问题，要赛政委和一三二师政委抓起来了，已解决。唯有十一支队武毅的问题未解决，他们是三个头头。要我回去按军区处理的办法办。同时要我再请示李作鹏。李说：“支左问题不管！”但十一支队已被民兵包围，鉴于此种情况，我又请示总理。总理作了四条指示：“①不准开一枪，若开一枪性质就变了；②不抓一个人，暂时也不处分一个人；③学中央，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把负责人找来，做思想工作；④要周志先向广州军区检

讨,军区也要做自我批评。”指定要我回去尽快处理,防止美国人乘我部队混乱之际,乘机向我进攻。我回去后,将总理指示报告广州军区,也告诉了海南军区。完全按总理指示办的。圆满的解决了舰队住海南部队的问题。

1986年国庆节后吴瑞林到任海军常务付司令员、党委村书记。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点名要他来北京的。

当时的情势是海军内乱决斗的第一个回合早已尘埃落地: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为核心的新党委正在号令一切;肖劲光有职无权告边站了;苏振华、刘道生、杜义德已被打翻在地;海军下属大单位已经整死了张学思、陶勇、李呈瑞、雷应通、齐勇等五位将军。

吴瑞林到任,造反派刷出大标语:“坚决拥护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吴瑞林为首的新党委!”吴瑞林在海军机关的全体大会上公开声明反对这条标语,他说:“你们不要把我和李王张扯到一起!”

这时海军有四五千人在北京支左。

吴瑞林到海军分工是负责作战工程,但总理则指示他插手管运动。按总理给他的指示首先抓了海军大院的整顿,停止随便关人、逼死人的混乱局面。同时整顿了支左单位的工作。当时海军管国务院三十多个部,根据总理指示制止了乱抓、乱批、乱斗,停止死人现象。总理要他查清海军五位将军死亡的原因,他紧张地工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情况都查明白了,陆续上报给总理和李先念同志,得到他们的首肯。关于西路军和皖南事变,总理布置他迅速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两大事件都是路线问题,凡在此时被害的都做为烈士,被俘的不能做叛徒来追究。在白区工作的、被迫跨党分子,现在情况已说清楚,一概不许当叛徒抓。总理要求以最快的速度传开。吴瑞林通宵达旦、次晨九时向总理汇报传达完了。总理笑着说:“你的动作迅速,已有来电问我是否属实的了!”这在广州救了刘兴元、闫福生和龙道泉。总理又要他弄清彭老总的下落,制造舆论,给支左人员做工作,终于使彭总住进三〇一医院。经总理指示,海军的苏振华、刘道生、杜义德、赖星云、方正平还有其他同志都采取措施把他们保护起来。总理指示不要死一个将军,这件事办好了就“流芳千古”,办糟了就“遗臭万年”。吴瑞林细心周到地贯彻了总理的这些指示。总理指示:“抗日高潮中大批学生、知识分子湧进革命洪流,他们中有曾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及其外国组织的,只要没有隐瞒,都不能当做国民党反动分子来抓。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被捕被俘已经审查过非自首叛变分子,不得再当叛徒抓,不要弄得人人自危。”吴瑞林利用各种机会和各种关系,把总理的各项指示及

时地广泛地传达开来。

1969年春节初三夜晚,总理把他找去作了长时间的谈话。总理让他贯彻中央碰头会精神:协和医院的张孝先、北京医院的伍杰、吴蔚然、天津的脑系科主任赵武成,还有黄家泗、眼科三〇一的张福心、同仁医院的张小楼:毛主席说,他们常给我们看病,有人说他们是特务,为什么不害我们?也不要说他们是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没有改造的等等。你要把这个精神好好地讲一讲。总理说海军管的院校很多,这些院校的老专家,老教授都要保护,有些是从国外回来,这有什么不好,他们从国外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本身就是好的事情嘛!这些教授们都是有贡献的,不要关他们进牛棚,要他们回到原来的房子里去。你写的那个牙科医院的报告,我已经批了。要把他们都找回来,新修一个牙科医院。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没有牙科医院,没有专门人才是不行的嘛!总理说,军事科学院,国务院的七机部、航天部、交通部都是你们海军管,你们的付司令赵启民,二十三基地的杨国宇,北海舰队的张远培,所在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很多,国外回来的高级专家特别多,像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梁学潘这些专家是不可多得的,一定要把他们保护好。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个人安危逃回来,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欢迎吗?还有李泗光是有独特见解的地质、石油专家嘛!外国人说中国是贫油国,他说是富油国,他说得对,已经为我们海空军做出贡献,搞出大庆油田来。总理说,青海的九院关牛棚的人过多,那里是搞先进武器的,不能让它长期瘫痪下去。要把他们搞垮了,将来你海、空军是要吃苦头的。总理说,还有一批是解放初期我党派去苏联,东欧的学生,派出时都是选拔优秀的苗子,不要把他们说成是臭老九或者是旧知识分子,那样搞我们今后要吃苦头的。要给老红军、老八路、解放式的干部都讲清楚,这是国家的重要的力量。要尽快将他们解放出来,尽快恢复工作,恢复原来的生活待迁。首先是恢复他们的名誉。搞事业要靠更多的人才,我们这样的大国,只少数人是搞不起来的。我们技术落后,只有通过这批人,才能工作起来。怎么能说他们是臭老九呢?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大游行的第三天晚上,总理找吴瑞林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你准备两天,不管别的事,考虑考虑:①东北战场,②华北战场,③西北战场怎么办好,准备打它两三年。”吴瑞林按指示闭门考虑两天,总理叫他去谈,谈到深夜,总理看看表说:“快十二点了,今晚就讲到这里,在我这吃晚餐吧!”就餐中,总理说:“我再给你出个题目,是首都如何防御的问题,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还到这个地方(东大厅)来谈。”于是又谈一夜。吴瑞林《散稿》

中记述颇详(有23页约6000字),这是吴瑞林留下的《三北及首都防御构想》,其中有总理的许多插话,这可能是战略学的很好的教材,将来会被人们所重视。

吴瑞林来海司主管作战工程,他拼力工作,累休克了,少事缓解,继续工作,贡献颇丰:大力发展了造船工业;监造核潜艇并主持下水试航;架设长波电台;规划北京、天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战备工程,等等,这里不能详述。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吴瑞林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会上他抵制了李作鹏老婆董奇彩等揪斗肖劲光的阴谋活动。在酝酿政治局名单时他秉承董必武的指示,在小组会上向同组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将军提问:某月某日有人向你做过举报吗?“有!”□□□将军答。“你送那去了?”“送给上边了!”“上边那一位?”“……”□不答。结果,□□□政治局委员落选并被迅速调离北京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去了。这是吴瑞林襄助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武老稳妥地揭露了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导致九届二中全会对陈伯达的专案审查,为党剪除了害人虫——假马克思主义权威。林彪虽在九大成为唯一的付主席,并在《党章》上写成毛主席的接班人,但陈伯达案的举发,也就注定了他垮台的命运。这是吴瑞林这位苦孩子出身的将军的传奇式生涯中又一奇迹,是他在十年动乱中为党建立的殊勋。这是一段不为人知的轶史,他留下有口述录音,与九大后史实发展相印证是吻合的,说明《录音》可信。有此一举,那些诽谤他上了林彪贼船和投靠“四人帮”等等,不过是叭儿吠象了!研究历史的人不可不研究这份《录音》。

《散稿》中说九大选中委时,他给大会秘书处信,提出自己不当候选人,经查属实。现将大会《简报》录下:

会议简报

西北组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吴瑞林同志的来信

大会秘书处:

海军组提了我为大会候选人,感到各方面水平都很低,当时多次提出不要选我当候选人。因此,我诚恳请求组织,采纳不要提我为候选人。

此致

敬礼!

吴瑞林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七日

(三)冤案沉沉何所惧,横眉冷对“四人邦”

1971年“9·13”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加紧进行,他们的矛头直指周总理。

1972年7月17日至1973年2月20日,在张春桥操纵的海军马拉松式的“五、四”会议上,吴瑞林被非法隔离批斗8个月。1973年2月23日,张春桥定稿上报了以海军党委四届五次扩大会议领导小组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1973年2月24日,中央将张春桥的《报告》印发为《中发[1937]10号文件》。诬陷肖劲光、吴瑞林上了林彪“贼船”,揪住不放。

1947年5月张春桥为了进一步迫害吴瑞林,又同苏振华一起炮制了《海军[74]批整字070号文件》。下面我们仔细阅读一下这个文件的首页:

“吴瑞林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上了林彪的贼船,陷的很深。海军‘四·五’会议后,迄今不仅一个问题没有交代,还妄想翻中央(1973)10号文件的案。最近检查吴瑞林家里的文件,从中发现有关‘北兵南调’、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以及订攻守同盟等材料百余件。吴的态度非常恶劣,气焰十分嚣张,海军广大”

这一页文件的上端有王洪文的“批示”：“不隔离为好,放在外边,可以继续审查和批判。”

吴瑞林生前只看见过这个《首页》。这是苏振华令专案组拿给吴瑞林的：“看！上方宝剑！你放老实点吧！”于是这个《首页》就落到吴瑞林的《散稿》中,至今没有归档。

吴瑞林虽然未见到下文,但他估计可能是要求拘捕“隔离审查”,否则王洪文的批示何以一开头就说“不隔离为好”呢?在海军档案馆我们看到其“下文”很长,洋洋数万言,近似于海政下发的《小册子》(见后。)

这个《首页》是个无价的珍宝!是吴瑞林大冤案的铁证!它把什么问题都证明得清清楚楚了!

“积极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上了林彪贼船”,白纸黑字如何可以赖掉?多年审查证明吴瑞林与林彪案无任何牵连,为什么不给

平反？

“一个问题没有交代”，证明吴瑞林蔑视“四人帮”，保持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本色！

“还妄想翻中央[1973]10号文件的案”，这证明吴瑞林勇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质！甚至可以说他有先见之明：因为10号文件是错误的，所以在给肖劲光平反时，于1979年3月5日《中发[1979]19号文件》已明令撤销了10号文件，指明“所谓‘上贼船’问题完全是张春桥蓄意制造的一桩冤案，应当予以彻底平反。现决定撤销一九七三年中发十号文件”。

“北兵南调”，这是牵涉到全军的一桩大冤案，都平反了，同案人有肖劲光、潘焱都平反了，为什么不给吴瑞林平反？

“态度非常恶劣，气焰十分嚣张”，说明将军八面威风，令江青张春桥恐惧。

江青为修行宫，1970年11月、1971年1月两次到海南，四次打电话或派人传话要吴瑞林来陪她。吴瑞林牢记1962年毛主席打的招呼：任何人不得用他的名义修房子。所以托病托忙，拒绝陪她。“大胆！奇特？危险！？”这是江青憋在肚里的话。现在在批斗吴瑞林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她发泼了：“吴瑞林，你这个小子，根本没有把老娘放在眼里！你是林彪埋藏在海军的定时炸弹!!!”

至于张春桥更不用说了，当年在山东打秦启荣，吴瑞林中路开花，如同甘兴霸闯曹营所向披靡，秦启荣全军为之破胆。出身秦启荣部的张春桥见了吴瑞林就心悸，不敢正视。张春桥暗想：“他同总理如此密切，我要攫取国家最高权利，怎能容许此人存在？！”重大的问题是王洪文批示能不能代表军委，这个文件能不能代表军委。一、为什么不报毛主席？二、当时已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同志，明白表示要复议。三、“四人帮”正遭法办，王洪文批示应予声讨更不可把它奉为圣旨。

所以吴瑞林同志坚决要求中央谴责并明令撤销这个文件！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周总理，喧闹着要“批林批孔批周公”。5月，张春桥、苏桥华用“海军政治部”名义发出小册子《吴瑞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严重错误和罪行的部分材料（供批林批孔用）》。其序页全文为：

“为了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林批孔，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李作鹏、张秀川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吴瑞林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肃清其流毒和

影响,现将《吴瑞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严重错误和罪行的部分材料》印发至连,传达到每个战士、职工、家属,发动全体同志进行揭发批判。此材料希妥为保管,切勿丢失,不得外传。将新揭发的材料,报告我们。

海军政治部

一九七四年五月六日”

小册子除封面及序页外,尚有 25 页(约八千五百字),继续诬称:“吴瑞林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紧跟林彪及其死党,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积极参与反革命政变阴谋,上了贼船,年深日火,陷得很深。早在党的‘九大’以前,他就积极投靠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忠实贯彻‘一·二五’黑会精神,狂热吹捧林彪及其死党,为他们篡党导权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向党猖狂进攻,积极参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在林彪一伙加紧实施《“571 工程”纪要》期间,他突击抢修山海关机场和亲自主持、精心炮制海军北兵南调方案,阴谋策划把大量兵力南调;九·一三事件后,他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自我标榜为海军健康力量,竭力捂盖子,干扰破坏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拒绝党的再三教育和挽救,至今赖在贼船上不下来。”

这段文字为总论,随着小册子展开了以六个大标题为统领的个论,罗织成名,把吴瑞林将军置于死地。文字冗长,不可能也不必要一引述,仅将其六大标题录下:

“第一,狂热吹捧林彪及其死党,大搞分裂活动,为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第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党猖狂进攻,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

“第三,秉承吴法宪、李作鹏的旨意,为林彪扩建山海关机场和三亚机场候机室”

“第四,亲自布置、精心炮制海军北兵南调方案,阴谋策划把大量兵力南调”

“第五,九·一三事件后,篡改中央首长讲话,极力捂盖子,插手舰队运动,干扰和破坏批林整风”

“第六,密令搜集敌台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诽谤的反动广播,送给李作鹏”

这是一篇奇文，八千余言没有一句真话。真可申报迪尼斯记录了！亏得是谎言，如真，就拿这“第六”项来定罪，吴瑞林的脑袋岂不就得搬家了？前面提到这个小册子的内容与张春桥炮制的《（74）批整字 070 号海军党委会（请示）》内容近似，可知这两篇超级谎言皆是出自张春桥的大笔。小册子第六页倒数第 6 行起，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吴瑞林在南海舰队工作时，**疯狂推行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党乱军活动，干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海军建设。**”着重点是引者所加，意在指出这些加了点点的文字，乃是小册作者自供，露出了他自己极左的“疯狂”的尾巴。

吴瑞林强烈要求撤销这个小册子，彻底平反，按原发放范围恢复名产，消除影响。

下面谨将小册子的封面、序页及第①②两页的文字引来，以供参观：

“为了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林批孔，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李作鹏、张秀川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吴瑞林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肃清其流毒影响，现将《吴瑞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严重错误和罪行的部分材料》印发至连，传达到每个战士、职工、家属，发动全体同志进行揭发批判。此材料希妥为保管，切勿丢失，不得外传。将新揭发的材料，报告我们。 海军政治部

一九七四年五月六日”

“吴瑞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 所犯严重错误和罪行的部分材料”

“吴瑞林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紧跟林彪及其死党，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积极参与反革命政变阴谋，上了贼船，年深日久，陷得很深。早在党的“九大”以前，他就积极投靠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忠实贯彻“一·二五”黑会精神，狂热吹捧林彪及其死党，为他们篡党夺权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向党猖狂进攻，积极参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在林彪一伙加紧实施《“571 工程”纪要》期间，他突击抢修山海关机场和亲自主持、精心炮制海军北兵南调方案，阴谋策划把大量兵力南调；九·一三事件后，他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自我标榜为海军“健康力量”，竭力捂盖子，干扰破坏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拒绝党的再三教育和挽救，至今赖在贼船上不下来。”

“第一、狂热吹捧林彪及其死党，大搞分裂活动，为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

权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一、吴瑞林早就投靠林彪及其死党，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1、吴瑞林在南海舰队工作期间，就经常吹嘘他来南海舰队前，林彪“接见”了他，“专门谈了话”，说他是林彪“派来的”。一九六七年海军“积代会”后，吴瑞林便按照林彪死党李作鹏、张秀川“三大助手论”的反动调子，大吹林彪是什么“最好的副统帅，最理想

吴瑞林感情纯真豪放，当笑就爽朗地笑，当哭就泪如湧泉。每逢老战友相聚、彻夜长谈，都是喜泪交加、抒情尽兴。”

他这一生流的泪是超常的多。

1975年4月2日董老(必武)走了，1976年1月8日总理走了，7月6日总司令走了，7月28日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主席也走了。吴瑞林浸泡在泪水中，头发全白了！

10月6日晚粉碎“四人帮”，14日消息公布。吴瑞林拍案而起，哈哈大笑，欢呼“拿酒来！”

……

粉碎“四人帮”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谁能懂得在吴瑞林这里依然照样进行并且变本加厉了呢？两年后，1978年9月7日上午10时，专案组来人宣布苏振华手谕：“吴瑞林必须去南海接受群众的批判，不得有任何违禁。”8日晚保卫处长带一个排用钢锤砸破门窗，强行拉人上车，吴瑞林心脏病发作，未能成行。9日押到火车站，架上火车，押赴三省(广东、广西、湖南)游斗。同时抄家，家属被押解山西候马。

吴瑞林被游斗一个多月，完全以囚犯对待，住关押犯人的房子，残酷殴打，右前额、右脚骨折，心脏病发作几乎丧命。吴瑞林有详细的亲笔记述，谨抽出一页供观：

“1978年9月17日上午，我在广州基地接受批斗后，再去湛江游斗。在飞行中冠心病发作，服速效与长效硝酸甘油，暂时缓和。到舰队驻地湛江，将我关押在过去关犯人后改为拘留房间，三面铁柱栅栏内，铁门，放三个岗哨，激动我心脏病发作，剧烈心绞痛。内勤员杨德云告押送我的专案人员段××，找来舰队门诊部医生。诊断后给我硝酸甘油、给氧气，打了一支止痛针。王医生被斗三天，一个班将人和家具搬上卡车送广东九江修械所，扫地出门。王医生和家属劳动去了，一个十岁左右男孩在江边洗澡，无人管，被水淹死。这是谭

志耕、段德彰、谢长泰(政治部主任)亲自干的。医生诊断时,未说一句话。有押送我专案段××、和内勤员和警卫营哨兵均可作证人。”

据《南海舰队党委文件(1978年7号)》记载:“海军党委很关怀我们的运动,将吴瑞林送南海接受批判。我们在广州、湛江、海口、清澜、零陵召开了批判会共十九次。参加人数达七万余人。有包括舰队领导在内的一百二十一人,对吴瑞林的罪行,进行了面对面的揭批。在湛江批判吴瑞林时,广东省监(纪)委付出记、市委常委等一千五百多位代表参加了批判大会,市委书记等五人作了揭批发言。吴瑞林的严重罪行和恶劣态度,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强烈要求上级撤销吴瑞林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依法惩办。”

这个文件还记载这次“运动”揪出南海舰队“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108人”,这个数字相当惊人!而其中又有多少是受吴瑞林所株连的呢?

……

许多目击者称:在斗争会上,将军成了阶下囚,病体残躯,憔悴枯槁,催人泪下。他回答追问,任凭拳打脚踢,只有四个字:

“没有!”

“造谣!”

声音沙哑、平和、字字清晰,全场顿时肃然。他的声音中蕴有一股剑气,使嚣张者寒栗;使老战友、老部下得到慰藉和满足:“雄风尚在,太好了!……”

这年他六十三岁,体质还算可以,没有折磨死。游斗了一个多月之后,他被押送山西候马的大山根根软禁起了。痛定思痛,吴瑞林沉思起来:“搞啥仔名堂?”“我被你们非法隔离起来时‘四人帮’还未成胎,我和他们如何牵连?弥天大谎!”“为什么往死里整?藏到山沟沟干啥仔?莫不是怕揭他投靠江青的癞疮疤、倒打一耙、杀人灭口?”

吴瑞林不由地想起两件事:当年接苏振华回海军工作时恰逢江青派人给苏振华送来纸条说:“苏振华同志,你这次出来工作,不止要管海军的事,还要管全国的事。”苏振华很得意,顺手把纸条给吴瑞林看;另一件事请看他的自述:一九六五年九月,苏振华在广州军区休息,海政干部部正付部长王建一、黄志强共商南海干部配备问题。他要我到海军任付司令员,王政柱同志到海军任参谋长,我的工作由马龙同志接替,袁益奋、罗文华同志到舰队任付司令,周志先任舰政主任。桂绍彬、肖平调出。谈至此到开中午饭,我回宾馆吃饭。午饭后他叫我下三点钟再去,去后,苏叫我帮他个人办件小事。他说托人在香港

买了一点药,叫我派舰从海上接来。我先说要省委代买合适,有些领导干部要药,我都是代托省委办的。苏说:不行,已经定好了,改了不好。我说:派船从海上去接,是无有这个先例的,不能这样干。苏说:我是托叶帅找人买的,你怕什么?我说:如此更不能办,不能我们犯错误,还关联到军委首长。为此发生了顶撞。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对比有沉痛的评论:“海军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展了‘揭批查’运动,揭批‘四人帮’插手海军的罪行,很自然地牵涉到海军‘四·五’会议以来苏振华同志追随‘四人帮’所犯的一些错误,有的同志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他”。“而苏振华同志却出于个人的需要,改变了‘查整改’原定的内容和重点,推行‘左’的做法,搞扩大化,并借此机会打击一批与他有不同意见、揭发他的错误的同志,动辄点名批判、宣布停职、撤职、隔离审查,甚至逮捕。错正了一大批干部,造成严重的后果。(P:360-361)

……

沉沉冤案,吴瑞林被摧残 20 多年。抄家多次,扫地出门多次。子女全被株连: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原在军中任职,均被逐出原岗位;被斗被关;一个儿媳被关被斗得头发全部脱落;小女儿被迫害得精神分裂至今未愈。部下被株连者无计其数。

综上所述,吴瑞林蒙受了大冤案大错案,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明明白白,必须给予平反。档案是历史的凭证,有了①张春桥亲手敲定的《海军党委(74)批整字 070 号》文件;②海政下发的《小册子》;③《南海舰队党委(1978 年 7 号)文件》的明证,谁要说在吴瑞林这里“不存在”冤案错案,那只能是扯谎和极端的诡辩。可是到了 1990 年 9 月 24 日,他凿实地接到一封公函,说:“冤案”“错案”“不存在”!你看怪也不怪?这乃“今古奇观”欲知端的须待慢慢写来!

(四)党的阳光,温暖他的心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强劲东风,吴瑞林终于迁回北京,有了操起笔杆的条件,遂多方写信,要求平反冤案,引起了有关领导的关怀,其简况:

胡耀邦同志 1979 年 1 月 20 日,在吴瑞林的申诉信上批示:“任穷同志:此件请你商总政处理。(我不了解他所犯严重政治错误的情况,不好发表什么意见。但只要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适当考虑几十年的革命历史,生活上从宽处理,不要株连子女,不要在结论里保留不实之词,并要认真给以改正错误的

机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的教训是很多的。但我们一些同志,口头上说起来都赞成,实际做的时候,又不切实照办,结果弄得党内许多人不同情,自己日子也不好过。这一点,我认为必须反复同一些同志打通思想。)”

(吴瑞林申诉信首先自责说自己在文革中有严重政治错误——耿仲琳注。)

胡耀邦同志 1979 年 1 月 30 日又有批示:

“耿飏、国清同志:

吴瑞林同志的问题,我不了鲜。他的信,我也未转华主席,特转给你们,按照中央的方针,只要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死党,对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同志,特别是对跟随党和毛主席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同志,都应从宽处理,生活上从优照顾,能工作的还应适当地分配一点工作。这对促进全党和全国上下的团结,很有好处。因此,吴究竟是怎样处理为宜,建议予以考虑。”耿飏同志 2 月 2 日批示:“同意按耀邦同志意见办。”

1982 年,军委决定派总政副主任兼纪委书记甘渭汉同志带着海政的《小册子》到南海调查吴瑞林的问题。甘在去前找吴谈话,向吴提出许多问题,吴逐一讲明情况。甘在南海调查了一个多月,回来后找吴谈话说:“老吴:你的问题都完全清楚了,和‘两案’没有任何牵连,没有问题了。老吴,你年纪也大了,不要做实职工作了,到广州军区当顾问吧!”吴感激地说:“服从组织决定!”

1983 年春,军委委员总政主任韦国清同志根据周总理生前和叶剑英副主席对吴瑞林问题的指示,召集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副主任兼纪委书记甘渭汉、军纪委副书记史进前,还有总政的其他工作人员;召集海军副司令刘道生、梅嘉生,副政委卢仁灿,政治部主任邓楚白,参谋长杨国宇研究解决吴瑞林问题,受到□□□、□□□阻挠,□□□也找甘渭汉反映不同意见,问题未获解决。军纪委副书记史进前向吴瑞林说:“你的问题因海军意见不一致,还需要做工作,你等等吧!”甘渭汉还给吴写了一信:

吴瑞林同志:

你给耀邦同志的信,耀邦同志已阅批军委纪委处理。我阅后和海军领导同志谈了你的问题,总之审查的与被审查的双方都应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有什么情况和要求请找海军领导报告。根据你的要求,现将“小册子”退还给你。

此致

敬礼

甘渭汉

二月十八日

为什么海军党委一些老同志积怨吴瑞林而揪住不撒手呢？对此吴瑞林留有申诉材料：

抽人的脊髓制造抗老血清，这是极其损人利己的事件；也是我吃苦头最大、最多，得罪人最多的事件；也是要死的人没死，我保护的人最多的事件。

一九六三年三月，军委在福州召开沿海边防会议，海军指定我和榆林基地司令员袁意奋参加。会议后期罗瑞卿总长主持会议。他来后的第三天，晚饭后他在池塘边散步，我遇见了他。他边走边说：“你为我核实一个问题，是个很残忍的问题，是抽年轻医护人员的脊髓搞什么‘抗老血清’的问题。据说是你舰队中心医院四二一医院的事。你核实清楚后报告我。”

我回舰队后，找保健医生李菁华（女）帮助调查核实。一个月后李医生告诉我这回事。她说：“四二一医院搞过‘抗老血清’，搞了两批共十二个人，每批抽六个人的脊髓。她说这均是男女医护人员。是四二一医院罗祖怡主任领导做的。”我问：“他是从哪里学来的？”李说：“是从东海舰队学来的。”我又问：“是谁指使搞的？”李说：“是领导派人去学习后回来搞的。”我又问：“是那个领导？”李医生拒绝回答。我也明白多了，也就没有深问她了。

一九六三年国庆期间，罗总长到了广州。他找我询问四二一医院搞‘抗老血清’的情况，问我核实清楚了没有？我回答：“搞清楚，保健医生李菁华为我核实的，舰队四二一医院搞了两批，每批六个人，五女七男，均系医护人员。”罗总长立即说：“你未搞清楚。”并严厉地批评了我。

我向罗总长说首长，你还要我在南海工作吗？罗总长说：“你怎么这样说呢？我怎么不让你在南海工作？”我回答：“司令员去核实政委搞的错误，我还能在此工作吗？”罗听后哈哈大笑：“人家说你搞不团结，我明白了，责任不在你。”他接着说：“搞‘抗老血清’这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分工我来处理的，我已经调查清楚了：第一个搞的是东海舰队政委□□□，他搞了四批，每次抽六个人的脊髓，共抽了24个人的。第二个搞的是北海舰队政委□□□，他搞了八批，共48个人。第三批是海军后勤部□□□等人，他搞了四批，24个人。第四个搞的是南海舰队的□□□，他搞了三批，每批6人，共18个人。全国有九个单位搞这东西，海军就占了四起。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是损人利己主

义。我要给□□□同志处分,你看怎么样?”

我沉思了,该怎样回答总长的提问呢?总长催我说:“你讲啊!”我回答说:“总长: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处分是不可能解决□□□同志的认识问题,我建议请总长与□谈一次话,指出其错误,□□□同志是可以检讨的,检讨了。问题就解决了。”总长说:“好,我同意你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文革”中此问题暴露出来,一批从北京、大连来的造反派寻揪□□□同志,我受总理指使,把□保护起来。他们轮番整我,罚站罚跪,搞喷气式,女医护人员向我脸上唾吐沫,我都忍着。我说问题已解决了,总长批评了□□□,他的检讨也上报了(其实□未检讨,也未上报)。同时我还给他们作耐心的思想工作,终于把这些人说服走。□、□、□、□恼羞成怒,我保护了他们,反而恩将仇报,把愤怒的脏水泼到我的身上,使我家三代人受迫害,惨不忍睹,我怎么能想象他们代表海军党委呢?

一九七二年八、九月分,海军四、五会议期间,苏振华政委指使海军卫生部兼海军总医院院长翟真搞了一分‘抗老血清’是搞科研的简报,来为□、□、□、□开脱责任,还诬我利用此问题整他们,为他们平反。三天后,周总理、叶剑英副主席发现了该简报,就批评了苏振华,命他收回该简报。因此苏振华、□□□与我结怨就更深了。

(五)又逢□□□,吴瑞林再倒霉

军纪委付书记□□□改变了甘谓汉的正确意见,他接管军纪委的工作之后,拒绝听吴瑞林申拆。他主持招集海军纪委书记□□率领海军造反派石运启等整吴专案组的人员,还有军纪委的几位工作人员,对吴采用围攻、对质的手段迫吴就范。还出口辱骂。吴瑞林抗议,指出□□□以这种方式处理干部问题是违反党章的。□□□不讲道理,蛮横地宣布:“吴瑞林犯了严重错误,给予撤销党内外职务、降职按正兵团待遇离休处理。”吴瑞林坚决不同意,并且坚决拒绝在《结论》上签字。会议不欢而散。会后,海军就硬性地按□□□的调子执行,迫吴离休。

□□□在川陕苏区时,执行张国焘路线,就关押过吴瑞林,因战情需要,徐向前指名要,吴瑞林才幸免于难。比番又遇上他,吴瑞林自叹倒霉。

……

“文革”中吴瑞林有没有错误?

有!不仅有而且很多!这是他一生中犯错误最多、检讨也最多的时期。

学习《516通知》要表态拥护；打倒彭、罗、陆、杨，要表态拥护；打倒海军头号走资派苏振华要拥护。随着历史的矫正，他恍然大悟，自己说了多少错话，办了多少错事？赶快检讨，一有机会就检讨，向有关同志赔礼道歉、口头的和书面的检讨和道歉都有案可查。这里摘引吴瑞林生前有关自述备查：

我是原海军常务副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的残酷迫害，一九六六年七月就被打倒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又受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之命出来工作的。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我在工作中，说过错话，办过错事，执行过错误的东西，对此我历来是检讨的。根据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受中央委托，在各大军区批林整风会议上宣布，“有错误就检讨，这次检讨了就算了”的指示精神，我在一九七二年海军党委四届五次扩大会议六七百人参加的大会上，作了全面系统的检查，当时的检查材料是刘居英帮我加工整理的，底稿被海军党委一九七三年三月抄我的家时抄走了。就是在我每次被批斗的各种会议上，我亦是作检讨的。按照中央规定对“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只要作了检讨就不追究个人责任。但海军按照林彪、江青“四人帮”的意旨，把我当敌人整了十几年，关了我八年，对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我的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和许多诬陷不实之词，直到现在没有给我平反、恢复名誉，反而结论“吴瑞林犯有严重错误给予撤销党内外职务按正兵团职待遇离休处理”的处分。海军党委给我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给我的处分也是错误的。

吴瑞林是非常认真、要求自己极严、勇于自我批评的人，他生前写申诉总是先检讨自己的错误，然后才说自己的冤案。他的错误都是属于“说错了话，办错了事，检讨了就算了”的问题，根本构不成处分。当时的海军党委坚持一、不予平反；二、严厉处分，那是“文革”的怪物——派性在作祟。吴瑞林当然反对。而且正式的《结论》并未给吴瑞林，后来刘军多次索看，有人就是践踏党章赖着不给看。所以这里只能据第五次稿申述吴瑞林的不同意见。第五次稿全文：

关于吴瑞林同志问题 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

中央军委纪委、总政并中央军委：

吴瑞林同志，现年六十八岁，四川省巴中县人，出身贫农，成份学徒，一九

三二年十一月入武,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入团,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转党,行政六级。被审查前为海军常务副司令员。因与林彪案有牵连,一九七四年五月经中央军委同意,对其进行审查。经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两谋”活动无牵连,但有严重错误,其主要问题如下:

(一)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至八月召开的海军党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在林彪的支持下搞地下活动,妄图把海军主要领导打成所谓“罗瑞卿分子”伸手夺权。吴瑞林参加了王宏坤等人在张秀川家进行的地下活动。六月三十日,吴在宿舍对第二小组召集人说:要李作鹏回来参加会议,要王宏坤出来领导。七月一日,吴和其他两个小组的召集人周志先等以第六、第五、第二小组的名义,正式提出“建议”,要肖劲光、苏振华同志“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会议由王宏坤同志负责领导”,并要在外地的李作鹏“回来参加会议”。党中央、中央军委察觉了王宏坤、张秀川等人的地下活动,专门召开了会议。七月八日,叶剑英副主席亲临海军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常委会议精神,指出“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对此,吴瑞林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海军三届四次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污蔑攻击说:“从七月八日叶剑英传达刘、邓、贺的黑指示以后,会议的性质就完全变了”,“成为一个反攻倒算,围剿革命领导干部并直接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的黑会”。“叶剑英一面篡改林副主席的指示,一面声明他这个人是从不搞鬼的”,“我说他不是不搞鬼,而大鬼小鬼一起搞”。同年十二月在南海舰队党委三届九次扩大会议上攻击叶副主席“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是一个军阀没有改造”。

(二)

吴瑞林在南海舰队搞分线划派,层层站队,打击迫害干部。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十三日召开的舰队党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总结中,吴讲“通过这次会议,形成了舰队党委的左派领导核心”。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吴从北京发报给南海舰队宣称:周志行、张永前、李杰民“始终占在海军李、王、张首长和我一边”,“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坚定的革命左派”。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吴背着舰队其他常委召开舰队第24次常委扩大会,分析湛江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对舰队的影响和内部的问题。出席四人,只有吴是常委,

其他周志先、张永前、李杰民均不是常委。吴在会上讲：“现在我们四个人开会，高（希曾）、桂（绍彬）（高为舰队参谋长、桂为舰队第二政委，均是常委）快回来了，有些重大问题，我们几个人先统一认识，取得一致意见，然后交常委讨论”，“我们在常委中还不是优势，在干部中也不是优势，我们要下很大的努力”。

根据吴发的电报，舰队各级办了站队学习班，使很多的同志受到了打击迫害。对此吴负有领导责任。

一九六七年五、六月，吴亲自布置少数人，整了诬陷方正平同志的材料。六月十五日，又签发了《关于揭发斗争方正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请示报告》，污蔑方正平同志是南海舰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黑司令部彭、罗在南海的代理人。在舰队“三·八”会议上进行批判斗争。吴又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签发了立案报告，致使方正平同志被专案审查达四年之久。南海舰队修理部原政委黄华和川岛水警区原政委曾文同志，因反对李、王、张和吴瑞林同志的地下活动，被诬为“黑干将”、“黑打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亲笔批示对曾文“要组织斗争”，对黄华“同意立案”，均惨遭迫害。对此，吴负有直接责任。

国家海洋局原局长齐勇同志，在海军“三·三”会议上严肃批评过吴瑞林。为此，吴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和一九六八年四月接见海洋局领导和“专案组”人员谈话时，污蔑齐勇同志“蜕化变质”，“挑拨关系”，“齐勇和方正平参加对我的围攻”，“搞他没有错”，并支持把齐勇同志拉到南海舰队和“方正平专案组”一起“联合作战”。以上谈话对打击齐勇同志起了很坏的作用。齐勇同志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晚，写下了“在海军党委扩大会我对吴瑞林的意见我保留是对的，如果我错了我愿受到任何处分”的条子后，含冤而死。

吴瑞林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员后，一九六八年十月在海直清理阶级队伍交流经验会上讲：“海军直属各大部清理阶级队伍形势大好，点名一千多，揪斗130多”，并要求“揪斗批紧密结合，薄弱单位要突出”，使不少干部受到打击迫害。十月十八日，李、王、张炮制了一个打倒半打倒的86名正师职以上干部名单，其中有海军、海直机关各大部、各舰队、院校的主要领导，吴也圈阅同意。

吴瑞林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任湛江地区军管会主任，一九六八年四月，吴利用职权派人把在地方工作的方正平同志的爱人张华同志抓到舰队政治部驻地，进行揪斗逼供，关了八个月。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吴根据南海舰队文工团群众组织写的李祥岩（湛江市公安局长）他们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军

队未介入“文化大革命”，就知道军管要犯错误的材料，亲笔写信给湛江市革委会主任花天才（又名花践，原任南海舰队政治部检察院副检察长）同志说，李祥岩“在六七年二月他就向中央文革告过我的状”，“说明他与罗道让（中共湛江地委副书记，原在中央保卫局工作）与罗瑞卿、杨尚昆是一伙坏东西，出谋夺军权”，令花“坚决查办”、“逮捕”李祥岩及靳怀珠、陈述同志，致使他们被变相关押一年多。

综上所述，吴瑞林同志犯了严重错误。他在受审期间承认了一些错误事实，但有些问题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也不承认。考虑到吴瑞林同志是个老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作过一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建议给予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按正兵团待遇离休。

（六）耐心驳斥污蔑不实之词

吴瑞林耐心地向《结论》作者石运启等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有文字材料和录音可证，而那录音又录下石运启无耻诡辩的花滑腔调，是他的大女儿海波偷录的）。他认为石运启等不上报他的不同意见，并且不让他《结论》上签署不同意见，是违背《党章》和《准则》、是践踏了他的党员权力。

现将吴瑞林对上述第五次稿的不同意见分述如下：

一、不同意“因与林彪案有牵连，一九七四年五月经中央军委同志，对其进行审查。经查与林彪及革命集团的‘两谋’活动无牵连，但……”这番昏话。王洪文批示同军委同意不能相提并论。要求如实地写明“四人帮”迫害诬陷，如实地写明诬陷的罪名，如实地写明三省游斗是诬陷，所立罪名“投靠四人帮”更是莫须有的污蔑，如实地写明吴瑞林遭受的是大冤案。经甘渭汉查明与两案无任何牵连，就必须撤销张春桥炮制的《（74）批整字 070 号文件》和海政下发的《小册子》、撤销《南海舰队党委文件（1978 年 7 号）》，并消除这些文件的流毒，郑重地为吴瑞林平反。决不可以如此诡辩地轻描写之后而在“但”字下面大作文章！

二、《结论》摆在第一位的问题竟然是个“地下活动”。到石运启落笔时算来这已是 18 年前的事了，这么久的陈年老账怎可翻出来处分人并且列在《结论》的第一位呢？可见石运启已是黔驴技穷了！

“三·三”会隙，同志们呼叫着拉吴瑞林到张秀川家吃西瓜，王宏坤提出要扯扯会上的问题，吴瑞林说句“算啦，会下不扯会上的问题！”拍拍屁股就走了。这么个事当时就有人要给吴瑞林扣上参加“地下活动”的骇人的政治大

帽子。吴瑞林说：“李王张有无‘地下活动’，我不知道。我吃口西瓜就走了，给我扣这个大帽子我是不戴的！”“三·三”会议决议也没有给李王张戴上“地下活动”的帽子，现在竟要硬给吴瑞林扣上，岂不是太霸道了吗？！而且把这种子虚无有的事，放到了第一位，可见石运启是抓不到过硬的把柄了！

查“三·三”会议于1966年8月25日结束，通过了《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的决议。决议中并未写入“地下活动”的问题。对石运启翻旧账无中生有地扣政治大帽子，吴瑞林生前有详尽的申诉，谨摘来备审：

结论稿称我“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李作鹏及王宏坤、张秀川篡夺海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站不住脚的，是不能成立的。

海军党委于1966年5-8月召开的三届三次会议是学习贯彻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会议。会议主持人海军党委第一、二书记在开幕时宣布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贯彻“五·一六”通知，主要是提高认识，互相学习，互相批评，结合实际“肃清罗瑞卿在海军的影响。”历史证明这个会议是完全错误的，我在会议中根据“五·一六”通知和党委第一、二书记讲话的精神发过言，当时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应该吸取历史教训。

但在“三·三”会议中，李王张搞阴谋活动我是不知道的，也是没有参加的。王宏坤在张秀川家，以张秀川请吃西瓜为名搞密谋，我是不知道的。我当时在操场看电影，是张敬一到操场临时拉我去的。吃西瓜时，王宏坤提出要扯会议问题，我即回招待所了。他们如何搞密谋我是不知道的。此问题在“三·三”会议期间，我就在常委和小组召集人会议上讲清楚了。所以结论稿中称“吴瑞林参加了王宏坤等在张秀川家进行的密谋活动”是不符合事实的。张奎乙、周志先所提证明材料是为了解脱自己，所提地点、情况，是不符合实际的。

关于“要李作鹏回来”参加会议的问题，我当时认为李作鹏是常委，又是付书记，他应该参加会议，开会前我曾当面向苏振华政委提过，苏振华政委当时回答说：“李作鹏是个好同志，他不要检讨了，不要回来了。”小组讨论中我们小组有人提出要李作鹏回来，我是与马忠全同志谈过此事。至于“要王宏坤出来领导”是我们小组海军工程部政委杨怀珠同志提出的，其他人并未提过，也不是南海舰队同志提的，更不是我提的。会议第21号简报系会议秘书处整理的。而且该天的小组讨论中，南海来参加会议的五个人均未发言，只是海直机关干部发的言，会议21号简报，不能代表南海组的意见。当简报发出

后,我就向常委和召集人会议提出过此意见。就这两件事来说,也是属于正常的会议活动,不是搞阴谋。

叶付主席向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点了王张的名,并没有点我的名。王宏坤、张秀川在叶付主席传达中央、中央军委的批示后,躲在家里不参加会议。会议以我去张秀川家吃过西瓜和会议 21 号简报来整了我,这是事实。事实证明,那时整我就是整错了我的,现在事过十六年了,对我的结论还以我去张秀川家吃过西瓜,来错误地认定我参加了王、张的“密谋活动”,是不符合事实的。将叶付主席指出李、王、张搞阴谋活动的讲话,大段地写在我的结论上,更是不应该的。又以此上纲为“吴瑞林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主犯李作鹏及王宏坤、张秀川篡夺海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更是没有根据的,是不能成立的。1968 年 6 月,中央军委下令调我来海军任付司令,因我从来不愿到高级领导机关工作,我还是不愿来的,直到国庆观礼时,经周总理谈话后,我才到职的。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看,我从来没有夺海军领导权的动机和言行的。结论稿这样提是强加于我的,我是坚决不能接受的。

1969 年 4 月,召开“九大”学习班,东海舰队张逸民、杨宝贵,北海舰队王天保还有一个大队干部,南海舰队十一支队武毅,他们几个人联合起来,控诉肖劲光同志,我多次做工作,但由于李作鹏的老婆董奇彩操纵,在学习班发难。为此,我报告了周总理,提出不当九大代表,总理批评我说:“你不当,人家会顺水推舟。”总理又指示:“组长是李作鹏,你要他去制止。”我找到李,传达了总理的指示,李倒打一耙说:“你为什么不早向我反映?”我说:“天天有人给你讲!”这才制止住控诉肖劲光同志的问题(肖劲光同志了解这情况)。

“九大”预选时,李作鹏的老婆董奇彩和李凯积极活动竞选中央委员,我对他们的行为不满意,向总理写了我不当中委候选人的报告,总理指示印发“九大”主席团。总理讲,董奇彩、李凯当中央委员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高潮。并指示我坚决抵制住(肖劲光同志也可作证,有简报可查)。

1969 年 6 月,海军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预选海军党委委员时,在李作鹏的预谋下,由王宏坤主持常委会,要把董奇彩、李忠、李凯、肖云、范丕忠等造反派选到海军党委,排挤一些老同志,达到他们操纵海军的目的。我忍不住在会上拍了桌子,我说:“文化大革命我耳朵被打聋了一只,眼睛险些失明,我坚决反对这些人当选党委委员。”肖劲光同志问我:“老吴,怎么回事?”我说:“他们把海军搞成这个样子!”王宏坤说:“若不选上这些人,海军搞文化大革命还搞个啥?”会后,我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是个新动向。”要我坚决

抵制。肖劲光、王宏坤、周希汉、赵启明、潘焱、张敬一参加了这次会议，还有组织部副部长靳文进。党委秘书王才、李述篆作记录，可以查证。

综上所述，我在海军工作的三年期间，正是李、王、张全面把持海军大权，张春桥直接插手海军工作最猖狂的时期，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我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我始终没有屈服“四人帮”对我的压力和排斥，没有参与李、王、张他们各种的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历史是最好的证明。

摆在第一位的还有“书面发言”攻击叶剑英元帅。稍为用心想一下就会提出疑问：“这能写入结论据而给人家撤职降级处分吗？”

当时吴瑞林到阿尔巴尼亚访问去了，回国挨整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书面发言。”“这是谁写的？”他一转念：“不能追查！”这也是他的习惯：在他看来，有些事作为领导者承担责任，担起来不过四两，如果推到下属肩上，可能就成了千斤。如果追查，写稿人可能倒大霉。吴瑞林就是这样一个人，勇于承担责任，愿意保护下属。他眼珠一转，聪明地拿起话筒：“报告叶帅，我犯了严重错误，向你检讨道歉！”他按发言稿内容向叶帅作了检讨。叶帅说：“算了！皇帝老子背后还可以骂三声嘛！检讨了就算了！”电话后他又写了书面检讨，后来见到叶帅又当面检讨此事。叶帅又说：“检讨了就算了！”所以，吴瑞林说这个问题他得到了叶帅的特赦，不同意写到《结论》上。

三、《结论》第二位的内容文字冗杂，难辨巨细。亏得吴瑞林逐条都有反驳：

1、方正平问题是上压下挤，吴瑞林顶不住，犯了执行的错误。中间竭力保护，结尾多次检讨、当面陪礼道歉。不应再写到《结论》上了！

2、我负责湛江地区军管仅两个多月，根本不存在逮捕关押地方干部的问题。说1968年4月我利用职权派人把在地方工作的方正平同志的爱人张华同志抓到军内批斗。那时我不在南海舰队，而是在北京治病，我根本不知此事，完全是强加给我的。但张华同志被关押在舰政八个多月，我1968年5月回湛江后不知道情况，又未过问，负有领导责任。

3、“国家海洋局原局长齐勇同志在海军‘三·三’会议上严肃批评过吴瑞林。为此，吴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和一九六八年四月接见海洋局领导和‘专案组’人员谈话时，污蔑齐勇同志蜕化变质，‘挑拨关系’，‘齐勇和方正平参加对我的围攻’，‘搞他没有错’，并支持把齐勇同志拉到南海舰队和‘方正平专案组’一起‘联合作战’。以上谈话对打击齐勇同志起了很坏的作用。齐勇同志

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晚，写下了‘在海军党委扩大会我对吴瑞林的意见我保留是对的，如果我错了我愿受到任何处分’的条子后，含冤而死。”

喲！人命关天！可是越细看越不明白齐勇之死究与吴瑞林有何干系！

这段文字是石运启移花就木的妙笔，他催眠术式地把齐勇“含冤而死”和吴瑞林挂上钩。

“接见海洋局领导和‘专案组’”这几字上的着重点是耿仲琳所加，我觉得这是不顾常识的无稽之谈，是石运启考虑不周漏出了任意诬陷的马脚。打倒了齐勇的“海洋局领导”和“专案组”那都是造反派大老爷，吴瑞林是南海舰队的，管不着海洋局，更有什么资格接见这班大老爷？谁接见谁？专案组就是专搞逼供信，石运启还能不懂吗？真是信口开河，漏洞百出。吴瑞林生前有调查：

据我了解齐勇同志死前写下这个条子的背景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晚上七时十分左右，海洋局齐勇专案组的刘安宁、程丕荣、赵瑞亭和齐勇谈话，赵瑞亭说：“你中午搞的什么名堂，这样下去对你有什么好处，不要装疯卖傻（注，中午齐勇自杀未遂），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齐勇说：“你们把我打倒了吧！打倒算啦！”赵说：“你愿意倒下去，还是愿意爬起来？”齐勇说：“你们想叫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可能！”赵说：“你过去的错误和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的错误呢？”齐勇说：“我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我对吴瑞林意见还要保留。”这时刘安宁马上挑动说：“你敢写出来？”当时齐勇不写，思想斗争很激烈，而刘安宁拿着纸和笔一再逼齐勇说：“你写！你写！”齐勇被逼的没有办法，只好写了条子。刘安宁拿到条子后就说：“你这是翻案，你翻吧！越翻越好！”进一步激化矛盾。在齐勇回到楼上之后，没过多长时间跳楼。齐勇之死是专案组大搞逼供信整死的，条子也是专案组逼着写的，拿来条子加害于我这不正是卑劣的罗织术吗？齐勇同志被迫自杀是有案可查的，国家海洋局有档案可查。我请求诉诸法庭。如果齐勇的死因是我所迫害，我愿负法律责任。如果不属事实，是对我的诬陷，诬陷者也应负法律责任。

4、诬陷吴瑞林迫害干部“点名一千多，揪斗130名”正师职干部“86名”，那一段奇文也是石运启的罗织术的妙笔。石运启善于取“物证”，上面是齐勇的“条子”，这回是吴瑞林的“本子”。“这是你的笔迹，你不能不承认吧！”石运启如是说。真是机关算尽最聪明呀！

结论中指出68年10月我在海直大会上点名一千多揪斗130名，是不符合事实的。

一九六八年六月，我来海军参加三代会，我与肖司令坐在一起。肖说：“老吴，你不要回去啦，派人将家搬来吧！”我问：“肖司令怎么回事？”肖看我不知情，不再讲了。我后去问李作鹏，李说：“是肖公个人的意见，常委还未讨论。”王、张对此未表态。会后我即去医院做点滴治疗。两个礼拜命令公布，群众贴出大字报，突出“李王张吴”，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一面上报海军党委、中央军委、周总理，一面仍即回南海工作。

十月国庆观礼周总理批评指示我到职。在李作鹏的刁难下（肖司令正忙于陪几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对海军工作只做原则指示），我请求王宏坤同志召集各大部首长汇报，传达总理的指示。总理规定一律用我个人口气讲，不用传达他的指示的口气。正开会时，接到报告海航保卫处长姚元贵跳楼身死。我讲话后各单位立即传达，制止了死人问题。当时海军在中央、国务院十几个部委支左，还有北京市若干单位。总理让我向他反映传达后的情况，我说除李东野在外贸部支左不听招呼被调回海军，由白相国接任外，其他均按总理指示做了稳定工作。

经由李作鹏指示，海军文办召集的万人落实政策大会上，临时由王宏坤同志指示要我去讲话，是海军文办写好的稿子，我发现文稿中有点名 1000 多揪斗 130 多人的数字，我认为不妥之处，记在我的小本上，在原稿上勾掉后才讲的。第二天我即写报告给总理，并提了三条建议：①不到外单位揪斗领导同志到海军开大会批斗；②不邀请外单位的群众组织参加批斗大会；③海直住郊区团以下单位搞正面教育。总理批准了我的三条意见，说三条建议很好，同时总理规定：调一个管进市内由军委办事组批准，一个团进京由国务院审批。此指示由我传达到处级干部。但第二天李作鹏竟又指示文办又召集了万人大会，还要我去讲话，我睡眠不到会以示抗议。李作鹏在这个会上抛出正师干部“86”名的数字。

事实清清楚楚，吴瑞林恰恰是反对“点名一千多，揪斗 130 名”和迫害“86 名”正师职干部的，可是经过石运启的罗织，竟成了吴瑞林的罪名，你看可怕不可怕！

然而罗织术是经不起推搞的，只要稍微想一想，吴瑞林不愿来海司，国庆节见到总理，挨了批评，才不得不上任，怎么才到任伊始，海军点名一千多，揪斗 130 名，迫害 86 正师干部的罪责，就落到了他的头上？石运启、石运启，你搞的也太玄了！

5、结论稿称：“在广东省湛江地区负责军管期间内，非法逮捕关押地方干

部”。

南海舰队1967年3月执行“支左”，四月执行军管任务，六月底奉总理指示将军管任务交五十五军。我负责军管工作仅三个月。我对地方干部一直是本着保护的态度，不支持群众乱揪、乱斗、乱抓人，搞武斗的做法。我与王政柱、桂绍彬、王全珍等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曾委托桂绍彬同志向地方干部打过招呼，因而被指责为犯有右倾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对我给花天才要“查办”或“逮捕”李祥岩、陈述、靳怀珠的信的问题，主要是据一份揭发材料，说他们冲击军事指挥机关，炸毁地下指挥所的门，抢走机密文件和通讯器材，我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联合发布的“公安六条”的精神来处理的。如揭发材料查无实据的话，那也是工作中的失误，致使他们被变相关押一年多，应负直接责任。除此之外，我没有要下面关押过什么人。

黄华同志是海军南海舰队修理部部长，舰队修理部位于广州黄埔，该处的文革运动由广州军区直接领导，黄华同志的问题是由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和广州军区处理的。曾文同志是海军卫校政委，不属南海舰队领导，曾文同志的结论是由海军后勤部作的。所以黄、曾案我都不能负责。

6、结论稿所提“把持南海舰队党委的领导权，搞分线划派、层层站队，打击迫害干部”的问题，不符合历史情况。

舰队1967年7月28日—8月5日召开的“三·八”会议批方是错误的。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我即将方送走，采取了保护措施。会议前后，海军派了几批院校和开展四大的“揪方战斗队”和地方造反派结合把矛头即对着我。在近万人揪斗、围攻我的紧要时刻，周志先擅自到北京告我，一是批方不力，二是“支左”问题上犯了右倾方向路线性的错误。1967年10月初，总理即电话告知，要我来京治病。我临行前，王宏坤电话通知“南海舰队党委工作由周志先同志主持”。从1967年10月至1968年5月长达8个月的时间，南海舰队党委工作是由周志先主持的。他既不与我联系，亦不向我报告，海军亦没人去看过我。在此期间我仅在李作鹏的催促下，发过一个电报，对部队产生了不良影响，我多次检讨和承担责任。从组织上来说，这段时间我是离开工作住301医院治病，没有管工作的任务，那能说我把持了南海舰队的领导权呢？就在这段时间内，南海大办学习班，召开了各级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搞了“分线划派，层层站队，打击迫害干部”。怎么搞的？搞了多少？我都不知道，对此我实在无法负领导责任。我于1967年10月来京治病后不久，海军即将王政柱、桂绍彬、袁意奋（原担任付司令）等同志调京参加海军学习班，后又留他们分别在

海后、海航、海装工作。我虽在京,海军亦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方正平同志被批判,肖平同志被冲击,高希曾同志为避免群众组织的揪斗,下部队蹲点了,原领导班子(常委)就仅有我和王全珍同志两个了,是海军有意把南海舰队的领导班子拆散的。1968年5月,南海情况紧张,总理指示我回去处理部队发生的问题。我是舰队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难道我不应该出面主持工作吗?怎么能说我把持了南海舰队的领导权呢?

7、关于态度问题,吴瑞林说:“区分态度的好与不好的真正标准是‘实事求是’,任何时候都要本着事实的本来面貌讲话,对的要坚持,错的要纠正,是共产党员的党性。”

自1971年“9·13”后,张春桥在海军就把矛头对着周总理及海军领导。拿我当靶子打。海军“四·五”会议以来,张春桥及苏振华政委就以我“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的罪名来整我。对此,我的态度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维护总理及海军领导同志。他们大造我“态度很坏”的舆论,是上了中央[1973]10号文件的。1947年5月4日,苏振华政委又将此罪名上报中央下发展众设专案审查我,叫群众批斗我,1978年文化大革命都已结束了,还将我押到南海游斗,我的态度仍然是坚持实事求是。他们又给我戴上“态度恶劣”的帽子上报下通。他们查不出定罪的真实材料,就以“态度不好”来拖着,挂起来达十年之久。我向上反映情况,又给我加上“告状”的罪名。我提出应将立案审查我的内容给我做出结论,澄清是非,又有人给我戴上“有错不认错”“回避事实”的帽子。中央规定认罪认错要实事求是,要证据确凿,难道一个共产党员坚持这一正当的要求就是态度不好吗?

总之,①档案证据齐全,吴瑞林蒙受大冤案大假案大错案,不给平反如何向后人向历史交代?②不给平反,反而给留了个“严重错误”的大尾巴,这个尾巴用“发言稿”、“纸条子”、“小本子”等“证据”罗织得好像天衣无缝,但假的就是假的,它经不起分析,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给人留尾巴,机关算尽最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想向人家泼脏水不曾想却弄得自己一身腥臭!吴瑞林将军不朽,后人会给他树立一座丰碑;而那位擅长罗织术的人,后人也会纪念他,给他立一个矮小的耻辱柱。

(七)尾声

那个留尾巴的《结论》得到了中央军委纪委的《批复》:
“海军党委:

(1984)海审字第 001 号请示。

经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你们对吴瑞林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和撤销其党内外职务,按正兵团职待遇离休的处理意见。”

吴瑞林不服,继续申诉,得到的答复:

“吴瑞林同志:

最近,我们收到军委首长转来你于今年 6 月 26 日写给江总书记的申诉信。根据军委首长指示,我们再次对你的申诉进行了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经中央军委批准同意的海军党委 1984 年 2 月 28 日对你的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是依据你在“文革”期间的错误作出的。对你的结论处理所依据的错误事实都与你见过面,并且用证据、事实逐个当面答复了你的申诉意见。对你的结论处理所依据的错误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凿的,不存在什么“错案”、“冤案”。

我们已将对你的问题的处理情况及有关材料上报了军委首长,军委首长对你的问题是了解的。你是一个老同志,希望能正确对待组织处理,认真吸取教训。

海军党委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们于前文提到的那个“今古奇观”现在出现了。“明明白白的大错案大冤案为何‘不存在’了,诡辩!”“这信稿一定是石运启拟的!”“乌云遮不住太阳,我得详细向江主席申诉冤情。”吴瑞林将军如是想。

1995 年 4 月 13 日 19 时他得知陈云同志逝世,瘫到沙发上。14 日 9 时他和刘军一起到中南海吊唁陈云同志,看望于若木大姐。

他构思悼念陈云老的文章,并悔改没有把自己的冤情向陈老倾诉……

16 日,吴瑞林同志心梗,到三〇一医院抢救。弥留之际委托刘军替他洗雪冤案。21 日凌晨 2 时 45 分含笑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年。

30 日中午,八宝山火化炉中运出他洁白的骨灰,他的子孙们沉痛趋前摩抚,拣出一颗晶莹的金属小球,这是他生前无法取出的敌人的子弹。他负伤 7 次,伤 11 处,是二等甲级残废。

1997 年 3 月,魏传统将军征集纪念诗文 65 篇,凡二十六万五千字,汇编成集。巍巍题写书名《最可爱的人》。

大书法家武中奇为将军挥毫:

“六十年革命生涯身先士卒威风八面不愧将军”

“廿余载风雨历程忠于马列坚持党性堪称英烈”

这下联是赞扬吴瑞林不屈于“四人帮”的表现。

《辽南日报》随军记者耿仲琳为将军哭挽：

热爱人民治军如铁 出神入圣睿在真知
国内战历智勇兼奇 援朝援越韬略精益
暮年奋笔再造甲兵 八秩岁月无一虚度
雄风永驻浩气长存 党的赤子国之典型

耿仲琳敬佩他是国人可贵的典型，他的事绩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保尔更感人。

1997年11月11-12日原42军炮兵首长刘恒泉向“吴瑞林传记组”说：“吴瑞林是纯粹的人，我最佩服的两员战将是韩先楚、吴瑞林。”

伟战！

(2002年稿,2004年8月20日抄清)

后 记

档案是历史的凭证。周恩来同志曾经指示我们“要用档案印证历史”。从汇编的这些文稿中可以看出，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贯彻执行了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指示，用大量的第一手档案材料，从不同侧面深刻揭露了叛徒张国焘的丑恶咀脸，精确地印证了四方面军渡河和西路军失败的历史真相。也把竹郁任意腌割档案材料，竭力为张国焘翻案的种种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了。

然而，现在我们还不得不奋然来辟谣。

《作家文摘》第541期明晃晃摆着这样的文字：“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这是……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说明和附件上批示”如何理解？《说明》有28页，附件页数更多，究竟批在哪“上”了？

当年归档的材料有：

①李先念1983年3月12日给小平的《信》，这个文件只有一页，不过200多字。

②陈云83年3月8日给李先念的信，上述《作家文摘》已经全文公布了：“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你看，陈云看了“两遍”，但竟未置可否，“赞成”的是“存档”，并非是赞成《说明》，可见有人偷换了概念！

③可是那个《说明》，是1983年2月25日写成，长28页，那上

面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常委圈点批示。

④是竹郁筛选的历史电报,那上面更无常委阅批的痕迹。

⑤是《中央传阅文件单》(是1983年3月25日即小平批示后传阅的)。那上面除小平、陈云名下注明“已阅”外,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名上都划了圈,胡耀邦的圈上方注明3.25,说明当天就传下去了,可以推知他对《说明》和《附件》决未细阅。叶剑英只划了一个圆圆的圈。西路军问题他很清楚,他在悼董振堂诗中早就说过“英雄死在错路上”,“高台为尔著荣光”嘛!佬大年纪,想是不屑去看那个《说明》和《附件》了。

怪啦,那里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说明》)”这种事?!不客气地说,这是明目张胆扯谎!

综上所述我们就明白了,归档文件中有两个李先念说明,一个是短《信》,一个是长文《说明》。小平赞成的是短信而不是长文。试想,圣睿的小平岂能赞成竹郁手笔漏洞百出的《说明》??按扯谎者的说法,小平的批示是批到《说明》和《附件》上了!可是事实却是小平的批示明白地批在短信的楣额。那些无法无天的人,公布了当年归档的文件,却隐瞒了这个短信!!!而且,他们把《说明》做了“摘要”,实际上是做了腌割,做了手脚。

在《信》中,李先念承认“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存档)处理。”

小平没有“审改”那个《说明》,而是“赞成这个说明(即信),同意全件(包括《说明》和《附件》)存档”,把问题束之高阁,不准他们公开写文章闹翻案。小平的批示是1983年3月22日作出的,后来(1983年10月4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编辑组回收载有竹郁闹翻案文章的《党史研究资料》第九期,就是贯彻中央不准公开写文章闹翻案的这一精神的明显的证明。

至于他们公布的《说明(摘要)》摘掉了什么呢?

“由于时隔四十多年,记忆不一定准确,加上当时我只在三十

兰台稿存

军,对全面情况,了解也不多,……”你看,《说明》开场白的这些大实话不是十分重要吗?他们为什么要摘掉呢?

田逢禄

